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将风云录 (二)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0周年华诞。为隆重庆祝这个盛大节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批推出《将帅风云录》系列丛书六集，即：《十元帅风云录》、《大将风云录》、《上将风云录》（一、二集）和《中将风云录》（一、二集）。

这部丛书，所收录的人物，除极个别走向反面之外，都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披荆斩棘、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过的我军高级将领。当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有功勋卓著、驰名中外的战将，也有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杰出的后勤工作者。他们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推翻反动统治，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肩负起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重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又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后辈的楷模，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然而，本丛书并不是着重反映他们戎马一生的历史传记，而是针对人物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撷取他们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最为闪光的、富有传奇特色的轶事和风采。俗话说，“一叶知秋”、“滴水映海”。轶事和风采同样能让人们感悟到，革命前辈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曲曲感人肺腑的绚丽乐章。

革命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走过了70个春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里程，创造了千古不朽的辉煌。70年如一日昭昭于世。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值得我们崇敬的革命老前辈们，为世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概括起来，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人生情操，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严谨求实的作风，认真科学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不正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今天一代一代革命继承者永志不忘，躬亲实践的精神准则吗！

基于上述思考，在建军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把这部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能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若诚能如此，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编 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中将风云录

大决战中的成钧

谢雪畴

成钧（1911～1988）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1年6月生于湖北省石首县一个贫农家庭。青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参加石首农民起义，1928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侦察员、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参加创建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多次反“围剿”斗争，并参加了震惊世界的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于1937年8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新四军第4支队营长、第5支队挺进团团长、第2师旅长，并先后兼任淮南路东、路西军分区司令员。率部转战淮南、淮北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7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5军军长，指挥所属部队先后参加了苏中、涟水、宿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屡建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0兵团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1月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同年7月任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华北防空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1956年12月任军委防空军副司令员。1957年11月空、防两军种合并后，任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副书记。1959年6月兼任空军技术部部长。为建设防空军、国土防空体系和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以及组织指挥热核武器的试验，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8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大运河上的风雷

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还有3个师的师长、政委，一行人20余骑，趁天刚放亮，便出了曲阜城，踏上去滕县的公路。

纵队的3万人马，驻在滕县南面的官桥一带，正等待他们把这次曲阜会议的精神和新的作战任务带回去。

午夜时分，成钧、赵启民回到了纵队司令部。司令部驻在官桥镇外的一个村庄里。

黑灯瞎火的大村庄，顿时便灯明火亮起来。

从这个时刻开始，纵队司令部里的夜夜灯火，总是迎接着天边出现的下一个黎明。

从这个时刻开始，司令部各个房间的电话总是铃声不断，骑兵通讯员、便衣侦察员、参谋人员在村庄内外，来去匆匆，奔忙不息。

从这个时刻开始，一队队骡马大车，驮载着弹药、粮秣、行李辎重，从司令部门前蜂拥而过……

也从这个时刻开始，司令部驻地周围的山岗、桥头、路口，骤然变得警戒森严起来。

战争的风云还没有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却已经在这乡间小镇和村落里蒸腾而起了。

其实，这场战争风云最先腾起的地方，正是在村头那黄土矮墙背后的小院里面。

黄土矮墙小院里面，住着成钧和赵启民。

从曲阜回来的第二天，赵启民便全身心投入战斗的准备。他正在对全纵队以上干部传达贯彻华野前委的曲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战略方针，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斗争。他在为华东战场上即将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准备。

从曲阜回来的第二天，成钧便开始谋划作战方案。

小院的堂屋里，挂满了大比例的军事地图。成钧面对敌军部署态势图，整天陷在凝思默想之中。

地图中央有颗四方形印玺似的大黑框框，那便是古今闻名的军事重镇徐州城。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像两根墨黑的铅丝，垂直交叉在这个大黑框框之上，形成一个大十字。除了大十字形的铁路线，还有一道道呈现出青绿色的河流，环绕在市区外围。这里有微山湖，有运河、不老河、沭河、淮河、涡河、浍河……在铁路与河流之间，那密如蛛网的红线便是纵横交错的公路网。

在这个由城市、河流和公路网织成的淮海平原上，驻有国民党军的黄百韬、李弥、邱清泉、孙元良 4 个兵团和 6 个绥靖区。这里有总兵力不下 60 万人的一支敌军。蒋介石南线的精锐之师，大部分都聚集在这里。

望着地图，成钧的思绪很自然地飞到曲阜那个会议室里了。

23 天前，10 月 5 日，成钧、赵启民同纵队 3 个师的师长、政委在曲阜城的孔庙里，参加了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召开的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 20 天。

在扩大会议期间，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了有纵队以上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统一作战思想，研究战役预案。

在 10 月 9 日召开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上，成钧见到了如今摆在他面前的这张敌军部署态势图。

也是在这次作战会议上，成钧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同粟裕之间来往的电报。

最早的一封电报，是 9 月 24 日晨 7 时粟裕向中央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的报告。粟裕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报告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阳、淮安、高邮、宝应，华野主力则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以歼灭来援之敌；第二步以 3 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第二个方案是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新安镇、运河车站以及峰县、枣庄之线，以战备姿态进行休整。

成钧一见这电报上的日期，心里不觉一怔。

9 月 24 日晨 7 点是什么时刻？这是济南城里的炮声刚刚停息、机枪步枪还在断断续续爆响的时刻，这是济南战役还没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的时刻。此刻，华东前线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共华东前委便端出这样一个十分大胆、出人意外却又是深思熟虑的大战役方案来，真是气魄宏伟！

更令成钧惊讶的是，粟裕的这份电报发出后不到 24 小时，毛泽东的回电便来了。毛泽东电报的头一句便是：“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接着指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之线为目标。”妙！这出手的头一锤便砸在黄百韬的脑袋上！黄百韬手下的 4 个军，都是曾同华野部队多次交手的老对头。新安镇距徐州不过两天行军路程，又

有李弥兵团的接应。这样一个不好下嘴的大刺头，毛泽东竟选作了战役的首战目标，要一口把它吞掉。这比粟裕的胃口、胆识和气魄又该高出几多啊！电报上还写着：“这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灭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部分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毛泽东好像是站在泰山之巅遥望东海，对一场规模空前、情势极其复杂的大战，在还未爆发之前，便把贯通全战略阶段的情况和方针都看清楚看透彻了。充分表现出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和敢于胜利的大英雄气魄。

成钧的心沉醉在这篇大手笔的电文里面。

也是在这次作战会议上，成钧还见到了中原野战军陈毅、邓小平于 25 日中午发来的电报：“同意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打援为好。”同时表示中原野战军将作好战略配合的准备。读着这份电报，成钧仿佛看见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身上闪发出来的放眼全局、照顾全局的奇光异彩，仿佛望见了陈毅纹枰对奕时面对一着高棋抚掌吟笑的神采。成钧还从这封电报中体味到了大区间战略协同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巨大鼓舞。

成钧的目光，久久地盯在地图上那条大运河线上面。

大运河从徐州西北的微山湖流泻下来，流过津浦铁路的韩庄大铁桥，横过贾汪煤矿区北面的万年闸，往东流到“山东第一庄”的台儿庄，再折而南，穿过陇海铁路，向宿北、两淮流去……在这里，大运河像一张铁弓，护卫着徐州北面 and 东面的大门。

在地图上，大运河像一条精美标致的绿色裙带，装点着肥沃的淮海平原。

在成钧的眼里，这运河却是一条波诡云谲、充满风险的战线。

在 10 月 14 日夜间的第二次作战会议上，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定下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部署。部署规定：东兵团第 7、10、13 纵队由临城、枣庄向韩庄—万年闸—台儿庄的运河防线出击，以进攻姿态迷惑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造成敌人的错觉，使其以为我军的目的是在进攻徐州而不是在围歼黄百韬兵团，以此来吸引徐州剿总的邱（清泉）李（弥）两个机动兵团北援或停留于徐州附近，而不敢放手东出增援黄百韬，为华野主力在新安镇地区围歼黄兵团赢得时间，同时截断黄百韬向徐州的退路。这正是毛泽东在 10 月 14 日凌晨 3 时电报中教给粟裕的一个大迷魂阵。

粟裕在这个具体部署中规定：

第 10 纵队沿临城、沙沟甫下，首先以精干得力部队袭击韩庄守敌，抢占控制运河大桥，而后渡河南下，直逼徐州九里山、东贺村一线。

第 7 纵队由临城、枣庄之间派遣精干得力部队袭歼万年闸地区守敌，得手后，主力向南，围攻贾汪冯治安总部，配合政治攻势迫冯部起义。

第 13 纵队担任围歼台儿庄之敌。

开完作战会议，成钧连夜交代第 21 师师长谢锐，秘密派出得力干部，潜入万年闸地区，去摸清敌人的情况。

成钧从曲阜回来，纵队参谋长冯文华便立即把第 21 师侦察得来的情况向他一一汇报。

万年闸这段运河，河心水深 4.8 米左右，靠岸处也有 2 米来深。河面最宽处达 103 米，最窄处在 80 米左右。河上所有的船只，全被万年闸、六十子、顿庄闸上的敌人搜走了。万年闸上有一座大桥，是鲁南峄县通贾汪煤矿的唯一桥梁。桥面宽可通行两部大汽车，步兵可成六路纵队通过。大桥两边敌人

都修了坚固的工事。桥北面，连结着运河大堤，修了一个月牙形工事。桥南岸，有一座钢筋水泥的碉堡，为敌人的营部。整座桥由一个营的兵力把守。防守这一段运河的是冯治安的第 59 军第 180 师第 539 团，团部紧靠在万年闸后面。

望着地图上的大运河，掂量着这些情报，成钧的心整天整宿都在万年闸上扑腾。

要突破这段运河防线，不难。难就难在不能打草惊蛇。

突破运河防线，并不是他这次作战行动的目的。他的行动目的是要让纵队 3 万人马火速通过万年闸，一下子插到陇海铁路线上去，而后在从大许家车站到徐州城外 20 来里处的林佟山、邓楼、苑山一带，把徐州敌军同新安镇黄百韬兵团的联系一刀斩断。

全纵队通过运河必须迅速，最好能给敌人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他最看中的是万年闸上的那座大桥。利用这座大桥，全纵队 3 万人马可以飞快地通过运河，比在河上架十座浮桥都强。一定要夺下这座桥。但是，怎样才能把桥夺到手？用炮火强攻？不行！那样花费的时间太长，而且要犯打草惊蛇、破坏整个战役计划的大错。

成钧对夺取万年闸心切，对夺取万年闸下了决心，对夺取万年闸的困难和风险又格外担心。

他把第 21 师师长谢锐召来，同这位骁勇机警的年轻师长一起，在矮墙后面的那间小屋里切磋琢磨，斟酌来，斟酌去。

小屋里的灯火，从黄昏一直亮到天明。

11 月 5 日夜间，华东野战军各路大军，在夜幕下隐蔽地开进了各自的集结地点。6 日，便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徐州进逼，而进攻的重点则指向陇海路东段。

同一时间，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徐州西面的陇海路中段也发起了强大攻势，进行战略配合。

国民党徐州“剿总”指挥下的 60 万大军，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自临城，南到蚌埠，一夜之间便陷溺在我两大野战军排山倒海的怒涛之中。

成钧命令师长谢锐指挥先锋部队，乘夜夺取运河防线的前哨阵地——峰县城。

第 21 师的前锋部队还没赶到，峰县城的敌人已逃之夭夭。

成钧立即命令谢锐：火速夺取万年闸！

7 日下午 5 时，第 21 师第 61 团第 1 营从峰县城外的向家庄出发，对万年闸实施奔袭。

第 3 连走在这支奔袭奇兵的最前面。

第 1 营营长陈洛平自动“下放”到尖刀连当了连长，第 3 连连长也学他“下放”去当了尖刀排长。

初冬时节，鲁南原野上，夜风瑟瑟，霜花满地。一营人在急行军。除了村头惊起的宿鸟和断断续续的狗吠声外，四外都是一派寂静。

午夜过后，部队接近了万年闸。

营长陈洛平、团长杨忠和师长谢锐，在队伍的最前面观察万年闸阵地。

万年闸上星光暗淡，月牙形阵地、桥头的碉堡、敌军的岗哨在星光下都溶成了一大片模糊的黑影。阵地前的开阔地里，有一道浅浅的沟坎，沟坎湮

没在枯草中间。

谢锐让陈洛平派人到那片开阔地上去摸一下，结果摸出了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一道铁丝网架在那波浪似的沟坎下面，乱草把铁丝网遮掩起来。倘若部队向这里猛冲，肯定要在这铁丝网前面遭受重大的伤亡。

谢锐同团长杨忠咬了一会儿耳朵。随后杨忠把第1营营长陈洛平和第3营营长姜少文召到跟前。他让第3营从万年闸的正面首先发起进攻；让陈洛平带领第3连绕到月牙形阵地的侧后，去夺取万年闸的月牙形阵地。

陈洛平带一连人悄悄绕到了运河北岸的洼地里。战士们一个个轻手轻脚地向前摸去。

夜风吹拂，运河的波浪发出响声。敌人的哨兵，在月牙形阵地上谈话、咳嗽，踏着沉重的脚步。

陈洛平握紧手中的驳壳枪，一只腿跪在泥地上，紧盯住月牙形阵地的动静。

这里正是月牙形阵地同运河大桥的结合部，也是阵地最要害、最脆弱的部位。从这里冲上去，能最迅速地把大桥夺取过来。

陈洛平再一次把那位刚摸过情况的战士找来，交代他再到阵地外面的乱草丛中去探路。

战士很快在黑暗中消失，又很快从黑暗中回来。

陈洛平把老虎钳交给这个战士，让他带一个副手，再摸回到铁丝网处把铁丝网剪断，为爆破手们扫清道路。

陈洛平刚刚把两个战士打发走，正北面便枪声大作。随后，月牙形工事里的重机枪横扫过来，曳光弹在夜空中划出腥红色的弹道。

正面进攻的部队方向，最先传出一声炸药爆炸的轰响，接着便是部队冲锋时发出的吼声和密集的射击声。

敌人的火力全被吸引到第3营方面。

“好！”陈洛平对趴在身旁的爆破手轻喝一声，“上！”

两个爆破手，抱起炸药包，蹿上了月牙形阵地。

月牙形阵地上，蓦地冒起一团金红色的烈焰，紧接着便是震得脑袋发懵的一声炸雷。

爆破成功了。

在炸药的光焰里，尖刀排的战士们挥舞着冲锋枪和手榴弹，向爆破口飞也似地冲了进去。

月牙形工事里冲锋枪嗒嗒地响着。

月牙形工事里迸出手榴弹爆炸的轰隆声。

随即，第二梯队的战士们冲上了月牙形阵地。

第3连对月牙形阵地的偷袭，一举成功。

第3连偷袭成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部队对敌人阵地的猛攻。月牙形阵地上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些跳出工事，顺着大桥向运河南岸营部的碉堡逃命。

尖刀排的战士们，混在溃逃的敌人中间，顺顺当当地跑过了大桥，跑进了桥南岸敌人的碉堡里。营部的敌人糊里糊涂地束手就擒。

陈洛平指挥第1营部队，乘胜突过大桥，夺取了万年闸。

第61团的大队人马，像暴发的山洪，涌过了万年闸，而后顺着运河南岸，左右开弓，席卷开去，在运河防线上撕开一个大大的缺口。

师长谢锐快马加鞭，飞身跑过大桥，双脚踏在敌军的碉堡之上，借着微放亮的曙光，观察着南面贾汪方向敌人的动静。在寒浸浸的晨风里，他满脸绯红，浑身冒着热气，嘴巴笑得大咧开来，一个劲儿叫喊：“电话，电话！”

跑得满头大汗的电话员，把黄橙色的被覆线拽到他跟前。

他拿起话筒，放开嗓门向成钧报告：“我这会儿就站在万年闸的桥头堡上……天亮前夺下万年闸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

电流把成钧极度兴奋的声波传了过来：“太好了！1营这回搞得蛮不错嘛！”停了一会，忽然又传出一道新的命令：“我马上告诉19师熊应堂，让他带着19师主力跑步出动，改道从万年闸过河，向贾汪推进，去接应贾汪的冯治安部队起义！”

谢锐真想把这个抢占贾汪的任务揽过来，但他握住话筒，想了想，终于只说了声“好”，便把话筒撂下了。

十万火急的大出击

当赵启民从兵团司令部的电话通报中得到贾汪起义成功的消息时，成钧手里正捏着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电报是华野前委7日深夜发给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和政委谭震林的。王、谭于8日中午转发给了第7、10、13纵队。

华野司令部从战略情报中获得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企图，同时又发觉了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收缩的动态。根据敌军的这个新动向，前委电报命令运河东边攻击集团的各路纵队，立即开展对黄百韬兵团的追击和堵击；要求运河西边山东兵团的3个纵队火速穿越第3绥靖区防区，向陇海铁路出击，会合从华中北上的第11纵队和江淮军区的两个独立旅，截断黄兵团的退路。

成钧、赵启民同纵队领导班子成员，拟就了一份全纵队火速向陇海铁路大出击的命令。

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解除了第19师进占贾汪的任务。第19师随即昼夜兼程，奔袭150华里，于10日凌晨，进占徐州东面的林佟山、邓楼、苑山一线，从铁路南面封闭了徐州东出接援黄兵团的进路。

一声十万火急的命令，让第20、21两个师的部队，以团为单位，分路并进，以风卷残云之势，一夜间从运河南岸推进到陇海路北侧的不老河边。

10日黄昏，第21师的部队最先抵达了不老河北岸。

不老河水深流急，河上没有桥，步兵不能徒涉。上万人马，停滞在河岸边，风风火火地四出找船。

正在这个时候，黄百韬兵团的一个师，越过了运河上的大铁桥，直奔曹八集猛进。

由台儿庄沿运河南下的华野第13纵队的先头部队，在曹八集东面迎头撞上了黄兵团的这一师人。

狭路相逢的两军，像铁路上对开的两列火车，发出狂啸，迎头撞去……

曹八集外面的田野里，迸发出雷鸣电闪般的爆响。

正在不老河畔的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听见曹八集外面这阵急骤的枪炮声，不禁一惊。

曹八集是黄百韬兵团西返徐州的一道大门。这道大门倘若被黄百韬抢到了手，他就会进一步抢占大许家车站。这两处要地一旦被抢，华野前委

十万火急的出击命令，也就功败垂成了。

成钧顾不上去弄清曹八集那边的情况，顾不上等待上级的命令，顾不上同第 13 纵队的同志联系，急忙命令骑兵通信员飞马把第 21 师师长谢锐找到跟前。

他命令谢锐带领部队朝枪声最激烈的地方冲杀过去。

第 21 师的健儿，救火似地从成钧的马前飞跑过去……

曹八集方向的枪炮声，越响越急。

第 21 师的大队，越跑越快。

被两昼夜急行军弄得疲惫不堪的战士，不少人跑得掉了队，不少人歪倒在路边喘气。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战士有的在发牢骚：“这是打乱仗啊！”

成钧听见了这个牢骚，大笑着，高喊道：“对，打乱仗！这是在打乱仗！敌人乱，我们也乱，以乱对乱！敌人是乱不过我们的，快冲上去！”

敌人真的没乱过我们。黄百韬的这个先头师，被我第 13 纵队和第 21 师冲杀得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最后躲进了曹八集外面的几处荒村野洼里，被我军迅速歼灭掉。

在曹八集通宵达旦的枪炮声中，第 20 师的两个主力团——第 58 团、第 60 团连夜抢渡过了不老河。

两团人以雷鸣电闪的声势，向陇海铁路横扫过去。

师的先头部队——第 60 团一鼓作气，冲到陇海铁路南边近 10 华里的大刘庄、小沙庄。在这里他们捞住了李弥兵团在慌乱收缩时丢掉的一个营。

当第 60 团这支出击过远的部队往回返时，正碰上从运河东边过来的一团敌人。这是黄百韬兵团第 100 军的一个团。这一团人正按照师长的命令，绕过曹八集，抄小路，去抢占大许家车站。我第 60 团的部队趁敌人像无头苍蝇似地乱冲乱闯之际，迎头一击，把这一团装备精良的敌人包围在大耿庄里。

下午，第 60 团在第 58 团第 2 营的协同下，只经过一小时的战斗，全歼敌第 100 军的这个团。

第 21 师部队在协助第 13 纵队完成了曹八集的歼敌任务后，挥师西进，占领了大许家车站。

入夜，第 7 纵队指挥所在不老河南岸的河涯村建立。

纵队司令员成钧又一次站在淮海战场的大地图前面。

他同兄弟纵队完成了华野前委十万火急的大出击任务。

他正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大战场，胸中激荡起一个将军在临阵前的壮气和豪情。

在《震撼世界的大决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11月10日这天，山东兵团以神速动作越过不老河南下，第 10 纵队逼近徐州东北之东贺村，第 7 纵队控制大许家、单集之间地区，第 13 纵队攻占陇海路上之曹八集，切断了黄百韬兵团退向徐州的道路，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着。粟裕说：‘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呆 4 小时，我们的战机就丢失了。’”

霜夜谈兵

深夜，河涯村。

成钧看过手中的电报，急忙同苑山前线第 19 师师长熊应堂通电话：“根

据华野和东兵团的情报，杜聿明今天一早到的徐州。中午，邱清泉来到了刘峙的司令部。黄昏前，驻在黄口、砀山的邱清泉兵团纷纷登上火车，东运徐州……从上面这些情况判断，杜聿明正在集结部队，快要出动援兵去救黄百韬了……你们当面敌人有什么动静？”

电话里传来熊应堂的声音：“当面没发现敌人大的动作，只有一点零星星星的接触，像是便衣侦察……”

“从现在起，你要特别加强战场侦察，把你们师里的侦察部队撤出去，把搜索范围放远一点，特别是对徐州东面几个火车站更要注意。邱清泉的部队总得在这几处卸车的嘛……”

这会儿成钧的心已经抛向了第19师的阵地，抛向了林佟山、殷山、薛山、黄龙山、邓楼、苑山那些浅山和丘陵地。

他走出指挥所，迎着清冷彻骨的霜风，仁立在河涯村的村头，举目四望。东面，碾庄圩方向，枪炮声紧一阵，松一阵。他知道，这是攻击集团正在向黄兵团一步步逼近。西面，从这里望过去，黑雾沉沉的铁路线尽头，便是徐州。在铁路线和徐州上空，笼罩着一团团灰暗色的云，灰色的浓云间似乎有一种神秘不祥的东西在浮动。

他望着这片灰暗沉寂充满神秘的夜空，心中却分明涌现出一个弯弓形的阻援大阵。弯弓的两翼由第10纵队和第11纵队构成，弯弓的中央摆着第7纵队的三道纵深防御阵地。这个弯弓形大阵正是按照毛泽东10月14日电报指示部署下来的。这是成钧平生从未见过的大阵。

在清冷的霜风中，他想象着一场空前激烈而残酷的大战，将要在这片空旷的平地上展开。

拂晓前，第19师司令部报告了夜间获得的最新情报：邱兵团第70军进入了邓楼和苑山前面的阵地，另一路正在向林佟山前进……

正躺在指挥所行军床上打盹的成钧，霍地翻身下床，几个箭步抢到地图面前，立即给第19师打电话：“进到林佟山的，是不是第5军？”

“大概是的吧……”第19师司令部传来的声音。

“什么大概小概的！”成钧厉声叱喝起来，“你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马马虎虎地报告情况？”

刚才那个声音，再没有出现。停了好一会儿，听筒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成……成司令，是我，肖学林……”

成钧一听见这带点结巴的声音便笑了起来：“怎么，是你？老表呀……”

肖学林是第19师政委，江西人，老红军。成钧一向都爱叫他“老表”。

“情况是这样的……”肖学林把师参谋处夜里搜集来的敌军情况向成钧一一汇报，“到林佟山去的是哪个军，这会儿还没弄清楚。”

“那么，你根据什么说第70军在邓楼和苑山呢？”

“抓……抓到了……一个俘虏，一个掉……掉队的下士……”肖学林讲起话来有些结巴。

“哎呀，抓到了第70军一个掉队的下士？”成钧大长了精神，好像缴到了一门大炮，“赶快给我送来！”

“熊师长同参谋长正在审问……”

“你告诉他们，问完话就给我送来。问出了些什么情况，要老熊在电话中向我报告。还有，对那个抓来的下士，态度要好一点。”

天色接近黄昏，当面敌军的情况已基本查清：邱清泉把两个军摆在第19

师林佟山、邓楼、苑山一带阵地的正前方。成钧整天念念不忘的那个新5军，此刻已进入林佟山西面那片村庄里，正在紧张地修路，构筑阵地。敌军的大炮蒙着炮衣，放在空地上，一队一队的大卡车，正往远远近近的村庄开去……

作战科长领着测绘参谋，在地图上标出敌人部队分布的态势。几处大村庄上面，都画上了军部和师部的蓝色三角小旗。小旗下面标明5A、70A和45D、200D、96D等字样。

成钧坐在地图前面，望着林佟山、邓楼和苑山上标明第19师防御阵地的红线及其对面的那些蓝色小旗，在反复思考，忽而在小三角旗和第19师阵地之间量过来量过去，嘴里轻轻吐出一串旁人根本听不清楚的数字。

他在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和心血，绘制着一幅幅阵地防御的场面。

纵队参谋长冯文华走来，招呼作战科长挨着成钧坐下。他们要听听司令员对拟制作战预案的意见。

作战科长还没坐定，便问成钧：“司令员，对邱清泉的这个兵力部署，该怎么个看法？”

成钧没正面回答，指着地图上那几面蓝色小旗，敲击着桌面说：“邱清泉把他的3个主力师——70军的96师、新5军的45师和200师捏在一起，摸成了一个拳头。他是想在19师20来里宽的正面上，对我们来个中央突破，把19师的防线撕裂开来啊！”

参谋长冯文华望着地图，沉吟片刻，发出了一声轻叹：“这一手，真有点厉害啊！”

“这个部署正好发挥了这几个师的长处。”成钧望了冯文华一眼，“这里，邓楼的96师，在阵地进攻中不但大胆、泼辣，而且特别喜欢‘钻隙’。你防御中出现的一点点漏洞，它都能很快地加以利用。它连排的小包抄战术，打得格外漂亮。这里，林佟山的45师，最会搞集团冲锋。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它那整营整连的集团冲锋，可不简单哩。它能一口气接连不断地打上七八个冲锋和反冲锋。你要是对自己的预备队掌握得不好，多半要吃大苦头的……”

成钧的话引起了作战科长的诧异：“司令员，你对这几个师的作战特点，怎么这样熟悉？”

成钧亮开嗓门，笑了：“邱清泉是我的老对手啊！解放战争一开始，我碰到的头一个敌人便是新5军和整编74师。邱清泉那时是新5军军长。这个邱清泉和74师师长张灵甫在淮南同我大打了半个月，我们1个旅4个团同他们的4个旅，硬是从长江边打到淮河南岸。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5旅部队伤亡大咧！真叫杀红了眼啊！你说，我还能不熟悉他吗？”

作战科长是新近才从兵团部调来的，他头一次听到这段故事，自然感到格外新鲜。成钧的谈笑也引起了指挥所里参谋们的兴趣。大伙便悄悄地围拢来，听他临阵谈兵了。

警卫员朱志道从灶屋里端过一盆盐水煮的花生，摆在小桌上。这是他替成钧准备的“夜宵”，这会儿端出来“充公”了。成钧抓起一把花生，闻了闻：“不错，新花生，挺香的。”先剥了一粒，放进嘴里，一嚼，突然扭回头，朝小朱吆喝一声：“喂，就这个吗？”小朱往门后一缩，晃了晃脑袋：“就只有这个啦！”冯参谋长伸手把小朱衣领揪住：“小滑头，你把司令的酒拿出来，大伙尝尝嘛！”“不行！这么多人……喝光了，怎么办？”“我陪你！”作战科长腿快，早把挂在门背后的水壶搜了出来。

欢声笑语混合着花生和酒的香味，在小桌周围飘荡起来。

“时间过得也真快啊！”成钧喝着老酒，嚼着盐水花生，忽然感叹起来，“一眨眼3年时间就过去了！现在，张灵甫已经死了，当年的两个大冤家，就只剩这个邱清泉了。几年来，他都在同中野作战。济南战役中，他来到徐州，我们没交上手。没想到，这一回，我同他又撞在一起了！”

“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冤家路窄哩！”冯文华也感叹起来。

作战科长的脑子里忽然又冒出一个问题：“司令员，你看邱清泉这次的用兵，同你们在淮南的那一次有什么不同吗？”

成钧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最大的不同是，如今的邱清泉被打滑了！”

“打滑了。好，这话有意思！”参谋长冯文华对成钧这一句话大感兴趣。抗战八年，他都任淮南军区抗大八分校的教育长。他对研究战术和战争史特别感兴趣。

作战科长以疑惑不解的目光，望着成钧。

成钧又一次指着地图上3个师的分布态势说：“你们看，邱清泉手里掌握着3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又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还碰到了这种对机械化部队最为有利的开阔地形。他本该把全兵团5个军的力量全部展开，对我们实行大包抄大迂回；可是，他竟然搞出这样一个偏于保守的作战部署来。”

“这同打滑了有什么关系？”作战科长越发听不明白了。

成钧给大伙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去年5月间，第74师师长张灵甫被打死在孟良崮以后，邱清泉成了陈毅和刘伯承同时挑中的头号对象。每次大的战役，两位老总都要想方设法打他的主意。这件事，后来被邱清泉知道了，他就由大胆变成了小胆，打起仗来，处处提防我们的穿插、分割、包围，生怕被两位老总吃掉。今年2月，朱老总在濮阳对西兵团营以上干部讲话时提到，要用削萝卜的办法，来消灭邱清泉的新5军。朱老总说：‘每次抓住机会，你就狠削他几刀！这样七削八削，就把这个王牌军削光了嘛！’朱老总的这个话，不久也传到了邱清泉的耳朵里，吓得邱清泉好几顿吃不下饭。他害怕当两位老总的头号对象，害怕朱老总的‘削萝卜’。所以他一上战场就‘滑’，就搞缩头战术。对于孤军突出的行动，对于包抄迂回的这一套冒大风险的动作，他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能顶就顶。这一回，刘峙不是几次都调他不动吗？在局外人看来，总认为是他的骄横跋扈。其实，依我看，主要还是他心里有鬼呢！”

冯文华同作战科长琢磨着邱清泉的这块心病，又把他摆出来的这个阵势仔细地端详了一番，两个人几乎同时吐出一句话来：“照他这个打法，齐头并进，稳扎稳打，对我们这个几十里纵深的阵地，一点一点地啃，那他得多少天才能打到碾庄圩呀！”

成钧伸开五个手指，正面反面地翻了个过说：“10天。他估计，我们最多只能顶住他10天的攻击，10天后，我们因伤亡和弹药消耗，不能再打了……”

“他也不想，10天后，黄百韬又该怎样了！”作战科长脑子灵活。

“所以，蒋介石、刘峙、杜聿明都一次次地要黄百韬一定坚守10天以上。”

“如果没等到10天头上，黄百韬被消灭了，我们这个阵地又没拿下来，那他邱清泉该怎么去向他们的老头子交代？”

“你以为，邱清泉为这个就会豁出他的老本来同我们拼吗？正好相反。我们部队守得越顽强，给他造成的伤亡越大，他就会打得越滑。最近一年多，军队转入外线作战以来，我们打的几次阻击战，有哪一次国民党的援兵是豁着命去救他们被围的兄弟部队的？”

“此话不假。”冯文华参谋长接过成钧的话，“还有，黄百韬同邱清泉，长时间都在闹矛盾呢……”

成钧同参谋长等人对邱清泉议论得正热闹，堂屋门忽地大开，一股冷风朝屋子里灌，蜡烛的火苗被刮得直晃。

“夜这么深了，还不休息？”进来的是政委赵启民，“外面正下霜呢！”

同邱清泉的最后交手

11月13日，邱清泉和李弥2个兵团4个装备精良的机械化军，100辆坦克，上百门重炮，在40里宽的正面上，向徐州东面华野第7、10、11纵队的阻援阵地展开全线进攻。

成钧在中央阵地的纵深里，摆下三道防线，迎接邱清泉第5、第70两个军的进攻。

徐州上空，天朗气清。9时刚过，从南京出动的轰炸机群便到达了华野部队阻援阵地上空。

接着，敌机群在林佟山、邓楼、苑山和铁路北面李弥兵团的上空盘旋。银光闪烁的机身，在晴空里划出一个个流动的圆圈，随后便消失在徐州西面的天空里。

当机群再次出现时，它们便排成了品字形，对准林佟山、邓楼、苑山一带我军阵地俯冲而下。铅黑色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从机腹下纷纷坠落。

第19师阵地上，顿时腾起黑烟和火焰。

机群第一番轰炸过后，便一架接一架地转到徐州南面的机场降落。在那里加油、挂弹之后，再一批接一批地朝林佟山上空飞来。林佟山是机群进入轰炸航路的检查点。

紧跟着这个大轰炸，邱清泉兵团分布在第19师阵地前沿的榴弹炮、山炮、重迫击炮一齐开火。

邱清泉精心地组织了这场火力袭击。他把所有需要轰击的地面目标都画在一张九九方格的千分之一地图上，命令飞行员和炮手们把炸弹和炮弹倾泻在这些方格格里。他把这得意之作取名为“急袭歼灭射击”。

第19师的阵地被覆盖在乌烟弥漫、冲腾翻滚的烈焰之中。

华野特纵游猎在不老河北岸的榴弹炮突然向徐州飞机场开火，实行了远距离射击，炮弹打到了机场东北跑道附近。这一下，国民党飞机的起飞降落都受到了威胁，陆空联络霎时中断，正在准备发起的地面攻击也停止了。

杜聿明费尽心机排出的这出大剧，刚拉开帷幕，便碰上了这支榴弹炮游猎的插曲。他急忙命令刚刚从安阳空运来的1个师马不停蹄地到不老河北岸去压迫这几门榴弹炮撤离。

不老河北岸榴弹炮的威胁解除后，徐州机场的飞机再度起飞。

邱清泉在林佟山对面的指挥所外面，升起了3颗鲜红色的信号弹。新5军和第70军的各处进攻出发地上，也前前后后地飞出了红色、绿色、白色信号弹——敌总攻击开始。

第 19 师阵地上，落下一个个白色烟团。

敌坦克从新 5 军阵地纵深出动，士兵们尾随在坦克后面，向第 19 师部队的阵地冲杀而来。

在邓楼的阵地上，第 19 师第 57 团 1 个营的战士趴在战壕里迎击敌人这次声势浩大的冲击。

邓楼是邱兵团突破的一个重点。进攻邓楼的是第 70 军的第 96 师。

当年被邱清泉誉为新 5 军两大“战将”之一的第 96 师师长兼快速纵队司令邓军林少将，对进攻邓楼的情形有以下一段记述：

“13 日晨，我指挥 287 团向解放军阵地邓家楼攻击。经过整天战斗，出动装甲车配合步兵猛攻，曾三次冲到村庄边沿，都受到解放军坚强阻击，始终无法攻入。山炮营 300 多发炮弹射向村内，结果大部分房屋被摧毁。邱清泉在电话中命令加强火力，要炮兵加速发射。我以必须攻下邓家楼的决心，严令 287 团顽强进攻，战斗至为激烈。当晚，解放军在强大火力下被迫撤退，放弃邓家楼阵地。”

杜聿明也对战斗的情形作了以下记述：

“每一村落据点的解放军，都以无比英勇的斗志狙击国民党军，虽然火力较国民党军为弱，但是节省弹药，发射准确，对国民党军每一村落家屋都给以严重打击。甚至有的村落已被国民党空军炮火摧毁，而解放军战士仍各自为战，勇猛狙击国民党军。国民党军打进去，被解放军赶出来，再打进去，再被赶出来。国民党军被打得垂头丧气，谈虎色变……”

邱、李两兵团发动全线攻势的第二天——14 日的战况，按杜聿明的说法是：“发现解放军的打援部队越打越强大，而且抓住国民党军不能夜战的弱点，集中力量在夜间反击国民党军。”至于国民党陆军同空军的协同作战情况则是：“当日空军照预定计划轰炸后，步兵疲劳不堪，未能照预定计划实施攻击，于是空军指责邱兵团按兵不动。等邱兵团准备好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又负气未出动轰炸，邱又指责空军不支援，使步兵受意外损失。双方互相指责以至叫骂，闹得互不协同。这一天国民党军内部陆、空军闹得一团糊涂，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铁路以北之第 13 兵团第 8 军虽然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经过激烈的争夺战，也只攻占两三个村庄，左翼第 9 军亦毫无进展。”

这种蜗牛式的进攻速度使蒋介石大失所望。攻势开始前，蒋介石以为邱、李两兵团有了空军和坦克的协助，又有火炮兵力，攻击的第一天便可以打到大许家、麻谷子之线，第二天可以进入八义集，与碾庄圩遥相呼应。可是打到第三天，杜聿明报告“每日前进速度平均不到 3 公里”，而碾庄圩的黄百韬则一个劲儿呼叫“包围圈正在一天天缩小”。蒋介石便于当日下午向邱清泉发出了一份十万火急的亲启电报：

“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应即以有力部队不顾一切牺牲，钻隙迂回，向大许家突击，并限在一天之内确实占领大许家，掩护兵团主力前进，以解黄百韬兵团之围，违者军法从事。”

邱清泉接到蒋介石这份尊称“吾弟”于前又严饬“违者军法从事”于后的电报，虽有满腹牢骚又不便公开发泄，于是便借南京政府机关纷纷准备南迁的消息破口大骂起来：“我们在前方拼命，南京远隔千里，倒自相惊扰起来，准备逃走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仗还有什么可打的？老头子为什

么自己不来呢？如果自己坐镇徐州，谁又敢不替他卖命？当然徐州现在是危险的，那也可以坐飞机指挥嘛！”

就在邱清泉对蒋介石的亲启电报借机发泄不满之时，成钧却正在同第 19 师第 57 团政委胡少卿通电话。

“你们第 57 团是一支英雄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你们一共歼灭过日伪军 5100 多人。你们一个团得到过新四军军部的两次通令嘉奖，还上过延安解放日报头版的专题报道。去年 10 月在胶东，你们 1 营在红石山苦战了一天，全营大部伤亡，营长、教导员和代理营长、代理教导员都牺牲了，最后只剩 1 连副指导员带领几个战士坚守在一个地堡里面，硬是把美械化的第 8 军打垮下去……这些都是我亲自见到过的呀！我完全相信，这一回，你们也一定能坚持打到底，能胜利完成任务的！”

第 57 团这一连串的光荣历史，被成钧如数家珍似的倒了出来，让红军出身的团政委胡少卿听得浑身热血沸腾。他没等成钧把话讲完，便热泪盈眶地回答说：“请老首长一百个放心，我们 57 团哪怕伤亡再大，只要人在阵地就在！如果完不成任务，我胡少卿就再也不来见你了……”

在以后的战斗中，第 57 团部队没有主动放弃过一个阵地。他们在这场异常艰苦的战斗中，记住了纵队司令员的关心和激励。在这场硬仗恶仗中，他们越打越勇，越打越灵活。敌人疯狂的炮击和猛烈的集团冲锋，教会了他们怎样去躲避敌人的炮火和机灵地保存自己的力量。他们让小部队分散在摧毁了的阵地上，用短促突然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他们发挥夜战近战的优势，专挑敌人的弱点去打击敌人。敌人白昼把他们的阵地夺过去，他们夜晚便从敌人手里把阵地夺回来。他们把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新 5 军（第 96 师原属新 5 军建制），死死地挡在阻援大阵的第一道防线上。

在第一道防线部队喋血苦战的日日夜夜，成钧正披星戴月地奔走在第二、第三道防线上。他要让这一马平川的广阔田野变为机械化王牌军不可跨越的天堑雄关。成钧一生打过许多出名的防御战。在长期作战中，他总结出一句朴实无华却含义深刻的话：“作风好的部队，摆在平地，平地就是一座高山；作风不好的部队，摆在高山，高山也只是一片平地。”这会儿，他用自己的这句话来激励二、三线阵地的部队。他要求每一道阵地都变成一座敌人不可攀越的高山。不管平时、战时，无论练兵、打仗，成钧都最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这会儿，他把纵队几个战斗作风最好的主力团摆在阵地的纵深，摆在阵地的侧翼，摆成了梯形队形。他时时在防备新 5 军的迂回突击。

毛泽东于 16 日凌晨 3 时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谭震林、王建安发出一份电报：

“碾庄之敌 44 军、100 军已歼灭，25 军、64 军亦已各歼一部，并已定 16 日夜总攻碾庄。则现在已到令 7 纵、10 纵、苏 11 纵等部向后撤退，放敌东进之时机，而且似宜推迟一两天总攻，才能诱敌深入。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

毛泽东这个电报到达淮海前线的当天，邱清泉逼着刘峙把总预备队第 74 军交由他来指挥，去完成蒋介石“钻隙迂回”、“占领大许家车站”的任务。这个遭到全歼后重建起来的第 74 军，只迂回到徐州东南的潘塘镇附近，便与苏北兵团的部队迎头遭遇。第 74 军的阵地屡遭突破，军长邱维达连呼告急，邱清泉只得加派第 72 军去增援。入夜，交战双方各自往后面收缩了一点阵地。第二天，17 日，邱清泉再增调第 70 军的第 96 师去潘塘增援。师长邓林

军在前线忽然得到解放军大部队正在后撤的报告，便派坦克部队往东急追了10余里远。在追击中，他的部队取得了个小小的胜利。与此同时，杜聿明和邱清泉也都从空军和地面部队得到了“共军大部队向东溃退”的情报，又从“居民”中得悉“共军粮弹缺乏，士兵每日仅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吃”。他们因此断定“共军已被击溃，且全线崩溃”。杜聿明连忙下令全线追击。邱清泉则忙着通电告捷，说：“进攻潘塘镇的共军被第2兵团猛烈反击，歼灭大部，于17日向后撤退，溃不成军。”徐州剿总得了这个梦想中的“大胜利”，便在大街上鸣放鞭炮，举行庆祝。剿总司令官刘峙欢喜得大喊：“我刘峙这回对得起国人了！”就连南京国防部总参谋长顾祝同也公开宣布“徐东共军被迫溃退”。这个“突破性的胜利”，引得这些将军们忽发奇想。他们便编造出一个“徐东空前胜利”和“潘塘大捷”的神话，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半个中国刮起了一阵“祝捷”旋风。

在杜聿明“全线追击”的号令下，邱清泉兵分两路奔大许家车站。他派出第70军跨过陇海铁路，向大许家车站以北的麻谷子和刘鹿家追击。他把最精锐的新5军摆在铁路南边，从薛家湖直取大许家车站南面的岳海和邵楼。他要用这个钳形攻势来追击“向东溃退之共军”，席卷大许家车站及其南北地方，去解救黄百韬兵团。他要用这个胜利去向蒋介石邀功。

成钧在大许家西面5华里的地方用第二道防线来迎击邱兵团的追击。他命令第20师和第21师的部队在车站南北的岳海、邵楼、刘鹿家、麻谷子、火神庙一带构筑了一座以村落为依托、各自独立的环形防御阵地。他让6个步兵团上万人马，扼守在这一带阵地上。他把几个战斗力最强的团藏在阵地纵深，准备一旦抓住邱清泉进攻中的失误，便进行坚决有力的反击。他用一支养精蓄锐的精兵来迎击邱兵团那支苦战多日伤残破损了的疲惫之师。第19师部队已经在第一道防线上给新5军狠“削”了一顿“萝卜”，如今要在第二道防线上再给这个“大萝卜”狠“削”几刀，用朱老总“削萝卜”的战术来创造一个战场奇迹。一开始，成钧便在作战态势上赢得了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

“大追击”开始的头一天，新5军军长熊笑三指挥王牌军里的王牌——第200师，从林佟山、狼山、虎山、燕山一线，一口气追到了大许家南面的薛家湖。第200师是国民党军队中鼎鼎大名的第一个美械化师。邱清泉就是在这个师当师长时打出名的。只有在战场上最吃紧最具决定意义或者最有利的时刻，邱清泉才肯抛出这个宝贝师来。

第200师头一天长驱大进到薛家湖后，第二天一大早，其先头部队便继续往岳海庄和邵楼追击。

这支追兵刚进到岳海庄前面，忽然发现那“向徐州东面大溃退的共军”却壁垒森严地坚守在工事里面。

防守在邵楼和岳海庄阵地上的是第20师第60团。

第200师的追兵在岳海庄碰到的是第60团的第1营。

第1营部队在岳海庄修下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村落防御阵地。他们在离村庄老远的地方，挖出一道由战壕、地堡、射击掩体和鹿砦构成的阵地。敌人的炸弹、炮弹、燃烧弹纵使把村落烧成灰烬，也烧不着这座阵地的一根毫毛。他们选择最有利于敌人进攻的地点，修造了几座三角形子母堡群，堡群外面设置了厚密的鹿砦，特意为敌人的炮火提供了射击目标。他们让弯弯曲曲的战壕，隐蔽在密密层层鹿砦底下。他们挑出最好的轻重机枪，选出最优秀

的射手，配给最充足的弹药，组成最厉害的火力点，分布在鹿砦底下的射击掩体里面。

所有射击掩体一律不加顶盖，连胸墙周围的浮土也抛散得一干二净。凭你再细心地观察，也难找见这等隐秘的目标。他们深知新 5 军的炮火厉害，对付的办法便是让敌人的炮兵找不着真正的目标。他们还组织了专门打反扑的小分队，每队 20 来人，全是个挑个选的勇士，手里拿的都是汤姆、卡宾、30 式机枪之类的美制自动速射火器，还有那种体积小杀伤力大的鹅卵型手榴弹，也是美国造。这种小分队经过了严格的壕堑战训练，由营、连指挥员控制在阵地的侧翼，专门用来对付突入阵地纵深之敌的集团冲锋。

令人奇怪的是，第 200 师这支“乘胜追击”到达岳海庄前面的部队，却迟迟不展开攻击。从早晨 8 时延宕到下午 4 时，按兵不动。

一支火急火燎要赶到碾庄圩去的救兵，却把大好的时光白白荒废了，岂不怪哉！

也许是邱清泉想向蒋介石邀头功的心太切，也许是这位曾留学德国对希特勒崇拜得发狂的将军生性颠狂，也许是他们战争机器上的故障太多，前天夜里，当邱清泉命令部队追击时，他不曾料到“溃退”中的解放军却会在这里以逸待劳地等候着他。那些遵照他命令追击的将校军官们懂得，追击溃逃之敌要轻装疾进，攻打坚固设防之敌的阵地却是非有大批炮弹不成的。而他们那些制造精美的大炮因为连日使用过度，弹药车里的炮弹已是空空如洗了。这样，他们今日大半天的时光，便在等待从徐州军火库赶运炮弹中折腾完了。

下午 4 时整，第 200 师开始了对岳海庄的攻击。

摆在薛家湖前面的炮兵群，把密集的炮弹倾泻在岳海庄西面偏南一点的阵地上。这里正是最有利于敌人进攻的地方。第 1 营在这里修下的三角形子母堡群，成了敌人炮火集中轰击的目标。新 5 军的榴弹炮，山炮、轻重迫击炮以及六 小炮，把大大小小的炮弹倾泻在这方圆 200 米的范围之内。

这地方的堡群、鹿砦、战壕都被密集的炮火吞噬。当炮火向阵地纵深延伸射击，当硝烟迷雾渐渐消散开时，人们便发现这 200 米的地面，已经成了一片荡然无物的焦土。

借着炮火威力爬近鹿砦前面的敌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以密密的集团冲锋，横冲直撞地冲过了这片焦土。他们从这里冲出一个大大的缺口。

冲进缺口的敌人，抖擞着威风，着了魔似地往村庄中央杀去。

在集团冲锋的敌人背后，一大群一大群的后续部队，正脚跟脚地往缺口里拥过来。

这个冲锋集团像一条浑身斑驳的巨蟒。巨蟒的脑袋已经伸进了村中，那身腰却还拖在缺口外面老远的野地里。

这条巨蟒选中的这个突破口，正是第 60 团第 1 营给它安排的一处假阵地。那阵地上的鹿砦、战壕和三角形子母堡，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既是实的，又是虚的。在新 5 军的炮火急袭开始之前，第 1 营的战士是确实实实在在地堡里放枪放炮的；在炮火急袭开始之后，战士们便在炮弹的烟幕下悄悄地溜走了，只留下这些空无一人的工事来领受美国炮弹的“盛情款待”。

这条巨蟒只顾伸长脑袋朝缺口里钻，却不知道它暴露在缺口外面的腰身才是第 1 营战士集中火力打击的目标。那些隐藏在阵地侧翼鹿砦底下的轻重机枪、小炮，到这时候，便一齐从各个射击掩体里探出头来，瞄准那暴露在

缺口外面的密集敌军拼命猛扫。

在这一串串火力的扫射下，这条巨蟒便被挥斩成了两截。

在第1营营长钱锋和教导员苏军的带领下，那专门打反扑的小分队便多批多路地朝缺口杀将过去。

拥挤在缺口里的敌人，用自己士兵的尸体堵塞了自己的进路。

小分队把缺口重新封闭起来。

冲到村庄中央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被从邵楼赶来的大队收拾得一干二净。

战斗结束后，从俘虏口中查问明白，这些全是第200师第598团的人。在300来名俘虏中，竟查出了5个步兵连的番号。

岳海庄的战果报到成钧面前，成钧放声大笑：“朱老总‘削萝卜’的战法真得劲啊！”

1960年，成钧路过徐州，特地去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他刚跨进展览大厅的门槛，迎面便见到当年他和纵队几位领导人联名颁发的一张嘉奖令，陈列在进口处的一个特制镜框里。嘉奖令是给第60团第1营的，嘉奖这个营在岳海庄取得的胜利。嘉奖令也记载了成钧同邱清泉的最后一次交手。

老总们的风采

胜利完成了阻援任务的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顾不上休整部队，顾不上总结经验和庆功祝捷，只顾忙着把3万人马悄悄地从战壕里撤下来，绕道徐州西南去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新战役。

早在碾庄圩炮响之初，蒋介石便急令远在河南驻马店地区的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率领12万精锐，火速奔赴徐州战场。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覆没后，蒋介石决策命徐州的3个兵团沿津浦铁路南下，命驻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上，并命黄维兵团向东北推进。三路大军会师宿县，以击破津浦路两侧解放军之庞大集团，实行“徐蚌会战”。

战事演进到11月23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龟缩在徐州以南，不敢南下。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猬集在蚌埠北面，观望不前。黄维则指挥12万人马，继续向宿县挺进，同中原野战军在浍河南岸之南坪集一带发生激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现黄维兵团成了一路突进的孤军，与李、刘兵团相距尚有20余千米，认准这是歼灭黄维兵团极为难得的好时机。于是，一面当机立断，令中野阻击部队向后收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下一个囊形阵地，吸引黄维主力第18军深入袋中，然后大举出击，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一面于23日22时急电中央军委建议：“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同时要求粟裕除将中野之第11纵队调回参加歼黄作战外，还要求华野再加派二三个纵队加入歼击黄维之作战。

中央军委收到刘、陈、邓电报，已是24日8时。45分钟后译出，随即送毛泽东。由于时机紧迫，毛泽东未及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研究，立即以中央军委名义草拟复电并于15时发出。电报发出后方将复电内容送周、刘、朱、任阅。复电如下：

“二十三日二十二时电悉。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 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 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

25日11时，华野粟裕、陈士榘、张震电告中央军委并刘、陈、邓：我们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并作如下布置：“(1)略；(2)除王张纵（注：即中野之11纵）已由中野指挥，参加向黄维突击外，只再调7纵、苏11纵加入对黄维之作战。该两纵于明（二十六）晚始可到达宿县以南及西南地区。”

人民解放军求歼黄维兵团之方针，至此完全确立。这个方针之确立，是统帅与前线指挥员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电报是战场上机断专行的一个典范。

华野第7纵队经过一天两夜的急行军，抵达了宿县西南之双堆集附近。

黄维兵团此时已被刘伯承装进了他的“囊形阵地”之中。

成钧同赵启民立刻驱车去向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到，并受领作战任务。

在临涣集前面的小李家村头，陈毅张开双臂，迎着成钧和赵启民哈哈大笑：“你两个，做啥子迟到这刻才到嘛！可叫我们等急了！”

在村中一座代号“一排”的小院子里，成钧头一回见到了刘伯承。刘老总抛下手中的书，拉住成钧的手臂，将成钧浑身上下打量了个够，回头望着陈毅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的这位纵队司令，仪表堂堂，大有儒将之风，蛮不错的嘛！”

“这一年，他们在山东拔钉子，搞内线歼敌，捞的油水很多，日子过得不错，一个个都红光满面的……”陈毅风趣地夸赞。

中野参谋长李达来到刘伯承的小院，同成钧、赵启民见过面后，便把他俩领到中野司令部作战室谈情况。

作战室安在村庄中一间豁亮的堂屋里，三面的墙壁从墙顶到墙根全被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盖得满满的。地图拼接得十分精致，图上的军标也画得规整美观。堂屋里的桌椅摆得端端正正，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不显急速行军的痕迹。成钧不禁在心里赞叹道：“怪道人人都说刘伯承抓正规化建设特别认真呢！”

中野司令部作战处长指着地图上那一个个红的蓝的军标，将黄维兵团被包围的态势和中野各纵队的位置，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野司的作战预案，作了个简要的说明。成钧接着便把第7纵队的人数、装备以及3个师和几个主力团的战斗力和战斗作风等，一一进行汇报。

在堂屋中央那张蒙着白布的长方形条桌上，几个参谋急忙把成钧的后记录下来。

刘伯承听着成钧的汇报。陈毅却在地图前面来回踱步，只是当成钧汇报纵队山炮团的情况时，他才停住脚步，神情专注地望住成钧的脸说：“再说一遍，一共是几门山炮？”

“9门。2门克雾伯，7门美式的。是春上打溜川和7月间打兖州缴的。”

“嗨！你都成富豪了！要得！”陈毅喜欢得仰面朗笑，“那你有多少炮弹？”

“每门按两个基数（60发）带来的。”

“你们一个山炮团的炮弹，比中野的全部家当还多些！”陈毅高兴得举起双臂，开怀大笑。李达参谋长大约发现了成钧疑惑的目光，便声调有点沉

重地补充了一句：“我们现在总共只有43门山炮，炮弹不过200余发呢！”

李达嘴里蹦出来的这个数字，确实令成钧大吃一惊。一个大野战军总共才200余发山炮弹，打这个仗，该有多难啊！

成钧的汇报结束时，李达代表刘、陈、邓首长宣布：“第7纵队部署在双堆集南面，属南集团序列，归中野6纵王近山司令、杜义德政委指挥。参加攻击黄维兵团的作战。”

直到吃饭时，邓小平才从指挥所里出来。一上午，他都在忙着同几个纵队司令打电话，指挥部队加紧缩小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圈，防止其突围。他同成钧和赵启民用劲地握了握手，声音沙哑地说：“你们来得正好哇！这下子，我们吊着的心算放下来咯！”

饭桌上摆了几大盆荤菜，有鸡有鱼还有油光闪亮的红烧猪肉。淮北出产的“高粱烧”更是酒香扑鼻。陈毅抢先伸出筷子，笑着朝成钧和赵启民晃了晃说：“这是刘司令、邓政委特地为你们搞的，我可得先解解馋咯！”

他夹住一大块肥肉塞进嘴里，豪放不拘地大嚼大咽起来。

刘伯承望着这桌酒菜，忽地诙谐起来：“这里也是夹住一个，拖住一个，看住一个啊！”

这三个“一”，是刘伯承当时对我军淮海作战形势的形象说法：夹住一个黄兵团，拖住一个李刘兵团，看住一个杜聿明兵团。这会儿，他竟运用到饭桌上来说笑了。

邓小平马上把刘伯承的话接过去，用筷子指着红烧肉中的那块大骨头笑笑说：“这就算是黄维兵团咯！”

三个四川老乡，掀起了一桌子的笑浪。

成钧和赵启民离开临涣集时，陈毅格外交代：

“去年七八月间，我们在南麻临朐搞得最狼狈时，刘邓不顾自身的困难，主动向中央军委毛主席要求提前外线出击，让中野部队背起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在大别山里转圈，减轻了我们身上的压力，使我们得以喘过气来。这一年中，中原的部队拖得瘦瘦的，每个纵队才不过2万来人，6个团，还有4个团的。你们却在山东境内内线歼敌，连连获胜，缴获甚丰，养得兵强马壮，战斗力大大提高了……这回打黄维，中野部队的困难不小，多有力不从心之处。你们应当有争挑重担子的勇气，学刘邓学中野同志的榜样……”

赵启民急忙对陈毅表态：“这一点，成钧同我，思想上都是早有准备的。”

从临涣集回来的第二天，成钧便同参谋长冯文华带领3个师长，还有纵队司令部的参谋们，到中野第6纵队前沿阵地去进行战场侦察。

中野第6纵队在前沿阵地修起了一个隐蔽的观察点。观察点被深深地掩藏在黄土堆中，朝向敌人的一方开了几个窄长的观察孔。观察孔后面架设着炮兵的剪刀形望远镜。透过望远镜看去，敌人阵地上一切尽收眼底。

离前沿阵地不太远的地方，横躺着一条沙河。沙河泛出灰白色，河床已经干涸。河对岸是一大片平坦的耕地。黄维在耕地中央摆上了一长串汽车，汽车上装满泥土，车身下掘有战壕。浮土把汽车车轮都掩埋了。士兵们藏身在这垛由汽车构成的防线下。这道汽车防线成了黄维兵团部西南面唯一的屏障。

在汽车防线的东头和西头，立着两个大土堆。土堆高不过三四十米，是古代战争中烽火台的遗迹，当地老百姓叫它“古堆”。西面那座古堆是个平顶，因名“平古堆”；东边那个有尖顶的自然就叫“尖古堆”了，在两座古

堆间有个百十来户人家的村镇，它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双堆集。黄维在两个古堆上都修了重重叠叠的工事，布下了重兵。东边那个尖古堆，它的下面连着大王庄、小王庄、周小庄几个大大小小的村庄。从军事上看，这是平地防御中一个极有利的地形，是一个有纵深有层次互为犄角互相支撑的理想阵地。这阵地又紧连着双堆集和小马庄，就显得更加重要。双堆集是黄兵团主力第 18 军和快速纵队集结的中心场所。黄维和他的兵团司令部就设在双堆集背后的小马庄里。

成钧从中野第 6 纵队司令部打听明白，黄维已经把第 18 军第 118 师的第 33 团摆在大王庄和尖古堆上，还把第 85 军的一个师放在小王庄和小周庄一线。第 18 军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第 33 团是第 18 军这个主力中的主力，是一支有“老虎团”之称的精锐部队。成钧根据黄维的兵力部署断定，这尖古堆上下，正是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这也是关系黄维生死的一个咽喉要地。

只过了三天，总前委刘、陈、邓正式命令，华野第 7 纵队接替中野第 6 纵队周尹庄一带的阵地，准备攻歼大王庄、尖古堆、小王庄、小周庄之敌。

成钧和赵启民把攻歼大王庄、尖古堆之敌的任务交给了第 20 师，把攻占小王庄、小周庄的任务交给了第 19 师。

12 月 2 日晚上，两个师同时进入了攻击出发阵地，进入了紧张的攻坚准备阶段。

就在总前委下令第 7 纵队担负攻击黄维核心阵地的同时，陈毅在电话中给成钧打了个招呼：“经过总前委研究，打算调你们的山炮团到临涣集来，归野司统一使用。”

“是全都去，还是给我留两门？”成钧问。

“是全部，一门不留。”陈毅说得干脆。

“那……好。我执行。”成钧迟疑了一下说。

“我们要割你的这块肉，你莫要叫痛哟！哈，哈……”陈毅讲得挺坦诚，还带点诙谐。

“那天，在小李家村，你对我这个炮兵团那么感兴趣，我当时就料到，你会打我这个主意的。”成钧也俏皮地回答。

“那么，这件事，就这样敲定咯！”

“这多年来，在上级的命令面前，哪一次我成钧讲过价钱？”

“要得。”陈毅十分满意地撂下了电话。

成钧把炮兵团长找来吩咐：“你马上回去准备，今天连夜动身，把所有的炮弹统统带去，一发也别留下。”

天快黑时，成钧同赵启民一道来给炮团送行。

成钧把全团的骡马、鞍鞴、驮架上的山炮和每一箱炮弹，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赵启民集合炮团干部战士讲话：“你们代表我们全纵队同志，去接受中野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检阅……”

浩浩荡荡一支炮兵，在暮色苍茫中越走越远。成钧和赵启民站在大路口上，目送这支渐渐隐没于远方的队伍。

过了两天，陈毅派总前委的一位机要员将毛泽东 11 月 13 日的一份电报送来给成钧、赵启民。

电文的（四）写着：

“7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注：即华野特种纵队的榴弹炮两个团）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

咀嚼着毛主席的这个电文，想起陈毅在小李家庄的那个特别交代，成钧的胸中仿佛出现了一片开朗的蓝天。

血战大王庄

夜间，第20师部队进入了预定位置，着手准备大王庄的攻坚战。

天拂晓前，成钧让师长张怀忠领他到离大王庄最近的哨位去，再次观察黄维的这个核心阵地。

30来户人家的大王庄，家家的房顶统统被揭得精光，剩下一片光秃的房框和山墙。那房顶的梁柱和檩木，全被“老虎团”的人拆去修了工事。村庄四周的树木也被斩伐一光。原先被树木遮掩着的圩堤，此刻都裸露在那里。圩堤上布满了地堡、鹿砦和射击掩体，圩堤下环绕着一条长长的水壕。当年人们用这圩堤和壕沟来抵挡淮北平原上的洪水，如今竟被“老虎团”利用来作了村落防御的主阵地。

主阵地上，每隔几丈远便修出一座坚固的暗堡火力点。火力点里安放战防炮，纤细的炮管伸出在射击孔外面。战防炮能抵近发射出榴霰弹，对近距离内发起冲锋的队伍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至于轻重机枪和汤姆式冲锋枪，更是密密麻麻地散在各个射击掩体里面。如此密集厚实的近战火力，已经把这道圩堤变成了一堵死亡之壁。

距离主阵地100来米的村庄外围，有一串子母堡群。每个堡群都由一个排的兵力把守。堡群同堡群之间可以用交叉的机枪火力互相支援，堡群同主阵地之间却不用交通壕贯通。守堡的士兵们心里明白：他们的命运只能同堡群共存亡。古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竟重现在现代的战场上。敌人给这种特别残忍的阵地，取了个响亮的大名，叫“铁壁”。

在大王庄里面，那一栋栋被拆毁了的房屋，也被改造成了由壕堑和室内暗堡织成的阵地内核。

这个由“铁壁”主阵地和内核构成的防御体系，显示出被称做“老虎团”的第33团并非虚有其名。它是蒋介石的战将胡璉亲手传授下来的一项看家本领。现任第12兵团副司令官的胡璉，原本是第33团的连长。他从这个部队的连长、营长、团长，一步步地爬上来，一直到第118师师长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军长。可以说，这支部队擅长防守的名声，正是胡璉在这个部队一手闯出来的。胡璉对防守战术有独到的研究。前年夏天，胡璉在第18军连以上军官的一次战术研讨会上讲话，专讲他对阵地编成和火力配系的形与质以及立体、多层和地干线下的火力等等的心得和创见。这个讲话材料后来被成钧缴到手。成钧对这个小册子不但自己细心地看了多遍，还要求全纵队营以上指挥员也“用心读读”，“向敌人学习”，“把敌人的本事学来消灭敌人”。此时此刻，在这个前哨阵地上，当成钧对“老虎团”大王庄阵地进行身临其境地观察之后，他对胡璉小册子中的那些“心得”和“创见”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感受。这也便是成钧的一大聪明。

天色渐渐明朗开来，大王庄阵地前后左右的景物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张怀忠强拉硬拽着让成钧离开了这个前哨阵地。

但是，成钧还是在阵地纵深的一处高地上蹲下身来。他要把大王庄阵地

的前前后后看个透彻，看个心里踏实。

大王庄紧挨着双堆集，两地相距不过三四千米。在清晨的寒风里，双堆集上烟雾缭绕，人声嘈杂。集外的空地上，摆列着一排一排的榴弹炮和坦克。环绕炮场周围，整修出宽阔的道路。望着这个严整的火力阵地，成钧觉得这个黄维兵团虽然是在行军中仓促转入防守，但从这重炮和坦克的摆列以及人车运动道路的规整来看，第 18 军和快速纵队不愧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他还从重炮队机动射击的方位上得出判断：大王庄前面那一大片开阔地，正是胡璉有意给进攻部队设下的一个陷阱。他想引诱我们的步兵从这片开阔地上去攻击那坚固设防的村落阵地，而后趁我们在这阵地前进退不得的机会，让这些重炮和坦克突然开火，给我们一个火力奇袭；或者用坦克来出击，大搞他的“火海战术”。

成钧同胡璉是头一次交手，但是成钧对胡璉的军事观点、战斗作风和行动特点，已经细心地研究了两年。他对那个书呆子气的黄维，说实在的并没太放在眼里，但他对于胡璉的每一个部署和行动，却总是格外留心。他平生偏爱看重那些战场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对胡璉也是恶而知其美的。

回到师指挥所里，成钧同张怀忠对进攻大王庄的作战计划又作了进一步的推敲。

“首先是要切实抓紧把近迫作业搞好！”成钧语重心长地叮嘱张怀忠。

要进攻大王庄，部队必须通过大王庄前面那片大开阔地。在这一点上，他同胡璉的看法是相同的。

敌人在这片开阔地上设下了一个“火海战术”的陷阱。在这一点上，他看透了胡璉的心机。

成钧要采用大规模近迫作业的办法来踏破胡璉的“火海战术”的陷阱，给胡璉一个有力的打击。

入夜，第 58 团、第 60 团近 2000 名战士散开在大王庄冰封地冻的开阔地上，挖出一条条齐人深的战壕。凭着这纵横交织的战壕网络，战士们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让敌人的“火海战术”只能在平地上抖威风。他们要凭着这网络式的战壕，向敌人的阵地一步一步地逼近，一直逼近到“老虎团”的腹地。

近迫作业进行到第三天，黄维同南京国防部商定来个空、步、炮、车的联合大反击，以“彻底打破共军的沟壕战术”。

大反击从由南京派出的轰炸机群对作业区进行“毁灭性轰炸”开始。轰炸机群出动之前，黄维司令部同南京空军部进行了无线电“陆空协同”。双方商定，大轰炸的开始时机选在当日空中能见度最佳的中午时分。

这次无线电的联络通话，被纵队政委赵启民的那架宝贝收音机收听到了。

成钧马上命令张怀忠，让作业区里的部队迅速作好迎击敌军大反击的准备。

中午一过，从南京起飞的大群轰炸机便飞临双堆集上空。排成楔形横队的机群，把一颗颗炸弹倾泻在大王庄前面的解放军的作业区。炸弹命中率很高，作业区每隔 50 米左右便落下一颗重型炸弹。机群掠过后，原本明净的天空便因硝烟、尘土和浊雾而迷茫起来。暴烈的气浪冲撞着蹲在工事里的战士，战士们如同坐在海船上一般。

大轰炸一过，双堆集外的榴弹炮、山炮、野炮、化学迫击炮便一齐开火。在铺天盖地的炮弹爆炸声中，敌快速纵队的坦克像一群钢铁老虎，咆哮着冲

进了近迫作业区，在纵横交织的战壕上用履带纵情地蹂躏。只一顿饭工夫，战士们辛辛苦苦流血流汗的成果，便全被毁坏。战士们气得破口大骂，那坦克却只愿往前冲去。

大王庄的敌步兵抓住这个时机从工事里跳出，尾随在坦克后面向作业区跑来。他们要把这一大片作业区抢夺到手。

作业区里的解放军部队，对敌人这一手是早有准备的。当大轰炸和炮击时，他们分散开来，将身子隐藏在各处的防炮洞里。当坦克在作业区里横冲直撞时，他们也让自己的身体深藏在泥土之中。当敌人的坦克同步兵结合发生脱节时，他们便纷纷从泥土中探出身来，抖掉泥土，抖擞精神，用机枪、汤姆、卡宾等武器向敌人步兵横扫过去。

敌人的步兵，被我军战士一拨一拨地压倒，只得趴在地上。敌人的坦克却只顾一个劲儿地朝前面冲撞过去。坦克同步兵被分割开来。

敌人的坦克一旦同自己的步兵脱离开来，第20师部队里经过专门训练的反坦克小组便抓住机会，一拥而上，用火箭弹、炸药包和熊熊燃烧的秫秸将坦克围裹起来。

在开阔平坦的作业区里，呈现出步兵同步兵拼死厮杀、步兵围歼坦克的激烈场面。

黄维精心组织的空、炮、车、步大反击，在苍黄的暮色中黯然收场。

成钧在纵队指挥所里，望着这片欢呼喊叫的开阔地，开怀大笑。他为自己的步兵成了战场的主宰而感到欣喜和自豪。

陆空联合的大反击破产后，“老虎团”使出了另一个“杀手锏”——组织小分队，对我作业部队实行短促突然的袭击。

头几次的袭击，“老虎团”真的占了点便宜——进展得最快的几处近迫作业，有的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被迫停了下来。

成钧在电话中严厉批评张怀忠：“你们部队的机枪是吃素的？敌人从工事里跳出来，送上门，为什么不狠狠地揍他？好好组织一下嘛！把敌人引出来打，比在工事里去消灭它不更好些么！”

成钧的严厉批评，批出了作业部队的新战术。

接连几天，作业部队的机动小分队把前沿的壕沟作为诱饵，钓“老虎团”的人来上钩，将其机动兵力大量杀伤，为最后攻夺大王庄阵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第七天，“老虎团”不再出来反击了。

作业部队迅速把战壕网络伸展到了“老虎团”的主阵地前面。

12月10日前后，根据总前委的决定，中原野战军再次调整了作战部署。以新调来的华野第3、13纵队，连同原来的中野第6纵队和华野第7纵队组成南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在东西两集团的配合下，突击黄维双堆集的核心阵地。

12月13日晚，东、西、南3个集团在同一时间发起了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击。

在华野第7纵队第20师的阵地上，师的两个主力团——第58团和第60团，并肩携手，对大王庄“老虎团”的阵地进行决定性的突击。

这是一次没有山野重炮火力支援的阵地攻坚战，是两个团在解放战争中经历的一次极其艰难的阵地进攻。

两个团把迫击炮、步兵炮、六小炮以及枪榴弹都集中摆在前沿阵地上，

趁日暮前对敌所有的暗堡、炮位以及对进攻部队危害最大的火力点和预备队的藏兵场一一进行了精确的瞄准校正，轻重机枪也对目标一一进行了试射。

当师、团指挥所发出的攻击信号弹飞上夜空时，这些掩藏在大王庄前面战壕里的炮火便把“老虎团”的阵地遮盖住了。敌人的机枪、火炮一时间竟都成了哑巴。就在这一瞬间，我军两个团里一大批最勇敢最有经验的爆破手，一个个从最前沿的战壕里奋勇跃起，抱着炸药包，盯住选定了的目标进行连环爆破。

连环爆破之后，进攻出发阵地上又飞出了土造的新式武器——“炸药炮”。炸药炮弹砸在敌人的“铁壁”和主阵地上面。这种并无多大杀伤力的土造“飞雷”，其巨大威慑力却能引起敌军官兵如面临天崩地裂似的恐怖，使他们在短时间内完全丧失抵抗力。

借着炸药炮天崩地裂似的震撼威力，第58团第4连和第60团第7连从“老虎团”的鼻子底下发起了最猛烈的冲锋。两个尖刀连只用了一个猛、准、狠的近距离冲锋，便杀进了大王庄敌人的主阵地。

当敌人从天崩地裂似的震撼中清醒过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阵地正在被撕破时，他们便用战防炮的榴霰弹和火焰喷射器的熊熊烈焰，来迎击我尖刀连的冲锋。

被榴霰弹杀伤的尖刀连战士，在地上爬着滚着，把丰榴弹塞进敌暗堡里面，取消了战防炮的“发言权”。

被火焰喷射器的火焰烧伤的突击队员，披着烈焰腾腾的棉衣，忍受着钻心彻骨的疼痛，奋力扑到敌人身上，同敌人一道滚下尸首枕籍的外壕里面，同归于尽。那些没被扑住的喷火兵，吓得抛掉手中的火焰喷射器逃跑了。

两个团的后续梯队，像澎湃的海涛席卷着突破口两侧，在敌人的主阵地上站稳了脚跟。

“老虎团”的军官驱赶着士兵向突破口反扑过来。

反扑的敌人，在尖刀连战士的刺刀和手榴弹面前惊得发呆，喊叫着向庄里逃命。

尖刀连的战士们奋勇追打着溃逃的敌人，趁势冲进了大王庄。

“老虎团”的士兵据守在壕堑和室内暗堡构成的核心阵地里，顽强抵抗。

我军两个团的部队都是富有巷战夜战经验的精兵，战士们用小包抄战术去分割敌人，用小包炸药和汤姆、卡宾、机枪等速射火力把敌人的阵地摧毁。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勇敢、机智，三人一组，五人一群，利用敌人的壕堑，专找暗堡的出入口去钻。他们凭一两颗手榴弹便解决一座暗堡。他们混在敌群里面，虚张声势，横冲直撞，打得敌人阵地上一片混乱。

蹲在大王庄东头的“老虎团”团长孙竹筠，眼看大势已去，带领一小批残兵，逃上了尖古堆。剩下的敌兵有的缴械投降，有的逃奔双堆集，有的逃进我军占领的地堡里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不到1个小时，“老虎团”死守的大王庄便被第20师部队全部占领，黄维兵团的咽喉阵地被一刀斩断了。

胜利的喜讯立刻飞到了第7纵队指挥所，飞到了成钧、赵启民面前。

胜利的喜讯立刻飞到了总前委和中野指挥所，飞到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面前。

陈毅立刻给第7纵队第20师政委邓少东打电话：“大半年不见5旅部队了！”

第 20 师即是抗战时期新四军第 5 旅，是陈毅亲自指挥作战多年的一支部队。陈毅是今年从华野调到中野后才同这支部队分手的。他一开口便他乡遇敌人似他说了起来：

“你们这次不到 1 个小时，便把大王庄这样坚固的重要阵地拿了下來，把蒋介石北伐时期组建的一个主力团，把这个陈诚当过团长的精锐团，干干脆脆地消灭了！看到你们部队这么大的进步，十分高兴啊！”

最后陈毅说道：“刘司令、邓政委都认为大王庄阵地很重要，敌人一定会来争夺的。刘司令、邓政委让我转告你们，你们部队一定要守住，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阵地守住！”

邓少东立刻把陈毅的电话内容报告了成钧。

成钧同赵启民正在细细琢磨陈毅的这个电话，大王庄方向便爆响出一阵猛烈的炮声。

成钧对这阵炮声起先没太在意，只交代指挥所参谋：“问问 20 师，有什么情况？”一个疆场老将，当然是听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炮声的。

但是，炮声在继续，而且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急，越来越狠了。

第 20 师指挥所来了报告：“双堆集的敌人正在对大王庄实行炮火反击，势头很猛啊！”

成钧扔下电话，从地下指挥所里出来，站到庄北头的高地上，朝大王庄方向眺望。

双堆集上那些榴弹炮、山炮、野炮、化学迫击炮喷射出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些闪闪烁烁的炮弹，在夜空里划出一束束密密的弹道，落在大王庄上。

大王庄正陷在雷鸣电闪般的爆炸中间。一个血红色的火团升起在大王庄上空。大火团下面还有一股股新冒出的烈焰，在翻滚，在腾腾升起。人们已经分辨不出那一发发炮弹爆炸的声响，只听到一阵持续不断轰隆不绝的雷鸣。

成钧被这猛烈轰击的炮火惊得一怔，双脚被牢牢地钉在村头那高地上。

敌人要反击，这一点，成钧是早就料定了的。

敌人对大王庄的反击来得这么急，这么猛，这么狠，却是成钧始料不及的。

炮击的时间越拉越长，爆炸的声浪越来越高。

成钧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这持续不断、越来越重的轰鸣，这雷鸣电闪般的大爆炸，这汹涌涌涌的血色云团，恍惚都升腾在他的胸间。他恍惚看见一群群战士正在大王庄那烧得通红滚烫的堑壕里苦苦拼搏，他恍惚看见一座座工事正在炮击中崩塌。

一连串疑问像无数只鼓槌在叩击着成钧的心扉。第 20 师会遭受多大的损失？战士们将付出多大的牺牲？已经夺到手的阵地会不会丢失……尽管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尽管长年的战火使他锤炼出一种临危不惧、处险不惊的高级指挥员的胆魄，但是在如此凶狠、猛烈的炮火面前，他的心还是被摧折得痛楚不堪，禁不住颤抖起来。

夜已经很深，北风在尖厉地呼啸，天空里飘起了雪花，他却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高地上凝望。

警卫员朱志德抖开一件军棉大衣，披在他肩上，他竟浑然不觉。在雪花

飘飘的北风里，他只感觉浑身上下都在被烈火燃烧。

参谋长冯文华跑过来，把他拽回地下指挥所里。

在指挥所暗淡的烛光下，他看见政委赵启民皱紧眉头在倾听收音机，想从敌人的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一点大王庄的消息。

成钧一回到指挥所便问冯文华：“第20师有什么报告？大王庄的情况怎样？”

冯文华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说：“问了几次，回答都一样：不知道。通大王庄的电话线被炸断啦！”

炮火急袭的轰响在持续。成钧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焦灼，便拿起电话：“要邓少东讲话。”

邓少东的声音在电话中出现了。

“大王庄里面有什么人在掌握部队？”

“60团的政委在里面。”

第60团的政委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他初当团政委那阵子，因为缺少指挥作战的经验，团里有位干部跑去向成钧、赵启民提意见，要求把这个政委换掉。成钧反问道：“这个人打仗不错嘛！没有指挥经验，哪个人的指挥经验是生下来就有的？你刚当指挥员时就有经验，就很成熟，就没有打过败仗吗？”这个干部被他问得讲不出话来。从这以后，成钧更加关心这位政委在战斗中的表现。曾有好几次，他从纵队指挥所直接同这个团政委通电话，鼓励他大胆指挥作战。

这会儿，当邓少东在电话中提起这位团政委时，这位政委正在大王庄阵地上指挥部队对付敌人的炮火袭击。他发现敌人的炮弹多数落在村庄中央和南边，便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到村庄的西面、北面和东面一线，占据了靠近双堆集和尖古堆方向的前沿阵地，让敌人密集的炮弹落到部队的后面去爆炸。他知道，在夜间，这是躲避敌人炮火的有效办法——靠敌人越近，敌人越不敢向你开炮。他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整修工事，抢挖防炮坑，加强警戒，派出潜伏哨，准备对付敌人步兵的突然袭击。他让各营各连派人到敌人工事和死尸堆里去搜寻弹药。他只顾忙活着这些，却没有、也不肯让徒步通信员冒着敌人炮火封锁去给指挥所送信，徒然增加伤亡。他知道，在这个时刻，每一个战士的生命都是最宝贵的。

这件事，后来成钧一直念叨了几十年：“我们当时在指挥所里急得要命，他却在那里只顾忙他的，也不给我们送个信来……”其实，他对这个政委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

在成钧政治上的关怀爱护下，这位团政委终于学会了指挥作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成钧的一片爱心，来感谢成钧的知人善任。

天麻麻亮时，从双堆集出来一股敌人。敌人一声不响地向大王庄摸了过来，每个人都反穿着棉大衣，大衣的白布里子同满地的白雪混成一个颜色。而我们的潜伏哨早已发现了这支伪装巧妙的敌人，部队早早地作好了准备。当这股敌人摸近时，战士们便用机枪、手榴弹打得这股敌人鬼哭狼嚎地败下阵去。

天色大明，双堆集的炮击终于停歇下来。

大王庄上打垮敌人偷袭的消息，也传进了纵队指挥所。

成钧急忙命令第20师师长张怀忠抓紧时机调整部署，把师预备队第59团推上去，坚守阵地；把第58、第60两个团撤下来，进行整理。

“敌人肯定会来争夺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得把阵地守住……这是刘、陈、邓首长的命令啊！”

成钧把调整部署的事忙完，刚坐下来吸烟，便突然叫了声：“饿啦！”直到这时，赵启民、冯文华和指挥所的人们才发觉，一头冷汗正从成钧的鬓角顺着煞白的脸流淌下来。

刚刚吃完早饭，敌人对大王庄的大反扑便又开始了。

13、14两日，敌我双方在这个3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上，各投入了4个团的兵力。8个步兵团在这里反复争夺了一个昼夜，双方伤亡都极其惨重，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血战。战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军事理论家陈铁军曾到大王庄进行实地考察。他从1平方米的泥土中，竟找到了120来个炮弹碎片和子弹头。

14日中午，大王庄争夺战打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国民党两个团突进村里，同第7纵队第59团进行逐房逐屋、一墙一沟地反复争夺。第59团指挥所向第20师首长告急。成钧知道这个情况后，斩钉截铁地命令第20师政委邓少东：“你把所有部队都豁上去！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阵地守住！”邓少东将师里仅剩的1个主力营——第60团第1营，加上团部的警卫连，立即增援上去。阵势刚刚稳定下来，敌人又上来了1个团，形势便又恶化起来。这时候，刘伯承、邓小平急命中野第6纵队第46团就近增援大王庄。

第46团部队正从大王庄西南面进入庄内，双堆集敌人的坦克便赶过来实行“腰击”。

第46团大部被挤压在第20师原先近迫作业区里，同敌坦克进行战斗。进入村内的部队，则同华野部队会合一起，与敌人进行争夺。

战斗打到下午4时前后，中野第46团某部的战士同华野第60团第2连1个排扼守在大王庄东南角的一段战壕和一座地堡里面。第60团战士把机枪打坏了，第46团的同志便把一挺机枪支援过来；第46团的同志没有了手榴弹，第60团的战士便送过去一批。两大野战军里的两支小分队，在这片流淌鲜血的热土上，在这个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生共死，同凶恶的敌人血拼到底，直到大部队上来把大王庄阵地全部恢复。这一英雄事迹，当时便由新华社战地记者賁育同志写成了报道，向全国广播。以后又收集在一本记叙淮海战役的故事集里。

天色渐近黄昏时，成钧命令第20师师长和政委将早晨从大王庄撤下来的两团人全部集合起来，重新投入战斗，坚决把大王庄夺回来。

“坚决把大王庄夺回来！”命令中的每一个字都迸射出他心灵上的那种拗劲、狠劲和硬劲。

成钧这股顽强不屈的劲头，同第20师干部战士的心是相通的，他的这股心劲也深深地植根在第20师这支英雄部队心灵的沃土之中。他的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一种军事权威的强力，不如说是一种心灵对心灵的呼唤。

一支不满千人的队伍，从极度疲劳困顿中振奋起来，踏着沉重艰难的脚步，又一次跨上了那片淌满鲜血的焦土。这时，他们发现，大王庄上的敌人，除了抛下大批伤兵和尸体外，活着的都逃回双堆集去了……

黄维兵团的末日

第18军在大王庄的惨败，使黄维兵团南面一线阵地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14 日夜间，成钧命令第 19 师部队乘胜夺取小王庄、小马庄几处阵地。小周庄阵地一攻便破，没费大劲。

夹在大王庄同小周庄中间的小王庄，驻守着敌第 85 军的第 23 师。该师眼见自己在解放军铁钳似的虎口里面挣扎不得，当解放军第 19 师部队对他们发起攻击前的一瞬间，师长王子华便宣布缴械投降。

剩下一个小马庄，孤孤单单地悬在一边。在第 19 师风卷残云的攻势下，这个小庄的敌人很快就被消灭了。

大王庄、小王庄、小周庄、小马庄一经扫荡干净，那原先突出在南线阵地的尖古堆便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土窝窝头”。

成钧命令第 21 师师长谢锐，把这个“土窝窝头”啃掉。

第 21 师部队第一次冲到“土窝窝头”的半腰上，古堆顶上的敌人突然跳出来施放毒气。我军第 61 团部队猝不及防，攻击受挫。

师长谢锐亲自组织对尖古堆的第二次攻击。他挑出第 61 团第 7 连和团部侦察队，兵分三路，实行宽大正面的突击。他让战士戴上用大蒜和肥皂制成的土防毒面具，并调集几门六 小炮专打那占在上风头上施放毒气的敌人。他严密组织师、团的炮火，将弹雨压在这座小小的“土窝窝头”上面。

在谢锐这样严密的部署下，两个连只用了 10 分钟时间，便啃下了这个“土窝窝头”。

尖古堆的陷落，敲响了黄维兵团的丧钟。

黄维、胡璉决定突围，并立即电告蒋介石，要求于 15 日派空军来掩护兵团突围。

15 日上午 9 时，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双堆集上空与黄维通话。王叔铭只对黄维讲了一句：“不能照计划实施。”黄维回答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

王叔铭同黄维在这里打了个哑谜。两人说的那个“不能实施”的“计划”，其正式名称叫“亥真 1700 计划”，是 1948 年 12 月 11 日由蒋介石、顾祝同、王叔铭同黄维研究制定的向解放军施放毒气掩护黄维兵团突围的计划。

王叔铭的飞机从双堆集上空离去。

黄维、胡璉和另一位副司令官吴绍周召集军长们在兵团部的大地堡里确定了当日黄昏突围的计划，即“四面开弓，全线反击，觅缝钻隙，冲出重围。”

黄维、胡璉的突围企图很快便被围攻双堆集的各路解放军部队发觉。

中野司令部火速下达了刘、陈、邓首长歼灭突围之敌的命令。

华野第 7 纵队司令员成钧在接到中野司令部的命令之后，又接到陈毅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

陈毅指示：第 7 纵队突进双堆集黄兵团的各师各团，对阵地上的所有重武器，包括榴弹炮、山炮、野炮、化学迫击炮以及重机枪以上的火器，一律不准动，包括弹药在内，一律由中野部队上来缴获。

陈老总的这个特别指示，当然得到了第 7 纵队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坚决彻底的执行。

陈老总的这个特别指示，虽然在第 7 纵队的战果统计上减去了一长串数字，但在部队精神风格的锤炼上却获得了一个大丰收。

黄维部猬集在双堆集的残兵败将，没等到黄昏便乱糟糟地四散逃命了。

黄维调来 3 辆坦克，自己占了第一号，把第二号分给了胡璉，另一位副司令官吴绍周摊到了第三号。3 个人分乘着 3 辆坦克向双堆集西面的沙河突

围。

3 辆坦克跑到了乱军的最前面。

副司令官吴绍周乘坐第三号坦克跑到玉皇庙前面渡河时，才发现黄维、胡璉的坦克已经把沙河上的浮桥压坏了，第三号坦克无法通过。情急智生的吴绍周，头脑顿时清醒过来，觉得与其到南京去送死，倒不如呆在这里被俘。他在解放军的战俘招待所里，比黄维早休息了两天。

黄维与胡璉的坦克一路领先，以最快的速度渡过了沙河，突出了重围，来到了浍河边上。

在浍河北岸，黄维不禁唏嘘感叹。11月20日，他的12万“精兵”正是从这条河上强渡过去，进入南坪集，钻进刘伯承的“囊形阵地”中的。25天后，他却凭着一辆坦克，形单影只逃到了这里，那12万“精兵”全装进了刘伯承的口袋里。

在浍河，黄维所乘坦克的发动机被河水浸熄了火，他便舍车泅渡过了浍河。他刚爬上河岸，便被在浍河南岸巡逻的民兵活捉。

只有胡璉侥幸逃进了蚌埠城。

解放战争时期的杜义德

王 毅

杜义德（191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2年5月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28年参加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4军第1师第3团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4军第10师第30团营政治委员，第29团政治委员，红30军第89师政治委员，红31军第91师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4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冀南军区副司令员，西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0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川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上党习用兵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迎来伟大胜利，但中国共产党却面临着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刚从抗战烽火中走出的杜义德正静静地听候着一场历史决战的将令。是年他33岁，任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以他富有魅力的湖南乡音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根本方针深深印入杜义德心中。“骤风起于青萍之末”，当刘伯承司令员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时，杜义德的心头闪过了这句中国的古训。“中共中央还要求各解放区要迅速地编组野战的正规兵团，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但必须保留一定的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并迅速地扩大民兵。同时，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实行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以便迅速地确立党在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地巩固一切新解放区。”美军的道格拉斯运输机懵懵懂懂地把刘伯承、邓小平等中共高级将领从延安运抵太行山腹地，哪曾想到他们带来的却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大胆应对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

杜义德及其支队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全国7个较大的解放区之一，包括原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此战略区域，西起同蒲路，与晋绥解放区相邻；东抵津浦路，与华东解放区相接；北起正太路、德石路，与晋察冀解放区相依；南至黄河，与中原解放区毗邻。因此，全区既处于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的地位，又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国民党军队向北进攻的道路，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1945年8月20日，在老解放区的基础上，遵照中央决定，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太行军区司令秦基伟，政委李雪峰；太岳军区司令王新亭，政委王鹤峰；冀南军区司令杜义德，政委李菁玉；冀鲁豫军区司令王秉璋，

政委张玺。

从敌后游击抗战转而成为野战正规兵团作战，这对于久经沙场的杜义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他手下的部队多数是基础不错的老部队，但是抗日战争后期分散到各区作为基干团，到对日大反攻之后，才逐步集中作战。部队的编制有些还不充实，团不足千人，装备就更差，没有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寥寥无几，弹药奇缺，步枪每支配弹仅数发，新参军的战士只能发给刀、矛。为此，杜义德向坐在身边的王蕴瑞，也就是后来的冀南军区4分区司令员投去了商讨的目光。

“老王，依你看来，凭我军现有的实力，怎么对付蒋介石的正规兵团呢？”

“还是得依靠运动战的方式。”年轻的王蕴瑞反应一向十分机敏。

“嗯，但关键也就在于如何运动，在运动中增强实力，削弱敌人。”

“是啊，究竟会是怎样一个打法呢？”

“其规模已远远不同于对日本的作战了。”

杜义德与王蕴瑞所研究的题目也正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军区首脑所关心的。1945年8月中旬，盘踞于晋西南的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按蒋介石的密令，派出4个师1个挺进队的整装兵力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心腹——上党地区，企图刀插上党，分割我太行、太岳根据地。中央军委明示刘、邓：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灭心腹之患。若要战胜蒋军的进攻，则必抱定打运动战、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打歼灭战的思想。

当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大部正在继续执行对日反攻的任务，杜义德所率冀南军区一部主力则在平汉铁路东侧作战。就全区而言，战略上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和平汉、同蒲两个方向上的进攻；而平汉线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当然是敌人日后的主攻方向。晋冀鲁豫局和军区重视对平汉线的控制，而派出了冀南军区的主力部队加以镇守。但此次驱除阎锡山的上党之敌，又非精锐不可。最终，在刘、邓的棋局上，冀南军区的8000人马汇同太行、太岳两区主力共计2.8万，围上了太行山南部的一片低地，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那只“脚盆”。

杜义德首先接到的是刘伯承的电示，令其迅速扩充兵力。“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就是胜利。”杜义德白天忙着率领支队整编、扩兵、训练，到了夜里，他仍然没有停下来休息。杜义德拨亮指挥部里唯一的一盏油灯，铺开了由晋冀鲁豫军区制发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警卫员知道首长要考虑大事了，连忙倒上一大缸子白开水。这是杜义德思考问题时最爱喝的。杜义德手执红蓝铅笔，在地图上追踪着军区刘、邓首长的作战决策：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并吸打援长治之敌，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主力，而后再攻长治。为防止敌人向北打通白圭镇到晋城一线，则从北面打起。杜义德领悟了刘伯承的用兵之道，一切作战均以打歼灭战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主力部队要始终保持高度机动的位置，在野战中打击敌人。追随刘、邓，杜义德始终像学生敬待先生那样。在他看来，刘伯承长自己整整20岁，邓小平也长自己8岁，两位领导在军事指挥上都有独到的理论和实践。这次上党战役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大课堂。

9月1日，太行纵队成功地打下了襄垣。刘司令员在专为高级指挥员召

开的会议上，令麾下众将再次折服于这位军事奇才的远见卓识。他指出，阎锡山部队的作战是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并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在野战也就是运动战中，他们采取的是“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正面钳制，左右包抄。刘伯承对城市战斗的战术指导，诸如关于攻击准备、接城运动、登城战斗、破城后的街市战斗等，对野战运动战中的战术指导，诸如诱敌、设伏、围攻方法以及追击、截击、阻击等，一一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说明。当杜义德捧读这篇后来被定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的军事专论时，如同亲耳聆听刘司令员的教诲一般。这篇专论几乎成为他在军事指挥领域得以升华的阶梯，令其终生受益。

9月7日，军区下达发起上党战役的命令。9月10日，战役正式发起。杜义德率领支队隐蔽于长治屯留公路两侧准备歼击长治援兵。仲秋的太行已暑气尽去，夜间初寒逼人，但身穿解放区群众支前的夹袄，脚踏妇女们送给部队的新布鞋，上下暖融融的。通过那架德国造的蔡斯牌军用望远镜，杜义德焦急地在视野中搜索着长治方向，心想只要阎锡山的部队敢出来增援，我就彻底消灭它。邓政委给了咱充分准备时间，绝不能辜负了他。原来，杜义德所率冀南部队系长途跋涉而来。为此，军区政委邓小平致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提议推迟两天发动战役。邓小平在这里为杜义德作了周全的安排：冀南部队长途跋涉，于9月2日才能到达河北省彭城、峰峰以西的贾壁，3日才能到达涉县以东的张家庄，4日才能到达涉县对岸的河南站，5日才能到达潞城东北的黎城附近集结。到达黎城后可以休息待机，便于攻克屯留、长子后向潞城攻击。刘、张、李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建议，把原拟定于9月8日拂晓前正式开始的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9月10日2时30分发起；并请邓小平亲率冀南部队于9月6日由黎城南开，进到北社南庄，7日向西开进，求得于8日晨4时以前到达南漳、北呈镇待机。

正当刘、邓电文频繁往来时，杜义德则带着他那支穿着紫花布军服的冀南部队由平原转入了山区。杜义德深爱着手下这支由燕赵农家子弟组成的部队，他们朴实、勇敢、忠诚。他知道，尽管部队的补给军需存在一定困难，但士兵的士气是高涨的。然而，杜义德在连日的开进过程中，却也发现了部队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冀南部队是初次从平原到山地作战，有些基层指挥员连山地布哨也是陌生的。一些战士一路行军，一路拾他们罕见的石子，放进挎包作纪念，直到他们发现太行山到处都是石子才把捡的石子抛弃掉。“我们的这支部队对山区还如此陌生，这恐怕会对将来作战造成不利。”在给刘、邓首长的电报中，杜义德如此十分坦率地汇报了自己部队的这一弱点，没有丝毫的掩盖。这一做法令刘、邓深表赞赏。刘伯承接到杜义德的电报感慨道，作为一员战将和战场指挥员，以战局为重，以士兵为爱，而不顾及个人虚荣，坦白弱点，真是可贵啊，可贵！刘、邓令杜义德把部队摆在长治西北，并把战役指挥所靠近这里，由太行后勤指挥部给冀南部队直接提供后方勤务。

9月12日夜，位于呈史村的杜义德得知，刘、邓首长已将指挥部摆在了自己的背后和驼坊太行部队指挥所的侧后。杜义德十分清楚刘、邓首长的意图。陈赓打长子是“打圈猪”，而守在这里的刘、邓亲自指挥太行部为右翼，作为左翼的冀南部则是准备“打野猪”。

从13日2时30分攻打长子的战斗打响第一枪，杜义德就很紧张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直到14日，那架蔡斯牌望远镜一刻也未离过他的手。可长治

阎军十分谨慎，仅在近郊试探性地接触了一下就龟缩不动了。从 10 日等到 14 日，足足 4 天，却没有用武之地。古来用兵讲求动静相生，或以静制动，或以动制静。伏击打援是敌动我静，以逸待劳的战法；而敌畏缩胆怯，迟迟不动，则是我军主动发起攻势的时机。素以少年持重、慎思断行而著称的杜义德拿起电话，摇通了刘、邓的指挥部。

“ 司令员，我是杜义德。 ”

“ 噢，有啥子情况？ ” 对面传来刘伯承铿锵的声音。

“ 部队隐蔽了这么久，我分析敌人的情况是不敢有所动作，龟缩固守将成定势。不若乘敌人胆怯、我军士气正勇发动攻势战，攻陷外围城镇，以势逼人，压迫长治之敌出城。 ”

“ 对头，你的估计有理。目前长治阎军远出增援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我们该采取第三步行动！ ”

“ 司令员，部队斗志高昂，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来！ ”

“ 放心，有你们的肥肉打牙祭！ ”

杜义德听到司令员将“打牙祭”的“打”字说得很重，禁不住心头一热：“是，司令员！我冀南部队保证完成任务！”

刘伯承许诺给杜义德的肥肉是位于长治北面的潞城。9 月 16 日 22 时，陈再道、杜义德率冀南部队主力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攻击潞城。部队一鼓作气，势如破竹，一一落实刘伯承制定的作战要点：加强侦察和器材准备；接城运动动作以突然隐蔽为好；登城战斗则须突然隐蔽，一举登城。整个潞城攻击战如行云流水。占领潞城后，继而肃清了附近据点之残敌。陈再道、杜义德的速战速决推动了战役的进程，刘、邓要求陈赓提早消灭长子阎军。

9 月 18 日，刘、邓指挥部转到潞城。陈再道、杜义德让出潞城最好的一座宅院作为刘、邓的指挥部。在此，杜义德再次见到了刘、邓、张、李几位首长。邓小平拍了拍杜义德粗壮的肩膀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好！按张际春副政委的话讲，你们都是创造了历史的人！”

9 月 22 日，杜义德带着冀南部队开往长治东南面，负责进攻东关至南关段。与此同时，太行部队已摆在正南，太岳部队摆在了西北，形成围三阙一的态势。正在围攻之际，情报表明，阎锡山派出了 3 个师约 7000 人前来增援，一场打援战斗即将来临。9 月 28 日，冀南纵队会同太岳军区一部佯攻长治，以继续吸引援敌。10 月 2 日，我军将敌援军包围在老爷岭和榆林地区。经数日激战，敌军步步退缩、猬集于磨盘脑一带。这时，我军发现敌人不只是 3 个师 7000 人，而是第 7 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所率第 23 军、第 83 军和省防军共 8 个师 2 万余人，兵力与我相当。军区领导急调冀南纵队驰援。按照军区命令，陈再道、杜义德迅速率队投入战斗，并在白天开进，故行暴露，以加速敌人动摇。激战至 7 日，阎军后援大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将领就擒。10 月 8 日夜，史泽波部弃长治西逃。10 月 10 日，蒋介石见上党大势已去，不得不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此后，蒋军又把主战场瞄向了平汉路。为此，杜义德和冀南纵队在短暂休息后，也开始东调平汉路。

上党战役对国共两党的战略全局而言，带有两个中国命运搏斗的性质；就战争史的角度而言，它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就战役的角度来观察，它是刘、邓指挥艺术的一个结晶，长于机动，处处先手，运兵灵活，命令彻底，计划周密，巧于出奇；而对于杜义德本人来说，上党战役无疑是聆听刘、邓上课的大讲堂。在上党战役中，他看到了如何掌握指挥员所必须抓

住的五个要素——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特别是他学到了刘、邓在指挥作风上，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故而杜义德始终认为，刘、邓是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导师。

1945年11月，平汉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峰峰召开。尔后，第1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东北。为加强野战军，军区抽调太行、冀鲁豫的基于兵团编成了第6纵队、第7纵队。不久，杜义德继段君毅之后，成为第6纵队政治委员。在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养病期间，杜义德军政重担一肩挑，率领第6纵队在刘、邓指挥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区的艰苦作战。

第6纵队当家人

1947年初，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席漫了华北大地，刚刚率领第6纵队胜利结束了巨金鱼战役的司令员王近山，因吉普车翻进深沟而压伤了腿。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首长电令，在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由政治委员杜义德担负军、政指挥的全责。

在野司医院，王近山对前来看望自己的杜义德深表内疚：“同志们在前方流血，我却在后方休息！”

“只管安心养伤，很快咱们就又可以并肩战斗了。”

“政委，往后咱们6纵的家就全靠你来当了！”

杜义德挑起了第6纵队当家人的重担，等待他的则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行动。

豫北战役之后，杜义德率队奉命集结于汤阴西北之王佐、鹤壁地区。他一面抓紧部队整训，积极准备迎接新的作战任务，一面观察研究着国内的局势。

当时，全国形势正发生重大变化。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我军愈战愈强，总兵力已增至195万多，广大解放区经过土改更加巩固。敌军总兵力下降到373万，内部矛盾加剧，失败情绪严重。国统区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蒋介石反动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指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必须把全国的局势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一次彻底的宣传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把仗打明白。想到这里，杜义德喊通信员，请第16旅旅长尤太忠、第17旅旅长李德生、第18旅旅长肖永银速来司令部。正在这时，机要参谋“报告”说野司电话告知，6月6日邓小平政委要来第6纵队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与任务报告。“太好了，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啊！”杜义德立即命令参谋马上通知部队团以上干部和纵队机关及附近部队的连以上干部，6日来纵司集合，听取邓政委讲话。

6月6日，邓小平围绕着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意图，向第6纵队团以上干部作了形势与任务报告，又应杜义德的请求，向纵队机关和附近部队的连以上干部讲了话。邓小平概括了当前的形势后指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极其有利的时机，不待我军总兵

力超过敌军，也不待敌军重点进攻被粉碎，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让敌人有喘口气的机会。我们晋冀鲁豫区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邓小平的报告鼓舞了第6纵队全体指战员。杜义德引导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抢任务、争贡献的热潮。

6月10日，刘、邓首长在安阳石林村召集纵队干部会议，确定由第6纵队和第1、2纵队担负突破黄河的第一梯队，以第3纵队为第二梯队。

按照野司渡河作战命令，第6纵队为右路，在濮县以南之李家桥、于庄、大张村渡河。第6纵队渡河成功后，即迅速包围、分割、歼灭鄆城及其以北地区之敌，防敌向西南逃窜。在战前的准备会议上，杜义德向副司令韦杰、参谋长姚继鸣和3位旅长讲述了他的看法：“我纵渡河地段的南岸为敌55师第181旅，约两个团防守，东明集、临濮集地段有敌81旅，菏泽有敌119旅。敌人在各渡口均构筑了野战工事。”杜义德在地图上指了指，继续说：“现在正值夏汛，黄河有1000来米宽，水流很急，增加了我们渡河的困难，但河防之敌都是我们手下败将，119旅曾经被我彻底歼灭过。敌人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针对敌人防线长、兵力不足的弱点，我想集中兵力实施突然而有重点的突破。”听到这里，几位旅长都聚精会神地往前凑了凑。“以第18旅从后大张村渡河，第16旅从后李家桥渡河；以第17旅为二梯队，随第16旅后渡河。争取偷渡成功，偷渡不成，立即转入强渡。成功后，两路迅速插至鄆城以南，协同友邻歼灭鄆城及其以北地区之敌。”杜义德拿着红铅笔的手作了一个猛插的姿势，结束了他的作战指示。

韦杰副司令听后十分赞成，补充说：“各旅受领任务后，应立即进行深入的动员，使广大指战员认清这次行动的重大战略意义，情绪高昂，信心百倍，全力以赴地投入渡河准备。”

6月30日上午，杜义德和韦杰、姚继鸣到第一梯队第16旅和第18旅检查渡河的准备情况。杜义德十分满意手下两员猛将的果敢作风。准备工作就绪，他最后一次嘱咐第16旅旅长尤太忠和第18旅旅长肖永银：渡河后如敌建制尚未打乱，应当稳扎稳打，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如果敌建制已被打乱，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敌人，逐个歼灭。

黄河北岸是我解放区，濮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做了许多渡河准备工作，同时对沿河地区严密封锁消息，增修了大小50只渡船，在树林中挖好了隐蔽的船坞和进入黄河的河道。这种隐蔽的渡河组织方式，早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就使用过。杜义德当时在四方面军总部，对此十分熟悉，因而这回使用起来更是出神入化，令敌人根本无法侦察到我军的行动。

6月30日22时40分，刘邓大军从八个地段强渡黄河。第18旅在后大张村渡口，采取横宽队形破浪前进。敌发觉后，我部即以猛烈炮火压制南岸，掩护突击队登岸，迅速占领了东于谷、董口滩头阵地。第16旅在后李家桥渡口，以隐蔽的动作偷渡成功。两个旅迅速向西南追击，鄆城守敌慑于我军声威，星夜弃城南窜。7月1日夜，第17旅渡过黄河。与此同时，各纵队亦强渡成功。蒋介石吹嘘能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倾刻之间即被刘邓大军突破。从此，人民解放军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我军突破黄河之后，蒋介石急调重兵，在王敬久的率领下由南而北，迫我背水作战。刘、邓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乘势发动了鲁西南战役，采取“攻

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歼灭郟城、定陶、曹县之敌，尔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王敬久集团。

7月4日下午，第6纵队接受了围歼定陶之敌的任务。

定陶城是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敌第153旅到达后，依托城垣和城外土堤构筑了多道工事和障碍。依据敌情和地形，杜义德采取夜暗长途奔袭，首先占领四关和土堤，包围定陶，尔后以强攻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经过一夜100余里的急行军，部队依靠机动而争取了主动。7月5日拂晓前，第16旅和第18旅突然包围了定陶城，袭占了四关。第17旅主力集结于城北方向，准备阻击菏泽方向援敌。7月7日和8日，我军击退菏泽敌1个营的反扑；8日，又击退定陶敌两个营的反扑。接连几日，第6纵队各旅每日天黑即抢修工事。战士们靠着手中的一柄小钢锹，在城外四郊的开阔地上挖出了纵横交错的通道和战壕。

7月10日下午，杜义德接到攻城命令。

刘伯承在电话里说：“拿下定陶的意义，一是解放定陶人民，二是为我军南下扫清障碍。如果攻不下来，我军过陇海路就会受阻。”

10日19时，杜义德下令向定陶守敌发起总攻。在强大炮兵火力轰击之后，第16旅第47团登城突击队第1营第2连在英雄刘玉芳的率领下，经过10分钟的激战攻破东门。第18旅第52团从北门迅速登城，突击队是第1连，登城突击排是王克勤所在的第1排。后续梯队分路突入城内，将敌人分割围歼。战至午夜，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敌一部向城南突围逃跑，被我第50团歼灭。是役，第6纵队全歼守敌第153旅及地方团队，创造了我1个纵队单独全歼敌广西部队1个旅的范例。

在定陶战斗中，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王克勤光荣牺牲。刘、邓首长发来唁电。为了纪念王克勤，授予他生前所在排为“王克勤排”，号召全军开展学王克勤运动。定陶县人民代表宣读了边区政府的唁电，中共定陶县委决定将定陶县城北门命名为“克勤门”，以永久纪念烈士。

定陶激战的烟尘未扫，杜义德又挥师济宁南部地区，参与“拦腰斩蛇”歼灭王敬久兵团的任务。

敌两个师共3个半旅被第1纵队和杜义德派出的第16、18旅围困在不到400户人家的六营集，兵力难以展开，粮、弹、饮水极端困难，部队十分混乱。刘、邓首长鉴于敌两个师猬集一处，我如采取四面围攻，敌必作困兽之斗，因此决定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布一个“口袋”阵，等待歼灭逃敌。杜义德看到第1纵队刚歼灭郟城敌人，需要短暂的休整时间，而自己的第6纵队攻克定陶伤亡不大，且有第17旅没有动用，便主动请求担负主要突击任务；并建议第1纵队在东面下网，以逸待劳，张好“口袋”，准备歼敌。刘伯承大为欣赏杜义德的这一做法，当即拍板：“就这样决定喽！”

14日黄昏，敌人突然以猛烈炮火向我轰击。肖永银旅长立即判明敌人有突围企图，即令第53团团长沙启荣带领部队迅速冲入村内。随即其他部队也突入村内给敌以猛击。顿时，逃敌乱成一片，溃不成军。在我第6纵队与第1纵队的夹击下，敌全部就歼于六营集以东预设的口袋内。仅第53团即俘敌3000余人，缴榴弹炮10余门。

六营集之敌被歼灭后，被围困在羊山集之敌第66师已成瓮中之鳖。第66师是蒋介石嫡系，陈诚的家底子。被困之后，蒋介石急调8个师又2个旅

的兵力驰援。但这支援军受到了陈锡联第3纵队和李德生第17旅的阻击。

为确保彻底歼灭羊山主峰之敌。第16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参谋长赖光勋按杜义德的指令，到第一线反复侦察敌情和地形，讨论研究作战方案，严密组织步炮协同。27日黄昏，第47团担任主攻任务，协同第3纵队第7旅第19团对羊山主峰之敌发起了总攻。第47团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善于啃硬骨头的优良作风，采取小兵群多路冲击的打法，经过45分钟激战，攻占羊山主峰，并乘胜向羊山集之敌发起进攻，协同友邻部队迅速将敌全部歼灭，胜利结束了鲁西南战役。

战后，第47团担任突击任务的第7连荣获特等功。刘伯承司令员在征战之余，写了一首题为《记羊山集战斗》的诗，诗云：“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鲁西南战役，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战。是役历时28天，刘邓大军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共5.6万余人。迫敌从山东、陕北和中原等地调动9个整编师共22个半旅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山东、陕北我军的作战，并为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通路。杜义德率第6纵队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突破黄河天险，一战定陶，二战六营集，三战羊山集，连战皆捷，歼敌2万余人，其中俘敌1万余人，经受了连续作战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为战略跃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第6纵队奉命转移城武以北汶上集地区休整待机。

下一步我军怎样行动，刘、邓首长决心如何，是立即进军大别山，还是乘胜在鲁西南再打几仗然后南下，这是杜义德在部队休整中经常考虑的问题。他想：在鲁西南再打几个歼灭仗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一是部队连续打胜仗，战斗情绪高，兵员充实，装备也有新的改善；二是鲁西南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三是部队对地形非常熟悉，且紧靠后方作战，能得到及时的支援。有了这些条件，打几个胜仗是完全有把握的。而且我军在鲁西南歼敌越多，南下背的包袱就越轻，对我们行动就越有利，还是以打几仗再走为好。

8月6日下午，邓小平来到纵队征求行动意见时，杜义德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汇报。邓小平仔细听了这位第6纵队当家人的陈述，说道：“你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但是打下羊山集以前，党中央、毛主席有个电报，基本精神是能迅速打下羊山更好，否则就不要纠缠，收拢部队，休整10天左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邓小平接过杜义德递过来的土卷纸烟，吸了一口，继续说道：“几天来，我和刘司令员也在考虑下一步行动问题，倒也没有最后决定呢！”根据邓小平的讲话，杜义德已预感到部队可能很快行动，工作的立足点必须放在提前南下上面，要迅速完成行动的 necessary 准备，以免陷于仓促被动。事实上，邓小平回去的当晚，第6纵队就接到了立即出动的命令。

鲁西南战役的胜利，给蒋介石震动很大，遂集中8个整编师共18个旅14万余人分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我分进合击。

刘、邓首长当机立断，提前南进，先机抢占大别山并在大别山区展开，是完全符合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距千里，要通过陇海路、黄泛区、涡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天然障碍，时值盛夏雨季，更增加了部队运动的不便。敌人控制制空权，而且可以利用铁路、公路运输。我则主要靠黑夜徒步行军，越向南走，困难越大，若为敌过早发现我之意图，调兵堵我进路，将会对我造成极大困难。为保持行动的隐

蔽和突然，加快前进速度，野司决定采取宽正面分兵三路南进。以第1纵队为西路，第3纵队为东路，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2、6纵队为中路。中路沿宁陵、淮阳、项城、息县之线南进。同时太岳区陈谢兵团过黄河出豫西，与华野西线兵团东西呼应，掩护我刘邓大军安全南进。

1947年8月7日晚，刘邓大军开始了向大别山的进军。从下达命令到出发只有24小时，野司上下高速运转。为加强保密，各部所有代号作了变更，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名就成了新的代号。野直（参谋长李达）叫李家庄，第1纵队（参谋长潘焱）叫潘店，第2纵队（参谋长王蕴瑞）叫王家园，第3纵队（参谋长曾绍山）叫曾家庄，第6纵队（参谋长姚继鸣）叫姚家屯。所以，第6纵队司令部的同志们戏称南进为“姚家屯搬家”。

当蒋介石如梦初醒，发觉我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军的意图，惊呼“局势严重”时，除令罗广文和张淦所部加紧尾追我军外，又急令整编第85师附第64旅以火车南运，堵截我军，寻我决战，妄图阻我挺进大别山，但为时已晚。第6纵队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保护着中原局机关和刘、邓首长，以两周时间突飞猛进，迅速通过了黄泛区，到达汝河。

23日中午，侦察员突然发现南岸油坊店、泥楼、汝南埠已有敌人，并以迫击炮向我军轰击。下午，敌约200余人向大雷岗进犯。杜义德派第18旅以第52团第1营抢过汝河，击退敌人，占领了大、小雷岗。随后第52团全部渡抵南岸。22时许，杜义德刚刚检查了第18旅和第16旅协同在汝河上架起的一道能通车马的浮桥后，又回来亲自审问俘虏。原来，占领油坊店、汝南埠一线的敌人是从平汉路赶来的蒋军嫡系第35师和第64旅。我军南进的道路已被截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还有一条不能徒涉的汝河，形势非常紧急。

就在这种情况下，杜义德火速赶到了汝河边第18旅指挥部。

“肖永银，你们18旅立即强行过河，占领汝河南岸阻我前进的敌占村庄，掩护中原局、野战军直属机关安全前进，不能犹豫。”杜义德话音刚落，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李达参谋长来到了。刘、邓首长向肖永银询问了前面的情况，立即要李达参谋长打开地图，简要地介绍了敌情。

李达指着地图说：“敌人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追来，紧跟我们的是敌人罗广文的3个整编师，距我只有25公里，明天就可以赶到。我们正面敌人是整编第85师附64旅，挡住了去路，妄图打乱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刘伯承接着说：“如果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计划，而且使我军处于极不利地位。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打开一条通道。要懂得，狭路相逢勇者胜嘛！要勇，要猛，明白吗？”

最后，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打过去。”接着，刘、邓首长下令：部队立即轻装，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清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分为三个梯队，并告诉每一个人集合地点是彭店。另告赖光勋带电台指挥第46团在后面掩护，万一情况紧急不能过河时，可以向水东军区转移。

刘、邓首长的指示是那样明确，决心是那样坚定果断。时间离天明只有四五个小时，不能多耽搁。杜义德当即向肖永银、尤太忠作了布置：“第18旅从正中杀出去，向两边撕开，顶住敌人，打开通道，掩护刘、邓首长的野

战军机关和纵队直属队前进。第 16 旅除以第 46 团担任后卫阻击敌追兵外，主力接替第 52 团防务坚决扼守大、小雷岗阵地，抗击敌人，保护浮桥，掩护全军渡河。第 46 团在后面 15 公里处以机动防御阻击追敌，掩护全军渡过汝河后撤退。如撤退不及，可留在水东军区打游击，以后再归建。旅长、政委要亲自带队冲，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应冲锋在前，起模范作用，杀开一条血路前进！”

肖、尤两人答了声“是”，便带着杜义德的指令冲进了前阵。

8 月 24 日 2 时，第 18 旅旅长肖永银率领第 52 团在左，参谋长邢荣杰率领第 53 团在右，部队端着刺刀攻击前进，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第 52 团迅速打垮了泥楼、大扬庄的敌人，控制了公路左侧，并向汝南埠派出了警戒部队。第 53 团在扫清沿河几个村庄的敌人之后，又歼灭了位于公路北侧杨柳楼守敌 1 个营，并打垮敌人的反扑，迅速占领了公路右翼之陈庄、彭庄，向油坊店派出了警戒部队。于是，我军杀开了一条长约 5 千米、宽约 3 千米的通路。第二梯队第 54 团，除应第 16 旅首长的要求，由李震政委带 1 个营支援坚守大、小雷岗的作战外，团主力立即从第 52 团和第 53 团之间插出去，保护刘、邓首长和中原局、野战军机关、纵队直属队前进；刘昌副政委则指挥旅直属队跟进。杜义德紧随第 52 团前卫营后面指挥。战士们看着旅、团长都在最前面指挥，特别是看到刘、邓首长同自己战斗在一起，勇气倍增，觉得没有打不垮的敌人，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凌晨 3 时，第 16 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亲自率领第 47 团跨过了汝河浮桥，以第 47 团和第 48 团分别接替大、小雷岗的坚守任务。交接中，第 48 团同企图复占小雷岗之敌进行激战，以猛烈冲击将敌赶出村外。大雷岗我军在肃清残敌后也立即加固工事，准备迎击天明以后敌人的进攻。为确保浮桥和第 18 旅杀开的血路，尤太忠、张国传不顾敌人密集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扫射，将指挥所分设在大雷岗村东、西两侧。拂晓以后，敌人以飞机和大炮向小雷岗、大雷岗和浮桥进行猛烈轰击，大、小雷岗一片火海，房屋多处倒塌，阵地烟尘弥漫。随后敌分三路向小雷岗猛扑，第 48 团沉着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 3 次冲击。杜义德命令第 48 团团长李耀光要在这里坚守一天，必须严格控制预备队的使用。战至 8 时许，敌再次发起攻击，突入我军小雷岗阵地，占去了一半村子，直接威胁着浮桥，情况十分紧急。尤太忠批准第 48 团团长李耀光以营的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并以河堤上的侧射火器全力支援，将敌人逐出村外，恢复了阵地。我军架设的浮桥在敌机的炮火猛烈扫射轰炸下，曾被打断。坚持在浮桥旁指挥的参谋长赖光勋立即命令工兵连干部带头跳下河去抢修抢接，保证中原局、野战军和纵队机关渡河。

敌攻不下小雷岗，夺占不了浮桥，遂改变进攻方向，企图占领大雷岗，拦腰截断我南进通路。10 时后，敌以 4 个连兵力向大雷岗发起攻击。坚守村外开阔地的第 47 团第 1 营尖刀连，依托工事把敌人放近打，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白刃搏斗，将敌阻止在阵地前沿。敌不甘心失败，又以两个营再次进攻。激战中，我军勇猛顽强，敌人失魂落魄。尽管敌冲锋号吹了几遍，敌人的士兵始终趴在地上不敢向前半步。旅长尤太忠抓住这有利时机令团长安仲昆先集中火力予以杀伤，随后令两个连和第 54 团 1 个营从敌翼侧勇猛反击。顿时，敌人被杀得东奔西窜，弃尸 200 余具。

与此同时，由岳城渡河的第 17 旅，掩护纵队野炮营和辎重部队安全渡过汝河。李德生旅长以其主力进到汝南埠东南，直接威胁汝南埠之敌侧后，有

力地配合了第 16 旅的作战。敌第 35 师惧怕我围歼，未敢再动。

激战中，刘、邓首长，中原局和野战军机关，纵队直属队和南下工作团的 2000 多名干部，全部安全渡过汝河向彭店前进。担任后卫任务的第 46 团在万金店顽强阻击敌人后，也渡过汝河。下午 4 时，第 16 旅拆掉了浮桥，以第 48 团在闫河店、第 47 团在彭店以北，逐步阻击追敌。

杜义德在纵队司令部紧张地掌握着各旅的战况。时值盛夏，他不停地喝着凉水，因为过度紧张汗水从头淌到脚，几近脱水的边缘。虽已身经百战，但此役令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汝河之战，是我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要的一次作战，也是一场最激烈的作战。它不仅关系到第 6 纵队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统帅机关的安危。第 6 纵队全体指战员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部队到彭店后，刘伯承高兴地对杜义德说：“这一仗打得好！我们这次能突出敌人的重围，主要是采取了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由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听了司令员的表扬，杜义德丝毫没能轻松下来，因为他知道更为艰险的情况恐怕还在后面呢。

为避免与敌在汝河和淮河之间纠缠，顺利完成千里跃进的最后行程，部队分路徒涉过了淮河。待我全军渡过淮河时，尾追的敌第 85 师被上涨的河水阻在北岸。我军先敌进入战略要地大别山，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胜利。在这次行动中，第 6 纵队在刘、邓首长直接指挥下，行程千里，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无畏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消灭一切阻挡之敌，突破重重险关，圆满地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1947 年 8 月 27 日，我军全部进入大别山。

党中央、毛泽东对刘邓大军到大别山曾经估计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要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两种前途。为了实现最好的前途。刘、邓首长约于 8 月 30 日发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今后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与巩固大别山根据地。”

根据上级的部署，趁追我之敌尚未赶到，大别山区较为空虚之际，杜义德布置第 6 纵队各部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先后占领了 15 座县城，筹建起民主政权，扩大了我军的影响。短短数月，杜义德已消瘦得像变了个人，脸上暴出了两个高高的颧骨。不过，每当想起刘司令员对大别山的比喻，他还是禁不住要笑出声音。刘司令员说，大别山是长江流域中游向南突出的一块地方，它就像小孩子戴的一块肚兜儿，摆在国民党核心统治区的中央：东达霍山、太湖，威胁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西出黄陂、孝感，直逼武汉；南临长江，北至淮河，是我夺取中原必须首先控制的要地。所以我们就是要扎在大别山，牢牢占住这块“小肚皮”。

9 月上旬，敌又派 7 个师分别从东、西平汉路沿线三面对我军构成一个大的包抄态势；另以对大别山情况十分熟悉，且各处设有其谍报网的桂系第 7 师、第 48 师进入大别山腹心地区寻我军主力作战，妄图趁我军立脚未稳之际把我军赶出大别山。

为粉碎敌之企图，刘、邓首长指挥部队连连出击，把敌机动兵力全部调到了大别山北麓，从而对第 6 纵队主力向鄂东地区实施初步的战略展开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十几万人的大兵团，采取跃进的形式深入到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带，在面临优势敌人进攻的条件下创建新的根据地，困难是不难想象的。在展开初期，由于部队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部队在思想上、士气上的变化，引起了身为政治委员的杜义德的高度关注。

9月的一个闷热的中午，杜义德叫来了住在隔壁的姚继鸣：“参谋长，还没休息噢？”

“政委，你不是也没有休息吗？”自从司令员王近山病休以来，姚继鸣眼见杜义德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而更加全力以赴地协助杜政委，分担了不少的工作。

“心里总是踏实不下来，你最近有没有感到部队里有些苗头？”

“从军事上看，部队明显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山地、水田地带行军作战的经验。”

“恐怕还不只如此。部队的士气往往会因具体的细小的问题而受影响，近来的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啊！”

“咱们到连队里去走一走。”

“好，就去肖永银、李震的18旅。”

杜义德、姚继鸣在第18旅直呆到深夜，同团营连排四级干部谈话，跟战士们谈心，终于掌握了第一手情况。部队转入大别山之后，在军事上，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山地、水田地带行军作战的经验；在生活上，北方战士普遍吃不惯大米，穿不惯草鞋，对南方气候、水土不适，语言不通；由于打仗没有后方，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两个多月连续行军作战未得休整。另外，也有些人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性认识不足，对于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建立与坚持缺乏信心，讲怪话，发牢骚。部队中右倾情绪逐步滋长，违犯纪律的事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个别单位不听招呼，执行命令不坚决的严重情况。回到司令部，杜义德和姚继鸣连夜把调查的情况逐项列出，第二天一大早便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

刘、邓首长十分重视杜义德带上来的情况。为了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克服右倾情绪，野司于9月24日在光山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刘、邓首长严肃地批评了部队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

杜义德难以忘记刘伯承司令员那尖锐而深刻的话语：“我们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现在当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消灭蒋介石反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手不要软啊！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称一称你这个共产党员是否足秤！”

第6纵队本来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杜义德向部队传达了会议精神，大家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许多部队提出了“一分艰苦一分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的口号，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此后不久，第6纵队根据野司的决定，将第48团、第51团、第53团、教导团、补充团等5个完整的建制单位，300余名干部和老解放区战士调归地方及军区建制。纵队副政委鲍先志，第16旅政委张国传，第17旅政委何桂成、副旅长张体学，纵队参谋处长王毓淮以及一大批优秀干部，都将调到地方工作。

纵队和各旅的几位干部临行之前，杜义德专门把大家请到自己的房里。面对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别山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我军进入大别山，他们内心深处是高兴的，拥护的。但是，由于我军曾三次从这一地区撤出，当地群众遭受了敌人的残酷镇压。加之我们在前段时间内执行土地改革政策过急过左，因而群众对我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尚心存疑虑，不敢靠拢我们。军民如鱼水啊！大别山的群众工作就是咱们能否坚持下去的活水源头。鲍副政委，你们这一行的担子不轻哟。”

鲍先志一行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在大别山建立了地方政权并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大别山各部队。

10月初，蒋军又调集7个师的兵力合击光山、新县地区，企图寻我军主力作战。为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刘、邓根据中央“分散大敌，歼灭小敌”的指示，令各纵队适时跳出敌之合围，乘机向鄂东各县发展。杜义德率第6纵队协同南来之第1、2纵队，乘势拔除沿途及长江北岸分散孤立之敌的据点，控制了长江北岸达300余里的广大地区，威慑大江南北。

此前，陈粟兵团进至大别山左后侧之豫皖苏地区；陈谢兵团解放洛阳，进至大别山右后侧之伏牛山区，从而与刘邓大军构成了犄角之势。蒋介石既怕这3支大军会合，中原不保，又怕我军在大别山扎下根来，尤其怕我军横渡长江，挥戈南进。因此，当我各路大军兵临长江之际，他急调青年军第203师从九江伸至蕲春、黄梅，又令整编第40师会同第52师第82旅，经浠水向广济，跟踪我军，并附我军之侧背。

敌人孤军来追，正是我军求之不得的良机。当他们从浠水向东南前进时，刘、邓首长即计划将其诱人地形险要便于设伏的高山铺地区加以围歼。决定各部队立即向心集结，在高山铺地区之东、北、南三面设伏，兜击敌人。以中原独立旅诱敌上钩；令第6纵队闪到敌之左侧埋伏，待其通过后，即尾随敌向东，一旦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时，便从后面捅他一刀。第2、3纵队为战役预备队。杜义德为了及时抓住敌人，急令第17旅参谋长宗书阁指挥第49团第2营和第54团1个营作为先遣队，紧紧盯住敌人，掌握敌之动向；同时迅速集结主力随后急进。10月26日，敌东进遭我第1纵队阻击，当晚猬集高山铺山沟内。黄昏时分，第6纵队先遣队赶到高山铺西山，乘敌不备，抢占了李家寨山和马骑山，迅速构筑了工事，从而扎死了口袋。

杜义德指挥第6纵队无声无息地在敌人后面摆成了一个马蹄形，渐渐与第1纵队兄弟部队形成合围之势。此刻的他已胸有成竹。他来到电报室，问机要参谋：“今天截获的敌报有什么动向吗？”

“报告政委，上午，‘武汉行辕’电示敌40师，高山铺最多只有共军1个旅，可大胆前进，为党国建功；下午，绕道先到蕲春的40师师长李振清敦促其部下速进，赶到蕲春吃晚饭。”

“哈哈……”杜义德听到这里大笑起来，“这顿饭恐怕是要老子烧给他们吃喽。”

半夜时分，敌第40师为夺路突围，派出一部兵力忙去控制来路上的马骑山、李家寨山，哪知几个钟头前他们曾走过的路这时已不属于他们了。27日拂晓前，敌发觉情况不妙，一面拼命向东猛攻突围，一面以连、营兵力向杜义德的马骑山和李家寨山攻击以保护侧后。马骑山受敌四五次的轮番进攻，敌曾一度突破至前沿。李家寨山的战斗也异常激烈。杜义德调集第6纵队主力及时增援，会同第1纵队把敌死死压制在山沟内。10时许战斗结束。是役，全歼敌第40师及第82旅共1.26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仅第6纵队俘敌就有4000多人。我军干净利索地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高山铺之战成为我军战史上的一个著名战例。该战的胜利是我军在完全没有后方依托，供应异常困难，军队连续转战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的阴谋，沉重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大大提高了部队在无后方依托和山地条件下作战的信心，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1947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以国防部长白崇禧组成“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执掌统辖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白崇禧从豫皖苏、山东及豫西调来6个师，加上原在大别山区的9个师，共15个整编师又3个旅的兵力，全面围攻我大别山解放区。同时加强保甲统治和反动地方武装，建立碉堡网并发展情报网，效法日寇使用过的“总力战”，妄图一举肃清大别山的我军。

粉碎敌军“围剿”的斗争，是我军能否在大别山存在和发展的一场严重斗争，也是我军夺取中原最关键的斗争。毛泽东指示刘、邓，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刘、邓首长决定采取集中与分遣、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法，以第1纵队和新到的第10、12纵队向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开创淮西、桐柏、江汉新解放区，以第2、3、6纵队坚持大别山解放区的内线斗争，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我以小分队牵制大敌，以大部队消灭小敌”的作战手段，实施广泛的机动，拖住敌人，并且密切配合军区地方武装，寻歼孤立分散之敌和土顽武装，掩护并深入开展地方工作。

刘伯承司令员率中原局及野战军机关随第1纵队到淮西区指挥，由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组成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留大别山指挥内线作战。杜义德调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先以第52团参谋长沈伯璞带领1个营，后由第50团副政委张镰斧带1个营，掩护野战军前指行动。

“我们6纵处于内线作战，穿插于数倍于己的敌人之间，困难虽然很大，但我军已熟悉了大别山区的敌情、地形，习惯了山区的生活，学会了山地攻防作战，又有人民政权、地方武装的配合，有强大的外线兵团的协同作战，我们完全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把敌人主力拖住在自己周围愈多，愈有利于1纵、10纵和12纵的顺利展开和华野、陈谢兵团大量歼敌。”杜义德向部下作了紧急动员。他知道，下一步是自己贯彻刘、邓作战风格，打运动穿插的时候了。

12月初，敌人“围剿”开始，迅速占领了浠水、英山、罗田、金寨和商城，并向中心区压缩。第16旅奉刘、邓首长之命，由纵队副政委鲍先志带领，已于10月下旬先期到达英山、罗田、麻城，剿灭土顽，掩护新建立的中共鄂豫区党委和鄂豫军区，建设后方。此时，杜义德和韦杰率领第6纵队主力适时跳出敌之合围圈，转移到黄安、黄陂地区。12月3日晚，有情报表明敌第85师西移，宋埠空虚。杜义德直接赶到第18旅旅部，面命肖永银：“情报可靠，黄麻防线上的宋埠城中空虚，你马上带领52、54两团，还有17旅的49团，打他个措手不及！”

肖永银随即率部出征，连夜以突然的动作一举攻克了鄂东重镇宋埠，全部歼灭了麻城地方团队2000余人。这是在粉碎敌人围攻中打的又一出色的胜仗，受到野司的通报表扬。这一仗，不仅给黄安、麻城地区反动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直接援助了这一地区的地方工作，而且严重地威胁敌人后方补给线，迫使进入中心区的一部敌人回援，有力地支援了各兄弟部队的斗争。

为拖散敌人，破坏敌人随时实施的合围阴谋，12月中旬以后，杜义德电

报前指，纵队决定采取以旅为单位活动，由他亲自带第 17 旅掩护纵队直属队，韦杰带第 18 旅穿插于敌整编第 7、28、48、20、11、85 师之间，以机敏的行动与敌辗转周旋，使敌人对我“吃不下，围不着”，处处扑空，疲于奔命。第 6 纵队寻找战机，适时分遣与集中，消灭分散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武装，支持与掩护地方工作。

杜义德指挥第 17 旅掩护野司首长和纵队机关，转战于黄安、麻城、黄陂。白天作战，晚上转移，越高山，涉冰河，斗争异常艰苦。杜义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同敌人重兵周旋中，我经常找第 17 旅旅长李德生同志和纵队参谋处长贺光华同志研究纵队机关和第 17 旅的行动，他们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对我的指挥帮助很大。纵队几次遭敌合击或埋伏，均因处置适当，第 17 旅部队作战勇敢，因而免受损失。1948 年 1 月 8 日，为摆脱合击麻城、木子店地区的敌第 7 师和第 28 师，我军一夜行军 140 余里，以大踏步的进退，大胆识的机动，突然出现于宋埠以西地区。第 50 团 1 营及旅工兵连包围歼灭了驻守长轩岭之敌黄陂县两个保警中队及黄陂县特工队、区公所等 200 余人；第 49 团 1 营攻克了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就未曾打开过的反动地主的顽固堡垒——鲍家，全歼守敌，为黄陂人民除了一大害。”近 3 个月的反“围剿”斗争，第 6 纵队各旅都是日日夜夜在极度紧张的行军作战中度过的。有时在内线与敌周旋，有时跳到外线，拣“好吃的敌人吃上一口”；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使敌捉摸不定；时而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时而分遣部队发动群众，消灭土顽，帮助建立我地方政权。

杜义德至今还记得那年春节前不久，他面见邓小平汇报战况的情形。邓小平听后情绪很高，说：“快到春节了，村子里边已经有了过年的味道。那天我就看到了一户门前的对联，很有意思，上联是‘大别山纵横南北’，下联是‘蒋介石不识东西’，横批是‘红军必胜’。”

“哈哈……好，这一联写得好！”杜义德也被节日的气氛感染“‘识’与‘是’，两字谐音，很巧哇！把蒋介石弄昏了头脑，不识东西的功劳要记在你们 6 纵的名下。”

邓小平给第 6 纵队以如此高的评价，令身为第 6 纵队当家人的杜义德一时间不知何言以对。

邓小平在晚年仍然回忆说：“我一个，李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 6 纵担负的任务最多，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就这样搞了两个月。”

1948 年 3 月，蒋介石在“大别山剿共检讨会议”的训词中，严厉责怪部属在大别山“完全陷入盲目作战”，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下面，但终于承认他在大别山是“作战失败”了。这个消息对杜义德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褒奖。

正当蒋介石为其在大别山的失败气恼难平时，杜义德又奉命带领英雄的第 6 纵队同第 3 纵队一起过淮河北上，迎接夺取整个中原的伟大任务。

西南大迂回

刘邓大军回杀中原，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东出淮海，又会同三野并肩打过了长江，解放了国民党 22 年来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中国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那么下一个解放的目标自然是陪都重庆了。杜义德兴奋地回想起刘伯承在 1948 年 4 月 28 日于中原某地举行庆祝延安光复大会上，曾经作过的打下蒋介石“三都”的预言，不禁心潮难平。进军西南，解放川黔康滇，迎接全国胜利，那将是一幅赤旗插满神州的美好画卷啊！

1949 年 5 月京沪杭战役后，7 月 18 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发出了关于进军西南的作战指示。8 月 19 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又发出了向川黔进军的命令。为贯彻前委的指示和刘、邓首长的命令，身为二野第 3 兵团副司令员兼第 10 军军长的杜义德于 6 月底奉命自浙赣线之金华、兰溪等地率队北移，至 7 月上旬先后抵达芜湖（兵团部）、安庆（第 10 军）、宣城（第 11 军）、当涂（第 12 军）等地整训待命。

7 月，第 3 兵团在南京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了进军的部署和作战方案。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二野司令员刘伯承起身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我们向西南进军，要贯彻军委毛主席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断敌退路，然后回打”的作战方针。这不是一般的迂回，是战略迂回，是层层迂回包围。陈赓指挥的第 4 兵团占领广州后直出云南，封锁国境线；杨勇指挥的第 5 兵团直捣贵州，占领贵阳后主力向北兜击；你们第 3 兵团从湘西向重庆、遵义迂回进击。这样，就可以把退集在西南的敌人全部歼灭。这叫“关起门打狗”。刘伯承的右手在半空中一挥，生动地做了一个关门的动作，然后要求第 3 兵团的干部要精心筹划，不怕吃苦，不怕疲劳，打好最后这一大战役。

作为兵团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的杜义德一边飞快地记下了刘司令员的每一句话，一边兴奋地想：向大西南进军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是我们在大陆上最后的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就第 3 兵团来说，除渡江作战有过千余里的追击之外，这将是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距离最远的一次连续追击战。一定要打好这一战役。

最后，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作了总结。兵团副司令员兼第 12 军军长王近山在大会上表态之后，杜义德也站起身说道：“我们 3 兵团素有坚韧不拔、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在此次同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最后决战中，坚决完成野司首长所赋予的任务，请野司首长放心！”会议确定第 10 军为第 3 兵团先头部队，到达湘西集结后，准时西进突破敌黔东防线，直取遵义、娄山关要地，然后向四川迂回进击。曾绍山率第 11 军，王近山率第 12 军，由西阳、秀山向重庆进击。

8 月 7 日，杜义德回到第 10 军，在安庆市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他和王维纲政委在会上作了进军动员报告，号召全军指战员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进军任务，为解放大西南 7000 万人民立新功。

1949 年 8 月下旬，依照野司部署，第 10 军军直和第 28 师、第 29 师、第 30 师等分别由安庆、桐城、青阳出发，到合肥乘火车经蚌埠、徐州到郑州，制造部队北上的假象，而后隐蔽地返回汉口，再步行经长沙到达湘西的桃源地区集结。为了顺利地到达集结地，杜义德和王维纲以及第 28 师师长陈中民、第 29 师师长周发田、第 30 师师长马忠全率部分随员先行，检查落实部队沿途乘车、住宿和粮秣保障等问题。赵晓舟副参谋长、许梦侠主任指挥军

直和本队车运跟进。

向西南进军中，为了保密，刘邓部队是以四野部队的面目出现的，一到汉口就受到中南局和四野部队的热烈欢迎。9月下旬，部队到达长沙后，四野副司令员兼第12兵团司令肖劲光又设宴招待。酒宴之上，杜义德指着席上的古井贡酒说：“这杯酒我们要等到西南解放之后再喝！”肖劲光毫不含糊地答道：“好，杜副司令，此酒先寄存在这里，等全国解放了，咱们再来庆功。”

10月初，杜义德率第10军经益阳、常德等地，先后到达湘西桃源地区集结休整。11月7日，第10军奉命由桃源地区出发。这支被刘、邓视为善于独立作战的劲旅开始向遵义、桐梓一线进击。与此同时，第5兵团由邵阳地区出发向贵阳进击。第10军向西急进，迅速突破国民党第19兵团何绍周布防的黔东防线，突入贵州地区，先后占领和解放了凤凰、江口、石矸、思南、印江、松桃、湄潭等地，抢渡乌江天险，于21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第5兵团占领贵阳。于是，杜义德率第10军与友军一起割断了从川陕甘边南撤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与广西白崇禧集团的联系，斩断了国民党赖以苟延残喘的所谓大西南防线，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等川陕甘数十万残余国民党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胜利地打开了二野大迂回、大包围的通道，为最后围歼国民党军于川西平原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为了把川陕甘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消灭在川西，第10军解放遵义后随即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踏上解放四川的艰苦征程。

人民解放军在川陕甘边、湘鄂川黔边同时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势，使国民党军在宽大绵长的战场上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特别是我军突破川东、黔东国民党防线，大量歼灭宋希濂集团和何绍周兵团，解放川黔大片地区后，国民党整个西南防线面临土崩瓦解。唯有川西、川南是敌逃逸的道路。为此，蒋介石急令位于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集团南撤。位于万县地区的孙元良兵团、重庆地区的罗广文兵团及宋希濂残部，在迟滞我军前进以后，亦纷纷西窜。刘、邓首长洞察入微，在西南战役发起不久，就发现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及川西南孔道逃往黔滇的目的，并为此而制定了周密的部署。杜义德清晰地记得，在第10军挺进贵州的途中，刘、邓首长曾指示第5兵团和第10军，在川黔敌人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隔断宋希濂4个军和罗广文3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予以歼灭，这是战役的中心；并指示第10军，在占领遵义以后，“取捷径出泸县，加上5兵团毕节、筠连两路，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在第10军攻占遵义的当天，即11月21日，刘、邓首长指出：“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性最大。因此，我第16、18、10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计算时间，第16军28日可达毕节，12月2日左右可达叙永或盐津；第18军比第16军迟三天；第10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綦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于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日可达叙永，12月6日可达盐津。因此，除第5兵团及第10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第3兵团以从正面多拖敌几天为有利。”兵团亦指示第10军，一定要按刘、邓首长规定的时限占领川南泸州地区，完成迂回作战任务。

刘、邓电示以第 10 军左翼与贵阳第 5 兵团主力并进于遵义、桐梓一线，西出合江、泸县。为此，杜义德会同政委王维纲对部队进行了紧急部署。决定以第 28 师为军的左路纵队，经枫香坝，过赤水，在太安场附近渡长江，然后向泸县挺进；第 30 师为军的右路纵队，由桐梓开进，取道川黔边的合江县，从合江北渡长江，向川南军事战略要地泸州攻击前进。军直和第 29 师随左路纵队跟进。

“兵贵神速，按预定时间到达就能抓住敌人，堵住敌人，就是战役迂回的最大胜利。”杜义德很有把握地说。王维纲也显示出必胜的信心。自从他俩在一起工作以来，始终配合得是那样的默契。“对！部队在遵义、桐梓修整三两天以后即刻出发。”王维纲说。

黔北到川南，数百里内层峦叠嶂，山峰逶迤连绵，道路崎岖曲折，行军十分困难。为了争取时间，25 日，左路纵队即由遵义出发，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翻山越岭，奋勇前进。当日即在枫香坝打了一仗，俘敌保安团 300 余人。12 月 1 日解放赤水，守敌第 72 军第 1 团自赤水河西撤。第 28 师渡过赤水河，沿江攻击前进。正当此时，机要参谋送来电报。杜义德获悉，右翼友邻第 12 军已于 11 月 30 日攻占川东军事重镇、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杜义德急走到地图前，比量了一下到泸县的距离，自言自语道：“估计敌部署已乱，其西逃计划可能会提前。”想到这里，他马上叫来副参谋长范朝利，吩咐道：“命令各师迅速急进！”

这是一个果断的决定。当时天公不作美，细雨霏霏，崎岖险峻的山道很滑，难攀难行。但部队士气一直很高，干部们说：“我们快走一步，四川人民就能早一天解放，少受一天苦！”工兵为炮兵开道，常常要炸平崎岖路径上的石头。部队过悬崖时，常常遇到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渊。上山时，大家的手一个一个地拉起来；下山时就蹲着往下溜，不少战士滚成泥人。在多山多雨的川黔地区，无论夜里、雨里，无论翻山越岭、跨河、渡江，部队每天行程从未少过 80 里。第 28 师各部队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兼程前进，很快抵近长江南岸。12 月 3 日，第 84 团以半个小时的战斗，占领江岸要点太安场，并立即组织渡江。滚滚奔腾的长江，波涛澎湃。部队指战员此时的心情如波涛起伏的江水，难以平静。一个月来长途行军及作战的疲劳，仿佛顿时消失。部队渡江后，分两路向泸县方向前进。16 时许，占领泸县县府所在地小市，将国民党守军第 21 军留守处歼灭。国民党第 72 军见我第 10 军攻势甚猛，立即向西撤退，泸县遂宣告解放。第 10 军右路纵队第 30 师在马忠全率领下，于 27 日由贵州遵义北之桐梓出发，经 6 天艰苦的行军与追击，于 12 月 2 日抵合江，将敌截击于合江、泸县交界的五通场以北地区，歼敌 1 个团。该部随即渡过长江，进入泸县县境。至此，追击北逃守军和向川南实施兜击的作战迂回任务胜利完成。与此同时，左邻第 5 兵团进占川南叙永、古宋、纳溪、江安等地，从而封闭了四川境内之敌从川南逃逸云南的道路。

重庆及川南广大地区解放后，蒋介石一面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之敌利用有利地形迟滞我军，同时向成都方向撤离；一面急令胡宗南集团加速南撤，企图收缩防线，在成都地区进行顽抗，而后向西康、云南突围逃窜。

刘、邓首长于 12 月 6 日作出“继续西进，完成切断敌之退路的部署”，指示杜义德会同王辉球政委率领的第 16 军，两军齐进，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云南的公路线。

杜义德指挥各师出泸县继续向西追击。部队这时表现出的高昂斗志和顽

强精神，已远远超出杜义德本人的预料。从湘西集结地出发，到迂回至川南，已经长途攻击行军一个多月，不少战士的脚都已泡上加泡，血泡遍布，行军十分困难。但为了截住敌人，完成任务，打好在大陆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最后一仗，他们仍一如继往，咬着牙向西北猛追猛插。

第 28 师第 84 团追至敦和砦，俘守敌警备团残部 140 人，并于 12 月 4 日攻占富顺。第 10 军左路纵队先头部队攻占富顺后，第 82 团发现敌人西逃，即以日行 240 华里的惊人速度奔袭自贡，尾敌穷追。抵自贡市东时，亦未因强行军而倦怠不前，而是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冲杀进城。这时，自贡守敌已向西逃窜，其政府、团警早已丧失抵抗能力，市长率领自卫队、警察向我军投诚。自贡解放，街上人山人海，掌声、欢呼声、歌唱声响成一片。为了追歼敌人，部队在自贡未作停留，乘胜继续西进，在程家场、双石桥等地歼敌 500 余人。6 日解放荣县，奉命暂停集结。由于杜义德部追得紧，跟得快，有的敌人当了第 10 军的俘虏还如梦未醒，不敢相信眼前就是解放军。

第 10 军右路纵队第 30 师在合（江）忠（县）边五通场歼敌第 44 军 1 个团后，分两路向隆昌方向追击。12 月 5 日 22 时许，第 88 团进至福集场时，得知逃敌在太和场一带宿营，便忍受着急行军的饥渴，轻装追击前进。第 88 团在夜袭中，歼敌第 44 军第 105 师师部及 1 个团 800 余人。敌残部 1500 余人在副师长率领下向第 30 师投诚。当晚，第 89 团在兴隆场歼敌第 44 军军部。接着，第 10 军右路纵队解放隆昌，沿成渝公路向西北继续追击。6 日，解放内江，攻占成渝线上的枢纽之地。第 30 师先头部队第 88 团乘胜前进，7 日渡过沱江，解放资中。至此，第 10 军控制了长江以北南起泸县，北至资中，西迄自贡、荣县的广大地区，为战役迂回任务的完成跨出了新的一步。

第 10 军占领泸县、自贡、荣县一线后，与友军一起遏止了敌人的南逃，对达成歼敌于成都平原具有重要意义。但杜义德明白，这还没有最后完成迂回任务。因为，大邑、邛崃、夹江、乐山一线仍可能成为敌人逃出围歼流窜滇康的通路。为此，决定遂行下一步迂回追击计划，攻占井研，西渡岷江，夺取邛崃、新津、丹棱等一线要点，而后与友邻部队配合，彻底切断敌人西逃的退路，最后完成对川陕甘南逃之敌的封锁包围。

第 10 军在荣县进行了短期整顿以后，杜义德即向部队提出“抢渡岷江，把胡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截断最后一条逃路”的命令。部队分两路向井研和岷江齐头并进。大厦将倾，一木难扶，胡宗南部一支美式装备团妄图阻止杜义德所率第 10 军的急进，谈何容易！第 10 军第 28 师经 14、15 两日激战，全歼该敌，扫清了渡江障碍。15 日下午至 16 日，第 29 师在慈本溪强渡岷江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阻击。与此同时，第 10 军右梯队第 30 师和第 29 师第 86 团，于 12 月 12 日从内江地区出发，亦向岷江挺进。

岷江，系四川四大江之一，江阔水深，水流湍急。胡宗南空运其主力第 1 军在岷江两岸及虎溪渡以东地区，占领深达 10 余里的险要纵深阵地，企图固守，阻我军渡江，以掩护其主力向西康退却。第 30 师于 12 月 14 日 10 时许进至虎溪渡东 10 里处，得知敌 1 个师已于一天前到达虎溪渡，且已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于我军进攻不利。为了扫清渡江的障碍，杜义德指示第 30 师趁敌立足未稳，集中力量，寻敌防御薄弱部位进行突破，然后将守敌压缩于岷江东岸，围而歼之。15 日夜，第 89 团在瓦子坳、虎溪渡接连两次战斗，歼敌第 92 团一部。敌残部逃向西岸，在岷江西岸重新组织防御，并控制渡口船只。情况万分危急，部队如若不能按时渡江，势必延误整个右梯队

的进击时间，给敌人留下一分沿川康、川滇公路逃掉的希望，使整个战役迂回任务受到影响。这时，第 89 团部队乘单人橡皮船冲向敌岸，在敌人的火网下夺回渡船，而后渡江，直插敌师部，捣其指挥中枢。敌随即全部西溃，向丹陵逃窜。第 10 军第 30 师遂在虎溪渡、青神两地强渡岷江。至此，敌妄图依岷江天险阻我进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第 10 军各部队渡过岷江以后，杜义德决心乘胜发展。第 30 师于 17 日在白马铺、东瓜场歼敌 1 个师。第 28 师分路经新路口、吴街子、桂花场地区，向丹陵急进，17 日解放丹陵，19 日解放蒲江。第 29 师于 17 日解放眉山，继于 18、19 日推进至青龙场、高桥、邛崃、固驿镇一线。第 30 师在白马铺、东瓜场歼敌一部。至此，第 10 军控制了青神、眉山、丹陵地区各要点。与此同时，第 5 兵团之第 16 军于 16 日攻占乐山、夹江，17 日攻占峨眉、洪雅，19 日占名山，渡过大渡河，完全切断了敌逃往康滇的通路。

第 10 军胜利完成迂回任务后，调整部署，移师新津，在新津以南地区集结，参加围歼胡宗南集团及其他猬集于成都平原的国民党军。此时，刘、邓率领的二野、贺龙率领的华北第 18 兵团及四野第 47 军、一野第 7 军等各路大军，从四面围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的大包围即告完成。蒋介石在其军队被围于成都平原、频于覆灭的困境下，将指挥权交给胡宗南，而后从成都乘飞机到台湾。胡宗南为集中全力向南突围和防我军对其割裂歼灭，急速收缩，构筑顽抗工事，进行垂死挣扎。

成都及其以南和西南之新津、双流地区，地形平坦，战场开阔，道路纵横，交通方便，便于我大兵团作战，也便于围歼敌人。国当时进军迅速，巩固地方的任务较重，陈锡联司令员、谢富治政委及王近山副司令员均留在重庆及川东。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协力围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21 日，刘、邓首长决定由第 5 兵团司令员杨勇和杜义德统一指挥第 3、5 两兵团共 5 个军；并指示杨勇率兵团指挥机构赴第 10 军杜义德处会合，召集各军领导开会，提出作战方案。刘、邓首长指出，我军占领乐山、青神、眉山、邛崃、大邑一线后，胡宗南集团等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被切断。对当面之敌绝非两个冲锋所能歼灭，要严防轻敌乱碰，必须十分慎重。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无准备无把握地战斗。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杜义德同杨勇在仔细分析敌情以后，于 12 月 25 日对围歼胡宗南第 5 兵团作出如下部署：第 16 军第 46 师、第 47 师进击蒲江东北之敌，第 48 师由大光场出邛崃，配合第 12 军侧击敌人；第 18 军第 52 师由眉山西北出寿安场，第 53 师由眉山以东向简阳西南三岔前进，配合第 11 军堵击可能向简阳逃跑之敌；第 12 军扼守巩固邛崃固驿镇之阵地；第 11 军移集简阳及以西地区，堵击可能由成都向简阳逃跑之敌，力求在运动中歼敌全歼。

胡宗南甩下的第 5 兵团李文部在穷途末路时，仍妄想挣扎脱逃，于 24 日晚趁我军调整部署之际，分左、右两路沿津河南岸和新（津）邛（崃）公路向西突围。杜义德当即决定予敌以歼击。敌人出新津以后，像一群没有头羊的羊群，在川康公路中乱挤乱撞。第 30 师继 22 日、23 日在新津西南狮子山给敌李文兵团以打击后，24 日又以两个营的兵力突入铁溪桥，两支部队犹如锐利的两把尖刀楔进敌两个军中间，插进敌人心脏。在敌我数量极度悬殊的情况下，机枪连进行迅猛扫射，打得敌人马翻人仰，仓皇溃散。至今，杜义德还清楚地记得第 83 团第 3 营机枪连长名叫马天邦。他一人掌握两挺重机

枪，打了4000余发子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不知所措。李文兵团开始突围后，杨勇和杜义德命令各军于25日向敌发起全面攻击。根据两个兵团5个军总的部署，杜义德又将第10军3个师分为互为掩护的三路。右路为第29师，首先夺取新津东飞机场，后出朝场、唐场、大邑；第28师为左路，夺取新津后，出新津、羊场，向邛崃方向追击；第30师居中，由狮子山向西平行追击，经羊场、邛崃、固驿镇插入敌兵团部。

25日10时许，待部队发起总攻后，第29师按预定方向西出朝场、唐场、大邑。敌人沿路到处丢下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及其他军用物资。这些东西，一时成了我军追击的向导和路标。昔日所谓的国民党王牌李文兵团，此时被分割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的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来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第30师第88团由永兴场经羊场、固驿镇与敌齐头并进，一部插入敌兵团部，将敌人指挥系统打乱。第89团由牟场向西来场方向插入敌背后新庵子地区，猛追猛打，俘敌5000余人。第87团在“坚决把残匪消灭在成都平原上”的口号鼓舞下，连夜追击，26日晨在冉义镇附近活捉敌第90军参谋长，俘敌数百；27日与友军将敌第90军之第53师、第338师包围在大邑、邛崃间，活捉第90军军长、第53师师长，全歼第90军军部、第53师师部及其部队。

当时，杜义德在军指挥所里，既为第30师的战绩高兴，又为得不到左路第28师的战况而焦急。突然接到第28师在大堰坝以西地区全歼敌第1军数千人的消息。杜义德真是喜出望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后来才知道，25日11时许，第82团经永兴场出牟场，向羊场方向追击，第83团到新津后得知敌主力向西及西南突围，遂按军指示与第82团一起向羊场方向追击。当日23时许，第83团在羊场附近与第82团会合。可是到了羊场后，发现敌已逃逸，并判敌已突于川滇路西。为了抓住敌人，第28师决定第84团由羊场出西来场，第82团、第83团以最快的速度绕至邛崃以西，截住敌人。26日7时许，第82团、第83团赶到邛崃西面之大塘地区，由西向东打。就在第82团、第83团向邛崃方向出发后约一个小时，杜义德电告第28师，敌主力在大邑以南地区，第82团、第83团应速出大邑向大邑西南地区追击。第28师急令第82团等在邛崃以东寻歼敌人。26日晨，敌向第23师友邻部队第12军第10S团反扑。第83团一部协同友军反击的同时，第82团、师直等即截击由邛崃宝林寺向北溃退之敌。26日20时许，第82团出西来场，第83团在童桥，配合友军歼敌第90军残部。27日晨，第28师到大堰南以西地区与敌第5兵团接触，敌第57军一部投降。与此同时，我军迫敌第1军4个团缴械。至此，第10军参加解放西南、解放四川的作战结束。整个川西平原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除起义者外，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四川首府——成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当时，部队多么想进去看看这座解放了的天府名城。但刘、邓首长命令：“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城！”真是令行禁止，二野部队一兵一卒没进成都城。同时，为了保证在贺龙同志率领的第18兵团到来之前，保持城里的秩序，防止敌人破坏，杜义德曾给市内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打电话，要他们维护城里的一切。事后证明，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0军军长的杜义德早已为国民党众将所敬畏，成都未遭丝毫破坏，一切保存完好。

战役结束后，杜义德令部队严格执行战场纪律，将战斗中缴获的大量黄金等贵重物品用20匹骡马运到重庆。之后，第10军又在江安意外地活捉了

化装潜逃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

此役，从华东安庆出发开始算起，至12月27日结束，历时4个月。第10军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杜义德的率领下，迂回作战7000余里，经过了湘西、黔北，跨越川南、川西，翻过武陵山脉、娄山山脉等大小山百余座，横渡乌江、赤水、长江、沱江、岷江等江河数十条。在刘、邓首长的正确指挥和友邻部队的密切配合下，继解放贵州凤凰、松桃、铜仁、江口、德江、印江、思南、绥阳、石砭、湄潭、遵义、桐梓、仁怀、赤水后，又解放了四川合江、泸县、隆昌、富顺、自贡、内江、资中、威远、荣县、纳溪、丹棱、井研、蒲江、新津、眉山等29座县城，毙伤俘敌第90军军长周士瀛以下官兵5.4万余人，并争取了数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第10军与友军共同完成了迂回任务，实现了把敌人消灭在川西的伟大战役任务。

杜义德站在硝烟尚未退尽的战场，远远地向成都眺望，心潮澎湃，万分激动。能取得今天的胜利，真来之不易啊！从华东到湘西，从湘西到成都城外，我军转战7000余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仅第10军就牺牲了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郭广智以下近300人。没有这种牺牲，没有部队顽强的战斗作风，没有部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官兵坚强的团结，没有四川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从湘西到成都，不仅道路崎岖，江河横溢，自然条件很差，而且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部队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地区和川南崇山峻岭中，经常遇到阴雨绵绵的恶劣天气，雨里行军，泥里宿营，但仍然精神饱满地昼夜兼程，边战斗，边前进，迅速占领了黔北、川南，截断了敌人向云南逃窜的道路……

革命胜利了，四川解放了，杜义德又带领部队投入了建设四川的新的战斗任务。

威震西南边陲的张国华

徐永亮

张国华（1914～197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又名张富桂。1914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北乡当边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4军班长、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巡视团主任，第2师第6团党总支书记，军团政治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河东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陕西游击支队科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战士剧社社长和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鲁西军区第7支队政治委员、教导第4旅政治委员兼湖西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西区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9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7纵队副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司令员。1949年全军统一整编后，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率第18军进军西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任书记。同年10月，胜利地指挥了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1952年2月，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1962年11月，出色地指挥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5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1967年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2年2月21日病故。

张国华是个普通的人，但他却是个非常值得人们尊敬的人。从井冈山到冀鲁豫边区，从豫皖苏到西藏，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说他是位英勇善战、文武双全的将军，是位了不起的人。他忠于人民，忠于党，是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每个革命者在其革命生涯中都会有闪光的一页，然而张国华的生命之光却分外明亮，分外辉煌。本文主要记叙他进军西藏及戍边卫国的一些光辉业绩。

刘、邓点将，受命进藏

1949年10月1日，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庄严升起的时候，当东方的巨人毛泽东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刘邓大军正在向大西南云贵川康挺进。第18军参加完衡宝战役，又立即入川参加成都战役。至此，除西藏和海南岛外，大陆已全部解放，全国人民莫不热情欢呼，同庆胜利。

西藏，这块中国神秘的国土，自元朝始即归入中国版图。它内连川康，外邻5国，是祖国的西南屏障。毛泽东明确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他还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当时西藏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49年夏，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英国人）直接向摄政王达扎秘密晋言说：“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时期，我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达扎听后，立即召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高级官员说：“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各位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以“防共”为名下令赶走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的办事机构及所有人员；同时宣布，在拉萨经商的

汉人和汉籍喇嘛等也一律离藏。为此，西藏地方政府还在拉萨举行了以咒骂汉人、反对共产党入藏为目的的“扣锅”和“驱鬼”的宗教仪式。这就是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为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而搞的所谓“驱汉事件”。

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并吞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妄图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刘、邓、贺首长接到电报后，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进军西藏的任务。他们暂时推开其他工作，全神贯注地投入了选将的思考……

入夜，重庆山城，嘉陵江畔，已是万家灯火。刘伯承司令员站在窗前，他无心观赏这美好的夜景，渐渐地陷入了沉思。他想：从现在的兵力部署看，第62军已占领西康省会雅安。西康和西藏接壤，由第62军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既可以减少人力、物力的运输，也可以争取入藏的时间。这无疑是最优方案。但他又一想，贺老总现在不在重庆，第62军是随贺老总到西南的，过去吃了不少苦。解放西藏的任务是非常艰苦的，此项任务理应由二野的部队承担。他想，不派第62军，派谁最合适呢？要派就得派强将去才行。刘司令员反复地思考着，墙上的时钟指向了12点。突然，他停步自言自语道：“对，让他去！哼，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说完，他急忙推门，向着邓小平的住处走去。

邓小平在灯下正在批阅陈赓发来自云南的剿匪电报，刘伯承突然破门而入。邓小平见是刘司令员，就急忙放下手中的电报说：“这么晚了，司令员还没睡？快请坐。”说完他起身将桌上的香烟递了过去。

刘伯承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吸了口烟说：“睡不着啊……”

邓小平开玩笑地说：“天塌下来有峨眉山撑着嘛。啥子难事把司令员搅得睡不着了？”

“关于进军西藏的人选问题。”

“你的意见呢？”

“我原想让杜义德去，可他身体又不行。我想还是先听听你的意见。”

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让‘地主’去怎么样？”

刘伯承兴奋地说：“张国华！不谋而合，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嘛。好，就让‘人才地主’去好了。”

邓小平又说：“让谁去，我也想了很久。”

最后，刘伯承说：“好！就这样定了。马上让办公室通知张国华，速来重庆受领任务。”

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第18军的指战员们刚刚从成都战役的战

场上走出，又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川西平原上。人人精神抖擞，歌声此起彼伏。他们正朝着未来的防地——川南开去。

公路上，张国华的吉普车正停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四周山峦叠翠，白云悠悠。参谋人员将地图摊在吉普车的车盖上。张国华指着地图问道：“部队还有几天才能到达防地？”

参谋报告说：“最近的只需两天，远的还需要4至5天即可全部到达防地。”

张国华说：“最远的还有几百公里嘛，怎么跑这么快？”

参谋笑着说：“到川南安家了，跑得还能不快？”

张国华微笑着点点头。他看了看表说：“上车，今天我们力争赶到泸州！”

此时，另一辆吉普车飞速而至，在张国华的车后嘎然而止。从车上跳下一机要人员报告说：“报告首长，重庆特急电报。”

张国华接过电报看后，转身告诉身边的参谋人员说：“命令部队停止待命！”

参谋奇怪地问：“停止待命？”

张国华说：“对！停止待命，立即下达。开车！”

司机问：“去泸州？”

张国华说：“不，去重庆。”

在重庆曾家岩，刘伯承、邓小平接见了张国华。刘伯承司令员首先向他传达了毛泽东主席要二野执行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后，随即将毛泽东的电报交给了张国华。张国华看完电报，刘伯承接着说：“我和邓政委商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怎么样？”

张国华答道：“坚决服从命令，请首长指示。”

邓小平说：“贺老总有事外出了，由我们俩找你先谈。”

刘伯承说：“我和邓政委商量后认为，进藏任务十分艰巨。你可以在二野范围内挑选4个师随你进藏。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略沉默了一下说：“我还是带18军进藏好，干部熟悉，这样把握性大。”

邓小平说：“带18军你有把握吗？”

张国华果断地说：“有把握。”

“好，就这样定了，你带18军进藏。还有什么困难吗？”邓小平高兴地说。

“没有。”张国华答。

刘伯承说：“有什么困难就说，让二野部队都支援你们。”

邓小平说：“立即通知18军各师的主要头头，叫他们速到重庆来受领任务。”

1月11日上午，刘伯承在曾家岩接见第18军的军领导及各师的主要负责人。在座的军领导有：张国华，既会打仗又有做地方工作的经验，是位文武双全的将军；政委谭冠三，老成持重，有胆有识，是参加湖南秋收起义者之一，此时已被任命为自贡市市委书记；副政委王其梅，虽未参加长征，但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我党得力的政工干部；参谋长陈明义，年轻有为，曾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思路敏捷，军容严整，人称“少壮派”。各师的领导有：第52师师长吴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是红军长征干部；第53师师长金绍山，原系豫皖苏赫赫有名的独立旅旅长，红军长征干部，国民党曾

悬赏 5000 光洋要他的人头；第 54 师师长张忠，精明强干，性格稳重，关怀部属，平易近人，也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

刘伯承的目光从每个人的面庞掠过，心想：怪不得小平同志叫张国华“人才地主”呢！他们 18 军可谓人才济济，师以上的领导同志基本都是长征干部。有这般虎将，何愁西藏不平？

刘伯承摘掉军帽说：“和大家好久没见面了，很想念同志们。冠三同志，让大家把帽子摘掉嘛。”

谭冠三示意大家脱帽，然后将帽子板板正正地放在膝盖上。每个人都紧闭双唇，肃穆以待，气氛有点紧张。

刘伯承看了看大家说：“大家放轻松一些嘛，不要太拘束。冠三同志把手放下来，放下来嘛。哎，这就对了。你们大家还可以翘起二郎腿听我讲。”室内一阵笑声，顿时，大家轻松了许多。

刘伯承说：“小平政委今天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来了，他让我先问候大家好。”室内又响起一阵掌声。

刘伯承问道：“国华同志，你没得 40 岁吧？”

张国华答道：“36 啦。”

刘伯承说：“36 属兔子的。兔子灵活，爬山得行，你还很年轻嘛。”

张国华笑了笑说：“不行了，已经快要走下坡路了……”

刘伯承说：“你还年富力强嘛。常言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你还未到不惑之年嘛。”然后他又侧身对谭冠三说：“冠三同志，这里除了你和我，他们都是 30 来岁的年轻人。他们手脚灵活，朝气蓬勃，又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同志们哪，我准备让你们挑重担，晓得吧？”

张国华立即站起来说：“请司令员下命令吧！18 军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谭冠三也激动地说：“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刘伯承非常满意地说：“好，很好！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股子劲头。这叫什么？这叫党性！进军西藏是非常不平常、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任务。你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党中央、毛主席对 18 军非常信任，这也是党和人民选择了你们！”接着刘伯承司令员又谈了进军西藏的军事部署、民族政策以及修筑康藏公路等问题。

1 月 15 日，邓小平、刘伯承又在曾家岩召开了第 18 军师以上干部的第二次会议。

邓小平说：“选你们 18 军进藏，是因为你们干部的素质好。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转好弯子。西藏地处西南边疆，约有 100 万人口，民族政策极为重要。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和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看，对西藏的多次用兵，大多未解决，而解决者也多是靠政治。因此，你们的一切工作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要团结达赖和班禅两大派。同时还必须解决公路和补给问题。你们要作好准备，8 月开始进军西藏。”

散会后，邓小平对刘伯承说：“看来，我们选张国华和 18 军进藏是选对了。立即把我们的部署电告中央。如果你和贺老总同意，我的意见把我们为什么要选张国华的理由也一并报告毛主席及中央军委。”

刘伯承说：“好，你想得很周到。张国华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在二野众多的干部中，刘、邓首长为什么要选张国华呢？只要了解一下他的卓著战功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下面仅举数例。

1946年11月，经中央批准，组建豫皖苏边区党委及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委。豫皖苏地跨江淮平原，位于黄河以南，淮河北，地处陇海、津浦、平汉3条铁路的交会之间，是南北贯通、襟带东西的战略要地。

1947年初平岗会师后，豫皖苏部队很快整编就序。经过短期的休整，张国华率独立旅、特务团等部队开始东进。此时，国民党军队依仗美式装备，对我豫皖苏地区实行第四次“围剿”。我军在张国华的指挥下，寻找有利战机，决心以军事上的胜利打出威风，摧毁一切敌伪政权。1月12日，张国华令部队迂回龙岗一带，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布下口袋阵，将敌新10旅第30团包围，以逸待劳。在此紧急关头，张国华对某团团长说：“一定要下决心打好这一仗，不要怕牺牲！你这个团如果打得还剩一两百人，你就去当连长，以后人多了再去当你的团长。”

将敌包围后，张国华先采取“掏心战术”，先消灭敌人龟缩在徐双楼的1个营。13日晚，独立旅先扫清外围之敌，占领有利地形。14日晨2时，在重火力掩护下，向敌人发起总攻击。晨4时许，占领了敌阵地，歼灭敌新10旅第30团团部及1个营。14日中午，军区主力特务团、骑兵大队又阻击敌人增援，相机将敌一部歼灭。14日黄昏，独立旅又对敌人发起进攻，将敌新10旅第30团全部歼灭，完成了军区主力东进的任务。此次战役共毙、伤敌人6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8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挺，各种火炮200余门，步、马枪1万余支。

龙岗集“掏心战术”取得胜利后，一个下级指挥员向张国华说：“你以前是否指挥过这样的战斗？”

张国华摇了摇头说：“没有。听说东北有这种打法。”

又问：“你将3个团的兵力全部用上一齐打，若是打个大消耗战怎么办？”

张国华说：“万一打不好，下次总结经验，还要集中力量打它个歼灭战。不这样，就无法坚持游击战争。”

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又进犯我豫皖苏地区。各地的保安团队也乘机四处设立据点，对我军实行“清剿”。豫皖苏部队在张国华的指挥下，避开敌人大兵团的追堵，以奔袭、奇袭等战法，声东击西，使敌主力陷于徒劳的往返之中。3月4日，张国华得知睢县的保安第6团装备好，但战斗力不强，城下工事也不坚固，仅有少数兵力防守。于是，他命令部队以夜袭强攻的手段，于3月9日发起攻城战斗。在我军强烈的炮火掩护下，独立旅仅用30分钟就将睢县县城全部占领。为此，该旅受到晋冀鲁豫军区的通令嘉奖。嘉奖电文称：“豫皖苏军区在敌人疯狂进犯、‘扫荡’、‘清剿’下，愈战愈强。十数天内，连克数城，守敌大部被歼。其作战特点，辗转机动，捕捉战机，善于寻找敌弱点。战斗精神旺盛，尤其善于远距离奔袭，伤亡很小。各部对此模范战斗应研究学习。”

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黄河防线，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大反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行战略大反攻。此时，豫皖苏部队仍在张国华的指挥下，按照晋冀鲁豫军区的部署，主动积极进行战斗，10日内连克7城。接着又举行了周口攻坚战，全歼守敌1100人；淮阳攻坚战，又歼敌1700人。豫皖苏部队出兵平汉路，斩断敌人中原运输的大动脉，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

1948年冬。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张国华一面组织地方武装支援前线，一面组织军区的主力部队配合野战军作战。他率部进行了宿怀阻击战，5天急行军，激战7昼夜，和兄弟部队阻住了李延年3个军的多次猛攻，对围歼黄维兵团的胜利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豫皖苏军区自1946年12月成立，到1949年1月，由初期的睢、杞、太狭小的根据地，扩展到豫皖苏全区；由最初的2个军分区，发展到8个军分区；在十分之四的地区内进行了土改，在十分之五的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在全区内建立了人民政权；武装力量也由初期的1500人，发展到8万人，拥有1个独立旅、16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骑兵支队、1个骑兵大队、6个区支队、37个县大队。在此期间，军区部队共进行了大小战斗330次，歼敌9.3万人。张国华文武双全，威震敌胆。此次受命进军西藏，与其说是刘、邓首长选择了他，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他，人民选择了他。

签订协议，和平进军

1949年2月17日，第18军宣告成立，属二野第5兵团建制。张国华任第18军军长，自然又成了刘、邓首长属下的一员爱将。1950年，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曾多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但均遭西藏地方当局的拒绝。

1950年2月25日，党中央电告西南局，同意派人赴藏说服达赖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3月底，志清法师（后改为密悟法师）携同贾题韬居士，离开重庆前往西藏。行至金沙江边岗托，被西藏地方当局所阻，直到昌都战役后才成行，于1951年8月底抵达拉萨。

1950年5月3日，党中央电复西北局，同意派出青海寺院劝和团入藏。该团7月中旬出发，至西藏黑河（今那曲）被西藏当局所阻。不久，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到拉萨后，夏日仓、先灵二位活佛被软禁，迟玉锐被押解山南，劝和工作又遭困难。通过工作，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当局才将迟玉锐等送回拉萨释放。

1950年5月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致电朱德总司令，请求入藏劝和。朱德回电赞扬其爱国热忱。格达活佛于7月10日离开甘孜白利寺，24日至昌都被西藏地方当局所阻，8月22日被害身亡。

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他们调动了17个代本（相当小团）约8000人，藏军4500人，民兵3000余人，陈兵金沙江边，妄图阻止我大军解放西藏。我军为了打开和谈的大门，在张国华的指挥下，于1950年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是役历时19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歼灭敌人5700人。昌都战役胜利后，张国华奉命以我方代表身份出席了北京的和平谈判。双方经过充分友好的协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共同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协议签订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主席发布了进军训令。训令宣告：“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派张经武为中

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当晚，毛泽东又找张经武和张国华长谈。

毛泽东说：“协议签订了，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也要到西藏去了。要实行协议，还要经过很多艰苦的斗争，要应付非常复杂的局面。你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进去了，又被赶出来，怎么办？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事，要慎重稳进，不可操之过急。”

第二天，张国华又去拜见了朱德总司令，请他为进军西藏作指示和题词。朱总司令作指示后，又挥毫为进藏部队题写了“进军西藏，巩固国防”8个大字。张国华在京还拜会了李四光、郭沫若等科学家。他想，我们不但要解放西藏，还要考虑建设西藏的问题。于是，他向有关部门请求援助部分地质、地理、医疗、天文、畜牧以及社会、民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工作者，组成“中央文委西藏科学工作综合考察队”，随军入藏，开展科研工作。

张国华在京处理完诸项工作后，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回到部队，立即投入了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的工作。张国华想，西藏的情况极为特殊，和平进军即将开始，估计沿途不会有大的战斗，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纪律以及执行民族政策的好坏，则是这次进军成败的关键。因此，需要搞一个带法规性的文件来规范部队的行为。于是，军政治部遵照军党委的决议和张国华的建议，制订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外事纪律》、《藏人的风俗习惯和禁忌》等。《进军守则》共分4个方面34条，主要内容有：不论机关、部队，一律不准派“乌拉”（差役）；在康藏地区只准按工委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保护喇嘛寺庙，一切宗教设施不得乱动；不得宣传反迷信和对宗教不满时，要回敬哈达；藏区旧有之行政人员继续任职，如已逃走，则尽量争取返回。

《入城纪律》规定：全体官兵在进入拉萨、太昭、江孜、黑河、日喀则、亚东各城市之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入城纪律教育；凡未持警卫司令部发的通行证者，一律禁止入城；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公共财产之责，无检查、没收、处理之权；严禁各部供给人员抢购物资，实行统一采购，公平交易，不得自定银洋和藏洋的比值，不得乱买强卖；除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之联合布告，西藏前线司令部之安民布告及印制的宣传品、标语口号等，不得乱写其他未经工委批准的标语口号；进入拉萨后，严禁到布达拉宫、三大寺以及拉萨当局之高级官员住宅驻扎或参观等等。

为确保进军、修路等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国华连续召集各种会议，按照西南军区的要求，具体布置了第18军全军的工作：第53师、第54师全力投入修建甘孜机场的任务，要求于1951年11月10日通航。甘孜机场竣工之后，第53师、第54师及第52师第157团立即投入康藏公路的修筑。另外，西南军区还抽调了一定数量的部队及3个工兵团、3个汽车团参加筑路。沿线设立若干兵站及4个办事处，还设有航空站、地情站、汽车修理厂等。共约7万人投入康藏公路的修建之中，并初步形成了庞大的进军保证系统。第18军为确保康藏公路的修建和运输，成立了后方指挥机关，陈明义任司令员兼政委。

1951年7月1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部告别了甘孜，历经17天行程，于7月17日顺利到达昌都。张国华等在昌都立即开展了统战工作，拜会了昌都活佛帕巴拉等上层人士。8月18日，西南军区胥光义同志专程来昌都向张国华等军领导传达了党中央和西南军区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协议是我军

进军拉萨、立足西藏的政治基础。要求部队反复学习，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外事政策，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8月21日，第18军下达了向拉萨进军的命令。鉴于策略和补给的需要，决定以军直一部及第52师师直率第154团、第155团，自8月20日至9月中旬，分别由昌都地区向拉萨进军。至此，拉开了多路向心进军的序幕。

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第18军直属机关、警卫营、工兵营、公安大队等，由昌都走北路向拉萨开进。

9月6日，由第52师副政委阴法唐率第154团等部从边坝出发，走南路向拉萨进发。

9月15日，由第52师副师长陈子植率师直机关、军炮兵营、第155团走中路向拉萨前进。

按照中央的全面部署，西北进藏部队（即第18军独立支队）在范明等同志的率领下，于8月22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开始了向拉萨的进军。

5月6日，新疆独立骑兵师派副团长安志明率部出发，于5月28日进抵藏北改则地区与先遣连会合，6月29日进至普兰。

8月3日，云南进藏部队在团长高建兴的率领下已进抵竹瓦根地区。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以雪山连绵、江河纵横、气候严寒、空气稀薄而著称。西藏地广人稀，平均海拔为4000~5000米，向有“世界屋脊”之称。为了解放西藏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为了保卫西南边疆，第18军的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张国华、谭冠三的率领下，毅然用双脚踏破了这块神秘的土地。千年的雪山上第一次飘起了五星红旗，沉睡的草地被进军的号声惊醒。山谷中行进着千军万马，藏胞们第一次见到“金珠玛”——解放军。部队在进军途中，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藏胞亲切的称他们为“新汉人”、“菩萨兵”。

张国华对统战工作的开展极为重视。他每到一地就去拜会当地的土司、头人、贵族、活佛等，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解放军的宗旨和“十七条协议”等。9月7日，部队到达丁青，张国华利用部队休整时间，立即调查了解39族的历史与现状。39族地区是过去由39个游牧部落组成的一个行政区。该地区地处西藏、青海、西康三省的结合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属高寒牧区。明崇祯十年（1637年），39族地区归蒙古最大的部落固始干所统治（原名为蒙古霍尔波39族）。清朝初年，39族直属理藩院管辖。乾隆十六年（1751年），归清朝驻藏大臣直接管辖。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国民党实力不足，鞭长莫及，藏军向康区东征，39族地区始归西藏地方政府统辖。39族人民不从，藏政府借口39族地区“亲汉”，进行镇压杀戮。从此，39族地区便与西藏地方政府严重对立。昌都解放后，39族地区划归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管辖。张国华在那里召开了千户、百户头人座谈会，调解了该地区与藏政府的关系，同时还和头人们商妥了支援人民解放军入藏的运输等问题。

过了丁青，部队继续向前进，渐渐地进入了“浅山区”。所谓浅山区，就是雪山看起来似乎低了，然而海拔却升高了的地区，海拔平均在4000米左右。部队越向前进，后方的运输线拉得就越长。物资运不上来，部队开始断粮，进军异常艰苦。许多人不得不靠野菜充饥，天天只好喝“四个眼的稀粥”——人的两只眼睛与映照在碗里的影子形成四只眼睛，可见粥稀到了何种程度。

一天中午，部队大休息，只能喝水壶里的凉水，吃“蛋黄蜡”（一种用面粉和蛋黄做的食品，形似蜡烛）。蛋黄蜡配给数量有限，一人每次只能吃1根（约半两重）。虽说蛋黄蜡有营养，但因分量少并不解饿，有的人就大口大口地吞嚼生野菜。此举不知何时被张国华看见了。他想，战士们每天要负重行军几十里，光吃野菜怎么行呢？他心疼他的战士们，顺手从警卫员手中拿过一小口袋糌粑说：“来，来，同志们！这是39族头人送给我的糌粑，就剩这点了，大家都来尝个鲜吧。”大家一听说是糌粑，便一齐围了上去，但很快又都慢慢地散开了。

张国华急忙招呼说：“不要走嘛，大家都来尝尝，尝尝嘛！”

一个战士回答说：“还是首长吃吧，我们不饿。”

张国华心疼地说：“说假话，不饿你们怎么吃生野菜！”

又一个战士有些顽皮地说：“西藏山高，气候干燥，吃点野菜去去火。”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张国华也笑着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和谭政委商量好了，到前边有老乡的地方，咱们买些牛羊，路上赶着走，到宿营地就杀了吃肉。西藏的牦牛肉可香啦……”

一个大个子战士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一顿能吃它二斤半！”

张国华笑着说：“当心撑坏了肚皮！”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说：“我宁肯撑死，也不当饿死鬼。首长，挨饿的滋味可真难受啊！”

张国华关心地说：“我知道大家饿，来先尝尝糌粑。”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一个战士大概饿得实在忍不住了，便说：“首长，我真饿呀。就尝一小口，就一小口。”

另一个战士也说：“我也尝一口。”

就这样，你一口他一口，瞬间就将那一小袋糌粑吃光了。

警卫员埋怨说：“什么尝一尝，全都给吃光了！”

张国华心疼地说：“他们饿呀。”

警卫员说：“他们饿，难道你不饿？”

张国华安慰说：“你忘了？陈老总总有首诗里说‘饥肠辘辘响如鼓，野菜和水煮’嘛。”

警卫员说：“野菜，这几天一到宿营地早就叫人拔光了。”张国华说：“你不会走远一点找嘛，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警卫员说：“听说咱们有一个团，已经吃了上万斤的野菜了。”张国华语气沉重地说：“不光他们吃，看来咱们也得准备吃野菜度日了。”

警卫员说：“那今天怎么办？你还没……”

张国华急忙岔开说：“老办法，一根蛋黄蜡，半壶凉白开。不！今天是两根。”

警卫员惊喜地问：“两根？”

张国华说：“是啊，前些天39族头人请我吃饭，我就把蛋黄蜡省下来了。给，这是给你留的。”说完将两根蛋黄蜡塞到警卫员手中。

警卫员急忙说：“不，不，首长你还没吃呢。”

张国华说：“我不是说了吗，两根蛋黄蜡，半壶凉白开，再把裤带这么一紧。嘿！到宿营地没问题。走！”说完，张国华向着前方走去。

部队到了纪路通，征得当地头人的同意，用银元买了些青棵和牛羊。常

言道“饥不择食”，即使是白水煮羊肉，人们也都大口大口地吞嚼。几天过后，这没有食盐和佐料的水煮羊肉又腥又膻，令人闻到就想呕吐。即便如此，也得硬着头皮吃，不然就得挨饿。40多年过去了，至今有些“老西藏”还不吃羊肉呢。

西行数日，部队进至怒江边。怒江两岸，雪山高耸，寒气逼人。江水以每秒8~10米的速度向前翻滚着，不要说徒涉，就是乘小舟横渡也难免有覆舟的危险。

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领导经过周密研究后，决定抢渡天险。张国华首先派人在沙丁一带选择了渡口，于当地雇请了船公，搞到十几只牛皮筏子。分设人、畜两个渡口，骡马卸鞍泅渡，人和物乘牛皮筏子渡江。牛皮筏子结构十分简单，用几张牛皮缝成圆形，里面用几根木条撑着，每只筏子只能坐5至6人。有人开玩笑地说：“这牛皮船呀，好像俺河南的大花碗。”

经过周密的组织计划，要求一切人员服从命令听指挥，物资和人员也都实行了定位，渡江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张国华再三叮嘱指挥渡江的李觉参谋长说：“首渡怒江，一靠严密组织，二靠团结互助。一定要同舟共济，战胜天险！”

渡江开始了，一只只牛皮筏子旋转着向江心飘去，忽而涛尖，时而浪底，水手们顽强地拼搏着。张国华站在岸边，屏住呼吸，紧闭双唇，两眼死死盯着江中的每只筏子，脑海里又闪现出当年指挥部队横渡长江的情景。直到每只筏子都安全地到达彼岸，他才长长地出了口气说：“同志哥呀，总算过去了。”

渡过怒江之后，部队又行进在冰峰雪岭之中。骡马因涉水迅速掉膘，又加草料跟不上，开始出现死亡。牲口一死，人的负重更加沉重，加之粮食越来越少，人的体力也在下降。这样一来，行军的速度慢了许多。张国华见状，立即同谭冠三、李觉、刘振国等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目前粮食困难，人马体力下降，已到了关键时刻。因此，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实行团结互助。粮食困难，党团员要让非党同志先吃。干部的乘马要让给病号骑。同时派人沿途采购粮食和马匹，共同渡过难关。

有人曾向张国华建议：“目前部队人困马乏，是否休整一下再走。”

张国华说：“不行。我们必须10月到达拉萨。西藏谚语说得好：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破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现在正是好走的季节，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闯过去；不然大雪封山，我们就更困难了。”

部队在张国华等人的带领下，顽强地向前行进着。此时，走南路和走中路的第52师各部，克服了种种困难，分别翻过了海拔5000米以上的丹达山和瓦合山。数十天内，进藏部队翻越海拔5000米左右的雪山10余座，跨越江河无数条。现在，张国华正率部翻越海拔5900米的冷拉山。行军行列里不断传来《歌唱二郎山》、《进军歌》、《十八军是铁打的英雄汉》等歌声。

文工团有位四川参军的大学生刘某，人们送其雅号“老夫子”。他那匹“飞机牌”的马，从泅渡怒江之后就经常“趴窝”。“老夫子”在路旁大声地朗诵道：“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又一岭，岭岭相连。祖国山河多壮美哟，我走马不前。”旁边的人见状急忙喊道：“‘老夫子’的马又趴窝了，快把他的东西放到别的马上去！”

“好。”大家一齐跑过去帮助卸东西。

此时，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首长走了过来。张国华见状忙问：“小同志，

怎么不走了？”

刘某答道：“非我不走，马不前也。”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谭冠三笑着说：“马不前也，何不求助同志乎？”“快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

张国华急忙说：“不，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谭政委的马驮的东西太多了。”

刘某感动地说：“不，不，我能行，我能行！”

张国华有意岔开说：“你刚才朗诵得不错嘛！”

刘某不好意思地说：“瞎胡诌的，开开玩笑。”

张国华说：“听说你的快板说得不错嘛。要是设个鼓动排，你说快板，他唱歌，还有的吹喇叭，鼓舞部队士气，你看好不好？”

刘某说：“这主意太好了。我马上向团长报告，立即组织节目。”

张国华说：“那好，我等着看你们的节目。”

部队在雪山上整整走了一天。有的人因防护不善得了“雪盲”，眼睛红肿得什么也看不见。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有高山反应，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步履艰难地向上爬着……

夕阳西下，天慢慢地黑了下來。部队行至半山腰便不能继续前进，无奈只好宿营。到过西藏的人都知道，爬山务必在上午 12 点以前翻过山头。下午气候变化多端，时风时雪，忽而冰雹，忽而雪崩，翻山易出危险。如不是万般无奈，人马切不可在半山宿营。万一遇上暴风雪，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山坳间，一座座帐篷搭在了雪地上，四周还筑起了雪墙。张国华不安地看看天空，向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注意天气变化，如有反常现象立即采取措施。”人们进入帐篷不久，开晚饭的号声便吹响了，但精疲力尽的人们这时大部已进入了梦乡……

张国华患有高血压症，在医生的督促下吃了降压药和安眠药刚刚睡着，因高山缺氧又被憋醒。他顿时觉得胸闷，呼吸困难，遂慢慢坐起，摸着火柴想把马灯点着，连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他突然悟到，这是在海拔 5000 米的雪山上，严重缺氧啊！他披上大衣半卧在帐篷内。帐篷外山风呼啸，月光如银。他心想，今夜不会有暴风雪了，真是天助我也。此时，他感到头像要裂开一样疼痛。他知道这是高山反映，便摸出事先准备好的止痛片用水送下，然后微闭双眼，双手紧紧地按住太阳穴，渐渐地陷入了沉思：走南路的阴法唐和走中路的陈子植的部队也开始断粮了。炮兵营在过瓦河山时，骡马突然死亡，大炮都是靠人抬着爬过山的。我们的行程刚刚过半，粮食是当前的主要困难。现在部队是靠稀粥和野菜度日，再过些时就到冬天了，连野菜也无处找了。战士们能熬过这一关吗？能，一定能！我了解他们。这是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的部队。此刻，他又想起了第 18 军和蒋军第 181 师的白刃战，想起了昌都战役中第 155 团 7 天长途奔袭堵住了敌人，想起了进藏之前刘伯承司令员的嘱托。瞬间，邓小平政委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进军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军事和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你的担子不轻啊！你们一定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突然，他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湖南乡音：“你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进去了，又被赶出来，怎么办？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张国华猛地坐起自语道：“请主席和刘、邓首长放心，只要 18 军在，就决不会被他们赶出来。我们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天亮了。雪山上又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张国华正在山坡处用雪搓脸，谭冠三也边搓脸边走来说：“国华同志，昨晚派出去探路的牦牛和向导都回来了。”

张国华说：“我早知道了，路还是没找到。”

谭冠三说：“是啊！带路的藏族向导说他也迷路了，正念经求菩萨保佑呢。”

张国华坚定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嘛，再让工兵营派人去探路。”

谭冠三说：“李觉同志已经又派他们去了。”

张国华笑了笑说：“天无绝人之路啊！走，咱们到前面看看去。”

谭冠三说：“吃了饭再去吧？”

张国华说：“你们先吃吧，我牙疼不吃了。”说完他向远处走去。

部队边探路边前进，整整走了一天还不到 10 千米。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又找不着下山的道路。饥饿，疲劳，加上高山严重缺氧，有的战友已经倒下了。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张国华深知，在高山上多呆一分钟，生命就会多一分危险。他命令工兵继续寻找下山的路。

正在此时，不知谁喊了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下呀！从雪坡上滑下去。”说完雪坡上溅起了串串雪花，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雪痕。战士们见滑下去的人没有什么危险，也都喊道：“快来坐‘电梯’往下滑呀！”接着便一个接一个地滑了下去。顿时，战士们的笑声、指挥员的吆喝声、战马的嘶鸣声，汇成了人类战胜天险的壮丽乐章，在千年雪峰上回荡，回荡……

张国华指着这壮观的场面，对身边的李觉参谋长说：“还是他们聪明。走吧，咱们也坐坐这‘土电梯’。”

李觉从兜里掏出一包药说：“你的牙疼，这是医生给你的止痛片。他们去抢救病号了。”

张国华接过药关切地说：“谢谢。老李呀，你立即派人，一定要把谭政委和体弱的小同志、女同志照顾好，千万不能出问题！”说完张国华穿好大衣和警卫员手拉手地滑了下去。

部队经过数小时的翻滚和与冰雪的搏斗，终于到达山下，随即埋锅做饭，清点物资，包扎伤口。这次翻越冷拉山，有 6 位战士献出了生命，损失几匹战马。

广大指战员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团结一致，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行程 3000 里，于 1951 年 10 月 26 日到达西藏首府——拉萨。部队与 9 月 9 日先期到达的王其梅先遣支队会合后，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拉萨数万僧俗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手捧洁白的哈达，载歌载舞，夹道迎接解放军入城，庆贺西藏和平解放。

11 月底，第 52 师各部也分别进驻西藏重镇太昭、江孜、日喀则，并派一支小部队于 1952 年 3 月 5 日到达亚东和山南隆子宗等地。西北进藏部队（第 18 军独立支队）在范明、慕生忠等人的率领下，克服艰难险阻，历时 3 个多月，行程 4000 里，于 12 月 1 日胜利到达拉萨。新疆向阿里地区派出的后续部队，在安志明的率领下，已于 1951 年 5 月底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云南进藏部队第 126 团和第 125 团的 1 个营，在团长高建兴的率领下，于 1951 年 10 月 1 日进驻察隅地区。我进藏部队，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挥下，在西南、西北军区的具体指导下，和平解放了大陆最后一块国土，完成了统一祖国的

光辉伟业，实现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豪迈誓言。

站稳脚跟，平息叛乱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一度出现了较好的形势：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西藏工委得到了充实和加强；统战工作有明显的进展，群众关系良好。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宣告成立，张国华任司令员，谭冠三任政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喀·彭错饶杰二人为副司令员。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势力决不甘心失败，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乘我军立足未稳，对我军实行断柴、断粮的“困饿”政策，妄图把解放军“饿走”。司曹鲁康娃狂妄地对张国华说：“过去满清有个入藏的大臣也姓张（指张荫堂），只在拉萨设了个衙门，没带什么兵，你何必带这么多兵呢？”

张国华说：“我不带兵，怎么保卫国防、建设边疆呢？”

鲁康娃说：“打败仗虽然难受，但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

张国华说：“我们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如果你们执意和解放军为难，我坦诚地奉劝阁下，你们的困饿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

鲁康娃说：“你们汉人不是说‘人是铁饭是钢’吗？难道你们是铁打的？”

张国华答：“解放军不是铁打的，但我们有钢铁般的意志，又有好心的人们支持，任何困难也压不倒我们。”

在谈到西藏要挂国旗时，鲁康娃更加露骨地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佛国，不必挂中国国旗，挂上了再拿下来更不好看。”张国华感到这是西藏的一股逆流，当即严正批判了他的错误言论。不料，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等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支持一些坏人对我进藏人员抗膀子、扔石头、吐口水，并进行辱骂。更有甚者，他们居然支持一个由商人、无业游民及社会渣滓拼凑而成的反革命组织，成立所谓“人民会议”。妄图制造混乱，恶化西藏形势。他们武装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住地，阴谋抢夺布达拉宫的军火，公然喊出“西藏独立”和“解放军撤回内地”等口号。张国华协助张经武代表，粉碎了伪“人民会议”的阴谋，并向达赖喇嘛提出解散伪“人民会议”。不久，达赖被迫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的职务。

为使我军在西藏能站稳脚跟，张国华等一手抓生产，一手抓修路。当时拉萨的粮食只能维持7天左右。张国华和谭冠三决定，军区机关、部队率先开赴拉萨河畔，挥镐掘土，向荒滩要粮。至1952年底，全区开荒1.4万亩。军区直属队在张、谭首长的带动下，开荒2300亩，解决了8000人3个月的粮食，基本上达到蔬菜自给。

要站稳脚跟，关键是要加快修通康藏公路。后方部队第53师、第54师等4万筑路大军已经把公路从甘孜修到了昌都。1953年1月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线路的修筑方案，并要求1954年通车。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同时，西藏工委决定，从青海到西藏再修一条公路。经报请军委批准，由慕生忠指挥，青藏公路也开始了勘探与修筑工程。为了加快修筑康藏公路的进度，张国华主持召开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会议。会议决定：康藏公路分东、西两段同时施工。东段由陈明义率第53师、第54师及工兵团等修筑。西段由西藏军区和噶厦政府共同组成修路委员会，由谭冠三任主任，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任副主任，由拉萨地区的部队和1.8万西藏民工

组成筑路大军，从西向东修筑。

在修路的过程中，张国华不断深入现场察看，指示部队一定要爱护藏族民工，帮助他们学技术，和藏族群众交朋友。奴隶们第一次得到解放军发给的大洋，彻夜难眠，兴奋不已。不料，我们白天发的大洋，夜里又被头人收了回去。后来我们就改为发物资。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对上层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在东、西两段共同奋战下，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全线同时通车至拉萨。

为此，中央领导和西南军区首长题词祝贺。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祝贺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邓小平政委的题词是：“为巩固祖国的西陲国防而努力！”贺龙司令员的题词是：“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张国华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此时，张经武返回北京，张国华代理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形势相对稳定。9月，中央指示西藏工委，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即“六年不改”方针。根据中央指示，张国华果断裁减了驻藏人员，撤销了第53师师部，调出了某些兵力，把部队收缩到只能保点保线的8000人。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公然喊出“永远不改”的口号。在一次会上，张国华要求西藏噶厦政府处理从金沙江东逃至拉萨的叛乱分子时，噶厦政府的首席噶伦索康却说：“还是请解放军出面解决好，你们有枪有炮……”

张国华严正地指出：“解放军坚决反对叛乱，但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国防，保卫边疆。叛乱分子窜扰西藏是地方治安问题，理应由噶厦政府处理。你们有权利，有藏军，也有枪有炮，完全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噶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软弱，如此暧昧，这只能说明你们当中有的人与叛乱分子有着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是很不好的！”张国华的话击中了索康的要害。索康一反常态，急忙给在场的人员一一敬烟，以掩饰他内心的慌乱。

1958年7月中旬，张经武、张国华直接会见达赖，严正指出：“噶厦政府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不要叛乱”的指示与劝告置若罔闻，阳奉阴违，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借达赖要去军区看戏为由，制造混乱，发动了叛乱。20日，叛乱分子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首先，盘踞在罗布林卡的叛匪于3时45分向拉萨河南岸牛尾山我守卫渡口分队开枪射击；接着，市内叛乱武装向我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起多次进攻。军区部队在谭冠三将军的指挥下，于3月20日10时向敌发起反击。拉萨之战，我军仅以1000余人的兵力，在短短两天之内就把叛乱平息下去。从此，拉开了西藏彻底平叛的序幕。

3月的武汉，春天悄然而至。毛泽东在东湖旁边的一栋寓所里召见了张经武和在北京治病的张国华。

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这样搞（指叛乱）无非是想赶你张国华走路。”

当谈到西藏的改革时，毛泽东说：“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

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人民就会早日得到解放。现在他们既然发动了叛乱，我们就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张国华带着毛泽东的指示，于3月下旬返回拉萨。在他严密的组织和指挥下，迅速发起了山南战役。4月4日，军区以4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以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的战术，向盘踞在山南之敌发起进剿。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匪的老巢。

1960年初，平叛部队在张国华的统一部署下，又胜利地进行了1、2、3号地区战役和阿里战役。

在平叛战役的每个阶段，张国华都反复指示各参战部队，要严格执行平叛中的各项政策。西藏军区第11师某部，在2号地区执行清剿任务。有一天，他们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一股叛匪，山顶上白雪皑皑，山坳里有数顶帐篷，还有马匹牛羊等。指挥员当即命令部队抢占山头，实行包围，准备一举歼灭叛匪。战士们进入阵地，利用冰墙作掩护，趴在冰上悄悄地进行战斗准备，枪上膛，手榴弹也挂上了弦，只等命令一下立即开火。指挥员慢慢举起右手准备下达命令，只见从叛匪的帐篷里跑出个赤条条的小男孩，在雪地上小解，然后又跑出一个小孩。紧接着，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和一位妇女去背水，拾牛粪，点火烧茶。很快，其他帐篷也冒出了缕缕青烟。指挥员面对此景，举起的右手又慢慢地放了下去。他想：不行！这里边有妇女和儿童，可能还有被裹胁的群众。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平叛中要讲政策，决不能伤害无辜。想到此，他立即叫来藏文干事和会藏话的战士一齐喊话，展开了政治争取工作。叛匪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醒了，震懵了，顿时乱了阵脚。有少数叛匪头子和骨干分子负隅顽抗，当场被我军击毙，其他叛匪见状纷纷投降。此时，有一叛匪首领将妇女和儿童组成人墙，掩护叛匪向我军扼守的山头步步逼进。指挥员命令神枪手在不伤害妇女、儿童的前提下，必须一枪将叛匪首领击毙。经过数小时的对峙，突然一声枪响，匪首倒地，其他叛匪跪地投降。受蒙蔽的群众和老人纷纷跑上山，感谢解放军的救命之恩。这时他们发现，有的解放军战士趴在冰雪上已经起不来了，有的冻坏了手脚，有的冻伤了耳朵和鼻子。其中，有一个战士趴在冰上竟然和冰雪冻在了一起，成了一个“冰人”。

那位在山坳里烧茶的老阿妈见状猛地扑了过去，默默地解开藏袍，把战士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她那温热的胸膛暖化战士身上的冰雪。她嘴里不停地念着经文，求菩萨保佑战士的生命。可惜为时已晚，那位战士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老阿妈抱着战士哭诉道：“金珠玛米，你是为救我们活活给冻死的……”在场人员无不默默垂泪，乡亲们向战士的遗体敬献了哈达。他们背着重伤员和死难者的遗体，慢慢地向山下走去。

1961年，张国华主持召开了平叛总结会议。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西藏、兰州、成都等部队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平叛的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当时有人曾断言：“没有20万军队，叛乱是平息不了的。”结果，我们的兵力远远少于20万，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彻底平息了西藏的叛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平叛后，在西藏立即掀起了“三反”、“双减”的群众运动。西藏工委为此制定了十三项政策，又先后制定了《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在改革中建立各种政权组织的指示》等等。

这些政策大都是在张国华的主持下制定的。他还下到农村和农奴一起吃糌粑，吃奶渣，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西藏民主改革后，出现了雪域高原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然而张国华却因夜以继日地工作，积劳成疾，患心脏病住进了内地医院。

卫国戍边，再创辉煌

正当西藏人民在中央稳定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时候，中印边境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张国华在医院里一面治病，一面让秘书从有关部门借来材料仔细阅读，详细研究分析印度侵略西藏的历史与现状。

印度反动派对我边界领土早有野心，蓄谋已久。1914年3月24日，参加所谓“中、印、藏会议”（即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以帮助西藏独立为诱饵，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夏扎（司伦）在西姆拉会议以外，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不丹以东的印藏边境线，即“麦克马洪线”。该线全长800千米，将历来属于中国、总面积约9万平方千米的地区划归英属印度。中国代表得知后，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因此，在1914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都不敢公布这次秘密换文的地图，也不敢改变地图上这段边境线历来的划法。

1944年，英国政府趁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便开始向西藏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要求，但仍然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

1947年印度独立后，仍执行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政策。印度在我西藏亚东、江孜等地设有兵营，长期驻兵于西藏。1950年，印度又竭力阻挠我和平解放西藏。阴谋遭到失败后，印度就在中印边界各段，首先是东段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的中国领土，还抢占了英国想侵占还没有来得及侵占的整个“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土地。

1954年4月6日，印度秘密改变东段边界的称谓，在一份机密文件中称：“今后‘麦克马洪线’一词和边界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从此‘麦克马洪线’的提法，一律用‘东北特区’一词代替。”

1956年11月12日，在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印度的反动派与西藏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挑拨达赖滞留印度，搞“西藏独立”的勾当。

1959年3月20日，西藏发生了叛乱。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尼赫鲁在信中不仅把已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而且还要把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也划入印度版图。这些领土的总面积约12.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1个福建省或3个荷兰、4个比利时的面积。

1959年3月31日，尼赫鲁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同日，达赖叛国集团进入印度控制区。印度政府应允给予其政治避难，并说“达赖在印度期间将获得尊敬的待遇”。

60年代，印度国内人民生活贫困，失业人数增加，国内局势不稳，一些邦的分裂运动有增无减，印度政府借用的美援急剧增加。印度当局错误地判断中国国情，他们认为：中国发生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在西南边

境无力进行军事对抗；蒋介石在东南沿海妄图反攻大陆，中国军队主力主要用于福建方面，西南防务空虚，有隙可乘；中国与苏联之间裂痕加深，国际上出现了反华浪潮。西藏的叛乱失败后，印度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便公开抛弃了中印友好的旗帜，接二连三地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走。

从1960年至1962年上半年，印度当局对我实行“前进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就是以武力实现对中国领土的要求。1962年9月，印度在西段边界我国境内设立了43个据点。有些据点距离中国哨所只有几米；有的据点还设在了中国哨所的背后，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面对印度的入侵，我国政府一再提出抗议，要求印度撤退。但印度政府全然不理。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确定在中印边境西段采取“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斗争方针。

印度在入侵西段的同时，在东段也不断地进行入侵。1962年4月28日至5月18日，印军多次侵入我西藏山南朗久地区。5月29日，非法侵占那典姆拉的印军，开枪打伤中国边民的骡马。6月4日，印军阿萨姆步兵第5营一部，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错那县克节朗地区，并在扯东建立了军事据点。

张国华在看材料的同时，还带病聆听了中央领导及周恩来总理对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分析与决策。他参加了总参关于中印边境斗争具体方案的研究制定。他不断将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及时地传达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5月下旬，他又派参谋人员返回西藏，集中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他个人的意见。

张国华在他的建议中说：中央认为这场军事冲突实难避免，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不主动惹事，不挑起战争，但要准备战争。中央对中印边境斗争的总方针是先外交（提抗议）而后军事，这叫先礼后兵。毛泽东主席讲：“楚国和晋国打仗，晋国退避三舍，后撤90公里，取得了政治主动，结果楚国被打败了。”我们现在也要这样。当前斗争的重点在西段，东段也要作好打的准备。在东段进行自卫反击，我们政治上有理，因为他们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我大片领土；军事上也有利，回旋余地大，便于兵力展开。我们要积极配合西段的斗争。

张国华反复地交待传达文件的参谋人员说：“一定要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领会贯通。周总理反复强调：这次斗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大打（敌使用两个旅以上兵力）由中央准备，中打（敌使用1个旅或两三个营的兵力）、小打（敌打巡逻部队或伏击、偷袭）由军区负责。一切准备工作都要落实，不打则已，打就打胜。打好了有利于谈判，有利于外交斗争。打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外交斗争。所以，准备不好，即使吃点小亏也不要乱动。打的时候一定要经中央批准。”

西藏军区根据中央一系列指示和张国华的建议，迅速组建了精干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区前进指挥所（代号419部队），统一指挥第154、155、157个原第18军的主力团和山南分区的部队。选调原军区作战处长、山南分区司令员柴洪泉为419部队司令员，原第52师副政委、江孜分工委书记阴法唐为政治委员。为加强昌都方向的指挥，又将鄯晋武派往昌都任分区司令员。战前，张国华还请求总政批准，将在政治学院学习的第155团政委乔学亭调回

参战；又从机关抽调顾草萍等一批处、科长和参谋人员到“前指”工作。

我边防部队在“前指”的指挥下，迎头顶住了印军的入侵，实行了“敌逼进，我逼进，敌切断，我切断，敌不打，我不打”的方针。印军的蚕食入侵遭到有力的阻止后，恼羞成怒，决心以武力征服。9月20日，印军公开向我择绕桥头哨所开枪射击，打死我军官1人，打伤我士兵1人。接着，印军又以1个营的兵力越过克节朗河向我尺东哨所发动进攻，打死打伤我官兵47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仍未还手。尼赫鲁便得意忘形地扬言，要把我边防部队从中国的领土上“清除掉”，“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印军得寸进尺，不断向我步步逼进。我方一再主张和谈，印度完全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1962年10月，张国华带病返回西藏。在到达拉萨的当天，就召开了军区常委紧急会议。张国华说：“我们的对手是印度的‘王牌’军队，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完毕；他们没有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罗瑞卿总长问我有没有把握打胜，我说有。”接着，常委们围绕如何打好仗发表了意见。

张国华最后说：“事关国威军威，影响深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我们准备先于掉他1300人（指当时克节朗敌情）。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把各自担负的任务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紧急动员，全力以赴，不怕任何困难去争取胜利！”

张国华自觉地加重工作负荷，带病加速战前准备，在军区部署完毕后，又到地方研究支前工作。他找到自治区负责交通的侯杰，要求他在24小时内为前线运送50车炮弹。侯杰果断地答应下来。190千米的山路，路况又极差，大家经过努力，只用了10个小时就完成了运输任务，受到工委、军区的通报表扬。张国华忙完拉萨的工作后，14日到达泽当，又与泽当分工委和军分区的负责同志研究运输问题。15日，驱车赶往前方指挥部，与“前指”的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司令部副参谋长石拌樵会合，立即向419部队的柴洪泉司令员、阴法唐政委了解情况，并研究对克节朗之敌的作战方案。16、17日，又召集有团级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张国华进一步询问了敌情、地形、道路等情况，又一一了解部队的思想状况以及粮食、弹药等准备情况，反复地征求到会人员关于战役打法的意见。

夜幕降临，麻麻（指挥部所在地）小山村居民的灯光早已熄灭，唯独张国华的房间里灯光还在闪烁，他正伏案审看给总参草拟的作战方案电报稿。电文称：“印军第7旅等部约3000人，配置于克节朗地区。其中克宁乃桥（含）以西为第7旅防区。敌以2个营在色章湖至克宁乃桥一线沿克节朗河设防，以1个营在绒不丢、色兄朗沟、章多等地为预备队，旅部位于勒龙、吉普之间。克宁乃桥（不含）以东，娘姆江曲河两侧为阿萨姆步兵第5营防区，该营并指挥近卫联队第4营的1个连，在沙则、仲昆桥设防。总观其部署特点是前重后轻，正面宽，纵深浅，状似一个‘丁’字形，左翼是重点，又是要害……”

张国华看完电报，一个人在室内来回踱步。他思考着：是张大口呢，还是张小口？是正面开刀呢，还是插敌两翼？口张大了吃不掉，口张小了又打不疼敌人……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初战慎重，只打沙则一点，吃掉敌人1个营。他想，这个方案不无道理，没有风险，也符合初战慎重的原则。张

国华不愧是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毅然否决了这个方案，决心吃掉敌人1个旅。具体战法有三：第一，从正面突破。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宜采用。第二，直插东拉。从地形看，这是矮子爬楼梯的打法，敌居高临下对我不利。第三种方案是集中兵力插敌两翼，由左翼对枪等之敌实施主要突击，同时迂回章多，打敌指挥机构，予以正面牵制，将敌分成数块，一块一块地歼灭之。首先，集中主力（步兵第155团和第157团的1个营）从枪等、卡龙实施主要突击，攻歼卡龙、枪等之敌；以步兵第157团（欠1个营）向敌左侧迂回，攻占章多；以步兵第154团攻歼敌右翼沙则、克宁乃桥之敌；以步兵第32团第2营（该营为419部队预备队）和山南分区部队在白采、择挠、几儿等地与守点分队正面牵制敌人。得手后，再集中力量聚歼扯冬、绒不丢和色兄朗沟之敌。另以炮兵第308团2个120迫击炮连和2个82迫击炮连组成轻便炮群，配置于拉则、搭拉地区支援步兵战斗。步兵第32团（欠第2营）集结于勒和得芒之间，为战役预备队。张国华等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分析，确定实施第三方案，并于16、17两日连续两次将作战方案报请总参审批。作战方案很快便获得了总参的批准。

克节朗反击战于10月20日7时30分发起。张国华坐在作战室里仔细地看墙上的地图，等待着前方传来消息。不久，前方的战报便不断传来。张国华在地图上不时地标出各种符号。

战报一：

“我主要突击方向的步兵155团，在炮火的支援下，迅速渡过克节朗河，向卡龙、枪等之敌展开攻击。9时45分，155团第2营攻克枪等，全歼守敌。该团1营向卡龙之敌进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连续攻克印军64个地堡，全歼守敌128名。上午11时，155团1营又先后攻克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全歼拉加普特联队第2营。”

战报二：

“我左翼步兵154团3营至11时40分连续攻克沙则、仲昆桥等据点，歼灭了守敌。该团于7时55分进至克宁乃桥。至此，克节朗地区左右两翼之敌均被我砍掉。”

战报三：

“我担任向左侧迂回的157团（欠1个营），于20日零时在枪等以西渡过克节朗河向章多前进。沿途要穿过密集的杜鹃林，有些地段部队只能从杜鹃林梢上爬过去，道路极其难行。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1时30分进至章多以西高地，向据守该地区之敌发起猛攻。”

战报四：

“我担负正面攻击的419部队二梯队，步兵155团第3营，于20日16时加入战斗，向色兄朗沟方向攻击，敌已逃窜。步兵154团主力于20时20分进至克宁乃桥，与步兵32团2营会合后，向哈东拉方向追击，21日拂晓攻占了哈东拉山口。步兵155团、157团和32团2营，21日上午分别对克节朗河以南山林、色兄朗沟和章多周围进行清剿，捕歼残敌，并以部分兵力占领了桑采拉，嘎波拉和吉山口。至此，克节朗战役首战告捷，歼灭印军第7旅和其他印军一部，俘敌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官兵1987名，并乘胜占领了达旺地区，逼近瓦弄。”

克节朗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致电嘉奖，电文如下：“这次对印度侵略军的反击作战，我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在高原严寒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

艰苦卓绝，勇猛善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取得了初战的伟大胜利。”

张国华高兴地说：“克节朗战役说明，事实上我们已不再受非法‘麦克马洪线’的约束了。军委的嘉奖电报，立即向各部队传达。”

“等一等！”邓少东副司令员匆匆走来，将一份电报送到张国华手中。

张国华接过电报念道：“前电收回……”

大家一时不知所措，个个低头不语，悄然离去。医生趁机为张国华测量血压。

张国华说：“医生，再给我几片止疼片。”

医生为难地说：“这……”

此时，赵文进副司令员走来说：“中央军委电报。”

张国华急问：“前一电报为什么要收回？”

赵文进：“军委在原电报的后面又加了两句话。”

张国华问：“哪两句话？”

赵文进回答：“第一句是‘捷报频传’，第二句是‘中央、军委极为高兴’。”

张国华站起来说：“把各团的电影队、文工团都调来前方，慰问鼓舞部队，准备更大的反击！”

10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中印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和平解决前，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

印度当局并不认输，公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建议，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组织“紧急内阁”，同时向边境调兵遣将，在达旺和瓦弄两个方向重点部署兵力。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之敌为印度陆军第4师战术司令部指挥的4个旅，共8000余人。敌军沿西山口至邦迪拉公路及其两侧地区成线式分段布防，重点在西山口。其布势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肚松”。

中央领导对这次战役十分重视，军委战略组组长刘伯承元帅也极为关注。张国华乃刘伯承的爱将之一，凭着几十年的了解，他丝毫不怀疑张国华的指挥才能，但事关重大，他还是以多病之身对老部下进行了多次指导。从刘伯承的电报中看，既有针对性的指示，又有作战经验的传授；既有开门见山的提醒，又有启发式的引导。刘伯承说：“过去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插进去，包围住敌人就是胜利。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插入、迂回、分割、包围都是机动的样式，绝非胜利的本身。对胜利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把敌人打死、打伤或俘虏。所以，当我们包围住敌人时，还要准备实施强攻，准备打硬仗，啃骨头。组织指挥要注重战前战术技术训练，夜行晓袭，出其不意。”

刘伯承的指示，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高度的责任感和对参战部队的巨大关怀。不仅张国华受益匪浅，而且对战役的组织指挥帮助极大。张国华反复思考着中央、军委领导的一系列指示，经过反复研究，他又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只打西山口和申隔宗地区之敌。这样兵力集中，把握也大；问题是歼敌太少，扩大战果时要重新组织，且敌人易于逃跑。第二，正面突破，插进一把尖刀，向两边剥开，分别歼灭敌人。这样代价大，不易全歼，弊端多不宜采用。第三，把口张大一点，吃掉西山口和德让宗地区之敌，相机攻占邦迪拉，并把主要力量放在敌左侧。这样既可以打痛敌人，兵力也够用；最大的问题是运输线长，补给困难，迂回部队任务艰巨。相比之下只要采取有利措施，克服困难，还是第三方案好。

张国华在作战部署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想把仗打大一点，硬一点，恶一点，歼灭敌人多一点。遵照军委的指示，军‘前指’决定，集中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实施反击。我们的具体打法是‘打头、切尾、斩腰、剖腹’，将敌分割数段，实施个个击破的战法，一举将敌全歼。”

参战部队遵照军“前指”的命令，分别于11月10日至15日向战地开进。开进前，张国华找各部队主要领导谈话，反复交代注意事项，尤其对担任大迂回的第11师和担任主攻任务的419部队更加关注。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对部属体贴入微。他叮嘱第11师要多带大蒜，因为在开进中不动烟火，以防喝生水生病。他将自己用的一根竹棍儿送给余致泉师长说：“竹棍儿不大，爬山过河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们迂回部队探清道路至关重要，要想尽一切办法隐蔽前进，以最快的速度对敌实施突然性攻击。你们迂回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战役的全局，一定要搞好！”

余致泉师长说：“请司令员放心，只要这根竹棍儿在手，敌人就跑不了。”

11月18日8时30分，我军向侵略之敌发起总攻。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的敌人在我凌厉的攻势下，防御体系迅速瓦解，全面溃逃。就在这紧急关头，我方通讯联络出现了问题，从18日晚至19日拂晓，指挥部与各部队失掉联系。尤其是“郭指”在报告敌人向他猛扑夺路的情况后，突然沉默无声。此时指挥部人人心急如焚，纷纷猜测会出现的情况。张国华在作战室里踱步不语，紧闭双唇极力控制着自己。他想，各部队可能是因为山地所限无法开设电台。至于郭志显，我是了解他的，他绝不会被敌人吃掉；相反，他会平安无事，也许他正与敌人厮杀，忽略了报告情况。张国华整整一夜呆在作战室里掌握战况，并将战况一一报告总参。

东方欲晓，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急忙扶椅坐下，慢慢掏出药片放到嘴里。警卫员把一壶在克节朗缴获的咖啡端来，发现司令员脸色苍白，额头上冒出了汗珠，急忙扶他躺在行军床上，转身去喊医生。经检查，张国华心跳每分钟120次，加之牙龈发炎，体温38度。护士给张国华注射完毕，医生正欲退出，只听张国华说：“医生，再给我几片止痛片。”

医生劝阻说：“司令员，你不能再吃止痛片了。”

张国华说：“现在是打仗，情况特殊嘛。”

从进军的路上到中印自卫反击战，张国华经常向医生要止痛片吃，究竟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头讲起：红军时期，张国华在福建的汀洲。一次战斗中，他头部受了伤，一颗子弹从左耳根打进去，从下颌骨出来，打掉了他5颗牙齿。1958年，他在协和医院镶了5颗假牙。因为下颌骨被打碎，牙龈经常发炎，所以他就靠吃止痛片坚持工作。

19日拂晓，参谋报告说：“首先接到155团的电报，紧接着便恢复了与各部队的通讯联系。”张国华此时果断地实施了越级指挥。19日，第157团渡过日曲河与“郭指”协同作战，攻击略马东之敌，于11时30分结束战斗，歼敌800余人。第163、164、165、157团和“郭指”分别展开了搜剿。此时，第154、155团沿公路齐头并进向德让宗方向猛追，第11师按时到达迂回终点，第32团2个营攻歼德让宗之敌。第32团第2营进至邦迪拉，从敌左侧实施攻击，于18时攻占了邦迪拉主峰。

西山口至邦迪拉战役，历时30余天，先后经历了克节朗与西山口两个作战阶段，终于取得重大胜利。我军歼灭敌第62旅、第7旅，基本歼灭第48、65、67、11旅及炮兵第4旅，共歼印军8800人（其中毙、俘豪尔、辛格准

将以下官兵 8595 人)；缴获各种枪支 5437 支，轻、重机枪 584 挺，各种火炮 343 门，直升飞机 5 架，坦克 9 辆，汽车 427 辆，以及其他武器、弹药、装备等。我东线边防部队阵亡 462 人，伤 998 人。

中国政府于 11 月 21 日发表声明，宣布于 11 月 22 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 12 月 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 1959 年 11 月 7 日前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接着，中央决定将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装备、物资交给印方，并释放全部印军俘虏。

张国华指示边防部队，将印方的大炮、坦克、汽车、武器等排列整齐，擦拭干净，灌足油料，由印方派代表签字接收。当印方看到这些被退还的武器时说：“真好，我们没想到会这样好。”外国的一些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此举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1963 年 2 月，党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张国华被通知要汇报中印自卫反击作战的情况。他连夜写了汇报提纲，觉得仍无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审阅。罗瑞卿在提纲上批了 17 个字：“此件看了，很好。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 月 19 日，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总部首长，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各省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毛泽东和刘少奇高兴地让张国华坐在他俩的中间。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在困难面前从不怯步，但在领袖们的面前却显得不够自然。他拘谨地照着提纲宣读。毛泽东幽默地频频插话，提问情况，有时不等张国华回答，罗瑞卿和肖华就代为回答了。此时，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张国华也随之轻松自如了。

当张国华汇报说这次战争规模虽小，但政治意义却很大时，毛泽东插话说：“要注重军事，只搞文，不搞武是危险的。各大区、各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你（指张国华）也是书记嘛，你当时到了哪里呀？”罗瑞卿代为回答说：“他先到麻麻，第二次到了邦岗共，可以听到枪炮声。”

毛泽东说：“离战场很近嘛。你比我小 20 来岁嘛。一打仗你的病也好了。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看来，除了董老以外，都还是可以打仗的。”

张国华接着汇报说：此次战争是在毛主席“有理有利”的策略下进行的，说打就打，说停就停，要前进就大踏步前进，要后撤就准时后撤，行动自如，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此，许多国家评论说：“中国军队打得潇洒自如，像小刀切黄油一样轻松”。还说：“一个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国家，主动决定停火后撤，使人大吃一惊。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定退还武器、弹药，这是有远见卓识的伟大行动，表现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

当张国华谈到为了实现对敌人的全歼速决，我们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做到既有正面攻击力量，又有迂回包围兵力时，毛泽东插话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看来，还是‘二五七’。战役上两倍于敌，战斗上五至七倍于敌。”

当张国华说到我们的基本战法“迂回包围，断敌后路，侧后突击，分割围歼”时，毛泽东又说：“前边防御，后边不防，绕到屁股后就完了。古今中外，谁都怕抄后路，主要是 11 师跑到它的后面去

张国华接着说：部队打得很勇猛，如果停火命令再迟到两个小时，他们就打到提斯浦尔了。此时，毛泽东插话说：“打到提斯浦尔也没关系。你经常到我这里来，我到你那里去一下也可以，有来有往嘛。”

张国华谈到参战部队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时，毛泽东又插话说：“我赞成这个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当张国华说我们的军队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千锤百炼，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时，毛泽东说：“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们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尾 声

1972年2月21日，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周恩来总理的思绪，四川省委告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在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猝然病发，生命垂危。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抓起电话指示北京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派最好的专家乘飞机赶往成都，并再三嘱咐说一定要把张国华抢救过来。然而，周恩来的关怀，医生的抢救，依然没有夺回他的生命。他还不满58岁，便过早地与世长辞了。

3月11日，西郊机场的停机坪前，聚集着很不寻常的人群。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周恩来总理拖着病弱的身体站在那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们也站在那里，中央军委各部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站在那里，李先念、郭沫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的副总理们也都站在那里。机场上肃静无声，熟人相见也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少顷，一架银白色的军用飞机徐徐落地。舱门打开，首先闪出了的是张国华的遗像，接着由亲属捧着他的骨灰盒，在李大章和严政的护送下缓缓走下飞机。周恩来首先向遗像鞠躬致哀，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也跟随其后。周恩来紧紧地握着樊近真同志的手说：“中央正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的走了……”周恩来说到这里潸然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毛泽东主席得知张国华早逝后，也深表惋惜。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次会议上，当请示毛泽东接见与会人员时，毛泽东感叹地说：“不见了，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与世长辞的噩耗传到拉萨，人们悲痛欲绝。西藏党、政、军、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张国华的遗像前堆放着无数条洁白的哈达。这位新西藏的创始人之一，这位藏族人民忠实的朋友，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喜马拉雅山上，与世共存。千里连绵的雪山，宛如一条长长的哈达，敬献给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张国华将军。

新中国首任“驻藏大臣”张经武

王勉之 徐永亮

张经武（1906～197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又名张仁山。1906年7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酃县沔渡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红军总部第6局局长、会昌教导团团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第2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3纵队参谋长、军委第2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51年6月13日，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此后历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71年10月27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9年8月27日，党中央为张经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51年，张经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代表，成为新中国的首位“驻藏大臣”。一提起“张代表”，西藏的人们立即会想起那位中高身材，并不魁梧，而且略显瘦弱，但挺拔坚毅，双目炯炯有神的张经武将军。今天，老将军虽已离我们而去，但是西藏高耸入云的雪峰不会忘记他，苍茫如海的松林不会忘记他，翻身富裕的藏族同胞不会忘记他，那些已脱下军装的“老西藏”和今天依然身着“国防绿”、永远忠于祖国的高原战士更不会忘记他。

张经武将军，以他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党性，勇敢睿智的对敌斗争策略，对藏族同胞真诚深厚的阶级感情，建设繁荣昌盛新西藏的崇高信念，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为在西藏工作过和今天仍在“世界屋脊”奋斗的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本文着重记叙他在藏工作15年的一些片断，以纪念张经武将军。

长途跋涉到亚东 劝说达赖返拉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至此，中国大陆全部解放。

欢庆的锣鼓声还没有完全停息，当时身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便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作为第一位共产党的赴藏代表，先期进藏，尽快把“十七条协议”和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面交达赖。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向张经武交代了进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十分信任地叮嘱他要挑起重担，努力完成任务。

毛泽东主席也在丰泽园接见了张经武，分析了协议签订后西藏的形势和达赖集团的动向。谈话从晚饭后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

张经武认真地聆听着，他要把毛泽东一段段精辟的分析，一句句亲切的叮嘱牢牢地记在心里，同时也在盘算着该如何完成这项重大任务。

谈话将要结束时，毛泽东把一封写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交给张经武，并说：“你把这封信亲自交给达赖喇嘛。还有什么困难吗？”

此时，张经武心里非常清楚，自清末以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挑唆下，

西藏一直在闹“独立”，并在1949年7月8日发生了“驱汉事件”。作为伟大祖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是唯一的一处还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没有人能帮助他开展工作。而且，西藏山高路远，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民俗，那里的政情，自己都不甚了解。作为第一位共产党的赴藏代表，孤身一人，能没有困难吗？但是，自己是一名1930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在这样重大的任务面前，怎么能说困难呢？张经武站起身，对毛泽东坚定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要尽一切努力，坚决完成任务！”

望着面前这张坚毅的脸，毛泽东露出了笑容。毛泽东深知这位张经武。他1932年起就在中央苏区从事军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南征北战。1946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同国民党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20年的战斗经历，已经把他锤炼成一位文武双全，善于在各种复杂艰险环境中审时度势、应付有方的共产党员。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当毛泽东送张经武到门口时，又再次嘱咐道：赴藏任务重大，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做好上层统战工作。一定要设法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深夜，与张经武在抗日战争时期结为伴侣的杨岗还在等着他。当张经武告诉她又要远行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他的进藏任务时，深知张经武每次接受重大任务都是欣然受命、义无反顾的杨岗还是被震动了。望着处在兴奋状态中的丈夫，她轻轻地说：“我和你一起去吧！”

“一起去？”张经武当然希望杨岗陪他一起去。记得1939年冬季，党中央让他和郭洪涛率代表团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时，就是杨岗陪他一同前往的。从山东到延安，今天不算什么；可那时要通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边打边走，借宿老乡家的土炕，吃小米饭，啃高粱面窝窝头，走了一年才到延安。可是这次到西藏，路途万里，高原空气稀薄，还不知会碰到什么艰险呢。于是，他劝慰杨岗说：“你身体不好，西藏形势如何还不清楚，暂不要去。等打开局面，看情况再说吧。”

1951年6月13日，张经武一行离开北京。为争取进藏时间，他们绕道香港、新加坡、印度，从亚东入藏。

一到香港，就遇到了乘船还是乘飞机的问题。如果乘飞机，因为中途要多次换机，所携带的几十箱礼品无法同机随行。如果乘船，路途时间需要一个多月，而此行时间紧迫，尽快与达赖接触是当务之急。

张经武十分清楚，为了尽快解放西藏，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开始向西藏进军。西南、西北军区都派人赴藏说服达赖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但均遭噶厦政府的拒绝。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为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梦想，一边采取拖延的办法抵制党中央提出的和平谈判建议，一边陈兵金沙江边企图用武力阻止我西进大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一举摧垮了藏军的防线。惊慌失措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达扎被迫辞职；达赖亲政后带领部分官员逃亡亚东，相机逃亡国外。

为了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暂不西进，再次劝说达赖派出和谈代表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才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和谈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一个月的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但是，达赖不但对协议迟迟不表态，反而离开拉萨南下亚东，准备逃亡国外。所以，中央才决定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代表面见达赖，向他详细解释协议的条款，争取达赖不逃亡国外，早日对协议表态，并

敦促他尽快返回拉萨。为此，必须争取时间，早日在亚东与达赖会面，决不能因为路途的耽搁而失去时机。

于是，张经武决定乐于泓、彭哲、郝广福、李永珂 4 人同他乘飞机先行，其余的人携带物品乘船随后赶到亚东。

大家考虑西藏气候恶劣，空气稀薄，环境艰苦，加之张经武年近半百，身体比较瘦弱，建议让中央专门指派给他的徐乐天医生同行。但是张经武说：“后边走的人多，路上走的时间又长，更需要医务人员。我不需要医生，人少行动更方便。”大家又考虑他沿途的安全，建议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天柱随机同行，张经武也没有同意。

从香港到新加坡的班机每天都有，但从新加坡到加尔各答每星期只有一趟班机。因此，他又几次催促工作人员一定要订好飞往加尔各答的机票，掌握好航班的情况，绝不要在路上耽误时间。

7 月 7 日，张经武同进藏和谈代表一行 10 人从香港起飞。8 日下午，到达加尔各答。随后，他们又乘飞机到西孟加拉邦北部小城锡里格，从那里再改乘汽车，于 7 月 10 日到达印度北部通往西藏交通要道上的噶伦堡。

噶伦堡，是 1888 年、1904 年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的桥头堡。40 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个诡秘的山庄。居民中除印度人外，还有尼泊尔人、西藏人和一些身份不明的西方人。这里是特务、间谍云集之处，而这些人目标直对着西藏。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挥着西藏上层中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虽然“十七条协议”已经签订，但他们仍然进行着破坏协议的勾当。

当张经武一行到达噶伦堡时，先于他到达的由亚东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来迎接中央代表的帕里宗本（相当县长）雪康·索朗塔杰和一些西藏在噶伦堡的商务代表、大商人等，在张经武下榻的一个别墅门口迎接我方代表。

进屋后，张经武关心地询问雪康：“达赖喇嘛在亚东身体可好？”马上又说：“你辛苦了！”这两句话，使对方感到亲切和蔼，紧张的心情放松了。雪康恭敬地回答：“达赖喇嘛佛体康泰。”

随后，张经武约见了一些西藏在噶伦堡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解释协议精神，以及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此次赴藏的目的。他特别对“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的政策作了反复解释和说明。张经武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诸位朋友如有机会，请将今天的约见和谈话，向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转告一下。”

当晚，张经武出席了西藏在噶伦堡的商务代表处、四品官邦达养丕和藏族大商人联合在喜马拉雅饭店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宾主频频举杯，气氛还算热烈。这时，一个名叫麦克仲萨的已经 80 岁的英国人，摇晃着长满白发的脑袋，捶着干瘪的胸膛，用藏语哀伤地唱着：“宝在手中不爱宝，失去宝贝悔恨迟……”显然，这是帝国主义分子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在发泄自己的愤恨。站在一旁的西藏噶厦政府的孜本夏格巴，这个鼓吹“西藏独立”的急先锋也乘机喊了一句“噶丹颇章万岁”（西藏地方政府万岁）。

这是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开挑衅，是对“十七条协议”的反动。面对这一猖狂的挑衅，张经武当仁不让，理直气壮地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张经武深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虽已签订，但离真正执行协议还有相当距离。这第一次撞击，预示着今后路上还会有更多的风雨。

在噶伦堡，我方得到了达赖转来的电话，告知他已准备返回拉萨。张经武心里明白，这是达赖从维护自己地位考虑作出的决定，但不管怎样，毕竟

是一件好事。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张经武不顾旅途的疲劳，决定第二天兼程赴亚东。

从噶伦堡到亚东有两三天的路程，途中要经过锡金。张经武一行在锡金停留一天后，又改为骑马，匆匆向东北方向翻越喜马拉雅山南侧的群山，向西藏边城亚东前进。

路途中，几个藏胞给雪康送来一小袋糌粑。张经武看到雪康在吃糌粑，就提出也要吃。雪康说，“现在你们不能吃，连我们在印度住的时候也不吃，怕不服水土泻肚。”

张经武亲切地说：“我们要学习藏族的生活习惯，就得先学会吃糌粑呀。”

雪康说：“在路上吃，万一闹起肚子来就不好办了。要吃，到了西藏再吃吧。”

张经武还是笑着吃了一小团糌粑，愉快地说：“明天我们就可以进入我国领土西藏了。”

“是的。”雪康说，“西藏地方部队将在乃堆拉山口迎接我们。”

7月13日，张经武一行到达海拔4300米的乃堆拉山口。张经武跳下马来，从山口向四周眺望，只见碧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空气洁净得像水洗过一样，连绵的雪山好似翻着白浪的波涛，山腰间莽莽苍苍的松林又像是雪山女神绿色的围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我们到家了！”稍顷又问雪康：“怎么不见藏兵呢？”

雪康也有些生疑，只好说：“按说应该到了，不知怎么回事。”

张经武一心想着快到亚东去，并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仍然高兴地对乐于泓、雪康和西藏代表说：“不来也好，可以省掉那些繁琐的礼节。”他伸手一指：“走吧！到山下喝一口祖国的泉水！”

下山走了约1千米，才见到因为错估了迎接时间而匆匆赶来的藏兵。他们在路边一片稍为平整的草地上整队站好，向张经武行军礼表示欢迎，并献了哈达和油炸果子。张经武举手还礼后，继续前行。

14日，张经武一行抵达距亚东10余里的仁青岗时，噶厦首席噶伦然巴·土登滚秋率领部分僧俗官员和达赖警卫团官兵前来迎接，并举行了欢迎仪式。张经武一行随后前往亚东下司马，住在噶厦准备好的房子里。

下鞍卸装还未及休息，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厦，表示希望尽快与达赖喇嘛相见。

15日，噶厦的几个噶伦拜见张经武，告知16日达赖喇嘛将在距亚东10余里的东噶寺与张经武见面，并提出会见达赖喇嘛时要有仪式。

张经武问：“什么仪式？”

噶厦官员说，见面时，达赖升座，两旁百官侍奉。张经武进去后，达赖下座迎接，接过毛泽东主席信件后仍升座。张经武的座位设在达赖右下侧。

张经武很清楚，“升座”是封建帝王与臣下相见的仪式，不能同意。这种安排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现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隶属地位。这是个原则，必须坚持。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只能作些适当让步。他嘱咐身边的乐于泓：“政治上西藏地方政府要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宗教上我们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

乐于泓向噶伦们指出：“张经武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会见时达赖喇嘛不能升座。张代表上山后，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到达赖卧室见面，送交毛主席的亲笔信，进行交谈。”他还用事实向噶伦们说明中央平等团结

的民族政策，介绍了西藏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时，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主席接见代表团时也平起平坐的亲切感人情景，并指着坐在旁边的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说：“这些，他们都是在场亲身经历过的。”

凯墨、土丹旦达都连声回答：“是的，是的。”

第二天上山后，张经武一行在东噶寺外帐篷中稍事休息，便到达赖内室。达赖从座位上站起来，跨前几步迎接，并让座坐下。

张经武看着 16 岁的达赖喇嘛，亲切地问候他身体健康。

达赖有礼貌地回答道：“很好。”并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向张经武道了辛苦。

张经武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非常高兴。”说着，他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及两份协议附件。他告诉达赖，毛主席赠送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押运，从香港海运到印度，不久即可到达，希望您早日返回拉萨。

谈话中，张经武介绍了和平谈判的情况和“十七条协议”的内容。达赖说话不多，但对张经武的每句话都非常注意倾听，有时还点头赞同。但对协议没有表态，只说阿沛不久即可返回拉萨，待拿到正本以后，再由噶伦们讨论。在商量返回拉萨的时间时，达赖停了一下说：“今天是藏历 6 月 12 日，我准备 6 月 18 日（公历 7 月 21 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你看是我先走，还是你先走？”

张经武回答说：“您人多，行动缓慢，最好先走。”

中央代表同达赖喇嘛的第一次会见，对方虽不热情，但还有礼貌，并且同意返回拉萨。

与达赖会见后，张经武立即将会见的情况拟写了一份电报，由机要译电员郝广福译成密码，交由西藏地方政府电台发往新德里，再经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转发中央。

当乐于泓提出由机要译电员和电台联系时，凯墨显得有些紧张。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电台台长福克斯是英国特务，怕被发现。

次日，噶厦政府派柳霞·土登塔巴和凯墨·索安旺堆来为福克斯求情说：“有个名叫福克斯的英国人，在我们电台工作。他在西藏的时间很长，老婆是藏族，已有两个孩子，本人要求继续留在西藏工作。为此，噶厦派我俩向代表报告这件事，并要求允许他继续留在西藏工作。”

张经武严正地指出：“福克斯是英国人。以往英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一贯搞间谍活动，他们编造谣言，挑拨离间，破坏藏汉团结，阴谋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接受。我们能让福克斯继续留在西藏吗？”为了给噶厦留有余地，又说：“我看，这件事由西藏人民来决定吧。”

事后，福克斯听说了这件事，又得知达赖已准备返拉萨，吓得跑到噶伦堡去了。

在起程赴拉萨之前，噶厦根据达赖的指示，特地从达赖的马厩里挑选了两匹枣红色的好马，分别送给张经武和乐于泓。

7 月 21 日，张经武送达赖起程返回拉萨后，觉得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甚为兴奋，便对翻译彭哲说：“走，去转一转。”

7月的亚东，阳光明媚，流水潺湲，满山的野花送来阵阵馨香。在亚东河边的沙滩上，他看见几个藏族孩子在玩耍，一下子觉得自己仿佛年轻了许多，便疾步走到孩子们中间，仗着过去学过点武术的底子，同孩子们一起翻跟斗。

豪放与天真的笑声，飘荡在亚东河谷。

7月23日，张经武一行从亚东起程，并在8月8日先达赖到达拉萨，完成了他作为第一位共产党赴藏代表的重要使命。

只身登上布达拉 责成达赖除叛匪

1952年的上半年，对于张经武来说，是一段极不平静的日子。

1951年8月17日，达赖喇嘛平安返回拉萨。9月9日，王其梅率领的进藏先遣支队到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和谈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12日也到达拉萨，并向达赖呈送了“十七条协议”正本。9月28日，张经武向达赖喇嘛转赠了毛泽东主席送的礼品，并同达赖进行了会谈，达赖祝毛主席身体健康。10月1日国庆节，拉萨上空第一次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0月24日，达赖喇嘛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拍发了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10月26日，毛泽东电复达赖喇嘛，感谢他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同一天，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主力到达拉萨。1952年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正式成立。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西藏地方政府本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努力建设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此时已是中央驻藏代表兼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张经武清醒地认识到，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并不等于就会执行。从1951年5月23日协议签订，到10月24日达赖表示拥护协议，这5个月零1天中，我方代表为说明解释进而贯彻落实协议，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即使以阿沛为首的5位和谈代表在噶厦会议上据理力争，以全家性命和财产作担保，取得了大多数官员的同意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仍旧指使手下向进藏人员抗膀子、扔石头、吐口水，封锁粮食，抬高粮价，嫁祸于解放军。鲁康娃还狂妄地叫嚣：“别看我们在昌都打了败仗，现在饿肚子比打败仗还要难受！”这一切表明，西藏反动势力妄图把解放军赶出西藏，最终撕毁“十七条协议”，继续搞“西藏独立”。对于如此尖锐复杂的斗争必须认真对待，稍一不慎，已经取得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11月，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策动下，一个以商人和无业流氓为骨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拼凑而成的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在拉萨游行示威，制造混乱。

1952年1月13日，鲁康娃召集噶厦官员在“外交局”二楼开会，作出了“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走”的决定，在拉萨发动了武装骚乱。

1952年3月底，伪“人民会议”分子向噶厦办公室送交了一份《西藏人民请愿书》，并受到了接待。洛桑扎西当即表示支持。鲁康娃说：“此举对西藏有好处，开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解放军不是尊重人民的意见吗？既是西藏人民的请愿书，我们就原原本本地转呈张代表吧。”

第二天——3月31日，伪“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了2000多人，

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地桑多仓，并在四周屋顶上架起机枪。一伙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街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噶厦派秘书将“请愿书”于4月1日送给张经武，并要求接见伪“人民会议”代表，大有不接受请愿条件便以武力相见之势。

在这严重时刻，张经武住地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只有一个警卫班。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张经武一面布置警卫班和工作人员严密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立即派人请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噶伦，共同听取伪“人民会议”代表陈述意见。

其实，不仅噶伦们早已知道“请愿书”的内容，张经武又何尝不知道呢？从进藏以来出现的种种情况，就可以判断出，“请愿书”的内容无非是要解放军撤出西藏，反对改编藏军，西藏的旧制度永远不能改革。一句话，就是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建立“西藏独立”。

张经武也清醒地看到，在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那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1951年9月17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在给达赖的信中写道：

“至尊达赖喇嘛：

美国政府带着非常同情的心情注意到了长期以来您为阻止中国共产党进军西藏、消除西藏的自治所付出的努力……本国政府认为，必须把抵抗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当作长期性的问题来看待，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会受到西藏及邻近地区的政治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限制。当然，美国并不能支配这些条件，可是它准备对现在和将来抵抗共产党入侵西藏的行动给予支持，并且将提供切实可行的物资援助。至尊当然会理解，美国向您提供上述援助和支持的打算的前提是您离开西藏、公开否认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缔结的协议，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对共产党方面予以合作。”

张经武明白，现在美国在朝鲜半岛点燃了战火，又在中国西藏煽阴风，这一东一西的配合，都是针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作为中央驻藏代表所面临的这场斗争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张经武严正地向全体噶伦指出，这次骚乱是有人在背后唆使的，参加骚乱的群众不明真相，他们没有责任。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应由西藏地方政府承担。

在场的伪“人民会议”代表和心怀鬼胎的噶伦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如芒刺身，极不自在。

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张经武又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让他们留下“请愿书”，听候答复。

4月1日，几个噶伦又来向张经武转达伪“人民会议”的“请愿书”内容。此时，大批藏军将张经武住地、银行、外事处、阿沛住宅秘密包围，并向阿沛住宅开枪袭击。张经武已得到情报，反动分子约定晚上11时动手。由于形势非常紧张，几位噶伦认为噶厦难于维持治安，且天色已晚，就提出与张经武一同留在工委应付突发情况。张经武与工委其他负责同志担心坏分子借口扣留噶伦而寻衅，就让几位年老的噶伦回家，只留下索康、拉鲁和阿沛3人。

这天夜里，张经武同几位噶伦一同打麻将，静观事态发展。然而心怀叵测的索康一会儿打麻将，一会儿喝酒拉琴，故作镇静。拉鲁坐立不安，一边码牌，一边口中念经求佛。阿沛则正气在胸，心怀坦荡，同张经武不时商讨

一些问题。

由于工委和军区及时采取了军事防范措施，伪“人民会议”分子未敢轻举妄动。也可能由于索康留在工委，反动分子担心索康的安全未敢动手。也许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虽然当夜这场蓄谋已久的武装骚乱未能得逞，但社会治安一直不见好转。为此，张经武利用书信紧急通知达赖，通报了拉萨的紧张形势，指出这次骚乱是有幕后人物支持的，要求达赖“即刻下令，予以有效制止”，并“解散所谓的‘人民会议’”。

4月2日，西藏军区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充分磋商后，联合发出了维持拉萨治安的布告。但是，由于伪“人民会议”有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幕后支持，非法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猖狂。就在这一天，伪“人民会议”继续在布达拉宫前的印经院开会，扬言“要继续组织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继续包围张经武住地，散布“噶厦已与三大寺订立盟约，定于藏历3月3日（公历4月27日）联合攻打解放军”，“鲁康娃打了卦，卦上显示，决不向解放军认输，一定要打下去”。有些贵族经营的商店故意抬高粮价，并造谣说：“粮食涨价，是解放军把粮食买光了。”拉萨地区不断发生割断电话线、袭击解放军驻地和哨兵的事件。

4月4日，张经武接到中央指示：“你们应对达赖采取坚决支持爱护的态度，帮助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办法。”

于是，张经武约请达赖面谈。达赖答复于8日见面。

当时，达赖居住的布达拉宫布满藏军和武装喇嘛，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也经常达赖身边。张经武只身前往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也许有人会说，发生了反革命武装骚乱，发动群众起来，或令人民解放军武装平息不就行了吗？但是，“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这就确定了当时西藏工作的特殊性：一切事情，包括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也要同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正是同在内地进行革命斗争有区别的地方。

工委和军区开会，共同分析了张经武去布达拉宫的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去，张代表有生命危险；不去，听任目前的局面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在会上，大家分析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其一，鲁康娃、洛桑扎西对张经武下毒手，制造流血事件。如果这样，鲁、洛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我人民解放军将一举歼灭所有不法分子。其二，鲁康娃、洛桑扎西将张代表软禁在布达拉宫，同时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发动进攻。这样，西藏反动上层势力就自绝于人民，我解放军将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其三，达赖喇嘛接受解散伪“人民会议”和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职务的要求。

张经武分析说：“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的是第二种情况。但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必须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同他讨论处理的办法。这既能说明我们对他的尊重，也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和教育其他上层人士，有利于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总之，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坚持和平解决。万一反动分子武装挑衅，我们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更能赢得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

张经武接着从历史上分析：“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尽往坏处想。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清代驻藏大臣有78任，被杀害的只有1任。那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事，因为清朝当时在西藏没有驻军，驻藏大臣傅清被杀。以后，清朝在西藏派驻了军队，就再没有发生过谋杀驻藏大臣的事件。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拉萨，我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去向达赖转达中央的态度，量他们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量他们也没有这个胆量啊。”

随后，张经武又笑着说：“如果我被软禁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宫顶，同达赖一起观看同志们的自卫还击作战。你们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后他爽朗地说：“即使万一被害，也是为革命，为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嘛。”

张经武以透彻的分析和沉着、有力、乐观、刚毅的情绪，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4月8日，张经武去会见达赖喇嘛。一行人骑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张经武把警卫班全部留下，并对他们解释说：“不必带这么多人进去，带人越少，越证明我们的诚意。”于是，他只带了翻译彭哲和两位保卫干部，徒步进入布达拉宫。

军区领导为了防止意外，还为张经武做了几面红布小旗交给警卫班，嘱咐道：万一反动分子把张代表扣起来，就摇动小红旗，打信号弹，部队就立即冲上布达拉宫，救回张代表。张经武走后，军区领导又命令作战参谋杨一真带上望远镜和信号枪，在西面广场小河边严密观察。一旦山顶摇起红旗或打出信号弹，杨一真也立即打出3发信号弹。军区领导还特别强调，“事关重大，千万不能疏忽大意”。

布达拉山上，到处都是藏军和武装喇嘛，而张经武却视若无睹，神态自若地被迎进了达赖的住室。

张经武同达赖谈话，请达赖以他的名义张贴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

达赖解释说：“武装骚乱是不好的，已下令司曹加以禁止。但是对代表（指伪“人民会议”代表）所提意见，请用和平方法进行解释，并对他们适当安慰，研究适当办法再解散，以免引起麻烦，发生事端。”

张经武说：“中央一直本着‘十七条协议’的方针，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就是目前所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和平的范围，中央仍然本着和平解决的愿望。希望达赖喇嘛认真调查事件真相，除少数首恶分子外，其余一律不加追究。”

达赖问：“如何进行调查？”

张经武说：“这是西藏地方发生的事件，调查责任应由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如果需要，解放军可以加以协助。”

这次会见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一直在观察动静的杨一真参谋和在作战室等待消息的军区领导，却觉得时间好像一下子凝固不动了。

忽然，杨一真发现布达拉宫后门走出1个人，接着又走出来3个人。他兴奋地擦了擦眼睛，继续仔细观察。当确认是张经武等人平安返回时，他急忙奔向作战室，大声报告：“张代表从布达拉宫回来了。”

此时，守候在作战室的张国华、谭冠三和参谋长李觉才放下心来，点头笑了。张国华说：“张代表总算回来了，但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详情还不知

道。通知部队，继续保持警惕。”

情况确如张国华所料，张经武会见达赖后，形势并没有明显好转，达赖借口“研究适当办法”，迟迟不作答复。

4月中旬，张经武召集全体噶伦，再次商谈伪“人民会议”问题。他背靠二楼的窗户说：“伪‘人民会议’干尽了破坏团结、违犯协议的事，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两位司曹在暗中支持的。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一直在忍让着，现在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他指着窗外继续说：“我们无法再退让了，再让就要掉下去了。”

他又坚定地说：“我们同二位司曹已经无法合作相处了。请你们转告达赖喇嘛，本代表从今天起，不再承认二位司曹的职务，因而也将不再同他们俩人商讨任何问题。”

随后，张经武再次写信给达赖。信中列举了鲁康娃、洛桑扎西一贯破坏协议的罪行：“第一，坚持‘西藏独立’，分裂祖国。2月18日在噶厦全体会议上公开声称‘西藏是独立国，自己有自己的国旗，并在泛亚洲会议上悬挂过’。他们还把解放军进驻西藏诬蔑为‘侵略’。第二，不执行协议规定，对协议中几项重要规定，例如改编藏军等，都持反对态度。第三，假借民意，树立私人势力，阴谋叛乱，主持非法的所谓‘人民会议’（具体情况略）。第四，不经西藏军区司令部批准，擅自将国防要地日喀则驻军炮兵代本调回拉萨，阴谋军事叛变。第五，不尊重达赖喇嘛的亲政权利，屡次违抗达赖喇嘛的命令，破坏达赖喇嘛的政教威信……”他最后写道：“请您命令噶厦从即日起在您的直接领导下与本代表直接联系办公。”

4月27日，达赖被迫宣布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二人的司曹职务。

5月1日，噶厦发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至此，伪“人民会议”事件宣告结束，反动分子以及在背后唆使的美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场骚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这场斗争后，尽管西藏地方政府中仍有一些反动分子在暗中支持伪“人民会议”的活动，但西藏的形势开始逐渐明朗，出现了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良好局面。

不顾自己体多病 护送达赖进北京

1954年春天，中央决定9月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根据人口比例给了西藏9个代表名额（达赖方面4人，班禅方面2人，入藏工作干部3人），并提出请达赖和班禅一同出席，由张经武同他们协商确定。中央还指示张经武：如达赖决定参加第一届人代会，务于9月5日前到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顾。现在即应着手部署交通和其他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指定专人负责，随时检查。

达赖将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情，在噶厦内部上层人士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有一个上层喇嘛说：“宗教重要还是大会重要？达赖喇嘛现在才20岁，正在学经，要到23岁才能考‘格西’（一种宗教学位），如去内地一二年，是会妨碍学经的。加上路途遥远，水土不服，也不好办。”

又一个上层喇嘛接着说：“我在国民党时期任过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处

长。国大选举时也说很重要，其实没什么。达赖喇嘛 1950 年去亚东的时候就有 2000 多喇嘛劝阻，还有一个喇嘛跳河死了，那还是在西藏境内。这次要到北京去，三大寺反对就不好了。”

阿沛·阿旺晋美解释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他针对两位上层喇嘛的话又说：“共产党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说一百条，有一条能实行就是好的。共产党所决定的事是一定要实行的，不能与国民党相比。达赖喇嘛 1950 年去亚东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混乱情况，大家都清楚。西藏和平解放后，地方秩序很好，这次又是去北京，更不能与过去去亚东相比。”

另一个上层喇嘛说：“达赖喇嘛是佛教之主，人民对他很信任。如果去北京，回来后就没有人信仰他了，岂不糟糕？达赖喇嘛是不能去北京的。”

有的喇嘛也乘机说：“达赖喇嘛去北京，上天是会降灾的！”

会上争论不休，有赞同的，有反对的，众说纷纭，毫无结果。最后决定，将会议全部意见报告达赖喇嘛，由他自己辨别是非，作出决定。

张经武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刻同达赖就有关代表名额、分配办法及初步人选进行了协商。之后，达赖还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写了回信。

5 月 13 日，张经武前往罗布林卡（达赖夏宫），将毛泽东主席的复信亲自交给达赖。

谈话中，达赖问张经武：“此信是否有人知道？”当张经武回答说“没有”之后，达赖又说：“以后我不经任何人向毛主席写信，可否由张代表转？我赴京开会之事，噶厦和译仓尚无肯定意见。我个人认为赴京开会，可以见到毛主席，无论对政治、对宗教都有好处，但是否去，这还不是最后决定的意见。”

张经武知道在此之前，达赖已多次向周围的人流露过想到北京去的愿望，就亲切而又明确地对达赖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是很重要的会议。我认为你的意见是很对的，赴京开会对于政治、宗教都有好处。当然，你什么时候去北京，中央都是欢迎的。对于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特别关心和照顾。今年你是否赴京开会，主要由你自己考虑决定，并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为好。”他仔细地告诉达赖：“赴京之前，必须向僧俗官员和各大寺僧众做好思想工作，并做好准备，主要是在你离开拉萨期间，要交代安排好噶厦、译仓和三大寺等僧俗官员，与进藏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更加团结，共同保卫地方治安，把西藏的地方工作做好。”

最后达赖表示，待他听取噶厦和译仓对他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事意见后，如有疑难问题，再同张代表面谈。

6 月 6 日，张经武再次会见达赖喇嘛，并将中央批准的西藏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选名单正式通知达赖。达赖当即表示赞同。

随后，达赖召开了噶厦和译仓全体官员会议。会上，达赖宣布自己已经“打卦”，决定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从 6 月 7 日到 9 日，连续召开了噶厦、译仓全体官员会议和中心官员会议，讨论达赖赴京开会的事。直到第三天，才最后一致同意达赖喇嘛赴京开会。

10 日下午，全体噶伦、仲译钦波、孜本和三大寺现任、卸任堪布及各级官员代表，一起面见张经武，呈递了《关于达赖喇嘛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意见书》。意见书除了表示同意达赖赴京外，附带了两个条件：其一，来往时间最多不超过 10 个月，无论如何不要超过 1 年。同意后，要求张代表给一个书面保证。其二，达赖喇嘛饮食有一定习惯，希望到内地仍能按照西藏习惯予以照顾。

面对这份意见书，张经武明显地感觉到，这显然是少数人企图阻挠达赖赴京的借口。同意“给一个书面保证”吧，作为一个中央驻藏代表，显然不能在这种无理要求面前妥协；不“给一个书面保证”吧，又担心已经做了的许多工作会前功尽弃。

此时的张经武真有点左右为难了。他反复向这些人解释达赖此次去北京开会的重大意义，说明生活完全按照本人习惯安排，并当即保证：“有我在，就有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的安全我完全负责。

不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致电达赖：“会议时间约月余，加上往返时间共约 5 个月。会后在内地留多少日子，何时返藏，统由你决定。需要我们帮助之处，我们当尽力帮助。”

张经武将中央民委的电报转给达赖，并对僧俗官员们说：“中央的电报讲得很清楚，这比我‘给一个书面保证’更有用吧？”

7 月 15 日，张经武陪同达赖一行离开拉萨。拉萨各阶层人民、进藏部队和干部数万人拥上街头热烈欢送，几乎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进京队伍浩浩荡荡，场面颇为壮观。但是同西藏关于达赖出行仪式的定制相比，那次出行也只能算作轻车简行了。

张经武清楚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对于中央关于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的指示，张经武是掂得出分量的。更何况当达赖决定赴京开会后，拉萨就传出谣言：“达赖喇嘛这一去就回不来了”，“达赖进京将触怒天神，灾难将降临西藏”……一旦达赖在路上出事，怎么向中央交待，怎么向西藏人民交待啊！对从 1951 年 6 月离开北京，3 年后第一次返回北京的张经武来说，此时的心情，沉重多于兴奋。他决心，行走不离达赖左右，休息不离达赖左右，住宿搭帐篷仍不离达赖左右。必要时，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好达赖。

从拉萨出发后，张经武和达赖先乘马车，穿越了 2000 多里长的拉萨河谷，然后改为骑马而行。

此时虽然晴空万里，是西藏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是高原的气候瞬息万变，甚至有时在一天之内就能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况且，千里跋涉，路途遥远，康藏公路才刚修到通麦。此去通麦，高山峡谷，骑马也得 20 天。当时正逢雨季，随时可能遇到山洪暴发。更严重的是泥石流。雨季里，雪山上积雪融化，轻微的雪崩就可能引发高山冰湖的溃决，奔泻的湖水将会冲垮山体，然后裹挟着山上的泥石下滑，撼天震地，摧枯拉朽，从山谷中汹涌而来，眨眼间就会把树林、村庄吞没。历史上，来往商贾、朝圣拜佛者，包括解放军进藏部队，已不知有多少人葬身于泥石流之中。

已是 48 岁的张经武，一路上精心照顾着 20 岁的达赖喇嘛。除了路上左右相随，每天出发前和到达住地后，他都要去达赖的帐篷看望并慰问，向噶厦官员了解达赖的身体情况，派自己的随行医生送医送药。每逢休息的日子，总要陪达赖聊天畅谈，问寒问暖，关怀备至。

人往往会有这种情况：本来身体已经患病，但由于心里始终挂念着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反而觉得自己没病了。这恐怕就是我们常说的，当一个人被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时，就会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物质力量。

此时的张经武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尽管上路后他经常被感冒、痔疮、胃肠不适及腹泻等疾患所困扰，但他全然不顾，也不告诉别人，总是心神专注地关心着达赖。

一路上，达赖和噶厦官员按照藏族习惯另起炉灶。沿途各宗（县）、谿卡（庄园）不断送来生活用品和丰盛的食物。尽管如此，张经武还是考虑到达赖旅途劳顿，需要营养。一天，他和副官为达赖送去了自己携带的20多听食品罐头。达赖欣然接受，对张代表的关怀表示感谢。

大队人马来到了接近泥石流多发地段的一个名叫拉玉的地方。张经武顾不上一路的风尘劳累，立即在筑路部队和群众中了解天气和泥石流的情况。

战士和群众告诉张经武，近日内暴发泥石流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山石松动，山坡上拳头大、斗大的石头飞滑下来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出现。有的战士告诉张经武，对泥石流也绝不能大意。前几天泥石流突然下来，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地被吞没了。为了保证达赖一行安全通过，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抢修塌方地段。现在公路虽已修好，但仍不能通车。

张经武对战士们的伤亡非常悲痛。但是，他更了解自己的战士。在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是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他反复向筑路部队领导交代，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一定要保证达赖一行绝对安全地通过危险区。

他走进达赖的帐篷，向达赖通报了道路情况，也告知了一个排的战士牺牲的消息。他对达赖说：“明天过泥石流多发地段，我们得下马步行。我要亲自挽着你的手，全程护送你走过这个危险地段！”第二天，当达赖一行来到泥石流多发地段泊龙时，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山坡上，一步一岗，两步一哨，面对山坡，背向行进的行列，手持红旗，随时准备发出躲避信号。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暴发的谷口地段，硬是人挨人地用身体筑成一道人墙，来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

地处泥石流区的这段路，一面靠山，山高入云；一面临河，河道在十几米深的山崖下。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嶙峋的泥石流区时，年近半百的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靠山的一边，保护、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看到山坡上长长的一列人墙，不解地问：“他们在干什么？”当翻译告诉他，那是战士们在用身体挡住可能飞滚而下的山石保护他安全通过时，达赖虽然没有说话，却看了战士们一眼，悄悄地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山坡上，战士们用身体筑起了长长的人墙。微风中，一面面红旗在轻轻飘动。山路上，体弱的中央驻藏代表搀扶着身着华服的达赖喇嘛，紧张而又小心地通过乱石隘路。这是一幅何等壮烈而感人的画面啊！

后来，筑路部队的干部战士们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都说：“很幸运，那天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我们确实是准备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来保护达赖喇嘛的。”

当前边的路还未修好，无法行走时，筑路部队就在山区原始森林中砍伐树木，临时铺出一条路。有时过河无桥，筑路部队就用圆木搭起临时桥梁，上边用松枝铺平，保证达赖一行安全通过。

8月13日，张经武和达赖一行经过20多天的跋涉，抵达波密地区的加龙坝。这里是康藏公路接头的地方。

进藏部队参谋长、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和后方部队副司令员张忠，带着全是由排以上干部组成的队伍和60多辆清一色的嘎斯69小汽车，早已迎

候在路旁。

从此以后，达赖一行改乘汽车。但是张经武仍不敢掉以轻心，每天都与北京联系，随时向中央报告达赖的行程情况。中央很快通知雅安和成都等沿线省、市政府，为迎接达赖喇嘛作好准备。

达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和热情周到的接待。

从成都，达赖一行乘火车北上。在西安与先期到达的班禅会合后，改乘专列火车，于9月4日到达北京。

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远道而来的达赖和班禅。在火车站，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为达赖和班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热烈的锣鼓声和欢腾的人群中，张经武如释重负，笑嘻嘻地轻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总算将这位佛爷送到首都了……”

广交爱国朋友 心系百万农奴

张经武到西藏之前，就从各方面了解到，西藏有两大阶级：农奴主阶级，他们人数少，只占西藏总人口的5%，但却占有几乎全部的耕地和生产资料；农奴阶级，他们占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然而却没有一寸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只好依附于农奴主阶级。农奴主对农奴可以转让、抵押和买卖，甚至生杀予夺。张经武和他的战友们到西藏后，就是在这种阶级背景下开展工作的。

“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这就构成了西藏工作的特殊性。比如，内地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西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就连宣传土改和阶级斗争都不允许。甚至《白毛女》这样的电影也不能在群众中放映。当时在西藏开展任何工作，都只能和上层人士协商解决，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宣传协议和执行协议。

为此，张经武在西藏广交上层爱国朋友的同时，心里始终装着百万农奴。从以下几个真实的事例中，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张经武其

事例一：布施僧俗众生，宣传“十七条协议”。张经武到拉萨不久，经请示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决定向三大寺的喇嘛和拉萨的乞丐进行一次布施。中央指示，发放的数额一定要高于国民党时期。为此，经商量我方请噶厦地方政府给开一份名单，告知三大寺喇嘛的人数及拉萨贫民和乞丐的人数，以便准备布施数额。不久，西藏地方政府开来了一张单子：哲蚌寺8000人，色拉寺6000人，噶丹寺4000人，拉萨市内乞丐500人。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记载，五世达赖喇嘛规定：常年各寺居住的僧侣人数为，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噶丹寺3200人。然而，噶厦开列的名单为什么大于历史上法定的人数？为什么三大寺的人数都是整数？我们不得而知。张经武指示说：“就按噶厦开列的人数准备。不过拉萨市乞丐和贫民可不止500人，我们就按800人准备吧。”

从1951年10月18日到11月11日，张经武在三大寺、小昭寺、上下密院、藏医院以及拉萨，为僧众和乞丐布施。

三大寺布施的金额为：普通喇嘛每人1份，1份为藏银20两（折合银洋2元）；寺内的堪布、铁棒喇嘛每人20份；达赖喇嘛一人40份。然而在西藏为乞丐布施，在历史上无此先例，共产党是第一次。张经武决定，乞丐每

人1份，藏银5两。在布施前，张经武又找上层喇嘛座谈。各寺高僧对中央的布施均表示感谢，对“十七条协议”中的“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达赖喇嘛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寺庙的收入不予变更”等规定都表示拥护。然而对给乞丐布施，开始西藏地方政府持反对态度，后经协商同意，却把人数大大压缩。不仅如此，他们还造谣说“领了共产党的布施要下地狱”，甚至还派人威胁乞丐不准领取布施。可是，当我们在拉萨某广场为贫民和乞丐布施时，来的人数远远超过500人。于是我们又多准备了些布施数额。拉萨的街头巷尾，到处布满了乞丐与贫民，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走向广场。其中有双脚戴着铁镣的人，有被削掉膝盖骨的人，有被挖去双眼的人，还有被剃去双手或剃去双脚的人。他们一瘸一拐地走着，有的甚至在地上爬着……目睹这些啼饥号寒的贫民，使人心灵震颤。这就是旧西藏，这就是在封建农奴社会中受苦受难的藏族人民。

面对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乞丐，张经武站在高处大声地说：“藏胞们，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给你们布施！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的处境十分痛心，十分关怀。这点钱只能暂时救济一下，不能完全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大家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才能有饭吃。西藏和平解放了，以后会有好日子的。”那一天，没有铁棒喇嘛的吆喝声，却秩序井然。人们坐在地上，极为安静。当张经武讲完话后，人群中爆发出长久的掌声（本来西藏人是没有鼓掌习惯的）。那些没有眼的人只好边喊“土节气”（谢谢），边点头致意；那些没有双手和双脚的人只好在地上叩头，表示他们的谢意……结果发放的人数不是500人，也不是800人，而是1500人。此次布施，影响极大。

事例二：广交上层爱国朋友，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张经武交的第一个藏族爱国朋友，就是现在的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他们是在北京和谈时相识的。为了藏民族的繁荣与进步，阿沛·阿旺晋美以西藏首席代表的资格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部队在进军途中和到拉萨之后，阿沛又积极协助筹粮和解决住房问题。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达赖喇嘛迟迟不表态，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狂叫不承认协议。此时，阿沛·阿旺晋美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报告了和谈经过。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愿意以全体代表和我个人的身家性命担保，签订协议完全是为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俗人民的利益，中央对协议的诚意不容怀疑。”他表现出光明磊落的人格，理直气壮地捍卫了“十七条协议”。此举深深地感动了张经武。从此，张经武常到阿沛家作客，二人建立了亲密的友情。

张经武在西藏交的第二个朋友便是西藏著名的学者、诗人擦珠·阿旺洛桑活佛。擦珠5岁时被定为色拉寺一位活佛的转世灵童，6岁入寺学习经文，21岁考得“拉让巴格西”（佛学博士）。他曾任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和经师，并于1908年随达赖喇嘛进京，朝见过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由于他身居高职，而又不是贵族出身，因此常遭贵族的妒恨，后因结婚娶妻，被噶厦当局免职贬为平民。他学识渊博，精通佛学和西藏历史，还擅长写诗，出口成章。因此，他的弟子众多，令人敬仰。擦珠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非常爱国，接受新事物较快。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讲话幽默，善于比喻，不仅形象生动，又有诗的韵律，耐人寻味。比如，他在西藏第一期藏语文训练班讲话时

说：“首长的讲话，像大海一样，内容丰富。我的讲话，好比井底之水，内容很少也很浅……”他的讲话博得张经武和教职员长久的掌声。擦珠老人被聘为该校的藏语文教员。为此，他还受到坏人的威胁，曾被暗地飞来的石头打伤。擦珠老人家庭贫寒，人口多，收入少。张经武知道后，指示有关部门，在他每月的工资中增补20个大洋作为救济。擦珠老人的腿不好，行走不便。张经武又指示后勤部门，从机关的乘马中挑选一匹最好的送给他。擦珠老人十分感动，即兴吟诗道：“毛主席有智慧的光芒，共产党像天上的太阳，‘十七条协议’像长明的火炬，把贫穷的西藏照亮……”后来，擦珠老人有病住院，张经武和工委的负责同志前去探望。详细询问病情后，张经武还特意嘱咐医生要精心治疗。不久，这位老人与世长辞。根据张经武的指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登报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在张经武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噶丹池巴，即土登滚秋，是值得提的。“噶丹池巴”，原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在噶丹寺讲经的法座，“噶丹”即噶丹寺，“池巴”乃法座或法台。随着历史的演变，“噶丹池巴”便成了僧官的最高职称。宗喀巴圆寂后，继任法座的人即被称为“噶丹池巴”。“噶丹池巴”是僧人的职称，“土登滚秋”则是他的名字。土登滚秋乃第九十七任“噶丹池巴”。

张经武在拜会噶丹池巴时，和他谈了西藏与祖国的关系，谈了“十七条协议”等。噶丹池巴说：“一千多年来，中国就是保护、发展西藏佛教的大施主。几百年来，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就是一种隶属关系。”

张经武向噶丹池巴赠送了“十七条协议”藏文本和纪念章、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噶丹池巴高兴地将纪念章戴在胸前，双手捧着毛泽东像，祝福毛主席健康长寿。

1963年，噶丹池巴向张经武提出个要求，说他终生的愿望是想把毛主席的像敬送到大昭寺供奉起来。他说：“毛主席是伟人，是藏族人民的大救星，令众生敬仰。我没有去过北京，没有见过毛主席，只好请个画匠画一张毛主席像供奉起来，了却我一生的心愿。”

张经武觉得他确系一片虔诚，这样做虽然宗教色彩重了一些，但还是赞同了他的要求。当年，噶丹池巴便请了画师，画了一张高1.8米、宽1.5米的毛泽东主席彩色画像，并亲自护送至大昭寺二楼经堂悬挂起来。这一事件轰动了拉萨和全西藏。从此，民间的许多经堂里也都悬挂起毛泽东主席的画像。

1964年，这位老人与世长辞。张经武为失去一位挚友而十分悲痛。他曾不只一次地对人说：“噶丹池巴是位爱国老人，也是很有学问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事例三：关心朋友进步，爱护朋友子弟。张经武在广交朋友的同时，还十分关心许多贵族朋友的子弟。这些贵族子弟有的曾在英国留学，有的经商到过印度，是西藏社会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快，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影响。张经武身为西藏工委书记，经与其他负责同志研究，确定了西藏青年工作的基本方针，即“运用适当的形式，把西藏上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组织学习，开展各种活动。通过这些青年的各种社会活动去影响西藏广大青年，以利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张经武指示西藏团工委，要与拉萨的贵族青年广交朋友，邀请他们参加政治学习和文化体育活动，以增强彼此的了解和交往。

1952年9月22日，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筹委会正式成立。它吸引拉萨各族青年积极参加体现反帝爱国、团结进步精神的各种活动。一群贵族小姐破天荒地在文艺晚会上表演了她们自己编排的舞蹈，一批贵族僧俗子弟组织了足球队，同时还举办了图片展览等活动。青年们的社会活动，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官员的强烈反响。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造谣诬蔑，并威胁恫吓参加活动的男女青年。张经武知道后，立即通知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责成他们严加制止分裂主义分子的行为。1953年1月31日，张经武和达赖共同批准，正式成立了拉萨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张经武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把一面绣有“为热爱民族和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锦旗赠给联谊会。此后不久，张经武还批准团工委组织了西藏青年参观团，赴内地参观学习。参观团青年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通过参观学习，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加深了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

在张经武的关怀与支持下，西藏各地相继成立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文化联谊会等。1955年，张经武在《西藏民族和人民走向光明和幸福的道路》一文中称：“西藏地区成立了爱国青年、妇女文化联谊会，在反帝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下，学习各种知识，爱国观念和政治觉悟正在日益增强。这是西藏今后更加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事例四：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张经武在抓好上层青年教育的同时，还抓了拉萨小学的创建，提起办学，张经武着实地费了一番周折。解放前的旧西藏，除个别贵族办的两所私塾外，全区竟无一所学校。张经武在讨论拉萨小学的办学会议上说：“办学校，主要靠中央出钱，不要西藏地方政府筹款和贵族捐助，目前办学还谈不上正规，只讲一般常识，这也是为将来正规化学习作准备。现在主要讲西藏的政治形势，讲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教育应从西藏青少年的实际水平出发，由近及远，如讲“十七条协议”，讲国旗国徽，讲阿沛在北京的讲话，讲人民解放军的艰苦奋斗等等。”在会议上，有人提出各种疑难问题，例如办学是否开设讲经（指佛经）课，学生毕业后是否当喇嘛等等。张经武代表中央答复说：“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人士的反映后再决定。学生毕业后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以内地的课本作参考，新教材编审完征得噶厦的同意后备案。”

经过艰苦的努力和紧张的筹备，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正式开学。张经武和工委、军区的领导都亲临学校，参加开学典礼。第二年又创办了日喀则小学。为了让更多的农奴子弟和无家可归的藏族儿童受到教育，张经武决定孤儿的衣、食、住全部由国家供给。

1956年4月22日，张经武陪同陈毅副总理到拉萨小学参观。他们仔细询问了学校的情况，翻阅了学生的作业本，还参观了孤儿们住的宿舍。张经武抚摸着孤儿普巴和索朗的头说：“你们没有家，学校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没有父母，老师和同学们就是你们的亲人……”

西藏的教育事业，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张经武等工委领导的具体督促下，迅速得到发展。到1955年，全区小学发展到462所，建立普通中学2所，中、小学在校生人数达16700人。

事例五：平息西藏叛乱，团结各界朋友，解救百万农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中分裂主义分子，置中央的警告于不顾，在1959年3月10日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和在藏工作人员，在广大爱国朋友和僧俗人民的协助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迅速平息了叛乱，并开始进行

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真正从苦难中站了起来，得到了彻底的解放。9月19日，张经武和工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到曲水县视察。他们在田间、地头 and 农奴共同劳动，并召开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民主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他们经常到农奴家中访问，问寒问暖，送医送药，救济贫困户。在各种会议与交谈中，张经武察觉到许多干部在工作中有急躁情绪，特别是对待寺庙问题，有的人有过“左”的言论。为此，他立即召集会议。在干部会上，他说：“关于寺庙问题，首先要充分发动群众，不可能在一个运动中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三反就是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先把政、教分开，先割断寺庙剥削群众的经济关系。三反搞得彻底，宪法也就进了庙子。”在会上有人提出，要反对迷信，是否可以把一些寺庙拆掉？张经武当即坚定地回答道：“我们的政策是一不准拆庙子，二不准批佛像。寺庙的问题由寺庙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不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宗教问题。寺庙内只要还有一个喇嘛，寺庙就要保留。”

11月11日，他又到林芝县进行调查。当他发现有些群众对党的赎买政策不理解时，就耐心地说：“对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不要面对面地进行斗争。”有的群众不理解地说：“过去三大领主剥削我们，残害我们，现在解放了，不斗争他们，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张经武解释说：“不面对面斗争，大家可以背靠背地进行说理。用这种方法倾诉大家的苦水。对于他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国家实行赎买政策，就是由国家出钱把他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买过来，然后再分给大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孤立少数反动分子，有利于民主改革工作。”几句话，把干部和群众说得口服心服。

张经武在调查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经验的总结和运用。1960年，西藏各地区民主改革运动蓬勃发展，各地群众纷纷成立了互助组。为了正确指导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张经武及时发现并总结了乃东县温区结巴乡桑嘎村朗生互助组的经验。他在题为《百万农奴的榜样》的材料上写道：“这是一个由11户朗生组织起来的‘穷棒子’互助组。它给朗生的真正解放树立了榜样，指明了道路，反映了贫苦农民人穷志不穷的硬骨头英雄气概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雄心壮志。这个材料说明，把这些没人要的旧社会的奴隶们组成互助组，就是引导他们走向了真正解放的光明大道。”

在民主改革的大潮中，百万农奴挣断了千百年来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奴隶们真正得到了翻身解放，第一次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大声地唱道：“戴过铁镣的人，知道铁的分量；吃过黄连的人，才知道糖的甘甜……”对奴隶的解放，有的上层人士感到面子过不去。因为奴隶当家作主，他们失去了昔日的尊严，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张经武针对这种情况，主持召开了全区统战工作会议。他耐心地劝导朋友们说：“有的朋友对我说，他们不愿意听‘改造’二字。其实，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改造，劳动人民要继续改造，革命工作人员也要改造，共产党员也都要改造嘛。”

1960年11月，西藏召开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张经武在会上推心置腹地说：“大家很清楚，千百年来，西藏广大劳动人民一直受着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就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劳动人民一旦获得解放，提高了觉悟，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把矛头必然指向剥削阶级，这完全是符合运动规律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奉劝各位上层的朋友们，你们对此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正确的态度是，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本着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原则，积极反映情况，协助党和政府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上层的

朋友们怎样和群众搞好关系呢？我认为朋友们必须放下架子，积极拥护党的政策，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到群众中去多交朋友，你们自然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大家放心，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的！”

张经武常说对朋友要以诚相待，因此许多人都愿意向他反映情况。有一次，张经武收到某政协委员的一封信，信中称：“组织政协委员们以学习为名，强迫人家交待与外国的关系，把上层人士的座谈会变成了斗争会、讨论会、但白会。”为此，张经武立即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谈话，严肃地批评了错误的做法。他指出：“你们这样搞，把党的名誉搞坏了，以后谁还听你的？这样搞，怎么能团结更多的朋友？怎么去分化、瓦解、孤立少数敌人？你们必须立即向上层朋友们道歉，立即纠正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犯！”

事例六：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干部。张经武到西藏后，对培养民族干部一直极为重视。他说：“实行民族自治，必须培养大量的民族干部，这是民族区域自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只有大量的民族干部成长起来，本民族人民才能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张经武在藏工作期间，在党中央和西藏工委的正确领导下，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干部。据1965年统计，全区已有藏、回、珞巴族干部1.6万人，其中1000多人担任了专员、县长、区长等职。在地广人稀的喜马拉雅山区，珞巴族干部们工作十分艰苦。张经武时常惦记着他们。1960年11月，西藏政协召开会议，他特意把参加会议的6名珞巴族干部请到家里，把他们待为上宾，热情地招待。珞巴族干部感动地说：“珞巴族在过去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下，不要说没有政治权利，就连生活的权利也没有。封建农奴主把我们逼上深山丛林。我们生产是刀耕火种，生活上吃不上粮，穿不上衣。他们管我们叫‘野人’。现在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又有了本民族的干部，参加了政府机构，共同管理国家大事。大家还分了地，组织了生产互助组，有粮吃，有衣穿。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呀……”

张经武激动地拉着他们的手说：“珞巴族地方大，地方好，大家要团结好，努力生产，改善生活。你们要从山上搬到山下的平坝来。有什么困难，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你们回去请转告我对珞巴族人民的问候。要热爱祖国，有事同政府商量。要热爱劳动，种好庄稼。要热爱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你们翻身解放。只有热爱毛主席，听共产党的话，才能建设好新西藏，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张经武在藏工作15年，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为了西藏的彻底解放，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模范地、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深受藏族人民的的爱戴与尊敬。张经武是新西藏的开创人之一。西藏能有今天的繁荣与进步，和张经武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西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他们幸福地唱道：

“共产党，是爹娘，噶厦政府是恶狼。
要想幸福有保障，永远跟着共产党。
毛主席，像太阳，三大领主是魔王。
彻底消灭农奴制，幸福生活永无疆。”

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敌前大潜伏的张祖谅

毛文戎

张祖谅（1911～196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1年农历10月14日出生于河南商城石桥区大塘弯村。1930年，家乡农民举行暴动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他毅然参加赤卫军少先队，并任指导员。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第四方面军第11师第31团特务连任战士、副班长。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25军第73师排长、第217团给养科科长、红31军第93师政治部干事，到陕北后，任红31军政治部保卫科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第772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大岳军区第2分区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5年9月任第386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第8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9年2月起任第18兵团第6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解放西北和进军大西南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60军军长，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军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任南京军区参谋长。1961年5月13日病逝。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3年5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部，起伏的群山重新披上了春天的盛装。开城板门店的停战谈判，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集团的破坏，又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敌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阵地进行了多次挑衅性的进攻。战场上整天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促进停战早日实现，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指示和第20兵团的部署，第60军奉命对防御正面敌人占领的883.7、973、902.8等高地发动进攻。这是朝鲜战场上我军从1952年转入阵地防御以来，第一次突破具有现代化设防工事的由敌人1个团防守的主阵地，并拔掉敌人号称“密苏里防线”的重要支撑点。敌我阵地前沿都在高山顶上，其间有深沟相隔，地形复杂，距离甚远。要一举拿下这些高地，难度很大。

在这次战役中，张祖谅作为第60军军长，经过深思熟虑，大胆采用3500多人敌前大潜伏手段，出奇制胜，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此役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誉为“首创我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1个团大部的范例”。

一着让人揪心的险棋

如同人们看戏剧《空城计》，往往要为诸葛亮的弄险捏一把汗一样，凡是耳闻目睹张祖谅在朝鲜夏季反击作战中组织指挥敌前大潜伏的人，也无不为他这次弄险捏几把汗。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貌似有兵实无伏兵的真正空城。张祖谅的敌前大潜伏恰恰相反，他把千军万马埋伏到敌人眼皮下一昼夜，而不让敌人看到一下点儿蛛丝马迹，貌似无兵，实为有兵。

1953年6月10日，山峦起伏的朝鲜东线战场，迎来了一个平凡而又极不平凡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第3兵团和第20兵团指挥部，第60军军、师、团领导机关，人们的心情极为紧张，共同关注着我军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

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李志民，特派作战科科长到达第60军前进指挥所，随时了解情况，报告情况。

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杜义德特地来到了第60军前进指挥所。

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张南生、参谋长萧文玖和新到任的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也整天坐镇在兵团的前进指挥所里，不离开岗位一步。

第60军军长张祖谅、副军长王诚汉、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从那天晚上就一直没怎么合眼。拂晓起，他们或者走出掩蔽部，透过望远镜向前方阵地观察，或者在新开设的前进指挥所处理各师、团报告的情况。

军指挥所里的气氛紧张而宁静，除了偶而响起的清脆电话铃声和掀动电报纸的哗哗声，几乎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昨天夜里，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已付诸实施——两个团的前进指挥所、4个营部、15个半步兵连、4个机枪连共3500多人，悄悄潜伏到了敌人阵地前沿。

军旅作家胡奇战后在《解放军文艺》上撰文说这是“潜伏在敌人眼皮下”，一点儿也不过分。

突击连离敌人前沿不到200米。潜伏部队如果咳嗽，睡觉打呼噜，敌人都能听到。敌人在60度到70度的陡坡上，从上往下扔手榴弹，可以甩到潜伏区。至于步枪、机枪、小炮、大炮的威胁就更不用说了。整个潜伏部队都处在敌人射程和火网之内。

这是一个带有很大冒险性的作战行动。一旦潜伏部队中有一个人暴露目标，一旦敌人发现有这么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队伍就埋伏在他们鼻尖之下，后果不堪设想。敌人是完全控制着制空权的，只要发现目标，强击机、轰炸机会立即呼啸而至，数百门大炮可以迅速将潜伏区覆盖。

人们对潜伏成败，存在着担心、焦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敌人毕竟是有着正常听觉、视觉、嗅觉的活人，而且还有现代化侦察设备。我军如此大量的部队要在敌人眼皮下潜伏将近20多个小时而不被察觉，实实在在是一着让人揪心的险棋。

弄险者原是一名儒将

下这一着险棋的指挥员张祖谅，并非张飞、李逵式的人物，而是一员儒将。

“为党为民一心忠，
智勇双全儒将风。
不幸中年离世去，
华东各地悼英雄。”

这是1961年张祖谅病逝之后，发表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上的一首悼诗。“智勇双全儒将风”的诗句，准确地表达了张祖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其实，张祖谅文化程度并不高。他出生于大别山区，9岁到12岁念过3年私塾，以后就辍学务农。如此学历，却被人们称为“儒将”，又并非名不副实。有例为证：

例一：早在抗日战争中，他就有过给文化教员当教员的故事。

1942年，张祖谅在八路军第386旅任政治部主任。他新婚不久的妻子王

华在旅政治部宣传科当文化教员。一次，她到旅炮兵连上文化课，课文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炮兵连的战士比步兵连的战士文化程度要高一些，有初小的，也有高小的，有的战士特别爱动脑子，想问题。课堂就在窑洞前的一个空场上，战士们整齐地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女教员讲课，有的还在小本上记着笔记。王华讲到资本家剥削工人时，说了一个成语叫“囤积居奇”。

一个战士举手报告：“请教员讲讲什么叫‘囤积居奇’。”

“什么叫‘囤积居奇’？”王华没有想到会碰上这个“突然袭击”，事先也没准备，一时，两颊绯红，手足失措，大颗汗珠在耳鬓边滚动。

连指导员王良骏见状立即站了起来说：“下课！今天时间到了，下次再讲。”

战士们迅速散去了，王华的“围”也解了。可是这位年轻的姑娘觉得在战士面前出了“洋相”，羞愧难当。她飞快地离开炮兵连，一路走，一路哭，从炮兵连到旅部驻地3华里，她整整哭了一路。

回到住处，张祖谅正坐在门外一个小桌子边看材料。一看王华泪流满面地回来，就开玩笑说：“今天大晴天，怎么会下雨了？”

王华说：“我再也不去炮兵连上课了！”

张祖谅静静地听王华讲明原委，耐心开导说：“什么都是锻炼的。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边踱着步子，边对王华说：“讲课要认真备课。对每一个内容，自己要先弄懂。上课时，有的同志提出问题，不懂就是不懂，给同志们讲清楚。我们八路军就是官兵共学，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你是上过初中的，应该知道孔夫子吧。他还要‘不耻下问’呢。”接着张祖谅给王华解释了什么叫“囤积居奇”。张祖谅举例说：“你们山西有的地主不是还有光绪年间的粮食吗？他们就是把粮食藏起来，等到缺粮时高价出售以牟取暴利。”张祖谅通俗明白的比喻，一下子就把王华点拨明白了。王华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学历不高，而文化修养却远远高于自己的丈夫和良师。

例二：张祖谅亲自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受到过邓小平的表扬。

那是1943年6、7月间，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到中条山视察开辟根据地的工作。返回太行时，路经第386旅，邓小平在参加旅领导干部的一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这样说：“你们要向张祖谅同志学习。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写给师的‘精兵简政’调查报告，所提的贯彻意见，很有分量。”

旅的同志们都知道，受到邓小平表扬的这份调查报告，是张祖谅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成果。为贯彻上级提出的“精兵简政”方针，张祖谅亲自深入到所属的3个团，找基层干部战士座谈，听干部汇报，有的问题他反复调查，反复核实。张祖谅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在第386旅上下留下很深的印象。

例三：翻开张祖谅的履历表，他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历。他1930年参加赤卫军少先队，后担任政治指导员。长征中，他担任红31军政治部宣传员、第93师政治部干事、军政治部裁判员和保卫科长。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第386旅锄奸科长、团代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

实践表明，张祖谅确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儒将。像他这样的一名儒将，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这样的强敌，在异国战场，竟然敢于作出“大潜伏”这样带有巨大冒险性的抉择，是不是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呢？

谨慎本是他的座右铭

如果说，“儒将”和“冒险”之间，难于找到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再看看当张祖谅入朝之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之后，他苦思冥想，写下“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座右铭，就更觉得张祖谅指挥的这次大潜伏——大冒险，与他的座右铭是如此大相径庭。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张祖谅被任命为军长。他亲手从第18兵团司令员周士弟手中接过第60军军旗，随后率部南进，解放宝鸡，攻克剑门，进军大西南，解放成都，在川西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1950年11月，第60军奉命出川，准备入朝参战，张祖谅仍留任川西军区司令员。1951年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第60军第180师受挫。消息传回祖国，传到成都，张祖谅得知他带领的老部队受到如此损失，感到十分心痛。1952年夏，他随西南军区参观团到朝鲜，在志愿军总部，副司令员陈赓和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向他介绍第180师受挫情况，并希望张祖谅重返老部队。张祖谅当即表示同意。返国不久，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任命张祖谅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军长兼党委书记。

1952年9月25日，即将赴任的张祖谅路经北京，下榻于前门外乡村饭店。他奉命参加国庆观礼后再入朝。同时下榻这里的还有各大军区参加观礼的军以上干部及志愿军回国观礼团。

国庆观礼后，参加观礼的代表纷纷离京，张祖谅也正准备动身。总政干部部一位处长忽然来到张祖谅住处，通知他留下待命，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他。

10月4日上午9时，又是这位处长来告诉张祖谅，毛主席将于11时会见他。张祖谅一听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一改平时稳重姿态，兴奋得像一个小小伙子，连忙换衣服，刮胡子。他摸着下巴问随行的参谋：“帮助看看，胡子刮干净没有？”

“干净了！干净了！”参谋高兴地回答。

一辆华沙牌小轿车，载着张祖谅和两位年轻的参谋——罗斯丁、陈丹特驶进中南海。

小车在毛泽东住房前停了下来。

这时，屋内出来一位戴眼镜的秘书。张祖谅问：“随我来的同志是否一同进去？”那位秘书说：“等我请示一下。”过了一会儿，秘书出来说可以一起进去。

会客室很简朴，摆放着一圈旧式沙发。

毛泽东站在门口迎接。他那魁梧的身材，慈祥的面孔，让张祖谅感到十分亲切。

“坐！随便坐！”毛泽东指着沙发，招呼客人坐下，自己坐在紧靠张祖谅的沙发上。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张祖谅的经历，简述了建国后我军两次影响较大的失利（一是金门作战，一是朝鲜第五次战役），并分析了这两次失利的主观和客观因素。毛泽东说：“180师的失利，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看，山西战场，你们60军打得好，解放了大西北，解放大西南也太顺利了，打胜仗一帆风顺是好事，但同时也孕育着失败的可能，不谨慎，不把敌人当

回事，哪有不失利的？”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一转，望着张祖谅缺了一颗牙齿说：“怎么办呢？我看180师北大荒不用去了，番号不用改了。你晚去几天，到协和医院把牙补上，到朝鲜后，放开嗓门，说话声音大一些，动员部队打个翻身仗！”

张祖谅兴奋地连连点头。毛泽东的亲切教导和关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从毛泽东住地返回后，张祖谅立即去协和医院镶牙，并同随行人员反复推敲领会毛泽东的谈话。张祖谅反复地说：“毛主席真关怀部队呀！”

“不谨慎，不把敌人当回事，哪有不失利的？”毛泽东的话久久地在张祖谅耳边回响。是啊！要打胜仗，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他坐在写字台旁，提笔写下16个大字：“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上下信赖，团结一致”。

张祖谅不仅把这16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且带到朝鲜，在第60军党委会上作了阐述，被作为作战指导思想，传达给第60军每一个指战员。

第60军当时刚刚从第68军手中接防，在朝鲜东线东起文登里、西至北汉江一线执行防御任务。我方阵地成“凹”字形，敌人阵地成“凸”字形。这个敌人凸进来宽约20千米，纵深最深处近9千米的地区，由东向西有938.2、973、883.7、949.2等几座大山，这些大山均高出我方阵地一二百米。这一地区是敌人1951年夏季反扑时占去的，经过长期经营，已形成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守敌为南朝鲜精锐部队第2军团第5师、第6师。这一线阵地被“联合国军”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州名命名，称之为“密苏里防线”。它与美军著名的“密苏里号”军舰同名。敌人把这一防线称为“密苏里防线”除寓意“胜利”之外，大有将此线比作钢铁军舰般坚强，如同总统家乡一般安全之意。

第60军刚刚接防时，敌人十分猖狂，公开在阵地晾晒衣物，来回走动，甚至唱歌跳舞，对着我方阵地解大小便。第60军指战员本来就觉得第五次战役打得有些窝囊，人人都想大展一番身手，见敌人如此猖狂，都憋着一肚子气，个个斗志昂扬。1952年10月29日，第60军接防完毕。11月1日至5日，敌人就想给我军来个下马威，向我方阵地发动进攻。第60军在一线的部队没有含糊，第542团在反击中歼敌200多名，第540团歼敌50多名，首战告捷。

张祖谅一到任，立即上前线视察部队，观察地形，了解敌情。他深深感到部队求战情绪十分可贵，但是要防止急躁蛮干。于是，他走到哪里，就把“小心谨慎”讲到哪里，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张祖谅在“抓敌一把”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从歼敌一个班开始”。并说：“不打则已，打则必歼。向薄弱处开刀，向突出处攻击。发挥炮兵作用，克服单步兵思想。杀敌1万，自伤超过3000，不算取胜。”

张祖谅亲自“种试验田”。冰天雪地里，他从单兵的防滑脚码抓起，对出击战士的武装佩带、过沟淌水鞋袜的更换、干粮饮水、救急药品、枪支弹药防冻包扎、伪装物的选择、伤员背架的设置、战斗小组的编成与分工，甚至连侦察小分队带不带大衣都和战士商量讨论。

“是不是把军大衣带上？”张祖谅问战士。他担心战士们趴在雪窝里要被冻伤。

“不行！”战士们在和蔼可亲的军长面前无拘无束地说，“带上，走起来大笨，尤其是打响之后。”

“ 打响了就把大衣扔了。 ” 张祖谅说。

“ 这行！ ” 战士们同意。

“ 小心谨慎 ” 的指导思想化成了战斗力。第 60 军上阵之后，从 “ 抓一把 ” 到 “ 挖一块 ”，26 次小型反击战，除一次扑空，两次未完全解决战斗外，其余都打成了歼灭战。

兵团、志愿军司令部的嘉奖电报不断传来。

1953 年 2 月，第 20 兵团首长的嘉奖电报是这么说的：“ 第 60 军接防后，自去年 12 月 12 日起，至今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向敌突出薄弱的前沿班排阵地进行了 26 次小型反击，打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由于积极作战，不仅消灭了敌人重要力量，保证了阵地安全，而且锻炼了部队，获取了小型反击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攻击精神。这种积极主动寻找战机的 ‘ 抓敌一把 ’ 的战术思想很好。特通报各部学习。 ”

在张祖谅 “ 小心谨慎 ” 思想指导下，第 60 军小型反击战越打越漂亮。1953 年 3 月 29 日，第 180 师第 539 团第 8 连和师侦察连第 2 排，由于战前准备周密，仅用 5 分钟，就全歼守敌伪第 7 师第 8 团第 2 连，毙伤敌正、副连长以下 179 人，俘敌 14 人，在打敌反扑中，又歼敌 20 人，并炸毁敌一个弹药库。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司令部表扬说：“ 以小的代价在短促的时间内歼敌 200 余人，打得甚好。 ” 1953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第 60 军第 181 师第 541 团又打了 1 个漂亮仗。志愿军司令部对这次战斗是这么评价的：“ 你部 541 团在无名高地战斗中，以敌我伤亡九比一的代价，十天歼敌 1500 多名。此次战斗打得甚好，特别是在反复争夺战斗中，部队打得顽强机巧，炮火不失时机地支援，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特通报表扬。 ”

用 “ 小心谨慎 ” 换取了巨大胜利的张祖谅，在两个月之后的大型反击战中，竟然敢于采取敌前大潜伏的冒险决策，岂不和他的 “ 座右铭 ” 背道而驰吗？

敌人 “ 逼 ” 出来的主意

张祖谅在朝鲜战场上并未在用人上、作战指挥上有过什么失误，而是连战皆捷。那么，他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大胆的决定？战后，负责编写我军战斗条例的王均（原第 60 军第 179 师第 536 团团长），为总结朝鲜作战经验，专门走访过正在军事学院学习的张祖谅。王均这样问道：“ 张军长，将几千人埋伏在敌人眼皮下……你在定下这个决心前是怎么考虑的？听说兵团首长曾说你决心大，有魄力！ ”

张祖谅微微一笑说：“ 这是敌人逼出来的！ ” 见王均对这句话有些迷惑不解，张祖谅进一步解释说：“ 在战场上有些办法是敌人逼出来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在打运城、攻临汾时，不是用过什么迫击炮打平射、迫击炮抛炸药包吗？打临汾时还将坑道挖到敌人碉堡下，挖到城墙脚下，然后装上炸药……最后轰隆一声，让敌人坐上土飞机！ ”

大潜伏的确是敌人逼出来的。

1953 年 4 月，因战俘问题中断了 6 个半月的停战谈判恢复了；但敌方不断节外生枝，拖延时间，不想很快达成协议。

1953 年 5 月，美第 8 军前任司令范佛里特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妥协，鼓吹要彻底取得 “ 军事上的胜利 ”，以军事方式解决朝鲜问

题。5月7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

为了教训敌人，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早日实现，并求得战后我方能够控制有利地形，志愿军领导决定对敌人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志愿军司令部于4月20日向各兵团发出了战役指示。

第60军当时归属第20兵团指挥。根据兵团首长的战役部署，第60军攻击的目标是902.8、973、883.7等敌人占领的几座高山阵地。

拿下这几个高地，是第60军指战员一上阵地就有的愿望。敌人凭借这几个高地，居高临下，碰上晴天，可以俯视我方纵深20多千米。平时，敌人利用其地形优势，常向我方打枪打炮。我军早已暗作准备，决心拿下这些高地。善于用脑的张祖谅，考虑到敌方阵地高耸，我方阵地是一片低矮山头，为了进攻敌人阵地时屯藏兵员，就指示部队乘夜暗运动到敌人阵地山腰死角地区，打眼放炮，挖掘坑道。我军放炮炸石，恐敌人发现，每次放炮时，就向敌人阵地打冷炮，山上山下，轰隆声响成一片。正是在隆隆炮声掩护下，两条坑道已挖到距敌前沿阵地不远的地方了。

然而要夺取这几个高地，光靠这两条坑道屯兵是远远不够的。

张祖谅站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苦苦思索着。

敌我阵地前沿都在高山顶上，海拔都在几百米以上，而且深沟相隔，地形复杂，距离又远。张祖谅多次询问曾到敌人前沿侦察地形的干部战士，并作过计算：从我方阵地出发，先要下山，走两三个小时。然后再过沟上山，要三四个小时。部队展开，完成进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大约要七八个小时。如果晚上8点开始行动，到达敌阵地前沿展开，已是拂晓四五点钟，离天明时间不多。如果攻击战斗不能在预定时间结束，白天攻击，必然要增大部队伤亡。即使占领了敌人阵地，也没有充分时间作好打敌反扑的准备。弄不好，第二天在敌连续不断反扑的情况下，坚守新占阵地的部队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

潜伏，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张祖谅的脑海中酝酿着。他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在列宁格勒战线有一个在敌前潜伏成功的战例；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小分队潜伏成功的战例，伟大战士邱少云就是在潜伏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然而，那毕竟是小分队的潜伏。如今要打的是敌人1个团的防御阵地，要潜伏的部队就不能只是一两个、三五个小分队，而是要三五千人。这么多人的潜伏能行吗？

张祖谅反复思索着潜伏的有利条件和困难。

5月上旬，第20兵团召开作战会议。巨大的掩蔽部里，坐满了兵团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第60军军长张祖谅、参谋长邓仕俊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新到任的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还有从国内来观战的李天佑、李成芳等高级将领。

作战会议，开门见山。关于打掉这几个制高点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人人心里雪亮。尤其是从军事上考虑，这几个制高点突入我方阵地一大块，高出我方阵地一二百米，可以俯视我方纵深和前沿部队侧后。如果停战线以此划分，双方各自后撤2千米，我方纵深就将无险可守，对巩固停战线十分不利。关于要不要打这几个制高点，已不容争议。会议讨论的焦点是“怎么打”。当面敌人阵地重点设防，工事坚固，火力密集；我军进攻道路山高坡陡，路程遥远，运动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减

少伤亡，夺取胜利，成为讨论的重点。

真是不谋而合。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在会议上提出了大潜伏的设想。

郑维山说：这几个阵地，谷深坡陡，地位重要，敌人以1个加强团防御，并不断对我方阵地实施火力、兵力袭击，构成严重威胁。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拔掉它。郑维山分析：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有利，但也容易松懈麻痹，戒备疏忽，造成我可乘之隙。敌我阵地主峰相距2至3千米，中间又隔有大川深谷，不便攀登，不利于炮兵发挥火力和步兵集结。他说：我反复思考，敌人前沿和侧翼都有大片树林，可供部队隐蔽潜伏。如果我们提前把部队隐蔽集中在敌前沿，第二天黄昏发起攻击，前半夜就可完成进攻战斗，可以有4到6个小时的时间改造工事，部署兵力、火力，组织步炮协同，补充弹药。这样，在第三天拂晓敌人反扑时，我军已作好战斗准备，可有效地反击敌人。在敌人反扑兵力增多时，由于山地狭窄，不易展开，我方可以集中炮兵打击敌人，以巩固阵地。

对强攻敌人1个团设防的坚固阵地实行战前潜伏，要出动多少兵力？兵力少了不够用，多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则大大缩小。在我军的战史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小部队潜伏成功不乏其例；然而那毕竟是小分队，人数少，许多事情比较好办。如今要打敌人1个加强团，潜伏部队至少得几千人。这么多人潜伏到敌人阵地前沿，能隐蔽好吗？潜伏时间要一昼夜，部队吃喝拉撒睡怎么办？万一被敌人发现，在敌人密集火力打击下，会出现什么局面？……

郑维山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沉默。与会的军长、参谋长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第60军军长张祖谅对大潜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经过长期冷静思考，成竹在胸。他首先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以沉稳的语调，郑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张祖谅进一步分析了实行潜伏手段的必要性：敌我双方都扼守在高山上。要从己方主阵地下到沟底越过谷地，再攀上敌人阵地前沿，约需6至7个小时。时值夏季，晚上8点才天黑。如果黄昏出发，要到次日早上3点左右才能占领进攻出发地。准备战斗和炮火准备再需30分钟，预计攻击敌人要一两个小时，而那时4点30分已拂晓。这样，解决战斗时即已天明。如果战斗迟延一下，天明还解决不了战斗，就会遭到敌人空炮火力的集中反击，增大伤亡。这时也不便于我军调动兵力和火器，攻占阵地后亦没有构筑工事的时间。接着，他谈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我军从1952年12月到现在，已对敌人进行了26次小型反击，其中25次都打成歼灭战。我方对敌人特点、地形都已比较熟悉。如果精心组织，潜伏是可以成功的。

张军长首先表示赞成潜伏，使会议气氛为之一振。郑维山、张南生等兵团首长和与会的军长们都聚精会神地静听张祖谅对潜伏成功条件的陈述。

张祖谅说：我们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和战备，已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前沿，对敌我阵地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们已有了主动权，敌人小分队即使在白天也不敢轻易到前沿活动。由于我军炮弹数量有限，炮火轰击时都打敌人主阵地，极少覆盖射击，所以敌人前沿的树丛未被破坏，为我军隐蔽提供了便利。山间溪流，水声瀑瀑，可以成为掩护人员声响的一个有利条件。在兵力使用上，敌人为1个团，按照我们前一段小型反击战的经验，也不需要集中3倍、4倍、5倍于敌的兵力，只以1.1到1.3倍的兵力用于第一梯队就够了，这样

可以减少参加潜伏的人数。此外，利用山地死角，加强炮兵火力对敌人不断袭击，加上佯动和伪装，严明纪律，把可能碰到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就能找出解决的办法。同时，用这么多兵力在敌人前沿潜伏，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可以出其不意……

张祖谅的发言，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与会同志频频点头，郑9维山、张南生等兵团领导人很感欣慰。其他同志陆续发言，赞同郑维山、张祖谅的看法，并分别提出了本兵种、本部队支援这次作战行动的打算。

郑维山越听信心越足，他一拍桌子，下了决心：“打！错了我负责！”

张祖谅当即表示：“我俩共同负责！”

郑维山摆摆手说：“不要你负责。我是兵团司令，当然我负责！”

于是，采用潜伏手段打掉敌人加强团阵地的作战决心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郑维山回忆说，张军长这个人很不错，有头脑，有创见。他的发言，对我们兵团领导定下这个决心，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把潜伏方案交给群众

潜伏，大部队的潜伏。作战决心虽然定了下来，要付诸实践，要做到万无一失，的确确实还存在很多非常现实而又尖锐的问题。

连日来，张祖谅和副军长王诚汉、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副政委赵兰田、政治部副主任李哲夫等反复讨论与思索着。这个军原政治委员袁子钦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任部长以后，政治委员一直还没有配备。张祖谅既是军长，又是党委书记，军政工作一手抓。

张祖谅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碰到许多作战的难题，都是通过“诸葛亮会”发动群众想出解决办法的。他同军的常委们决定，走群众路线，把潜伏的作战方案交给群众，发动全军都来提问题，想办法。

“相信我们的战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张祖谅强调，“一定要让全体指战员弄清楚，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采取潜伏这种战术手段？潜伏中究竟可能碰到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应当怎么解决？”他要求参战的各级指挥员不打官僚主义仗，都要亲自到敌前沿看地形，亲自到基层去参加各类人员的“诸葛亮会”。

大量的问题提了出来，大量的办法也想了出来。

担任主攻敌阵地最高峰973高地的第542团团长武占魁，来到第8连坑道。第8连是突击连，潜伏的地区离敌人最近。连队干部已组织班长以上干部到敌人前沿“摸”过地形，侦察过冲击道路。他们把侦察的情况摆在沙盘上，以班为单位研究战术和打法，分析潜伏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夜间，他们就在阵地后方选择类似攻击目标的山头，反复进行潜伏、冲击和纵深战斗演习。一演习，问题暴露出来了。大家把问题记下来，第二天在班务会、连务会上反复研究，然后再把想到的新办法搬到演习场上实践。

坑道里光线很暗，武团长弯腰走了一段，见一个拐弯处墙壁上有个小油灯，灯光下有一个班的战士坐在树棍搭起的床铺上，正在开“诸葛亮会”，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武占魁不声不响地坐在一个子弹箱上当“旁听生”。

“我再提个问题！”一个操四川口音的战士一边抽烟一边说，“潜伏区离敌人那么近，一咳嗽，让敌人听见咋个办？”

“小问题。”旁边一个山东口音的战士说，“你不会把烟戒了？”

“就是不抽烟，嗓子痒了还是要咳嘛！”那个四川战士说。

“对！这确实是个问题。”班长引导说，“一个人咳一声，大家都咳起来，还不像打雷？应当研究一下止咳的办法。”

围绕潜伏中的咳嗽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想出了各种办法：有咳嗽毛病的趁早治疗；吸烟的，早一点戒烟；出发时，身上带点生姜、仁丹、止咳片……

“要是这样还止不住呢？”有个战士问。

“有办法！”班长说，“头天晚上摸地形，我忽然想咳，就用手在地上挖了个小坑，嘴上堵着毛巾，埋进小坑咳嗽，声音就小多了。”

“我还有个办法！”一个挺机灵的小战士说，“要是遇到冷炮爆炸声，还可以在轰隆轰隆声音掩护下痛痛快快地咳几声。”

“俺还有个问题！”一个河南口音的战士说，“要是睡觉打呼噜，敌人听见咋着？”

“那就想法不睡觉。”有人说。

“万一困得眼皮打架，咋着？”还是那个河南口音。

“我有个好办法。”一个四川战士拉长声调说，“出发时，兜里装几个辣椒，困起来把辣椒放在嘴里狠狠咬上一口，保险你的瞌睡虫都给吓跑了！”
好一个绝妙的点子，全班都笑了。

又有人提出新问题：“要想大小便怎么办？”

“好办！好办！侧起身子，就地解决。”另一个四川战士说，“第一，身上有伪装，别人看不见；第二是露天厕所，不会臭气熏天；第三，解决后就抓点土盖上，还能为朝鲜的树木上次好肥哩！”

全班又一次发出欢快的笑声。

“我提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班长发言说，“要是潜伏中被敌人冷枪冷炮打伤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显然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加上问题的严肃性，使会场上活泼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静下来。

“我来说。”那个爱抽烟的四川战士语调缓慢而稳重，“我们绝不能‘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这么大的部队，战斗又这么重要，谁要是当了软骨头，打伤了哼哼叽叽，乱爬乱动，让敌人发现我们，谁就是全军全国人民的罪人！我保证，打伤了不乱叫，不乱动！”

“我说！”“我说！”会场立刻沸腾起来。不同语言，表达着同一个决心：一定学习邱少云，即使粉身碎骨，也要保障集体的安全，换取战斗的胜利！

团长武占魁不声不响地走出坑道。他在想，多好的战士啊！为了保证潜伏的成功，为了战士少流血，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想得周到些，再周到些。他迈开大步，沿着交通壕返回团指挥所。

当天晚上，武占魁同第3营干部再次检查了部队的演习情况。他站在假设的敌人阵地的山头上向山下俯视。明知有几百人在山腰里运动，可是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一点声响。星光下，只见满山荒草在夜风中轻轻摆动……

这天夜里，武占魁破例睡了一个好觉。

作好潜伏失败的准备

连日来，张祖谅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总在想，要打掉敌人1个团的主阵地，要派那么多兵力潜伏到敌人眼皮下，一旦有个闪失，一旦作战企图被敌人发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张祖谅在思考着，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采取什么办法对付。

大潜伏，就是大冒险。不仅军的首长担心，兵团首长担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长也很担心。

兵团首长把第60军突击连队的干部叫到兵团部，把祖国慰问的慰问品拿出来招待，亲切询问潜伏准备工作的各项细节。首长指示，要注意冲击道路的坡度。潜伏时，山地死角固然可以利用，但是，战斗发起，坡度大，攀登困难，会增大伤亡……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李达等将军们，决定亲自听取作战部队汇报，为了让军、师首长集中精力抓好作战准备，特地嘱咐：汇报情况只要参谋来就行。

军长张祖谅、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得知志愿军首长要亲自听取汇报，并且指示只要参谋去就行，非常感动。为了把战斗准备情况向首长汇报得更清楚，根据他们的指示，司令部组织制作了一个关于战区地形的特殊“沙盘”——按照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放大10倍，用马粪纸按等高线裁剪下来，逐层招叠，钉在木板上，对与实地有误差的地方作了修正，对一些敌人重点设防之处和不易察觉的低凹处又作了写景。“沙盘”共有4个乒乓球桌子大，可以拆装组合。“沙盘”以各种颜色的模型定位标明，成了我军潜伏和突破敌人防线作战的缩小了的标本实体。“沙盘”装在两部卡车上，由3名熟悉情况的作战参谋和侦察参谋带去汇报。还派了3名侦察员，按潜伏战士的着装全身披挂，以便向志愿军首长作汇报表演。当然，他们也担负着保卫“沙盘”安全的押运任务。

张祖谅、邓仕俊在送3位参谋上车时，紧握住他们的手交代：“要如实向首长汇报情况，但一定不要提困难，不要伸手叫苦。”

军司令部侦察参谋李一平、第179师作战参谋张志民、第181师作战参谋麦好礼，从汇报准备到汇报的要求上，又一次深切感受到张祖谅那严谨细致的作风和处处为全局着想的大将风度。

汽车在晨光朦胧中向北急驶，几个小时之后来到志愿军司令部驻地。

先是汇报作战部署。邓华、杨得志、李达以及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情报、通信、炮兵、后勤等部门负责人都在座。

将军们对张祖谅决定用3个团各打一处，每个团又多路多箭头地实施攻击，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相结合的部署表示满意。

邓华说：“抄后路，出奇兵，仗是攻坚，兵力不能平推。要破规律，破惯例，要出奇，奇得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才好！”

谈到“潜伏”，汇报得详细，首长们问得更详细。

参谋们说，参战部队都经过潜伏演习。演习中曾发生这样的故事：“假设敌”在模拟的敌人阵地上严密监视了3天，中间下了一场雨。3天过后，他们回来发牢骚说：“叫我们受洋罪，为什么潜伏的部队没有去？”问他们发现了什么？回答说：“当然发现了，第二天，有一队人，从南往北走，其中还有女的。”其实，这些“假设敌”不知道。那天下午，他们占领阵地，摆开监视的架式。而在他们眼皮下，潜伏部队从黄昏开始下山，通过沟底，爬上沟对面，进入“潜伏区”，而后整整潜伏24小时。演习指挥员轮流值班，

巴望看到“假设敌”发现情况的信号，可是一直没有看到。至于那一队人，是祖国慰问团的文艺演出队，走在潜伏区内的一条小路上，是从团部到营里去。就是这队人，也没有发现在他们走的小路旁藏有一批潜伏部队。演习潜伏的部队回来说，有的战士看到这一队人的脚上除了穿黄解放鞋外，还有一个穿蓝色力士鞋的。一查，这是参加演出的一位女同志穿的。而“假设敌”们眼睛只盯着树丛草地，关于潜伏部队的任何情况也没有发现。

邓华等首长们听了汇报，惊奇而又高兴地笑了。听说3个侦察员都参加过潜伏演习，便叫来问了个仔细，诸如伪装、防撞、抑喷、解困（防止睡着打呼噜）等，还把包水壶的布袋解下来看是否能作装大使用。邓华说：“上面的袋口应该大些嘛！”当侦察员伏身就地作业时，首长一眼看见背上的手雷，便问道：“敌人打中了手雷怎么办？”“敌人打燃烧弹怎么办？”

“报告首长，学习邱少云同志，至死不动！”侦察员回答。

邓华面色深沉地点点头。战士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是我们要设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尽最大可能减少伤亡。

汇报从下午1时进行到晚上10时。晚饭也是送到“沙盘”前，人各一碗，边吃，边谈，边议。

汇报结束，邓华代司令员特别强调两手准备：潜伏暴露，奇袭不成，要立即强攻，及时投入后续部队。并说：“每个团要有救护组织，人要多一些。部队打上去以后，及时抢救，转运伤员和烈士。这个工作一定要重视。”

邓华问汇报的参谋：“我们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

参谋李一平等想起临走时张祖谅军长关于不要伸手叫苦的交代，因此谁也不吭声。

首长们一一点出：物资？运输？医务？……当点到炮兵和炮弹时，3位参谋忍不住笑了。

邓华等首长明白了，当即指示，战斗发起之前，把炮兵第7师的1个团配属给第60军。

李一平等返回军部，向张祖谅等军首长详细传达了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的指示。张祖谅静静地听着，然后对军部的同志们说，对首长的指示，要一件一件落实。

关于防止潜伏战士背上的手雷被敌人打着的问题，张祖谅和师、团干部以及战士一起商定了个办法：把手雷的背带用铁丝搞成活扣，或用一根绳子把背带在胸前勒紧，潜伏时，解开它，使手雷袋能够转动。卧倒后，将手雷袋转到胸前，把手雷压在身体下面，用身体作掩护。

关于防备敌人打燃烧弹，大家说敌人不可能打燃烧弹。因为距敌人太近，敌人也怕烧到他们自己。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草木葱茏，

先烟后火，可借着浓烟遮蔽，解去身上佩带，在火中碾滚、扑救……

关于作好万一潜伏被敌人发现改为强攻的准备，张祖谅和邓

仕俊等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兵团首长指示，进行着周密的准备和部署。

秘密调动千军万马

小心谨慎，兢兢业业。

攻必克，守必固，打必歼。

这是张祖谅军长主持军党委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这个军从1952年到东线接防以来，先后采取“打活靶”、“小分队活动”、“抓一把，连续抓”、“小型反击”等方式，都连战

连捷。作战规模从歼灭敌人1个班到1个排、1个连、1个营。半年之内，共进行40多次反击作战，除一次效果不理想外，其余对敌营以下目标的攻击都是速决、全歼。正如毛泽东形象概括的那样，“零敲牛皮糖”，越敲越漂亮。

如今要打敌人1个团的阵地，要搞掉它3个海拔近千米的制高点，摧毁其所谓的“密苏里防线”，而且要采用大部队潜伏的特殊手段，这确是“非同小可”的一仗。作为一军之长而且一贯谨慎的张祖谅，毫无疑问把“冒险”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战役准备工作秘密而又紧张地进行着，每个环节都力求做到严格、严密、周到、细致。

潜伏部队不仅班排以上干部都利用夜暗到潜伏区摸过地形，战斗小组长也都进入潜伏区对地形、敌情进行了反复侦察，达到进出自如，情况熟悉，规定明确，措施周到。尤其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学习伟大战士邱少云，自觉遵守潜伏纪律的思想深入人心。

在当时我军地面作战还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炮兵无论对偷袭还是强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令张祖谅等军首长伤脑筋的是，几百门大炮如何占领发射阵地这个大难题。敌阵地居高临下，如果把炮兵发射阵地放在我方阵地的高山背后，虽然隐蔽，但要配合部队发起进攻以至向敌纵深延伸，有些炮则打不到。如果把炮阵地靠前配置，又容易暴露在敌人视线之内。

张祖谅、王诚汉、邓仕俊等指示炮兵研究对策。

于是，有一部分野炮，利用夜暗硬是被推上高山，悄悄地进入了坑道工事。黑黝黝的炮口，可直接向敌人前沿阵地瞄准。大部分火炮，分期分批被推进了距敌前沿几千米的一片杂木林。

“这也是一种潜伏！”张祖谅和军首长们一再告诫炮兵指挥员，“这里敌人很容易观察到。一定要严密伪装！进入阵地时的车辙痕迹，都必须扫除！”

军、师的炮兵主任们深知这一行动的冒险性。虽然在周围山头上我军已经加强了高炮火力，组成了对空火网，但如果战斗打响前暴露了目标，不仅这几百门大炮安全成了问题，而且要影响战役全局。

要保密，要隐蔽，但炮兵要打得准在战前试射是非搞不可的。要试射又不暴露作战意图，看来是矛盾的。炮兵指战员想出了办法，使矛盾得到了统一。

“轰！”“咣！”敌人一个掩体被摧毁。

“轰！”“咣！”敌人一个工事飞上了天。

“轰！”“咣！”几个敌人倒毙在山坡上……

据南朝鲜军队的战史记载：6月上旬，“中共军队冷炮射击增多”，但往往是“不等齐的间隔、断续发射，和平常打冷炮无异”。

敌人也曾派遣空中校正机，妄图利用我军打炮之机，为其压制炮火指示目标，但是迅速被我高射火力赶走。

经过精心策划，几百门大炮先后顺利完成试射，修订了射击诸元，顺带

消灭了敌阵地 22 个工事和上百个敌人。敌人对我新的炮兵阵地和进攻企图竟毫无察觉。

与此同时，部队在通信方面也进行着周密的准备。张祖谅对军司令部通讯科长刘文波说：“潜伏中的通信联络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

潜伏中的通信工作确实是很复杂的。潜伏中不能有一点声响，摇电话不能响铃，打电话不能出声。而潜伏部队在一昼夜时间里，又必须随时同上级指挥所保持联络。为了解决秘密通信手段，通讯科长、通讯营长、通讯股长、通讯连长们都绞尽了脑汁。他们规定：有线电通话，潜伏部队随时待机守听，不得高声讲话，有情况用预先规定好的暗号吹送话器，或按开关表示；团指挥所向潜伏部队讲话时不得摇铃，应先持机呼叫。无线电、步谈机在潜伏中严禁发信。除情况紧要，除部队被敌发觉、战斗打响或有线电被破坏，方可开机联络，但也只限于被察觉或打响的部队的机器。

基层干部们为适应潜伏的特点，还想了很多简易联络方法。开进时，指定专人以白纸条指示路标，后面指定专人撤收，消灭痕迹。进入潜伏区，与警戒部队用拉绳的方法保持联系，规定了各种情况报告的记号，并将绳子拴在指挥员胳膊上，防止打眩时对方拉绳不知道。

战斗准备从前方到后方，从步兵、炮兵、工兵到作战、侦察、通信，从粮弹运输到医疗救护，各方面都在紧张地准备，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

到 6 月上旬，后勤坑道里粮食、弹药囤积得如同小山，工兵已协助突击部队悄悄排除突击道路上的大量地雷。战士们把自己的水壶、铁镐都缝了布套，带上全副装具跳跃，也听不到撞击声。

6 月 9 日，战斗发起的前一天，张祖谅的前进指挥所在龙门山开设完毕。这里距敌阵地前沿不到 3 千米，敌人大口径机关枪都可以打到，炮弹、炸弹不时在山头爆炸，威胁到指挥所的安全。但这里能直接观察到战况，位置是理想的。

“还有什么问题？”张祖谅冷静而仔细地思考着步兵、炮兵、后勤等每一个参战部队及每一个环节的准备情况。

上午 9 时，张祖谅指示作战参谋，要通了担任主攻的第 542 团团团长武占魁的电话。

“军长，我是武占魁，有什么指示请讲。”

张祖谅问：“占魁同志，你们的尖刀连长是谁？”

武占魁回答：“还是 8 连连长蔡麦田。”

张祖谅记得，下面曾经反映过，说第一次潜伏侦察，蔡麦田没有完成任务。这次让他再带领尖刀连，是否合适呢？他对武占魁说：“你们赶快换了他，不然就来不及了。上午把情况报告军里。”

武占魁放下电话，心想，第 8 连连长的情况已经向师里报告过，师里可能没有向军里报告。军长直接打电话询问这件事，说明事关重大，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武占魁和副团长宋存银、副政委史玉飞商量，决定再检查一次。武占魁和史副政委立即来到第 3 营，找到营长晁尚志、教导员闫启文，把蔡麦田的情况再次作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蔡麦田是个好同志。第一次侦察没完成任务，提前返回，是因为夜间摸错了方向，与其他潜伏侦察人员失去了联系，不是思想右倾。在连的支委会上他已作过检讨，决心一定要把潜伏侦察搞好。第二次、第三次潜伏侦察任务都完成得不错。武占魁还和大家分析了蔡麦田的一贯表现：历次战斗表现都不错，指挥灵活，勤于动脑，几次潜

伏侦察不但摸清了敌人火力点，还对本连各班潜伏区的地形作了仔细侦察，明确了各排的任务和冲击路线，而且从连长到班长都指定了代理人。如果现在换个新连长上来，情况不熟，指挥更困难，也很难把尖刀连带上去。因此，营团两级领导都认为不换为好。

研究结束，已到下午 13 点，武占魁正准备回团指挥所向军长报告情况，这时第 3 营通讯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团长接电话。

武占魁来到装有电话的坑道，拿起电话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张祖谅。”电话里传来军长的声音，“你们尖刀连长换了没有？”

武占魁汇报了营团领导研究的意见，说还是不换为好。

张祖谅耐心地听了他的汇报，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符合实际，有道理，当即表示：“那好，你们务必把潜伏的准备工作再检查一遍，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马上就办，请军长放心。”

放下电话，武占魁思潮起伏。张军长作为一军之长，对作战准备一直抓到主攻团的突击连长的人选，作风是何等细致周密！而张军长又是这样的民主，虚心听取部属的意见。武占魁怀着激动的心情大步来到第 8 连。

第 8 连指战员们正集中在一个坑道口前赶修的公路上，围着雨布，以班为单位仔细擦拭武器，他们甚至把每一发子弹都擦得锃亮。然后，大家进行红旗签名。坑道口的炮弹箱上铺展开一幅巨大的红旗，红旗上贴着白布剪成的“一定把红旗插到大无名山上去！”13 个大字。干部战士依次在红旗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蔡麦田见团长来到，上前敬过军礼，请示道：“团长，授旗誓师大会是否现在开始？”

“开会吧！”武占魁说。

坑道口，连队全副武装，整齐肃立，人人脸上显得异常紧张和严肃。武占魁站在队伍前面，望着一张张刚毅的面孔，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想说说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他想讲一讲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在开城谈判中的无赖行径，他想讲一讲张祖谅军长、军党委、师党委、团党委对第 8 连的信任，但转念一想，这一切战士都很清楚，不需再讲。于是，决定什么也不讲了。在“授旗开始”的口令声中，武占魁把红旗授给了第 8 连连长蔡麦田。

武占魁紧紧地握住蔡麦田的手，发现这位年轻连长的眼眶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蔡麦田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带领全连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而他自己却在这次战役中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后，张祖谅得知蔡麦田光荣牺牲的消息，心情沉重，沉思了很久，很久。

也就在 6 月 9 日这天，郑维山的第 20 兵团前进指挥所在龙门山开设。新任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已到职。根据上级指示，这一仗仍由老班子郑维山、张南生指挥，新任司令员、政委来到前线主要是了解熟悉情况。

因为担任主要进攻方向的第 60 军原属第 3 兵团建制，所以第 3 兵团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杜义德也来到前线指挥所参观指导。

夜幕降临，张祖谅和副军长王诚汉、副政治委员赵兰田、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以及各参战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们，分别到出发点向参战部队握手送行，祝大家胜利归来。指战员们全副披挂，精神抖擞，头戴伪装，臂扎毛巾，带着军、师首长的嘱托，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

10日凌晨4时前，军指挥所先后接到报告，所有潜伏人员已在敌阵地前潜伏完毕。

在敌人眼皮下的时刻

这一天的黎明似乎来得特别早，这一天的时间又似乎过得特别慢。

张祖谅从清晨起来站在地图前沉思。五万分之一的平面地图，在他头脑里完全是立体的，因为他多次亲自到前沿观察过地形。他确信战前的各项准备相当扎实、周密、细致。他也坚信参加潜伏的每个指战员都会自觉遵守潜伏纪律，克服各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但是，敌我双方毕竟是运动着的活人，战场情况往往瞬息万变，意想不到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不久前，他属下的部队打方形山，有4个连700多人在敌前潜伏，就发生过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就在担任潜伏区警戒的分队出发不久，发现一名战士失踪，还带走一支冲锋枪。

担心，焦虑，揪着各级指挥员的心。

这名战士到哪里去了？在异国他乡，不可能开小差。被敌人炮击伤亡了？也不可能。这一段时间敌人没有向这里开炮。这个战士一贯表现很好，求战心强，会不会不愿在后边留守，追赶连队去了？可他是在连续侦察敌情、地形时，脚被磨坏，行动不便，才让他留守的。如果这个战士真是独自去潜伏区找连队，万一误入敌人阵地，或与敌人遭遇，后果会很糟。

“找！”这个战士所在团的团长王子波命令，“派两个机警战士，一定要把这个战士找到。”这两个同志摸进潜伏区，找到担任警戒任务的连队指导员，一清查，那名战士果然已来到警戒分队中。干部动员他回去，他流着眼泪苦苦哀求，周围战士也帮他说好话，指导员只好同意他留下。

团长王子波接到这个失踪战士下落的报告，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他严厉地说：“积极性可嘉，但违反纪律必须追究。功是功，过是过，打完仗再说！”

就在这4个连潜伏的一昼夜，有的战士被敌人冷枪击中，有的曾与敌小分队遭遇……

当然，这些情况潜伏部队都处理得很好，保证了潜伏的成功。当晚，部队突然发起进攻，只经过14分钟就歼敌400多人。

张祖谅很清楚，那次潜伏毕竟人数比较少，而眼前这次大潜伏，人数是上次的五六倍。这次潜伏，既有步兵，还有炮兵。他知道敌人是拥有制空权的。他还清楚，正面敌军拥有105至230榴弹炮230门，有各种迫击炮130门。这些大炮只要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大批炮弹倾泄在潜伏区。

不过，张祖谅始终把担心装在心里。他沉着、冷静的神情感染了指挥所里的每一个人。

“这一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数着过的。”担任主攻任务的第542团团团长武占魁整天蹲在观察所里，双手抱着望远镜，观察着敌人阵地的动静，观察着潜伏区的情况。

时近中午，警卫员看到他从昨晚起水米没沾牙，便弄来两筒祖国慰问的樱桃罐头。鲜红的樱桃，在银色的小勺衬托下像灿烂的玛瑙。

武占魁拿起小勺吃了一口，樱桃甜甜的，可一想到前面的潜伏部队，喉头像有东西在顶着，咽不下去。他向警卫员摆了摆手：“端走吧，等打完仗

再吃！”

此刻，在潜伏区里的战士们却比他们的团长胃口好得多。昨夜向潜伏区开进，每个人饱受折腾，汗水湿透了军装。下山、上山，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后面的人必须踩着前面人的脚印，防止踏响地雷。上坡的时候，先用手把活动的石头搬掉，再回头伸手拉身后的战友。遇到树枝，必须紧紧握住，交给后面的人，一个一个递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通过才放手。到达潜伏区，既要挖掩体，又不能出声响，远比平时挖工事累得多。所以，当在掩体里躺下来时，大家就觉着肚子饿得咕咕叫。上午，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空隙射进来，给大家以温暖的感觉。战士们不声不响地吃着干粮，有的细嚼慢咽随身带来的大萝卜。离敌前沿稍远一点的战士，也有人利用断断续续的炮弹爆炸声作掩护，咔哧咔哧地开着罐头。战士们称这是“步炮协同”。

上午总算熬过去了。敌我互相发射着冷炮，只是我方的炮打得略为频繁一点，既不致暴露意图，又“关了敌人的禁闭”。

“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各团指挥所不断向师、军首长汇报情况。这些语言听著实在使人感到愉快。

“敌情！”下午2时，武占魁团观察所里几个参谋像被针刺了一下，从炮弹箱上跳起来，身体紧贴胸墙。他们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从敌973高地前沿工事里出来5个人，端着枪向潜伏区走来。

电话铃响，侦察参谋报告：“团长！5个敌人向潜伏区运动！”

“知道了。”武占魁刚把电话耳机放下，另外几个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几天，为监视敌人行动，在阵地前沿增加了不少观察所。此刻，各观察所都在紧张地汇报同一情况。

武占魁举起望远镜边观察，边思索：今天炮火监视得这样紧，为什么敌人还要出来？是一般活动，还是有目的的侦察？怎么处理？不理他，让潜伏部队去收拾？万一收拾不好，阵地上敌人发现目标怎么办？……不能让这几个家伙接近潜伏区！武占魁果断地抓起通向炮兵阵地的电话机，喊道：“给他几炮，马上把这几个家伙赶走！”

半分钟后，像通常冷炮打活靶一样，几发炮弹落在5个敌人身边，敌人慌忙弯腰向自己的阵地跑去。

“敌人跑了！”团参谋长用清脆的声音大声向师里报告。

武占魁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南风拂面，武占魁忽觉身上发凉，用手一摸，原来衣服早被汗水湿透了。

太阳极其缓慢地向西移动。空中几片白云，为潜伏区带来一阵阴凉，但为时十分短暂。阳光的照射，使山坡上的蚂蚁和小咬活跃起来。这些小昆虫似乎知道潜伏区的指战员不会对它们怎样，纷纷从指战员们的脖子、袖筒、裤脚放肆地钻到贴身的衣服下。指战员们痒得真想坐起来脱光衣服好好抖一抖，可是都懂得自己所处的特殊场合，只好咬牙忍着，任凭这些小昆虫在身上肆无忌惮地爬行与叮咬。

太阳，终于慢慢移向山后，离天黑为时不远了。再过两三个小时，如果平安无事，潜伏就可宣布成功，奇袭就可以开始。

然而，沉闷的爆炸声打破了黄昏前的宁静。敌人从山梁后面阵地上发射了几发炮弹，其中有一发落在第535团第2营突击队第5连的潜伏区。

这片灌木丛在夕阳晚照中，立刻就笼罩上了白色的烟雾，不幸的事就在此时发生了。炮弹片楔进战士张保才的双腿，鲜血如泉水般往外冒，染红了

军裤，染红了鞋袜，染红了他身子下面的土地。

极度的痛楚使张保才昏了过去。

待浓烟散后，离张保才不远的战友发现他受了伤。他们多想爬过去给他包扎一下啊！救急包就在衣服口袋里。但想到潜伏纪律，他们忍住心痛，努力控制着自己。他们见张保才从昏迷中醒来，大概怕痛得叫出声来，拼命用牙齿咬着自己的袖子。他们看到张保才汗珠在脸上滚动，脸色由红到白，到黄……终于闭上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那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潜伏区仍是那样平静。太阳已经落山。突然，敌人向第542团潜伏区方向发射了10多发炮弹。团长武占魁立即命令炮兵还击。敌人炮击停止了。第3营副营长晁尚志通过有线电话向指挥所报告：刚才第8连被敌炮火击伤7人，战士荀子清腹部被弹片击穿，肠子流了出来。他没叫一声，自己把肠子往肚子里塞，想用毛巾堵住继续参战，结果，没有多久就牺牲了。

这一天，像张保才、荀子清这样的战士，在整个潜伏部队中涌现出30多名。

纪律，高度自觉的纪律，变成了巨大的无形的力量。3500多人，步调一致，团结一心，赢得了潜伏的胜利。

出其不意，神兵天降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了天黑。师、团指挥员们各自离开观察所，走进自己的指挥所。

担任主攻最高峰973高地的第542团指挥所布置得像要举行盛典。坑道中央，并排摆了两张方形的桌子。桌子上倒立的炮弹壳里，插着几束盛开的金达莱。花前，摆着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慰问的香烟、苹果、水果糖。桌子四周坐满了来自各方面的客人——有来自祖国的作家、记者，也有兄弟部队来参观学习的干部。

武占魁坐在桌旁，拿起电话耳机和师里对表。

在方圆几百里的深山峡谷中，500多门火炮，3500多名指战员，要协同一致地去歼灭有坚固防御阵地的敌人1个团，没有统一的时间是不行的。那时没有标准台对时，以上级首长的表为准。第179师师长吴仕宏、第181师师长钟发生与张祖谅军长对表，团长、炮兵群长与师长对表。逐级对表，一直对到突击排长。

晚8时20分，几发信号弹划亮夜空，我军声东击西的炮火准备开始。敌阵地一片寂静，而两侧山头则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我军两支部队分别向两翼山头攻击前进。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向两侧发起进攻，遂集中一切兵力和火力还击。正当敌人被诱上当之际，又有几发信号弹升上了夜空。我军即将发起冲击的敌902.8、973、883.7高地立即被火红的钢风铁雨覆盖，呈现一片火海。我军数百门大炮猛烈射击。敌人阵地上地雷被引爆，照明雷被打亮，掩蔽部被击中，阵地在燃烧。敌人炮火慌乱地还击，立刻被我强大而集中的火力所压制。7分钟过后，我军炮火向敌纵深延伸。这时敌人判断我方步兵该发起进攻了，进入坚固工事的步兵纷纷钻出来占领阵地。哪卸3分钟后，我方炮火又向敌前沿阵地扑天盖地砸去，再次给敌人以重大杀伤。5分钟后，炮火再次向敌纵深延伸，缩进坑道和坚固工事的敌人再次跑进前沿工事。他们没想到这又是一次假延伸。几分钟后，我方炮火又向敌前沿阵地猛轰。火

箭炮弹伴着排山倒海般的巨大轰隆声，在夜空中划出整齐红色弹道，如闪电似霹雳。敌人阵地被严严实实地戴上一顶火红的帽子。

山坡上的潜伏部队，目睹我军炮火如此威猛，兴奋地吹呼。全部炮火向纵深延伸之后，突击部队分成13个“箭头”，如万马奔腾，迎着火光向各自的目标发起冲击。

突击部队在红旗引导下，向敌人阵地主峰（973高地）冲击。突然，一道铁丝网拦住去路。时间紧迫，组织爆破已来不及。火箭筒班班长李云峰毅然趴在铁丝网上，高呼：“同志们，为了胜利，从我身上通过！”尖利的铁刺扎进李云峰的身体，他咬牙忍着。此刻，人人都懂得争取时间的特殊意义，于是踏着李云峰用身躯架起的胜利桥梁，一跃而过，冲向主峰。

与此同时，“箭头”向敌902.8高地疾进。新战士萧正祥被铁丝网挂掉了鞋，赤着脚随部队冲锋。铁丝网断头和炮弹碎片一次又一次扎破他的脚板。他的脚踏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个血红的脚印，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慢自己的冲击步伐。

山头上火光闪闪，杀声震天，冲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峡谷。

战士勇猛，进攻神速。

据《韩国战争史》对这场激战记载：

“（6月10日）日落西山，第5师与往常一样，第27团、第36团的警戒组在前沿埋伏，执行夜间警戒。这时中共军第60军开始炮击我阵地，并以两个团兵力在中东部战线掀起狂风波浪，矛头指向师的东侧翼。”

“第181师10日下午在松亨集结待命，傍晚开始沿五峰棱线东西两侧分进突入。首先，在第5师左翼949高地，敌人投入连规模兵力佯攻，牵制我军。20时前后，敌人突然发射1万多发炮弹，向师的右翼第27团发起进攻。”

“……敌两个营尾追第1连冲向973高地。前哨阵地被突破，主阵地崩溃。”

“第27团预料到敌人会发动大规模进攻，作好决战准备。这时敌炮火更加猛烈，在883高地、949.2高地主抵抗线一带爆炸，使人寸步难行，有线通信炸断，阵地一片混乱。”

“……这时，敌我炮击达到高潮，爆炸声震天动地，949高地东山坡一片火海。”

“第27团丢失973高地和883高地……右邻第62团阵地依然平静。由此推断，敌人集中兵力攻击第27团的目的显然是逼第5师从北汉江东侧突出部撤走。”

《韩国战争史》的记述应当说基本上是准确的。当时战斗发展的确相当顺利。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我军通信器材实在落后，部队冲击前进时，团、师、军指挥所几乎只能靠空中的信号弹了解冲击进展情况。信号枪也难免出故障。于是，战斗就出现了一些令人心焦的时刻。

第542团第3营本来已经攻上973主峰，可是有线电话没架通，无线电呼叫不上。第181师师长钟发生打电话向团长武占魁了解情况，武占魁汇报了自己的判断，钟师长还是担心部队没打上去。

联络不通，有什么办法？武占魁只好派作训股长亲自到前面了解情况，并立即报告。

团长、师长着急，军长、兵团司令也着急。

第 20 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亲自打电话给张军长：“张祖谅吗？怎么搞的，仗才开始就放羊啦！”

张祖谅心里何尝不急，但他仍用平静的口气向郑维山报告说：“我们正在搜集情况，很快上报。”

第 181 师的情况报上来了，第 179 师的情况还是上不来。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立即派两名参谋到第 179 师前进指挥所了解情况。他们来到第 179 师前进指挥所，只见师长吴仕宏正在焦急地等待攻击 902.8 高地的第 535 团的情况。后来了解到，原来第 535 团把电台放在一个洞里，天线也在洞内，当然联络不上。后来电台搬了出来，才沟通了联络。

战况终于弄明白了。各突击队总共只用 70 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 902.8 高地、973 高地、883.7 高地——敌军第 27 团防守的大部分阵地 10 余平方千米，歼灭第 27 团第 1、2、3 营和师部搜索连。

正如张祖谅在战前所预料的那样，丢失阵地的敌人像输急了的赌徒，为了挽回败局，拼命组织反扑。他命令部队：一定要抓住这一机会，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攻占三个高地的指战员们连夜改造和加修工事。各营的二梯队也逐步加入战斗。

11 日天刚刚放亮，敌人飞机就来到我军所占阵地上空进行侦察，并轰炸扫射。随后，敌人以 3 个团的兵力，在炮兵掩护下，轮番反扑。

在军前进指挥所里，张祖谅沉着镇静，指挥若定。他时而走出坑道，用望远镜向前方阵地观察，时而回到指挥所认真听取从各师发来的战报。他知道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后勤，抓补给，把弹药及时地送往前方，组织好步炮协同，利用火力大量杀伤反扑的敌人。

作战科长报告，前沿部队反映，弹药有些供应不上。张祖谅，这个从来不向上级叫苦伸手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毫不犹豫地亲手摇通了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的电话。

“郑司令员吗？我是张祖谅。部队弹药供应不上，请兵团支援一下。”

郑维山知道，张祖谅这个人向来不讲价钱，不叫苦，此时他提出弹药问题，一定很吃紧。但当时天上有多架敌机疯狂地轰炸扫射，战场炮火连天。如果靠人背肩扛输送，费力费时，也供不应求。郑维山决心用汽车输送。他亲自向后勤部门指示，将汽车在坑道里装满弹药，选好道路，掌握时机，加大油门向前冲。

好一个出乎敌人意料的一着。当敌人飞机侦察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10 辆满载弹药的汽车已有 9 辆到达目的地，只有 1 辆中途中弹受损。

激战，夜以继日的激战。

在我军新占 973 高地上，第 181 师第 542 团第 1 连第 6 班班

长罗子周率领全班坚守在最前沿。他们发扬孤胆作战精神，从 6 月 12 日凌晨 3 时到晚上 8 时，连续打退敌人 23 次反扑，歼敌 420 余名。阵地前，横七竖八堆着大批敌人的尸体。

在我军新占 883.7 高地一个前沿阵地上，只剩下战士潘正光一个人了。这个四川籍的战士，虽然右臂负伤，鲜血直淌，但毫无惧色。他把手榴弹捆起来，把战友们留下的冲锋枪压满子弹，打退了成群敌人 27 次冲锋，在炮火支援下，歼敌 200 多名。阵地始终屹立在他的脚下。。

我突击部队在炮兵支援下，苦战 4 昼夜，先后击退敌人一个排至两个营

兵力的反扑共 190 余次，歼敌 7812 名，巩固了全部阵地。大潜伏成功了！

3500 多名步兵的潜伏，几百门大炮的伪装和潜伏，都搞得神不知，鬼不觉。

南朝鲜军队 70 年代编写的战史上，还搞不清我军为什么进攻得那么神速，不明白他们的“主抵抗线”为什么会迅速崩溃。

失败，当然是不愉快的。南朝鲜军和美国军队的军官们免不了互相埋怨。

南朝鲜军副师长韩信上校撰写的战场“证言”说：“883 高地、973 高地落入敌手后，第 35 团和增援的第 3 师第 22 团进行了反击，结果反击均遭失败。最后，这两个团损失太大，连第二道防线都无法防守。这时，美第 8 野战军司令官来到前方观察所，我和各团团团长建议，暂时转入防御，得到兵力和火力增援后再夺取高地。唯独师长主张反击。泰勒听了师长的话后，似乎抱怀疑，我们也都十分惊讶。这时战局已急转直下。假如当时决定转入防御的话，还不至于这么轻易遭到失败。后来从顾问那里听说，当时美司令官也并没有抱希望，但同意了师长的意见。可见指挥官的决心是多么重要。”

显然，这位副师长对他们师长的不明智很是不满。

南朝鲜军第 27 团第 1 营营长崔奎宣中校的“证言”叙述了他当时的惨状和心态：“战斗开始时，我方遭敌数万发炮弹的轰击，我团防守阵地遭到的炮击尤甚。虽然预料敌人发动进攻，但直到敌两个营出现在我营阵前时，才知道进攻规模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与敌对抗，其残酷性难以言状。血战中，两个连的连长和营搜索队队长全都战死，伤员剧增，主抵抗线崩溃。973 高地丢失后，第 35 团前来增援，经 3 昼夜苦战，非但没有成功，连第 35 团也损失过半……晚上接到撤退命令，但这时已无退路。在 100 号公路上，中共军人来来往往，北汉江上的桥已经毁掉，加上到处是我军装备的爆炸声和火光，更加重了士兵的恐惧心理，好像敌人就在身边似的，于是竞相跳江逃命。有的士兵抱着橡胶睡垫，有的则徒手游渡。这中间有 20 多人丧生，我也因中途抽筋几乎丧命。”

战争中，胜利者的心情自然是无比兴奋和喜悦的。

郑维山、杨勇、王平、许世友、杜义德等兵团首长来到第 60 军指挥所的坑道，对第 60 军热情表扬和鼓励。许世友拍着张祖谅的肩膀说：“张军长有魄力，把几千人潜伏到敌人鼻子底下了，出其不意，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发来嘉奖令。电文称：

我军 60 军此次反击 883.7 高地（含 973 高地）和 902.8 高地战斗，是我从敌 1 个团阵地同时突击，并占领了该团的主峰阵地，仅经 1 小时零 10 分钟战斗即歼敌 1 个团大部的范例。这说明了只要我们战前真正作到充分周密的准备和细致的组织步炮协同，并把指挥的技巧与部队的英勇顽强相结合，同时冲锋突破敌 1 个团的防御阵地是完全可以的。我 60 军首创我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 1 个团大部的范例，特予通报表扬。望再接再厉。

继续稳扎狠打，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

军联合司令部

1953 年 6 月 12 日

战报传到了汉城，传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传到了板门店。对方态度忽然变得老实一些了，停战谈判文件全部达成了协议。双方军事人员划分军事分界线时，一条粗粗的红杠把 883.7、973、902.8 等高地划在了我方控

制线之内。战线拉平了，敌人的突出部被切掉了。

“OK？”我方代表目视对方军事人员在问。

“OK！”对方军事代表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摊开了双手。

文经武纬的战将张翼翔

邓湘田 康月田

张翼翔（1914~1990）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4年5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1928年10月在本县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游击纵队交通员。1929年12月参加红军，任第3军团第2纵队战士。1930年任湘东独立师班长、第16军第7师排长和连长。1932年任红8军第22师连长、副营长。1933年为江西红军学校学员，同年任第3军团第6师营长。1935年任第17师参谋、营长。1937年任第6军团第52团参谋长、第6军团军部参谋。后为延安“抗大”一队学员。1938年任淮南第4支队第8团参谋、教导大队队长和大队长。1939年任第5支队特务营营长、淮南第4支队第14团副团长和团长。1942年任淮南第2师第6旅副旅长。1943年为淮南华中党校学员。1944年任淮南第2师第5旅副旅长兼西分区副司令员。1945年任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苏浙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1纵队第3旅旅长。1946年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谋长。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9年10月任第20军军长。1950年11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军长兼政委。1953年1月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1958年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63年12月任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1968年3月负责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同年6月兼任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69年5月任第二炮兵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4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负责常务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期间，曾两次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放牛娃出身的张翼翔，戎马一生，从士兵逐级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他参加过中央苏区的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艰苦卓绝的长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历次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参加和指挥过许多战役、战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军有方，对部队建设、国防尖端与军事科研都尽职尽责，工作出色，显示出很高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才能。本篇所记叙的是他从解放战争初期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所创光辉业绩的几个片断。

在津浦线受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坚持卖国、独裁的国民党蒋介石，又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内战。刚刚晴朗的天空又出现战争的阴云。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方针，并为此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1945年9月20日，在浙东四明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的苏浙军区浙东纵队，接到新四军军部急电，指示“放弃浙东，全军北撤”，命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武装人员外，在7天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江北。

接到命令，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和纵队领导同志一起，立即筹集船只，集中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开展宣传动员，布置善后工作，确定北撤行动部署，毅然决然在7天内率纵队1.5万人渡海北上。他们挥泪告别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与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浙东父老乡亲，开始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新征程。

1945年11月，奉党中央之命，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北撤之浙东、浙西、苏南新四军部队和党政机关组成新四军第1纵队，立即开赴东北，协同东北部队执行发展东北解放区的任务。11月10日，新四军第1纵队正式成立，下辖3个旅。第3旅由原浙东纵队组成，张翼翔任旅长。

11月下旬，张翼翔率第3旅到达滨海地区休整，待命进入东北。

然而，战局瞬息万变。国民党第13军、第25军突然在秦皇岛登陆，占领山海关，又长驱直入攻占锦州，切断了华北我军与东北我军的联系，并进占沈阳。中央遂命新四军第1纵队停止进入东北，待命行动。不久，又令第1纵队留山东地区作战，编为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在莒县朱梅地区休整待机。

张翼翔所率第3旅浙东兵居多，初到山东，与当地老百姓一时难以沟通。当地干部说：这些南方兵，讲话像鸟啼，叽里呱啦，一句也听不懂，好像来了一批外国兵；个个留长发，好像来了一批学生兵；不少人盖五颜六色的绸面丝棉被，有人还穿绸衬衣，好像来了一批少爷兵。有群众悄悄议论：“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

部队从南方来到北方，生活上感到诸多不习惯。在浙东吃惯了大米，吃不惯北方的面食，更吃不惯高粱米。在山东，小米是上好的细粮，山东人民尽量省下小米供应部队，可这些南方兵没吃过小米，连淘都不会淘。

面对这些情况，张翼翔认为，部队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适应山东生活，尽快扎根于山东人民之中。过去在浙东，我们就是依靠群众才站住了脚；如今到山东，也一定要和这里的老百姓打成一片，才能无往而不胜。

他反复向部队讲明军民鱼水一家人的道理，积极倡导指战员开展与房东谈家常、帮助房东做家务等活动。年轻战士接受新事物快，刚学会几句山东话，就用手势比划着，与当地群众交流起来，使群众很快明白了这支部队来自盛产丝绸的江南鱼米之乡。在那里，穿件绸衣，盖条绸被，是很平常的事，并非就是地主资本家。那里很多人留小分头，也不是什么不良习气。而且，这支部队曾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腹地区，在长江南北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许多贡献，同样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

群众渐渐同部队靠近了，他们主动到连队伙房去，帮助部队淘小米，做面食。

张翼翔抓住群众帮助部队的每一件小事，在部队中广为宣传。又请来当地干部，给部队作根据地斗争史和新旧光景对比的报告。还组织指战员访问翻身农民，听他们忆苦思甜，听他们讲老区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指战员们深深体会到，在老根据地，恶霸地主确实打倒了，穷人确实翻身作主人了，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普遍提高了，社会风气确实纯正了，这里确实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了。

人民了解了部队，部队也了解了人民，军民之间关系更密切，感情也更亲近了。山东老区开始成为这些南方人的第二故乡，部队北撤以来因远离乡土而产生的思想波动渐渐平息了。

1946年1月上旬，第1纵队向津浦线开进，准备攻取兖州。纵队交给第3旅的任务是在鲁中地方武装配合下，包围监视泰安的日伪军，破袭泰安南北铁路，防敌南援。

接到战斗任务后，第3旅指战员人人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张翼翔率领部队迅速北上。

这时，虽然日本早已宣布投降，但中国军队对遍布中国城镇的日军的受降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况且，我们要受降，国民党也要受降，斗争是尖锐复杂的。

泰安、大汶口地区驻扎着日军的“至锐”旅团。纵队指示张翼翔要尽可能以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先孤立“至锐”旅团，消灭伪军，然后迫使“至锐”旅团向我军投降缴械。

张翼翔为此作了一系列努力。

当我军对兖州的攻击刚开始，张翼翔就率部迅速实施了对泰安、大汶口日军的严密包围监视，并派员向日军下达通牒，严令他们不得参与中国内战，听候命令准备投降缴械，迫使日军在我军主力攻击兖州时未敢轻举妄动。

此时，国共双方停战令即将生效，为争获受降权，国民党军密令“至锐”旅团务于停战令生效前撤至济南缴械，同时令泰安、大汶口伪军接替日军防务。张翼翔当即指出，日军目前在我军包围圈内，理所当然应由我军受降。为击破国民党军争夺受降权的阴谋，他命令一部兵力配合鲁中地方武装迅速包围泰安，集中主力阻止日军北撤。

1月12日黄昏，赤柴日军北撤。张翼翔当即命令部队进占该地，并将接替日军之伪军击溃。撤退日军集中于大汶口、东太平后，又分两个梯队开进。当其先头部队进至百子坡时，张翼翔指挥部队坚决予以阻击并收缴其武器，迫其退回原地。

1月14日，即国共双方停战令生效的第二天，济南国民党军队一部南下，有接应日军北撤的企图。为争取时间，进一步迫日军向我投降，在纵队统一指挥下，张翼翔以一部兵力配合第2旅包围华丰、大汶口、东太平之敌：以旅主力控制泰安、大汶口之间地区，防敌北窜。之后，我部施以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迫使日军于23日交出汽车37辆，各种火炮11门，轻重机枪56挺，步枪800余支，各种炮弹、子弹3万余发和大批辎重。

此时，我军迫使日军投降缴械任务已经完成，遂放其撤向济南。为防止日军报复，张翼翔令部队在日军开进道路上布置兵力，严密监视其行动。

抗战八年，日军疯狂嚣张一时。今天，看着日军“至锐”旅团3000余人在我军监视下，犹如丧家之犬，狼狈撤退，张翼翔和指战员们确实感到大快人心。

收复泰安

津浦线讨逆受降任务完成后，因停战令已生效，国内出现了暂时和平。张翼翔奉命组织部队一面继续包围泰安等地伪军，一面转入战备休整。

对于停战，张翼翔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国民党交手多年，教训颇多。他认为，是战是和，最终不取决于共产党，而取决于国民党。因此，必须作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实现和平，这是人民的渴望，形势的要求；另一手则要准备战争，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样的两手准备，是要吃亏的。

根据纵队指示，他积极组织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开展军事练兵，抓紧战术、技术训练，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为迎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作好了军事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国民党果然并无停战诚意，不久便开始进攻我东北解放区，继而又包围我中原李先念部队，同时增兵华北、华中、山东。泰安被围之伪军也蠢蠢欲动。

5月间，形势越发明朗。党中央明确指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6月1日，党中央又进一步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为迎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策应中原和苏皖我军的对敌斗争，以利尔后机动作战，山东野战军决心拔除山东解放区内残存的伪军据点，并令第1纵队围歼泰安伪军警备第1旅宁春霖部和大汶口伪军第5路军吴化文的第1团赵广兴部。张翼翔奉令率部协同第1旅执行夺取泰安的作战任务。

泰安城北靠泰山，其西关与津浦铁路毗邻，是该城商业中心，主要建筑物大部分布于西关一带。守敌宁春霖部，系日寇投降后由7个县的伪保安团纠集而成，共3个团和1个特务营，全部驻守在城内和西关。其中西关为其防御重点，有6个营的兵力在西关及沿城墙一线。西关各重要街道均筑有巷战工事，设有各种障碍，又利用医院、学校、教堂等高大建筑物作为支撑点，依据城墙和城壕作为屏障。

纵队确定以西关为主要突击方向，由张翼翔指挥第3旅（欠第7团）及隶属第1旅之第1团共3个团兵力担任对西关之敌的攻击。

受领任务后，张翼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敌情，研究打法。经反复研究，决定以第1旅第1团担任对共和街以东和伍家庙以西、以北至西门外大街地域之敌的攻击，得手后继续夺取基督教堂，断敌退路，并肃清该地域之敌；以第8团先行肃清共和街以西、奈鸟河以东地域之敌，尔后夺取电灯公司，继续向北夺取翠英中学；以第9团肃清奈鸟西北地域之敌，并配合第8团夺取翠英中学。

张翼翔深知，夺取西关将是一场恶战。他亲自组织战前各项准备工作，除反复研究作战部署和作战指挥外，还组织各级干部和突击连的战斗骨干进行反复细致的敌前侦察，确定突破口和运动路线，研究火力组织、战斗队形以及在战斗中怎样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等。攻城器材、弹药等也都作了周密的筹划和准备。

战斗发起前夕，纵队政治部发布紧急动员令，号召指战员为保卫和平而战，为保卫山东解放区而战。

张翼翔也对部队作了深入的战斗动员。根据第3旅自身的情况，还提出了“打响第一炮，与老大哥比赛”的口号。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6月7日夜，我军的冲锋号声格外响亮，猛烈的枪炮声划破天空，连续不断。攻城战斗开始了。

各路部队在泰安外围与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在西关主攻方向，张翼翔亲自指挥突击部队，以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突然猛烈动作，乘着炮火，扫雷区，越铁丝网，跨深壕，连续突击，强行爆破，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迅速进入巷战。第9团占领过街楼、教场口地区，突入财源街，继续向纵深发展。第8团占领粮食市街，攻取下河桥与第9团会合后，即向电灯公司、浸信会逼近。第1团从第8团右侧突入财源街，向东北方向发展。

敌遭我突然打击，被迫放弃前沿一线阵地，企图利用街道工事，凭借高

大建筑，坚守基督堂、伍家庙、电灯公司等要点，并在局部阵地实施小分队反冲击。

为粉碎敌之顽抗，张翼翔调整部署，与敌展开争夺制高点的战斗。他命令炮火猛烈压制敌火力点，摧毁碉堡工事，直接支援步兵，同时令步兵采用搭人梯、翻墙头、打壁洞等手段，打通道路，穿越民房，从两侧迂回分割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残敌逃入城内。

8日午后，张翼翔指挥部队夺占西关。

与此同时，东关、南关、北关的战斗也进展顺利。敌龟缩城内，我攻城部队直逼城垣。

泰安守敌手忙脚乱，一片哀鸣。

纵队首长决心乘胜攻城，不给残敌以喘息之机。遂令各部队作好攻城准备，并调整部署，确定以城西和城南为主攻方向，以岱庙伪旅部、天主教堂、伪县政府为主要攻击目标。

由哪个部队担负这项重要任务呢？任务区分时，司令员叶飞等纵队首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张翼翔。在夺占西关的战斗中，第3旅斗志旺盛，勇猛顽强，有一股势不可挡的锐气。叶飞当即决定，以张翼翔率第3旅由城西主攻。

经过一天紧张的攻城准备，10日黄昏，部队隐蔽进至前沿进攻出发阵地。战士们摩拳擦掌，精神抖擞，急切地等待总攻的战斗号令。

18时，总攻开始了。顿时，炮火冲天，枪声猛烈。第3旅首先利用紧靠城墙之有利阵地，组织密集火力。10余门山炮、迫击炮，80余挺轻重机枪，对预定突破地段实施猛烈射击，摧毁敌城墙碉堡工事和火力点。

守敌依仗坚固的城防工事拼死抵抗。

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张翼翔指挥突击队奋勇越过城壕，冒着敌密集火力架梯登城。第8团第4连首先打开并巩固突破口，将红旗插上泰安城头。该团后续部队迅速楔入城内，乘胜攻占天主教堂和伪县政府。第9团突击队登城后，直取岱庙，在第8团一部配合下，攻占岱庙伪旅部，并沿城墙向北门发展。残敌纷纷向城东南、东北方向逃窜，均被我友邻部队分路兜截，被歼大部。

当夜10时，战斗胜利结束。是役历时3天，歼敌3000余人，俘敌副旅长、参谋长等高级军官，被山东野战军誉为攻坚战的一个成功范例。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46年6月底派军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号召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以争取逐渐改变军事上敌强我弱的局面，直至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张翼翔和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与兄弟部队一起，投入了伟大的全国解放战争。

鏖战淮海

1948年9月，张翼翔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当时，华东野战军举行的济南战役已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举行淮海战役。

10月14日，华东野战军在曲阜召开作战会议，讨论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张翼翔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会后，第1纵队随第6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之后，进至郟城、马头以南地区，待命协同攻歼杨家集、瓦窑地区之敌第100军，尔后协同友邻部队聚歼新安镇之敌黄百韬兵团及第63军等部。

就在淮海战役打响的前夜，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因患黑热病突然病倒，指挥部队的重任落在了张翼翔肩上。

10月26日，第1纵队从兖州地区出发，和兄弟部队一起以排山倒海之势分数路挥师南下。张翼翔和广大指战员肩负着人民的期望，满怀胜利的信心，迅速逼近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镇、阿湖地区之敌黄百韬兵团。

华野部队挥师南下，敌人惊魂失魄。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坐卧不安，连电告急。

蒋介石为遂行事先拟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一面严饬刘峙集团加紧收缩兵力于徐州地区，一面急令参谋总长顾祝同飞抵徐州督战，妄图击退我军进攻，并乘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尚未会师之际，歼我华野主力一部。处在敌人所谓“一点（徐州）两线（津浦、陇海）”防御部署右翼的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惧怕遭覆灭的命运，接到命令后，仓皇率领第25、44、64、100等4个军，向徐州方向退却。为防我军跟踪过河，不待其后尾撤完，便将运河铁桥炸毁，将船只尽行破坏，以致把担任左翼掩护任务的该兵团第63军丢弃在运河以东。

鉴于徐州之敌有总退却征候，11月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电示华野、中野：“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要求务必做到：第一步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歼敌全部于长江以北。同时强调：“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命令中野主力直出宿县；华野乘敌慌乱西撤的有利时机，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

根据上述指示，野战军首长立即作出各个纵队展开追击、截击的部署。11月9日，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示张翼翔：敌第63军已于昨日下午2时撤离新安镇，企图经窑湾渡运河西逃，在其逃经堰头时，已被第9纵队歼灭一个团。你纵应立即向窑湾方向开进，首先追歼该敌，尔后协同友邻，直捣黄百韬司令部。

张翼翔将这个任务传达到部队后，广大指战员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决心将敌第63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在窑湾镇。

8时许，部队自小归昌地区出发追歼该敌。

广大指战员不顾半个月来急行军的疲劳，紧紧咬住逃敌，穷追不舍。敌人逃窜沿途遗弃的军用物资随处可见。经过近百里的追击，终于当日傍晚将敌第63军紧紧包围于窑湾地区。黄百韬所率另4个军，也已被我友邻部队分别包围在碾庄圩和曹八集一线。至此，整个黄百韬兵团落入我华野主力重重包围之中，形同瓮中之鳖。

窑湾镇，西临运河，北靠沂河，位于两河会合之处，南、西、北三面被运河环抱，东面有一条三四米高的围墙，墙外有断续外壕和水塘相连。镇四周地形开阔，多小村落。镇内居民3000余户，素有苏北“小上海”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先后在这里筑有防御工事和若干碉堡。敌第63军逃至窑湾后，眼见无法渡河逃脱，决定固守待援。

敌第63军原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部队，战前从南京、芜

湖一带调到淮海战场。军长陈章是10月初由第62军副军长升任的。对此，黄百韬曾忧心忡忡地说：“战前换将，兵家所忌。”第63军大多数官兵都是广东人，初到苏北、鲁南，水土不服，加之吃不饱，穿不暖，士气低落。仓皇逃到窑湾后，绝粮断炊，濒临饥寒交迫的绝境，军心更加动摇。

根据窑湾的地形特点和敌人仓促布防、立足未稳、工事不坚、士气低落、军心动摇的情况，张翼翔决心不予敌以任何喘息机会，采取急促勇猛的战斗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打敌措手不及。在纵队行进间，他即令第1师、第2师、第3师，分别由东、北、东南三面包围压缩敌人，首先肃清外围，同时作好不经调整部署即可转入总攻的一切准备，坚决于12日前全歼窑湾之敌。

张翼翔用电话将上述决心和部署向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作了报告。粟裕在电话中询问：“你们1个纵队消灭敌人1个军，有把握吗？”

“有！”张翼翔坚定地回答。

“好，预祝你们胜利！”

接着，粟裕提醒张翼翔：敌第63军虽然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但受反动宣传较深，不了解我军俘虏政策，有可能负隅顽抗。因此，要注意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

最后，粟裕兴奋地告诉张翼翔：东北野战军已将卫立煌集团47万余人就地全歼；华北傅作义集团60万人，面临东北、华北我军夹击之势，已成“惊弓之鸟”；徐州刘峙集团貌似庞然大物，也是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

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和全国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极大地鼓舞着张翼翔和纵队全体将士。

10日拂晓，各师按纵队的部署，采取击破一点、大胆猛插、直捣纵深的战术向窑湾发起攻击。是日午夜，第1纵队完全控制了窑湾外围阵地。

在部队向敌外围发起攻击的同时，10日上午，张翼翔在腰庄召开有各师师长、政委参加的作战会议。经过深入研究，并报请野战军首长批准，决定：以第1师担任主攻，首先由东门或大东门突破，歼灭该镇中部之敌，继而向两侧和纵深发展，与第2师、第3师打通联系；第2师由北门突破，歼灭该镇北部及西部之敌，打通与第1师的联系；第3师由南门及南门、大东门之间突破，歼灭该镇南部之敌。

会后，张翼翔同纵队几位领导带领师、团干部，亲临前沿勘察地形，研究打法，选择突破口，周密部署兵力火力。整个部队士气高昂，信心倍增。

11日下午4时30分，总攻开始，我军强大的炮火向敌人主阵地和军指挥所猛烈轰击。顿时，镇内硝烟弥漫，火光四起。

第1师先头部队第2团第2连，乘敌火力点被我压制之机，连续炸开两道鹿砦和围墙，迅速突入小东门，连续打退敌人3次反冲击，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第2团乘胜在一小时内全部进入突破口，并分路向纵深和两侧发展进攻。随后，第1团、第3团也相继投入战斗，积极向敌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分别从北门和南门发起进攻的第2师、第3师，也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但因地形不利，敌人拚死顽抗，几次突击均未奏效。

张翼翔鉴于第1师进攻发展顺利，即令第2师第6团改由小东门突入镇内，直插北门，策应第4团。21时，在第6团配合下，第4团突破北门，并倾全力向南发展进攻。

这时，第3师主力在第1师的策应下，也突破了大东门，并乘胜向西发

展。

但是，困兽犹斗。正如野战军首长所指出的那样，敌第63军由于不了解我军的俘虏政策，加之老兵油子多，仍负隅顽抗，妄图固守待援，进行垂死挣扎。

与此同时，刘峙集团以3架飞机数次向第63军阵地空投粮食和弹药，妄图促使该敌作绝望挣扎，以延缓其覆灭的命运。

敌人的垂死挣扎，更激发了我军迅速彻底歼敌的决心和勇气。第1纵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更加迅猛地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席卷窑湾镇，逼使残敌纷纷投降。敌军长陈章见大势已去，待援无望，慌忙带领卫兵向运河方向逃窜，企图泅水潜逃，刚逃到河边，就被我严阵以待的截击部队当场击毙。

12日拂晓，窑湾战斗胜利结束。第1纵队共计歼敌第63军2个师5个团1.3万余人，给黄百韬兵团以沉重打击，为华野完成中央军委赋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受到野战军首长的通令嘉奖。这次作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战法，以1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1个军的成功战例。

战斗刚结束，野战军司令部就通知张翼翔前往野司接受新的任务。

原来，黄百韬兵团被我军严密包围之后，蒋介石大发雷霆，责备刘峙无能，令杜聿明回徐州任“剿总”副总司令，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并限于20日与黄百韬兵团会师；同时令黄维兵团急进宿县，另组织第6、第8两个兵团北援。敌在徐州猬集兵力近80万人，企图与我会战，在中原战场作最后挣扎。

为阻击东援之敌，保障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华野命令张翼翔率部加入阻击兵团，西与鲁中南纵队、东与第11纵队并肩由房村东西向狼山、鼓山地区的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翼侧攻击，以攻势行动阻敌东援。

11月13日，第1纵队渡过运河，经3天急行军抵达房村地区，迅即向狼山、鼓山发起攻击，以威胁东援之敌右翼，配合正面防御兵团阻敌东援。

狼山、鼓山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当时为邱清泉兵团右翼据守。我第1纵队指战员对邱兵团无不恨之入骨。这个自诩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以来，常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与我军作战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气焰十分嚣张。战士们听说又要与该敌作战，顿时情绪激昂，纷纷表示决心，誓在淮海决战中钓住这条“大鱼”，不使其漏网。

经过精心布置，11月18日夜，张翼翔发出攻击命令。第2师、第3师分别向狼山、鼓山守敌邱兵团所属第70军发起攻击。经两日激烈战斗，予敌以严重杀伤，攻占鼓山和狼山大部分高地。

邱清泉为解除其右翼的威胁，严令第70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多次向第1纵队狼山、鼓山阵地猛扑。战斗甚为激烈，我军阵地得而复失。

干部战士虽然伤亡很大，但士气极为旺盛，以“不完成任务，决不下山”的英雄气概，与顽敌展开更加激烈的搏斗。

敌连攻数日，死伤惨重，东援无望。

我阻击兵团经过顽强抗击，殊死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东援黄百韬兵团的企图。

在战役第二阶段，为坚决阻击“徐敌”南援，保障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华野首长决心以5个纵队南下求歼李延年兵团；以8个纵队编成东、南、西

3个阻击兵团，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分别在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50千米的正面上，采取弧形纵深配置，组织防御战斗。第1纵队奉命与第4纵队、第12纵队编成东阻击兵团，由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第1纵队位于兵团的最右翼，任务是以水口为中心组织防御，阻击邱清泉兵团南援。

这时，第1纵队经过连续20多天的行军作战，减员较多，部队十分疲劳，有相当一部分连队建制不全。张翼翔和纵队领导经过深入分析敌我形势，认真总结过去与该敌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全纵队大张旗鼓地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大家发扬我军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坚决阻击邱清泉兵团南援，保障中野全歼黄维兵团。

恰在这时，毛泽东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发表，其中关于“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英明论断，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完成阻敌任务”的决心书、保证书，像雪片一样飞往各级领导机关。

张翼翔又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反复勘察地形，研究防御战术，制定防御措施。

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张翼翔决定采取纵深梯次部署，组织3道防线：以第1师在水口、小店、下洪地域，担任第一线防御任务；以第3师在玫瑰山、赵家崔地域，担任第二线防御任务；以第2师在宝光寺、褚兰以南地域，担任第三线防御任务。

各师受领任务后，即于11月21日迅速进入阵地，不顾疲劳，不畏严寒，夜以继日地构筑野战工事。至23日，全纵队构筑成以堤埂为依托，以地堡群为骨干，与交通壕和散兵坑相连接的梯次纵深防御体系。大家充满信心地说：“让敌人的‘王牌军’在我们筑起的铜墙铁壁面前碰个头破血流吧！”

11月24日5时，邱清泉兵团第70军一部向我第1师水口阵地发起进攻。当敌进至我前沿阵地约300米时，我军各种火器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窜回黄河故道以北。为破坏敌人进攻准备，第1师乘敌立足未稳，连夜组织部队向该敌实施多次反冲击，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敌遭我军突如其来的冲杀，伤亡惨重，被迫218

后撤至尖山地区。

25日，邱清泉兵团主力第5军攻占第1纵队友邻阵地杨家洼后，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分路向第1纵队防御阵地猛攻。战斗空前激烈。

我全体将士以“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同疯狂的敌人进行顽强的阵地争夺战，前仆后继，寸土不让。

经过6昼夜鏖战，张翼翔指挥部队大量杀伤和消耗敌人，挫败了邱清泉兵团的南援企图，有力地保障了友邻部队歼灭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

徐州之敌南援和蚌埠之敌北援的企图失败后，困于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愈加惶恐不安，连连呼救。

蒋介石为避免其嫡系主力重蹈黄百韬兵团之覆辙，急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绕道萧县和永城南下，袭击我中野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危，偕同南逃。

11月30日，总前委向全军发布动员令，要求各部队在徐州之敌倾巢南犯或向西南或向两淮逃窜时，应不顾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坚决予以就地全

歼。

是日晚，杜聿明率领3个兵团及徐州地区国民党军政机关、后方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约30万人，放弃徐州，分多路纵队，蜂拥而下，向徐州西南推进。

野战军首长当即以11个纵队的强大兵力，采取多层多路尾追、平行追击和迂回拦击相结合的战法，展开全线猛烈追击。

张翼翔率第1纵队以第1师为右路，第3师为左路，第2师和纵直居中，迅速越过津浦线，向萧县方向追歼逃敌。

为了抓住敌人，张翼翔指示各部队，坚决不要为小股敌人所迷惑，大胆插入敌纵深，勇猛追歼。广大指战员不顾疲劳，历尽艰难，如猛虎下山，直扑敌人。

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如丧家之犬，西逃时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军用物资、军事文书到处可见。在我军强大兵力的追击下，敌掩护部队整营、整连地被歼灭，被我穿插部队甩在后面的敌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成群成群地当了俘虏。

12月4日，第1纵队攻占芒砀山，与第9纵队胜利会合，并封闭了杜聿明集团西逃的通路。5日，第1纵队协同华野主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李石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

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后，蒋介石仍在做解救黄维兵团的黄粱美梦。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杜聿明重新调整部署，企图以三面掩护、一面突击、逐次跃进的战法，拼力向西南突围。

针对敌人的部署与企图，华野首长决定采取三面突击、一面阻击的战法，乘敌立足未稳、调整部署之机，大力紧缩包围圈，坚决阻敌向西南突围。

张翼翔奉命率第1纵队以李石林为目标攻击前进。当面之敌系李弥兵团部及第9军和第41军一部。为保持连续攻击能力，张翼翔决定各师轮番作战，首先以第2师、第3师向赵破楼和王白楼攻击，第1师为预备队。

在紧缩包围圈的战斗中，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意志，同敌人进行反复激烈的争夺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围攻夏砦时，敌人的碉堡群封锁了第1纵队前进的道路。在紧急关头，第1师第1团特务连副排长庄德佳和第3连战士赵林临危不惧，抱起炸药包向敌人碉堡群冲去。赵林小腿中弹，鲜血染红了棉裤，但仍忍着剧痛，一步一步地爬向敌碉堡，将敌碉堡炸毁，自己也壮烈牺牲。庄德佳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用炸药包、手榴弹与敌人拼搏，直到光荣牺牲。

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广大指战员越战越勇。至12月中旬，张翼翔指挥部队相继攻克刘庄、豆庄、蒋庄、阎庄等敌占村落数处，会同兄弟部队将敌两个兵团8个军20万余人，紧紧围困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东、西10千米、南北5千米的狭小地区内。

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将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夺取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彻底胜利。消息传来，第1纵队全体指战员欢欣鼓舞，群情振奋。

17日，华东野战军召集各纵队领导人会议。会上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合举行的平津决战，已经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退路。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中央军委决定，淮

海前线全军转入战场休整，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打”、两个星期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及野战军首长的部署，第1纵队与兄弟部队一起，采取大规模近迫作业的办法，将战壕延伸到距敌人阵地的最近处，一面包围监视敌人，一面轮番休整部队，进行总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1月6日，向杜聿明集团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总攻开始。张翼翔奉命指挥部队在第4纵队、第12纵队的协同下，首先歼灭夏庄之敌；接着向朱楼、邓楼、竹安楼方向突击，分割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联系，与第3纵队一起歼灭李弥兵团残部；尔后西进，参加聚歼杜聿明指挥部及其主力邱清泉兵团。

傍晚，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第2师采取连续爆破、连续突击的战法，一举攻下敌人的要点夏庄。与此同时，第3师也夺取了夏庄至夏砦间的敌人碉堡群。

是日夜，张翼翔决心以第3师第7团、第9团夺取罗河堤，割裂朱小庄与丁枣园敌人的联系。

罗河堤，是朱小庄与丁枣园敌人的天然屏障，也是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接合部。敌人在河堤周围构筑了地堡群，并以猛烈的火力拼死据守。

第3师先以第9团多次强攻，仍然不能突破敌人防线。罗河堤攻不下，就难以攻占朱小庄、丁枣园，也不能割断邱、李兵团的联系，势将影响全纵队任务的完成。张翼翔令第3师调整部署，投入预备队，反复争夺。终于有1个营攻占长约200米的一段堤埂，楔入敌人的主要防御阵地。

敌人大为震惊，立即令丁枣园、朱小庄之敌向我第3师猛扑，双展开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我指战员英勇顽强，义无反顾，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敌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竟向我军施放毒瓦斯，同时出动飞机疯狂扫射。

阵地上浓烟弥漫，烈火熊熊，到处一片焦土。占领堤埂的该营干部战士冒着毒气和烈火彻夜奋战，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仍然坚守着阵地。

此时，第3师以一部兵力继续牵制罗河堤上和丁枣园的敌人，暗中将主力转入近迫作业。9日下午2时，第3师从三个方向对朱小庄之敌发起攻击，仅3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接着，乘胜向丁枣园发起钳形攻势。

据守在丁枣园的敌人，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第45师。该敌拼命抵抗，垂死挣扎，以猛烈的火力连续4次反冲击。

为全歼该敌，张翼翔令第3师一面施以军事压力，歼敌一部；一面展开政治攻势，瓦解其军心。10日晨，这个所谓精锐师的残部，包括师长、副师长在内3000余人，全部投降。向来趾高气扬、骄横跋扈的敌师长崔贤文，一扫昔日威风，顾不得许多面子，投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要馒头吃。

蒋介石的最后一支“王牌军”，就这样狼狈不堪地全军覆没了。

张翼翔随即令各师奋勇出击，大胆穿插，开展大抓俘虏的竞赛。仅最后围歼阶段，第1纵队就俘敌近1.7万人。

1月10日，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中，张翼翔指挥第1纵队鏖战65天，以歼敌3·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载入史册。

打过长江去

淮海战役结束后，第1纵队奉命于1月16日以4天行程进至宿县东南水铺地区休整，准备渡江。

休整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按照华东野战军统一部署，第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建制。张翼翔任副军长。这次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为渡江南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3月1日，第20军奉命暂归第8兵团指挥，经泗阳沿运河南下，于15日到达扬州东北樊川、丁沟、宜陵地区，进入渡江作战集结位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历来被称为天堑。当时，战争总形势虽然对我非常有利，但由于我军毫无现代渡江工具，只能以木帆船实施渡江，欲突破用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把守的长江天堑，困难仍然很大。

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后，张翼翔同军长、政委一道，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

至4月初，第20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420余只，并动员了渡江所需要的船工，又从部队挑选、训练了一批优秀战士担任水手，以满足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还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

张翼翔又组织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与技术演练。他还派出侦察部队过江进行实地侦察，查明扬州以东沙头嘴至龙稍港段长江南北两岸40千米内的兵要地志、敌情、工事、兵力部署等情况。

为确定渡江作战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手段，张翼翔同军长刘飞一道，根据实地观察和侦察所获的敌情，多次召开师、团干部会议，反复研究，并要求各师、团群策群力，积极思考，深入讨论。由此形成统一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手段。这就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多头登陆，一点两面；四快一稳，即航行快、登陆快、展开火力快、抢占有利地形快，坐船稳；寸土不让，寸土必争，坚决巩固和扩大滩头阵地，保证后续部队安全登陆；登陆后，各级指挥员应边打边集结整理部队。此外，对船只的战斗队形和组织指挥，炮兵的使用和步炮协同等问题，也都作了具体的研究与规定。

4月6日，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召集由第8兵团、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和战役指导思想，东集团关于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以及对渡江后战役的发展变化和可能出现的情况的相应对策。

东集团规定：第20军归第8兵团指挥，为兵团渡江第1梯队，自三江营至龙稍港段强渡长江，登陆扬中，尔后渡过夹江，经埤城、上塘等地向镇江、丹阳地区进攻，截断京沪铁路。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国人民。

伟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了！

继中集团于20日晚首先发起渡江后，东、西集团亦于21日晚同时发起强大突击。

张翼翔和军长刘飞指挥部队自三江营至龙稍港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

22日占领扬中岛，将敌第41师第123团、江苏保安第4团、第113师第337团大部歼灭。23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乘胜经埠城、上塘等地直向丹阳方向进攻。在与友邻部队协同截断京沪铁路后，又指挥部队以超越、拦头、斩腰等多种战术手段，不分昼夜冒雨疾进，沿京杭公路金坛、溧阳向广德方向追歼逃敌。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

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把稻草铺在泥路上，以防战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残破的小桥，以便部队顺利通过。群众的热情，更加激励着指战员一往无前。战士们经长途跋涉，脚底早已满是水泡，但仍然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全速追赶敌人。全军上下心中只有一个“快”字。至26日，第20军将敌第28军、第96军大部歼灭。其中，第174团取得了一举俘敌1.2万余名的战果。

27日，第20军进至溧阳以南戴埠地区集结，奉命归第9兵团建制。

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统治中国的梦想。但是，蒋介石在最后败退之前，仍企图凭借上海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以固守防御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破坏城市。为彻底摧毁蒋家王朝，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总前委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10兵团及第8兵团一部攻取上海。

5月2日，第20军由戴埠地区出发，经4日行程进至震泽地区集结，准备参加上海战役。指战员得知这一消息，欣喜若狂，群情激奋。

第20军的作战任务是，消灭浦东地区之敌，尔后控制吴淞江以南、黄浦江以西地区，协同友邻部队沿沪杭线从龙华地区攻入上海市区。

第20军当面之敌为国民党军第123军、第37军及暂编第8师。这是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

根据第三野战军首长关于打上海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争取把上海基本完整地接管过来的指导思想，张翼翔在战前动员时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作战部署及战法，都要围绕这一指导思想，一定要打出第20军的威风，务求军政全胜。

5月10日，第58师首先向平湖之敌发起攻击。指战员冒雨长途行军，迅速投入战斗，仅用两天时间就攻占平湖、金山卫，尔后由闵行以南地区乘胜追击，连克百曲东、三林塘、杨思镇，直指敌第37军。

与此同时，第59师、第60师也于18日进抵松江地区，准备向上海外围之敌第37军基本阵地梅家衞、华泾攻击。

敌第37军由3个青年师编成，系敌浦东防御兵团主力之一。该敌利用浦东河流纵横、河宽水深等复杂地形和在交通要道、各要点构筑的大量钢筋水泥工事，企图死守，阻挡我军向上海挺进。

这是一场攻坚战。张翼翔和军领导认真总结前几仗的经验，深入细致地研究对敌坚固城防工事之钢筋水泥地堡攻击的战术手段，周密部署战斗行动。

22日，攻坚战全面开始。第58师向洋泾、烂泥渡发起进攻，第59师与张家楼、塘桥之敌展开激烈阵地争夺战，第60师与对峙的周家渡之敌奋力拼搏。

三个方向的突击，就像三把钢刀，直刺敌人心脏。在血与火的拼杀中，指战员们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的孤身打入敌人阵地，与敌展

开肉搏；有的舍身炸地堡；有的带着数处刀伤与敌拼搏；有的腰折骨断，仍不肯下火线，用鲜血和生命为胜利铺平道路。

在我军猛烈的攻击下，敌人整个部署被分割得支离破碎，顾此失彼，只有绝望挣扎。敌军苦心经营的城防工事，在我军摧枯拉朽般的凌厉攻势下，一个个都成了他们自掘的坟墓。

24日，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

当夜，张翼翔奉命除留第58师警备浦东外，率主力从高昌庙地区西渡黄浦江进入市区，会同兄弟部队参加市区围歼战，肃清市区残敌。他组织部队迅速肃清苏州河以北、绍兴旅沪同乡会、北火车站、凯福饭店等地区之残敌。

27日，市区残敌肃清。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上海解放后，第20军担任上海第一警备区的警卫任务，同时兼任松江城防。

8月初，第20军奉命移驻嘉定、太仓、罗店、南翔地区，进行渡海登陆作战训练。

10月，张翼翔任第2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奉命北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同时封锁台湾海峡。

局势严峻，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果断调整军事战略方针。

9月初，正在江浙一带忙于组织部队进行渡海登陆作战训练的张翼翔，忽然接到兵团通知，令他7日到上海参加兵团召开的军长、政治委员会议。会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作了重要报告。陈毅在分析了朝鲜战争的局势和发展前景后，指示第9兵团停止渡海登陆作战训练，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在思想上作好入朝作战的准备。会议还确定了部队的行动部署，要求第20军开赴山东兖州地区训练整补，待机行动。

会后，张翼翔辗转难眠。美国侵占朝鲜，控制台湾，不仅威胁东北地区，也威胁到上海、华东地区。维护世界和平，保卫祖国安全义不容辞。他深感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入朝作战的决策英明正确，暗下决心，一定要组织部队尽快作好参战的一切准备。他非常熟悉第20军。这支队伍，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具有良好的军事、政治素质，既善于野战，敢于近战、夜战，长于穿插，能打硬仗、恶仗，又具备吃苦耐劳、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优良战斗作风。只要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这支部队就一定能迅速奔赴战场，狠狠打击敌人。

10月14日，张翼翔等率部队抵达兖州地区，执行为期3个月的训练整补任务。

17日，张翼翔主持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开展形势教育，加紧军事训练，迅速完成整编等工作。张翼翔号召全军指战员要继承并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做好各项战备工作，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他说：我们既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我们的邻邦肆意践踏，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准备着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调遣。

在第20军集结兖州地区整训期间，朝鲜战局继续恶化。美军大举越过“三

八”线，其空军飞机亦多次侵入中国边境纵深侦察轰炸。有鉴于此，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向朝鲜出动，并于10月12日向华东局发电，令第9兵团开赴东北地区。

10月23日，中央军委令第9兵团迅速开赴东北的电报再次发到华东军区。29日，张翼翔和团以上干部在第9兵团司令部驻地曲阜听取朱德总司令关于入朝作战的动员报告。朱德要求第9兵团部队以旺盛的战斗意志，和兄弟部队一起肩负起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光荣任务。朱总司令的报告，使团以上干部明确了入朝参战的光荣任务，坚定了广大指战员出国作战的决心和信心。

11月3日，兵团命令第20军立即北上，集结于东北梅河口地区，进行临战训练，更换冬装，待机入朝。第二天，张翼翔等率领第20军乘车向东北进发。

这时，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已胜利结束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判断敌人并没有被打痛，凭借其骄横的心理和对我军力量的错误估计，还会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的原定计划。为粉碎敌人新的攻势，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决心举行第二次战役，遂于6日命令第9兵团迅速由辑安、临江等地入朝参加第二次战役，担任东线作战任务。

张翼翔在沈阳接到兵团命令时，先头两个师已根据兵团命令直接向辑安开进。这时，整个部队分散在兖州至辑安的铁路线上，他一时无法直接与各师沟通联系。

军情紧急。为了坚决执行命令，迅速入朝作战，张翼翔一面在沈阳直接向部队下达开进命令，一面派人至辑安在鸭绿江边组织部队迅速入朝，同时指示政治机关以刚刚发表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为中心内容，在列车上组织部队进行立即入朝参战的紧急动员。

动员后，指战员们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奔赴朝鲜战场消灭侵略者。有的单位到达鸭绿江边后，还利用集结队伍的间隙，举行抗美援朝誓师大会。

指战员们背靠解放了的伟大祖国，面对战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他们高举手中武器，庄严宣誓：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祖国增光，为毛主席增光。

11月7日至11日，第20军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全部跨过鸭绿江。

激战长津湖

11月15日，第20军进至柳潭里西北之南兴洞、德实里地区集结，并接替第42军部分阵地，阻敌北犯。

开进途中，张翼翔严格执行兵团制定的伪装、保密措施，命令部队关闭电台，严密伪装，严格管制灯火，夜行昼宿，使整个部队的开进和集结行动不仅未被敌人发动的空中袭击所阻止，而且也丝毫未被掌握有现代侦察技术的敌军所察觉。战后，西方一些军事史学家称第20军所在的第9兵团这次隐蔽开进集结的行动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因为部队入朝仓促，思想准备不足，入朝后，一些同志对抗美援朝战争产生了一些想法。有的认为，已经打了十几年仗了，现在该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了，不宜出国打仗；有的认为，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能不

能打赢这场战争，结局难以预料；有的把抗美援朝错误地看作是给朝鲜人民帮忙，把自己当“客军”，甚至当“恩人”；也有少数干部战士对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在国内战争中，我军一向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只要我们一入朝，几个月就能把敌人赶下海去；还有的同志盲目骄傲，认为只要有一个第9兵团开进朝鲜，打它一二仗，就可以横扫美军，解放全朝鲜。

为了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使全军指战员明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和战争的艰巨性，身为军长兼政委的张翼翔和军党委主要成员领导全军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工作。

11月下旬，军党委连续两次发出号召，要求全军指战员努力提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觉悟，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和盲目乐观情绪，密切协同朝鲜人民军，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打好出国第一仗。

与此同时，张翼翔深入到部队和战士中间，了解他们有什么想法，并宣传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和打败敌人的有利条件，讲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抗美援朝与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引导干部战士把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统一起来，把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结合起来。随着教育的逐步深入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整个部队对入朝参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第二次战役前，侵入东线长津湖地区之敌，为美军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第20军当面之敌美陆战第1师两个团，企图越过死鹰岭占领柳潭里，尔后向西进犯南兴洞，或向北进犯德实里。

为取得第一手资料，制定作战预备方案，张翼翔亲率参谋人员到柳潭里以北一线勘察地形。他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深入前沿阵地，检查阵地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系、生活设施和军需储备，并同师、团主要领导一起分析情况，研究打法，修订作战预案。

24日，美陆战第1师第5团占领新兴里、新岱里地区。25日，其第7团进占柳潭里。

26日，张翼翔带领部队进抵松落洞、大南里、下马岱、新德里地区隐蔽集结。27日黄昏，按照兵团部署，他指挥部队向当面之敌美陆战第1师发起攻击。

经一夜激战，第58师进至上坪里地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下碣隅里之敌；第59师占领下碣隅里西北死鹰岭、西兴里阵地，割断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敌人的联系；第60师占领富盛里、乾磁开、小民泰里一线阵地，切断了下碣隅里敌人的南逃退路；第89师迫近社仓里。全军完成了对下碣隅里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

28日昼间，敌人为摆脱被分割包围状态，沟通其各部之间的联系，开始连续不断地猛攻第59师、第60师阵地。张翼翔一面调整部署，完善防御体系，坚决抗击敌人的连续进攻，一面组织部队以反击、反冲击积极歼击被围之敌。

当晚，第58师猛攻下碣隅里之敌。激战至拂晓，歼敌800余人，下碣隅里以东山地全部为我控制。第89师攻击社仓里之敌时，从俘虏中查明原守敌伪第3师第26团已由美第3师第7团接替。张翼翔考虑社仓里敌情变化，遂

令该师停止进攻，暂时转入防御。

当时，东线战区普降大雪，最低气温达摄氏—30 左右。这种恶劣气候，给长期生活在华东地区，从未在严寒冰雪中生活过，更无在此种地区作战经验的第 20 军指战员带来很大困难。同时，由于运输工具缺乏，粮食供应不上，部队随身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

空前未有的冻伤和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

张翼翔十分着急。为使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使冻饿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与其他军领导研究后，即以军党委名义向部队发出号召，要求全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毅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友爱，战胜严寒、饥饿和疲劳，彻底歼灭美陆战第 1 师。他指示团以上机关派出大批政工干部，积极协助后勤部门做好部队的防冻工作。他还利用战斗间隙深入部队，与战士们一起缝制耳套、棉袜、棉手套等御寒物品。

军党委的号召和军领导的行动，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在最困难的时候，部队中喊出了“熬过困难就是胜利”的口号。有的战士在饥寒交迫中昏厥了，周围的同志就立即解开棉衣，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战友的身体。有的连队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每天仅能分到几个冻土豆。就这几个冻土豆，谁也舍不得吃，干部让战士，战士让干部，最后干部用自己的体温化开冰冻将土豆送给伤员。尽管天气严寒，指战员衣衫单薄，生活异常艰苦，战士们仍然斗志昂扬。阵地上不时传来战士们自编的顺口溜：“不怕雪，不怕风，不怕饥来不怕冻，美国鬼子上来送他终，坚守阵地做英雄……”充分显示了革命军队崇高的乐观主义精神。

29 日，下碣隅里、古土里被围之敌为打开逃跑通路，分别向我第 58 师、第 60 师阵地连续猛攻。

就在这一天的战斗中，第 20 军出现了一位革命英雄主义的杰出代表——杨根思。

紧靠下碣隅里东南角之 1071.1 高地及其小高岭，地势险要，是下碣隅里被围之敌向古土里逃跑的必经之地。第 58 师第 172 团第 3 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第 3 排扼守该高地。

29 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该高地猛攻。

阵地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杨根思指挥第 3 排沉着应战，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 8 次猛攻。战至 10 时，弹药告罄，杨根思仍带领战士们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敌人拼杀。最后全排仅剩两名伤员。

在敌人又发起第 9 次冲击、我增援分队尚未赶到的危机关头，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毅然冲向密集的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住了阵地。杨根思和他的战友们英勇顽强地作战，为配合主力部队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赢得了时间，立下了卓越功勋。

张翼翔为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深深感动，认为杨根思是对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最好典型，应当大力宣扬。在他的倡导下，军党委很快作出向英雄杨根思学习的决定。全军迅速掀起学习杨根思、争取当英雄的高潮。杨根思的名字，传遍第 20 军部队和整个朝鲜前线。

为表彰杨根思英勇献身的精神，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将杨根思生前所在连命名为“杨根思连”。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29日这天，古土里之敌向我第60师坚守的富盛里、小民泰里一线阵地连续进行4次攻击，均被击退。下午，敌人又纠集1000余人，坦克、汽车100余辆，在50余架飞机掩护下，再次向我富盛里、小民泰里一线阵地进攻。第60师顽强抗击，又连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敌遭我猛烈打击后，除大部坦克逃回古土里外，其余被我包围于乾磁开南北公路一线。

当日黄昏，第60师乘敌疲惫混乱又失去炮兵、飞机支援的有利时机，进行猛烈反击。敌伤亡累累，混乱不堪。第60师一面紧缩包围圈，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展开政治攻势，迫敌投降。在我军事、政治压力下，30日拂晓，美、英军和南朝鲜军官兵240人宣布投降，其中有美军中校1人、少校2人。

乾磁开战斗，首创在朝鲜战场瓦解敌军的范例。它充分证明敌人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尽管他们技术装备优良，但也是可以战胜和瓦解的。

30日，社仓里之敌向我第89师阵地猛攻。该师连续击退敌人7次进攻，顽强地坚守了阵地。

当晚，第58师在友邻第27军一部配合下，继续攻击下碣隅里之敌，终因冻伤较多、兵力不足、伤亡过大而受阻。

这时，西线敌人在我军打击下已全线退却，新兴里之敌亦被我军全歼。敌人对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丧失了信心，遂令其东线残部向咸兴、元山方向撤退。

为加紧歼灭被围之敌，第9兵团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当即调整作战部署，令第26军接替第20军第58师继续攻击下碣隅里之敌，第20军主力前出至黄草岭地区阻敌南逃和北援。

根据兵团命令，张翼翔带领第58师、第60师迅速向古土里、黄草岭地区攻击前进；并令第89师一部于社仓里警戒，师主力前出至黄草岭以南上、下通里地区，阻止美第7师北援和陆战第1师南逃。

12月1日和2日，第59师（暂归第27军指挥）坚守死鹰岭附近阵地，阻敌突围南逃，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3日，被围之敌在下碣隅里之敌的接应下，猛攻我死鹰岭阵地。第59师英勇奋战，给敌以重大杀伤。坚守主峰的第177团60余人连续打退敌人8次攻击。战至15时，终因连日作战，弹药不济，冻饿、伤亡减员较大，阵地被敌突破。突围之敌一部被歼，大部逃往下碣隅里。

美陆战第1师残部逃往下碣隅里后，一面空运伤员，一面纠集真兴里以南之敌北援接应，企图立即突围南逃。

6日拂晓，残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南突围。

此时，张翼翔率第58师、第60师已进至黄草岭南北地区。他立即命令各师依托已占领阵地进行层层阻击。

7日，敌逃至古土里。8日晨，敌在航空兵支援下继续南逃。第58师组织4个连节节阻击，顽强坚守院里、黄草岭一线阵地，与此同时，第60师也将真兴里北援之敌阻于门岬、堡后庄地区。该师苦战竟日，终因人员大部冻伤、弹药耗尽而无力出击。

这时，张翼翔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但他充满血丝的双眼仍然紧紧盯着地图，注视着战场的瞬息变化，困了用冰雪浸湿毛巾擦一把脸，饿了就喝碗水充饥，对部队实行不间断地指挥。

9日黄昏，残敌继续南逃。

张翼翔令第60师参谋长蔡群帆组织第58师、第60师可战兵力，经祥在

洞向直洞方向实施追击；令第 89 师在真兴里以南地区坚决阻击逃敌。战至 11 日，第 89 师先后在水洞、龙水洞地区截歼逃敌 600 余人，击毁、截获汽车 90 余辆。

12 日，残敌窜至五老里、咸兴地区。

在第二次战役中，张翼翔率领部队不顾天气寒冷给作战带来的重重困难，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协同兄弟部队对长津湖地区之敌实施分割包围，给有建军百余年历史、自诩为“重装备典型”的美“王牌军”陆战第 1 师以歼灭性打击。我军在冻饿、伤亡减员极端严重的困难情况下，仍组织一人一枪追歼逃敌，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此役，第 20 军计歼敌 8000 余人，为转变东线战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后，张翼翔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这一仗，是我们首次与美军作战。如果说我们打败了敌人，赢得了胜利，可以引以为荣的话，那么从艰苦作战中用生命和鲜血换得的经验，更值得我们珍视。尤其是在作战指挥上，随着作战对象、地区、气候条件的变化，自觉地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作战行动，显得更为重要。

12 月 17 日，毛泽东高度评价第 9 兵团在第二次战役中的作用。他指出：“9 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 4 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参加第五次战役

敌军遭第二次战役沉重打击后，被迫退回“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

为了总结第二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准备南进再战，第 20 军奉命于 1951 年 1 月上旬进至咸兴地区休整。

张翼翔深知，大力恢复与增强战斗力是部队休整中刻不容缓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到达休整集结地区，他一刻也没有休息，马不停蹄地组织起草《关于两个月休整工作的指示》，提出“一切为了提高战斗力，准备再战”的休整工作总方针，要求部队全面、深刻、具体地总结敌我双方作战的特点及规律，概括出全军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作战经验及应记取的教训。

第二次战役中，第 20 军冻伤人员达 1.1 万余人。尽管有很多客观原因，并且积极组织部队采取了各种防冻补救措施，张翼翔仍深感懊悔。为尽快恢复部队战斗力，医治这批战斗骨干，他与军其他领导研究决定，除将少数冻伤严重、在短期内不能治愈的冻伤员迅速送回祖国治疗外，对其余万余名伤势较轻的冻伤员全部就地突击治疗。为配合医务人员精心治疗这批冻伤员，他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直接负责这项工作，部队中的骨干担任主要护理员，烹调技术最好的炊事员为冻伤员做饭，条件最好的房子让给冻伤员住，最好的药品和物资首先满足冻伤员的需要。当时，整个部队成了一所大医院。

在张翼翔等各级领导全力组织下，经过短短两个月的治疗，80%的冻伤员基本恢复健康。

在此基础上，张翼翔又组织领导部队紧密结合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事训练。他强调：干部训练，要突出指挥训练和攻防战术训练，其中营以上指挥员要着重解决与美军作战的战术思想问题；连、排干部和班长、战斗小组长，要着重解决夜间进攻战斗的指挥、火力组织、

协同动作等问题。分队训练，要着重解决夜间进攻中队形的运用、射击和山地投弹等问题，并要求普遍学习和掌握反坦克、打飞机、土工作业等技术。炮兵训练，要树立为步兵服务、积极歼敌的思想，并要求炮兵干部要着重解决炮兵的组织指挥、火力运用、步炮协同及间接射击等问题。

训练期间，张翼翔经常亲临训练场，深入到分队和战士中间，认真听取意见，肯定成绩，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这次军事训练，由于紧密结合实战，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老战士与新战士相结合，讨论研究与现场练习、实物教育相结合，军事训练与搜剿匪特相结合等训练方法，不仅使补充的 1.5 万余名新兵熟练地掌握了手中武器，使新提拔的干部迅速学会了本级的指挥，还使步兵的五大技术、各级干部的战术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大大提高了一步。

第 20 军经过 3 个多月的休整，士气高昂，粮弹充足，在第 9 兵团建制内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第五次战役作战。

3 月 20 日，张翼翔率部队自咸兴、五老里地区南下。4 月 13 日进至平康以北洗浦里地区集结，进行战役准备。

14 日，张翼翔到兵团受领任务。

兵团命令，第 20 军首先从伪第 6 师正面劈开缺口，将敌东西割裂，协同第 27 军歼灭伪第 6 师、美第 24 师各一部，尔后向万世桥、机山里、抱川方向突击，协同友邻部队歼灭美第 24、第 25 师。

回到驻地，张翼翔立即组织部队进至口边洞、六丹里以北一线进攻出发位置。军指挥所设于五云里。

为打好这一仗，张翼翔昼夜忙碌。他和副军长廖政国、副政委谭佑铭等反复研究作战计划和部署。

17 日，张翼翔组织召开作战会议。他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部署和兵团首长的意图，以及当面敌情、地形和第 20 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决定组成两个梯队，并加强左翼方向的兵力配备，以保持突击的连续性和向敌纵深穿插的力量。具体部署是：第 60 师配属炮兵第 17 团为第一梯队左翼，首先从芳花洞附近突破伪第 6 师防御，直插荷吉观、道马峙、加里山、国望峰，阻敌步兵、坦克北援，协同第 59 师歼灭美第 24 师第 21 团于场岩里以北地区，尔后向抱川方向发展进攻；第 59 师配属炮兵第 26 团、第 11 团（两个营）为第一梯队右翼，在芳花洞（不含）至自等里地段突破敌防御，沿新术岬向长明里、都坪里方向实施突击，协同第 60 师歼灭美第 24 师第 21 团于场岩里以北地区，尔后向抱川方向发展进攻；第 58 师为军第二梯队，随左翼第 60 师之后跟进，准备在机山里、抱川方向加入战斗，协同友邻部队歼灭美第 24、第 25 师。

22 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开始。

17 时，我炮兵开始火力准备。30 分钟后炮火延伸，步兵发起冲击。第 60 师迅速抢占 547.4 和 712 高地，旋即直插荷吾观、三台洞、道马峙等地，于 23 日 5 时 30 分攻占加里山及其附近地区。第 59 师突破正面敌防御阵地后，也于 23 日拂晓攻占 697、634.2 高地。

当天上午，张翼翔获悉美第 24 师有退却征候，立即命令第 59 师和第 60 师一部经朴达峰、脚歇峰迅速向都坪里方向攻击前进，第 60 师主力经国望峰、道城岬直插机山里，并令第 58 师随第 60 师之后跟进准备加入战斗。17 时，志愿军首长令第 20 军以 1 个师迅速插到西坡、抱川，切断公路，阻敌南逃。张翼翔即令第 60 师执行这一任务。

24日晨，第60师进至贵木岫附近地区，并继续向贵木洞、清溪山疾进。与此同时，第59师攻占脚歇峰、兴隆寺，第53师进至道马峙、石龙山以南地区，军指进至俭丹里。至此，张翼翔带领部队完成向敌纵深实施猛烈穿插的第一步任务，并给南朝鲜第6师以重创。

这时，整个中线之敌均迅速收缩兵力，全线退却。

为彻底歼灭敌人，志愿军首长令第20军协同兄弟部队迅速追歼向抱川、议政府逃窜之美第24、第25师。

按照志愿军首长部署，张翼翔令第60师插向江口洞截击逃敌；第58师向西南出击，切断西坡至永阳里公路，协同第60师歼敌一部于西坡至永阳里地区；第59师自龟汀洞南下，向机山里方向发展进攻。战至28日上午，我军予美第24师以大量杀伤。

此时，我西线部队已进至议政府以北地区，敌主力已撤至北汉江以南。第20军遂奉命移至山阳里地区待机。

5月8日，第20军进至麟蹄西南、杨口以东、昭阳江以北地区，接替朝鲜人民军阵地，进行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准备。

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开始。按照兵团部署，第20军在兰田里至九万里地段突破昭阳江，向富坪里、美山里实施主要突击。

当晚，张翼翔指挥部队渡过昭阳江，攻占敌第一线阵地。接着，又指挥部队直插五马峙，抢占龙浦公路以西山地，割裂南朝鲜第7师、第9师之间的联系，并会同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对县里、龙浦之敌南朝鲜第3师和第9师形成合围之势。第60师第178团第3营第5连在穿插作战中，动作迅速勇猛，指挥灵活机动，12个小时进行大小战斗13次，缴获汽车70余辆，歼敌500余人，及时抢占五马峙要点，为主力部队合围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8日晨，敌企图由县里经镇东里向东南突围。张翼翔立即令第60师除留一部于美山里、后坪里一线构筑坚固阵地防敌南窜外，师主力经大、小开仁里向月屯谷前进，追击逃敌，并令第58师向县里方向攻击前进。战至19日，我军会同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将南朝鲜第3师、第9师大部歼灭于县里及其以南地区，并缴获敌人全部重装备。随后，张翼翔又组织部队以主亿峰、芳台山为主要目标，对溃散于山林之残敌，实施搜剿作战。

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第20军除留一部兵力继续搜剿残敌外，主力进至美山里和大、小开仁里以北地区集结。

第五次战役第一、二阶段作战中，张翼翔采取抓住敌人薄弱环节，集中主要兵力从正面突破敌人于一点，并迅速楔入敌人纵深，实施猛烈穿插、迂回包围敌人的战术手段，指挥部队在金化以南地区狠狠打击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在县里地区又予南朝鲜第3师、第9师以歼灭性的打击，会同友邻部队粉碎了敌人“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狂妄计划。

此役，第20军取得歼敌5000余人，缴获和击毁坦克、汽车490余辆的战绩。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为争取时间休整，张翼翔率部队于5月23日向预定集结地区金化以东、山阳里以北开进。

正当部队涉渡昭阳江北进时，敌人乘我军转移之际，又开始了猛烈反扑。

为掩护兵团主力转移休整，张翼翔根据兵团副司令员陶勇的指示，命令第58师和第60师第180团以昭阳江及华川湖为屏障节节阻击敌人。

当时，部队经第五次战役两个阶段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粮弹缺乏。

但是，为了打击疯狂进犯的敌人，迟滞其进攻，掩护兵团主力安全转移，第58师和第60师第180团在华川湖东西两侧宽达50余千米的正面上，仍然顽强阻敌进攻。

战斗开始后，第58师在华川湖西侧先敌抢占启星里、城山、大利里一线有利地形，阻敌北犯，掩护主力及伤员安全转移，并在将军山、341高地、上好音洞一线构筑基本阵地工事；第60师第180团在华川湖东侧，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和工事，与友邻部队并肩作战，连续阻击7昼夜，予进犯之美空降兵第187团等部以重大杀伤。

30日，鉴于我后续部队已通过敌封锁区，或绕道北上到达指定位置，且基本阵地工事已初步构成，张翼翔即令第58师以一部兵力扼守城山诸要点，主力移至将军山、341高地、上好音洞一线阵地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

之后，第58师指战员忍受着饥饿疲劳顽强战斗，在每一个阵地上都与敌展开了激烈反复的争夺，阵地昼失夜复。至6月8日，第58师连续奋战13昼夜，歼敌7400余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为继续阻击敌人北犯，张翼翔和军领导研究决定：第60师接替第58师阵地，第59师坚守千佛山、大成山、赤根山一线阵地。

调整部署后，全军在华川以北，西起千佛山、大成山，东至北汉江约30千米宽的正面阻敌北犯。战至16日，又给美第7师、第24师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我军伤亡较大，兵力不足，大成山、三天峰、赤根山、长古峰一线主阵地相继失守。

这时，第20军防御阵地在地形上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

为缩小各师的防御正面，加大防御纵深，并控制反冲击的力量，张翼翔决心将3个师的兵力全部展开在金城以南鸡雄山、承岩里、白岩山一线防御阵地，采取纵深梯次配置，构筑坚固工事，以积极防御的战术手段，坚决完成阻击美第24、25师和南朝鲜第2、第6、第9师北犯的防御任务。

至7月15日，第20军将防务移交第27军。张翼翔率领部队在华川、金城地区顽强奋战50余天，抗击并遏止敌人来自空中和地面的联合进攻，有力地掩护兄弟部队转移、集结和休整，并取得了歼敌2.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9月下旬，第20军进入元山地区，担负海防战备和构筑野战防御工事任务。

元山位于朝鲜中部，是重要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到达集结地区后，张翼翔立即组织部队开展树立持久作战思想的教育。

这一教育，由于坚持启发诱导、逐步深入、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仅扭转了少数干部战士“速胜回国”和“换班回国”的思想，而且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坚定了全体指战员持久作战的决心和信心。随后，部队即在元山地区开始紧张的战备施工。

在张翼翔组织指挥下，第20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52年8月，圆满完成了构筑宽25千米、纵深15千米，有多层配置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战术防御阵地体系，对粉碎敌人我军侧后登陆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为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在构筑阵地工事的同时，张翼翔还组织部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战备训练。

1952年10月，第20军奉命回国。

回国前夕，张翼翔在平壤受到金日成首相的亲切接见。金日成对第2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怕流血牺牲、克服重重困难取得的重大胜利，给予很

高评价，赞扬张翼翔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张翼翔向金日成表示，只要朝鲜人民需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立即带领部队重返战场，狠狠打击侵略者。

张翼翔是位英勇善战的将才，也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优秀领导人。他从朝鲜回国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走上了新的征途……

欧阳文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岁月

刘 建

欧阳文（1912～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2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3军团独立团宣传员、红5军第3师宣传员、红3军团第1师第1团宣传队长和第2团俱乐部主任、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和第12团团部文书、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4师第12团第3连指导员和第12团总支书记、第4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副主任、主任，独立旅、黄河支队、教导4旅政治部主任，第115师政治部秘书长，山东纵队第5旅政治部主任和胶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山西吕梁地区的午城和井沟战斗、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山东的樊坝和梁山战斗、沂蒙和胶东地区反“扫荡”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4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41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四保临江”，东北夏、秋季攻势，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平津战役中的康庄、怀来、张家口战斗，湘南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政治委员兼中共粤东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政治委员和院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1978年恢复工作后，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研究院党委书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和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届常委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党中央命令胶东军区派部队分批到东北去，配合苏联红军肃清残余的日伪军，开展党政军民等各方面的工作。10月初，萧华与刘西元、胡奇才、林一山、吴瑞林等同志来到胶东军区机关驻地莱阳，准备到东北去。当时欧阳文即向萧华提出了随同他们一起去东北的要求，并获得了批准。10月20日起，欧阳文奉命率领东海军分区独立2团、西海军分区独立2团、北海军分区独立1团，横渡渤海，挺进东北，到达辽宁庄河地区。在这里组建了东北人民自卫军第3纵队，胡奇才任司令员，欧阳文任政治委员。次年1月，第3纵队奉命和第2纵队合并，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欧阳文先后任该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直到1952年7月调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委员为止，前后在第4纵队工作长达6年之久。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欧阳文都是在这支部队中度过的。

欧阳文在第4纵队工作期间，率领纵队的各级政治机关和全体政工干部，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记述欧阳文在这期间的战斗历程，我们不妨先把1947年2月8日中共辽东分局和辽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写给第4纵队的信抄录如下，作为第4纵队历史及其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建树功勋的重要见证。该信称：

鞍海战役、新开岭大捷的英雄们，全体将士及政工同志们，你们在新开岭大捷不久，又在冰天雪地中勇敢敏捷地向敌后出击，大量地消灭了敌军和团队，攻克了几十个据点，在广大地区内摧毁了敌伪统治，兴奋了敌后人民。

你们完成了任务，在坚持敌后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转战在辽东

解放战争初期，第4纵队转战辽河两岸、长白山下，以旺盛的斗志和坚强的战斗力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了辽南大片土地。1946年10月，第4纵队将号称“千里驹”的蒋军精锐第52军第25师全歼于新开

岭地区，共毙伤俘敌师长李正谊以下官兵 8000 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创造了东南满自卫战辉煌战绩。欧阳文写诗赞道：“诱敌深入山谷里，埋伏雄兵密林中。敌人陷入我罗网，运动战例创奇功。”“鏖战新开两昼夜，毙俘敌军四千双。‘千里驹’师遭覆灭，军民协力凯歌扬。”这次战役的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民主联军总部的嘉奖和表扬。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还就此发表了题为《第二十五师的毁灭》的文章，深刻阐述了这次战役胜利的重要意义。

欧阳文在其《战斗的足迹》回忆录中，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为题，专门阐述了新开岭战役的意义，具体分析了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欧阳文指出：这次战役的胜利，是在敌人的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取得的。它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创了东北我军全歼敌 1 个整师的先例，给我纵队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锻炼和提高，既培养了干部的指挥能力，又培养了部队死打硬拼的顽强作风。有效地迟滞了敌人对临江地区的窜犯，保障了辽东军区机关人员和物资向后方转移，使我军有足够的时间调整部署，以迎接敌人的进攻。尤其重要的是极大地振奋了民心，使广大南满人民群众相信我民主联军具有打破蒋军疯狂进攻的力量，增强了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为以后军民团结一心，协力取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军战斗的胜利，无疑给曾经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当他们清醒过来以后，一方面哀叹“共军兵力的强大”；另一方面，特别是 1946 年秋他们占领四平后，便深感自己的兵力不足。为了改变战线过长、捉襟见肘的颓势，敌人不得不将开始所用的那套长驱直入、全面进攻的作战方针，改为“先南（满）后北（满），南攻北守”，妄图在击破南满我军主力后，再转而越过松花江，进攻北满，最后实现抢占全东北的目的。于是，国民党军在经过短期调整后，从 10 月开始，便集中主力 8 个师（其中 7 个师是国民党军精锐），约 10 万之众，分 3 路向我以临江为中心的长白山根据地发动了凶猛的进犯；同时以部分正规部队和全部地方保安团队，对我坚持敌后斗争的军民进行“清剿”，以解后顾之忧。在此形势下，我中共南满分局、辽东军区和省委，遵照上级指示，为了避敌锐气，待机再战，便主动放弃安东（今丹东市），转移到临江地区。

取得新开岭战役胜利后的第 4 纵队，于 11 月 12 日进至八里甸子。部队随即在这里着手整理内部的工作，即调整机构，充实干部，补充装备，消化俘虏，医治伤员，总结奖励，鼓舞士气，准备继续作战。这些工作尚未最后完成，便接到开赴临江地区集结的命令。于是纵队立即沿牛毛坞、步达远、太平哨等地，经过近 30 天的艰苦行军，冲破了敌军的重重追堵，于 12 月初来到了铁厂子、八道江、六道江一带，与军区领导机关和第 3 纵队胜利会合。

当第 4 纵队到达临江地区时，整个南满解放区的形势已进一步恶化，我方只剩下长白山下的临江、濛江、长白、抚松四个小县，其余地方全都被蒋军所占。这四个小县，北面是莽莽苍苍的高山大岭，东面是与朝鲜交界的鸭绿江，交通闭塞，地瘠民贫，物资缺乏，人烟稀少。可是，在这贫困狭小的山沟沟里，却聚集了中共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以及安东省委的一部分，再加上第 3 纵队和第 4 纵队的主力部队，共约三四万人。由于人口猛增，根据地大大缩小，顿时，机关和部队的吃饭、穿衣、住宿、运输以及兵员补充、医药供应等都成了大问题。特别是时届严冬，天寒地冻，积雪没膝，

滴水成冰，主力部队经过连续作战，没有得到充分休整，有不少指战员衣着还很单薄，根本无法抵御寒冷的袭击。在此情况下，要想再作更大的打算，就很难了。再加上蒋军4个师正从西、南两个方面向这里猛扑过来，形势对我十分不利。

欧阳文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上下的心情自然非常焦急。下一步怎么办？这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事情。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辽东军区通知各纵队师以上干部去七道江开会。第4纵队接到通知后，立即派人出席会议，欧阳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七道江会议是1946年12月11日开始的。参加会议的有辽东军区领导干部萧劲光、陈云（后到）、萧华、程世才、罗舜初、吴克华、莫文骅、唐凯等同志，第3纵队和第4纵队的部分师以上干部曾克林、刘西元、彭嘉庆、韩先楚以及邓岳、李伯秋、刘光涛、谭开云、杜光华、李丙令等同志。13日，在得悉敌两个师分别向梅河口、辑安（今集安市）方向进犯的情报后，萧劲光立即决定：与会的纵队军事干部迅速返回驻地，准备迎战，政工干部留下继续开会。14日深夜，会议结束。

七道江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任务，重点是坚持南满还是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的问题。这是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开始，会上有三种意见：一是第3纵队和第4纵队都到北满去，和北满兄弟部队会合，并肩战斗；二是第3纵队和第4纵队都留在南满，坚持正面对敌斗争；三是第3纵队在南满坚持正面对敌斗争，第4纵队深入敌后打游击。会议开了两天，各方面的意见都相持不下。以后又形成两种意见：部分人同意大家都留在南满，坚持斗争，与南满人民共存亡；部分人则主张放弃南满都到北满去，或者在南满打打看，打得赢就留下，打不赢就去北满。主持会议的萧劲光没有急于作出结论，而是请陈云前来参加会议。

陈云在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以精辟的语言、确凿的论据、生动的比喻、具体的数字，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弊，作了透彻的论述，然后对会议几天来的争议作了重要结论。大意是：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我们坚决不能丢。目前，东北我军斗争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南满站住脚。如果我们走了，蒋军在南满就无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大量兵力压向北满，这就中了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奸计。再说，我们坚持南满斗争，只要长白山在我们手里，群众就有信心向着我们，跟着我们。有了根据地，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会如鱼得水，就有了战胜敌人的本钱。只要我们在南满坚持斗争，便能牵制一部分敌人，减轻北满我军的压力，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战胜敌人的把握。最后，陈云用铿锵有力、满怀信心的语气，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振作精神，鼓足信心，艰苦奋斗，以新的姿态与敌人斗争到底！

陈云的一席话，使到会的同志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欧阳文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在这关键的时刻，陈云的决断稳定了大家的情绪，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展现了南满斗争的光明前景，为“坚持南满，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一分区，辽南二分区，安东三分区）”，直至取得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根据陈云的结论精神，会议转而讨论怎样坚持南满斗争。经过充分的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采取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紧密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同时并举的作战方针。第3纵队担任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顶住敌人，挫其锋芒，粉碎敌人对临江地区的进攻，为改变

局面打下基础。第4纵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恢复我地方政权，和军区地方部队一道，以游击战争形式，开辟敌后战场，重点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以及散兵游勇、顽伪匪杂，破坏敌人运输补给线路，钳制和调动敌军，打乱敌人部署，配合正面第3纵队的对敌作战。七道江会议后，欧阳文和纵队领导同志一起，抓紧时间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敌后作战四保临江

遵照七道江会议精神，一切准备妥当以后，第4纵队所属各师分3路向敌后挺进。

12月14日，第12师率第34团（此时，第35团已在敌后凤城地区活动；第36团驻辑安一带，归辽东军区指挥），由辑安西面的横路一带出发，向安（东）沈（阳）铁路以西的岫岩、盖平方向挺进，尔后在占屯堡一带活动达两个月之久。

12月18日，第10师由通化的东北堡一带出发，越过梅（河口）辑（安）铁路，进到碱厂、小市一带，有力地威胁了敌军占领的沈阳、抚顺、本溪等地。

12月18日，纵直机关和第11师由临江的六道江一带出发，通过梅（河口）辑（安）铁路和通（化）永（陵）公路，有力地打开了牛毛坞、太平哨等地的局面。

从12月14日开始到1947年1月下旬，第4纵队各部队采取远程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法，在兄弟部队的大力配合下，在约1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50多次，攻克敌据点40余处，歼敌（包括地方顽杂武装）千余人，使牛毛坞以北、碱厂以东、救兵台以南、永（陵）桓（仁）公路以西，纵横70多千米以内地区没有敌人踪影，极大地扶持了当地我各级政权，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更重要的是，由于第4纵队活跃于敌后，捣乱敌心腹，威迫沈阳、抚顺、本溪、安东等敌占重地，使敌人不得不从临江前线调回3个整师和1个师的部分兵力，以巩固其后方。与此同时，北满我军冒着—40的严寒，越过松花江，进行了“一下江南”作战，迫使敌人再次分兵北援。由于南满蒋军的两次分兵，不仅减轻了第3纵队等部队在正面抗击敌人的压力，而且有了足够力量粉碎敌第一次进攻临江的阴谋。七道江会议精神初显成效。

在深入敌后的1个月中，欧阳文一直随纵直机关活动。1947年1月12日，辽东军区命令第4纵队主力转移到通化以东集结。于是，纵队即率第11师经太平哨、牛毛坞向沙尖子前进，并在沙尖子歼敌1个侦察连。这时，欧阳文突患重感冒，高烧不退。他虽然仍坚持随部队前进，但适逢隆冬，雪深路滑，所经之处又是高山密林，骑马不行，坐担架也很困难。因此，到沙尖子后，纵队领导决定派人将他转移到设在朝鲜境内的后方机关去治疗休养。欧阳文一行，经马架子、外岔沟越过鸭绿江后，又经楚山、碧潼来到设在昌城的纵队后勤部。欧阳文病愈后，与纵队后勤部部长邱国光一起到达平壤，向江华等领导同志汇报和商讨了关于纵队的后勤供应问题。3月间，欧阳文经碧潼、楚山、渭源、高山镇、满浦、燕城，从中江过鸭绿江，到达临江，最后回到了驻在六道江的纵队部。

1947年2月初，“一保临江”战斗以我军的胜利刚刚结束，部队尚未进

行休整，敌人便又纠集 3 个师的兵力（5 个师盼番号），迫不及待地向我临江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当时第 4 纵队的部署是：第 12 师仍在辽南占屯堡、凤城一带敌后活动；第 11 师奉命第二次深入敌后，向宽（甸）、桓（仁）、辑（安）一带挺进，以坚强的力量和有效的打击，牵制敌军主力，造成其后顾之忧；第 10 师主力则在铁厂以西，向通化压缩，负责围城打援。在第 4 纵队的有力配合下，第 3 纵队在高丽城子、三源浦等地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敌之第二次进攻临江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蒋军两次进犯临江虽然均遭惨败，但其侵占我南满之心未死，又七拼八凑了近 4 个师的兵力，于 2 月中旬，向我临江地区发起了第三次进攻。此时，第 4 纵队第 11 师活动于安东至沈阳铁路两侧；第 12 师在辽南碧流河两岸广大敌后地区；第 10 师和第 12 师第 36 团转为正面防御，协同第 3 纵队作战。再加上北满我军主力“二下江南”，对敌展开猛烈攻势。这就使敌人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疲于奔命，忙于应付。战斗至 2 月下旬，蒋军第三次进攻临江又以惨败结束。但是，非常不幸，第 4 纵队第 10 师师长杜光华在大荒沟战斗中光荣牺牲。

1947 年 3 月 8 日，北满我军主力“三下江南”，向敌人发起反击，迫使敌人将第 22 师、第 91 师由梅河口、营盘地区北调长春、四平。辽东我军先后收复金川、柳河、辉南、辑安、桓仁等城，通化守敌陷于孤立。为牵制敌主力，配合北满我军作战，巩固和扩大长白山根据地，辽东军区决心由第 4 纵队第 10 师和第 12 师第 36 团主攻通化，第 3 纵队位于柳河一线，负责打援，以保证通化战斗的胜利。

通化为辽东重镇之一，南到辑安，北至长春，东至临江，均有铁路相通，交通极为便利。敌人经常在此放有 1 个师守备，防御设施较为充分。敌人 3 次进攻我临江，均以此为前进基地（包括武器、弹药、粮草的中转）。

3 月 20 日下午 3 时，我进攻通化的战斗打响。由于敌人防守较严，工事坚固，地堡成群，再加上时值冬末春初，遍地积雪，部队行动诸多不便，我军进攻受阻，进展缓慢。23 日，欧阳文随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通化以北某高地指挥部队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至 24 日拂晓，我军已攻占多处敌人据点，有的部队正向市内攻击。这时敌人援兵第 89 师和第 54 师第 162 团正由旺清、向阳镇奔来。我方因伤亡较大，不利再战，便决定除以第 30 团继续围攻通化外，主力撤出战斗，以保持部队的元气，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准备粉碎敌人的再次进攻。当部队撤至新的集结地域后，欧阳文立即回到六道江纵队部，向各级政治机关部署了部队休整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蒋军在南满战场虽然连连惨败，但其贼心不死，在获得增补和总结前三次失败的教训后，一改过去平行推进、长驱直入的战术，运用以优势装备扼守要点、主力集中机动使用的方法，又拼凑了 10 个师的兵力，分 8 路于 3 月 26 日向我临江地区开始了第四次进攻。为了痛击来犯之敌，南满我军立即决定集中第 3 纵队和第 4 纵队主力，以不惜重大伤亡和打硬仗、打恶仗的决心，在红石砬子附近，以很小的代价围歼了敌第 89 师和第 54 师第 162 团，取得了俘敌代师长以下 8000 多人的重大胜利。其余各路敌军，见中路主力被歼，便都仓皇逃回原地。至此，南满我军彻底粉碎了敌对临江的第四次进攻，走完了最艰苦的历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南满我军取得“四保临江”的伟大胜利，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不仅狠狠地打击了蒋军的嚣张气焰，使其损兵折将，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

“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由于蒋军在南满连连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兵员补充困难日益成为其致命弱点，便不得不改变它的战略方针：由战略进攻转为机动防御。东北我军从此则由战略防御逐渐转入战略进攻，基本扭转了东北战局，为缩短东北解放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4月，欧阳文在六道江以《四保临江》为题写诗一首：“蒋在东北忙调兵，‘先南后北’犯长临。军民一致齐奋起，敌兵四万被歼尽。三下江南相配合，四保临江得安宁。从此战局我主动，准备反攻歼敌人。”这首诗不仅记述了战役的过程，而且指出了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

“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七道江会议的功绩是永存的。这是挽救南满危机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坚决贯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共东北局关于南满作战的一系列方针，高度统一了南满军民的思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四保临江”及以后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直至东北完全解放的胜利。

上下一心渡难关

在前后近4个月的“四保临江”作战中，第4纵队先后担负了深入敌后和正面防御的战斗任务。其中，深入敌后作战是第4纵队组建以来最艰苦的时期。部队在—40的严寒里，在没有根据地依托、给养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得不到休整和补充，元气受损。但是，英雄的指战员们，高度发扬了我军固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顽强地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级的正确指挥和兄弟部队的密切协同下，在人民群众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大力支援下，第4纵队不仅胜利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而且取得了歼敌约8000多人的辉煌胜利。更重要的是，纵队得到了严峻的考验，大大提高了军政素质，为迎接即将来到的东北战场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对于深入敌后作战，首先要做的是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由于形势严峻，根据辽东军区的指示，除第11师外，第4纵队其他部队都已作了过松花江和北满兄弟部队会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此，要让部队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下子都转到深入敌后这个弯子上来，并坚决地愉快地执行，是不太容易的。正如萧劲光同志在一篇回忆录中所说：“（当时）领导干部中的这种想撤出南满的消极思想，对部队影响很大。当时对我们来说，天寒地冻、衣食困难、根据地狭小、敌人嚣张都不可怕，可虑的是我们自己形不成‘武松的拳头’，没有‘打虎’的坚强决心。我们深感思想工作任务之艰巨。”显然，当时任第4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欧阳文身上压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对他来说，搞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责无旁贷的。

七道江会议结束后，彭嘉庆和欧阳文等同志一回到纵队驻地，便立即利用短暂的宝贵时间，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召开各种会议，特别是纵队政治工作会议，深入传达七道江会议精神，反复讲述纵队深入敌后作战的重要意义、注意事项以及方式方法，动员全体指战员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光荣传统，并提出要“咬紧牙关，熬过困难，爬过山顶，迎接胜利”的口号。在连队，还相应地开展忆苦教育和形势教育，用蒋军和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残酷压迫、剥削、镇压东北人民群众，进行反攻倒算的罪恶事实，激发广大指战员仇恨敌人、爱护人民的阶级觉悟，增强打好深入敌后战

斗的信心。以上措施，有效地肃清了部队中存在的悲观失望和恐敌惧寒情绪，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必胜的决心。

同时，部队调整充实了各级干部，加强了党的组织，极大地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物质准备上，动员部队用破旧的毡毯剪裁做了一些御寒用的鞋袜、手套，并请当地群众介绍防冻御寒的办法；动员指战员自背部分干粮，以解决在敌后筹粮的困难。另外，还适当处置了一些笨重的无法携带而又无关紧要的物资和装备，尽量多带子弹、手榴弹和轻武器，以利轻装奔袭。

部队深入敌后，各级政工干部随即纷纷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认真细致地做好现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大讲特讲红军长征以及抗日战争中我军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大讲特讲在敌后耳闻目睹蒋军等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迫害南满人民的罪恶事实；大讲特讲部队不断涌现的好人好事，开展评功、记功、立功运动，树立正面形象；大讲特讲纵队深入敌后作战的重要意义和光明前景。总之，尽一切力量不断激励、鼓舞部队，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还不断地教育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一定要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光荣传统，和广大战士同甘共苦，以实际行动来启发大家，带动大家。当时，按制度配备马匹的干部，都主动把马让出来，不是驮物资，便是让伤病员骑，自己和战士一样爬山走路，一样扛枪负重。团政委周绍明其时正患肺结核，上级让他回后方休息治病，他不同意，仍然坚持随部队深入敌后。不久，他病情加重，吐血，高烧，连马也不能骑，行军时只好用担架抬着走，但仍然坚持随队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连指导员鞠恩远肚皮被敌人的子弹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由于缺医少药，气候严寒，伤口很难愈合，随便动一动便会引起剧痛。领导再三让他到后方休养、治疗，他总是不同意，仍然坚持行军作战，长达一个多月，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连队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像周绍明、鞠恩远这样的感人事迹，在当时是非常多的。正因为有这样许许多多感人事迹的不断启迪和鼓舞，才使部队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动力。

第4纵队深入敌后作战，部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值隆冬，天气奇寒，气温经常在一30~—40之间。到处是冰天雪地，鸟兽绝迹，雪深没膝，不辨路径。指战员们经常在趴冰卧雪的条件下作战，在风雪弥漫的环境中行军。吃的是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喝的是随处可见的积雪。指战员的鞋袜和脚经常冻在一起脱不下来。如果强行脱下，就可能弄个皮破血流。所以大多数人都是长时间不敢脱鞋。有一次，欧阳文带着一支警卫小分队，在一个高山的山头上想找下山的路。由于满山积雪，白茫茫一片，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任务很急，时间紧迫，不能再拖了。欧阳文突然想起红军长征时下雪山的方法，便告诉大家裹紧衣服，抱住脑袋，顺着山势滑下去。他首先带头滑了下去，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是那些警卫战士却苦不堪言，因为他们身上背了很多东西。当他们下到山脚时，一个个不是“丢盔”便是“卸甲”，显得非常狼狈。但是，大家都乐得哈哈大笑。

在那些日子里，最令人恼火的就是碰上狂风怒吼、雪花乱舞的恶劣天气。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部队便无法行军作战，只好找地方避一避，躲一躲，因而常常贻误战机，令人焦急不安。那时，为了迷惑敌人，以利奇袭，或者为了避开强敌的围堵，部队经常在山沟里活动，很少进入大的村庄或圩镇。

如果侦察到敌情，为达到一击成功的效果，部队经常要在夜间出发，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山间小道上奔进。实在疲惫了，就只好挤在人烟稀少、条件极差的山间民居里，靠烤火挨过漫长的寒夜。当时如能在老乡的大火炕上睡上一觉，就已经相当美气了。不过没有被子盖，上冷下烫，总得来回翻转。在山沟里活动，不容易弄到油和盐，只能找点老百姓泡菜缸里的酸菜水代替。玉米窝窝头冻得像石头那样硬，砸不烂，咬更不行，只好用口水慢慢浸软了吃。

那时，有相当多的指战员御寒的衣帽不全，不是缺棉裤便是缺棉帽，不是缺棉鞋便是缺手套。个别人不得不裹上毯子方能行军打仗。尽管御寒条件如此不足，但是战士们对枪支弹药却十分爱护。有的指战员总是把枪搂在怀里，用棉衣裹着睡觉、行军、开会或站岗。有的则宁愿好几个人共用一条被子或毯子，也要腾出被子或毯子来包枪支。因为在奇冷的天气里，如果枪栓冻坏了，扣扳机时不容易发火，在战斗中就会误事。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部队真正因战斗而伤亡的不多，因冻伤而减员的却不少。例如，在大蚊子沟伏击战中，作战负伤仅 20 余人，而冻伤却有 400 多人。又如，第 4 纵队第 11 师在敌后作战 3 个多月，部队减员 3300 人，其中因冻伤而减员的便有 2100 多人，占 63% 以上。当时，怎样帮助指战员们渡过严寒关，几乎成了共同的头等大事。大小单位，各级干部，都不等不靠，想方设法，共渡难关。有的把仅有的几床毯子剪成小块，分给大家做包脚布；有的找来乌拉草当鞋垫子或护腿、护膝；有的组织捕猎队，尽可能地捕捉些野兽，给大家补补身体，野兽的皮则分给大家做靴靸；有的教大家如何防止冻伤手脚，想办法保证部队随时能喝上防寒的姜（或辣椒）汤水……总之，能想出的办法，都用上了。大家团结一心，互助友爱，如果找到了好吃的、好穿的，总是干部让给战士，上级让给下级，体强的让给体弱的。许多第 4 纵队的老战士，现在一想起这段极其艰苦又充满阶级友爱的经历，都感叹不已。

在敌后作战，经常是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缺吃少喝地周旋在敌人的重围中。1947 年 2 月 16 日，第 4 纵队第 11 师奉命第二次深入敌后作战，他们由通化、辑安附近的青沟子一带出发，再次向抚顺、本溪方向前进，以牵制敌主力，造成其后顾之忧。我军第二次深入敌后，外部条件没有多少变化，仍然是天寒地冻、补给困难、毫无依托；所变化的却是敌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后，变得更凶狠狡猾了。英雄的第 11 师指战员们，高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采取远程奔袭、速战速决、飘忽不定的打法，日夜转战于敌军的夹缝中。有一次，第 31 团等部队在师指挥所和师直机关率领下，执行破袭凤（城）灌（水）铁路的作战任务，曾在 8 天内不眠不休，行程 250 千米，只吃了 7 顿饭，连续和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 9 次，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其艰苦程度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

当年，第 4 纵队第 11 师的老战士刘华清，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对这次战斗有较具体的记述。他当时在第 31 团第 3 营当营部书记。经过几番激烈战斗后，部队昼夜奔袭跨过了安奉、凤灌两条铁路，到达石城子。这时，指战员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刘华清和司号员奉营长之令，随第 7 连进村找东西吃。一进村，碰到两个背枪的敌“清剿队”队员。他们立即缴了这两个人的枪，问清敌情况后便把这两个人轰走。在那兵慌马乱的年月，石城子的老百姓都跑光了，自然很难找到吃的东西。刘华清和司号员一商量，便

决定到富户家翻翻看。不久，在一个富户的家里翻到一麻袋花生，扛回营部后，便权且充当营部全体指战员的一顿“饭”。这是两天两夜以来的第一顿饭啊！吃完花生“饭”，部队便马上离开了石城子。几个月来，部队连日转战，不停地奔跑，难得吃顿好饭，睡个好觉。有些人困倦得一停下来就睡着了。有一次部队小休息时，刘华清在路边睡着了。醒来一看，四周静悄悄的，黑暗中找不到人，只碰见也因为睡着了而掉队的第7连卫生员。这时敌人正紧紧尾追而来，如果再跟不上队，他们便有被俘的危险。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山炮营开过来了。他们赶紧跟着山炮营，经过两三个小时急行军才追上了自己的队伍。后来，部队在红石砬子附近的荒沟里中了蒋军新25师的埋伏，饥饿疲累已极的指战员们慌忙应战。为了掩护师指挥所和师直机关转移，纵队战斗英雄、第1营教导员丛德滋带伤坚持指挥战斗，终因敌众我寡，不幸中弹英勇牺牲。部队突出重围后，原打算在红石砬子休息一两天，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打开背包，敌人的六炮、迫击炮弹就打过来了。部队又立即转移，一口气跑了30多千米，到达中（国）朝（鲜）边境线上我安东3分区控制的白菜地，才得到了短暂的休息。3天之后，部队北进桓仁南面的铁厂子，与从碱厂回来的第32团会师。经过这次激烈的战斗，部队伤的伤，亡的亡，掉队的掉队，第31团只剩下700多人。其中，第1营由300多人锐减到60多人，有一个连队只剩下8个人了。

欧阳文在回忆录中说，由于第11师两次深入敌后作战，特别是在第二次深入敌后的两个多月中，不仅完成了配合正面作战的任务，而且还取得了收复碱厂、攻克桓仁以及破袭安（东）沈（阳）铁路等重大胜利，因而获得了辽东军区为全师指战员每人记功一次的特殊奖励。这样特殊的奖励在我军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对于第4纵队深入敌后作战，中共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都有明确的具体的指示：这次深入敌后是“军事与政治全面结合的群众性斗争”，是以军事力量支持地方干部和群众，逐渐创造小块根据地的斗争，斗争中要充分体现我军与辽东人民共患难的精神。因此，其作战方针是：“在军事上是趁敌后空虚，采取远距离奔袭，主动打击敌人。打击对象，除坚决消灭一些可以消灭的敌正规军外，重点首先应大量歼敌地方游杂武装，以消灭压迫群众的地头蛇，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支持群众斗争，铲除蒋军依托。再就是炸桥断路，以增加敌人的交通运输困难，打乱其后方，使敌人不安，以吸引牵制敌之主力，扩大其兵力不足之矛盾；倘使敌人主力回师，我则与它周旋，避强打弱，争取主动，多打胜仗，以战养战，提高士气。”“在政治上，则加强宣传，大量发动群众，恢复新政权，摧毁伪政权，对极其反动之地主恶霸，予以公审镇压，以支持群众斗争。”这些指示，为第4纵队取得敌后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陈云、萧劲光以及辽东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都非常认真地予以解决，有些事例后来成为人们流传的佳话。在七道江会议上，陈云曾多次询问第4纵队到会的同志：“你们出去（指到敌后）有什么困难？”当第4纵队的同志具体提出后，陈云立即肯定地答复说：“你们纵队要什么东西，首先保证你们。”萧劲光也明确表示：“远距离情报，我们首先保证你们；俘虏未处理，交其他部队处理；兵员不足，我们从地方部队抽调补充一部分；部队没有冬衣御寒，从3纵队和军区机关补给你们。”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和伤病员安置问题，陈云亲自去仓库和医院了解情况。他指示仓库

保管人员和医务人员，要确实实地查清库存，优先保证第4纵队的需要；对伤病员要特别认真地照顾，不要饿着冻着。他指出做好了这些工作，也是对前方指战员的莫大鼓舞。

为了解决兵员问题，从医院动员了不少已治好伤病的同志归队；军区机关也大力精简人员，特别是把许多警卫人员充实到战斗部队；还从地方部队抽调了不少人，补充到第一线。有一个省军区领导，对抽调走他的部队一时想不通，怕影响战斗力，丢失自己负责守卫的地区，无法交代。陈云便亲自前往做思想动员工作，亲切地说：“你们将一部分兵员交给4纵队，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因为调走了兵力，致使地方丢失，由我负责好了。”在精简机关、充实基层这个问题上，陈云和萧劲光同志都带头坚持把自己的警卫班压缩到只留下两三个人。有些同志担心遇到敌情人手少了不好办，陈云就耐心地解释说：“同志，前方部队如果打不好仗，一旦敌人来了，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七道江会议决定了的事，我要带头执行，不能讲价钱。”萧华还亲自到第4纵队进行动员，做思想工作，他在讲话中反复阐明深入敌后作战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是极其关键的一环。他指出，要大力提倡和发扬我军固有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不断克服少数人中存在的消极情绪，借鉴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敌后工作的经验，在新的地区、新的条件下闯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斗争方法。

当时的安东省委也组织精干的机关于部，由刘澜波省委书记亲自率领，随第4纵队深入敌后，开展地方工作；同时动员广大的南满人民群众，积极拥军支前，为打败敌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给第4纵队解决冬衣等问题，辽东军区机关和第3纵队的指战员们，响应七道江会议的号召，发扬高度阶级友爱精神，踊跃地拿出自己的棉衣、大衣、棉鞋、棉帽、手套，送给第4纵队的同志。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有些棉衣、鞋帽、手套是直接脱下来的。

上级领导的关怀和兄弟部队的支援，直接保证了第4纵队敌后作战的胜利，切实有力地鼓舞了第4纵队全体指战员的革命斗志，使他们深刻地领会到我军之所以百战百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真理。

与民共甘苦

在敌后作战期间，第4纵队之所以能够战胜严寒，取得胜利，是和广大南满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敌后革命根据地都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蒋军一到，面目皆非，受到严重的摧残。蒋军每占领一地，就一面派出部队四出进行疯狂的“扫荡”；一面多方收罗土匪、特务、伪军、伪警和地主武装，扶植地主、富农、流氓、地痞以及伪满人员，建立反动政权和反动武装。敌人在铁路、公路沿线重点设置据点，加紧修筑工事，同时并村修路，严加控制。各类反动分子一旦得势，便迅速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我许多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被血腥镇压，许多妇女被奸淫，许多房屋被烧毁。敌人派款抢粮，征兵抓夫，闹得鸡犬不宁，乌烟瘴气。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南满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恶毒的是，敌人为了困死我军，封锁我军，把老百姓和我党我军隔绝开来，在每个村镇都建立了严格的连坐制度、保甲制度和情报网。如果查出谁与我军有接触，轻者处以罚款，重者抓去当苦工或受鞭打。对护养我军

伤病员的，给我军送情报的，供给我军粮食的，则作为刑事犯一律杀害。他们还将山沟里的小窝棚烧光，将粮食抢光，将水源堵塞，把居民赶走，以断绝我军依托。在敌人残酷、凶狠、毒辣、严厉的统治下，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受所谓“正统”思想（即国民党宣传他们是“国军”，我们是“匪军”）的影响，有许多胆小或不明事理的群众不敢与我军接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第4纵队遇到了重重困难，不用说兵员、物资、情报等难以解决，就连向导也难找到。

尽管敌人居心恶毒，但是第4纵队并没有被困死，老百姓也没有和第4纵队隔绝开。遵照中共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关于敌后斗争“是军事政治全面结合的群众性的斗争”的指示，为了做好群众的发动和组织工作，第4纵队政治部首先选调政策性强、具有独立活动能力和敌后工作经验的优秀指战员，组成若干工作队，每队三五十人不等，进驻草帽顶、浑江边、凤城、赛马、平顶山、红庙子等重要地区。工作队的领导有的直接兼任该地区的区长或县长，以利于开展工作。例如：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长李显率50余人，组成宽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坚持活动于宽甸以东、浑江口以西、牛毛坞以南广大地区；纵队第10师政治部副主任车学藻率数十人，活动于凤城和赛马地区。各工作队脱离了纵队的主力，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配合下，团结与发动群众，开创小块敌后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这些小块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对配合主力作战，转运与隐藏伤病员，供应部队一定的物资和兵员，特别是振奋军心和民心，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部队在敌后执行政策的好坏，纪律表现的优劣，对部队的战斗力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部队吃住、兵员补充、伤病员安置、物资运送、情报传递等等，都要依靠群众去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武装斗争固然重要，是中心环节；而武装斗争能否胜利，关键又在于群众是否支持；群众的支持，又主要依靠党的正确政策的威力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当时，政策是否正确，主要看能不能体现并保护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切身利益；作风是否优良，主要看能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这二者都要部队用实际行动去体现，否则群众是很难组织、发动起来的。在欧阳文主持下，纵队政治部一再要求各部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每进驻一个村镇都要把做好群众工作放在首位。

各部队通常采用大量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大力宣传我党的政策、我军的宗旨，讲明当前敌我斗争形势和发展前景；同时反复宣传讲解我党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在本质上的区别，打破群众中存在的所谓“正统”观念，树立东北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信心。对贫苦农民，我军坚决依靠和支持；对极反动的地主恶霸和民愤极大的坏分子，坚决予以公开镇压；对于一些恶毒攻击、诋毁、诬蔑我党我军的言论，及时公开揭露与批判；对待观望态度的地主和士绅，则予以教育，稳定其情绪；对开明的愿意与我合作的人士，则予以表扬和信任。此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对敌人发动政治攻势，扩大和加深敌人的内部矛盾，以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为了表明我军与蒋军的不同，部队的粮款都向地主、富农征借，绝不侵犯一般群众的利益。

欧阳文和各级领导一再强调，要反复教育广大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违纪者一定要严格查处，轻者公开检查，赔礼道歉；重者或影响很坏者则当众处理，严责不贷。部队每进驻一地，便帮助群众干

农活，干零活，保证做到“庭院光、水满缸”。部队离开前，还派专人检查纪律执行情况，做好弥补工作。总之，要求部队要用实际行动去宣传启发群众，让群众自觉地认清我军和蒋军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欧阳文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曾经当过他的警卫员的王玉乾经历的一件事。在深入敌后作战中，王玉乾被派出执行一项任务，路过某团机枪连时，顺道看望了老战友、这个连的指导员毛振宇同志。在将要告别时，毛突然向王提出要借5角钱。王感到十分不解：在这战火纷飞、什么东西也买不到的敌后，借钱有什么用？毛说：“前几天，连里有个战士不小心踩死了群众的一只鸡，需要钱赔偿。”王玉乾听后，感动不已，马上从自己仅有的六七角钱中，拿出5角给他。欧阳文得知此事后，觉得事虽简单，但是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从中可以看出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是多么认真、多么严肃。也正因为如此，我军得到了南满各阶层人民的真正了解与支持。群众有的说：“国民党军队和满州国的皇协军、小日本的皇军一样，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你们才是穷人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有的说：“过去我们想中央，盼中央（指国民党），那知中央来了更遭殃。”还有的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如果早来两天，我的儿子和兄弟也不会被国民党的军队抓去了。”

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支持，艰苦奋斗在敌后的第4纵队如鱼得水，处境有很大改善。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信，送情报，带路，送粮食，护理伤病员，看管俘虏；有的还积极配合作战或报名参军，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帮助我军夺取胜利。部队每进驻一处，群众便主动对敌封锁消息，主动把好房子让出来，把热炕头腾出来，以便我军指战员们好好休息。有的群众舍不得吃酸菜水，留起来送给战士洗手、洗脚，防治冻伤。他们把玉米碾成面送给部队，自己却吃玉米皮。据不完全统计，在“四保临江”战斗期间，辉南县支援粮食2.4万公斤，菜蔬（干菜）15万公斤；柳河县出民工2.57万余人，大车4000多辆，担架2871副，报名参军4000余人；临江县支援粮食2.5万公斤，干菜7500公斤，草料4万公斤，报名参军2018人。要知道，当时这都是一些很小的县，能作出这样大的贡献，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广大人民群众对部队的积极支持和真诚爱护，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志，成为第4纵队取得敌后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英雄的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在参加“四保临江”战斗后，紧接着又投入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以及著名的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随后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的张家口、康庄、怀来战斗，并奉命担当警卫北平的任务。在此期间，第4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该军又先后参加了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不久，进驻广东、广西一带。

欧阳文作为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成员，亲身参加了许多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和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他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夺取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业绩在这支部队光辉的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篇章。

塔山阻击战中的胡奇才

王贤根

胡奇才（1914~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北省红安县人，生于1914年9月28日。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先后6次负伤，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团长、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山东纵队第8支队副司令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第二分区司令员、第1旅副旅长、鲁中军区参谋处长、山东军区第3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4纵队司令员、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一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东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工程兵顾问组组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家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荣誉功勋章。是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候补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临 战 受 命

1948年的夏日，阵阵爽风吹过东北大地，大片大片的高粱、玉米地在阳光下闪烁着丰收的光芒。

在青纱帐中走出一位身材魁伟、面色稍黑、精神饱满的军人，他用浓重的湖北口音招呼着身后的人马。不久，一支雄壮的队伍挺进在黑土地上。

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就是胡奇才。

他原是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后到大连治病。在此期间，吴克华从辽东军区调回第4纵队任司令员，韩先楚从第4纵队调往第3纵队任司令员。此时，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胡奇才回第4纵队改任副司令员。

胡奇才的老上级罗荣桓与他促膝谈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红军时期，你不是当过12师政委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你又变成副团长了。单从职务上讲，这肯定是降了，可那是革命的需要。大敌当前，我们都应以革命利益为重，只要对革命有利，干什么都一样。”

胡奇才心悦诚服。光着脚板投向革命，什么时候想过是为了一官半职呢！

罗荣桓鼓励道：“要打大丈夫了，回去可是个好机会！”

胡奇才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走上新的征程。

“要打大丈夫了！”部队在战役之间，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整训和军事练兵运动。

在整训和练兵热潮中，胡奇才心中总是思索着一系列问题：这大丈夫是怎么个打法呢？毛主席会怎样部署呢？东野的首长会给我们纵队什么任务呢？

他不时地翘首南望，他的心飞向了河北西柏坡，飞向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身边。

毛泽东数日在山坡上、地图前徘徊与思虑，胸有雄兵百万。一幅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大决战的蓝图已经呈现在他的面前。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很快作出决断：抓住决战时机，选定决战方向，组织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与前途的伟大战略决策。

毛泽东的深邃目光早已看准了东北这片黑土地。

自 1947 年 5 月至 1948 年 3 月，我东北野战军连续发动了夏、秋、冬季的攻势作战。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我军沉重打击，丧失了战争主动权，剩下的 50 万左右的部队被我军分割于长春、沈阳、锦州等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仅有辽西走廊这条狭长地带保持着锦州与关内的联系。蒋介石看到了东北局势的严峻，并预感到有丢失的可能，但仍下最大的决心进行重点守备，同时企图通过辽西走廊连接关内关外大军，牵制我军于关外，伺机打通北宁线，争取有利战机，以扭转败局。

作为纵队的指挥员，胡奇才并不知道最高统帅部的统筹，但他知道这将是我军与国民党军一场生死的大较量。

我军与国民党军在这片大地上已经较量了多年。昔日毛泽东、党中央带领红军从南方到了北方，如今北方的大片土地上很快要拉开大决战的序幕，我军的百万雄师就要围困和攻击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从而挥师再从北方打到南方。一派灿烂的阳光很快就要普照中国大地了，人们怎不为之振奋呢！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在军用地图前沉默徘徊。淡红的香烟火在他手指间微微闪烁，淡淡的烟味仿佛增添了他的思绪。毛泽东思考的问题是：东北的国民党 50 万军队如何就地歼灭？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

毛泽东始终专注着锦州。

我军攻下锦州，等于关门打狗。辽沈战役这盘棋活了！接着大军入关，平津战役这盘棋也活了！……蒋介石怎经得住这几击，他的江山必将像山崩般地垮台！

几经周折，东野司令林彪终于下决心先围攻锦州了。东野的兵力部署电报军委、毛泽东。

1948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是常人难以比拟的。

蒋介石得知我军向锦州方向运动的迹象，觉察到老对手毛泽东布棋之凌厉，赶紧飞往沈阳、葫芦岛、天津、北平之间，与卫立煌、傅作义磋商，调整兵力部署。

他紧急从华北战略集团抽调第 62 军 3 个师、第 92 军 1 个师和独立第 95 师，海运葫芦岛；又令烟台第 39 军 2 个师海运葫芦岛。这样，加上驻锦西的第 54 军 4 个师，共 11 个师，组成由第 17 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同时，他还命令海、空军配合“东进兵团”。

蒋介石又命令国民党军队的新 3 军、新 1 军、新 6 军、第 49 军、第 71 军和第 207 师第 3 旅共 12 个师又 3 个骑兵旅，组成廖耀湘为司令官的“西进兵团”。

霎时，车轮滚滚，烟尘弥漫。“东进兵团”、“西进兵团”迅速向锦州南北方向云集。

蒋介石下令东西两兵团合击我围攻锦州的东野大军。其目的，一方面是解锦州之危，另一方面是妄图在此围歼我东北野战军主力。

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扫清锦州外围敌城镇据点，由第 2、3、7、8、9 等 5 个纵队组成的攻城部队加紧对锦州的包围。同时以第 5、6、10、12 共 4 个纵

队对付沈阳方向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 9 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以第 4 纵队、第 11 纵队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向之敌。也就是说，第 4 纵队、第 11 纵队面对的是国民党侯镜如指挥的“东进兵团”。

锦州是辽西走廊的咽喉，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清兵围攻锦州，总兵洪承畴、洪承德率 13 万兵马与清军战于锦郊松山，败走杏山。睿亲王多尔衮曾率兵战于距锦州西南 30 千米的塔山。

如今，塔山是国民党“东进兵团”解救锦州的必经之路。

顷刻，塔山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

由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胡奇才副司令员率领的第 4 纵队很快进入塔山一线阵地。

东野首长明确指出：塔山阻援战斗意义重大，要消灭东北蒋军，必须先从小东山开刀，封闭入关通路；要取辽西，必须拿下锦州；要拿下锦州，必须把近在咫尺的锦西、葫芦岛援敌堵住。

因此，能否把援敌阻于塔山以南，就成了锦州能否攻克的关键。为此，东野首长又令第 1 纵队（欠第 1 师）进驻锦州、塔山间的高桥，作为战役总预备队。

塔山堡是辽东湾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位于锦州与锦西之间；东临渤海，西接白台山、虹螺山，紧贴锦西高地，两锦公路穿村而过，北宁铁路于村东 1 千米处与公路平行北上。第 4 纵队的防线就以塔山堡为中心，东至海边，西至白云山、北山，正面长 12.5 千米。在这敌人北进的唯一通道上将展开一场血战。

胡奇才副司令员与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等指挥员，带领全纵队团以上干部到前沿勘察地形。这里，北距锦州外围不到 20 千米，南离锦西敌人的前沿阵地只有一二千米。敌人占据塔山南面的大东山、小东山、影壁山一线高地，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我军阵地全在敌人炮火射程内，很易被敌人攻击控制。时间紧迫，部队来不及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第 4 纵队必须像钉子一般坚固地钉在塔山，才能保证围攻锦州的胜利。

敌我态势十分严峻：我军要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的陆、海、空联合进攻，兵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势上敌高我低，加之敌有坚固工事作进退依托，我军准备时间仓促。经分析，大家还认为，塔山地区为中等起伏地，敌人在海、空军火力支持下，便于展开攻击；但这里临海傍山，敌人不便从两翼迂回。全纵队防御正面长 12.5 千米，便于敌人进攻的地形仅有 8 千米，敌人不可能一次冲击投入太大的兵力。

胡奇才与几位纵队领导依此分析，决心将敌人挫败在我阵地前沿。一旦阵地被突破，也必须有足够兵力将敌人消灭在阵地内。于是将兵力作了部署：第 12 师全部展开于东自打鱼山西至白台山一线，第 11 师第 32 团展开于北山之前。重点是守备塔山堡、塔山桥（铁路桥）和白台山等足以支撑全线的主要阵地。为了保证有足够力量持续不断地反击敌人的连续冲锋，第一线师、团均以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机动力量作第二梯队。第 10 师全部及第 11 师第 31 团、第 33 团则于一线部队侧后，按纵深梯次配置，作为全纵队的预备队。

部队进入紧急的战前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

10 月 8 日晚上，胡奇才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白天在前沿察看地形的情形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他感到塔山堡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放 1 个连的

兵力太少了。他心中总觉得守好塔山堡，比重点守塔山那座小山头还重要。于是他翻身起来找到纵队参谋长李福泽，决定再去一趟塔山。

9日拂晓，胡奇才和李福泽带领参谋驱车赶到塔山堡后面的小山包上。经再度察看分析，总觉得塔山堡后面的山包大小，又在公路一侧，而塔山堡正在公路线上。如果守小山包而不守村子，一旦塔山堡被敌人夺占，再增加一倍的伤亡也守不住塔山堡。而敌人却可以绕过山头，沿公路直奔锦州。这样一来，我防线其他部位再坚固也无济于事。守山不守村，就可能犯三国时“失街亭”的错误。塔山堡虽然地形低洼，但村前一条宽20米的饮马河可作为天然屏障，民房村宅又可作为工事的依托。因此，固守的重点应放在塔山堡。

正在此时，第12师师长江曼元、政委潘寿才也来到山包上。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即令第34团第1营的另2个连队当晚进入塔山堡。

10日凌晨，隆隆的炮声响彻塔山地区上空，枪声像爆米花般响个不停。

敌军向我白台山、塔山堡、铁路桥头堡、高家滩等阵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敌人偷袭由第12师第34团警卫连1个排守备的打鱼山岛。由于我守军不了解沿海潮汐涨落规律，敌人1个连的兵力趁拂晓起雾和海潮退落之际摸上了打鱼山岛。

打鱼山岛失守，使塔山地区左侧防线受到威胁。

东野首长询问战况，围攻锦州的各纵队关注打鱼山岛情况。他们清楚，如敌军从西海口登陆，也可直抵锦州外围。

下午5时，海水退潮，纵队领导命令第10师第29团第1营夺回该岛。胡奇才在师指挥部，从望远镜中看到我军很快攻上打鱼山岛，将敌军1个连打得落花流水，还生俘30余名。

塔山阻击战从10日开始恶战6昼夜，作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每天主动询问塔山战斗情况。林彪对塔山前线指挥员说：塔山必须守住！拿不下锦州，军委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林彪最担忧的是塔山堵不住。

10月11日，第4纵队接到东北野战军首长电令，指名胡奇才立即到塔山前线协助第12师指挥作战，并要每天向东野司令部报告4次敌情、我情、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情况。

同一天，东野又派作战处长苏静到第4纵队司令部协助指挥。

接到电令，胡奇才心情颇为激动。他知道，这是东野首长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东野首长时刻关注着塔山，围攻锦州的各纵队指挥员关注着塔山。他整理一下戎装，带上参谋人员立即步行赶往塔山第12师。

坐镇在前沿指挥所

一路风尘，胡奇才从第10师前沿赶到塔山第12师指挥所。师长江曼元、政委潘寿才已经得到通知，把团以上干部集合在战壕里等候胡奇才副司令员的到来。

第12师指战员在塔山已经战斗了一昼夜。就在昨天——10日，对面的敌人试探性的进攻也非常猛烈。

1966年的冬日，当年坚守塔山的第34团政委江民风对笔者深有感触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第一天的战斗就异常激烈。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来阵地看

地形时对我们说，塔山前沿连队 1 个班增配 1 挺轻机枪和 1 挺重机枪。那时，这火力算是很强的了。我把重机枪叫做“老黄牛”，因为它经打，很猛，来劲。我和团长焦玉山都在塔山前沿阵地。我个高块大，打仗喜欢扛挺重机枪。那天我就把挺重机枪，坚守在饮马河边。我对部队说：“以我重机枪为号，听我的！”

战争是残酷的。坚守在饮马河边的第 1 连看到前沿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打得眼睛都红了。连长、战斗英雄刘景山身先士卒，光荣牺牲。第 3 连连长对江民风说：“政委，你快回去！”子弹像密集的雨点直射过来。饮马河边老百姓的房子打平了。第 3 连连长再次拽着江民风说：“政委，快回去！”江民风顺势从高处跳了下来，第 3 连长也倒下了。江民风拉着他说：“走！”就在这瞬间，第 3 连长再也没有起来……

第 1 连的前沿战斗最为激烈。江民风带第 4 连冲上去，由第 4 连连长代理第 1 连连长，组织指挥战斗。

晚上，指导员在小油灯下，拿着花名册清点人数，边点边流泪。第 1 连 160 人，牺牲 50 多人。江民风政委对他说：“我今晚给你配 20 名党员，20 名团员。”第 34 团从机关、特务连、侦察排、通信排、警卫连抽调人员补充到第 1 连。江民风将自己的警卫员也送到第 1 连……

胡奇才副司令员到达第 12 师后，立即向全师团以上干部传达了东北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和纵队首长的决心，提出一定要在塔山地区坚守 6 至 7 天，保证主力部队攻克锦州。

这位出生于大别山南麓李家田的山村农民之子，在艰苦的磨难中练就了一付硬朗的身板。单从他 16 岁参加红军之前从未穿过鞋这一点，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位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的将军会有怎样的意志和毅力，会有怎样的气度和精神。他在硝烟未散的指挥所与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研究了师领导的分工和兵力的部署：副师长芦燕秋下到第 36 团坚守白台山阵地，帮助第 36 团指挥作战；参谋长李洪茂负责指挥纵队直属炮兵团，组织步炮协同，并到前面的观察所去；胡奇才副司令员和师长、政委在师指挥所负责全面指挥。

师指挥所附近只有一条很浅的交通壕。胡奇才觉得要打硬仗，要坚持个把星期面对敌人不间断的大规模进攻，这样的交通壕肯定不行。他提议立即派工兵连构筑师指挥所、炮兵指挥所和掩蔽部。

为使炮兵有力地支援前沿战斗，他除让师、团山炮和迫击炮靠近前沿，选择隐蔽阵地，直接射击敌人外，还将纵队炮兵配置在师指挥所附近，由 7 门射程为 1 万米以上的 90 野炮专门负责打击敌人炮兵。他还要求炮兵对敌炮测好距离，事先编好射击诸元，只要步兵提出要求，随时都能准确而有力地予以炮火支援，甚至夜间都可炮击敌人。

部署就绪，胡奇才带上参谋、警卫员直奔塔山堡第 1 营阵地。

经过一天的战斗，我方工事大部被敌炮火摧毁，战士们正在重新构筑修整。

胡奇才检查了阵地工事。工事は隐蔽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防护手段，如果构筑不好，我军将直接遭受敌人炮火攻击，增大伤亡。他跃上一个刚刚修好的工事，在上面蹦了几下，又蹬了几脚，觉得富有弹性。于是跳下工事，指着这由 3 层树木、4 层草包垒起的掩体问大家：“这能行吗？”

随行参谋摇了摇头。

“用 60 炮炸一下。”胡奇才对参谋人员说。

迅即，两名参谋将一门 60 炮对准了工事。

一声巨响，工事被炸塌。

指战员们被眼前的事实怔住了。

“这次阻击战非同往日打阻击，这样的工事，连小小 60 炮都经不起，还能顶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胡奇才面对第 1 营指战员严厉地说，“顶不住飞机大炮，就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阵地被敌人占领，敌人援锦部队过去了，东北就解放不了啦！”

他的军帽上还落着刚刚被炮弹炸起的尘土，腰间的武装带扎得紧紧的，面部表情极为严肃。他想到了战争的严酷，想到了敌我双方殊死搏斗的种种可能性。他继续对第 1 营的指战员说：“现在我再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敌人，全系蒋介石中央嫡系部队，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飞机、军舰和大量地面炮兵配合。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打过的一次立体战，不是游击战、运动战，是特殊意义的阵地战。因此，我们必须构筑坚固的大小地堡掩体，以便防空、防炮、防毒，还要在地堡里生活、治病、贮备弹药。大炮轰炸时，我们钻入工事；敌人冲上来，我们迅速钻出来迎击。要把工事筑成钢铁堡垒！”

胡奇才向大家扬了扬手，高声鼓动道：“坚持 7 至 10 天，胜利就是我们的！”

第 1 营领导立即作了具体布置，阵地上很快掀起了“看谁工事筑得最坚固”的比赛热潮。

战争是无情的，枪炮没有眼睛。胡奇才深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疲惫不堪，但他必须严格地要求部队。作为东野首长指名派往前沿的高级指挥员，必须对战斗的前途负责，必须对指战员的生命负责，必须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指挥任务！

11 日，我军的阵地刚刚修整有个模样，敌人就发起了进攻。停泊在渤海湾上的蒋军“重庆号”巡洋舰上，152 毫米的大口径火炮忽闪忽闪地向塔山地区开炮，炮弹爆炸的声浪令地动山摇。指战员们蹲在刚刚修整的工事里，工事顶上的土块哗哗地震落下来。塔山正面，敌军集中第 62 师、第 8 师、第 157 师、第 151 师 4 个师的兵力实施中央突破。

敌人的炮火排山倒海般地从我军阵地前沿轰向纵深，又从纵深一排排地回击到前沿。

炮火刚有些稀落，浓浓的硝烟还在塔山堡阵地上飘荡，敌军第 8 师就从正面和左右翼向塔山堡第 34 团第 1 营阵地发起了攻击。

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射出的子弹稠密得像暴风雨，枪声、手榴弹和近距离炮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

第 1 营阵地前沿，我军指战员与敌人犬牙交错，你争我夺，反复冲杀搏斗。

在这激烈搏斗的同时，敌人还一拨拨地从前面压过来。第 1 营阵地受到严重的威胁。

“炮火射击！”我军指挥员下令。

第 12 师主要炮阵地已经前移在塔山堡西北高地，他们以猛烈的炮火打得后续敌人纷纷溃退。在前沿阵地与我军交战的敌人失去了后续支援，被打得狼狈不堪，死伤惨重，只得逃回。

敌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蒋介石的军令催促他们与我军作一死战。

经过上番调整，敌军又集中 30 门野炮、榴弹炮和两艘军舰上的大炮，集中轰击塔山堡第 1 营阵地，并以 5 架飞机轮番投掷重型炸弹。

塔山堡沉浸在一片浓烟火海中。

我军前沿工事大部被敌炮火摧毁，人员伤亡较大，但指战员仍沉着地等待着敌军炮火停歇后的集团攻击。

密密麻麻的敌人端着冲锋枪、机枪、步枪，猫着腰又冲上来了。头顶上炮弹还在呼啸，交通壕中的炮弹还在爆炸，敌人已经压到了我第 1 营阵地前沿。

在饮马河边的第 1 连指战员与敌人展开血战，顽强抗击敌军的冲锋。枪管打红了，就用手榴弹、枪托和刺刀与敌人搏斗。部分敌人冲上了饮马河北岸，占领了塔山堡村边的三处民房。

在这关键时刻，在东西小山头观察前沿战斗的第 1 营副营长鲍仁川，迅速赶到第 1 连阵地，组织第 1 连尚存的指战员堵住敌人。我军第二梯队迅速赶到，与敌展开激战，很快将占领民房的敌人大部歼灭，还生俘 20 余名。

阵地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敌人很快又组织了第三次冲击。第 12 师警卫营也投入了战斗，协同第 1 营反击敌人。

第 12 师的其他团队也同时遭受敌军攻击，战斗同样惨烈。

胡奇才和师长、政委在指挥所里，不时地用望远镜观察前沿战斗情形。他们分析敌我双方攻防重点和薄弱部位，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他们觉得，在敌冲击中我军适时组织反击，将有利于巩固我前沿阵地，打击敌人的疯狂气焰。

下午，敌军以 4 个师的兵力向我塔山堡、铁路桥头堡、白台山 7 号和杨家洼子 4 号阵地发起攻击。胡奇才和师长、政委及时命令炮火打击冲击的敌人，同时命令部队在阵地前沿实施适时的反冲击，主动打击敌人。敌人被我突如其来的反冲击打得乱了阵脚，纷纷溃退。

10 日，我军毙伤敌 1174 名。11 日，又毙伤敌 1302 名。

胡奇才及时将战况报告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第 12 师司令部每日 4 次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报告情况。

经两日的苦战，第 12 师伤亡很大。纵队决定，缩小第 12 师防御正面，将铁路桥头堡以东至西海口一线阵地交纵队主力第 10 师接防；另将第 11 师第 31 团前移，拨归第 12 师指挥。同时，经兵团批准，将第 11 师第 31 团阵地移交第 11 纵队；第 32 团撤出第一线，列入纵队预备队。

调整后，一线防守和预备队的力量都大有加强。

培山铁路桥头堡阵地原由第 12 师第 34 团第 3 营守卫。经过两天浴血奋战后，坚守阵地的第 3 营指战员坚决要求在自己的阵地上打到底。他们向纵队首长、师首长表示：我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寸土必争，像钉子一般钉在阵地上，决不让敌人前进半步！

从整体考虑，必须缩短第 12 师的战线。

纵队领导、师领导反复做该营的工作。最后，第 34 团第 3 营将阵地工事全部整修一新，高举写有“守如泰山”4 个大字的鲜艳红旗，交给接防的第 10 师第 28 团第 1 营。他们向第 28 团的指战员说：“这里是红旗阵地，每一寸土地都染有烈士的鲜血。我们把它交给老大哥，你们可要为烈士们报仇啊！”

阵地上庄严肃穆，写着“守如泰山”的红旗在渤海湾吹来的劲风中猎猎飘扬，指战员们手握钢枪威武地站立在工事前。第28团政委张继璜接过红旗，代表全团指战员慷慨激昂地宣誓：“劳苦功高的英雄战友们，你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一定要在这块红旗阵地上向敌人讨还血债！”

激动的热泪挥洒在染满鲜血的热土上。

10月12日这天，敌人的进攻仍然很猛。他们用了约两个军的兵力，向我塔山堡、铁路桥头堡及白台山7号阵地实施连续攻击。我军有的前沿阵地失而复得，指战员多次打退敌人的冲击，给进攻之敌大量杀伤。黄昏前，我军进行反击，将敌人推出阵地千米以外。

12日夜，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塔山一线阵地前分外寂静。静是动的前奏。指挥员及时抓住“静”的良好时机，为“动”作好充分的准备。纵队指示各部队利用时机深入敌营抓“舌头”，割电线，扰乱敌人。胡奇才所在的第12师第34团侦察排立即派出一个行动小组，深入敌后设伏，结果活捉了敌第21师第63团副团长高录臻和一名卫兵。

敌军被俘的副团长经不起我军一番盘问，供出了实情：为了攻下塔山阵地，蒋介石、卫立煌先后来葫芦岛。蒋介石先是命令第54军军长阙汉騫指挥，后改为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卫立煌不放心，又派他的副总司令陈铁来设指挥所。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指挥海、空军投入塔山地区战斗。然而两天猛攻，寸步未进。蒋介石大骂将领无用，于12日派他的随身参军罗泽闾前往督战，并决定把这两天没舍得用的“华北剿总”直辖独立第95师——所谓“没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拿上来，准备明天大干。蒋介石还特地将独立第95师原师长、华北督战主任罗奇弄来，为其老部下打气鼓劲。罗奇一到锦西就狂妄叫嚷：“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为取得塔山，向蒋介石表功，他在前沿部队建立了督战组织，规定逐级监督，怯阵者格杀勿论。他又以每人50万金元券的代价收买了一批人马，组织了“宁死不退”的“敢死队”。

几天的进攻未能奏效，敌军“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心情烦躁不安。他在参谋人员的协助下，又向进攻塔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下达了10条命令。其中第7条写道：

“军以增援锦州之目的。各军、师自13日拂晓开始向塔山、白台山、铁路桥头堡攻击，尔后进出锦州与锦州守军会师包围消灭塔山、锦州之敌。独立第95师担任对塔山的攻击，占领后沿塔（山）锦（州）公路向锦州前进，与锦州城南地区守军取得联络。第62军担任对白台山地区的攻击，占领后沿铁路左侧向锦州城西及飞机场地区前进，以主力占领飞机场并确保之，保证空运补给。第54军以第98师、暂编第57师除担任原葫芦岛及锦州的守备任务外，以第8师担任铁路桥头堡的攻击，占领后随独立第95师沿铁路向锦州前进。第21师、暂编第62师为总预备队，位于独立第95师之后，随时准备增援独立第95师的战斗，并掩护该师的后方安全。13日拂晓后有空军助战，各军、师准备地对空联络信号，向空军指示轰炸、扫射目标。海军第3舰队的152毫米火炮以协助独立第95师攻击塔山为主。”

侯镜如好像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

我军第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得知此情，不觉增添了几分压力。

胡奇才副司令员面对数倍于我之敌将要发起的更为凌厉的攻势，当即与

江师长、潘政委商量对策。随即指示部队加紧修固工事。针对敌“赵子龙师”可能采用的“波浪式”冲击战法，指示部队做好战前准备。

空前的激战就要来临。

不出所料，10月13日拂晓，晨雾还弥漫在塔山地区上空，随着几声鸡鸣，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敌军的重炮和军舰上的火炮开始对我塔山地区前沿阵地实施摧毁性的攻击。

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扬起的土块、石头高高地冲向半空，又重重地落回地面。我军指战员大都伏在工事里，少量警戒人员的锐利目光始终盯着前沿敌方的动向。

稍顷，在炮火掩护下，敌军独立第95师、第8师、第151师、第157师分路向我军铁路桥头堡、白台山7号阵地迂回猛攻。

敌独立第95师以团为单位，以1个营为一拨，一拨一拨地向塔山铁路桥头堡我军阵地冲击。接防此阵地的已是第4纵队第10师第28团。

团长鞠文仪、政委张继璜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冲击，严密地组织指挥全团指战员英勇作战。

敌人像蚂蚁一般密密麻麻地嗷叫着冲了上来。我守军以密集的火力压制敌人，杀得敌人尸横遍野，惨败退回。

敌人一拨被我军击退，后一拨人踩着前一拨人的尸首继续往前冲锋。敌人全部使用自动武器，一拨人全端着冲锋枪，另一拨人全端着轻机枪。

敌军进攻十分凶猛。第28团前沿阵地许多连队伤亡惨重，不得不把团的第二梯队增援上去。

第10师蔡师长请求纵队炮火更有力的支援。纵队吴克华司令员即令各炮群全力打击向塔山铁路桥头堡方向进攻的敌人。

下午，战斗更加激烈。团、营、连之间的电话线全被敌炮火炸断，通信兵拼死抢接，电话仍是时断时通。各阵地官兵在这关键时刻，充分发挥独立作战的精神，与敌搏斗。

敌人的“敢死队”一拨一拨地冲上来。他们光着上身，端着冲锋枪、轻机枪，真可谓赤膊上阵、硬打硬冲了！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两军交战在阵地上，互相被分割，相互被包围。我军第2连第1排坚守在塔山铁路桥前小营盘地域，首先受敌“敢死队”冲击。全排30余名战士顽强作战。身负重伤的指导员程远茂带领这个加强排坚守6个碉堡和500米战壕，打到最后只剩下7个人，守在最后一个碉堡内。他们边打边喊：“决不丢失红旗阵地！”“别忘了34团战友的嘱咐！”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枪托、刺刀与敌展开搏斗。纵队炮火的及时支援，师、团后续梯队的及时推进，使这个英雄阵地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

下午4时许，高家滩阵地危急万分，坚守在那里的1个连队快打光了。团长鞠文仪和政委张继璜带着第4、第5两个英雄连队和1个警卫排迅速地增援上去。敌人炮火猛烈，炮弹不断地落在队伍中爆炸，许多指战员在路上就被炮火炸死炸伤。在距阵地仅仅500多米的路段上，这支增援队伍就倒下了200多人。阵地里是我们的战友，阵地外是敌军“敢死队”。团长、政委率领队伍迅速包抄扫射过来。敌人经不住这猛烈的内外夹击，纷纷倒下。

与此同时，塔山堡、白台山的战斗也异常激烈。

坚守白台山7号阵地的我军第36团第5连，在炮火支援下连续打退敌军10多次冲锋，全连打得只剩下连长焦连九一人。他两耳震聋，眼鼻震得鲜血

直流，仍寸土不让，英勇奋战。

这天的战斗我军共毙伤敌人 1245 人，自己伤亡 1048 人，几乎是一比一，可见战斗之惨烈。

锦州方向，我攻城部队已全部扫清敌军外围据点，攻城准备就绪。

锦州国民党守军司令范汉杰焦急万分，一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支援。

蒋介石见势不妙，于 13 日夜晚给“东进兵团”侯镜如下了一道紧急命令，限令第 17 兵团 14 日拂晓攻下塔山，12 时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

侯镜如陷入十分艰难的困境之中。但军令如山倒，他仍迅速部署所属各军、师部队于 14 日实施强有力的攻势。

胡奇才在指挥所也接到了东野首长和吴克华、莫文骅关于整个战况的通报。他意识到，锦州总攻前，这里的战斗会更残酷。他整一整沾满烟尘的军装，走出战壕，眺望这几日浴血奋战的疆场，心潮起伏：为了我军攻克锦州，为了关门就地歼灭东北 50 万国民党大军，为了解救全中国，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几万万同胞兄弟，我们的部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有多少热血青年在这片土地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我们生存着的勇士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完成烈士的遗志，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胜利的曙光。

夜已经很深了，露水浸湿了胡奇才的戎装，但他仍不想回指挥所。他眼前仿佛展现出明日在这片血肉筑起的阵地上将有的恶战……

黎明前的恶战

胡奇才刚刚和衣躺下，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长期战争岁月养成的习惯，使他迅即起来，拿起话筒。此时，他头脑已经清晰，思维已经敏捷，决无常人那样睡意未尽矇矓眈眈的形态和神情。战争磨砺人的意志，锤炼人的精神。

电话是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打来的。他称赞了前沿第 12 师的恢弘战绩，并告知刚才野战军司令部刘亚楼参谋长来电话说，我军上午对锦州发起总攻。吴司令员让他将这消息传达给塔山地区前沿的指战员。

消息传到前沿阵地，坚守在战壕里的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几天来浴血奋战为的就是这一天。

胡奇才副司令员临危受命，坐镇指挥，为的就是保证锦州总攻击的胜利。现在总攻的炮声就要打响，他心中自然是一阵阵热血上涌。他想，范汉杰在锦州坐不住了，过几天卫立煌在沈阳也呆不住了。不要多长时间，蒋介石在东北的 50 万大军就要落入我军之手啦！全东北将是红彤彤的共产党天下啦！

几天的激战，弹药消耗很大，后方一时供应不上。胡奇才将这情况迅速报告吴克华，吴克华又迅即报告野战军司令部。

东北野战军首长多次嘱咐：有困难和要求一定要及时提出，保证予以解决。

共产党人是不叫苦的！共产党人是不向上级说困难的！可眼下与“赵子龙师”交锋，经一日激战，我军炮弹所剩无几。对于这场阻击战来说，用猛烈炮火消灭或阻止敌军的后续梯队极为重要。

胡奇才正在阵地上与指战员分享我军即将发起锦州总攻的喜讯，几辆满载各种类型炮弹的卡车从高桥方向驶来。啊！是总预备队第 1 纵队的老大哥送上来的。胡奇才的感激之情又涌上来。我军作战，兄弟部队相互支援，团

结一致，这种良好的精神和风气已经压倒蒋介石军队的威风了！

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支援塔山前线的 152 加农炮连也上来了。

胡奇才很兴奋。他知道，守卫在第 4 纵队右翼长宁山以西阵地的第 11 纵队指战员，不断迎击敌军的疯狂进攻；热河独立第 4 师、独立第 6 师的指战员像数把锋利的钢刀，多次出击锦西西南，严重威胁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侧背的安危。这些都强有力地支援了第 4 纵队的正面作战。第 4 纵队的其他两个师英勇奋战，也是对第 12 师塔山堡、白台山等阵地防御阻击战的强有力的支援。支援是相互的。全军上下、左右齐心协力，没有守不住的阵地，没有攻不克的城堡！

14 日拂晓，薄薄的晨雾弥漫在塔山堡阵地上，指战员们经昨日一天的激战后，刚修复完工事，正在掩蔽部、战壕里打盹，忽听到前哨警戒部队激烈的枪声。

没有炮火准备，定是敌军偷袭我阵地。

大家迅速操起轻机枪、冲锋枪、步枪，进入战斗岗位。

正在这时，炮弹飞行的“嗖——嗖——”声从前方传来，一簇簇冲天的火柱伴随着隆隆的爆炸声在前沿阵地、在塔山堡民房前、在晨雾中升起。鸟雀早已被这几天的枪炮声吓得无影无踪，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鸡鸣声也淹没在猛烈的枪炮声中。

原来，国民党军“赵子龙师”组成的“敢死队”利用拂晓晨雾的隐蔽，悄悄接近我前沿阵地，妄图偷袭我军，一举拿下塔山堡，在我大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之前向高桥、锦州方向推进。

我军指战员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知道总攻即将打响，战斗情绪倍增。敌人的炮弹和飞机投下的炸弹在阵地上爆炸，密集子弹在指战员们身边乱飞。

我军只有倒下的身躯，绝无倒下的精神。

敌军第 95 师、第 151 师、第 157 师、第 8 师趁天未明，分三路向我军铁路桥头堡、塔山堡、白台山 7 号阵地袭击。

敌人偷袭不成，改作强攻。

攻击铁路桥头堡阵地的第 95 师，在海、空军炮火支援下，对我阵地发起两次大规模进攻和 8 次连续冲锋，曾一度攻占我第 30 团第 7 连阵地。第 30 团第 4、5、9 连密切配合第 7 连反复与敌争夺，终将敌军打退，恢复了阵地。

“赵子龙师”被我军打得稀里哗啦。

进攻我白台山阵地的敌人，在第 12 师第 35 团、第 36 团和第 11 师第 31 团并肩反击下，均被一次次击退。

正在激战之际，战役总预备队第 1 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给第 4 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打来电话：“我们奉野战军首长命令来做你们的预备队，已在高桥待命。我代表 1 纵全体指战员向日奋战的 4 纵同志致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支援上去！”吴克华听到这位老战友亲切而又热烈的话语，激动不已：“4 纵全体同志向所向无敌的 1 纵老大哥致敬！有老大哥做后盾，百倍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你们远道而来，请先休息，一旦需要，我们就请老大哥上来！”

笔者听胡老将军说，在战争年代，各部队都争担最艰巨的任务，一旦任务争到手，决不会轻易退让。

第 4 纵队是块硬骨头，第 4 纵队是只猛虎。

一只猛虎作战正酣，会请另一只猛虎上来吗？

有一只猛虎蹲在身后，第4纵队这只猛虎更凶猛了！

上午10时，从锦州方向传来天崩地裂般的轰鸣。

胡奇才正在战壕里，参谋递上东野司令部来的电报：锦州总攻开始。

他扬起脸，挥笔批示：即告前沿阵地指战员。

部队正在利用战斗间隙修整工事，得知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雀跃。一边是攻城轰轰的炮声，一边是欣喜的呼喊声：

“锦州打响了！”

“范汉杰快完蛋啦！”

“向攻锦州的老大哥学习，加油干呀！”

“坚决守住阵地，保证攻锦胜利！”

.....

胡奇才看到指战员这种激越昂扬的情绪，浩然之气顿时增生。

锦州方向的捷报不断传来：

11时，攻城部队全线冲锋.....

11时30分，第2纵队、第3纵队、第7纵队.....突入城内.....

12时，入城部队与敌激烈巷战，进展迅速.....

蒋介石得知我大部队总攻锦州开始，即令侯镜如再度组织塔山地区的进攻。

11时，正是我攻城部队冲入城下，锦州危在旦夕的时刻，“东进兵团”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敌企图从两翼攻入，尔后夺取塔山堡。

我守军士气大增，越打越猛。

胡奇才与江师长、潘政委商定，以第12师预备队第31团协同第36团预备队实施反冲击。

我军强有力的密集火力向正在朝白台山阵地冲击的敌第151师猛烈压去。这劈头盖脑的打击，使第151师实在难以承受，遂边打边退。我军又从两侧冲杀过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同时切断敌一个排的退路，迫使其在我阵地前沿投降。

敌军两翼夹攻未能奏效，隐蔽在塔山堡以南的第151师主力只得退缩回撤。

正当塔山、白台山我军指战员与敌艰苦激战之际，东北野战军首长发来电报：

胡、江、潘并12师指战员：

你师在友军配合下，5天来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打退了95师、8师、198师、197师、151师、暂60师在海空掩护下之连续猛烈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并全部歼灭了打鱼山岛之敌，保障了我攻锦部队充分准备，因而取得了锦州顺利突破。你们这种英勇顽强的防御战，是模范的，值得赞扬的。盼你们继续努力，顽强阻击敌人，保证锦州战役的全部胜利，为下一次战役造成有利条件。

林彪

罗荣桓

刘亚楼

谭政

1948年10月14日

胡奇才副司令员自然有一种欣慰之感，这是东野首长对自己指挥的肯定。同时，强烈的责任感又使他精神更加抖擞。战斗还未结束，敌军还要进攻，我军决不能松懈意志，而是要借东野首长的慰勉电，进一步鼓舞士气，夺取战役的全部胜利。

在师指挥所的军用地图前，胡奇才副司令员又与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研究部署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塔山雄风永存

15日凌晨，夜色笼罩着大地，塔山阵地上分外寂静。困倦的指战员们正趁战斗间隙稍事恢复体力，有的倚着枪在打瞌睡，有的靠着战壕在打鼾。各指挥所里的微弱灯光映照着值班参谋和领导的身影。

胡奇才副司令员不敢入眠，他觉得这夜太静了，静得让人心里有些发毛。

他披上军大衣，悄然起身钻出地下指挥所，沿着战壕走向山地高处，在茫茫的夜色中向前方瞪望。

参谋和警卫员跟随其后，不敢打扰他，与他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首长一旦有令，他们马上可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去。

胡奇才静静地站在山坡上。他默默地瞪望着，似乎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突然，他转身回到指挥所，随即命令：“告诉部队，防敌偷袭！”

此刻是凌晨2时。

塔山堡阵地第34团的指战员正在休息。部队连日苦战，极度疲惫。恰在此时，敌第95师已接近我前沿阵地，有的敌人已经摸进了我方第一道战壕。

敌人利用阵地上的一堆堆的尸体作掩护，又向我军第二道战壕爬进。

情况危急！

第34团最前沿的第1连指战员还在休息。警戒哨兵发现前方地面有蠕动的模样，但很快视线又被一堆堆高出地面的尸体所阻挡。

“有情况！”

恰在此时，第1连后面送饭上阵地的两名炊事员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已经摸到了脚下。没等开枪，他们就与敌人扭打厮杀起来，同时高喊：“敌人上来了！敌人上来了！”

警惕性极高的第1连连长刘景山听到呼喊声，立即端起枪带领副排长王文礼、副班长卜凤刚等迅猛地冲杀过去。

经过一阵激战，摸上来的这股敌人被消灭。

没有料到，还有一股敌人从后面又摸了上来。

卜凤刚卧在战壕边看到了这情景。他赶紧搜集了几十颗手榴弹，准备与敌决战。

敌人距卜凤刚只有30来米了。他拼足劲，一口气甩出去七八颗手榴弹。敌人有的被炸得哇哇大叫，有的端枪在阵地上乱跑。卜凤刚鼓足勇气，又连续甩出20来颗手榴弹，炸得敌人死伤一片。

此时，全连的指战员都投入了战斗。

又有一群敌人向卜凤刚冲过来。机敏的卜凤刚从左翼绕到敌人背后，迅速投出手榴弹。敌人应声倒下。卜凤刚冲过去操起敌人的机枪，猛烈扫射剩余之敌，边打边喊：“缴枪不杀！我军优待俘虏！”

六七个敌人见势不妙，扔下枪，举起双手，扑通通跪在了卜凤刚的面

前……

上午，敌人分三路向我塔山堡阵地发起冲击，我军炮火打得也很猛。已经冲杀到我前沿铁丝网和战壕外的敌人，后有我猛烈的炮弹爆炸，前有我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的密集扫射，纷纷倒下。

阵地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和血腥味。

敌“赵子龙师”的两个连被我火力夹击在前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副营长鲍仁川组织人员对敌喊话，展开政治攻势。

敌人回答过来的是“突突突”的机枪点射声。

几位战士倒在血泊中。

“谁敢过去喊话？”鲍仁川大声问道。

“我敢！”副班长卜凤刚说。

“好样的，完成任务给你记大功，负伤了我派人背你下来！”

卜凤刚像道闪电向敌工事方向冲去。第1连的火力集中掩护。

卜凤刚很快绕到敌工事跟前，用力甩出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手榴弹在敌工事中爆炸，敌人的机枪哑了。

卜凤刚连续几个翻滚，冲进敌工事。敌另一个机枪手正架起枪要射击，卜凤刚的两只巨手已钳住他的脑袋并使劲向后将其打翻在地。卜凤刚随即一脚蹬住敌身，一手卡住其脖子，将其打昏。

“你们缴枪吧！别替蒋介石卖命啦！”卜凤刚高喊，“我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过来，人民欢迎你们！”

有个持步枪的敌人颤抖着走过来，边走边说：“长官饶命！我家还有60多岁的老母亲！”

“放下武器！”卜凤刚命令着。

这个敌兵乖乖地放下枪，跟在卜凤刚的身后。

卜凤刚又迅速地转移到短墙的缺口处，举起手榴弹对短墙内的敌人大喊：“缴枪吧！不缴枪就炸死你们！”

敌人吓得不敢吭气了。

“锦州已被我们打下了，活捉你们六七万。你们没指望啦！”

敌军有些骚乱了。

我军的阵地上又响起了一片喊声：“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

卜凤刚进一步喊道：“弟兄们，你们打了5天，死了那么多人，连个小地堡也没夺去。别再打啦！”

敌人的心乱了，纷纷说：“我们缴枪。你们真的不杀吗？”

卜凤刚指着一条沟，对他们说：“你们从这里跑过去！我们不但不打，还给你们指出隐蔽地。”

“枪是蒋介石的，命是你们的。我们欢迎你们！”

在我军阵地强大的呼声中，卜凤刚看着放下武器的敌人一组组一群群地向我阵地方向跑去……

连卜凤刚也没想到，一下子竟跑过来124名国民党官兵。

当天晚上，锦州国民党军被我全歼，鲜艳的军旗在锦州城郭高高飘扬。

16日下午，蒋介石离开沈阳卫立煌处，坐上他的“美龄号”专机又飞到葫芦岛。一大帮军人迎接他。

蒋介石到达第54军军部后，顾不上休息，急切想了解塔山一线情况。

华北督战主任罗奇向蒋介石汇报了塔山几日屡攻屡挫、至今未能向前推

进的情况。

蒋介石听着听着就来了火，指着第54军军长阙汉骞骂：“娘希匹！你要负责！你不是黄埔生，是蝗虫，是蝗虫！”

“你枪毙！”蒋介石火气越来越大。齐刷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像木头鸡般地呆立着，谁也不敢吭声。

大家知道，蒋介石说枪毙谁就会枪毙谁，再大的官，在他不顺心时都会顷刻毙命。

蒋介石训了一通后，渐渐地没多大气力了。大家沉默无语。好久，罗奇才解释说：“官兵是用命的，两天来的攻击，独立95师伤亡很重，现每个团只编成一个步兵营了。”

蒋介石怒气未消。他知道锦州失守，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但他想到的不单单是塔山、锦州，而是沈阳、长春、北平、天津……他没有心思在葫芦岛吃中饭，怒气冲冲地说：“我走！我走！”几架战斗机掩护着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在塔山上空盘旋。蒋介石要好好看看塔山这块令他几天来坐卧不宁的小地方，到底是怎么个模样。

弹丸之地的塔山已成一片焦土，炮弹炸燃树木、房舍的股股浓烟袅袅升腾，在空中打着圈儿。蒋介石在机舱内也许闻到了浓烈的硝烟味，或许看到了众多穿着黄军衣的部属横七竖八地倒毙在塔山我阵地前沿。

人们不知道蒋介石此时眼中见到的是什麼，只知他哀叹地说：“没有料到，3个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就是打不过塔山！”

胡奇才副司令员在塔山前线阵地上几天来没好好合过眼。连续6个昼夜的激战，我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夹击共军主力于辽西走廊”的梦想，塔山前线毙、伤、俘敌6117名，锦州范汉杰10万守敌全部被歼。

派往第4纵队协助指挥的东野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向林彪、罗荣桓等首长汇报时说：“塔山那个营安得好，像个钉子！”

罗荣桓政委赞扬道：“没有想到4纵打得这样好！像打得这样好的防御战，在我军历史上是少见的。”

后来，胡奇才老将军回忆说：“塔山阻击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硬仗、险仗、恶仗，是力量的较量，勇气的较量，意志的较量，智慧的较量……”

1948年11月1日，即沈阳解放的前一天，坚守塔山的部队才奉命从阵地上撤下来。他们没有休整，没有补充兵员，立即向冀东方向挺进。

在向关内进军途中，第4纵队接到中央军委11月17日关于实行统一编制番号命令：授予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的番号，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军长胡奇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1949年春天，胡奇才到北京检查身体，并向中央领导汇报塔山阻击战情况。周恩来听说胡奇才身体欠佳，亲自打电话给彭真，要他安排胡奇才到北京医院诊治。因周恩来当时忙于写政协纲领，就请朱德总司令与胡奇才谈话。朱德把胡奇才接到家中吃饭交谈，尔后又介绍给毛泽东……

1949年8月，胡奇才将军进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1992年的一天，新上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万年上将，登门拜访了自己的老上级胡奇才将军。

两位将军兴致勃勃，又一次回忆起当年共同参加的震惊中外的塔山阻击战的激烈场景……

他们谈了许久。临别时，胡奇才老将军请年轻的张万年上将为他题词。张万年总长思忖片刻，挥起大毫，书赠胡奇才老将军 4 个苍劲的大字：“塔山雄风”。

独腿将军钟赤兵长征记

薛春德 刘心明

钟赤兵（1914～1975）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钟志禄。湖南省平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3军团第5军第3师宣传员、连政治指导员、师军需处政治委员，第4师第12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第5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后方梯队政治委员，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军委一局局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2月，在娄山关作战中右腿负伤，截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独一无二的独腿将军。抗日战争初期赴苏联，先后入苏联共产国际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炮兵纵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治委员、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从徒工到红军指挥员

1914年12月26日子夜，湖南省平江县城郊的一间茅草屋里，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是个男婴，在家里排行老五。父亲叫钟继先，是个码头工人，穷扛大个儿的。父母总是把希望寄托给子女，愿孩子长大后有作为，有志气，当官儿多拿奉禄，便给男婴起名钟志禄。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钟赤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独一无二的独腿中将。

钟志禄生不逢时，降生在一个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时代。家里一贫如洗，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穷人家越穷越生子，继钟赤兵之后，母亲又生了一个仔。一家8口人，两张大嘴，6张小口。没饭吃了，大人还耐得住，崽仔们却不能，一个个哭嚎着要饭吃。

为了让崽仔们填饱肚子，钟继先拼命地干活。别人干一班他干两班，别人一次扛一包，他扛两包。为了钱，钟继先累得吐了血。他想休息几天再干，然而一进家门，看到嗷嗷待哺的崽仔，他心酸了，叹了一口气，又走出家门上了码头，没命地干起来。日积月累，他积劳成疾，因无钱医治，在钟赤兵5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钟家失去了顶梁柱，生活就更没着落。母亲体弱多病，还得拉扯6个未成年的孩子，自然一家人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穷极潦倒。

钟赤兵看到妈妈太累，从6岁起就帮着家里干活。好在大哥、二哥相继成人，家里的日子还可勉强过得去。钟赤兵9岁时，母亲为了使他长大后有出息，不再像父辈那样受穷，靠着节衣缩食，把他送进县城一所教会开办的学校——明厚小学读书。钟赤兵理解母亲的心情，读书特别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过好景不长，当他升到三年级时，办学校的洋人撕下了慈善的假面具，有意提高学杂费，逼得穷家子弟纷纷退学。钟赤兵也辍学了。一连几天他围着学校的院墙转，听院里的学生念书。他多么想念书呀！几天的工夫，他明白了许多，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一天，他止住脚步，站在校门口，咬咬牙，面对仍在读书的富家子弟大声吼道：“地主老财的狗崽子们，等着！我钟志禄总有一天要为穷人争这口气，让他们的崽仔都能念书。”

为了活命，无学可上的钟赤兵，经人介绍进县城北街“青云阁”毛笔店当了学徒。

“青云阁”看上去是一个十分文雅的招牌，可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老板姓余，诨号“建馊子”，啃过几天孔夫子的脚后跟，常常自命不凡地给学徒们讲些“三纲五常”的道理，其实是让大家听他的话，好好为他做工。一天，他喝了二两老酒，高兴地把童工们召集一起，大放厥词：“你，你，还有你，都听着！我这个姓是富贵姓，老天有眼，‘余’者，年年有余也！你们能到我这里干活是你们的福分！老爷我绝不会亏待你们。”说的比唱的还中听，他根本没有菩萨心肠，是个地道的地主兼放高利贷者，对待童工不给分文不说，还动不动拳打脚踢，倒打一耙地训斥：“你们这些穷棒子，在我这里不但学了手艺，还白吃白喝！”

有一天，钟赤兵干活时，左边的耳朵感到发痒，顺手用手中的小楷毛笔杆掏了一下耳朵，凑巧让“建馊子”看见。“建馊子”便乘他不防，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小手，狠劲将笔杆朝他的左耳孔里捅。钟赤兵疼得尖叫，顿时鲜血顺着笔杆流出来，童工们个个惊呆了。“建馊子”看了看徒工，得意洋洋，指着钟赤兵嘲弄说：“怎么样，偷懒的小东西，有味道吗？”接着又厉声厉色地向童工们嚷：“都看清了吗？往后谁再偷懒就和他一样！”从此，钟赤兵的左耳听觉受到严重影响。

钟赤兵怒目看了看“建馊子”，把手中的毛笔、胶水朝地上一摔，冲老板说：“你这个臭‘建馊子’，我不干了！”

“好，你小子要反了。”“建馊子”操起身边一根棍子朝钟赤兵打去。

钟赤兵一闪身，棍子落空。

“建馊子”再次举起棍子。

“呸！”钟赤兵朝“建馊子”脸上吐了一口，蹦出门，跑走了。

钟赤兵回到家里，母亲看到孩子的左脸肿得像发面馍馍，失声地痛哭起来。钟赤兵不堪虐待，一怒之下，离开毛笔店，进了一家织布厂学织布。

光阴荏苒，钟赤兵转眼15岁了。这一年，他的家乡“红”了，农民运动犹如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他的4个哥哥分别参加了农会和工会。在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中，他逐渐懂得了“劳工神圣”，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的革命道理。当时，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并肩战斗，打土豪，斗奸商，要求减租减息，提高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钟赤兵组织儿童团四处贴标语，巡逻警戒，起早摸黑，表现了对革命的极高热情。

1930年6月，彭德怀军长率领红5军再次挥师平江。这时的钟赤兵，已在当地手工业工人中是个小头头。红军攻打长沙时，他带领500多名工人参加了战斗。平江是红军、白军拉锯的地区，战斗中钟赤兵带领的500多人都牺牲了，他负伤后被压在同伴们的尸体中，成了唯一的幸存者。钟家兄弟闹革命的事儿，在平江地区出了名。平江战斗，红军猛攻数日，全歼国民党守军，继平江起义后又一次占领平江城。“红军打回来啦！”平江人民欢腾雀跃，纷纷组织起来帮助红军清查敌人，收缴武器，运送弹药，整个县城一派繁忙。钟赤兵也高兴地一会儿帮着人们张贴标语，一会儿带着儿童团员放鞭炮，擂锣鼓，呼口号。胜利的喜悦使他真正感到贫苦人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不久，为了打击反动派，红军又要离开平江城。16岁的钟赤兵便告别家乡和亲人，参加了红军。扩红的红军问他叫什么，他眼珠子一转，心想：在毛笔店学徒时，常听老板将“红”说成“赤”，“赤”是“红”的意思，红

军就是要把全中国都变红。“军”就是“兵”。现在当了红军，要为穷苦人打天下，就不能讲“官”呀“禄”的。于是，他便冲着扩红的红军说：“我叫钟赤兵。”

“赤兵，这个名字有意思，好，叫得好。”

从此，钟志禄就改名钟赤兵了。

钟赤兵在革命战争中作战勇敢，又有文化，进步很快，几个月后，就由一个普通战士成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员。

1934年3月，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任红12团政治委员的钟赤兵，奉命率部保卫三溪圩白塘村。当时，红军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路线，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次战斗，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与第12团作战，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经过精心准备，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使第12团伤亡很大。大敌当前，敌强我弱，再这样继续打下去，就会给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甚至还会全团覆灭。情况十分危急，钟赤兵顾不得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决心不失时机地带领部队冲出阵地，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以有效地歼灭敌人。于是他果断地高喊：“共产党员们，跟我来！”随即端着枪第一个朝敌营冲去。全团指战员在他的带领下，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进攻。当敌人发动第五次攻击时，一串子弹射进了他指挥战斗的掩体，其中一发不偏不倚正击中他的左手拇指，像刀削一般，将拇指齐刷刷地截了下去，顿时血流如注。警卫员惊叫：“政委，你受伤了！”

“别声张，打仗哪有不碰破点皮肉的！”钟赤兵厉声对警卫员说。

说话间，敌人又黑压压地蜂拥而上。钟赤兵拔出手枪，骂了一声：“狗杂种！打！”

一时间，枪弹、手榴弹像雨点似地射向敌人。敌人被红军的猛烈火力打懵了，以为红军的增援部队赶到，掉头就逃。战斗结束后，钟赤兵手上的鲜血已将包扎伤口的十几层纱布浸透。他因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嘉奖。

从当连指导员（当时叫连政委）起，钟赤兵就给自己规定了三条：一不怕死，二不贪污，三不腐化。当时红军中的个别干部因受旧军队军阀主义影响，时常打骂士兵。钟赤兵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他对士兵既严格要求，又备加爱护，深受士兵和基层干部的爱戴和拥护。他和团长谢嵩领导的第12团，士气高昂，作战勇敢。在上级首长的心目中，这个团不管什么硬仗、恶仗都能打，是红3军团的模范团之一。彭德怀军团长称第12团是一支专啃“硬骨头”的拳头团，也特别喜爱钟赤兵这位年轻的指挥员。

由于第12团能征善战，敌人一听说与该团作战，便闻风丧胆。

1934年10月，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北上，彭德怀军团长采取声东击西、暗渡陈仓的战法，命令第12团朝南向广东方向进发。

第12团的突然行动，果然惊动了尾追红军的敌人。他们以为红军主力有重大战略行动，在向广东方面集结，便急匆匆纠集大批部队追击，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广东境内。钟赤兵和团长谢嵩带着部队昼夜兼程，翻山越岭，待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周围的情况不对，几乎没有发现友邻部队。善于揣摩军团首长指挥艺术的钟赤兵感到这是调虎离山、牵牛鼻子的战术，便鼓励指战员发扬第12团的光荣传统，紧紧地牵住敌人，即使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完成军团首长交给的战斗任务。为了牵住敌人，他和谢嵩带领部队时而翻山

越岭，东躲西藏；时而出其不意，虚晃一枪。在把敌人的大部队拖得疲惫不堪时，他和谢嵩又率部队巧妙地将敌人主力甩开，迅速赶上北上的主力部队。

彭德怀军团长看到第12团圆满完成了牵制、诱惑敌人的任务，拍着钟赤兵的肩膀高兴地说：“你这个政委当得不错嘛！”

血染娄山关

1935年1月25日，红军长征攻占贵州遵义后，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给红军和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

此时此刻，升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的钟赤兵也和大家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并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率部“四渡赤水”。1935年2月一渡赤水后，为了有利于进行运动战，红3军团缩编为第10、11、12、13等4个团。钟赤兵仍任第12团政委。

为了摆脱10多万川军的尾追堵截，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运动中歼灭每人有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的王家烈的“双枪兵”。中央军委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3军团。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又让第12团和第13团担任先锋团，要求2月底以前夺取娄山关，攻下遵义城。

钟赤兵和团长谢嵩立即率领第12团向赤水河前进。贵州军阀王家烈发现红军要渡赤水，急调侯之担一部向赤水河急进，企图阻止红军东渡。钟赤兵率部急行军，先于敌人赶到了赤水河边，击溃东岸守敌，转兵从二郎滩过河。

为了和敌人抢时间，他一面让工兵搭浮桥，一面组织先头营乘船渡河。但河边只有3只小船，其中的1只还破烂不堪，每只船又只能乘30人，一来一往，十分费力。他和战士们都心急如焚，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河去。

先头营刚渡过河，赶到河西岸的“双枪兵”便过足了烟瘾，来了精神，在侯之担师长的指挥下，疯狂地阻击红军。

“同志们，顶住，不打退敌人，2、3营就过不了河。”钟赤兵挥动驳壳枪，向敌阵蔑视地看了一眼。

“轰！轰！”红军的一排手榴弹飞入敌群炸开。

敌军挨炸，抱头鼠窜。侯之担急了，向两个军官“当当”开了两枪。两个军官“哎呀”尖叫一声，躺倒在地。“他妈的！都看到了没有，谁跑老子崩了谁。”侯之担吼着。

“打得好！再打手榴弹。”钟赤兵鼓励部队。

“轰隆！”又一排手榴弹在敌群炸开。

敌军骚动，左顾右盼，枪声减弱。

“弟兄们，你们看红军就是那么几个人，他们背后是赤水河，打死一个老子奖烟土一两，抓住一个活的奖烟土五两。”侯之担喊。

敌军的机枪、步枪又狂叫起来。

“同志们，朝敌人后边那个帐篷上打，那是敌人的指挥所。”钟赤兵指着敌后高地喊。

“嗖嗖”几颗手榴弹飞到敌帐篷炸开，帐篷起火。侯之担炸飞了帽子，拔腿后退。

敌军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看头儿退了，也跟着屁股撤。

红军二渡赤水后，长驱直入，直扑桐梓，准备冲过娄山关，再夺遵义城。

娄山关在桐梓县城南 30 里处，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山脉最高峰，海拔 1440 多米，地势险恶，群峰如剑，直插云霄。一条通向关口的公路镶嵌在十步一曲、八步一弯的盘山道上，直通云天。公路两边是高山和深涧，山腰是点灯山，山脊又高又陡，山上茅草棘藤相互盘绕，灌木野竹丛生，乱石相杂其间，成为通向娄山关的天然屏障。山顶峰竖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由桐梓去遵义的公路从碑旁横穿而过。人们一向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娄山关的险峻。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城就成为囊中之物了。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第 12 团于 2 月 25 日晚到达桐梓县城。干部战士饥渴劳累，都想休整一下。谁知刚歇脚，钟赤兵和谢嵩便得知彭雪枫、李干辉率领的红 13 团于 25 日下午在娄山关半腰和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了激战，眼下双方正对峙在关口下。枪声就是命令。第 12 团奉命于 26 日拂晓前赶到娄山关口，接替第 13 团作正面进攻。

听说要打仗，指战员们顿时来了精神，奔波了十多天的疲劳被抛到九霄云外，有的磨刀霍霍，有的把枪弹擦了又擦。为了打好仗，钟赤兵和谢嵩连夜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进行战斗动员和部署。

午夜，部队开始向娄山关进发。为了能在拂晓前赶到娄山关，指战员们冒着毛毛细雨和刺骨寒风，在坎坷泥泞的公路上一溜儿小跑地前进。

拂晓时分，部队刚到娄山关下的南溪口，就隐约听到断断续续传来“砰砰”的枪声。紧接着派出去的传令兵从关上口来报告，说敌人从南面的峡谷里沿公路向娄山关反扑，第 13 团设在半山腰的哨所已经丢失。情况紧急，钟赤兵对谢嵩说：“谢团长，我带 1 营为先锋，跑步向关上开进，抢占娄山关，你带 2、3 营跟进。”

“还是我带先锋营吧，你几天都没有休息好。”谢嵩争着。

“别争了，你的担子也不轻，要准备随时带部队冲击。”钟赤兵说着走到队前，大手一挥：“1 营跟我来，”

不大的工夫，钟赤兵带领第 1 营官兵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踏着凹凸不平的山地，冲向娄山关。关上，雨雾浓云铺天盖地，黑压压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年仅 21 岁、中等身材的钟赤兵，健步如飞，率部疾进。

第 12 团刚登上“娄山关”三个大字的高大石碑下，敌人已先一步占领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

“快，把敌人打下去，为兄弟部队开道！”钟赤兵命令第 1 营向敌军反攻。第 1 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关口之处顿时被突破。正在这时，第 2、3 营在谢嵩带领下赶到。为了扩大战果，钟赤兵命令第二梯队：“3 营，上刺刀肉搏！不给敌人喘息机会。”

红军战士一阵冲杀，直杀得王家烈的“双枪兵”鬼哭狼嚎，尸横遍地，狼狈逃窜。

第 12 团牢牢控制了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

“督剿”总指挥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兵力反扑，企图把落到红军手里的阵地夺回去。他命令其第 4 团沿桐遵公路北上，从中路增援退守在娄山关下南坡的部队；命令旅长杜肇华坐镇黑神庙指挥作战，不惜一切代价“扼守待援”；命令宋华轩团、金祖典团由板桥出发，从左右两翼包抄娄山关。

8时，浓雾从峡谷中缓缓散去。过足了烟瘾的王家烈的“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足，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嚎叫着向上扑来。公路又陡又窄，敌人进攻队形密集，控制娄山关口的第12团第1营居高临下，奋力迎战。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和机枪扫射，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剩下的敌人连滚带爬龟缩到公路旁的战壕里。

战至10时，“双枪兵”的烟瘾快发作了，只好使出全部吃奶的力气，作最后挣扎。敌军官亲自在后面督战，扯着嘶哑的嗓子连嚎带骂，用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钟赤兵见敌人冲上来，大声命令：“上刺刀，取出马刀！”待敌人靠近，他一声呐喊，战士们先投出一批手榴弹，然后踏着硝烟，挥舞马刀，如猛虎下山似地冲入敌群，横劈竖砍，直杀得敌人喊爹哭娘，丢盔弃甲，像潮水般退去。

钟赤兵率第1营官兵乘胜追击，冲到黑神庙时，突遭敌人约1个团兵力的反击。敌众我寡，红军伤亡很大。

钟赤兵看到一队更多的敌人冲到第1营阵地前，情况异常紧张，部队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他一手挥动马刀，一手紧握驳壳枪，指挥第1营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战斗中，他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站在阵地前沿，一手解着上衣纽扣，一手指着山下的敌人，厉声大喊：“快，狠狠打！把狗日的统统消灭光！有我无敌，我在阵地在！”

“冲哟！”

“冲上去得赏钱哟！”

一队刚过足了烟瘾的“双枪兵”，凭着烟劲，楞是呼着喊着，不怕死地朝上攻。

正在第1营战士难以抵挡时，团长谢嵩派来的由第2营营长带领的突击队冲了上来。

这时，钟赤兵的身子猛地一晃，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的警卫员胡胜辉以为他被绊倒了，赶上去一看，却见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钟赤兵的右小腿上冒了出来。

“政委，你负伤了，我背你后撤！”

“别声张，擦破点皮不碍事！”钟赤兵轻松地回答着。在胡胜辉的搀扶下，他慢慢站了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胡胜辉见钟赤兵又要投入战斗，就一把搂住他的腰，不由分说将他按坐在一块石头上，撕下自己的衬衫，替他包扎伤口。钟赤兵的腿负了重伤，敌人的枪弹撕开了他右小腿上的一大块肉，血如泉涌。一连包了十多层破布，血还照样向外浸。胡胜辉赶紧找来卫生员，又叫人把钟政委负伤的情况报告给团长。谢团长命令胡胜辉一定要让钟政委马上撤下来。

谁知，钟赤兵还没等卫生员包扎好伤口，就拖着伤腿指挥战斗去了。他站着困难，就趴在石头上指挥。这时，一股敌人窜上第1营附近阵地。战士们没了弹药，就用刺刀捅，用马刀砍。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马刀砍缺了口，就搬起石头往敌人头上砸。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残酷，但大家在政委英勇顽强精神的鼓舞下，毫无惧色。战斗从拂晓一直进行到傍晚，阵地仍牢牢控制在红军手中。钟赤兵拖着伤腿坚持指挥，直到由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

这时，第2营营长邓克明、教导员谢振华带着部队冲到黑神庙，看到身负重伤、躺在路旁草地上的钟赤兵，心里非常难过，便吩咐身边的同志赶快把钟赤兵抬下战场。接着他们举枪高呼：“同志们，敌人反扑上来了，坚决

把它打下去！”第2营指战员以猛虎下山之势，很快把敌人压了下去。全团随即沿公路猛追溃逃之敌。

看到红旗插上娄山关，躺在担架上的钟赤兵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三次截肢

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医生立即为钟赤兵治伤。但因伤势严重，拖延时间过长，必须从小腿以下进行截肢。当时的手术条件极其简陋，没有医疗器械，没有麻药，工具只是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的木匠锯。手术时，锯上下拉动的响声好似万箭穿心。

钟赤兵忍着巨痛躺在手术台上，紧紧闭着眼睛。手术刚刚进行了20多分钟，豆大的汗珠就从他的脸上、身上直往下淌，浸湿了衣裤，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依旧一声不哼。医生瞅着他，既难受又同情，关切地对他说：“如果疼痛难忍，你可以喊，可以叫，这样兴许会好些。”钟赤兵摇摇头，没有说话。他知道，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与敌人厮杀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为了革命许多战友都倒在血泊中，和他们比，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手术中，他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在场的医生、护士都被他那坚强的意志所感动。一位年仅15岁的小护士一边协助医生护理他，一边抽泣着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合和这么强硬的汉子。”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手术一直做了三个半小时。

当钟赤兵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整个右腿已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轻松，又感到痛苦。轻松的是手术终于完了，痛苦的是失去了伴随他南征北战的腿。他为自己的日后而忧心忡忡：我还能率领部队冲锋陷阵与敌人厮杀吗？我还年轻，才22岁呀！……

贵州的6月，天无三日晴，又加上医疗条件很差，手术时没有条件消毒，所以没过几天，钟赤兵的伤口就感染了，腿肿得分不清小腿和大腿，高烧持续不退。昏迷中，他恍惚感觉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向马克思报到。他常说胡话，一会儿喊着“冲呀”、“杀呀”，一会儿大声惊叫，有一次还突然坐起来。仅仅几天功夫，他的眼窝就塌陷得很深，面色蜡黄憔悴。

彭德怀军团长得知钟赤兵的病情严重，特地在看望他时嘱咐医生：“一定要想尽办法救活钟赤兵。”

为了把钟赤兵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医生只得决定给他进行第二次截肢，将右腿膝盖以下剩余的部分截去。他又经受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命运总是跟他作对。第二次手术同样因为医疗条件差，消毒条件不好，伤口不能愈合，继续感染，危及生命。医生无奈，狠了狠心，不得不将他的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半个月內，三次截肢，对一个人来说，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啊！可钟赤兵命大，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钟赤兵称自己的生命是捡来的，格外珍惜，常常告诉身边的战友：“是党救了我的命，我只有拼命地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多做工作，才感到问心无愧。”

钟赤兵截去了右腿，虽然保住了生命，但伤在短期内却难以治愈，加上身体虚弱，是让他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还是让他拖着一条腿继续跟部队长征，组织上举棋不定。他得知后坚决表示跟着部队走。他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死，只有走才有生存的希望。但走中有打，要对付围追堵截的敌人，还要爬山涉水，同恶劣的大自然斗。这些，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很不容易，

何况他是一个被锯掉一条腿的残疾人。然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天，军团长彭德怀来征求他的意见，他坚决地说：“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

彭德怀感动了，红军领导感动了。

一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还有第3军团的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同志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忽然，毛泽东发现了他曾赞扬过的钟赤兵，便走到病床前，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小鬼，又负伤了？”

钟赤兵用手指了指失去的右腿，没有说话。

毛泽东看着他痛苦的表情，说：“应该在娄山关立个石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

当毛泽东得知有人建议把钟赤兵寄养在当地群众家里养伤时，反对说：“钟赤兵很能打仗，是有战功的，就是抬也要把他抬着北上！”

就这样，钟赤兵在毛泽东、党中央的关怀下，由第3军团调出，被安排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拖着一条腿随中央直属部队行动。

中央休养连是一个特殊连队，有体弱年老的领导同志，还有一些妇女干部和家属。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老人是休养连成员，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也编在休养连。钟赤兵被编入第1排第2班。休养连连长是夺取遵义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的第3军团第10团团长张宗逊，指导员是原中央苏区女部长李坚真，党支部书记是董必武。

钟赤兵到了休养连，由于刚做过手术，伤口没愈合，行军时只得躺在担架上。他为减轻担架员的劳累，每当遇到陡峭山路担架不好走的时候，都主动爬下担架，拄着拐杖，一颠一跛地跳着走。双拐是木棍做的，十分粗糙，走不几步，两个胳膊窝就被磨肿了；但他总是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

为了减轻战友们的负担，钟赤兵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不忍心总让饥饿疲惫的战友们抬着走，伤口稍有好转，就让战友扶他上马行军。部队进入藏族区域时，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反动武装不断打冷枪偷袭红军，部队行军要格外小心，随时随地注意隐蔽和疏散。钟赤兵为了战友的安全，为了缩小部队行动的目标，坚决不坐担架，咬着牙坚持一个人拄着双拐行走，有时遇到难以通过的地方就爬着过。红军行至腊子口，他的伤口再次发炎，同时发起了高烧。当他得知另一位同志也在发高烧时，就毅然把照顾自己的担架让给那位同志，自己拄着拐棍过腊子口。就这样，钟赤兵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长征的终点陕北。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1954年，钟赤兵调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这年春节，贵州省举行各界人士春节茶话会，钟赤兵与王家烈相遇了。王家烈是以民主人士的身分出席座谈会的。出于对钟赤兵的好奇，王家烈走到他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做了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握着钟赤兵的手问道：“请问将军尊姓？右腿何故造成？”

“敝人姓钟名赤兵。腿嘛，乃被贵军的‘双枪兵’在娄山关借走了，也不知先生何时送还？”钟赤兵诙谐、幽默地说。

王家烈双手合在胸前，面有愧色地说：“久仰久仰！罪过罪过！久闻将军大名，请钟将军从重发落！”

“王老先生，这些是过去的事，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我们还要一同共事，共商治黔大业呢。”

王家烈被钟赤兵如此博大的胸怀所感动，当即老泪纵横，再一次用双手

紧紧握住钟赤兵的手说：“钟将军真乃大将风度，王某佩服！佩服！”

此时，室内鸦雀无声，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切，无不为了钟赤兵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的利益不计前仇的宽广胸怀所感动。

“刀下留人”

1930年11月，中央红军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当第3军团东渡赣江，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中央苏区发生了肃清“AB团”事件。由于“左”倾路线影响，这一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蔓延。党的一些文件中甚至公开宣称：“AB团在红军中居然设了总司令、军长、师长等。最近破获AB团最多的莫过于赣南及一方面军。赣南的干部除××同志外，其余大都是AB团分子。”“反AB团的宣传斗争没有造成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

广大指战员听说反革命分子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把反革命斩尽杀绝。但是，“肃反”运动到底怎么搞，“AB团”到底在哪里，谁是“AB团”，却没有人能说清楚。于是就胡乱怀疑起来，连平时不大遵守纪律的人也被怀疑为“AB团”，继而又怀疑到谁谁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谁谁的出身成分有问题，谁谁和地方的嫌疑分子有关系……再而从怀疑发展到传讯、刑讯、逼供信，真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结果冤枉错杀了一些好同志。

12月，担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秘书的向仲华被逮捕了。消息传到第12团政治处主任钟赤兵的耳朵里。钟赤兵和向仲华在一起共过事，他知道向仲华15岁参加儿童团，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从事地下工作中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1930年7月红3军团进攻长沙时，向仲华组织难友冲出监狱，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仲华作战勇敢，团结同志，钟赤兵很敬佩。“这样好的同志当‘AB团’，我不信。”钟赤兵本来就对这种扩大化有反感和抵触，一听说连自己最了解的向仲华也打成“AB团”分子，便火冒三丈，对周围的同志说：“我敢担保向仲华不是‘AB团’分子？他要是，我也是！”

周围的同志提醒钟赤兵要冷静，说话要注意分寸。他何尝不知道说这些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就在这不久前，红3军团有一个姓李的连长，一向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因在一次会议上说了一句“我不相信‘AB团’有那么多人”，便被扣上“与‘AB团’同流合污”、“想带部队造反”的罪名被处决了。

前有车，后有辙。自己公开站出来为一个已被逮捕的所谓“AB团”分子辩护，若辩护不成，何止是政治生命，恐怕就连性命也难保啊！然而，他想得更多的却是共产党人办事要实事求是，尤其是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党组织和他的直接领导应该认真负责。于是，他竭力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向仲华的实际情况，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要求“刀下留人”。经过钟赤兵的极力抗争和担保，向仲华才死里逃生，回到战斗岗位。钟赤兵这一“保”，为我军“保”下来一个将军。

解放后，钟赤兵担任军委民航局局长。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他因心脏病住院治疗。这时局里一些人因受运动扩大化思潮的影响，把曾在“两航”起义中积极保护电器设备，勇于跟国民党特务面对面作斗争，

军委民航局初建时又积极为民航的电器工业献计献策，为我国民航初期的电器工业立了汗马功劳的一位工程师，硬说成犯有贪污罪，将其打成“大老虎”，并在多次批斗和逼供后错误地将其判成死刑。

宣判大会这一天，他得到通知，赶忙从医院跑出来，果断地要求“刀下留人”。因为他熟悉这位工程师。在组建军委民航局时，他曾找这位工程师多次谈话，并多方对其进行调查。钟赤兵立即抱病到中央肃反五人领导小组和公安部，找有关领导据理力争，要求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尊重历史不看一时一事，认真按照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办事。随后，他又拄着拐杖去找周恩来总理，说明情况，终于使这位工程师得到解脱，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异国他乡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钟赤兵担任陕北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在长期的战争中，他练就了独腿骑马。任军事部部长后，他跑遍了陕甘宁边区的山川，看地形，作部署。后来，他又被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在他担任军委一局局长期间，党中央拟送一批在长征途中受重伤的红军将领到苏联治病、学习。钟赤兵的右腿虽然经过三次截肢手术，但因医疗条件差，截肢处的肉里还残留着骨头渣，时常发炎，疼得难以忍受。党中央为了彻底治好他的残腿，决定送他去苏联边治病边学习。

1937年冬，钟赤兵和李天佑、刘亚楼、卢冬生、李世英等同志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路途艰难遥远，没有火车及飞机，还要通过日军占领区，穿行没有人烟的戈壁滩。常人都很困难，钟赤兵一条腿行走就可想而知。但这些红军将领长征都走过来了，再大的困难也能踩在脚下。他们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938年6月抵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钟赤兵和其他几位中国同志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红十字会疗养院疗养。

莫斯科的仲夏是美好的。黄昏时分，夕阳西下，眩目的绯红色霞光铺洒在都市的屋顶上，构成一幅气派宏伟、色彩纷呈的图画。那些沐浴在晚霞之中的屋宇，风格不同，色泽迥异，有彼得大帝式的，有东方正教堂式的，还有罗马式、哥特式的。在莫斯科市区中央，浅灰色的克里姆林宫塔楼昂然矗立在宽阔的红场侧翼，它那已经有些黯淡的琉璃瓦镶嵌的塔尖直插云天，塔尖上那颗红星显得分外明亮……

异国的一切使钟赤兵感到新鲜，可最使他羡慕的却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这更加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向往和不懈的追求。他由此想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想到了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帝国主义蹂躏的祖国人民，渴望着有朝一日祖国也会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关注着国内的抗战，特地找来一张中国地图挂在房间里，经常分析研究国内抗战形势。当他得知由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取得消灭日伪军3万余人、一举收复四五十个县城的消息时，高兴得竟然忘记自己只有一条腿，和战友拥抱在一起雀跃欢呼。他一不小心，摔了个三肢朝天，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为了尽快回到国内参加抗战，他以顽强的精神进行着艰苦的锻炼。他到苏联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手术。为了尽快地恢复健康，手术后不几天，他就下地拄着拐杖坚持走路。刚开始走三五十米就难受得浑身冒大汗，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但他不气馁，仍继续坚持，1个月后就

可以走一两千米。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附近，留下了他那双拐一行行深深的印迹。苏联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而且十分寒冷。进入10月，已滴水成冰。室外锻炼不方便，他就在室内锻炼。他那忘我的精神，使疗养院的苏联工作人员都感到吃惊。

经过3个多月的疗养和锻炼，他的体力得到了较好的恢复，被组织送进苏联共产国际党校学习，而后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对于只读过3年教会小学的钟赤兵来说，学习是一项十分艰苦的事，首先遇到的是语言上的困难。学校所有书籍都是俄文原版，翻开书本，密密麻麻的俄文，犹如“天书”，横竖看不明白。于是他就下决心过语言关。好在出国前，他在伍修权的帮助下，学了一些俄语基本知识，对一些日常用语也多少能听懂一些。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和苏联教官的耐心辅导，他和刘亚楼顺利地过了语言关。不久他便能借助字典、辞典和其他工具书读书、学习、记笔记了。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将军的摇篮，苏联许多著名的军事将领，如崔可夫、朱可夫等都毕业于这所学院。这里又是一个知识的海洋，有大量的藏书，军事、政治、哲学和历史书籍应有尽有；还有苏联高级教官讲课。因此，在这里学习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钟赤兵学习十分刻苦，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教官们为他这种刻苦求知的精神所感动，特别为腿部不便的他做了一项决定：钟赤兵听课可以迟到、早退。但钟赤兵从不自恃特殊，依旧严格执行学院的一切规定。他除了听课、读书外，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除了比较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课程，还涉猎了大量的文学和历史书籍，为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更好地为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中国抗战进入困难阶段，钟赤兵再也呆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和李天佑、刘亚楼商量回国之事，并一起设计着回国后如何与日军作战的方案。

7月，苏德战争爆发，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提前结束。8月中旬，钟赤兵、李天佑、刘亚楼、卢冬生等十几人离开莫斯科，到达蒙古库伦（乌兰巴托），待命回国。由于苏德战争所致，交通不便，苏联驻蒙使馆供应发生困难，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因中蒙边境日军布防严密，无法过境，他们被滞留下来。但他们坐不住，便主动请缨，一面帮助蒙古人民进行反法西斯作战，一面等待回国抗战的机会。

在蒙古的一年多时间里，钟赤兵最初被安排到一所学校当政治教员。由于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很受学生们的爱戴。随后他又被派去编一种宣传苏联人民与德国法西斯作战的小报。这使他受到了锻炼，也使他积累了运用报纸作宣传的经验。为了便于工作，后来他和刘亚楼等同志改名换姓，被安排在乌兰巴托（蒙古首都）中国工人俱乐部工作。在这里，他抓紧时间学习，并研究国内的抗战形势。

1938年8月，苏德战争到了十分残酷的阶段，苏联对蒙古援助减少，乌兰巴托的中国工人俱乐部停办。当地一时难以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便让他到一个集体农庄去看菜园。这期间，由于物资匮乏，在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冬季节，竟没有劈柴可供取暖，有时还要饿肚子。由于营养不良，他日渐羸弱，身体十分消瘦。但他坚信，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终会失败，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自己也一定会尽快回到祖国。

战争进行到1945年初，中国的抗日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对日军的防御作战转变为对日军的攻势作战。钟赤兵和刘亚楼等同志又回到了莫斯

科。不久中蒙边境松动，他才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帮助下几经周折回到了祖国。

为新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奠基

1949年仲秋的一个傍晚，北京西山。在古老皇家园林双清别墅前，一辆黑色吉姆轿车“嘎吱”一声停住，从车里走出两位人民解放军将军。一位是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在天津战役中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亚楼，另一位是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政治委员钟赤兵。

刘亚楼身穿军装，洒脱利索。钟赤兵身着便装，头发乌黑浓密，架着双拐，掷地有声；不过他那举止、气质，依旧不失将军风度。

两人在秘书引导下，来到毛泽东办公室兼卧室、书房的门前。毛泽东迎在门口，刘亚楼敬了个军礼。随后，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了声：“主席好！”

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钟赤兵和刘亚楼，兴奋地说：“二位将军鞍马劳顿，远道而来，辛苦了！请落座！”

刘亚楼和钟赤兵按照毛泽东指的位置坐下。毛泽东习惯地点燃一支烟，然后说：“你们二位来得正好，有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经恩来同志提议，党中央研究决定，你，刘亚楼，去组建军委空军，当空军司令；钟赤兵嘛，你去组建军委民航局，也就是当军委民航局长！”又说：“你们二位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给你们提个要求嘛，就是只许干好，不许干坏。”

“保证完成任务。”刘亚楼和钟赤兵不约而同地回答。

组建军委民航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一无飞机，二无专家技术人员，时处建国初期，经济又十分困难。真可谓“一无所有，白手起家”。

钟赤兵遵照周恩来以“两航”作为组建中国民航基础的指示，开始了艰辛的工作。

当时，钟赤兵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在北京饭店办公。他办事雷厉风行，十分讲究效率，除了秘书应办的事情之外，事必躬亲。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从第二野战军等单位调来一批干部作为军委民航局的骨干。同时，他安排秘书及有关人员想方设法筹建民航机构和办公设施。在此期间，他又分别和“两航”高级技术人员以及起义的积极分子不分昼夜地谈话，了解情况，征求他们对发展中国民航事业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军委民航局机构正式开始办公了。

“两航”即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是旧中国的两大航空公司。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两航”在上海的基地先后搬到香港。衡宝战役开始后，“两航”在华东和西北的一些航站有的告急，有的撤销，国民党政府即胁迫“两航”迁往台湾。此时，香港当局也釜底抽薪，配合国民党政府以《紧急法令》为借口，封闭和征用“两航”在启德机场的厂房，使“两航”的数千名员工陷入绝境。

面对港英当局的无理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逼迁阴谋，具有爱国精神的“两航”员工十分愤慨，立即组成“港九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进行合法斗争，以维护员工们的经济利益。“两航”员工的斗争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关注，周恩来立即指令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两航员工。不久，深明大义的“两航”员工在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率领下，毅然起义，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祝贺，赞扬“两航”起义“是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和紧张工作，钟赤兵于1950年3月31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民航状况报告》，提出了民航建设的方针、政策。毛泽东3天后批示：“所拟方针可用。”

但是，“两航”起义后，由于港英当局同台湾国民党特务相勾结，进行各种限制和破坏活动，不准“两航”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起飞，冻结“两航”在机场的各种器材；国民党特务又大肆破坏和造谣，进行反共宣传，情况紧急而又复杂。面对这种情况，钟赤兵在周恩来的同意下，指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并参与策划“两航”起义的任伯生去香港，执行同港英当局斗争的任务。在此期间，钟赤兵经党中央批准，先后两次发表声明，抗议港英当局的不法行为；又秘密派人组织“两航”留港员工积极展开护产斗争，保护启德机场的飞机和器材；同时利用同港英当局诉讼的时间，组织员工秘密地以整化零拆卸飞机装箱，雇用外轮先后分批将大批飞机和各种部件及电讯器材运回国内，为建设新中国民航事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为了发展中国的民航事业，钟赤兵十分重视知识，注重培养人才。在他的倡导下，民航办起了部队干部文化学校、工农文化速成中学、俄语专科学校和机务人员学校。这些学校为培养和造就中国民航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航初建之时，大部分骨干都是“两航”起义人员，是旧中国培养出来的。钟赤兵发扬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政治上爱护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局党委会上，有人对“两航”起义人员的思想教育有畏难情绪，他便语重心长地说：“争取、团结、教育‘两航’人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无产阶级感情，要对他们在工作中的成绩予以表扬，对缺点、错误要慢慢地去批评、改造，不能操之过急。尤其是刚开始，他们提的事情，我们办不到时要多作解释工作。”在钟赤兵的耐心工作下，这些同志的思想顾虑被打消了。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经钟赤兵倡议，军委民航局设立了顾问室，聘请“两航”元老、高级知识分子当顾问，参加每周一次的办公会议，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聘请高级技术人员任机务和航务总工程师，任命他们为各厅、处的领导，让他们有职有权；同时号召从部队来的同志向“两航”起义人员学习技术业务，尊重他们的意见。他还教育“两航”人员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分期分批组织他们到民航学校轮训，学习政治，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

钟赤兵在军委民航局工作4年。在此期间，中国民航从无到有，继而不断完善，全国民航航线迅速恢复，还担负了森林巡航、农田灭虫、救灾等任务。这些无不浸透着钟赤兵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

毛泽东又一次保护了他

1959~1960年，由于赫鲁晓夫集团违背苏联人民的友好意愿，在科技援助方面先是卡我们的“脖子”，接着又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给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带来了很大困难。国防科技要发展，要摆脱困境。钟赤兵受命于危难时刻，于1961年4月21日奉调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协助主任聂荣臻元帅进行工作。

科学知识是国防科技发展的根本，而当时国防科委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部分中级科研人员大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其出身和社会关系多属于非劳动人

民家庭。如果因此将他们拒之门外，中国就等于没有自己的科学家。在这种情况下，钟赤兵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重在表现”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生活中关心，工作上支持，使他们深感党和人民政府给予的温暖和关怀，心情舒畅地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钟赤兵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但为了国防科技的发展，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他却说：“阎王爷给我留下的时间也许不多了，我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同志。”

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要求国防科委也要创“四好”。钟赤兵认为不能硬搬带兵的方法管理科研工作，依旧坚决贯彻由聂荣臻元帅组织制定、经党中央研究、毛泽东批准的“科研十四条”，强调国防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了把“科研十四条”落到实处，他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聂荣臻在国防科研机构的重要讲话，并且深入调查研究，抓了第十研究院第十四所贯彻“科研十四条”的经验，树立典型，在科委系统大力推广。为了让科研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特请陈毅元帅到国防科委作报告。陈毅渊博的知识、风趣幽默的讲话以及对科研工作的深刻见解，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

由于钟赤兵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贯彻党的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坚持按照科学的方法管理科研，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犯了“天条”，“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了“军内反革命一小撮”、“‘臭老九’的黑保护伞”等帽子，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乃至人身摧残。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他毫无惧色，坚持斗争。

一次，“造反派”头头逼他交待所谓黑材料，他怒不可遏地说：“这帮人欺人太甚！老实说，想从我这里得到一根毫毛也办不到！”

钟赤兵的“顽固不化”惹怒了林彪、“四人帮”，他们指使亲信狠“整”钟赤兵，使他得了心肌梗塞，不得不送进医院抢救治疗。可林彪、“四人帮”的亲信不让抢救，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于1967年3月硬将他从医院拖出来游街批斗。他重病在身，又是一条腿，站立非常困难；但他们偏不让他坐，还给他戴上一米多高的高帽子。他们厉声厉色地反复问道：“你为什么要保护‘臭老九’？为什么要推行修正主义科技路线？……”

“他们臭不臭是另一回事，但他们的知识对我们发展国防科学很有用。不用他们的知识我们的国防科学就没有今天。”钟赤兵据理争辩。

“打倒‘臭老九’的保护伞！”林彪、“四人帮”的亲信带头喊叫的同时，还指使人对他拳打脚踢。

钟赤兵任凭林彪、“四人帮”一伙百般折磨，硬是不低头，捍卫着正义。

1967年8月，钟赤兵又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隔离起来。他的夫人于陆琳，这位15岁参加革命、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教育系的“三八式”老干部，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说：“我当时是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和钟赤兵分别隔离在两间教室里。夫妻近在咫尺，我为他的身体担忧，却不能照应。”

被隔离的次日上午，批斗钟赤兵夫妇。一个“造反派”头头质问：“钟赤兵，你为什么支持于陆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钟赤兵义正词严地反问：“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什么，学校的教育方针又是什么，你知道吗？”

“造反派”头头愣了。过了一会儿，鼓着肚子说：“这谁不知道，学校当然是抓教育，是培养人才，是……”

“这一方针是谁提出来的？”

“毛主席。”

“既然是毛主席，难道于陆琳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就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吗？”

林彪、“四人帮”之流见从政治上整不倒钟赤兵，就决定从生活上对他进行迫害。他们撤掉了钟赤兵的警卫员和保健医生。对于一个肢体残缺、患有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来说，身边没有人照顾，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没完没了的批斗，果然，3天后，钟赤兵就病情加重，岌岌可危了。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知道了钟赤兵被批斗、隔离审查的情况，非常生气，当即指示：“钟赤兵同志是个好同志，从小是在红军里面打仗打出来的，工作有能力，有魄力。”

林彪、“四人帮”挨了当头一棒，只好放了钟赤兵。

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钟赤兵又一次被从生死线上救出来。此后，他继续冲杀在工作和斗争的第一线。

红军时期的秦基伟

徐贵祥

秦基伟（1914～1997）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4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补充师师长，八路军第129师游击支队司令员，太行一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第15军军长，志愿军第15军军长，昆明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

这是中国大别山下一个普通的村庄。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着一块黑色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汗珠子摔成八瓣渗进土地，在那里生长出沉甸甸的稻穗和麦粒。他们双手捧着自已的劳动果实养育着自已和自已的子孙。他们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沿袭千年的纯朴民风 and 耕耘者勤劳善良的习性，又赋予了他们深沉的民族文化意识。他们崇尚圣贤，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历朝历代明君忠臣的故事。劳作之余，村口大树的树荫下，常有银须飘扬的老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诸葛亮七擒孟获、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那位后来成为解放军一员猛将的秦基伟，就是在这里蹒跚学步的。他有一个不算富裕但又充满温暖的家庭。父亲秦辉显和伯父耕种10余亩田地。母亲周氏勤俭持家，纺线织布饲养牲口。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很早地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能够主动帮助大人们干活。举家和睦，日子里没有大富大贵的征兆，倒也乐趣盎然。

8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倒不是奢望他中状元中举人，只是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成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

然而好景不长。

从1925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不知名的瘟疫，相继夺走了母亲、父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家破人亡，半边天哗啦一下落下来，砸在刚满11岁的秦基伟肩膀上。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悲痛和恐怖铺天盖地而来，几乎让人窒息。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偌大一个农舍里空落地只剩下一个孩子。他白天在门上挂一把锁，下田干活；收工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田里的草薅了，院子里的草又长满了。晚上睡觉，老鼠也欺负他，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穿堂而过。老鼠来了兴致，吱吱吱杀声震天，满屋子追着打架。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家里有一种蛇，不咬人，人睡着了，它就爬过来吃人的口水。可那毕竟是蛇，单那丑陋的长相，就难以让人亲近。这自然使他怕得要命，睡觉时就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连喘气部不敢大声，最后也终于可以迷迷糊糊睡着了。

日子就这么辛酸而又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

每逢佳节，便是这个孩子最难挨的时光。

失去亲人的第一个八月十五那天下午，他早早地锁上门，独自一人坐在秦罗庄对面的山岗上。今天是团圆日，有爹有娘的孩子不会来找他玩。即使来了，他也快乐不起来，他们有温暖的家，有慈爱的父母，有香喷喷的月饼，可是他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的欢声笑语，他更觉得孤独。

由于家破人亡，这个 11 岁的孩子，过早地体察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想当年，父母和伯父健在，家道殷实，自己一家在村中颇有威望，左邻右舍既羡慕也显得亲近。如今只剩自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道一落千丈，人们再也不愿意同这个穷孩子有更多的瓜葛了，生怕有朝一日他饿昏了或冻病了会赖在自己家的门口……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村里大人物的这些思想活动。他只是凭着一个孤儿悲凉而又敏感的心，本能地注意到人们异样的目光，觉得对他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于是在那个八月十五的下午，他独自坐在对面的山上，从林缝里望着自己的村庄。村里人哪知孤儿心。那秋收后的喜悦，那合家团圆的欢乐景象，像竹签一样刺痛了他的双眼。

他仰起脸，把目光投向村后更远处的老君山、天台山，泪水顺着两腮落在脚下的草丛里。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爹爹啊，娘啊，你们在哪里呢？你们知道不知道么娃心里好苦哇，你们快回来吧，搂着娃亲亲热热过个节吧。娃不眼红人家的月饼，也不馋人家的鱼肉，娃就想被爹娘搂在怀里当一个有爹有娘的娃……

那个晚上，他在山上一直坐到月挂中天。

人生的重大转折发生在 1927 年。

那年，外面的世界已是闹哄哄的了。

远在黄安（今红安县）千里之外的欧亚大陆上空，仍是战云密布。中国国内的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早在这年 1 月初，武汉老百姓在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 30 万人的游行示威，愤怒抗议英国水兵枪杀罢工工人事件。1 月 8 日，中国北伐军占领汉口。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数百名共产党人被杀被捕……

远处的枪声虽没有传到黄安，但黄安、麻城等县却有一些本地人，有穿长袍的，有戴眼镜的，频繁奔走于城乡之间，秘密串联百姓，给偏僻的山野带来一些新奇的神秘色彩。

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头夜里下了一场暴雨，露珠还在叶子上滚动。黄安北部山区的土质是红粘土，雨水一渗，又板实又平坦。伢子们清晨照例去放牛，牛还是那般摇头晃脑快活得直打响鼻，草还是那般挂着雨露晶莹柔嫩，太阳也还是以往的那个太阳，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千真万确有一件东西像钻石一样嵌进了秦基伟那双机灵而又充满忧郁的眸子里。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发现——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如同米面馍馍一样大小形状，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印在地面上，纹络清晰异常。

众牛倌扑闪着大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印在地上的是何物。

秦基伟自然也不知道。他上前蹲在地上看，又站起来后退几步看，然后东瞅瞅西瞧瞧，冷不丁冒了一句：“莫不是鞋印？”

“对，是鞋印！”紧接着就有人响应。

“像鞋印。”又有人恍有所悟。

七嘴八舌，各自发表高见，最终统一了认识：印在地上的，就是一双鞋

印。

是鞋印但又不是寻常的鞋印。这双鞋印，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不仅使这几个牛倌惊奇不已，而且对整个秦罗庄的传统文化都是一种冲击。它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是从秦罗庄大山屏障之外的广阔天地里来的。一句话，这双鞋印是有来头的。

秦罗庄的人是踩不出这种鞋印的。这鞋不是线纳的，也不是麻搓的，底不是平的，而是有着精美图案的。

接着，一个牛倌又发现了一双鞋印。

再往后，就见多了。田埂上、草棵里、盐店河边的沙地上，到处都出现了这种鞋印。与这鞋印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贴在墙上的标语，无非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之类。

消息就像投进池塘的石子，很快便在山乡荡漾开来。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经过世面的私塾先生，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又有共产党往南边去了。”

证据便是那鞋印。

这鞋被外边的人们称作“马克思鞋”，作田人是不穿的，只有扛枪打仗的人才穿这种鞋。乡下人传得活灵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人都是共产党，他们走的是一条叫作“革命”的路，这种路走到头，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

这种传说，对于秦基伟是极具诱惑力的。

对于穷人来说，打土豪、分田地，没有比这再好的事了。

他左思右想，日不能静，夜不能眠，心里像有一种东西被灶火燃着了，越燃越旺，最后燃成一片势不可当的火焰。

“他娘的！丢掉这堆破烂，离开这个穷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他心想。

有了明确的主张，日子就过得有条理了。他心里也有了支撑，除了放牛种田，唯一的大事就是一个字：等。

已经是深秋了，山外刮进来的冷风装满了他那间稀里哗啦的破屋子。那屋子，连冷风都不愿意久留，刚刚进来，又从四壁透亮的缝里钻了出去。

可是，他没法出去。这儿好歹是个家。离开这里，他连破屋子也没有。

冷风飕飕地刮个不停。他拎过一把斧子，把庞大的树根劈成一截截小块。冬天，下雪了，出不得门，窝在家里烤火，树根是最熬得起燃的。

然而毕竟年纪太小，斧子举得尽管很高，可落下去还是轻飘飘的。少年劈树根，就像蚂蚁啃骨头。

正在满头大汗地干，虚掩的院门被踹开了。本家的一名堂叔旋风般地跌进来，惊惊乍乍地喊：“还劈个么事，闹革命了，还不跟我打县城去！”

秦基伟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看见门外又有一群人，手里拿着梭标、大刀之类的家伙，一边奔跑，一边咋唬，这才恍惚明白，这就是大鼓书里说的：要起事了，要反天了，要换世道了。穷人造反打江山，水浒一百零八将，闯王李自成夺天下，天王洪秀全闹长毛……官逼民反，民不聊生，不得不反……霎时，从大鼓书里听到的，从大戏里看到的，听老辈人传说的，那一串串轰轰烈烈的故事闪现在他的脑海里。多少个饥饿寒冷的夜里做过此类辉煌的梦啊！

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这是他的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层思想。

反了，我不反谁反？最该反的就是我！这是他的第二层思想。

“叔，我跟你去！”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重大的选择面前，在生死攸

关未来莫测的严峻关头，这个 13 岁的少年既不显得悲壮也没怎么激动。他掂了掂手中的斧头，平静地问：“我就带上这家伙？”

堂叔一把夺下斧头，说：“你这家伙管屁用，尺把长的柄，还没等你近身，人家早一刀砍过来了。给你这个。”

他伸手接住。递过来的是一柄带有麻绳染成红缨的梭标。

他扛着这根梭标，又趁堂叔不注意把斧头揣进腰里，然后跟本村的乡亲们一道上路了。这是 1927 年 11 月 13 日，黄（安）麻（城）起义开始的那一天。

对于起义，他是半明白，半懵懂。但有一个准则，村里的穷人参加而富人害怕，这就是他之所以毅然跟随起义队伍前进的基本前提。他读过年把私塾，脑子里多少有些文化底子。那时候，他衡量可行与不可行的唯一尺度，就是看哪些人乐意和哪些人不乐意。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尽管这是几年后才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两种行为准则，但是在此之前，绝大多数革命分子正是以这个准则选择自己的道路的。

当天下午，起义的群众汇集在黄安北部重镇七里坪，在那里编队动员。然后于当晚子夜浩荡南下，直指县城。地上，万头攒动，梭标、大刀寒光闪烁；天上，一轮皓月冷静地注视着中原沃土大别山麓的这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的农民队伍，注视着这群衣衫褴褛而又手舞足蹈的庄稼汉子。

他们要干什么？

打天下夺江山去也。

一路奔袭，到了打鼓岭。累加激动，秦基伟的小脸憋得通红。

“伢子，怕吗？”一位满脸络腮胡子、背扛大刀的乡亲跑前跑后，俨然是个组织者，路过秦基伟身边，大概是看他年龄太小，便停住脚步问他。

“有什么怕的！”他答。他转动脑袋，看了一眼漫山遍野的队伍。

是啊，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中国的农民运动提供了这样一条经验，人多不仅力量大，胆量也成倍地增加。

“知道我们这是于什么吧？”络腮胡子又问。

“革命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嗨？”络腮胡子显得有些惊奇，笑了笑又问：“革命是什么呀？”

这回轮到他语塞了，吭哧了半天，才反问：“你说革命是什么？”

络腮胡子想了想，说：“革命就是打地主老财，要他们的命，让老百姓都有饭吃。”

“就这些？”他问。

“约莫就这些。”络腮胡子不太肯定地回答。

他没说话，但他在心里并不认为就这么简单。革命这个词儿他听了好几回了，革命的理儿也有所耳闻。他琢磨，革命绝不仅仅是要地主老财的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肚皮问题，革命可能还有比这更要紧的目的。

从六里坪到黄安县城，弯弯曲曲 50 多里路。起义的队伍人山人海，刀枪林立。人们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顶着皓月直达城北三里岗。天亮时分，总指挥潘忠汝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 30 余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

一直处于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黄安县，转眼之间赤旗飞扬。

在战斗中成长

一年一度的秋天，红红火火地走来了。1929年杜鹃花开的时节，秦基伟怀里揣着从乡苏维埃软缠硬磨得来的证明，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天上一朵云彩飘悠悠，
地下一支竹笛脆溜溜。
秋天的风儿刮进了山坳，
树上的果儿挂上了枝头。
外面的光景热辣辣的亮，
当红军的伢子出了村口。
水往低处流哎，
人往高处走哇。
何时才能把家转呀，
革命不成不回头，
哎嗨革命不成不回头……

这首歌是听谁唱的，他记不清了。但歌词他记清了——革命不成不回头。他最后回过身来再看看秦罗庄，那大片大片绿色的树林和漫山飘荡的氤氲挡住了他的视线。于是他放开了脚步，先是大步流星，然后一路小跑。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你追我赶，一起赶到红31师驻地参了军。

他被分配在第3团机枪连当战士。

红军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耕田耙地之类的活计，它需要力气，但又不完全凭借力气；需要勇气，而有勇无谋也不行。它对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甚至是苛刻的。一个优秀的士兵应该是这样的——具有老虎的勇猛，狐狸的狡猾，猴子的敏捷，犬的警觉；而当需要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时，则又需要兔子的速度。优秀的军人，尤其是处在野战状态中的优秀军人，应该具备所有野生动物的长处。

早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其生存状态的确是艰苦的。没有军饷，

没有补给，没有营盘。所面临的，是夏暑冬寒的磨砺，是国民党军没完没了的“围剿”堵截，是动荡不定的奔袭和跋涉，是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格斗和厮杀，是一次又一次从大刀砍杀和牙齿的撕咬中挣脱而生存。

没有比中国红军的生存条件更为严酷的了。于是乎，论勇猛，论坚强，论灵敏，论吃苦耐劳，论生存能力，论饿饭缺水……中国红军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都首屈一指。

秦基伟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是跟国民党第20军郭汝栋的部队交手。这回可是真刀实枪地干。地点在麻城县的城门岗。敌人1个团，被红31师团团围住。由于红军的武器差，敌人只被杀伤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跑了。

秦基伟当时没有大多的想法，首当其冲的愿望是在战斗中搞到一支枪。那时候没有发枪这一说。参加红军了，也不一定马上就发枪。想要枪，就得自己去夺。他太渴望有一支步枪了。革命军人还成天扛着根梭标，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要是打过两仗还扛着梭标，那就太惨了，不说你怕死，至少是笨蛋。

战斗一打响，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老战士趴在土堆上射击，他看得于着急。打了一阵，敌人退了。这回轮到他一显身手了。他举着一根半丈梭标，大吼一声，直冲向敌人。果然，他缴了一支大枪。虽说只是个汉阳造的单套筒，比捷克式和大盖式差点，但终究比梭标强。他对着太阳拉开枪栓看看，枪膛好好的。他心想，这兵也真熊，一枪没放就撒丫子了，枪膛里还亮铮铮的呢。嘿嘿，你不要，老子可不客气了！

他一扬手，那支梭标被抛出十丈开外。来一个优美的转身，漂亮的老套筒便洒脱地左肩右垮了。

这次战斗，秦基伟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副班长。

副班长是个多大的官呢？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将军开玩笑说：“可别小看了副班长，官不小呢，比三人战斗小组的组长大，比日本鬼子的伍长大，管好几个人呢。”

确实，他很珍惜这个职务，管理起来很大胆，硬是把副班长当出了八面威风。正是在副班长的位置上，他显示了组织能力，不久就当上了班长，并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

7个月后，当秦基伟从随营学校毕业时，他所在的第31师已被整编成红1军第1师，他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担任排长。没过几天，红1军和红15军又整编为红4军，部队来了个大调整，他又被调到军部手枪营第2连当排长。

排长当了好几个月，他才发现一个问题：排里好几个战士都是共产党员了，而他这个排长居然还是“党外人士”。那时候的党员可光荣得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担任指挥员竟然不是党员，那工作怎么开展呀？有许多事，党员们悄悄商量，根本不通知他。

他感到很恼火，于是找营教导员，要求入党。

教导员的答复有两条：第一，你是中农成份，中农要用更长的时间考验。第二，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好打抱不平，爱提不同意见，需要改正。

对第一条，他毫无办法，中农成份不是他挣的，也不是他能够改变的；对第二条，他也是毫无办法。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小到大都是一根肠子通屁股，直来直去，想改，但改不了。改了几天还会再犯，一犯就更厉害。

1931年，中央苏区开始清查“AB团”，搞“肃反”运动。

军长被撤了，师长被抓了，团长、政委被抓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营连干部被抓了，再往下，不偏不倚地该小排长们倒霉了。

还好，秦基伟没被杀头。运动由上而下，到了最底层，风势就弱了。再说，连小排长都杀了，还靠谁来打仗呀？同那些被杀掉或被撤掉的人相比，他确实算是万幸了。

他被调整了工作，由第1排排长调成了第2排排长。

这只是个小小的变动，但这个变动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奥秘，也算是中国红军独有的特色之一。如果按新的眼光看，从1排长到2排长，应该说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然而在60年前的红军时代却不是这么简单。那时候的第1排排长人称“大排长”，作战时紧跟连长、指导员，相当于副连长，而且是连长的当然代理人。

可是第2排排长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说，2排长在连里的地位往往还不如3排长。在红军连队里，战斗时往往是这样，先锋是第1排，后卫是第3

排，第2排夹在中间。不是信不过，至少可以说，第2排的力量相对弱些，使用起来也自然靠后一些。

为什么要“降职”呢？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也没有想到要去问个水落石出，但心里难免要犯嘀咕：我没犯错误呀，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虽说性子直了点，爱提个意见，可从来没出格呀，怎么稀里糊涂就给“涮”了呢？

后来听人传说，是被人“张冠李戴”了。因为他幼年时出过天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红军时代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人员变动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至只知绰号不知姓名。恰巧，本连第3排排长也是个“麻子排长”，曾经对肃反说了几句风凉话，可能是被连长和指导员（已先被抓走了）供了出去，于是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又因为第3排排长是雇农出身，比秦基伟的中农成份好，所以没怀疑3排长，稀里糊涂地把他给“收拾”了。好在他才是个排长，又沾了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没有搬家。

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秦基伟有幸成了“党可原谅三分”的人，脑袋没掉，后退一步，当起了第2排排长。

现在，站在训练场上，面对一群或比他年长或比他年小的老兵或者新兵，秦排长双手卡腰昂首挺立，声音响亮地教授步兵战术条例。

部队的成份实在太杂了。排里有些老兵，参加过几次战斗，似乎多了一些经验。但更多的人，昨天还是工人或农民，今天就是红军了，连枪都不会放。

而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曾经在心里暗骂他最初的教官是“狗日的白匪”，但正是那个从白军里投诚过来的教官以无情的严厉将他磨砺成材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从心里感激那个教官。

况且，他还上过随营学校，单兵战术那一套受过相对正规的训练，进攻时利用地形、地物比较灵活，懂得侧面接敌，善于运用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法。

姿势好看与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实用，是减少伤亡的可能性。

他先介绍自己参加了哪些战斗，遇到了哪些艰险，克服了哪些困难，获取了哪些战果，然后扯开衣襟喊了一声：“同志们请看！”

大家齐刷刷把目光投向排长赤裸的胸膛，不禁有些发懵，白白净净，搓衣板式的胸膛上啥也没有，有什么可看的？

他笑了笑说：“我参加过那么多战斗，每次都往前面冲，遇到过那么多危险，枪林弹雨里一次次闯出来，汗毛都没掉一根，你们说为什么？”

老兵、新兵面面相觑，心想：为什么？走运呗，难道是神仙保佑不成？排长也别吹，你是碰巧了，不信你刀枪不入。

“告诉你们，我就是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训练，练出一身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

老兵、新兵恍然有悟：绕了一圈，原来是动员呀！有些老兵撇撇嘴，骂一声：毛头小伙子尽搞歪门邪道。而心里却不得不服：这个伢子不赖，练起兵来有板有眼。

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他就自己做示范。

定好目标，首先在前方选好隐蔽物，计算好时间，然后开始冲击。什么时候跃进，什么时候匍匐，什么时候正面猛跑，什么时候侧身接敌……这一套他做得从容利落，令大家都很服气。

在早期的红军队伍里，能够这样有板有眼地练兵，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有理论讲解，有现身说法，有具体示范，有归纳总结，形象直观，生动通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雾的早晨。

那天连队统一训练，正在兴头上，来了两个人，身上挎着驳壳枪，同连里干部连招呼也没打，径直走到场地中间问：“谁是2排长？”

一看这阵势，秦基伟心里有些发虚。这两个人他都不认识，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他心里咯噔一紧：坏了，莫非是保卫局抓人来了？

当时肃反还没有结束，本连第3排排长刚被抓去。掰着指头算，再往下，除了自己，没谁可抓了。

怎么办？他四处看了看，练兵场上喊声震天，各练各的，没谁注意这边。保卫局抓人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被抓的走了，坐牢或者杀头去了；没被抓的照样训练。

跑，跑脱是有可能的，可往哪里跑呢？又凭什么要跑？老子参加红军就下了决心要革命到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一股血气涌上来，他挺身而出，铿锵回答：“我就是2排长。”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秦基伟以为是要下他的枪，但没有。来人中的一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

到了军部才知道，是军长徐向前召见。军长一口山西腔，开始他听不大明白，后来终于听明白了，军长是在和他拉家常，上问父母，下问土地，再问理想，又问决心。

家常聊完了，军长说：“行啦，你回去收拾一下，到手枪营2连当连长。”

他“啊”了一声，半天嘴巴没合拢。直到徐向前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才回过神来。

哎呀，我的天哪！紧张了老半天，原来是“升官”呀。他心里直怨那两个挎盒子枪的同志：干吗不早说呢，吓得我差点跟他们动家伙。

不久，他就知道了，“肃反”并非是党的本意，只不过是党内一些人利用了，搞极端化，错杀了许多人。徐军长是个军人，他是坚决反对那种过激行为的。部队搞完了，他这个军长指挥谁去呀？

可是，在红军队伍里，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中央代表更是法力无边。许多事情他这个军长是无能为力的，甚至连他的妻子程训宣都被当成反革命悄悄地杀掉了。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徐向前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其中就包括秦基伟。

转战鄂豫皖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了第四方面军，秦基伟继续担任方面军总部手枪营第2连连长。

11月10日夜，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4天，黄安战役的枪声打响了。

那几天里，方面军总部气氛异常紧张，参谋人员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秦

基伟作为负责首长安全的手枪连长，虽然与参与决策距离尚远，但他有幸目睹了大战在即总部首长的风采，也亲身感受到了首脑机关的指挥作风。

他尤其喜欢注视那些长时间伏在地图上工作的人们。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便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向往。那几天，除了吃饭

和当面询问、布置任务以外，徐向前总指挥很少离开过地图。他趴在地图上，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趴在又香又甜的白面馍上。那专注的神态和虔诚的表情，让 17 岁的秦基伟领略到了一种崇高的神圣感。

11 月 25 日，方面军总指挥部前移，进驻黄安城东南距城仅 5 千米的郭受九地区，加强了火线指挥。

秦基伟和他的连队，心里急得冒火，手里痒得出汗。外面拼命地打，里面拼命地吵。吵什么？要打仗呗！手枪营是总部首长身边的部队，人员全是从部队里左挑右选的。小伙子一个个健壮剽悍，一长一短两只枪，加上后背的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红穗子一飘一飘的，牛气得很，令兄弟部队十分羡慕。可如今外面打得叮当响，自己却呆在总部里，心里干着急。

还真有说俏皮话的。第 11 师的部队换阵地时路过总部，就有人跟手枪营的人说风凉话：“喂，我说张二蛋同志，仗都快打完了，你们啥时候露一手呵？别捂出了痂子！”

还有刻薄的，那就不是俏皮话了：“同志哥呀，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怎么样？你们不敢上，把大刀借给我们使使怎么样？你看咱这把，刃口都卷了。”

当真扔来一把卷了口的刀，使手枪营的小伙子满脸愧色，气不得，恼不得，也骂不得。不管啥理由，人家从火线回来，从死人堆里闯出来，别说腌臢你几句，就是骂你几句你也得听着。

秦基伟却恼了，毕竟年轻气盛，一脚端开营长的门：“这个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连队要打仗！”

营长正在补军装，瞟了他一眼，头也不抬地说：“好哇，你秦基伟英雄啊！把连队给我留下，你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他惜了，满脸狐疑地看着营长。营长仍然专心致志地补他的上装。

“把枪也留下，打完这一仗，封你为秦大刀！”营长又说，依然没抬头。

一腔无名之火，被营长不紧不慢地给熄了。留下连队，留下枪，他去干什么呢？真去耍大刀倒也未尝不可，可是，真能一走了之吗？徐总指挥的岗谁站？

发牢骚可以，动真的不行！这点组织纪律观念他还是有的。

露一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全部肃清黄安城外围障碍之后，徐向前确定对黄安城围而不打，夹而不击。目的是吸引周围的国民党军前来增援。围城之意不在城，关键在于诱敌援兵，待援兵打得差不多了，再也不敢来了，这才集中兵力收拾城内守敌。

这一招果然奏效。黄安城内的国民党军多次寻机突围，自然都是徒劳。他们像是铁皮脑袋碰上一个橡皮口袋，虽然往外拱了一截，却空喜欢一场，最终又被坚决地弹了回去。城南国民党军第 30 师也两次派出增援部队，均被红军第 11 师打退。

12 月 20 日拂晓，国民党军集结其第 30 师大部和第 31 师一部兵力，并组织“敢死队”，向红军第 11 师第 31 团的嶂山阵地进行夜袭。由于该团第 5 连前卫排警戒时疏忽，嶂山阵地被突破。国民党军爬上嶂山顶峰，直逼红

11 师指挥所。

天亮以后，国民党军又集中兵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拼命向红军阵地攻击。双方反复白刃格斗，阵地几经易手。战斗进行至下午三点多钟，增援的国民党军已进至离黄安城仅 10 余里的地方，逼近红军打援部队固守的最后一个山头。

情况十分严峻。红军第 11 师已经同敌人混战在一起，师长王树声把师直手枪队和通信队也组织起来，跟国民党军拼上了刺刀。

总部手枪营 300 多个精神焕发的战士被召集在总部大院门前。

深秋下午的太阳像是戴上了一层透明的面纱，阳光温暖而柔和。只见 300 多簇鲜红的“火苗”在微风中抖动——手枪营战士们大刀柄上的红绸子，鲜艳醒目，迎风招展。

关键的时刻到了，徐向前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把手枪营拉出去。

一声令下，300 多条汉子如箭离弦，拥向第 11 师的格斗场。

岂止是手枪营，连总指挥徐向前也操起家伙上了阵地。

秦基伟亲眼看见了那一幕：在山头上，徐向前双手擎着望远镜瞭望。山腰上，国民党军撕开第 11 师的防线，一步一步地往上攻。秦基伟急忙率队扑向前去。当冲到徐向前身边时，他差一点动手把总指挥拽到山的背面去；但他没敢。

徐向前这时差不多成了最基层的指挥员。他观察了一会儿，把握火候一到，下了一道命令：“命令 28 团和手枪营冲锋！”

霎时，手枪营从正面，第 28 团从右侧，第 11 师从左侧，像决了堤的洪流，一路杀声，滚滚而去。

后来，秦基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红军打仗，漫山遍野。”

的确是漫山遍野。军号声，冲杀声，枪声，炮声，汇成一支雄浑的交响曲，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别山麓，奏出了壮阔的旋律。

黄安战役胜利后，为了给北路敌人以有力打击，夺取商城，把鄂豫边和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商潢战役。商潢战役自 1932 年 1 月 19 日打响，红军集中 4 个师的兵力，对商城仍然采取围而不取的方针，诱敌援兵；另集中一部兵力，在商潢公路附近运动，寻机歼灭来援之敌。

敌果然被诱动。1 月底，国民党军第 2 师、第 12 师、第 75 师、第 76 师 4 个师共 17 个团出动，沿商璜公路东进。

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夜冒雪行军，集结于杜甫店地区，抢修工事，布好阵势，准备迎敌。红 12 师担任正面突击任务；红 10 师、红 11 师置于左侧，红 73 师置于右侧，担任两翼包抄任务。

手枪营经过黄安战役，略有伤亡，但建制完整。战后，兵员和武器都得到了很大补充。第 2 连补充了 10 名新战士，清一色的黄安人，可谓是清一色的子弟兵。在这件事情上，秦基伟表现出了年轻而成熟的思路。他把 10 名新战士召集在一起，先是介绍了本连的战斗业绩，然后板下脸，一本正经地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我的指导员也是黄安人。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自从有了董必武，黄安人就走上了革命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英勇作战，打死了是黄安人的光荣。贪生怕死的，活着也是黄安人的败类。我们都是乡亲，我当这个连长，对你们只有一个照顾，战斗时给你们机会往前冲！”

说完，他举目将新战士一一扫了一遍，然后提高嗓门大喝一声：“听清楚没有？”

众人一个激灵，齐声回答：“听清楚了！”

“如果有人嫌我不顾乡亲情面，怕在我手下吃亏，现在提出来，还来得及，我找营长帮你们调换连队。”

新战士们憋红了脸，无一人吭气。

“没有？那好，从今以后，我秦基伟往哪里冲，你们就给我往哪里冲。谁要是‘筛糠’丢人，我丑话说在前面，……”下面的话他没说完，只是用手使劲地拍了拍屁股后面挂着的驳壳枪。

大家全明白了：商潢战役在即，连长是怕咱们新兵给黄安丢脸啊！

大家纷纷说：“连长你放心，黄安穷山穷水穷云彩，就是不穷志。你说往哪里打，咱就往哪里打，死了你给家里捎个信，张三是在前倒下的。”

“对呀，连长你记住，哪怕收不全尸，你也得把咱的红军帽捎回去，革命成功了，家里也有个依靠。”

战士们很动情，说着说着就哭了。

秦基伟把脸板得风雨不透，可又觉得鼻沟子有些痒，伸手挠一挠，原来净是水。他心想：这没出息的眼泪，不知道啥时候就流了出来。

但他心里却暗自得意：好，这把火烧起来了，而且烧出了战斗力。

2月1日上午，战斗打响了。红军首先与敌军第2师交火。敌第2师装备精良，兵痞较多，战斗力很强，不断发起猛烈进攻。双方血战了数小时。

当天下午，红军第10师、第11师从左侧迂回，抵刘寨包围了敌第2师和第12师的两个指挥部，并抢占了傅流店渡口，切断了右路敌人的后路，使敌军心动摇，全线慌乱。红军正面和左翼部队乘势对敌发起猛攻。

敌军几万官兵眼见大势不妙，哗地一下全线溃退。

徐向前挥师前进，红军追兵急如潮涌。

手枪营也拔营起寨，簇拥着总部，一路喊声连天，追将过去。

正追击间，猛听得一声喊：“秦大刀，你给我站住！你往哪里冲，还要不要总部啦？”

秦基伟举目一看，是营长。他气还没喘匀，就赶紧回答：“营长，我……没丢掉总部呀，我一直跟着……”

营长火了：“什么一直跟着，看看你们都打到什么位置了？”

秦基伟自知理亏。只顾追击，确实把总部抛下了。正要解释，营长又是一声怒吼：“你的人怎么跑了几个？”

秦基伟吃了一惊：“不会吧，我的连队还能开小差？”

“不是开小差，是开大车，你给我看！”

顺营长手指的方向看去，秦基伟笑了。原来被他“整训”的那帮黄安籍新战士正挥舞大刀，拼命地往前追，已经插进了第33团的队伍。

尽管他为自己的部下兼老乡的勇敢行为而暗暗高兴，但战斗结束后，他还是铁着脸把他们训了一顿：“勇敢得讲究个章法，该拼的时候冒死地拼，不该拼的时候就给我稳住。一说追击，连总部都不要啦？都给我反省！”

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历经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连续奔波，劳累异常，亟待休整。而且，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即将拉开帷幕，红军理应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从容对敌。

但张国焘不管这些，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江山易手，天下姓共，而他张国焘也可以身居京都了。况且，还有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支持，更坚定了张国焘的决心。于是乎，麻城战

役势在必行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攻下黄陂，打到武汉去！”

这一盲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红四方面军陷入麻城之战不得脱身，蒋介石得以乘机从容调兵遣将，从三面紧缩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包围圈，导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最终失败，红军将士严重伤亡。

秦基伟第一次负伤流血，就是在这次战斗中。

立足巴山蜀水

这是一个甜蜜的春天。太阳从遥远东方的山坳里冉冉升起，映红了通江的山山水水。山谷里弥漫着乳白的氤氲，五颜六色的花朵漫山遍野，高耸蓝天的针叶杉上滴着晶莹的露珠。

坝子上，一群官兵舞枪弄刀，龙腾虎跃。

多情而善良的巴山蜀水，迎来了一路苦战、数次死里逃生的红四方面军，用它丰腴的胸脯为这支多灾多难的队伍提供了一块休养生息的地盘，使之得以立足、喘息，建立政权，扩大队伍，补充给养。

这个春天，对于秦基伟本人来说，也似乎格外恩典。想当初，由于负伤，一只胳膊几乎烂掉。队伍且战且走，几次差点把他甩掉。漫

川关一仗打完，红军伤亡过半，伤员漫山遍野。他凭着日夜惊心，时刻机警，硬是一路跟着部队走过来了。从河南到陕西，又从陕西到四川，来到这片山青水秀的“天府之国”。

初来的时候，他被分配在苦草坝的医院里。中草药一熬就是一锅，每天喝3大钵子，不仅治好了他的伤，也救了他的命。

他出院的时候，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发展之际，军事人才奇缺。根据他的资历和战斗表现以及实际需要，他被总部任命为红江县军事指挥长，同驰名中外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并肩战斗了几个月。张琴秋原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因为参加了小河口会议，提了张国焘的意见，连降数级，被贬到红江县担任县委书记。在红江县担任几个月指挥长后，秦基伟升任团长。

往事不堪回首。

想当初，在打麻城参加陡拔山战斗时，团长就指定他为团长代理人。团长牺牲后，徐向前总指挥第一个就想到了他。不幸的是，他也负伤了。于是改提他的入党介绍人、第2连指导员郭世进担任团长。但是，这位侥幸提起来的团长竟然在严峻的时刻“筛了糠”，七里坪血战时软了骨头，哆哆嗦嗦地溜之乎也。

1932年，秦基伟跟着主力一路艰苦征战，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杀开一条血路，从湖北进入豫西。沿途人烟稀少，荆棘丛生，田园荒芜，满目苍凉。当地居民大多迁居外逃。部队找不到吃的，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有时连野菜野果也吃不上。

他挺住了。

部队进入陕西后，遭到了杨虎城3个团、胡宗南两个旅的围攻。蒋介石闻讯又调集大军，一共有5个师加3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分而食之，围歼于漫川关以东十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中。徐向前、陈昌浩坚持集中，指挥部队苦战一夜，于天亮突出了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秦基伟带着伤病寸步不离地跟随主力突出重围。

一路艰辛，一路熬煎。再往西南，又遇上个横卧在前进路上的大巴山。当地人说：大巴山，路漫漫，风如刀，雪似箭，寒冷腊月走一遭，十有八九不回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翻越大巴山，上70里，中70里，下70里，合计要走210里路。尤其是山顶的70里路，寒风像刀子，雪粒打在脸上当当地响。在山上宿营一夜，人挤人搂在一起，胸贴胸都是凉的。白天还稍好些，半夜里狂雪飞舞，人都成了雪人。天亮上路，一清点人数，许多人没有了。扒开雪，人都在里面，已经硬了。没有棉衣，没有棉鞋，没有棉被。上山之前，每人发一捆稻草，穿是它，盖也是它。稻草怎么能挡住风雪啊！肚子里没食，心胸里没火，人身上那点体温，狂风一刮，全没了。翻越大巴山，冻死了多少人啊！

秦基伟没有倒下，留住了最后一口气，挺过来了。

他大难不死。是意志救了他，是信念给了他顽强的生命力。

在他从死亡线上完全挣脱过来，并且恢复了红润的脸色和健壮的肌体之后不久，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的团长，时年19周岁。19岁的红军团长，堪称少年有为。

第四方面军在川陕站稳脚跟后，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红军也得以在战争间隙养精蓄锐，扩充兵员。

1933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年轻的警卫团长秦基伟和他的警卫班正要策马去见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此时，他看见团部外面有几个战士在忙忙碌碌，扯根绳子这里拴一下，那里挂一下。这几个人好像是总部来的。那绳子一直扯到他住的那间屋子里。这时一个战士递给他一件东西，两头弯弯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弹般大小。

他莫名其妙，问：“这是什么玩艺儿？”

那个战士说：“秦团长，你放到耳朵边上就知道了。”

他握住那东西，疑疑惑惑地用手掂了掂。那个战士又说：“秦团长，这是电话，郑部长正在里面跟你说话哩。”

电话？他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但又不敢马虎。总供给部郑部长要是真的在里面跟他说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瞟了那战士一眼，把那个两头弯的东西放到耳朵边上，听了一会儿，果然是郑义斋部长在里面说话。

音是听见了，话却没听清。他连听带猜，估摸出是让他带部队去执行一项任务。最后，郑部长还问：“明白了吗？”

像往常一样，他胸脯一挺：“明白了！”

其实是半明不白。

放下电话，他就喝令警卫员备马。

总部警卫团成立后，除了警卫工作以外，还要负责总部的一些勤杂事务，司、政、供各部门的首长都能调遣。尤其是供给部的事情多，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使用警卫团最频繁。在秦基伟的经历中，上级首长交代任务，从来都是面对面，说得细，听得清，弄不明白的还可以再问。这回却让他吃不准了。因电话里面杂音大，再加上郑部长一口河南腔，他根本就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

为了圆满完成任务，秦基伟决定去当面领受任务。他带着警卫班策马飞奔30里路，没多大功夫就赶到方面军总部，找到了郑义斋。

郑义斋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见秦基伟等人大汗淋漓地闯进来，头上还冒

着热气，不觉吃了一惊，诧异地问：“噢，你咋又来了，不是让你去福阳坝吗？”

秦基伟气喘吁吁地回答：“我得听你当面交代。”

郑义斋说：“我在电话里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啊。”

秦基伟说：“那里面乱哄哄的，我没听明白。”停了停又说：“再说，我对那玩艺儿也信不过。”

郑义斋听了，哈哈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笑完之后，他对秦基伟说：“那不是玩艺儿，是电话。现在条件好了，团长都安了电话。以后下通知、报情况，大多要用电话，你要习惯。”

郑义斋那样一笑，秦基伟的心里可不是味儿了。他是农家子弟，从出生到参加红军，没进过大城市，也没见过洋玩艺儿。这本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但如今自己已经是团长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知道挥大刀片子喊冲锋。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就必须学习。只有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责，掌握新的指挥技术。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贻误了战机纰漏可就捅大了。

从此，“学习”二字便像种子一样种进了他的心田。再去总部，他就有意识地往参谋部门跑，去看新装备，看地图，学地形学。以后，曾经有一位将军说过：“秦基伟这家伙，爱玩。当红军的时候玩命，当支队长爱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像，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的时候玩无线电，上甘岭上玩喀秋莎。”虽说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秦基伟性格的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玩”正是一个指挥员优秀素质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永远都要与新事物保持联系，掌握现代化的装备。应该走在部下的前面，当一个洒洒脱脱明明白白的指挥员。”

血战临泽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先后粉碎了敌人的数路围攻，基本上站稳了脚跟。1935年4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踏上了漫长的征途。长征中，秦基伟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补充师师长和梯队长。

1936年11月上旬，以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为主体，组成了西路军，准备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然而，孤立无援、远离后方的西路军，遭到了西北马家军毁灭性的打击。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1937年元旦，徐向前指挥部队连克临泽、高台两城，就地筹粮休整。第5军军长董振堂率一部进驻高台，政委黄超率两个团驻临泽城外。方面军总供给部、直属队等勤杂部队驻临泽城内。方面军的意图是在这里创建甘北根据地。

这里，曾经是一片古老的战场。在古代，大漠落日映着金戈铁马，人们曾经在这里绘制过历史的辉煌与豪壮。今天，中国工农红军一部用步枪、大刀、长矛、石块又在这里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举。

红军占领高台、临泽等地，插进马家军腹地，使西北诸马为之震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于是，马家军急调重兵前来与红军决战。

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的红军部队，而以大部兵力绕道而进，插入西路军前锋部队孤守的高台地区，向高台发起猛烈

进攻。

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红5军军长董振堂动员所有人员坚持了8天8夜的激烈战斗，打退马家军的几十次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高台城东西两面先后于1月20日拂晓失守。马家军攻进城后，又很快占领了两个小庙制高点。守城红军与敌近距离血战近10个小时。当部队全部阵亡后，董振堂扔掉卷了刃的大刀，砸坏枪支，同两个警卫员一道纵身跳下城墙，慷慨牺牲。

高台失守后，临泽顿失屏障，成了马家军进攻的直接目标。

1937年1月21日，马家军以5个多团的兵力攻打临泽县城。

与马家军数万之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守临泽城内的除了总部机关、直属部队以外，主要的战斗力量居然只有1个连。而且，此城也已被马家军围困多时，周围的红军部队都已先后撤离。

留在城内的最高指挥官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大敌当前，郑义斋连想也没有多想，立即在临泽城内老庄为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有机关各局负责人、妇女独立团团团长李媛泉和政治委员吴富莲、兵工厂厂长、警卫连干部和医院的院长、政委等人参加。蓬头垢面的红军干部们坐了满满一院子。会上，郑义斋庄重宣布：“总部主力正在转移，临泽城只剩下同志们领导的分队。总部命令我们，最少坚守3天，拖住敌人，掩护总部撤退。3天之后自行突围。”

对于与会者来说，这不啻是一声霹雷。除了1个警卫连，剩下的部队差不多都是妇弱病残，同十倍于己而且兵肥马壮的马家军抗衡，能坚持3天吗？

郑义斋当然知道大家的担忧。他说：“同志们知道，我老郑打仗不大在行。我现在指定一名同志担任这次守城指挥。这位同志当过连长、团长、师长，打过不少硬仗。从现在起，城内所有部队都要服从他的指挥！包括我本人在内！”

与会者纷纷抬起头来，目光里有些惊奇。郑部长临阵封将，想必这个人有些手段，但愿他能不负重望，指挥部队守住城池，并有能耐组织大家死里逃生。

几十双眼睛一起投向郑义斋，等待他点出守城之将。

“秦基伟！”郑义斋高声一喊。

“到！”秦基伟应声而起。

“我代表总部首长，任命你为临泽城守城总指挥！”郑义斋神色庄重，一字一顿地宣布道。

“是！”秦基伟也是一脸凛然浩气，郑重接受。

正式任命完毕，郑义斋的嗓门低了下来，目光湿润地说：“秦基伟同志，我把临泽城交给你了，供给部坛坛罐罐一大摊子，还有医院、妇女独立团，全交给你了！你有什么话说吗？”

秦基伟的眼眶也有些热。受命于危难之中，这是一种高度的信任。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何况共产党人要为自己的主义奋斗终身呢！面对着几十双期待、信任的眼睛，秦基伟陡然感到一股无名之火燃烧着自己一腔热血。他本想对大家说几句鼓励的话，作一番动员，可是憋了半天，却憋出了这么一段话来：

“只要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如果突围，老秦殿后！同志们听我的指挥，就是我的好兄弟好姐妹。谁若自行主张，坏我大事，死路一条。大家向部队说明白了，我秦基伟打仗有两支枪，一挺机枪和一把手枪，机枪是打

敌人的，这手枪嘛……”

说到这里，秦基伟略一沉吟，剑眉紧锁，手击桌面，勃然变色：“我的手枪是专打逃兵的！”

这句话说得很重，发聋振聩。与会的机关于部和分队指挥员都感受到了这话语的分量。但他们很快就理解了。决战关头，郑部长把全部家当交给秦基伟是再合适不过了。生死攸关，没有一手硬的，那还能行？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秦基伟双手卡腰，高声发问。

“听清楚了！”回答也是不含糊的。

秦基伟的动员就这么结束了。接下来，他部署了守城计划。他把所有的人员，不分干部战士，不分男女，统一按战斗需要编成班、排、连。以警卫连的两个排为主力，加上妇女独立团的部分兵力，分别把守几个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门楼；另一个排由他本人和警卫连长亲自掌握，作为机动部队。

另外，秦基伟还特别要求兵工厂赶制土炸弹——把炸药盛在玻璃瓶和陶罐里，摔撞即能爆炸。

当天夜里，秦基伟带着机动排沿城墙巡逻。临泽城不大，城墙基本上是坚固的，也很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处就是戈壁滩。

眼下秦基伟必须着力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时马家军已经把小小的临泽城围得铁桶一般。青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骑兵队伍分布有序，在城墙外耀武扬威地游戈。骑兵后面是步兵。

开阔地里，马家军还搭起了不少帐篷。入夜之后，又点燃了许多篝火。那阵势，倒也颇像古代的部落战争。

第二天拂晓，马家军的进攻开始了。一场血战，很快就染红了初升的太阳。马家军先用山炮猛轰城墙。几分钟后，城墙的胸部出现了几个豁口。攻城的士兵很快搭上梯子，挥着马刀往上冲。

守城红军奋起反击，把敌人第一轮冲击打退了。

因马家军摸清了守城部队的底细，当第二轮冲击发起后，敌指挥官扯起喉咙大喊：“弟兄们冲啊！城里都是女红军。冲进临泽城，一人搂一个，先上者先挑！”

还有人在下面拍屁股大叫：“城里有红军的经理部，有金有银，有白面儿，先攻上者多得！”

这几声喊叫，使攻城的士兵陡生蛮劲。有黄金、白银和鸦片，还有女人，那诱惑力当然大了。

马家军拼命地往上冲，红军拼命往下打。秦基伟抱一挺轻机枪，边打边吼：“兔崽子听着，黄金、白银、女人、鸦片都有，老子就是不给你。狗日的想要，先问问我的机关枪答应不答应！”

这是守城红军唯一的机关枪。这位前红军师长确实十分了得，一挺机关枪成了他实行指挥的代言人。他打一阵子换一个地方，一是为了全面督战，二是为了迷惑敌人，造成到处有机枪的假象。

这一仗，足足打了一个上午，马家军终于未能得手。

与临泽保卫战同时，城外也有几股红军队伍在敌人包围中作战。中午时分，一股红军部队杀出重围，报捷似地向临泽县城方向打了一阵枪。马家军不知就里，唯恐遭到红军内外夹击，丢下一大堆尸体，连忙收兵。

夜里，秦基伟把白天战斗的情况向郑义斋作了汇报。郑义斋很满意地说：“打得好。明天是关键的一天，要顶住。再没人增援，夜里就突围。”又说：

“你不要老是抱着机关枪往前头冲。你一阵亡，临泽也就完了。”

秦基伟咧嘴一笑：“怕死者死，不怕死者不死！打仗这玩艺儿就这么回事，你胆子一硬，子弹都绕着你飞！”

郑义斋板下脸说：“一派胡言！你要小心！你死了不要紧，丢了临泽城事大！”

秦基伟立正回答：“郑部长放心，我秦基伟不是豆渣做的。突围之前，我死不掉！”

第二天，马家军又组织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

第三天，战斗进入高潮。整个临泽城，在枪炮声和喊杀声中颤栗。

数次攻城没有得手，马家军的指挥官恼羞成怒，组织了个督战队跟在攻城部队屁股后面，用冲锋枪督战。

秦基伟倒是不慌不忙。为了节省子弹，他要求部队开展近距离射击，并命令妇女独立团和兵工厂全部上阵，主要用大刀和石头作战。

战斗进入最紧张时刻，秦基伟指挥部队将全部土炸弹运上阵地。他亲自做了一个精彩的实战示范，并命令战士们停止反击，静候敌人进攻。等马家军顺着云梯爬上半腰时，他和几名战士各拎着一串土炸弹，走到垛口处，将土炸弹投向马家军，一打一个准。

警卫连的战士守在薄弱环节上，看见敌人架云梯，并不急着打，等敌人靠近了，上多了，一齐出动，用钩子撑住云梯，发一声喊，将云梯掀翻。妇女独立团女兵们手中的石头和土炸弹随之倾泻而下。

战斗中，秦基伟眼见一位负了伤的红军女战士，头缠绷带，双手擎着一块大石头，追打攀城之敌，其状英勇至极。一个马家军军官在30米外举着步枪向这位女战士瞄准，秦基伟眼疾手快，横起机枪一个点射，敌军官当场毙命。

就在这一天的战斗中，秦基伟第二次负伤。一颗子弹打在他的机枪上，又弹起来，削伤了他的4个手指头。他当时毫无察觉，虽然浑身都是血，却只顾抱着机关枪，哪里敌人最密集，就往哪里打。

以后曾经有人问过秦基伟，在临泽战斗中，打死过多少敌人？

他老老实实回答说，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机关枪点了几天名，谁能数得过来啊？

秦基伟指挥部队在临泽坚守了3天，攻城的马家军由猖狂到泄气，最后甚至有点奇怪。他们简直弄不明白，小小的临泽城，里面多是勤杂人员，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居然横竖攻不下来，实在让人费解。

秦基伟心里却很明白：那当然啦，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临泽保卫战，我们没有谁准备还活着，抱一条决心死战，打死拉倒，打不死就继续拼。这就叫置于死地而后生。

打了几天之后，方面军总部来了指示，命令弃城突围。当天夜里，月黑风大，能见度和能听度都很差。三更时分，秦基伟登城瞭望，但见狂风呼啸，大雪漫卷，心中窃喜：真乃天助我也！

当即一个命令传下去，把所有骡马的蹄子绑上棉花，人员和辎重悄悄集中。留下1个班在北面故意弄出一点声响，造成北面突围的假象。待马家军的注意力集中到北面后，秦基伟大手一挥，部队像箭一样钻进苍茫夜色之中，一路疾进，神不知鬼不觉溜之大吉。待马家军发觉，部队已进至南沙滩间。秦基伟率1个班殿后，且战且退，与追敌周旋了一阵子，终于将敌人摆脱，

赶到了倪家营子。

风雪祁连山

秦基伟等人突围赶到倪家营子后，西路军曾一度击溃敌追击部队，并歼灭了马步芳旅的1个宪兵团，缴获了1000多支枪和一批军用物资。按说，此时应该乘胜东进，向河东策应部队靠拢；但是因为沒有接到命令，总部主要领导尤其是陈昌浩顾虑重重，不敢东进，突围的部队只好又返回倪家营子。

就在返回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又围攻上来。连续7个昼夜，方圆十几里的黄沙地带马蹄声碎，烟尘蔽日。马家军的骑兵部队高举马刀，像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涌向红军阵地。

总部眼看部队将被马家铁骑斩尽杀绝，终于下决心组织剩余力量再次突围。突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大批马家军又蜂拥而至。近8000名红军被分割围困在三道流沟里，从3月8日至10日，马家军的马步奎旅和刘呈德团采用“狼驱羊群”的战术，对红军轮番进攻。

在三道流沟，西路军同马家军展开了血战，最后突围出来的，只有千把人。秦基伟是最后一批离开三道流沟的。刚来到祁连山口，又有恶讯传来：著名战将陈海松在梨园口战死。

天幕低垂，乌云翻滚，松涛怒号，雪泪飘洒。

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的最后时刻到来了。所有的战斗团队都被打乱了。根据郑义斋的指示，秦基伟把总部机关包括供给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准备在梨园口摆开阵势再跟马家军拼上一场。阵势刚摆好，马家军便策马而来。秦基伟的“杂牌军”大多使用手枪。手枪打马，既打不准，也打不远。即使打中了，只要不是要害，那马还是纵身向前。打了一阵子，部队就全散了。郑义斋在战斗中身中数弹，倒在秦基伟的身边。

一切都从简了，没有葬礼，没有哀乐，甚至也没有眼泪。秦基伟一边组织大家掩埋这位自己敬重的首长，一边指挥部队交替掩护，向祁连山撤退。

整个西路军全垮了，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没有了建制，也没有了指挥员，真的成了散兵游勇。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三个问题：一是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是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是组织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会议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柄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把西路军全部编成两个支队，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从康龙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龙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秦基伟一行人进到山口，正碰上李先念等人在收容队伍。秦基伟曾经在第30军当过一段时间粮秣处长，认识李先念。

李先念一见到秦基伟就喊：“秦基伟，总部首长都走了，所有人员归我统一指挥，你跟我进祁连山吧！”

秦基伟问：“我们是先进去，还是跟你一起走？”

李先念想了一下说：“你们先进吧，把同志们都找到一起，向东走。”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秦基伟的一生又多了一道曲折。

进山后没走多远，又遇上西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和李卓然，还有保卫局长曾传六。除了他们，还有一批伤员。这几个人都是政工干部，野战条件下独当一面的能力有限，再加上跟着一批伤员，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正犯愁间，送上门来一个百战不死的秦基伟，真是喜出望外。3个人一合计，由张琴秋出面，把秦基伟和第9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何柱成叫到一起，进行了一场很严肃的谈话。

张琴秋说：“秦基伟同志，何柱成同志，你们都看见了，现在形势很严峻……”

秦基伟打断她的话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绕弯子。首长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那好。”张琴秋笑了笑，随即黯下神来说，“现在有20几个伤员，只有我和老李他们几个，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想是不是这样，组织一支游击队，由秦基伟同志担任队长，何柱成同志任政委，负责保护伤员。”

秦基伟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20几个伤员中，有几个认识的，其中有第88师师长熊厚发，此人也是四方面军赫赫有名的战将；另外还有几名团级干部，身上都缠着绷带。他心里不禁敲起了鼓，这样一支队伍，让我怎么个游击法啊？往哪里游，能不能游得出去，全是未知数。

转念一想，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再苦再难，也不能丢下伤员不管啊！张琴秋他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同意！”秦基伟说，转过头又问何柱成：“你呢？”

何柱成看了看秦基伟，又看了看张琴秋，张了张嘴：“那好吧！”

心头一块巨石落了地，张琴秋仔细打量这两个人，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她一手拉住一个人的手，连声说：“谢谢啦，谢谢啦！你们帮了大忙！”

进了祁连山，情况就更糟了，地上两尺多厚的积雪，树上3尺多长的冰凌。冰天雪地，别说棉衣，单衣还是破的。战斗时又跑又跳，根本不觉得冷。战斗一停下来，感觉就不同了。手一挨上石头就冻住了，拿下来得粘掉一层皮。深山老林里，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连野菜也吃不上，也没有地图，更谈不上指北针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秦基伟和何柱成领着30多个伤残“游击队员”，不仅空着肚子，还几乎是光着膀子。在雪山里东游西荡转了一个礼拜，转得骨头发软眼睛发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喇嘛庙，进去后东翻西翻差不多挖地三尺，才找到一点大米。连忙添水架火，煮上一锅稀饭。

不多一会儿，水就开了，雪白的米花随着沸腾的开水上下翻滚，奇异的米香弥漫了寺院小屋。

好香啊，好暖啊！秦基伟等人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连日来，又累又乏，又困又冷，终于有了一间屋子，终于有了一锅稀饭，简直相当于登上了天堂。

尽管累得要死，可谁也没有睡意，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看着那锅直冒热气的稀饭。灶火烧得通红，满屋子暖洋洋的。

倒是秦基伟，此刻还真的犯了困。参加红军七八年了，大小战斗不知道打过多少次，身边的战友一批批地倒下了。七八年的风风雨雨，七八年的拼拼杀杀，当初一起参加红军的小伙伴们已不知下落，有些人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红军的生活，就像一首悲壮的歌，每一个音符，都滴着热血。革命革

到现在，才革出了一点滋味，才知道革命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最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相信，这是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恍恍惚惚中，他看见郑义斋部长微笑着向他走来。那是会宁会师后的一个晚上。那时候，传说红军要跟国民党休战，联手抗日，他想不通，去找郑义斋发牢骚。两个人聊了一夜。郑部长问他，革命成功后，打算做什么。他当时回答，革命成功后，他要回到鄂豫皖去做粮食工作，让乡亲们都吃饱肚子。……哦，粮食啊粮食，这通红的火，这白色的雾，这翻滚沸腾的大米稀饭，真香啊……

突然，一丝轻微而异常的响声拨动了秦基伟似睡非睡的心弦。一个稍纵即逝的意念像箭一样射中了他的神经末梢。

他倏然睁开双眼，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双枪早已擎在手中，快慢机大嘴张开。

“老何！”他猛喊一声。

“稀饭好了，大家拿缸子来！”何柱成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分稀饭。

“等等，有情况！”秦基伟的脸绷得紧紧的，“准备战斗！”

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枪支都上了膛。

秦基伟说：“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先出门探路。如果有情况，肯定被包围了。哪里敌人多我朝哪里打，我把敌人引开。老何，你领着伤员从左边山垭口撤出去。”

说完，手一挥，跟上去几个人，猫腰潜出门外。

门外是一片漆黑。

路是早就看好的了，警戒也是早就放出去的。这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块有利地形，秦基伟的心中都是有数的。几个人顺着石壁向外摸，在离安有暗哨的那个石坎前十来步处，秦基伟停下了，向后摆摆手，然后拣起一个石子扔了过去。

没有回声。

他又拣了一块稍大的石子扔过去。

终于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心里明白了。刚才在寺庙里他隐约听见了一声闷响，那声音极轻极轻，轻得像一缕微风，但还是没有瞒过他的耳朵。事实证明，他的敏感是可靠的。潜伏哨显然已经被杀害了，寺院已经被包围

他迅速向跟上来的人交代一番，兵分两处，一处作掩护状，一处作突围状；并且指定了路线，准备跳出圈外吸引敌人的火力。

一切安排妥当后，两个战斗小组开始向外运动。

“叭——”一声清脆的枪声撕裂了祁连山寒冷的夜空。

他看清了这声枪响的闪光处，抬手还了一枪。接着，按他预先安排的计策，一个红军伤号大声叫起来：“团长，有人打枪！”

另一名伤号也喊：“不好，有敌人！我们被包围了！”

秦基伟则装腔作势地喊：“镇静，慌什么慌！刘连长，你带两个排在这里给我顶住！”

姓刘的伤员应声而答：“二排三排，就地抢占有利地形！”

这场空城计演得有声有色。刘伤号等人跟马家军接上火后，秦基伟又带着几个人朝敌包围圈方向开了几枪，然后向东一路跑去，边跑边喊，大造声

势。

马家军则是将信将疑，疑的是红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少，而眼前这股红军要突围，则是确凿无疑了。于是，收拢队伍，纷纷围了过来。

枪声，给寺庙内的伤员带来了信号。身负重伤的熊厚发侧耳听了听，对何柱成说：“老秦他们正在吸引敌人，我们得赶快撤！”

何柱成看看一锅雪白的稀饭，心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一跺脚，骂了句：“狗日的马家军，连口稀饭都不让吃！”飞起一脚，将锅踢翻，大刀一拔，喊了声：“走！”20几个人鱼贯离开了小屋。

山的南面，枪声如爆豆。好在夜黑路险，马家军的包围部署尚未完善；再加上这些兵平日作战都是骑马，下马上山，在这崎岖小道跟红军捉迷藏，显得十分笨拙。而打游击对于秦基伟等人来说，则是如鱼得水。他们上窜下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交替掩护，不仅使何柱成等人得以脱险，他们自己最后也撤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一仗下来，刚刚成立的游击队又被打散了，秦基伟的身边只剩下3个人。

走上新的征途

月光从牢房狭小的窗缝里射进来，慢慢地挑开了秦基伟沉重的眼皮。

他茫然四顾，黑咕隆咚的，唯有远天的月亮，静谧而且亮丽。月亮背后的天幕，高远纯静。恍惚间，秦基伟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境界。在故乡，在盐店河畔，在自家对面那开着映山红的山岗上，也有这样又大又亮的月，小伙伴们就在这又大又亮的月下玩着一百零八将占山为王的的游戏……

可是，他哪里知道，这轮明月，已远离故土数千里。此乃塞外西域之月了。直到一声断喝“干什么！”传过来，他才恍有所悟。如今他已非自由身，一战失着，身陷囹圄，成了阶下囚。

他撑起身，用手抠了抠墙。墙是砖墙，但接缝处土质已松。他渐渐地抠出一把土末，送到鼻子下闻了闻。没错，这是西北的黄土。

他已经记不清是昨天还是前天，抑或是更早些时候的那个下午，他和3名游击队员在祁连山上冻饿交加，再也无法坚持了。他们下山寻着一户牧民，买了一只羊煮了，天堂赴宴般地饱餐了一通。最后一根骨头啃光后，就再也没有力气了。随后，他们围着那盆通红的干牛粪火塘，东倒西歪地进入了美妙的梦乡。

他们委实太困太乏了，在祁连山上若干昼夜，别说睡，眼皮合久了，也会冻在一起睁不开。此刻的这几位红军战士，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不在乎了。终于吃饱之后，他们唯一的需要是睡觉，是把数日来被寒冷、饥饿和疲乏折磨得行将崩溃的神经彻底温暖过来，充实起来，松弛起来。

这一觉睡得好香啊！感觉中好像睡过了十年二十年。

醒来已是第二天凌晨。他们几乎是被一阵山摇地动的喊声擂醒的。前来捕捉他们的马家军十分惊奇：这几个红军好能睡，把枪从他们怀里拽出来他们连动都不动。没有比这更好对付的人了。

秦基伟睁开了眼睛，但很快又闭上了。他感觉到不对劲儿，又睁开，使劲地眨了眨眼，这才发现，乌黑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门。

他心中骤然一紧：糟糕，当俘虏了。

接着，再一个意念袭过来：当俘虏还行？拼他娘的！

于是，他想一个鹞子翻身，伸手夺枪。岂料双臂已被反扭，哪容半点松动。既然动弹不得，无奈中只有破口大骂的份。

“狗日的马家军，有种你砍了我，砍了老子，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反正是到手的猎物，马家军官兵倒是不急不恼，慢慢腾腾，从从容容地理着绳子，捆绑俘虏的手脚。

另外几名被俘的同志也跟着大骂。大家明白，身陷此境，逃脱是不大可能了。不甘被擒，惟求速死。

秦基伟一边蹦跶一边高声叫嚷：“你们听着，你不杀我，要是跑脱了我，砍你十个八个的不费我事！”

一个士兵照他屁股砸了一枪，喝道：“南蛮子，逞什么能！再蹦我剁掉你的脚脖子。”

秦基伟瞅准时机，往前趑趄一步，弯腰拱背，前腿弓后腿绷，照那个揍他屁股的士兵的小肚子撞去，将那家伙撞个四爪朝天。那士兵脑袋碰在石坎上，顿时血流如注。

马家军的军官火了，骂了声极其肮脏的西北俚语，拎起马鞭子纵身扑过来，照秦基伟劈头盖脸一阵抽打。

马鞭蘸着鲜血在空中飞舞。马家军的军官累得气喘咻咻，也无法制止秦基伟一声高过一声的怒骂——直到他完全昏迷为止。

现在，秦基伟终于在西北高远的月色中苏醒了。

动一动物体，浑身火烧油煎般地疼痛。无数道马鞭抽下的血痕，就像无数条细而紧箍在身的毒蛇。

他开始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

胜败乃兵家常事，生擒活俘也是交战双方经常遇到的事。对他来说，生与死，都是无所谓的事了；重要的是，如果死了，最后一滴血是不是为革命而流？如果活着，会不会损害革命，怎样才能接上继续革命的茬？

那一夜，他想得好苦好苦。投身革命七八年了，脑子里装的全是两个字——革命。对于受过特殊教育的红军战士来说，革命高于一切。

天亮了，看守送来一土钵子裸麦稀粥。他伸出舌头舔舔，粥是咸的，心想伙食还挺好。

转眼间，那一土钵子稀粥被他喝了个底儿朝天。喝完粥，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放风。天哪！那么多熟人，都是四方面军的，有干部，有战士；有男的，有女的；有伤的，有残的。

这一下，他激动了。他原以为就他自己不幸落入敌手，万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患难战友。他心里顿时一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这么多人，只要活着，找机会逃出去，编1个营1个团都没问题。再说，长征的时候就明确了，如果打散了，就地发动武装。红军就有这个能耐，一个红军战士就是一粒火种，一粒火种就能燃起一片燎原之火。

过了几天，见他没有寻死闹事的表现，看守的马家军便取消了他的单间“优惠”，枪托子抵着屁股，把他撵到了一个大马厩里。那里面住着几十号人。

人一多，秦基伟就如鱼得水了。没过几天，原先认识的，混得更熟了；原先不熟的，也混熟了。他这才知道，他们被俘到这里，还是不幸中的万幸。俘获他们的是马禄的队伍。马禄在同西路军作战时，曾有一次被包围，几近

全军覆没。西路军首长从抗日大局出发，向马禄晓以大义，双方达成默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放了马禄一条生路。马禄出于感恩，或许本身对中国革命有同情倾向，所以才没杀红军俘虏，而且伙食还搞得不错。若是被别的马家军俘去，那就惨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这期间，在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委徐立清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张掖狱中支部，成员有卜盛光、徐立清、秦基伟、方强等人。支部的工作中心很简单也很明确，就两条：一是教育全体被俘的红军官兵，保持革命气节，誓死不当叛徒。如果被敌人杀害，要喊口号，要让群众听到红军的声音，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杀了红军多少人，待以后红军的队伍来了收尸报仇。二是作好暴动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要组织大家逃跑，能跑多少跑多少。跑出去后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然后向东寻找红军主力，再赴抗日战场。

在西北马家军监狱里的这些共产党人的信念是坚定的，他们为抗日而求生的愿望也是现实的。当时，除了西北和其他一些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中华广袤的土地上，抗日的烽火已经形成冲天之势。

随着抗日形势的日益高涨，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在抗日的大局下发生着积极而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在押的政治犯是十分有利的。虽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根本愿望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政治犯们的待遇确实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这种改善，秦基伟有很深的体会。

红军也不是青一色的英雄好汉，也有懦夫，也有孬种。被俘之初，一个叛徒认出了秦基伟，对马家军说：“那个麻子团长好凶噢，过草地时又打人又骂人。”

秦基伟心想：小叛徒，大约是长征中挨过我的训，记仇记到这里了。你说我是团长我就是团长啦？脑子一转，点子就有了。

敌人审讯时，把桌子拍得咚咚响，说他不老实，明明是红军团长，居然瞒起来，谎报自己是伙夫。

秦基伟不慌不忙，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实话说吧，我当过连长，但真的没当过团长。我当连长时负伤了，不能作战，便让我训练新兵。一大群新兵在一起，名义上叫新兵团，其实也没个编制，没个委任状，怎么能算团长呢？”

审讯者见秦基伟说得振振有词，滴水不漏，起初是半信半疑，接着就信大于疑，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又出了个大一点的叛徒，不供秦基伟是团长、师长，也不供他是总供给部的处长、梯队长，而供他是徐向前手下的参谋。这一下，知名度大大提高了。谁不知道徐向前呀？在徐向前手下当参谋，那是高参啦，可了不得！

没准这叛徒还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徐向前的高参在监狱里。”这话很快便传开了。马家军很重视，这么一个大人物，可不能有什么闪失。万一国共合作成功了，徐向前来要他的高参，好歹得有个交代。这以后，敌人对秦基伟打是不敢了，骂也很少了。伙食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每天两大钵子青棵麦盐巴粥。

秦基伟等人在凉州坐了40多天牢。由于中共强烈要求放人，马家军只好把这批战俘送往兰州，交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

在兰州住了一周多，狱中的同志们也渐渐地知道了外面的情况：国共两党已开始谈判。中共在兰州、西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正在同国民党交涉，

要把关押在西北监狱里的红军官兵全部要回，送往延安。

不久，果然有了眉目，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员都送往延安。国民党采取了两面手法，要把红军干部送到南京感化院去“换脑子”。恰在这次转送途中，狱中支部周密部署，多数同志都得以逃脱。秦基伟逃脱后，辗转找到援西军司令部。后来，援西军和西路军余部整编成八路军第129师，秦基伟从此走上抗日战场，成为声震半壁太行的一员抗日将领。

军中儒将莫文骅

王扶犁

莫文骅（1910～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西南宁人。191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参谋、辎重队长、连长、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和主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为培养大批抗战干部和保卫党中央、陕甘宁边区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辽东军区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成为我军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后任纵队、军和兵团政委，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和南下作战，一直打到广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南宁市委书记兼市长、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参与领导广西的恢复建设和剿匪斗争。1951年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4～1965年，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加强我军政治理论教育和政治建设，培养中高级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1975年任军委装甲兵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有《莫文骅回忆录》、《百色风暴》、《莫文骅诗词选》、《二十年打个来回》等。他南北征战20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他长期担任我军各级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对我军政治工作多有建树。他办学十余年，为我军院校教育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博学多才，兼资文武，素有军中儒将之称，本文采撷的是他在解放东北战场的历史片断。

进东北，抢天下

1945年9月上旬，河南林县。在太行崇山峻岭中的一条崎岖山路上，一行4人正策马疾行。这是八路军南下第3支队副政委莫文骅和他的秘书及警卫人员。他们是随部队从豫北到林县时，听说被中央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林彪，已从延安飞抵太行转赴山东的消息后，为追赶林彪而来。

莫文骅追赶林彪去山东，是他们先前约下的事情。莫文骅与林彪还是比较熟悉的。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彪任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莫文骅是“红大”党总支书记，后来毛泽东主席让林彪、刘亚楼、莫文骅3人在延安继续办“红大”（后改称“抗大”）。林彪是校长，刘亚楼是教育长（后改为训练部长），莫文骅是政治部主任，3人一起共事多年。“七七”事变后，林彪离开“抗大”去前线。平型关大捷后，他还给莫文骅、刘亚楼来信，介绍此战情况和他总结出的十条作战经验。1938年，莫文骅离开“抗大”，先后调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党的“七大”前，林彪曾对莫文骅说，他准备去山东工作，并希望莫文骅也能一起去。在延安整整工作10年的莫文骅很想去前线，便答应了他。可“七大”闭幕后，中央决定莫文骅为八路军南下第3支队副政委，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南下第3支队挺进河南漯河时，日本投降，故中央电令他们停止南下，北进冀热辽。莫文骅听说林彪已从延安去山东，心想，现已不再南下，且来到山东边境，不如就此去山东。他给中央发电请示。中央复电说，随队北上或去山东，由他自定。这样，莫文骅带上身边工作人员便一路追赶而来。

出了太行山，他们一路向东，直奔濮阳。远山碧碧，草木葱葱，天高云阔，完全没有了群山阻隔那种沉闷之感。到了濮阳，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告

诉他说，林彪已奉命转向北往冀察热辽去了。莫文骅遂向北追去。他们每天以百里的速度追赶。因林彪的行动保密，追了几天，尚未见踪影。

到了冀中南宫附近，遇见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组织部长宋任穷，他们见到莫文骅后惊讶地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同志曾电报中央，要你到冀鲁豫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也同意了，你还不知道？”“不知道啊。”莫文骅随即将自己的近况作了简要说明。“你现在返回已不可能了，也不必要了，还是去东北与蒋介石抢天下吧！你若同意，由我们报告中央。”

这样，莫文骅按照薄一波、宋任穷的意见，继续策马北上。

他们本想沿北宁线出山海关，但因美军为从海路运输国民党部队而占领了秦皇岛，遂改道去承德。路上他们碰上一批开往东北的干部队伍，有男有女，有步行的，也有坐大车赶路的，一派向东北大进军的景象。形势的发展使莫文骅深受鼓舞。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同样令他高兴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亦有了较大发展，已远非红军时期可比。现在进军东北，与蒋介石抢天下，在东北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上将会有一番大的作为，大的发展。想到今后的斗争，莫文骅兴奋不已。一路上，他们马不停蹄，昼行夜宿，经天津附近，过热河，于10月下旬到达承德。后由承德改乘火车出关。进入东北后，莫文骅先是担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很快又调到刚刚成立的辽东（南满）军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开始，辽东军区驻在安东（今丹东）。萧华任军区司令兼政委及省委书记，江华任军区第二政委兼省委副书记，莫文骅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瑞林任参谋处长。军区部队基本上是从山东渡海过来的八路军第115师的3万多人，是经过八年抗战的老部队。

辽东军区的范围是从沈阳以南，大连以北（辽东半岛尚为苏军占领），东至长白山区。南满根据地工业城市多，本是东北工业和交通最发达的地区；但由于日伪14年的残酷统治和掠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苏军出兵东北后，几乎把工厂的主要机械设备都作为战利品搬运到了苏联。我军初到东北时，工厂停工，发电厂不能正常发电，火车经常要靠烧木柴。

南满根据地与朝鲜仅一江相隔。日本投降前夕，日伪反动势力多集中在南满，遗留下大量散兵游勇、宪兵警察、特务汉奸。因此这一带社会环境复杂，匪患猖獗。为站稳脚跟，安定秩序，尽快恢复生产，军区组织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以肃清匪特；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扩军运动，壮大队伍。

莫文骅到南满后，首先组建了军区政治部，由李毅担任秘书长，王淮湘任组织科长，刘汉任宣传科长。政治部承担起收容遣送日本战俘、难民和教育伪军及吸收其参加我军的工作，同时负责接待大批从关内渡海经安东到东北的我军部队和干部。

此时，国民党也在加紧调兵遣将，同我争夺东北。他们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在美国支援下大举进攻东北。至11月，已先后攻占山海关和锦州，并沿北宁线向沈阳方向进犯。1946年1月，辽东军区从安东曾暂撤至本溪。这时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曾克林、唐凯部编入辽东军区。军区部队整编成两个纵队（第3、4纵队）、1个保安旅和3个军分区。

2月初，国民党军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2月中旬，敌北路军的第13军第89师之一部进至彰武至法库间的秀水河子地区，被我东北

联军围歼 5 个营 1600 余人。就在辽西我军于秀水河子打了第一个歼灭战时，辽东军区在沙岭对敌新 6 军的反击却没有奏效。军区使用主力部队打敌 1 个团另 1 个营，兵力数倍于敌，激战 3 天，没能拿下。

在主力打沙岭时，莫文骅和曾克林率 1 个师进至辽中方向，打敌增援部队，曾与敌新 6 军第 22 师的 1 个团遭遇。经过激战，他们歼敌 1 个连，俘敌数十名。

沙岭战斗的失利并没有挫伤部队的斗志，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地抵抗着国民党军向东北腹地的猖狂进攻。3 月 13 日国民党军占领沈阳后，乘苏军撤退之机，又集中 5 个军的兵力分别向沈阳以北的四平和沈阳以南的本溪地区进犯。敌军南攻本溪，北犯四平，而四平是他们用兵的重点。南满部队遂投入了保卫本溪的战斗。从 3 月下旬至 5 月初，辽东军区部队连续 3 次进行了保卫本溪作战，共毙、伤、俘敌副军长以下万余人，给进犯蒋军以重创，有力地配合了北满部队的四平保卫战。

按照毛泽东“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段，选择较大城市，狠狠打击敌人，迟滞敌人向北满进攻，或把进攻的敌人拖回去”的指示，辽东军区于 5 月下旬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第 4 纵队和地方武装于 25 日攻克鞍山，歼灭国民党第 60 军第 184 师 1 个团，接着乘胜南下，解放海城、大石桥。在此形势下，海城守敌第 184 师师长潘朔瑞，率师部和 1 个团 2700 余人火线起义，发表了反内战和起义的通电宣言。海城起义，是东北战场上我军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首次创造的敌 1 个师火线起义的成功范例。鞍海战役的胜利，促使第 184 师火线起义，参战部队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首长和辽东军区首长的嘉奖。

第 184 师起义后，莫文骅代表辽东军区去海城迎接起义部队。海城起义，是东北战场上我军处于战略防御的困难时期发生的国民党军首次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莫文骅高度评价和赞扬了潘朔瑞将军和起义官兵的正义之举，向他们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和慰问，并将起义部队迎接到安东附近整训。

从 3 月以来，向东北腹地大举进攻的国民党军，虽然接连遭到民主联军顽强反击，但并没有停止进攻势头。尤其敌在四平争夺战得手之后，气焰嚣张，长驱直入，一路北进，先后攻占了公主岭、长春、吉林及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时期，是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最为神气的时候。

不过，国民党军表面上取得的胜利，也使自己背上了包袱，为巩固其占领区，不得不分兵把守。由于战线拉长，敌兵力不足的困难明显暴露，已无力向北满、南满同时发动进攻。他们一改“长驱直入，全面进攻”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重点向我南满解放区展开进攻，企图首先截断我南北满解放区的联系，摧毁南满根据地，解除其北进的后顾之忧，然后转兵北上，夺取北满，最终占领全东北。

10 月，敌调整兵力，集中了 8 个师约 10 万余人，分三路向我南满进犯，重点扑向辽东军区所在地安东。

在敌强我弱、敌重兵步步紧逼的形势下，辽东军区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丢掉包袱，保存力量，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决定暂时放弃安东，把军区机关转移到临江。军区后勤仓库工厂、野战医院和一批伤病员也撤至长白山脚下靠近鸭绿江边的地方。

10 月初，为反击国民党军新的进攻，南满第 3 纵队插向敌人占领的中长

路，在远程奔袭中突然包围了西丰县城，经一日两夜激战，全歼守敌新6军第207师工兵团及两个营的援兵。接着第3纵队又在清河以北、大庙沟以南和开源以南、中固以北的铁路线上破路炸桥，将中长铁路拦腰斩断，使敌南北交通中断，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北满我军作战。

10月下旬，莫文骅和曾克林来到赛马，向第4纵队传达了军区的决定，指示部队在后撤中集中兵力，实行机动防御，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时机歼敌一路或一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这次进攻南满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除第184师（重新组建）残敌外，全系蒋军之嫡系精锐。敌中路主力第52军第25师曾参加过缅甸远征军作战。该师系半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自吹为“能征惯战”的“千里驹”师。骄横的第25师根本不把民主联军放在眼里，横冲直撞，猖狂进犯，一路跟在第4纵队屁股后面紧追不舍，企图与我主力决战。10月24日，敌第25师侵占赛马集后，留下第74团的两个营防守，师主力继续向凤城急进。当固守赛马集的敌第74团团团长梁济民发现附近地区我军兵力较大，急电第25师师长李正谊不要前进，迅速回援时，遭李正谊回电斥责：固守弹丸之地，还未与敌接触，不宜先行呼吁。由胡奇才、彭嘉庆指挥的第4纵队抓住敌第25师狂妄骄横、孤军冒进和屡屡指挥判断失误的弱点，决心采取行动，相机歼敌。他们以1个团与敌保持接触，调动敌人，诱敌深入，迫敌就范；同时集中兵力，待机破敌。当敌人被诱入新开岭地域后，第4纵队集中了8个团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对敌形成合围。已陷入包围之中的敌第25师摆出决战架式，欲与我作困兽之斗。该师向沈阳呼叫：“只要炮弹（空投），不要援兵！”于是，“千里驹”的末日来临了。经3天激战，敌第25师全部被我歼灭。傲慢的师长李正谊剃了光头，化装成伙夫企图逃跑，也被我活捉。

第25师被全歼，敌人进攻锐气严重受挫，遂由轻我开始变为怕我。国民党军患恐惧症，各路进攻亦由快变慢，由分散冒进变为猬集缓进。新开岭歼灭战胜利的当天，有“虎师”之称的敌新6军第22师已进至距离新开岭仅30华里的双岭子，徘徊3天不敢前进。敌东北“剿总”杜聿明对第25师被歼痛心疾首。他在给新1军第38师校级以上军官训话时说：“今天我们应切戒骄傲，对共军战力万不可存轻视心理。这次25师疏忽冒进……以致全部被歼灭。25师这样好的部队，如此下场真令人痛心至极！”

新开岭战役，首创东北我军一次作战全歼敌1个整师的辉煌战绩，共歼敌8900余人，振奋了军心民心，迟滞了敌人对临江地区的进攻，为辽东军区机关和伤员、物资的转移及部队的调整，争取了时间。新开岭战役结束后第二天，党中央、中央军委即来电嘉奖。延安《解放日报》于11月5日发表了题为《第25师的毁灭》的祝捷社论，辽东军区首长萧华、江华、莫文骅、吴克华也电令嘉奖，对辽东部队首次大捷，予以热烈祝贺。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敌人的整个进攻计划，掩护了辽东军区机关的安全转移，但并没有改变南满我军的被动局面。经过短期休整的国民党军，于1946年12月中旬又对南满我军发动了重点进攻。这时，南满根据地只剩下位于长白山麓的临江、抚松、蒙江、长白4县。在这块巴掌大的区域内，有一座大山（长白山），两条大沟（一通抚松，一通长白），纵横不过17.5千米。地盘狭窄，深山老林，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缺少回旋余地。这里地瘠物乏，气候严寒，村庄稀少，人口不过23万，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生存条件差。军区和省委机关及主力部队都挤在这山沟沟里。在—40的严冬，大

雪封山，部队经常露宿在冰雪之中。吃饭更成了问题，粮食供应困难，开始还能吃上贴饼子，不久磨面已来不及了，只能吃大碴子。后来，碾大碴子也来不及了，只好将整粒的玉米煮来吃。部队装备不足，兵员无着，衣食住都成了大问题。加之敌重兵压来，情况非常险恶。

正当南满斗争形势严峻和极端困难的时候，为了加强对南满斗争的统一领导，东北局派陈云、萧劲光来到辽东，在临江成立了辽东分局，统一领导南满根据地党政军的工作。陈云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军区司令，萧华改任军区副司令兼副政委，程世才任副司令，吴克华任军区参谋长，莫文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唐凯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敌人大举进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为了应付最坏的局面，辽东军区已下达了主力北撤的预令，部队准备好了过山林用的斧头、锯子、绳子和爬犁、干粮等。

1946年12月11日，辽东军区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研究了今后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放弃南满，转移北满。莫文骅、韩先楚、彭嘉庆等同志则主张坚持南满根据地，其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如放弃南满北撤，正中敌“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坚持南满，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等于在敌人屁股后面吊个大冬瓜，牵制敌人主力，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利，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敌人虽强，但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南满我军已有相当实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第4纵队全歼敌第25师已充分显示了部队的战斗力。莫文骅在发言中还讲道：“若把队伍拉到东满，要经过深山老林，很难通过。即便去了，敌人也会尾追而至。再撤北满，敌人再追至北满。这不过是水涨船高而已，是下策。”

会议讨论了两天，对去留争论很激烈。

14日，连夜从临江赶来的陈云主持会议。陈云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权衡去与留的利弊，提出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意义和可能性。他说：闯进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其牛头是向着北满的，尾巴在南满。若我们松开牛尾巴，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难保。我们抓住了牛尾巴，它就进退两难。而要抓住其尾巴，是比较费劲的，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从全局来说，这个损失要比放弃南满的损失小得多。大家要我来拍板就是坚持南满，一个人都不走，留下来打。他的讲话坚定果断，份量很重，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会议最后确定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安东、辽东3个军分区所辖的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

这次会议，在南满斗争最困难的时期，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作出了正确而重大的战略决策，解决了部队向何处去的问题，对挽救南满危局，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最后决胜东北，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在部队思想混乱的情况下，打破了“保存实力”的退却思想，解决了部队干部的思想顾虑，统一了思想，成为南满部队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思想上的转折点。

初期的东北战场，敌强我弱，战斗频仍，环境艰苦，部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干部战士思想混乱，认识并不统一。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派遣大批部队和干部先机进入东北，建

立东北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历史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初入东北，我们的工作方针是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在一段时期里大家思想上并不很清楚。国民党军进攻东北后，辽东军区从安东撤往本溪时，不少人留恋城市，舍不得坛坛罐罐，把沙发都搬进了山沟。这反映出干部思想上不愿让出大城市，怕艰苦，图安乐。八年抗战胜利了，大家都希望我军能独占东北，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足。当然，局势的发展有个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个过程。随着东北局势的明朗和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的明确，大家的思想也逐渐统一和明确起来。

再有，打准的问题似乎也成了问号。抗战时有个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当时国民党占有合法地位，苏军把大城市交给了蒋介石。群众中也存有视国民党为正统的思想，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的说法，这对部队也有影响。

1946年初的沙岭一战，我军以优势兵力却未能取胜，除了组织指挥、战术技术等原因外，也暴露出轻敌、厌战等思想问题。战前军区领导提出了“这是和平前的最后一仗”的口号，表现出对和谈停战的盲目性。军区主力部队是从山东渡海过来的老部队，抗战时部队唱的歌词是“打完鬼子就回家”。现在打败了鬼子不回家，又来到关外打仗，思想弯子确实很大。新部队大都是刚参军的农民，也有不少是伪军改编过来的，家乡观念重，不愿离家远出敌后。在沙岭战斗中，第20团配合主力担任打援任务，其一个新建连队在一片坟地后面与敌人交火，距敌只有一二百米，地形十分有利，火力也很密集，可就是没见打倒几个敌人。团营领导都迷惑不解，这个连队虽是新建的，但大都是国民党军的老兵，射击技术都不错，为什么对鼻子底下的敌人都打不着呢？原来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思想在作怪，好多人打仗时把枪口抬起来朝天放，怕打着“自己人”。

在国民党军向东北大举进犯，我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双方争夺东北之战不可避免的客观形势下，在打与和的问题上，不少人思想混乱，对和平仍存幻想。

国民党利用和谈之机，把主力调到东北战场，这使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非常不安，但更让他担心的是部队在和与打的问题上的思想混乱。在四平撤退时他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

在抗战转为内战的新形势下，部队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反映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已成为政治工作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怎样把思想统一起来，把部队的情绪调动起来，巩固和扩大部队，这是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一个时期里思考最多的问题。

部队教育的方向

在南满斗争最艰难的岁月里，部队政治工作也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辽东军区部队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创造出诉苦、练兵和战评、立功运动等生动有效的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形式，大大活跃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南满部队的诉苦运动是第3纵队首先开展起来的。南满部队的新成份比较多，俘虏过来的伪军数量不少，有的部队多达三分之一。这些出身贫苦的

俘虏兵，受尽了日寇铁蹄蹂躏之苦，饱尝了当亡国奴的苦难。他们最初是控诉日寇奴役东北人民的种种罪行，后来发展到控诉军阀、官僚、地主和豪绅的压榨。把日本侵略者和官僚地主的罪行放在一起控诉，激发了大家的民族仇、阶级恨。也有的部队把地方群众请进来诉苦。一次，在转移中，第19团第2连第1班住进一户老乡家。一进门，战士们便惊呆了：炕上躺着生病的老大爷，盖着“更生布”；50多岁的老大娘上身一丝不挂，下身只遮了块麻袋片；两个大点的姑娘，穿的是缝不到一起的烂布衫；5个小点的孩子光着屁股挤在一起。这悲惨的景象揪着战士们的心。一位战士心酸地说：“老班长，我脱件衣服给他们，上级不会批评吧？”“不会的，我也送一件。”班长一边解衣扣，一边说。这时，指导员进来催大家烫脚，见刚解放过来的一位战士从背包里抽出仅有的一双鞋，递给了老乡。指导员深受启发，决定用乡亲们的苦，以苦引苦，在连队开展诉苦教育。

起初部队的诉苦教育还是自发零星地进行，尚未形成群众性的教育运动。直到“四保临江”作战中出现了诉苦典型房天静由后进变先进、杀敌立大功的事迹，才引起了各级重视。

第20团第3营第9连战士房天静，山东淄博人，15岁就给日本鬼子抓到本溪煤矿当劳工，经常遭鬼子和把头打骂，受尽了苦难。后来全家逃荒闯关东，卖了两个弟弟当盘缠。母亲千里迢迢来看儿子，但见面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赶走了。她想儿心切，忧虑成疾，不久便去世了。父亲得了霍乱病，不能下矿挖煤，被日本鬼子用镐把活活地打死。日寇投降后，房天静在本溪参加了军。由于思想落后，常讲怪话，发牢骚，顶撞领导，是连里有名的后进战士。连里诉苦时，他一边痛哭控诉，一边痛心地说：“指导员，我真混，我忘了本。在沙岭子作战时我朝天开枪，没有阶级观念，你处分我吧！今后我一定好好干，替妈妈报仇！”经过诉苦，房天静转变了。在热水河子战斗中，他机智果敢，猛打猛冲，单人单枪冲入敌群，击溃1个排，俘获1个班，首创孤胆歼敌1个班的战例，荣立特等功，被纵队授予“孤胆英雄”光荣称号。

第9连诉苦教育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涌现出24个积极分子，连队面貌一新。师、团领导帮助第9连总结了诉苦教育“吐苦水”、“挖苦根”、“查忘本”、“下决心”的4步基本做法。纵队宣传队还将房天静的事迹编成5幕17场名为《复仇立功》的歌剧，巡回演出，配合教育。

辽东军区对第9连的经验极为重视。莫文骅主任亲自下到第7师调查诉苦教育情况，对第9连的经验给予肯定。他认为，诉苦教育抓住了阶级教育这个中心，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是解放战争新时期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军区政治部于1947年3月下达指示，号召立功与诉苦相结合。《辽东日报》重点宣传推广了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做法和经验。1947年夏军区政工会议上，专题介绍了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并对诉苦教育进行了总结，使诉苦运动迅速在全区部队、学校、工厂、医院开展起来。干部战士人人“倒苦水”，“挖苦根”，“算剥削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自己，使诉苦教育形成了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许多干部战士都有本血泪账，有的家破人亡，沦为乞丐；有的还不起阎王债，卖儿卖女。当干部战士讲到亲人惨遭迫害时，悲痛欲绝，放声恸哭。不少连队还为干部战士的受害亲人设灵堂，进行祭奠和诉苦，开追悼会，气氛悲愤，情绪激昂，有效地激发起大家的阶级仇和民族恨。

部队诉苦中激发出来的战斗热情，在“四保临江”作战中发挥出来了。东北严冬，天寒地冻，哈气成冰。在一40的奇寒中，部队行军休息时要不停地跺脚，不然脚就会冻在地上。夜晚在山沟里露营，战士们拣来树枝搭起窝棚，在里面垫上干草，睡在里面四处透风。拣不到树枝的，只能用积雪垒起雪墙挡风，再在地上铺些干草，围着篝火取暖睡觉。在“四保临江”战役中的108个昼夜中，有的连队仅仅住过28天房子，其余全是在风雪中露营。不少部队一连十几天爬冰卧雪，冻伤减员很多。严寒威胁着部队，粮食、被装供应非常困难，御寒物资奇缺，不少部队没有棉衣、棉帽、手套，战士们把草绑在身上御寒。部队杀猪，将皮剥下来扎几个眼当鞋穿。有的连队把毯子剪成小块，分给战士包脚。部队到了山区没有油盐，吃的是老乡家的酸菜水。玉米面窝头冻得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牙咬不动，就用枪托砸碎，再放到嘴里慢慢地咽。天寒，冻得枪栓拉不开，撞针也冻缩了，枪打不响，战士们就合盖一条被子，抽出一条被子来作枪套。在那异常艰苦的日子里，严寒并没有冻垮部队。指战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情，不畏严寒，不怕流血牺牲，连续作战，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辉煌战果，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47年6月，辽东分局发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通知。军区政治部便要求把诉苦与土改教育结合起来，深入进行阶级教育。如果说诉苦教育解决了战士个人复仇的决心，那么进行土改教育时，个人仇恨则上升到阶级仇恨。大家认清了受苦受难的根源，明白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并进一步寻根挖源，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了，但国内剥削阶级还存在，蒋介石就是剥削阶级总代表，只有拿起武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劳苦大众才能翻身解放。随着阶级教育的深入，较好地解决了干部战士中存在的视国民党为“正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完鬼子就回家”等糊涂思想，使大家懂得了个人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关系，明确了“打倒蒋介石，翻身求解放”的基本道理。

在土改教育中，莫文骅接到第7师的一份电报，反映有的部队受“贫雇农坐天下”口号的影响，对出身不好的干部不信任，进行批斗。他立即下到第7师，了解到部队在土改教育中有偏差，存有清洗打击的思想，采用了地方群众斗争的方式，使出身不好的人产生恐惧的心理。地主成份开小差的有45人。有个文化教员在训练场上被战士用枪瞄准，说是打地主。有的领导同志认为，土改教育中“分化、过火是必然现象”，“地主成份跑了没关系，剩下我们工农自己干”。这使莫文骅感到，部队经过诉苦和土改学习，解决了苦从何来的问题，唤起了阶级意识，激发了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部队的土改教育应以思想改造为主，不是以清洗打击为主，不能搬用地方群众斗争的方式。阶级教育要以诉苦运动为基础，但诉苦不能完全代替阶级教育。他在师党委会上指出，一些干部文化高，出身不好，但他们已投身革命，转变了立场，就不能搞唯成份论。他强调，大敌当前，军队内部不能搞阶级斗争。要求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从部队回来后，莫文骅向陈云和军区党委作了汇报。陈云等一致同意他的想法。军区政治部发出通报，及时纠正了这种偏向，稳定了干部情绪，使军区诉苦运动健康发展。

部队一经“倒苦水”、“挖苦根”的阶级教育，杀敌立功的劲头就空前高涨，涌现出大批房天静式的英雄人物。仅1947年，第3纵队就出现了英雄

模范 26 人，有 7213 名干部战士荣立战功。1947 年初，莫文骅在部队中看到指战员求战心切，情绪很高，墙上贴满了请战书、决心书和标语口号。新 6 军是国民党军进攻南满的主力，一色的美式装备，号称“王牌军”。当 1946 年 10 月敌人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犯时，第 3 纵队第 9 师在强敌面前毫不示弱，特别是对骄狂的新 6 军，部队提出了“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 6 军”的战斗口号，顽强阻击敌人 5 昼夜。后来，这一口号已在南满部队普遍叫响，反映出诉苦立功教育后部队士气的变化。于是，莫文骅写下了这首顺口溜：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 6 军。

菜心味甜营养好，歼灭新 6 军建功勋。

同志们大家来竞赛，看谁是人民大功臣！

后经音乐家牛元甫谱曲，这首歌在南满部队广为传唱，部队面貌为之一新，连敌军听了也胆颤心惊。在“四保临江”战役中，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惊魂落魄地说：“你们吃了白菜心，连我这白菜帮子都给吃了。”后来，屡遭重创的新 6 军，终于栽在第 3 纵队手里。在辽沈战役中，新 6 军连同他们的西进兵团全军覆灭，从新 6 军军长升任兵团司令官的廖耀湘亦当了俘虏。廖耀湘被俘后说：“你们第 3 纵队就像旋风一样，两条腿竟赛过了我的十轮卡！”“第 3 纵队及其友邻部队，第一棒子就打碎了西进兵团的脑袋（指兵团前进指挥所），使我们部队失去指挥。群龙无首，焉能不败！你们指挥有方，行动迅猛，作战剽悍。兄弟佩服，佩服！”此后，第 3 纵队“旋风部队”的绰号，不胫而走，声名远扬。

1947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批转了辽东第 3 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并发出了开展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指示，辽东军区诉苦教育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著名的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1948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诉苦三查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辽东军区在开展诉苦运动的同时，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立功运动也蓬勃兴起。

辽东军区的立功运动是 1946 年 3 月 19 日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为了鼓励部队情绪，特别是当时有不少刚从伪满军过来的新兵，一下子还不能从政治上给他们鼓励，因此采用建立功劳簿、给作战有功人员记功和发奖金的办法。后来，莫文骅看见苏军有功勋章，戴上很荣耀，对激发士气、增强荣誉感有一定作用，便决定要搞。兵工厂很快就设计制造出了军功章。军功章分为 3 个等级，打完仗就发。但那时还没有形成群众性的杀敌立功运动。随着诉苦与立功运动的结合，部队发动起来了。选标兵模范，评战斗英雄，召开庆功大会，掀起了群众性的为人民立功劳的热潮。在“四保临江”战役中，军区部队杀敌立功运动开展得非常好，涌现出一大批战斗功臣和英雄模范人物。有不少英雄事迹，当时新华社都进行了宣传。

诉苦和杀敌立功运动的开展，又促进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在诉苦中，干部战士产生了复仇立功的强烈愿望。杀敌立功就要有本领，就要练兵。那时，部队中新成份不断增加，不少刚入伍的新兵就奔赴战场。因此，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广泛开展练兵活动。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东北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

敌的变化。连遭打击的蒋军，机动兵力大为削弱，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东北我军则越战越强，部队和根据地得到壮大和发展，由全面防御转为战略反攻。1947年5月，南满我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以破竹之势，横扫了辽东各地的蒋军。

过去，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环境艰苦，作战频繁，部队伤亡较大，影响部队情绪。在“四保临江”作战中，军区政治部就提出战场爱兵问题，要求不仅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战士，而且要爱护战士的生命，反对莽闯、乱撞的战斗作风，尽量减少伤亡。

在谈到如何减少伤亡时，莫文骅回忆说：在夏季攻势中，部队在南山场子击溃了号称“虎师”的敌第22师，打了个大胜仗，但我们也付出了千余人伤亡的代价。部队的战斗情绪很高，比如有个指导员带1个排守山头，他站起来喊：“你们来吧，我是10师28团的！”这样不注意隐蔽，伤亡就大。有的连冲锋道路选择得好，伤亡很少；未选择好的伤亡就大。南山场子一仗后，部队总结出战斗情绪高但战术技术水平低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政治工作与战术技术相结合。打下梅河口之后，伤亡仍然不小，而且有些伤亡是可以避免的。有了这一次的体会，认识更加明确了，就把上次的总结修改后下发，引起了部队的重视。

夏季攻势后，辽东军区同时召开了军政会议。两个会反映了两种情况：军事会议上一些师长们反映说，部队中以右倾情绪为主，今后主要应强调军事纪律；而政工会议上政工干部们说，战斗情绪空前提高了，但战术技术差。由于两个会议看法不一，就合起来开。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部队战斗情绪高而战术技术差，今后应在加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开展练兵、立功运动，政治工作要保证战术技术的提高。认识的统一，使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结合有了新的发展，于是战评运动便在辽东军区部队产生了。

战评运动是立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克服了过去立功中单纯评勇敢、评战绩的偏向，使评功与评战术技术、作战指挥、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战评是作战的经验总结，干部战士用流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教育自己，深刻实际，是有效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最早开展战评运动的第4纵队，创造了很多经验。每次作战之后，他们以正反典型战例入手，开展从下到上（从战士到干部）、从个人到单位（班、排、连、营、团）、从互相批评到自我批评的群众性自我教育。战评中，不少单位还摆设沙盘，以实例说明道理。在大家评论的基础上，以连或营为单位再作全面总结，并利用时间进行实际演习。可能时，连队评论后，由团召集连以上干部专门进行战术评论，以提高干部战术指挥能力。

战评运动的开展，使部队打一仗进一步，经过战评，使立功运动有了依据，训练方向更明确了。在大练兵中，军事民主、群众路线得以贯彻，无论是战术还是技术训练，大家都热烈地讨论和研究，反复演练，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第10师第28团长岭连在战术演练中创造了“三看三评”方法，即：把一个班分成演习、假设敌、参观3个组。演练时，参观组从后面看、侧面看和正面看，然后采取“对比评”（对比3个组或个人的动作评优缺点）、“典型评”（评最好的小组或个人动作）和“反复评”（3个组轮看演练，反复评议）的方法，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动作进行综合评议，使训练取得显著的效果。这种方法受到东北野战军总部通报表扬，并在东北部队中普遍推广。

在战评运动中，各级司政机关、军政干部下到连队，一起参加和指导战

评，使军政分家、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脱节的现象得到克服，军政工作配合更加密切。政治工作也不再是只注意提高士气，进行简单鼓动的表面性工作，而是与军事工作一道去解决怎样减少伤亡、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怎样把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转化为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这对我军战时政治工作是个新的发展。辽东军区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诉苦教育运动，发展到群众性练兵运动、战评和立功运动，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大大活跃了部队政治工作，激发起指战员坚强的战斗意志和高昂的战斗热情，并转化为巨大的战斗力，保证部队赢得了“四保临江”战役和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的伟大胜利。

从辽东军区创建开始，莫文骅在这里工作战斗了两年多。这个时期正是南满斗争最艰难的岁月。谈起辽东政治工作，莫文骅说：诉苦、立功和战评运动，都是来自群众的创造，我们在工作指导上做了些总结推广工作。这句很平常的话，却体现了他的一贯作风。莫文骅认为，从根本上说，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政治工作的根本方法。他回忆说：那时军区首长陈云、萧华对政治部很放手，充分发挥政治机关的作用。我们政治部也很注意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少用命令。那时我们只发过两个训令，一个是关于建军问题，一个是关于土改学习。一般都用发号召、作指示的方式，动员群众自觉去做。莫文骅在战争年代就坚持看书学习，兜里常揣个小本本，随时记下些问题和体会，养成了思索问题、总结经验的习惯。他的这些作风也带给了部队。那时，部队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中，不少是工农老干部，文化不高，缺乏总结经验的习惯。开政工会时，他就逼“鸭子上架”，非总结不可，你说总结不了就不让你回去，逼着政工干部去想问题，提高思想和工作水平。结果，不少经验就这样逼出来了。莫文骅长期做部队政治工作和学校教育工作，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历史比较熟悉，积有经验。他对以惩罚为主、消极防范的作法很不赞成。他在总结辽东军区政治工作时曾写道：“从过去历史上看我们的政治工作，我以为中央苏维埃后期红军的教条宗派的政治工作路线不是以宣扬先进、奖励为主，而是以斗争为主的。毛主席的思想则是以奖为主的方针。如陕甘宁边区英模运动及其各种工作，皆是贯彻以奖为主的方针。”辽东军区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开展政治工作，贯彻以奖为主的方针，用发扬优点去克服缺点，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去调动部队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1948年2月，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哈尔滨召开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东北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对辽东军区的政治工作经验非常重视，他让莫文骅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辽东军区情况和政治工作的报告》。在此之前，罗荣桓还曾亲自找来《东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东北日报》介绍了辽东军区政治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并发表了题为《部队教育的方向》的著名社论。社论对辽东军区政治工作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指出：“进行诉苦教育的全部过程，在部队教育工作上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创造”，“虽然还是一个开始，但这确是部队教育的革命，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教育部队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这是巩固部队、提高觉悟、改造思想、激发杀敌情绪、提高战斗力最基本、最生动有力的教育。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方法问题，而是部队教育的路线问题和部队教育的方向”。后来，莫文骅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立功运动的初步经验》一文，使辽东军区的政治工作经验很快推广到全东北部队。

辽东军区政治工作经验，代表了解放战争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教育的方向，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

辽沈战役中最激烈的一仗

1948年1月，南北满已打通，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东北战场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决定撤销辽东军区。

5月下旬，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的莫文骅到鞍山任职。纵队司令员是吴克华，副司令员是胡奇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欧阳文，参谋长为李福泽。

第4纵队的老底子，是抗战初期山东胶东天福山起义及各县起义的抗日武装。这支抗日队伍创建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坚持了8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解放了除青岛之外的胶东全境。抗战胜利后，奉命横渡渤海，挺进东北，转战于辽东地区。第4纵队曾首战营口，两克鞍山，三保本溪，四保临江，胜利地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创造了鞍海战役中迫敌第184师起义、新开岭围歼战全歼蒋军1个主力师和梅河口攻坚战歼敌1个师的范例，成为东北野战军中的主力纵队。

从春末到夏末，东北野战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大练兵。

第4纵队在鞍山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军政整训，使部队的战术技术、组织指挥和协同水平大为提高。部队满员，运动能力增强，士气高涨。

1948年秋，东北蒋军遭我夏、秋、冬季攻势沉重打击后，已完全丧失战场的主动权。其剩下的50余万部队，被我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联的地区，仅赖辽西走廊这一狭长地带保持着锦州与关内的交通联系。长春守敌为我久困，是撤是守，举棋不定。整个东北蒋军亦陷入欲撤难舍，固守无力，被动挨打的困境。而我东北解放军已发展为百万大军，占据了东北97%的土地，解放了东北86%以上的人口。解放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兵源雄厚，给养充足，后方巩固。东北和全国战场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表明，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时机已经到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通观全局，审时度势，决定把战略决战的方针首先指向东北蒋军卫立煌集团。

一场战略决战，首先在这块广袤的黑土地上展开。

9月12日，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时称秋季攻势）拉开序幕。第4纵队、第11纵队首先奔袭北宁线，打响了战略决战的第一炮。第11纵队在北宁线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等要点、控制了关内外的陆上通道。

9月11日，第4纵队从鞍山、台安出发，于15日协同第9纵队突然包围了锦北重镇义县。后奉命南下，首战月亮山，再战砬子山，连战皆捷，切断了兴（城）、锦（西）、葫（芦岛）敌之联系；又以两小时攻克兴城，全歼兴城守敌3200余人，切断了关内同锦州的铁路交通。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相继逼近锦州，对敌形成重兵包围之势。

由于第4纵队以神勇迅猛的动作，出色地完成了战前主动请缨、打响头一炮的作战任务，东总首长驰电祝贺：

庆祝你们两小时攻克兴城的胜利。希望你们发扬这次作战的优点，以便参加今后更大的战斗。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进行充分的组织准备工作，集中兵力，集中火力，注意步炮协同，选择敌之弱点进攻，则一定能每战皆胜，

无坚不摧，敌人横直是抵挡不住我军猛烈的爆破和猛烈的冲锋。

同时，东总首长还通令表扬第4纵队在兴城注意政策纪律，号召全军学习：此次4纵在攻击兴城作战中，认真执行城市政策，遵守入城八大守则，认真地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与公共设备，实行缴获归公、统一分配，不搜俘虏腰包及敌方市政机关职员之财物，获得兴城人民的好评，使该城秩序迅速恢复。此种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作风，应予通令表扬并在全军之内普遍发扬推广。

第4纵队出师获胜，军政双丰收，表现出了这支主力部队良好的军政素质。早在辽东作战中，该部的政策纪律观念就表现出来了。部队执行政策纪律好，不拿俘虏一件东西，俘虏们很感动。战士们说，就是打赤脚作战，也不拿俘虏的鞋子。为此，第4纵队曾受到辽东军区通电表扬。这次兴城作战，部队做到空手进，空手出。第29团获纵队“秋毫无犯”的锦旗。东总在上报毛泽东主席、东北局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总结》中写道：

部队对执行战场及城市纪律进步较以前突出。义县、兴城、锦州、沈阳等地都没有侵犯私人工商业及城市人民的利益，一切工厂、公共机关（锦州受炮火摧毁）保护比较完整。在兴城战斗解决后，县政府只少了一把修理电话的铁钳，并由部队立即清理交还。某地主之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地方同志接收后以五千元一斤卖给部队。俘虏人员所携之私人财物全部没有动。

部队进驻辽西后，认真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自觉做到住在苹果园不吃苹果，被人民群众称赞为“秋毫无犯”、“仁义之师”。

守着苹果堆而不吃群众的苹果。毛泽东主席看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称赞第4纵队自觉地遵守纪律。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

从此，第4纵队不吃苹果的精神传遍全军，成为我军光荣的传统作风。

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先打下锦州，切断敌关内外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这种战略筹划早在一年前就在高层领导中开始酝酿了。

1947年10月13日，毛泽东就给林彪打招呼：“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林彪胸无全局，竟回电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又电示东北野战军“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提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战略设想。但林彪怕主力南下，受东北、华北敌人的夹击，又怕劳师千里，补给困难，因而把主力摆在长春、四平一线，对长春一会儿要打，一会儿要困，举棋不定，徘徊数月。直到同年7月下旬，他才把北上打长春的计划改变为南下北宁线作战。

林彪对南下作战，行动迟缓。他一再要求华北部队围攻大同，以分散傅作义的兵力；还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要以华北部队行动的迟早来决定，并以久雨不晴、全军无雨具、粮食补给困难等为由，拖延时日。9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再次发电催促林彪南下北宁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要求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林彪才干9月上旬移兵南下，部署攻打锦州。

9月30日，林彪率前方指挥所从双城乘火车南下。

10月2日晨，东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的专列突然在郑家屯停下来。此时林彪接到军委通报，得知敌军增兵葫芦岛的情况后，又犹豫起来。为解锦州之围，蒋介石令沈阳蒋军主力5个军12个师，另3个团和3个骑兵旅，约10万余人的兵力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出辽西驰援锦州；又调山东第39军的第2师和第103师，华北的第62军、第92军的第21师和独立第95师，海运葫芦岛，会同锦西的第54军及暂编第62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东进援锦州。敌以东西对进之势，企图夹击我攻锦州部队。在原攻锦州预案中，在阻援部署上，林彪对沈阳方向置兵较厚，而对锦西、葫芦岛方向因敌兵力不大，只放了一个战斗力不算太强的第11纵队。新的敌情变化使他最担心的是锦西方向阻不住敌人。况且，锦州与锦西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有公路、铁路相联，无险可守。林彪对锦西、葫芦岛方向的担心，使他对攻锦州的决心产生动摇。他足足思虑了一整天，当晚22时致电军委，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但估计攻锦州“须相当时间”，锦西方向“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二是“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的把握大为增加”。并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

3日晚，毛泽东主席连发两电，对大战在即林彪举棋不定提出批评：“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林彪历来用兵谨慎，算度很精，等、忍、狠是他打仗的特点。对此，曾与林彪共事多年的莫文骅是了解的。可在攻打锦州问题上，林彪却疑虑重重，动摇不定，反映出大战在即他还没有下定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莫文骅后来在《毛泽东选集》中旁注了几个字：举棋不定，实伤脑筋。“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为“攻击林总”的把柄。

5日，东总前指到达锦州西北30余里的莽牛屯。林彪在锦州城北的帽儿山看地形时说：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人挡住。两锦相距30多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州的部队就要受到很大威胁。葫芦岛方面又增加了5个师。我们的饭菜只够请一桌客，现在突然来了两桌客人，怎么办？

由于敌“西进兵团”离得还远，林彪更关注的是攻下锦州和顶住敌“东进兵团”。于是，准备南下攻山海关的第4纵队被调防塔山一线。

正在兴城地区的第4纵队，于4日接到东总电令：第4纵队、第11纵队及热河独立第4、6师，统归第2兵团指挥，担任阻击锦西向锦州增援之敌。第4纵队即转至塔山高桥地区布防。东总电报还指出：两锦间敌阵地距离只有30公里，故我军“必须采取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勇敢的攻势防御”，“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敌人数十次猛烈进攻，待敌消耗疲惫进退两难之时，再集中11纵全部及4纵一两个师的兵力，组织反突击，将敌人大量歼灭于我阵地之外”。命令还强调：“这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多少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待胜利。”

“死守不退”，“死打硬拼”，“不计伤亡”，这些很不寻常的字眼，

在东总的电令中还是不多见的，足见塔山防御作战任务的艰巨和第4纵队肩上的份量。

由于第4纵队死守塔山的任务很重，林、罗、刘东总首长10月5日再次电示第4纵队：“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20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从东总到兵团均明确表示，打下锦州没有问题，关键是第4纵队能否守住塔山。

第4纵队守备塔山，已成为锦州战役的关键和各级关注的焦点。

第4纵队受领任务的当晚，党委书记莫文骅召开了纵队党委常委会议，对上级的命令、意图和要求进行认真讨论，统一了思想，确定第12师连夜出发，迅速占领塔山堡和白台山一线，掩护主力进入防御地区。

第二天一早，纵队召开了第10师、第11师及直属单位师以上干部会议，由吴克华司令员传达作战命令，莫文骅政委进行战斗动员。莫文骅指出：塔山阻击战意义重大，能不能全歼东北敌人，关键在能不能打下锦州；而能否攻克锦州，又在于能不能守住塔山，堵住援锦之敌。塔山这一仗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要有全局观念，不以俘获多少来计算胜利。只要守住塔山，保障主力拿下锦州，不论付出多大牺牲都是胜利。我们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不退，打硬仗，打恶仗，准备几天几宿不睡觉，苦熬苦斗，死打硬拼，坚决堵住援锦之敌，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要打好这一仗，为人民立大功。

10月6日晚至7日夜，各部队日夜兼程赶到塔山地区，进入指定位置，不顾行军疲劳，立即投入战前准备，紧张地勘察地形，筑掩体，挖战壕，昼夜不停地抢修工事。当地群众主动组织起来，协助我军抢修工事。材料缺乏，群众拿来了桌子、门板。有位老贫农主动拆了自己的房子，把木料扛到阵地上。有些老人还把准备的寿材板送给部队修工事。

8日晨，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纵队和师、团首长察看了前沿阵地，现地确定了主要防御阵地前沿位置和坚守要点，采取集中兵力、重点防御、控制强有力预备队的部署原则，在左起打鱼山、右至白台山的8千米正面上组织防御，以铁路桥、塔山堡、白台山为主要阵地。

塔山，其实并不是山，周围是平缓的起伏坡地，无险可守。

我军前沿一线阵地，东临渤海，西依虹螺山，距锦西敌前沿远的不过千米，近的只有几十米，距锦州敌人也不过30千米。南面大小东山、影壁山一带高地，敌人筑有坚固工事，配置各种火炮，居高临下，以火力钳制我塔山一线。塔山堡是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位于北宁铁路西侧1千米处，至纵深高桥，均地势平坦，只能依托村落、小高地和隘口进行防御。当面的敌人，是蒋介石亲自督战的9个师，除两个师外，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建军较早，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敌兵力不仅三倍于我，且有空、海军的支援配合。显然，此战对第4纵队来说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

8日下午，第4纵队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吴克华司令员作了总结，决定以第12师和第11师第32团展开于正面，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白台山等一线的战略要点；以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第二梯队，保持强大的后劲。第10师和第11师第31团、第33团为纵队预备队。吴司令员部署完毕，莫政委向大家讲道：“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一

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纵队部，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就是天塌下来，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一步不能退！”莫文骅这次“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死守不退”的誓言，让第4纵队老同志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政治工作亦紧张地进行。纵队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向基层党员、士兵作直接的深入动员，发布了《告全纵队共产党员的信》、《告全纵队指战员书》，提出了“死守阵地”、“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保证锦州胜利”等战斗口号，特制了“英勇善战”、“稳如泰山”等锦旗，号召开展杀敌立功和夺旗竞赛，当战斗模范，做守备英雄。

10月9日，全纵队上下举行了阵地宣誓。第10师政委李丙令在第28团干部会上宣布：“我的阵地位置就在同志们的身边，与部队同生死，死守阵地！”第12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在阵地上，当着部队的面，指着自已的位置，表示决不后退的决心。各师、团首长及营、连干部，都在阵地上向党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部队战斗情绪高涨，激昂的口号响彻阵地。

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晨4时，敌以4个师的兵力在40余门重炮、7架飞机、两艘军舰火力掩护下，分路发起全线进攻。

天色微明，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敌炮火对我阵地进行全线轰击，成千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狂风般地倾泻到我军阵地，爆炸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突然从空中压到地面，沿着打渔山、塔山、白台山一线，轰轰隆隆不停地滚动。

莫文骅政委走出山上指挥所，举起望远镜向前线观察，除了弥漫的海雾和滚滚的烟尘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

此刻，指挥所时刻关注的前沿，正展开一场空前激烈残酷的战斗。

敌以4个师的兵力，在8千米的正面，实施全线攻击。整连、整营、整团的敌人，或军官率队在前，或督战队压后，密如蝗虫，气势汹汹，一梯队接着一梯队，一拨连着一拨，直往我军阵地压来。我每一处阵地都抗击着几倍以至十几倍的敌人。

向我右翼铁路1号阵地及打渔山一线进攻的是敌暂编第62师。3时20分，敌1个营趁退潮之际，袭占我打鱼山岛。4时，敌向我塔山堡东的铁路1号阵地、高家滩阵地攻击。我前沿阵地的几个尚未修好工事和还没来得及修工事的小高地被敌抢占。

“迅速组织反击，夺回阵地，打掉敌人的威风！”纵队吴司令员在电话里对第12师师长下达了命令。

前沿迅速展开了一场反击战。战士们冒着弹雨冲上去，几经冲杀，丢掉的几个小高地重归我军之手，唯有打鱼山岛还没有夺回来。因海水涨潮，我军反击部队被海水挡住，岛上的敌人也被困住激战至下午4时，坚守铁路桥1号阵地、高家滩阵地的第34团第3营已打退敌人8次冲锋。这时，敌以1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又蜂拥着冲上来；但遭我火力拦阻，不得前进，其后路也被我炮火切断。趁敌混乱之际，第34团第二梯队和第29团一部迅猛反击，经30分钟激战，全歼该敌。活下来的280个敌人，全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我军第29团第1营趁海潮退落，向打鱼山岛猛扑过去。敌不支，被歼一部，余落海逃命。打鱼山阵地为我军收复。敌左翼进攻的第151

师，以我军刘家屯北侧7号阵地为攻击重点，先后发起排、连规模的两次进攻，均被守备7号阵地前沿的第36团警卫连第2排击退。至9时，敌又增至1个营，分6股猛扑过来。敌士兵在督战队威逼下，前面的被打死了，后面的踩着死尸上。敌炮火轮番轰击，进攻接连不断。当敌人发起第6次冲锋时，已是下午时分。这时坚守前沿阵地的第2排只剩下9个人，干部全部伤亡。在友邻支援下，直到太阳落山，敌人也未能爬上7号阵地。东总12日在给军委的电报中称：“前日敌分路攻击被击退”。“进攻刘家屯北敌151师451团曾组织6个督战队，并由正副团长亲自督战，但战斗精神仍极不强，我似手榴弹反击时敌即溃退。锦州之敌近日在扫清外围作战中亦有如此表现，例小紫荆山暂54师1团6连长曾枪杀6名士兵企图挽回战局，终亦无济于事”。这一天，敌人妄图寻找薄弱环节的试探性进攻，都碰了硬钉子。

10月11日，敌复以4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改用中央突破的方式，在其两翼策应下，全力向我前沿核心阵地塔山堡突击。晨7时，塔山堡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顿时，一个街道整齐的大堡子成了一片瓦砾，树木截断，房屋倒塌。在残垣断壁的废墟上，横竖躺着被炸死、炸伤的无辜百姓。连树上的麻雀也没有飞出敌人的火网，被打死掉在地上。修筑在村边的工事被打塌，泥土翻卷，硝烟弥漫。

炮火过后，敌第81师1个团，同时从正面和左右两翼向塔山堡阵地压过来。守卫在村口前沿阵地的第34团第1连与敌展开激烈的拼杀，顶住了敌人多次攻击。敌遭我火力杀伤后溃退。随后，敌集中30余门野炮、榴弹炮与两艘军舰的火力，并以5架飞机轮番投掷重型炸弹，对塔山堡轰击30分钟，投射弹2000余发。

我前沿工事被摧毁，地堡被炸塌，第34团第1连伤亡过半。敌人丢下成堆的尸体，终于扑上来，趁机占据了村边的3处民房。我第1连死守不退，从街头巷口残垣断壁里顽强抗击。塔山堡阵地到了危急关头。

一直在纵队指挥所里观注塔山堡战斗的莫文骅，直接把电话要到第34团指挥所，对焦玉山团长说：“迅速组织反击，你亲自组织，坚决顶住！”焦团长有把握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正在组织反击，一定顶住！”

于是，团政委江民风率团预备队，迅速向血战中的塔山堡扑过去。在东面小山上观察前沿战斗的第1营副营长鲍仁川，不顾敌人炮火封锁，飞奔入村，迅速把第1连零散抵抗的人员组织起来，继续同敌人拚杀。适我第二梯队赶到，消灭了窜进村里的敌人，恢复了前沿阵地。敌被击退后，又组织反扑。我第12师预备队投入战斗，协同守备分队将敌再次打退。

在塔山堡两翼，我军一些阵地也曾一度被敌突入，经拉锯战，反复争夺，最后将敌击退。在白台山7号阵地上，敌两个营以集团冲击靠近我工事。我第5班奋力抵抗。在全班伤亡、弹药告尽、敌人突入阵地之后，班长徐忠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下午4时许，敌人丢下遍地的尸体，龟缩回去了。

各部队汇集上来一天的战况，组成了一幅幅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敢战斗场面。莫文骅的心绪难以平静，他走出纵队指挥所，到前沿去看望与敌人苦战了两天的战士们。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庙里，莫文骅见到刚刚从前沿撤下来的战士。他们是坚守塔山堡的第34团第1连的战士。这个连战前有一百七十八人，经过这场恶战，从火线上撤下来的仅有7个人了。

莫文骅逐个望着这些衣服已撕破、满脸乌黑、缠着绷带的勇士们，激动

地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好啊！你们打得英勇顽强，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阵地。烈士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夺取最后胜利，为烈士报仇！你们还能不能打呀？”

“能打！”战士们的回答坚定有力。部队有如此高昂的战斗情绪，战士们如此坚强，使纵队首长尤为感奋和自豪。第二天发布的《纵队首长告全纵队指战员书》中这样写道：经过两天战斗可以证明，“只要我们沉着等敌人接近二三十米远距离，我们的刺刀、手榴弹杀出去，敌人就狼狈逃窜了。敌人有炮，我们也有炮。敌人冲锋，我们以反冲锋出击，是任何敌人抵挡不住的。由此，说明我们有把握守住阵地，击溃敌人任何进攻，不仅可以杀伤敌人，而且可以俘虏敌人”。同时号召指战员发扬顽强守备精神，死守阵地，坚决完成阻击任务。

第4纵队两天的战况，使一直担心塔山方向的林彪心里有了底。他在当日晚8时半给军委的电报中表示：“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

敌人两天攻击未逞，第三天只以少数兵力在前沿与我保持接触，没有发起大的进攻，战火纷飞的塔山，全线沉寂下来。

此时，我攻锦州部队已经扫清锦州外围据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停地发出梦呓，称“国军9日夺回高桥，10日已逼近女儿河，正策应锦州国军……”。然而，困在锦州的敌兵团司令范汉杰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睛都望穿了，还不见一个援兵的影子。

塔山前线的全线沉寂，正预示着一场规模更大的厮杀。

纵队指挥所及时指示部队，抓紧时机加修工事，改善阵地，补充弹药，整顿组织，开展战评，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迎接恶战。

根据敌两天的进攻特点，纵队调整部署，缩小各团守备阵地的正面，加强纵深配置。第34团第3营接到将阵地移交给第28团命令时，要求继续坚守，保证寸土不失，并通过师向纵队请求。经纵队首长解释后，第3营才作了圆满移交。他们将阵地整修一新，撤出阵地时，擎出写有“守如泰山”四个大字的红旗，对接防的第28团同志们说：“这里是红旗阵地，每一寸土地都已被烈士的鲜血染红。我们把它交给老大哥，你们可要为烈士报仇啊！”第28团张继璜政委接过红旗，代表全团指战员面向红旗宣誓：“劳苦功高的英雄战友们，你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你们怎么守，我们就怎么守，一定要在这块红旗阵地上向敌人讨还血债！有我们在，红旗永不褪色！”阵地交接场面，甚为感人。

这一天，阵地上政治工作尤为活跃。各部队调整与合并了部分建制，提拔和配齐了各级干部，健全了党组织，吸收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火线入党；组织了评功、查功、补功、记功活动，及时授予奖旗、奖章，颁发嘉奖令，表彰各部队的英雄事迹；同时组织了慰问活动，慰问信、慰问品很快分到战士手中。兄弟部队间互相贺功，阵地上的标语牌整修一新。宣传队在阵地上组织了贺功晚会，就地编写、演唱英雄模范事迹。

第12师宣传队员和战士们一样抬木头，抬铁轨、抢修工事。他们编写了“坚守阵地，扬名全国”的歌子，一有空就教给部队唱。

仗打起来了，男女宣传队员不顾飞机轰炸扫射，来到第36团阵地上送奖旗，唱歌扭秧歌，一点不畏惧。演完后又分头到各部队收集战斗故事，回来编成快板、洋片，晚上又出去宣传。

夜晚，恶战后的硝烟尚未消散，宣传队员已到最前沿阵地去演出。那里

离敌人阵地不过几百米远，演出对连敌方都听得清清楚楚。被抓过来的俘虏惊讶地问：“每天晚上你们吹吹打打干什么呢？”战士们不由得哈哈大笑。

12日晚，第34团侦察第7班抓回来两名“舌头”，是敌第21师第63团副团长高录臻及其卫兵。经审讯，进一步弄清了敌情。原来，从华北调来的增援部队独立第95师，准备明天投入战斗。独立第95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色的美式装备，号称“赵子龙师”。此次该师来塔山前线，由原师长、现为总统府战地视察组组长、华北督战主任罗奇亲自督战。罗奇在第95师建立了庞大的督战组织，并重金收买亡命之徒，组成了“敢死队”，准备决一死战。他吹嘘说，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

13日拂晓，敌4个师在数十门重炮和军舰、飞机炮火的配合下，采取两翼突破、夹击塔山的战法，全力向我阵地展开猛烈进攻。

向我东侧第28团防守的铁路桥头堡和高家滩阵地进攻的，是敌主力独立第95师和第8师。

“重庆”号巡洋舰的侧射炮弹，加上正面发射来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我军阵地上。刚刚修复的工事，大部被毁。开阔的海滩上，整团、整营的敌人，由“敢死队”作先锋，哇哇叫着冲上来。

第28团的勇士们，沉着应战，用机枪、步枪、手榴弹把敌人杀退一批又一批。双方在前沿展开了激烈争夺，一场混战接着一场拚杀。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还往上冲。我军战士们坚守阵地，打光了手榴弹就拼刺刀，拼石头。在危急时刻，第28团第3营冒着敌人的炮火拦阻，付出了伤亡70多人的代价，从侧翼反击上去。敌人的“敢死队”成了“送死队”，尸横遍野，血溅海滩。敌人终于被打退了。

上午10时，前沿我军捉到敌第95师一个士兵，将他送到纵队部。他说广东话，像疯子一样地叫喊：“你们把我活埋吧！”“我不活了！”莫文骅亲自审问，用粤语向他宣传俘虏政策，但毫无结果。可见第95师官兵受毒害之深。

遭到痛击的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不顾死活地又一次次冲锋。头戴大盖帽的军官，跑在前头。他们把尸体垒成活动工事，向我阵地步步推进。我军阵地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管是阵地上的防守部队，还是作为第二梯队的反击部队，经反复拚杀，伤亡都很惨重。

在这危急的时刻，指挥员的坚定非常关键。莫文骅拿起电话对第10师政委李丙令说：“你告诉蔡师长，一定要死守！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一步不能退！”李丙令表示：“请纵队首长放心，我们决不后退一步！”

纵队决定把预备队1个团移至第28团侧后，以备敌危及我阵地时从侧翼支援第28团，同时命令各炮群轰击向铁路桥方向进攻的敌人。

下午，战斗更加激烈。第28团营、连之间的两条电话线全被炮火打断，各阵地失去联络。在第2连指导员程远茂率领的第1排阵地上，指战员已击退敌人8次进攻，连伤员在内只剩下7个人，弹药也快用光了。这时敌人又开始冲锋了。头负重伤的程远茂指挥大家，把敌人放近再开火，并以手榴弹、刺刀、石头与敌搏斗，宁死不退。直到我反击部队赶到，将敌击退。

第28团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挫败了敌精锐第95师的疯狂进攻，当日获东总首长的贺电嘉勉。

这一天，我西线白台山7号阵地、常家沟北阵地和塔山阵地，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经整日激战，击退了敌数次集团冲锋。

13日是敌人进攻最凶猛、双方争夺最激烈的一天。当日，我军毙、伤敌1245名，自己伤亡1048名，几乎一比一，足见战斗之惨烈。敌主力第95师遭重创，几乎全部“敢死队”都被打死在我军阵地前沿。我军基本上打掉了敌进攻的锐气。

13日晚，东总来电：锦州外围据点已全部肃清，攻锦部队明天发起总攻。要求阻击部队积极备战，坚持到底。

锦州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莫文骅连夜把总部的指示传达下去。部队的战斗情绪更高了。

急红了眼的蒋介石为挽救锦州守军被歼的命运，限令“东进兵团”14日“拂晓攻下塔山，12时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在蒋介石严令威逼下，14日敌以4个师的兵力猛攻我塔山左右两翼阵地。

我铁路以东阵地遭到敌第95师的三路突击。刚刚接替第28团阵地的第30团指战员们，以第28团为榜样，同凶恶的敌人展开了反复争夺。

天刚拂晓，敌人的军官发疯似地驱赶着士兵，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分三路以密集的人群一拨又一拨地拥向我阵地，其中路爬上了我铁路4号阵地铁路桥头堡。第4连经反击，夺回了阵地，把敌人压缩到了铁路以东。敌第二次攻击时，再度突进我工事。伤亡过大的第4连已无力反击，就在工事里与敌拼杀。这时第5连第3排反击上来，将敌击退。随后，敌又以1个营的兵力两次发起集团冲锋，均被击退。

上午10时，锦州方向传来了震天动地的炮声，锦州总攻开始了。

战士们为这喜讯所鼓舞，士气高昂，越打越勇。敌人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我方阵地逐渐巩固下来。

敌人强攻不成，耍起了花招，在靠近我前沿阵地一两百米的地方筑起了临时工事，派出小股部队攻击，企图引诱我大部队出击，以火力杀伤我有生力量。指挥所命令部队，依托工事坚守，不轻易进行远距离反击，同时用炮火轰击敌人。

在塔山堡以南，敌人一直隐蔽了1个师的兵力，只待其两翼得逞，好一举夺下塔山堡中心阵地。然而，直到太阳落山，两翼进攻的敌人始终未前进一步，该师只好撤回。

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守敌即将全歼。塔山当面之敌亦作最后挣扎。不善夜战的蒋军，搞起了偷袭。

2时，敌趁夜暗集中5个师的兵力，在无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向我阵地运动。拂晓时分，突然扑向我阵地，企图乘我军疲劳之机实施突袭。我军紧急应战，与敌短兵相接，勇猛拼杀，一鼓作气，将敌人逐出阵地。

此时，天色已大亮。敌人偷袭不成，突然发起了集团冲锋。我反击部队迂回至敌侧后，前后夹击，将敌人打垮。

进攻塔山阵地的敌第95师的两个连，被我强大火力截断了退路，畏缩在饮马河北岸一个高坎下的开阔地里。班长卜凤刚和一个战士机警地钻过战火，突然出现在靠近敌人的土坎下。他们大声喊道：“快缴枪吧！老乡，锦州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不要替蒋介石卖命啦！”在我军强大压力下，敌人纷纷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共有124名。

中午，敌人全线溃退了。太阳照耀着巍然屹立的塔山阵地。

下午，传来了锦州解放的胜利消息。

“锦州解放了！”这胜利喜讯从纵深传到前沿，从打渔山传到白台山，

我军阵地上一片欢腾。经历了6昼夜生死搏斗的第4纵队指战员，终于赢得了塔山阻击战的胜利。塔山英雄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铸造了塔山的钢铁阵地，创造了震惊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例，为解放锦州立了第一功。不管蒋介石如何限令其军队攻占塔山，也不管国民党的中央社如何造谣说蒋军“已越过高桥”，“东进兵团”始终没有东进一步。自称在华北从未吃过败仗的“赵子龙师”，也终究没能把范汉杰这个“阿斗”救出来。留在塔山战场上的，只不过是蒋军几千具发臭的尸体。越过高桥的，只有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蒋军俘虏。

东总首长对第4纵队塔山阻击作战的出色表现甚为满意，曾先后两次发来嘉勉电，表扬第12师和第10师全体指战员，赞扬他们这种英勇顽强的防御战是模范的防御战。

10月16日，塔山战斗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东总首长就听取了第4纵队扼守塔山的战况汇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听后都很兴奋，称赞第4纵队打得很好，胜利之大，出乎预料。

东北野战军总部在战况总结中，高度评价了塔山阻击战，称“这一防御战之顽强，对我当时攻击锦州取得调整部署与攻击准备时间起了决定的作用”。

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它以光荣的战绩和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为激烈的一仗。第4纵队以3个师的兵力抗住了敌人在飞机和舰炮掩护下的11个师的猖狂进攻。战斗最激烈的日子，在我军防御正面，双方曾有20个团、7架飞机、2艘军舰和500门火炮同时交战。连续6天血战，我军毙、伤敌副团长以下5647名，俘虏副团长以下570名，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我军坚守塔山阵地，岿然不动，以比敌人少一半的伤亡代价，保证了攻克锦州和辽沈决战的伟大胜利。

战后，第12师第34团荣获“塔山英雄团”光荣称号，第10师第28团荣获“守备英雄团”光荣称号，第12师第26团荣获“白塔山英雄团”光荣称号，纵队炮兵团荣获“威震敌胆”锦旗，一大批集体和个人荣立战功。

在东北4年解放战争中，最早开展战评立功运动的第4纵队，仅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工作模范、特等功臣、毛泽东奖章获得者、朱德奖章获得者就多达142名，荣立大功者有11730名。从个人立功到班排立功乃至一次作战行动全师立战功，第4纵队战功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为东北我军之冠。

塔山阻击战，是解放战争中我军一次大规模的野战阵地坚守防御作战，其灵活的战术和活跃的政治工作，为我军留下了宝贵经验。

罗荣桓政委在谈到塔山作战胜利的原因时曾说：“塔山这个仗，锦州这个仗，的确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打到了敌人真正的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垂死挣扎，集中其一切可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仗，任务是光荣而艰巨，胜利是来之不易啊！好在战前部队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大练兵，打了个好基础，它的威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了。”罗荣桓对塔山战时政治工作非常满意。他说，塔山作战打的也是一场政治仗。罗政委的话既是对第4纵队的鼓励，也指明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对战胜敌人、赢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作为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的莫文骅，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不负众望，以他坚强的党性和出色的才干，带领全纵队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

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赞誉。人们对他出色的政治工作才干尤为称道。主攻锦州的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曾称赞说：莫文骅政委对部队政治工作很有经验，他支持和帮助军事指挥员下决心，是一位能带领部队打胜仗的好政委。显然，人们的看法是不错的。第四野战军入关后，莫文骅先后任第14、13兵团政委，率部南下，直至解放广西全境，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镇南关。

塔山战斗结束后，莫文骅用3天时间赶写了《略谈塔山战斗》的总结报告，重点探讨和总结了战场上的政治思想工作。

塔山阻击战的政治工作，是在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战士们的士气正是以政治教育中激发出来的高度阶级觉悟为基础的。当战士们明白了苦根在哪里，自己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时候，其力量就像山洪爆发，任谁也阻挡不了。塔山作战的胜利，使莫文骅更深刻地感受到，战争不仅是兵力和兵器的对比，也是人心和意志的较量。在觉悟了的战士面前，勇气和斗志可以转化为战斗力。

《莫文骅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塔山当面之敌，无论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优势，他们的进攻很凶，他们要打下塔山的决心很硬。蒋介石到葫芦岛督战，并亲自在‘重庆号’巡洋舰上指挥。可是，他们始终不能打过塔山。原因何在呢？这是我常常思索的问题。敌95师号称是‘没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战斗力不可谓不强。这个师的‘敢死队’是用每人60万金元券买来的亡命徒。抓获的俘虏开始态度死硬，当了解了我们的俘虏政策后，他们的‘精神防线’就瓦解了。万金之下必有勇夫，可这些‘勇夫’（特别是那些穷苦出身的士兵）一旦觉悟，认识到在给反人民的战争卖命时，一切金钱收买和漂亮的谎言都失去了作用。‘赵子龙师’解不了锦州之围，800万蒋军亦挽救不了蒋家小朝廷的末日。这就是敌人为什么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东进兵团”拿不下小小的塔山，蒋介石大为光火。塔山战斗的第二天，蒋介石从沈阳飞抵葫芦岛。据侯镜如回忆说：“到54军军部后，由罗奇向蒋介石汇报攻击塔山受挫的情况，蒋介石越听越有气。蒋介石认为塔山的战斗应由阙汉骞负责，指着他，要枪毙他。大家立正不动，也不敢出声。沉默好久，罗奇说：‘官兵是用命的，两天来的攻击，独立95师伤亡很重，现在每个团只编成一个步兵营。’这时，蒋介石听说锦州失守了，气得连午饭也没吃，坐上专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在塔山上空盘旋了两圈，哀叹地说：‘没有料到，3个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就是打不过塔山。’”

心情沮丧的蒋介石，带着满脑子问号飞走了。他最终也闹不明白，没有金钱的诱惑，没有督战队的威逼，塔山共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斗志和战斗力。

塔山作战的政治工作之所以坚强有力，还表现在政治工作的群众性上。塔山作战命令下达后，纵队首长把情况和任务交给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层层动员，宣传鼓动，使每个人都明了上级的意图和战斗的意义，激发出责任感和光荣感，从而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第36团有个连队，参加士兵代表大会的20人，在战斗中个个英勇顽强，带头杀敌，打到后来只剩下9人，全部被炮火震聋，仍顽强坚守阵地，有力地鼓舞了全连斗志。

各级党组织是部队中的核心力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极为重要。纵队党委提出了“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决不后退一步”的誓言。纵队党委正副书记还发出致师、团党委

书记指示信，要求师、团党委书记在紧要关头不负党的重托，以自我牺牲精神完成任务。纵队首长给东北军区及攻锦州兄弟部队写信，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同时组织师、团、营各级领导进行军旗下宣誓和阵前宣誓，鼓舞和坚定部队死守阵地的决心。纵队还召开党代表大会，发布《告全纵队共产党员的信》，号召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打好这一仗。

战斗中，共产党员坚决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做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以模范行动影响带动群众，坚决完成战斗任务。第12师通令记功的160人中，共产党员达113名，占70%。该师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占全师伤亡总数的70%。

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指挥员的决心起着关键作用。激战中，我一侧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伤亡很重，情况非常严重。前沿指挥所向纵队报告了这一情况，说他们“尽量坚持”。这时，电话线被炸断了。“我们的任务是死守，怎么说尽量坚持？”莫文骅说着马上又要通了电话，查明情况，明确指示：“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死守，一步不能退！”对方解释说，是语言表达问题，请纵队首长放心，决不后退一步。在危急时刻，胜利往往决定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指挥员的决心对稳定部队、聚拢人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战时政治工作的总目标，是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情绪，保证战斗的胜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要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针对部队的思想问题，化解矛盾，排除一切不利因素的影响，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塔山战斗任务一下达，部分干部战士就反映出要打进攻仗、不愿打防御战的思想。通常来说，打进攻仗，缴获多；防御作战，缴获少，伤亡和消耗大。愿打进攻仗，不愿打防御战、实质上是保实力、怕伤亡的思想。辽东分局在“四保临江”时，就曾把“继续保持不叫苦的精神”作为对敌后部队的一条要求。这次第4纵队把塔山阻击战的重要意义讲清楚，号召部队打大仗、硬仗、恶仗，不计缴获，不怕伤亡，为攻克锦州作贡献，很快打通了思想。

塔山战斗开始的第二天，总部派来了一位处长到纵队当联络员，其任务是上通下达，加强联系。总部联络员可参加纵队的党委会（只听不表态），但总部给他或他发给总部的电报，别人不能过问。个别同志私下开玩笑称联络员是“监军”，纵队主要领导对此做法也有反感。也许因为塔山方向太重要了，总部派人去看看，随时掌握情况；也许因为第4纵队的任务重，担心出什么闪失；也许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不管上边出于什么意图，这种做法会引起下边的考虑，甚至影响到作战情绪。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何况，激战正酣，指挥员有任何一点分心，问题可就大了。于是，莫文骅找纵队主要领导谈心。他说：“这次任务，非比寻常，叫我们守塔山，是党的信任。我们都是几十年党龄的党员，绝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别的情况先不要想它，坚决打好这一仗。”战斗中，阵地上弹药缺乏。莫文骅刚来第4纵队，比较超脱，要弹药、请求友邻部队支援等“叫苦”的事，他主动出面，以他个人名义给总部发报，减少了不必要的误解。莫文骅感到，上下一致，相互信任，是保证作战胜利的重要一条。及时掌握部队思想，排除不必要的误解，协调关系，稳定情绪，巩固部队，保证指战员同心协力，一心一意打好仗，这是战时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塔山作战胜利后，莫文骅到总部汇报工作。总部首长表扬了第4纵队英

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并告诉他，第4纵队要继续防守塔山阻击锦西、葫芦岛之敌，以保障我东北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莫文骅受领任务后向总部反映说，敌“重庆号”巡洋舰在葫芦岛附近游弋，向我阵地开炮，我们的大炮打不到它，请考虑调配大口径炮给我们。林彪听后说：“好吧，这次我给你1个营，9门炮。这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大口径的榴弹炮，用汽车牵引，是日本仿造德国的。”有了这几门炮，就再也不怕蒋军的舰炮了。

莫文骅很高兴。可当晚，林彪又跑来找他，慢吞吞地说：“我打廖兵团需要大炮，你们也需要大炮，是不是少给一点呀？给你们3门怎么样？”莫文骅回答说：“好吧，3门就3门吧。我们服从大局。”他便带着这3门炮回到纵队。当时，第4纵队尚未下火线。他们根据总部指示，进行第二次守塔山的部署。也许敌人有了塔山的教训，未敢再来碰我塔山阵地，只对我左翼第11纵队发动攻击。为支援第11纵队，第4纵队用大口径榴弹炮远距离轰击敌人，并轰击敌“重庆号”巡洋舰。这种大口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重庆号”吓得调头逃走了。直到廖耀湘兵团被歼，第4纵队才彻底完成了塔山防守任务。

10月30日，东总命令第4纵队与第11纵队等归东北第2兵团指挥，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先遣兵团，迅速而隐蔽地挺进冀东。

11月1日，辽沈战役硝烟未尽，沈阳即将解放，莫文骅和吴克华率部进关。刚刚从塔山撤下来的第4纵队，满怀豪情，浩浩荡荡地开赴华北战场。

太阳照耀在燕山的崇山峻岭，金光灿灿。群峰之巅的万里长城宛如腾飞的巨龙，气势如虹。

3年前，莫文骅从中原出关，为的是同国民党抢占东北；如今，第四野战军主力挥师入关，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莫文骅在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中，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从热血青年到铁军军官的聂鹤亭

王晓建

聂鹤亭（1905～197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安徽省阜南县人。1921年开始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组织反对军阀统治的吴山庙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叶挺独立团第2营第6连连长。1927年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第73团第2营第6连连长，中共东江特委教导营营长，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第4军第11师第35团副团长、第33团团长，第4军第11师参谋长，第4军参谋长，第1军团第1师参谋长，第1军团作战科科长，红军甘肃（西方）野战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第4大队大队长、军委总参谋部第1局局长、军委参谋部部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辽北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1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

学运先锋

1921年，聂鹤亭16岁，已经是一个充满爱国意识的热血青年。他从阜阳来到安庆，报考了安徽省立安庆皖江专科师范学校体育系，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当时的师范院校免收学杂费和膳宿费，所以许多家境贫寒拿不出学费的青年都走上师范这条路。聂鹤亭与众不同之处是他选择了体育系。这使许多人感到不解——他们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为什么偏偏要学体育呢？

说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回溯一下聂鹤亭的身世了。

聂鹤亭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县（今阜南县）赵集区吕大园乡的聂老村。父亲聂老运是眼科医生，家境原本殷实。不幸的是聂老运夫妇染上了鸦片烟痛，不几年就抽垮了身体，抽尽了家产。正在阜阳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念高小的聂鹤亭，也被迫停了学，回到家中干庄稼活，过起了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鸦片烟在中国城乡蔓延成灾，类似聂家这样因鸦片烟毒害而破产的家庭不少。聂鹤亭目睹家人、国人的体质日益屠弱，精神日益萎靡，生计日益艰难，深为国家、民族的前景忧虑。他在阜阳念书时，学校里已开设了体育课，除田径、器械以外，还包括队列、刺杀等军训项目。聂鹤亭很喜欢上体育课，认为体育不仅能增强国人的体质，而且能振奋全民族尚武、自强的精神，逐渐产生了“体育救国”的想法。

安庆是一座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名城，自清朝康熙年间至民国初年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五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思潮在安徽的传播。安庆的学生运动极为活跃，曾多次发生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学潮。

初到安庆，聂鹤亭和同学们一起去游览长江边的著名古刹迎江寺。他们拾级登上寺内高7层的振风塔，极目远眺。望着浩淼的江流和苍翠的山色，聂鹤亭胸中的爱国情怀更加强烈。

一位安庆籍的同学指着西门外的鸭儿塘东山岗，激昂地介绍说：“那里筑有革命志士吴懋的坟墓。”吴懋是安徽桐城人，光复会会员，1905年在北

京火车站谋炸清朝政府的5名重臣，结果炸弹提前爆炸，自己壮烈牺牲。聂鹤亭早就听说过吴樾的壮举，对他很是崇拜。这时候，聂鹤亭遥望着吴樾墓想：只要能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早日摆脱列强欺凌，只要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自己完全可以像吴樾那样，义无反顾地献出一切……

聂鹤亭进入皖江专科师范学校之际，安庆已经由王步文、蔡晓舟等人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学校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进步书刊。这些书刊都是聂鹤亭以前没有见过的。他感到很新奇，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从共产党人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到国民党左派朱蕴山创办的《评议报》；从高语罕控诉列强宰割中国领土的《青岛茹痛记》，到布哈林阐释马克思主义常识的《共产主义ABC》……他无不涉猎研读，几乎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程度。这些书刊使他大开眼界，拓展了思路。

不久，聂鹤亭结识了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六安人许继慎。许继慎是安庆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红1军军长，后被张国焘诬陷为“第三党”、“反革命”而遭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为许继慎平反。1988年，中央军委确认许继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家之一。许继慎比聂鹤亭年长4岁，聂鹤亭常去找他，谈读书心得，谈时事政治，谈理想和人生。许继慎在政治上对他颇有帮助。两人很是投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1年5月，安徽凤阳税关监督倪道烺、安徽军务帮办兼皖南镇守使马联甲为扩充军费，强迫省议会削减本已决定增加的教育经费。倪道烺是权倾一时的安徽督军倪嗣冲的侄子，马联甲是一个残忍横暴的军阀，省议会不敢违拗他们的意旨，拟削减教育经费。

6月2日，安庆各校师生闻讯派代表去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可议员们这时正在举行“公宴”，宴请倪道烺和马联甲，并商议去倪嗣冲“生祠”举行庆典之事，不但拒不接见学校师生代表，还令警察连推带打将他们赶了出来。这一下引起了安庆各校师生的公愤，数千名学生一齐前往省议会示威。

聂鹤亭也参加了这次示威，他和同学们高声呼喊反对军阀的口号，并勇敢地与马联甲派来弹压学生的军警搏斗。军警们用棍棒和刺刀大打出手，手无寸铁的学生只得后退。聂鹤亭身高1.8米，体魄强健，力气过人，军警们奈何他不得；但是同去的同学却有50多人被打成重伤，其中姜高琦、周肇基两同学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牺牲。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安徽“六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安庆各大、中、小学校全部罢课，聂鹤亭也参加了罢课斗争。他与同学们制作了一幅白布横幛，悬挂在皖江专科师范学校门口，上书16个大字：“议员军阀，残杀学生，全体罢课，誓与偕亡！”

在各校师生的坚决斗争下，在全国舆论的谴责声讨下，安徽省当局不得不将年度教育经费由92万元增加至150万元，对伤亡学生也给予了抚恤。但下令残杀学生的元凶倪道烺和马联甲，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办而逍遥法外。特别是马联甲，不久居然还升了官。

严酷的现实使聂鹤亭认识到，无论“体育救国”还是“读书救国”，都是行不通的。要想真正救国救民，就必须同封建军阀、反动政府和他们的主

生祠，为尚在人世的活人所建立的祠堂。

子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彻底改造黑暗的社会。

从此，聂鹤亭不再安于平静的课堂生活，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1921年8月，聂鹤亭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委派李兆珍担任安徽省长的“驱李运动”，担当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驱李队”队员。他和同学们一起，带着行李包围省长公署7天7夜，迫使焦头烂额的李兆珍化装从边门逃走，再也不敢来安庆上任。

1922年5月，聂鹤亭参加了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抵制日货活动。他们动员各界人民不买日本货，不乘日本船，将数十箱查获的日本货当众焚毁，还使几艘日本轮船既无客源又无货源，不得不空空驶离安庆码头。

由于聂鹤亭为人正直，机智果敢，同学们都很拥护他，推选他担任了皖江专科师范学校学生会负责人。他由此进一步成为学生运动的先锋和组织领导者之一。

一天，聂鹤亭和同学们听说，安徽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正在流行的疫病束手无策，断定有“妖怪”作祟，于是请来一个名叫徐继武的“狐仙”降妖捉怪。官员们又是开欢迎会，又是设宴大吃大喝，弄得乌烟瘴气。

堂堂省府官员，不想方设法医治病人，控制疫情，却带头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同学们议论纷纷，对此都很愤慨。最后一致决定，大家共同出面制止这幕丑剧。

聂鹤亭和十几位同学匆匆赶到“降妖捉怪”的现场，正逢“狐仙”徐继武酒足饭饱之后神气活现地迈步登坛。他身穿八卦衣，手持宝剑和折扇，表情诡谲怪异，口中念念有词。但当他发现聂鹤亭等一群青年学生突然出现，对他怒目而视时，心里直发虚，便煞有介事地宣称：“狐仙”刚刚被芜湖的“狐童”请走，一时半刻回不来了。边说，边退了下来。

聂鹤亭故意问：“狐仙不是连妖怪都能捉住么？这么厉害怎么会害怕学生呢？莫非是假的吧？”正在兴头上的省政府官员们也不肯中途罢休，坚请徐继武升坛作法。徐继武无奈，只得硬着头皮答应登坛。他生怕自己的骗局被学生们拆穿，特地吩咐两个门徒坐在坛前，把守住坛门，不让任何人进入。

徐继武登坛后，不一会儿灯就熄灭了，“降妖捉怪”正式开始，坛内传来噼噼啪啪的扑打声和吱吱哇哇的尖叫声。

聂鹤亭见时机已到，立刻招呼同学们一拥而上，推开徐继武的门徒，闯进坛内。只见徐继武一只手用折扇拍打桌子，另一只手捏着鼻子叫得正欢呢。聂鹤亭上前揪住他，他却继续作戏，声色俱厉地假托“狐仙”发了怒，要降罪惩罚冒犯神灵的狂徒。聂鹤亭毫不胆怯，狠狠扇了徐继武一个大嘴巴，高声喝道：“来吧，有本事你就降罪惩罚我吧！”

徐继武见聂鹤亭硬是不信邪，一下子泄了气，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连连向聂鹤亭叩头求饶。

省政府的官员们起初看到学生冲坛，已经乱了方寸，又听得“狐仙”口口声声要“降罪”，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慌不择路地扭身便逃，却被周围的同学们挡了回来。及至亲眼见到“狐仙”挨了嘴巴不仅没有“降罪”，反而向聂鹤亭下跪求饶，这才如梦方醒，发觉上了当。一位督办大人涨红了脸对聂鹤亭说：“我们很惭愧，竟相信了徐继武这个骗子。我们还不如你们学生，做了这等丑事。这是安庆的耻辱呀。”

这件事传开后，聂鹤亭的威信更高了。同学们又将他选为皖江专科师范

学校在安徽全省学生联合总会的代表。

1923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在英国、美国的支持下，打败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队，掌握了民国政府的大权。他觉得还不过瘾，想再进一步当正式的“大总统”，便以5000块现大洋买一张选票的价格，收买了国会议员590人投他的票，居然如愿以偿，“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曹锟踌躇满志地说：“国会是一个猪窝，议员是一群猪仔。有了武力和大洋钱，不怕买不到猪仔。”但纸包不住火，贿选的丑闻终究张扬了出去，曹锟被世人讥为“贿选总统”，被收买的无耻议员们则被称作“猪仔议员”。

全国舆论哗然。安徽学生联合总会和教职员联合总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不承认贿选总统曹锟。10月9日，即曹锟正式就职的前一天，学生联合总会和教职员联合总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游行。安徽也出了几个臭名远扬的“猪仔议员”，其中家在安庆的有两个：一个名叫何雯，另一个名叫张伯衍。游行队伍据此分成两路，一路去何雯家，一路去张伯衍家。

许继慎、聂鹤亭带领一路游行队伍去状元街张伯衍家。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反对曹锟贿选！”“揪出猪仔议员！”“打倒猪仔议员张伯衍！”“打倒猪仔议员何雯！”军警们不敢阻拦，缩在一边旁观。许多工人、市民激于义愤，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到达张家门前时，游行队伍已由3000人增加到7000人。

张伯衍正好在家，他早有准备，命人把大门上了锁，再结结实实顶起来。

聂鹤亭试着推了推门，两扇大门纹丝不动。他随即找来一根结实的木杠，带领群众抬起木杠猛撞张家大门，不一会儿便将大门撞开。群众一哄而入，搜出躲藏起来的张伯衍，痛打了他一顿，还不解气，又将张伯衍祖先的灵牌砸碎，扔进厕所。最后将张家的银元、珠宝、首饰、绸缎翻出来，统统拿到街上示众。平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第二天，张伯衍、何雯办的报纸《民治报》大放厥词，诬蔑昨日的游行群众是“暴徒”，要求省当局予以严惩。许继慎、聂鹤亭又领导学生前往《民治报》报馆问罪。许继慎和聂鹤亭当众数说了《民治报》颠倒黑白的劣迹，群众越听越气愤，七手八脚将这家公然为“猪仔议员”张目的报馆砸了。

曹锟就任“大总统”以后，张伯衍、何雯向曹锟哭诉了安庆“暴徒”的“暴行”。曹锟很恼火，下令严厉镇压各地反对贿选的群众。苏浙皖巡阅使齐燮元、已升任安徽省长的马联甲有了“尚方宝剑”，立即发出通缉令，捉拿反贿选的省学生联合总会负责人、各校学生领袖及教育界进步人士共36人。

聂鹤亭的名字也在这被通缉的36人之内。好在这时他已自皖江专科师范学校毕业，省学联通过关系，将他安排到安庆六邑中学当体育教员。他得以避开军阀当局的视线，改换姓名隐蔽了起来。

半年后，形势更加紧张，聂鹤亭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六邑中学显然也呆不下去了。他听说同在被通缉36人名单之内的许继慎去了广州，已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心中不由一动，很想也到广州去参加革命学军事。然而，当时安徽军阀对广东革命势力防范甚严，道路上盘查得很紧，聂鹤亭又是一名在逃的“通缉犯”，万一被查出真实身份，后果就不堪设想。他不得不打消奔赴广州的念头。

恰在这时有人告诉聂鹤亭，江西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将军把督军蔡成勋赶走，自任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同情广州国民政府，使江西出现了一些新气

象，他还在南昌办了个军事学校，招收有文化的青年。

聂鹤亭反复考虑后决定去江西。他想，自己反正已下定决心学习军事，在广州学还是在南昌学倒无关紧要，学成之后为谁打仗才是根本问题。

讨贼军的参谋长

1924年秋，聂鹤亭搭船溯长江西行，先到九江，然后转乘火车来到江西省会南昌。他按地址找到那个招生的军事学校，才知道这个学校其实是军官子弟学校学兵连，学员大都是青年学生和军官子弟。凭聂鹤亭的文化程度，没费什么周折就被录取了。

学兵连的生活苦，训练也苦，每日实行严格、紧张的“三操两讲”制度，即早晨、上午、下午各进行一次军事操练，上午、下午各上一次军事课。有些学员因为实在吃不了苦、受不了约束而离去。聂鹤亭坚持了下来，他在这里接受了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各科目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段时间虽只有短短六七个月，却为他以后带兵打仗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

1925年5月，江西政局又发生变化，省当局在压力下投靠直系军阀孙传芳，把赣军编入了所谓“五省联军”，准备对广东革命政府作战。学兵连也受到波及，省当局拟将本届毕业学员分配到部队中去充任初级军官。聂鹤亭暗想：自己假如真当了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军官，就很有可能与孙中山的广东革命军队交手作战，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干的。他未及等到毕业，便找了个托词回安庆去了。

聂鹤亭回到安庆后，适逢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怒潮。安庆各界人民也展开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聂鹤亭参加了青年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青年救国团”，被推选为队长。他组织示威游行，参加声援大会，带头在街头演讲，还在长江沿岸的码头盘查英货和日货，很快又引起安徽军阀当局的注意，再次被通缉。

这时，聂鹤亭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党组织一直关怀着他。正当他在安庆无法立足、面临危险之际，安庆的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去，找上海的党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聂鹤亭与共产党员郑鼎（李云鹤）同行，顺利地来到上海，通过秘密交通员找到了党组织。在法租界白浪尼蒙玛浪路升平里4号，他们与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高语罕见了面。高语罕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大革命的发展形势，委派他们回安徽去，协助蔡晓舟等同志在合肥北乡吴山庙一带发动反军阀统治的武装暴动，以策应国民革命军即将开始的北伐。

听了高语罕的话，聂鹤亭很兴奋。他毫不犹豫地与郑鼎接受了任务，匆匆打点行装，赶往合肥。

吴山庙今属长丰县吴山镇，位于合肥西北30多千米的江淮丘陵地带。郑鼎、聂鹤亭找到了负责人——共产党员蔡晓舟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许习庸，共同研究了暴动的步骤和每一个细节。大家都认为时机已成熟，随即投入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1926年11月12日，吴山庙暴动开始了。

在吴山庙的小营盘，安徽讨贼军第4路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由蔡晓舟任讨贼军司令，郑鼎为政治指导员，许习庸为副司令，李雨村为总参议。聂

鹤亭担任了讨贼军的参谋长。讨贼军共有 300 多人，主要由李雨村的寿县古渡岗民团组成，也包括数十名来自各地的革命志士。在暴动的领导者中，只有聂鹤亭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所以暴动的军事计划主要由他策划，部队行动也由他组织实施。他肩上的担子很重。

暴动使闭塞、沉寂的吴山庙沸腾起来。当天正逢集日，讨贼军宣传队组织吴山庙小学的数十名学生走上街头，张贴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还教唱革命歌曲，进行讲演，带领贫苦农民群众高呼口号。一时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铲除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等振奋人心的口号声响彻吴山庙。

聂鹤亭一生担任过各种级别的十多个参谋长职务，但细数起来，他第一次担任参谋长，是在吴山庙的讨贼军中。虽说经验不足，他还是尽自己的全力做了大量工作。

聂鹤亭协助郑鼎整顿了部队，根据司令部的决定，将现有的 300 多人分成 3 个营。他们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郑鼎主要讲对老百姓要秋毫无犯；聂鹤亭则强调，在战场上一定要有铁的纪律，听命令听指挥。聂鹤亭还协助蔡晓舟、许习庸制定了攻打合肥的军事行动计划。

吴山庙暴动震撼了安徽省特别是合肥地区，省军阀当局也感受到威胁。孙传芳任命的“五省联军”皖军总司令陈调元得报，立即调来刘凤图旅 3 个团，并配属 1 个炮兵连和 1 个机枪连前来镇压。合肥、寿县、定远、凤阳 4 个县的土豪劣绅也蠢蠢欲动，派出他们掌握的民团配合刘凤图旅的行动。刘凤图不知讨贼军的虚实，不敢贸然进兵，把部队部署在吴山庙通向合肥的交通要道四十埠。

11 月 23 日凌晨，讨贼军整装向合肥进发。部队行至 10 千米外的四十埠时，与刘凤图所率敌军遭遇。蔡晓舟叫来聂鹤亭，要他组织部队坚决抗击敌军。

聂鹤亭是第一次上战场。起初，他听见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也有些慌张，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行使起了参谋长的职权。他运用在江西学兵连学到的军事知识，细心观察了战场的地形，随后布置部队就近占领有利地形，反击敌军的进攻。

敌军人数比讨贼军多出 10 倍以上，武器装备更占绝对优势。讨贼军战士每人只有几发子弹，全靠高昂的士气与敌军相持。敌军毕竟是军阀部队，士气不高，各县民团更是乌合之众，眼见猛冲几次未能奏效，还被撂倒了十几个人，便不再主动往上冲，只是远远地用炮火轰击讨贼军。讨贼军得以凭劣势兵力和少量子弹坚持到黄昏。

天一黑，敌人更不敢进攻了。讨贼军从从容容地撤出阵地，回到李雨村的民团驻地古渡岗。聂鹤亭清点人数，共有 4 名战士牺牲，20 多人负伤。

当夜，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蔡晓舟、郑鼎、许习庸、聂鹤亭等分析了形势，认为目前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没有外援、仅凭这一支孤军作战的情况下，暂时是无望取胜的。他们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来，将武器也坚壁起来，等待有利时机，再图大举。会后，讨贼军部队立即进行了疏散，几位领导者分头撤离了吴山庙。

吴山庙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暴动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震慑了安徽的反动军阀，鼓舞了安徽人民斗争的勇气，因此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聂鹤亭来说，这次暴动是他第一次带兵，第一次当参谋长，第一次上战场打

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10年后，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长征到达西北的聂鹤亭时，聂鹤亭详细回顾了吴山庙暴动的经过，还分析了暴动失败的原因——缺乏经验，未能教育和训练好士兵，不知道如何发展与人民的关系和获得广泛的支持。斯诺将聂鹤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收录进他又一部记述中国革命的著作《红色中国杂记》中。

“铁军”军官

聂鹤亭和郑鼎躲过敌人的搜捕，潜回安庆。他们向安徽的党组织汇报了暴动经过，随后于11月底来到已被北伐军攻克一个多月的武昌。

郑鼎很快接上了党的关系。随后高语罕再一次会见了他们俩。在座的还有安徽歙县人柯庆施。柯庆施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这时正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党组织考虑到聂鹤亭的情况，决定安排他到叶挺独立团工作。几个月来，叶挺独立团虽战绩辉煌，伤亡也相当重，尤其是冲锋在前的连、排干部，每次大的战斗后都有许多缺额，急待补充。

聂鹤亭早就听说过叶挺独立团的威名。这支部队原来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后改编为独立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自出师北伐以来，独立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立下了赫赫战功，被世人誉为“铁军”。能到北伐名将叶挺麾下效力，能成为独立团这支从没有打过败仗的英雄部队的一员，聂鹤亭是十分高兴的。

聂鹤亭来到驻在南湖的叶挺独立团报到，被分配到第2营第6连担任排长，少尉军衔。第2营是独立团中经常打先锋的部队。叶挺曾当众说过：“我深深感到，每次战斗中，当我下了命令之后，我就跟着你们大家走了。比如贺胜桥战斗最后阶段，就是第2营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第2营营长正是聂鹤亭的熟人许继慎。许继慎在贺胜桥战斗中负了伤，刚刚伤愈归队，他也没有想到会在军营里见到一身戎装的聂鹤亭。

老朋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各自叙述了分别后的曲折经历。

许继慎忽然想到了一桩大事，问聂鹤亭：“你加入‘CP’了没有？”

“CP”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聂鹤亭摇摇头说：几年来自己虽一直按照党的指示行动，却因为总是到处奔波，尚没有得到加入党组织的机会。

许继慎爽快地表示：“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我介绍你加入党组织。”

几天以后，由许继慎和第6连第1排排长李岱岳介绍，聂鹤亭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入党后他才了解，叶挺独立团的连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排长、班长中也有将近一半是共产党员，团部设有党的支部，各营都有党小组。聂鹤亭所在的党小组，组长是第2营第5连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的周子昆。周子昆热情地给聂鹤亭送来《共产党宣言》、《向导》等书刊。聂鹤亭抓紧空闲时间潜心研读，进一步坚定了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叶挺独立团驻扎武汉整训期间，聂鹤亭常常参加第4军党组织召集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还听过施存统、高语罕、恽代英作的报告。报告内容有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分析中国革命形势的，也有介绍党现阶段的纲领、主张和政策的，等等。聂鹤亭感到每次听讲都颇有收获，自己的党性和思想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当时的叶挺独立团中，黄埔军校毕业生不少，聂鹤亭感到自己军龄短，军事素养不够，常向他们讨教军事上的种种问题。例如什么叫做“捷斯连科战术”等等。他也注意向有实战经验的老兵请教。有一次，叶挺讲话时，要求每个官兵都必须保持“铁腿、马眼、神仙肚”。聂鹤亭不解其意，问了排里老兵才明白，这是叶挺独立团的流行术语，意思是要做到能昼夜兼程长途跋涉，能连续作战不合眼不休息，能忍饥耐饿有饭多吃没饭不吃。

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4军扩编，新建第25师，朱晖日任师长，叶挺升任副师长。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任团长，许继慎任团参谋长，聂鹤亭仍在第2营第6连任排长。

1927年1月3日，武汉各界人民群众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鄂及北伐胜利大会。当天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国租界附近江汉关集会演讲。这时英国水兵突然登陆，驱逐、殴打集会群众，用刺刀扎死中国海员1人，打伤码头工人数十名，制造了“一三惨案”。

武汉三镇被激怒了，30多万人拆除了英方设置的沙袋、电网，冲进汉口英租界游行，坚决要求收回已被英国霸占多年的租界。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纷纷调集军舰，以动武相威胁，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武汉国民政府毫不示弱，决定派第73团开进英国租界，以维持治安名义为爱国群众撑腰。

聂鹤亭怀着义愤填膺的心情随第73团进驻汉口英国租界，作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面对中国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斗争，鸦片战争后一直在中国作威作福的大英帝国退缩了。2月19日，英国代表欧玛利被迫在《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上签字，将英国租界交还给中国。3月15日，《协定》正式生效，汉口英国租界的“米字旗”降了下来，租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聂鹤亭感到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他和团里的同志们议论说：“只要中国人敢于站起来斗争，就是十国联军打来也不怕它！”

正当大革命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达到高潮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内产生了东征讨伐蒋介石集团和北伐征讨奉系军阀张作霖两种意见。周恩来、赵世炎等主张东征，陈独秀、彭述之等主张北伐。争论之后，中央决定继续北伐讨奉。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等也主张继续北伐，先攻河南，与冯玉祥部国民军会师；再争取阎锡山的支持，进军北京。共产党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意见一致，继续北伐遂成定论。

4月19日，在武汉南湖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继续北伐誓师大会。聂鹤亭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并不清楚党内的争论，只是决心在北伐的战斗中冲锋陷阵，打出“铁军”的威风。

4月21日，聂鹤亭随第73团出发。他们高唱歌词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庆”的雄壮歌曲，沿京汉铁路向张作霖控制下的河南进军。

这时，张作霖已调集奉军主力第3、4方面军团，由其子张学良统率，开赴豫南战场。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5月14日的上蔡战斗中，聂鹤亭率全排战士由上蔡西郊猛扑敌人阵地。在枪林弹雨中，身边不断有人倒下，非死即伤，聂鹤亭却像没看见似地勇往直前，真有那么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有几个老兵原来对这位学生出身的新任排长抱怀疑态度，及至这一仗打下来，都心服口服了。

在5月17日的东、西洪桥战斗中，奉军在重炮的掩护下不断疯狂反扑，双方均伤亡惨重。战场所在地洪河的河水被伤亡士兵的鲜血染红，变成了一条“红河”。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支持不住，开始向后退却。第73团奉命出击西洪桥，团党总支进行了政治动员，号召党员和团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聂鹤亭对排里战士们说：“没有上级命令，我们一步也不能退！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往前冲！”

第73团官兵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奋勇争先，将正面守敌1个团打垮。紧接着，又将前来增援的奉军段国璋部击溃。上蔡守敌富双英待援无望，只得命令全旅放下武器，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改编。

5月27日，发生了继续北伐以来最残酷的临颖战斗。张作霖深知临颖一失，许昌、郑州、开封也保不住，所以用6万重兵坚守。张学良亲赴临颖，在誓师会上声泪俱下，陈说临颖事关奉军大局，动员守城将士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

国民革命军的火力远不如奉军，在临颖发起进攻后伤亡骤增。这时，从友邻部队第26师第77团传来消息：团长蒋先云负重伤阵亡了。

聂鹤亭见过蒋先云，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每逢恶战必身先士卒，立下过许多战功。聂鹤亭内心里是很钦佩蒋先云的。他抑制住自己的悲痛，把排里的几个共产党员找来，对他们说：“仗打到这个地步，就要看我们党员的了。刚才听到消息，蒋先云团长牺牲了。我们得学他，要死就死在战场上，绝不能贪生怕死！”共产党员们的心都被聂鹤亭打动了，一位老班长代表大家表示：“排长，你放心吧。你打到哪，我们一定跟到哪，绝不给共产党丢人！”

奉军在临颖城东挖了一条10多千米长的护城壕，护城壕与城墙之间又筑有坚固工事。第73团几次发起冲锋都未能得手，在护城壕前死伤枕藉。

5月28日下午2时，第73团再次发起进攻。这一次，国民革命军集中所有火力猛打奉军工事，不让敌人抬头。硝烟尚未散尽，聂鹤亭已率全排飞速冲向护城壕。他们连续不断地投出手榴弹压制敌人的机枪，接应全连、全营越过了护城壕。

乘奉军注意力被第2营吸引住之机，第1营从敌人的侧翼发起了进攻。他们派出20多名爆破手越过护城壕，把炸药运进了城门洞。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两扇城门都被炸倒。奉军的军心顿时动摇，工事里的敌人无心再守下去。第73团乘势冲进城去。奉军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防线彻底崩溃。下午4时，临颖全城被攻克，残敌被肃清。

临颖战斗后，聂鹤亭随第73团沿京汉铁路北进，又参加了许昌战斗、新郑战斗，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成长为一名英勇顽强、善于带兵的基层军官。他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上级的重视。为表彰他不怕牺牲、勇敢作战的精神，上级将他的军衔提升为中尉。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奉军的残兵败将退守黄河以北。北面的威胁已解除，武汉国民政府遂命令北伐的部队回师，准备东征讨蒋。

第73团也奉命撤回武汉。武汉街头出现了欢迎第4军、第11军凯旋的横幅和标语。其中一幅横幅上写有4个醒目的大字——“铁军钢矣”。“铁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声誉，令刚下战场的聂鹤亭久久难忘。

然而这时的武汉，已处在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前夕，氛围死气沉沉，与两

个多月前出师北伐时判若两城。聂鹤亭看到一座充满革命朝气的城市变得如此沉闷，想到大革命的前途正处在空前的危机之中，心情既沉痛又郁闷。

7月，部队移师江西九江，驻扎在距南昌50多千米的马回岭地区。不久，传来了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流反共的消息。这个消息使第73团全团上下都愤慨不已，共产党员更是人人心里憋着一股气。聂鹤亭预感到，这支共产党掌握的“铁军”即将有大的行动。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聂鹤亭所在的第73团全团与第75团3个营及第74团机枪连一道，在聂荣臻、周士第指挥下，以“打野外”为名，摆脱了张发奎的控制。聂鹤亭精神抖擞地投入了起义的行动，多日来的忧愁、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带领全排执行了向九江方向警戒张发奎的军队突袭的任务。

驻马回岭地区的起义部队首先占领了火车站，截断了九江通往南昌的南浔铁路，破坏了可资敌人利用的通讯线路。接着，部队火速南下，于8月2日进抵南昌，与起义军的主力——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的第20军、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部会合。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命令：以第73团为主扩编为第25师，编入第11军序列。由叶挺任第11军军长，聂荣臻任军党代表。周士第任第25师师长，李硕勋（李陶）任师党代表。

从8月3日开始，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陆续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当时的打算是：重占广州，依托海口，组织力量，再举北伐。第73团作为起义军的后卫，走在全军的最后，于8月6日撤离南昌。

起义部队冒着酷暑行军，于8月下旬到达江西南部，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遭遇。起义军以一部分兵力阻击黄绍竑部，集中主力1万多人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在攻打寨的激战中，聂鹤亭所在的第73团第2营第6连连长秦悦军负伤，聂鹤亭在火线上被任命为第6连连长。他带领全连攻上敌人的主阵地，不顾一天没有吃饭，连水也来不及喝，就向溃逃的敌军发起追击。

起义军越战越勇，终于攻克会昌，歼灭钱大钧部6000余人。战斗结束后，聂鹤亭第一次见到陈毅。陈毅由上级派来担任第73团政治指导员。他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在后来转战粤闽赣湘的艰苦日子里，陈毅常到第6连来，行军的时候帮战士们背枪、背背包，宿营后给大家讲革命道理，还跟战士拉家常。聂鹤亭很敬重陈毅。

经过一个月的行军作战，2万多人的起义军已减员过半，剩下1万多人。偏在这时，第20军参谋长陈浴新叛变，把起义军南进的计划和路线都泄露给了敌人。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决定改变原定的行军路线，由福建长汀沿汀江、韩江进入广东的东江地区。

这时，国民党军黄绍竑部又攻上来，第25师奉命迎击。敌军是桂系部队，死不交枪。战斗在南山岭进行了几个小时，仍呈胶着状态。

黄昏时分，聂鹤亭看到军长叶挺、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来到第73团。叶挺一向注重军人仪表，就是在疲劳的长途行军和紧张的战斗中，仍然扎着武装带，打着绑腿，军容严整。叶挺把连以上干部召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仗不能这样打，再拖下去，不利。我把所有的机枪、迫击炮、号兵都集中起来支援你们。你们要把全体战士组织好，把手榴弹带上，冲锋号一

响，就冲上去，拼刺刀也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聂鹤亭和各连连长响亮地答应一声：“是！”然后各自回到本连队，按照叶挺的要求迅速作好出击的准备。

叶挺一声令下，几十把铜号同时吹响，几十门迫击炮、上百挺机枪同时打响。第73团潮水般涌上敌人阵地。黄绍竑部顶不住了，溃退了……

此战歼敌两个营，缴枪数百支。在战斗中，使聂鹤亭印象最深的是叶挺——他在险恶的局势面前冷静果断，指挥若定，不愧意志如钢的“铁军”名将。在聂鹤亭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叶挺一直是他努力效法的榜样。

打退了黄绍竑，起义军经瑞金到长汀，取道上杭、峰市进入广东境内。聂鹤亭率第2营第6连担任后卫。后卫不仅时时要与紧迫不舍的敌人作战，还要收容全军的掉队人员，并尽可能劝说私自离队的人归队，肩负的担子很重。聂鹤亭克服种种困难，带领全连出色地完成了后卫任务。

9月23日，起义军兵分两路：周恩来、叶挺、贺龙等率主力进占广东潮州（潮安）、汕头地区，朱德率第25师进占大埔县的三河坝。聂鹤亭奉命带领第6连在三河坝担任警戒任务，防备敌军从西面梅县方向袭击起义军侧背。

国民党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此时执掌广东军政大权。他对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十分不安，立即派出陈济棠、薛岳等部1.5万余人东进，与西面的黄绍竑部夹击起义军主力；另以在会昌吃了败仗的钱大钧部进攻三河坝的第25师。

起义军主力与敌军苦战3昼夜，伤亡2000多人，无力再战，只得退出战斗。他们在向海陆丰地区撤退的途中，又遭敌军截击，军心本已动摇的部队大部分溃散。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分散转移。只有余部1200多人进入海陆丰，参加了在东江地区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后来，这支部队也失败了。

聂鹤亭率第2营第6连参加了朱德指挥的三河坝战斗。他们依托韩江有利地形，固守笔支尾山一线，连续激战3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在第25师阵地前，钱大钧部损失了1000多人，但仍未能越雷池一步，着实尝到了“铁军”的厉害。

10月6日夜，为接应潮汕地区的起义军主力，朱德率领第25师主动撤出战斗向潮州转移。计划取道饶平与起义军主力会合。恰在饶平，第25师与从潮州撤出来的贺龙所部第20军第3师200多人相遇，这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遭覆灭性失败。

两师部队会合后，虽还有2500多人，却失去了与前敌委员会的联系，陷入4万多敌军的包围，成了一支孤军。官兵们明白目前的处境，士气极度低落，一些人议论纷纷，灰心丧气。

在这个紧要关头，朱德把部队集合起来，在队前用镇定而有力的声音说：“现在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干下去，我们一定能干下去。只要有200条枪，我们就有办法。现在我们有2000人，以后可以发展到2万、20万人。中国革命是有前途的，愿意继续干革命的跟我来！”

朱德的这番话，使部队的情绪得到稳定，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聂鹤亭望着朱德坚毅的面容，心里热呼呼的。朱德虽不是“铁军”的老上级，但他的言行举止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却已使第25师官兵十分佩服。聂鹤亭和大家一样信赖朱德。他想：自己当然是要继续干革命的，那么就只有跟着朱

德走。

当地党组织派来了向导带路，部队经大埔、蕉岭进入福建。广东国民党军队钱大钧部在后面紧追，福建国民党军队蒋光鼎部在前面堵截，连土匪钟绍奎的队伍也沿路袭扰。朱德不与敌人恋战，指挥部队且战且走，从峰市打到武平。刚刚停下来休整了一天，钱大钧的1个师就撵了上来。朱德决定在这里杀敌人一个回马枪。聂鹤亭率第6连参加了这次退却中的反击战。战斗突然打响，敌军猝不及防，两团人马乱哄哄地败退下去。部队摆脱了追兵，进入江西境内。

连日行军、作战，官兵疲劳已极，部队得不到给养，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伤病员没有医药，往往是轻伤拖成重伤，重伤不治而死。时令已是深秋，上至朱德下至士兵穿的还是在南昌发的单衣短裤。为避开敌人，宿营不能在村镇里，只能在森林中。睡觉时，大多数人没有铺盖，只好抱着一些树叶御寒，一夜要被冻醒好几回。

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许多人动摇了，逃跑、离队、开小差成了常事，甚至有人拖枪叛变投敌。部队行军只要遇到岔道，就会有人头也不回地从岔道上自寻出路而去。每天宿营后，又会有人借故出走，第二天早晨再也不露面。第73团的一位营长，竟将全营官兵连同团部重机枪连一起拉走，连经理处的现款也被他骗去……

目睹北伐时期无坚不摧、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竟至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聂鹤亭十分痛心。他虽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掌握部队，一再劝说全连官兵跟着党走，跟着队伍走，但依然有几十个人连招呼也不打就扬长而去。他只好在队前宣布：对实在要走的人不勉强留，可一定得把枪留下。

10月下旬，部队转战到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朱德把全体排以上干部召集起来，推心置腹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在最困难的时刻，陈毅也向部队里保留下来的五六十名共产党员讲了一席话：“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朱德和陈毅的话，真是讲到聂鹤亭心里去了。他靠着对党的信念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苦苦撑持，终于把连队巩固住了。第6连既是人数保留较多的连队之一，又是战斗力最强的连队之一。在攻打信丰和大庾（今大余）的战斗中，他率领全连发扬叶挺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的传统，屡次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以少胜多，重创敌人，给朱德和陈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十几年后的1944年，为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曾在延安召开红1军团史座谈会。朱德在座谈会上说：“红1军团的来源，开始于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改组，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同志成立独立团，附属在第4军张发奎的第12师内训练。北伐时，该团约有2000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周士弟、陈毅、聂鹤亭，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可见朱德对聂鹤亭印象之深。11月初，朱德、陈毅在崇义主持了整编。部队此时还剩八九百人，原来的师、团编制早已不能适应现状了。整编后师、团

机构撤销，现有人员编成 1 个纵队，号称“国民革命军第 5 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朱德担任，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兼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纵队下辖 3 个大队，第 1 大队长周子昆，第 2 大队长林彪。聂鹤亭任第 2 大队副大队长。

聂鹤亭初到叶挺独立团时，就与林彪相识了。当时林彪是刚由黄埔军校分配来的见习排长，在第 2 营第 7 连任职。他俩同营不同连，接触不多。南昌起义后，他们同在第 73 团第 2 营担任连长，多次配合作战，逐渐熟悉起来。然而真正共事，还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在红 4 军、红 1 军团、抗日军政大学、东北野战军，聂鹤亭曾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多年，既受过林彪的表扬和批评，也向林彪提过尖锐的意见。如辽沈战役之前，他曾再三反对林彪先打长春的主张。辽沈战役实践已经证明，聂鹤亭的意见与中央军委的意见吻合，是正确的。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在 1927 年 11 月，聂鹤亭担任林彪的副手，配合林彪工作还是很得力的。

11 月底，部队来到湘南。虽说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开始了混战，对起义军的围攻有所放松，但起义军的粮食、弹药却更加困难。这时，驻防湘南汝城一带的国民党第 16 军军长范石生给朱德来信，希望“合作”，实际上是想收编这支部队，扩充自己的实力。朱德与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老同学，护国军、靖国军旧袍泽，私交不错。朱德为使饥饿、疲惫的部队在湘南站住脚，得到急需的给养和弹药补充，便将计就计，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听从共产党调动”的条件下，接受了范石生的番号，将部队改称第 16 军第 47 师第 140 团。

聂鹤亭毕竟还只有 22 岁，缺乏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对这次原则性和斗争策略巧妙结合的改编，他仅仅看到了部队重打国民党“王八旗”的一面，却忽视了部队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因而既“看不惯”，又“想不通”。他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如实写道：我当时的思想是，革命要继续下去，不能打退堂鼓。

于是，聂鹤亭向党支部书记周子昆提出：回上海找党，搞别的工作。党组织经过研究，同意了聂鹤亭去上海找党的要求。

聂鹤亭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工作、战斗、生活整整一年的“铁军”部队，离开了生死与共、亲如兄弟的战友们。他已与这支部队建立了难舍难分的感情，他是含着热泪、一步三回头地离去的。

在湘南、赣南农会的协助下，他换上便衣，取道吉安、南昌、九江、安庆，于 12 月初到达上海。

幸运的是，他再次找到了党的秘密交通员何步青，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沿途情况复杂，环境险恶，因此聂鹤亭没有随身携带组织介绍信。可天无绝人之路，恰巧熟人许继慎和柯庆施正在上海，便由他们两人向组织上证明了聂鹤亭的身份。

这时，党已在酝酿发动广州起义。鉴于聂鹤亭是有实战经验的“铁军”军官，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聂鹤亭得知这样的安排很满意，他的愿望也正是真刀真枪地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为牺牲的战友和被杀害的烈士报仇。接到通知，他一刻也没有耽搁就立即动身，昼夜兼程前往广州。

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12月8日，聂鹤亭在广州起义爆发前夕赶到了广州。党组织将他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官教导团特别班，身份是军官学员。军官教导团的团长，是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全团人员中，除个别反动军官外，绝大多数铁心革命，有“赤子赤孙”之称。聂鹤亭虽初来乍到，也感受到了一种浓烈的革命气氛。

在军官教导团，聂鹤亭遇到许多原叶挺、贺龙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都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历尽艰辛通过种种途径聚集到这里的，其中熟人不少。大家暗暗地互相鼓励：南昌起义失败了，不要紧，跌倒了还可以再爬起来。这次在广州起事，一定要成功，要胜利！

起义前夜，上级指定聂鹤亭到起义总指挥部当参谋。他兴冲冲地赶到总指挥部报到，见到了“铁军”的老团长、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叶挺。

叶挺刚刚从香港赶到广州，正忙着分析敌人的兵力部署。听聂鹤亭报告说他原是独立团第2营的排长，满意地说了声：“好！”又紧紧地握了握聂鹤亭的手。

聂鹤亭急切地问：“总指挥，我的任务是……”

叶挺不假思索地答道：“你的任务是哪里吃紧到哪里去！”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起义的枪声响了。聂鹤亭颈系红领巾，奔走于城内各支起义部队之间，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黄新廷转战晋冀抗日寇

胡立言

黄新廷(1913~)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3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洪湖市)宋家墩。1928年任苏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929年8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3军排长、连长、营长、侦察科长。1935年任红2军团第4师第12团参谋长、团长,率团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第716团团长,参加了滑石片战斗,冀中三战三捷,齐会、陈庄、米峪镇等战斗。1941年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秋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副旅长。1945年被选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第358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1军第1师师长、第3军军长,参加了保卫延安战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战斗,宜川、西府、荔北、扶眉诸战役,兰州战役中率部首夺黄河铁桥。1953年1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夏季反击战。1954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75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1977年8月任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当选为中共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1987年被连续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荣誉勋章。

黄新廷这位出身洪湖的打渔郎,一生伴随着硝烟成长。还是少先队队长时,他就参加了保卫洪湖苏区的艰苦战斗。长征中,打宣威,战宾川,首渡金沙江。抗日战场上,鏖战雁北,威震平原,他领导的团队成为贺龙手中的一只铁拳。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转战陕甘宁,进军大西北,他率领的第358旅是彭德怀麾下的一支劲旅。建国后,他仍驰骋疆场,曾指挥甘新青三省部队剿灭残匪,参加抗美援朝。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后,又战斗在平定叛乱的第一线。他身经百战,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军事指挥员,是革命战争中打出来的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保卫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文仅记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率八路军第716团转战晋冀,歼灭日军3个建制大队的赫赫战功。

滑石片歼灭日军蚋野大队

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沿平汉、正太、同蒲、平绥铁路,分25路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五台、阜平、涞源大举围攻。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0师配合兄弟部队作战。10月14日,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来电命令第358旅率第714、716团,越过同蒲铁路进入晋察冀边区,归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挥,粉碎日军进攻,把敌人驱逐出边区。

10月下旬,黄新廷率领第716团,进入五台县窑头地区的寨里村、中座村。团指挥所设在一户农民的大院子里。人还没有进屋,黄新廷团长就让通信员找来了参谋长刘忠、一参谋王绍南,二参谋胡超林。黄团长开门见山地说:“旅部的电台只能与120师联系,一直没有和晋察冀军区沟通,敌情不明,又得不到上级指示。当前,第一要封锁消息,部队行动绝对保密;第二要迅速组织侦察,摸清周围的敌情、地形。”遂决定组织一个侦察小组到五台县城附近进行侦察。黄团长特别嘱咐,让新调来的小参谋张霖参加侦察小组,他在五台城里长大,熟悉当地情况。

入夜,黄团长小屋里的炕上点着一盏油灯,他和政委廖汉生、参谋长刘忠三人围坐在一起。黄新廷说:“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搞好侦察,尽快摸清敌人情况。张宗逊旅长要求我们继续派出得力人员,扩大侦察范围,尽

早捕捉到战机。”

“明天就让我带领侦察分队出动，亲自摸摸情况。”说话的是刘忠参谋长。他30岁出头，人高体大，与26岁的团长相比，就像是一位兄长。

黄新廷说：“今晚可以喝二两，出去又得戒酒了。”

刘忠憨憨一笑。参谋长爱喝两口，全团皆知，但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执行任务绝对滴酒不沾。黄团长深知参谋长的这一习惯和戒律，在执行任务前也就作了这样的宽容。

当天晚上，天气突变，黑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窑头一溜9个村庄，像是被扣在了一口大锅底下。清晨起来，整个村野像是变了个模样，山峦、村庄全披上了银装，雪花在呼啸的北风中飞舞旋转，然后纷纷飘落下来，把人、牲口踩出的一条条污印遮盖了起来，保持着冰雪世界的纯洁与美丽。

黄新廷团长目送刘忠参谋长带领20余人的骑兵侦察分队，踩着厚厚的积雪，迎着凛冽的寒风，消失在白色的山峦之中。他返回指挥所，找来从五台城归来的侦察人员了解情况。听说五台驻有一支人数较多的日军部队，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

11月3日，风停雪止，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大地闪耀着银光，空气中透着一股湿润的甜丝丝的气味。战士们把院子、村路打扫得干干净净，在阳光的沐浴下，边擦枪，边猜测、议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团指挥所里焦急地等待着侦察分队的消息，没有人说话，显得格外沉寂。黄新廷站在桌子旁，伏身认真地看着军用地图，不时发出一阵翻动地图的沙沙声。

第358旅旅部与第716团团部同驻中座村，相距不远。中午，张宗逊旅长、张平化主任一起来到了第716团团部。他们以同样焦急的心情，等着刘忠参谋长归来。

太阳偏西的时候，马踩积雪的细碎蹄声由远而近地传来。团部的几个警卫员操着不同的口音，争着猜侦察分队离团部还有多远。这些从作战部队挑选出来的“机灵鬼”一个比一个聪明，他们能从马蹄声中判断出有多少队伍，有多远距离，一猜一个准。

猜测还没有结束，刘忠参谋长骑马的身影已进入了警卫员们的眼帘。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回团部，向首长们报信。

下午两点钟，刘忠等人策马来到团部，敏捷地翻身下蹬，气还没有喘匀，就开始向旅、团首长报告敌情：“驻五台日军110师团135联队蚋野大队700余人，昨晚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经过70里山地夜行军，今天凌晨偷袭了高洪口晋察冀2分区5大队，当地军民受了一些损失。”

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大家精神为之一振。黄新廷与其他旅、团指挥员不约而同走到地图前，把目光注视在高洪口至五台一线上。

5位指挥员你一言我一语地判断着敌情，取得了共识：这股敌人是孤军深入，单独出动，不可能带多少给养，且有后顾之忧，偷袭后必然要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敌人经过一夜长途行军，需在高洪口休息，估计3日晚或4日晨撤退；按照敌人的装备情况和以往行动规律，必然走大道，原路返回。

黄新廷与张宗逊旅长异口同声地说：“要抓住这股敌人不放。”

大家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在伏击地域的选择上。

黄新廷通过张霖及侦察小组已了解了这条道路的情况。他对着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手指在万沟村、滑石片两个地名之间来回挪动，对张宗逊旅长说：

“据侦察，这一带地形险要，高山间夹着一条七八里长的大道，道路紧贴山边而过，越往东山势越陡。我军若在此设伏，短兵相接，突然开火，一定能打个歼灭战。”

张宗逊旅长随着黄团长的手指，看着地图上一条实线两侧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中间的滑石片这个地名，把目光停了下来。他狠狠地把手向标着滑石片的小黑圈圈上一戳说：就在这里设伏，只要我们部队能及时赶到，歼灭敌人还是有把握的。

黄新廷说：“我军驻地距滑石片走最近的山路也有50华里，而日军从高洪口到滑石片仅有20华里。关键是……”

“关键是一个‘快字’。”张宗逊旅长没有等黄团长说完，斩钉截铁地说，“要和敌人抢时间，争取先期到达，作好伏击准备。起码也要和敌人同时到达，打个预期的遭遇战。”接着，他对黄新廷发出指示：“由716团担任伏击任务，进至滑石片两侧设伏并随时准备开进中与敌人遭遇，坚决歼灭敌人。714团担任五台方向阻援任务。”

张宗逊起身欲走又停了下来，加重语气说：“大家注意，要快！争取1小时之内出发。”

黄新廷与团里其他领导，分头下到各营下达任务。黄新廷来到第2营，正是部队临近开晚饭的时候。团长这个时候到来，那些绰号“小诸葛”、“早知道”的干部和老兵们，猜测准有“情况”。当团长布置完任务后，开饭早一点儿的连队，战士们狼吞虎咽，10分钟就吃完了饭；饭端出来晚点儿的连队，战士们边吃边往自己的碗里、茶缸中填塞，准备边行军边吃。大伙儿纷纷表示：“饭少吃一口没什么，赶在敌人前面消灭它要紧。”司务长、炊事员们自有一套让部队边走边吃上饭的“绝招”，哪能让部队饿着肚子打鬼子呢！

下午4时，部队出发了。11月的五台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山野被大雪所覆盖，寒风凛冽，道路难行。黄新廷骑在马上，反复琢磨，最后定下决心：不留预备队，3个营一起上，打个速决的伏击战。第3营拦头，第2营截腰，第1营堵尾……。

晚9时，第716团与旅指挥所均到达滑石片以西高地。敌人也几乎同时到达，远处传来了敌人的马蹄声及皮靴踏地的沙沙声。日军大队长蚋野诡计多端，尽力隐蔽其行动，行军纵队非常肃静，连马蹄上都套了特制的“草鞋”。

黄新廷命令部队加速向山下运动。

“报告团长，我们营只插过去两个连队，其他同志还没有过沟，敌人就上来了。”第1营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低声报告。

黄新廷说：“告诉1营长，没有过去的连队不要强行通过，注意隐蔽，把敌人全部放进沟里。3营在前边一打响，你们坚决堵住敌人后路，不能让一个敌人出沟。”

第3营刚下到陡崖上，日军尖刀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沟，战斗随即打响。第9连副连长张云祥带领十几名战士组成突击队，猛扑到沟里，十多颗手榴弹甩了出去，在敌群中炸开。

在高洪口捡了便宜，抢了牛羊，准备回五台报功的鬼子，万万没有想到八路军会在这儿冒了出来。蚋野中佐很快清醒过来，立即组织全部骑兵向我第9连正面猛冲，企图利用我立足未稳之际，冲出沟口。已经过去的十几个鬼子兵，听到枪声也掉转头来接应。

我第9连突击队两面受敌，寡不敌众。黄新廷命令第3营营长王祥发：“组织火力往下压，组织兵力支援9连突击队。”

王祥发脱掉棉衣，大吼一声：“11连跟我来。”第9连连长曾祥旺也带领其余两个排从侧翼压了下去。随着连续猛烈的爆破声，战士们冲到敌群中，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使敌人的火力优势无法发挥。

与此同时，第2营在营长蔡久、教导员黄新义分别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敌人压去，与向前拥进的大量日军遭遇。冲在前面的第8连将敌人拦腰截断，第6连、第7连从山上插下去进攻日军侧翼。第5连飞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座小庙，控制了制高点，给正在从东坡向上爬的日军一阵痛打。敌人无奈又滚回到沟里。被第2营、第3营打得措手不及的侵略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又掉转头来朝高洪口方向突围。

时刻注意第1营战况的黄新廷团长，听到第1营阵地枪炮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急促，便对身边的参谋长刘忠说：“从2营抽1个连支援1营。”刘忠抬腿向第2营跑去，亲自带领1个连队支援第1营战斗。

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第716团将蚩野大队分割成几段。大部分敌人被迫躲在陡崖下顽抗，少数退到沟西北的石沟村几间土屋里死守。

不容敌人喘息，黄团长立即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一片喊杀声，整条沟里形成了无数个围歼侵略者的火力圈和格斗场，枪炮声、刺刀撞击声、呐喊声回荡在五台山间，火光、硝烟、尘土弥漫在峡谷之中。

在激战中，黄新廷又将指挥所前移，以便更好地观察战场，指挥部队全歼侵略军。

火光中，第9连冲向日军盘踞的石沟村，将一束束手榴弹投向敌据守的屋内。敌人的机枪哑了，十几个鬼子兵端着枪冲出土屋狂奔。这时，第3营恰好赶到，将外逃之敌堵住全歼，敌人无一漏网。陡崖下3户窑洞里，一伙日军被我包围，仍在顽抗。第6连冲了进去，将顽敌消灭，并缴获了一部还没有来得及架设的电台和几笼军用信鸽。这位蚩野中佐被第716团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没有来得及向他的上司发出求援信号。

黄新廷指挥第716团指战员，与日军进行了彻夜激战，拂晓前将敌人全部歼灭。这一仗，消灭日军蚩野大队700余人，缴获战马135匹，山炮2门，小炮4门，轻重机枪30挺。第716团阵亡干部4人、战士47人，有15名干部、62名战士负伤。

当太阳在东方高高升起时，黄新廷带领第716团的抗日健儿向高洪口前进。高洪口的乡亲们得知前一天还在杀人放火的日本侵略军，一昼夜间竟在滑石片成了英勇的八路军战士的枪下鬼，欢喜地流着热泪拥上前去，热烈欢迎子弟兵胜利到来。

11月7日，也就是在八路军夺得滑石片战斗胜利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大吹大擂动用5万大军的“北围五台”行动，草草收场，以失败而告终。

黄新廷奉命离开晋察冀边区，回师晋西北。这支凯旋而归的队伍成为一支出色的抗日宣传队。指战员们骑着缴获的战马，携带着战利品，迈着矫健的步伐，高唱着战歌前进。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列队迎送威武的八路军将士们，吹呼声、口号声和掌声把队伍从一个村镇送往又一个村镇。遇有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城镇，出操的士兵像接到一道无声的命令，全部停止了操练，把敬佩和羡慕的眼光投向第716团的行军行列，有人甚至情不自禁地高喊：

“向八路军学习！”

国民党骑兵第1军军长赵承绶对八路军1个团消灭日军1个大队感到震惊，把部队的家属基地娄烦镇特意让了出来，给第716团驻防，以示敬佩之意。

挺进冀中，三战三捷

1933年末，为了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的方针，中央决定第120师部队到冀中平原去，开展抗日斗争。中央赋予第120师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帮助冀中第3纵队整训发展、扩大自身力量三大任务。

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决定亲率第716团、独立1支队、教导团挺进冀中，并命令开辟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第715团带两个营，到冀中会合。

黄新廷率领第716团经过一个多月时间、700余里的长途行军，突破了敌人同蒲、平汉铁路数道封锁线，于1939年1月19日到达冀中大平原。第716团指战员大多来自山区，战斗在山区，突然进入陌生的平原，心里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失去了山区地貌千变万化的熟悉方位，甚至有些辨不清东西南北。尽管一路之上指挥员们对习惯在山区作战的战士们进行了平原战斗的教育，但一到现地，大家心里依然犯起了嘀咕：“这么大的平坝子，无遮无挡，这仗怎么个打法？”“大冬天无草无木，一眼望出去十几里，兔子都难藏身，成百上千部队怎么隐蔽？怎么伏击？”大家真有点“虎落平阳”之感。

黄新廷是少数几个在江汉平原长大的指挥员。他从岚县出发的第一天，就琢磨着平原作战的问题。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掌握平原作战的本领，成了他在滑石片战斗以后和向平原进发时经常思考的中心问题。地形地貌，村庄组成结构，道路的改造利用，何时日出，何时日落，月光下、垦空里能见度与山区的区别，目测距离误近不误远的特点，乡亲们的服饰打扮，生活习惯……都成了他研究考察的对象。他还给指战员们提出了不少需要尽快了解和研究解决的课题，诸如日军部队机械化程度、在平原的行军速度、作战特点、行动规律、在大平原如何依托和改造村庄、如何依靠人民群众等，一时间部队中形成了一股研究如何进行平原游击战的浓厚空气。

第120师到达冀中时，形势已十分严峻。冀中区战略位置重要，直接威胁着日军盘踞的华北重镇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岁末年初，日军对冀中区连续进行了两次围攻，占领了5座县城。八路军冀中军区成立不久，部队新，组织尚未健全，敌人的围攻给冀中根据地造成了极大困难。少数部队思想混乱，群众情绪亦十分不安，反动势力活跃。形势急待扭转。

面对这种形势，贺龙师长、周士第参谋长及黄新廷团长等指挥员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打几个胜仗，痛歼日军，打掉其嚣张气焰，才能稳定冀中军民情绪，才能增强部队平原作战的信心，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立足大平原。

黄新廷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和尚不巩固的平原根据地，第716团这个挺进冀中唯一的一个完整建制团任务十分艰巨。如何打几个胜仗，特别是如何打好第一仗，首战告捷，成了当务之急。

战争的情况瞬息万变，黄新廷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第120师刚刚到达

冀中，同第3纵队的联欢会还没有开完，日本侵略军依据所谓的“南号作战”计划，对冀中根据地的第3次围攻已经开始了。

日军从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两个师团中抽调了两个联队、两个大队共7000余兵力，分3路并进，向冀中区气势汹汹地扑来。3路敌人中，战力最强，行动最快的是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联队长宫崎富雄大佐，是个侵华老手。“七七”事变中，他率部攻打北平南苑机场，进占北平、天津，守备保定，后又奉调华中，参加侵占武汉的“会战”，连连受到侵华日军总部的表彰。现在又调回华北，与八路军作战。宫崎的第3联队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军队，下属3个大队并配属大量炮兵、坦克。他们倾巢出动，分兵数路，相继占领了我河间、献县，尔后抢粮拉夫，构筑工事。宫崎富雄矮墩墩的身体，长着一付狡诈凶残的嘴脸，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亲率主力一部占领河间城，企图继续向肃宁进攻，扬言不日将占领整个冀中区。

黄新廷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战机，与政委廖汉生一起到师部驻地向贺龙师长汇报情况。

贺龙赞同黄新廷的意见，并坚定地说：“日军侵入冀中以来，还没有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将骄兵狂，孤军出扰。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个弱点，狠狠地打击一下！”他嘱咐说，这是第120师进入冀中第一仗，要周密组织，保证首战必胜。

黄新廷受领任务后，对敌我情况作了详细分析。虽然团里不久前抽调3个连队及参谋长刘忠等十几名干部交给余秋里组建第3支队，力量有所减少，加之平原作战还没有经验，但敌人并不知道我军已进入冀中，只要准确掌握敌情，口不要张得太大，选择有利作战地形，把握战机，打一个胜仗还是有把握的。他派出二参谋胡超林带领侦察分队深入到敌人鼻子底下，随时了解敌人行动；自己则与新任参谋长王绍南一起，亲往河间通往肃宁大道中段两侧侦察地形。

黄新廷相中了大道北侧一个不显眼的小村曹家庄。曹家庄以西是梁村，以北是解中堡，以东是中堡店，以南是管中堡。五六个村庄相距不远，形成一个菱形村落群，座落在河间与肃宁大道中段，是个理想的待机歼敌地域。

黄团长决定派第3营第10连在曹家庄占领有利地形，向河间方向警戒；主力隐蔽在周围村庄待命。黄团长善于发挥指挥员的长处。第10连连长杨福明，人高体壮，长着一张红润的“福相”脸膛，大伙儿送给他一个绰号“长官”。他善于动脑，作战机动灵活，常常出敌不意致胜。他受领任务后，立即组织连队构筑工事，改造村舍，以利于防守与出击。

1939年2月2日，日军宫崎联队第2大队200余人和伪军一部，拖着山炮、步兵炮备1门，沿公路向西开进，企图进攻肃宁县城。宫崎果然狡猾，出动前故意向老百姓放风说“明天（3日）皇军出城打游击”，以迷惑我军。当天敌人走到三里庄，就有群众骑自行车抄近路向我值班部队报告。群众尚不了解这支穿着灰军装、代号叫亚6团的部队，听说鬼子兵出动，纷纷向后跑。梁村一户人家办喜事，新郎没顾上脱下新衣，撒腿就跑。

黄新廷团长立即部署战斗；廖汉生政委则组织人员安抚群众，要大家不要慌张。

上午9时，日军向第10连阵地开火。连长杨福明沉着冷静。敌人打炮，他让部队隐蔽。炮击后，他组织优秀射手先撩倒几个鬼子，以引逗敌人。当敌人展开战斗队形，接近我前沿阵地50至30米处时，我军各种枪支一起开

火，一排排手榴弹落地开花。骄横的鬼子兵在冀中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狙击，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第 10 连依托村庄，很快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黄团长从敌人的行动中进一步证实：日军并不知道我军主力部队到来，孤军与我遭遇，出乎意料。他决心抓住战机，歼灭这股敌人，夺取首战胜利。

黄团长对身边的参谋长王绍南说：“立即通知王祥发营长，命令他带领 3 营其他连队投入战斗，固守曹家庄阵地，吸引敌人进攻。命令 1 营向敌人侧后迂回，发起攻击，打击敌人侧后，截断敌人退路。”

王祥发指挥第 9 连、第 12 连首先向敌人发起冲击，歼敌一部，迫敌退出曹家庄以南坟地，狼狈后窜。黄团长又命令第 1 营及第 2 营 1 个连投入战斗，杀伤、击溃日军一部。敌人遭此意外痛击，于 11 时退至中堡店固守待援。

黄新廷团长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向中堡店发起冲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双方激战 3 小时，我军越战越猛。敌已渐不支，龟缩村内，依靠村舍顽抗。

附近村庄的乡亲们见亚 6 团指战员英勇顽强抗击日本鬼子，深受鼓舞，冒着弹雨把食品送到部队中。当部队把鬼子兵包围起来时，许多群众拥向前沿，有的把春节准备的供品也拿了出来，塞到战士嘴里。他们一边送食物，一边流着泪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有这样的军队，鬼子就长不了。”支援前线的群众越来越多，抬担架、送伤员全包了。梁村那位新郎，连长袍、礼帽都没有来得及脱，就抢着抬担架。部队领导问他时，新郎不好意思地说：“你别见怪，过去有些队伍打一下就跑。鬼子来了，我们不跑不行啊！你们可不同，硬把鬼子给打趴下啦！”部队的同志一再劝他回去，他坚持要留下，急忙说：“你们让我抬一步也好啊！”战士们深受鼓舞。

下午 3 时，河间、任丘方向日军 400 多人，分 3 路前来增援。其中，一路骑兵 150 余人。虽有数名群众前来报告，但未赶到敌人前面。

进攻中堡店的我第 1 营部队腹背受敌，情况变得严峻起来。

黄新廷团长迅速作出决断：命令第 1 营立即转移杜中堡，第 3 营全部集结曹家庄。贺龙师长及时派来独立第 1 支队 1 个营加强第 716 团。

增援之敌与中堡店日军会合后，以猛烈火力向第 716 团射击，并组织骑兵、步兵轮番冲击，企图夺回杜中堡、曹家庄以北阵地。第 716 团的勇士们以旺盛的斗志，利用地形，充分发扬火力，沉着机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至下午 5 时，日军始终未能出村，只好转攻为守。

太阳从地平线上慢慢消失，天色渐渐黑了下來。黄新廷不失时机地调整了战斗部署，命令蔡久营长率领大部还没有投入战斗的第 2 营，向日军占据的解中堡、中堡店进行强攻；调第 1 支队 1 个营迂回敌后，断其退路。

晚 8 时，我军向敌人发起猛攻。第 2 营首先攻下了解中堡，又悄悄摸进了中堡店，与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近战。

敌人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于夜半拉着 30 多辆大车的尸体和伤员，绕道向河间城撤退。

黄新廷马上组织部队追击。他亲自率领第 2 营及独立第 1 支队 1 个营紧逼上去，尾追逃敌，一直追到河间城西门与北门，并占领了北街。深夜，巨大的爆炸声，清脆的枪声，震撼了河间城。惊恐失色的宫崎富雄万万没有想到，派出去的援兵不但没有解围，却引来了窝巢失火。他急忙调动兵力，坚守城中各个要点。

黄新廷根据具体情况，没有强攻敌扼守的据点，命令部队立即撤出战斗。河间城内探照灯大开，枪炮声大作。宫崎组织了一个不小的场面，“欢送”第716团凯旋而归。曹家庄一战，我军歼灭日军150余人，首战告捷。

胜利的消息迅速在冀中大平原传播开来。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河间城鬼子夜间不敢睡觉。”“亚6团来无踪，去无影，专打鬼子老窝。”……曹家庄周围的菱形村落群更是热闹非凡，支起了过年用的大锅，杀猪、宰羊、蒸馍，到部队慰问的群众络绎不绝。村里人还集资建立了一座石碑。中堡店一前清贡生受乡亲们委托，专门写了碑文，热烈祝贺我军胜利，悼念阵亡烈士，以世代缅怀。

部队也从群众的抗战热情中受到极大的鼓舞。19个小时连续战斗，部队没有做过一顿饭，群众送的食物吃也吃不完。乡亲们送情报，救护伤员，掩埋烈士遗体，竭尽全力支援部队。亚6团又流行了一句新的歇后语：冀中乡亲——真好。

黄新廷团长很快收敛了胜利的喜悦，仔细思考着这一仗的利弊得失及敌人可能作出的反应。这次战斗，我军未能及时发现日军骑兵支援分队，原以为是少数骑兵侦察，实则为一百人的作战部队；断敌退路动作不快；首战动员充分，却忽略了保存自己的教育，不少战士直着身子冲锋，增大了伤亡。战斗中有6名干部、39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友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换取了平原歼敌的经验，赢得了冀中人民的信赖。

2月3日清晨，天空中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晶莹的雪花无声地飘落在大平原上。战斗的胜利，瑞雪的降临，一洗人们在日寇围攻中的阴郁心理，显现出一息生气。

黄新廷率领第716团，如这静静的雪花一样，悄悄隐蔽转移到了大曹村、刘家疃、大王庄地区，待机再战。在曹家庄胜利的当天，贺龙师长就对黄新廷说：“马上转移，别只顾发‘洋财’喽。搞不好，今晚就有你们的苦头吃。”师、团长对此认识是一致的，判断是准确的。

骄狂的宫崎富雄，怎甘心失败。他报复心切，派遣大队长汤田四凯，于4日拂晓，带着步、骑、炮兵千余人，山炮5门，迫击炮8门，借着朦胧的夜色，冒着零星小雪，隐蔽前进到距大曹村5里地的小刘庄，准备对八路军进行偷袭。汤田信奉金钱万能，抓来一个老百姓，允诺给钱，让他到大曹村跑一趟，看看有无八路。这位乡亲，来了个将计就计，急匆匆地赶到第716团团部报告：“日军有几十人到了小刘庄。”狡猾的汤田在收买这位老百姓时也留了一手，只让他见到刚进村的一小部分日军。

黄新廷判断：此股敌人最大的可能是大部队的先头分队，也不排除是小股敌人。为了迅速弄清情况，他决定派第2营第7连对小刘庄进行火力侦察。同时，命令第2营其他连队及第1营占领大曹村阵地，准备迎战。

黄团长带领李书茂、张霖、宋仁荣几个参谋，从刘家疃团部来到大曹村，勘察地形。他嘱咐两位营长，按照村外坟地、村沿沟坎、村边房屋组成三层防御阵地，充分依托村大、地形变化多的特点，打击敌人。

上午8时，日军对大曹村进行猛烈的炮火急袭。阵地上掀起一团团积雪夹带泥土、弹片的混合物，忽起忽落。炮火急袭后，步兵发起冲击。在我第1营、第2营正面有五六百敌人，形成多层散兵线，黑压压一片冲了过来，歇斯底里地叫喊随着刺刀的寒光向前推进。

黄新廷命令团迫击炮群向日军散兵线射击。炮弹准确地接连命中敌群，

在密集的进攻队形中打开一个缺口。当敌接近我前沿 50 米时，我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敌人一排排倒了下去，缺口扩大，散兵线破碎，第一次冲锋被打退。日军过去这种屡屡得手的武士道式的阵式，在第 716 团勇士面前，却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汤田四凯气极败坏，指挥日军连续发起 3 次进攻。

日军在我第 1 营阵地上疯狂地发射了上百发炮弹。有秩序隐蔽在村沿的战士们，被敌人炮弹掀起的泥土埋在了沟坎下。迷信武器的日军，以为他们强大的火力已使八路军阵地成为无人阵地。当敌人直着身子向前冲击时，从泥土中钻出来众多八路军战士，一排排子弹向敌人射去，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鬼子兵号叫着横尸在我军阵前。

在我第 2 营阵地上，只有第 5、第 7 两个连队百余人。日军一次冲击，正面投入 400 人兵力。蔡久营长灵活指挥，组织交叉火力，叠次射击；组织投弹组，移动投掷，在敌人距我军阵地前 10~20 米的距离时突然开火，取得最佳杀伤效果。他们还及时向团炮兵指示弹着点，校正射击，步炮密切协同，打退了日军成倍兵力的进攻。

穷凶极恶的侵略军 4 次强攻，均告失败，于是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一时，阵地上毒雾腾腾，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指战员们迅速用毛巾包上积雪捂住口鼻，继续坚持战斗。

毒气随风吹到了团指挥所上空，正在紧张指挥战斗的黄新廷团长还没有顾上防毒。警卫员周天顺将一块湿毛巾捂在了团长嘴上。打退敌人进攻后，黄团长才觉得一股臊臭味袭击口鼻。他问周围同志：“这是一股什么味道？”

“报告团长，这是尿味。我听说尿能解毒，就把尿撒在毛巾上了。”周天顺回答得理直气壮，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汤田四凯放毒后，命令士兵放心大胆进攻。但是，被敌人卑劣行径激怒了的八路军战士们愈战愈猛，火力越来越烈，日军纷纷被击毙在我军阵地前。

黄新廷团长判断敌人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抓住时机，指挥第 2 营从正面，第 1 营从翼侧，在炮火掩护下，对日军发起了反冲击。战士们带着国恨，带着为两天前牺牲的战友复仇的强烈愿望，猛打猛冲，乘胜夺取了敌人的阵地。

感情不易外露的黄团长，也禁不住赞誉道：“我们的战士真是好样的，打得痛快！”

太阳落在平原尽头的地平线上，夜幕降临了。黄团长决心利用夜暗解决战斗。他命令第 1 营、第 2 营继续从正面进攻敌人；把一直还未来得及上阵的第 3 营也投入战斗，命令王祥发营长绕到敌人侧后，围歼日军。

23 时，第 716 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发起了总攻。此时，日军只有招架之功了。气势汹汹的侵略者，变成了狼狈溃逃的败兵，不顾一切地朝河间城逃窜。王祥发率第 3 营紧追不舍，直追到河间城下，杀伤逃敌一部，再次给宫崎富雄一个痛击。

大曹村一仗，我军歼灭日军 300 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 80 多辆大车的军用物资。日军大队长汤田四凯负伤。

刚赶到冀中的第 715 团，在邢家庄也打了个胜仗，歼敌上百。新组建的第 3 支队在板家窝也初战取胜，消灭日军 80 余人。

我军初到冀中，一个星期里三战三捷。日军大吹大擂的所谓“南号作战”对冀中区的第 3 次围攻被粉碎了，宫崎富雄不得不放弃攻占肃宁的计划。

精于思考的年轻团长黄新廷心里又在掂量着这次战斗的得失。进入冀中时，第716团的实力并不很强，部队在山西连续作战，减员较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到冀中后又抽调出3个连队和部分干部，全团不足千人。战士们长途行军，鞍马劳顿，没有得到充分休整，便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大曹村战斗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劣胜强、以劳对逸的战斗。使黄新廷高兴的不只是一次战斗的结果，而是部队取得了平原作战的经验：充分依托村落，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歼灭敌人。这次战斗与曹家庄战斗虽只隔了两天，但我军却有了长足的进步。战斗中日军发射炮弹500多发，特别是第1营白天防御敌百发炮弹的轰击，部队无一伤亡。全团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战斗的重大胜利。

第120师坚决的战斗行动，使日军连遭打击，被迫龟缩在城里。宫崎富雄带着主力，窜到冀南阜城，留下1个大队守着这个倒霉的河间城，一时再也无力组织大的进攻。黄新廷率领第716团驻在河间等4县搭界的窝北镇，第一次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整机会。团里还补充了一批冀中参军的新战友，迎来了白求恩大夫带领的东征医疗队。

黑马张庄伏击侵略军

1939年2月14日，黄新廷与政委一起到东湾里，参加了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并建立以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区总指挥部。

贺龙在会上提出以第120师部队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冀中军区部队主要进行整训。作为第120师在冀中的主要作战部队的团长，黄新廷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可不轻。会后，贺龙亲自给他布置任务，一是把冀中区第30大队交予第716团协助整训，配属作战，提高战斗力；二是打击驻河间的日军，伺机歼敌。

我军三战三捷之后，日军已不如以前那样骄狂，近期也没有寻找我军进攻的迹象。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是“引蛇出洞”，还是见机奇袭？一直萦绕在黄新廷的心头。

东里湾会议一结束，黄团长就找来二参谋胡超林，对他说：“交给你一个任务，到河间城里去，把鬼子近期的活动情况给我摸清楚。”二参谋是团司令部负责侦察工作的。胡超林侦察员出身，有胆有识，经验丰富，过去常常单独完成侦察任务。黄新廷嘱咐道：“不要搞单枪匹马闯关，要组织几个精干的侦察员，充分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情况摸得越细越好。”从这一天起，侦察分队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一个个装扮成骑自行车的、挑柴的、拾粪的，直到天黑才回来。房东几天见不着人影，还以为调走了呢。

2月17日，也是阴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黄新廷率领蔡久和王祥发两个营，还带上第30大队的部分干部战士，悄悄地来到了河间城下。他周密部署，突然向河间城发起袭击，一举攻进城内。河间城内几个不同方向，同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驻河间日军大队长在一片慌乱中醒来，一面紧急向联队求援，组织部队占领城内各个要点；一面侦察八路军主力的方向，组织兵力阻击。就在日军仓皇调动之时，我军早已撤回窝北镇。战士们兴奋地向乡亲们讲述黄团长年关奇袭河间城，小鬼子老窝被掏呼救兵的故事。第30大队队长对黄团长说：“我们在4分区时，驻地常常被鬼子兵偷袭，

处于被动应付中。今天像是出了一口气，大家特别激动。”

黄团长说：“我们这是‘敌驻我扰’，让鬼子不得安宁。瞅准机会，咱们一起把敌人一股一股给消灭掉。”

黄团长的第一个目的确实达到了。据侦察，日军从此睡觉都不踏实，每晚上半夜住东街，下半夜住西街；活动也受到限制，只在白天才敢出来巡逻，夜间在城里忙着移动式睡眠。

夜幕低垂，天空中闪烁着群星，窝北镇骡马进圈，鸡犬归窝，只有黄团长住的那间农舍里，仍然亮着灯光。二参谋胡超林拿着一个小本本，上面画着一些谁也不认识的符号。他正在汇报河间日军的情况：“驻河间的鬼子吉田大队，最近天天出城骚扰，每次出动兵力200多人。每到一个村庄都要抓夫抢粮，掠夺群众财物，逼迫群众填平村庄之间我军运动的道沟。我们多日观察，敌人总是单日出西门进北门，双日出东门进南门，早出晚归，来回不走一条路。”

黄新廷团长问：“敌人活动半径有多大？”

胡超林答：“这些天都在城周围两三里之内活动。”

黄团长轻拍桌子站起来说：“好！你们继续侦察，千万不要惊动敌人。”语气中隐藏着喜悦。

春节过后，敌人的活动半径扩大到城周围五六里外。2月26日，胡超林向黄团长报告：敌人袭扰了南三里庄。河间以西，道路两边，城周围地区的村庄都遭到了骚扰，只剩下黑马张庄一个村子还没有去。

这一天，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窝北镇的人们正睡得香甜。第716团的营长、教导员们急匆匆地赶到团部。王绍南参谋长向各营指挥员简短传达了团里在黑马张庄作战的意图、决心及贺龙师长对这次作战行动的要求。

黄新廷团长强调说：“这是我们平原作战中的第一次伏击战，它不同于山地伏击。这次我们要依靠人口稠密的村庄设伏，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隐蔽作战意图。出发前只向部队宣布夜行军纪律与注意事项，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具体战斗任务，到达伏击地域后再宣布。”

一次特殊的紧急集合，没有急促的军号声，没有各分队报告的宏亮嗓音。战士们如天空中的浮云，无声地聚拢起来，个个精神抖擞。随着黄团长一声“出发”口令，部队出窝北镇悄然向西走去。老兵们正揣摸着走向何处，突然队首又改变了方向，向东开进。队伍绕过村庄，远离农舍，在道沟中隐蔽前进。在卫生队的行列里，一位高鼻子、黄眼睛的大夫带着8个人，牵着4头骡子，在静肃中跟进，这是白求恩的东征医疗队。队伍末尾有几个扛着扫把的战士，扫掉脚印。

黄团长率领着第2营、第3营部队准时到达设伏地。黑马张庄是座不大的村子。传说以前该村有一张姓人擅养黑马，为绿林好汉窦尔敦养过马，因而得名。黄团长指着一栋如鹤立鸡群的高房子，对身边的张霖参谋说：“那儿就是我的指挥位置。”张霖迅速带着几个战士前去安排。黄团长带着两位营长一起来到大道以北。他指着村东北侧一片农舍和村沿沟坎说：“王祥发，你们3营在这里占领阵地。”然后又到了大道以南，对蔡久营长说：“你们2营在路南侧设伏。”

黄新廷来到特务连时，二参谋胡超林与连长何腊光都在。团长见面就问：“胡超林，人员都布置好了吗？”

“报告团长，一切都照您的指示办了。胡必明参谋带一个侦察班到河间

城里去了。在果子洼和堤口村化装侦察的苏子龙班也出发了。黑马张庄周围的一个班，由吴子龙带着，天亮再出发。我与何连长负责封锁村子，一切人员只许进村，不许出村。”

黄新廷说：“对出村进村的乡亲要讲清道理，可不能像在河间城那样神气噢！”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

黄团长回到指挥所时，天已经亮了。参谋张霖报告，政委率领第1营及第30大队在果子洼已安排好了。果子洼是团预备队设伏地。

作为指挥所的这座高屋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位置。黄团长举目远眺，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大地飘逸着的一层晨雾开始散去，远处出现了吴子龙侦察班的熟悉身影。他们一身当地农民装束，头上裹着白毛巾，有的斜挎着粪筐，有的正往麦地里堆雪，三三两两在田野里忙碌着，不时向东了望。村里家家炊烟袅袅，鸡啼远一声，近一声，不时还有几声犬吠，就像一首动听的田园奏鸣曲。面对此情此景，黄团长又想起了前几天缴获的一份日军文件，上面写着：“白天村外无一人，一定有八路潜藏。”想到此，彻夜未眠的团长一点倦意也没有，叫上两个参谋一起向第2营阵地走去。

黄团长对部队阵地设置挺满意，与第2营教导员黄新义一起焦急地等待着敌人出动的消息。

黄新义说：“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怎么还不见敌人的动静？”

黄团长胸有成竹地说：“倘鬼子不到这里来，按第二方案执行，照样歼灭它。”第二方案设想敌人万一不到黑马张庄，则由第2营、第3营执行断后任务，由第1营与第30大队对敌形成南北夹击。

说话间，侦察参谋胡超林报告：“吉田大队步兵200余人，骑兵20余名，携山炮1门，重机枪3挺，已经出了河间城，经堤口村，正向果子洼前进。”

黄新义高兴地说：“团长，敌人还真听你指挥呀！”

3月1日晨8时半，日军向黑马张庄开来。先头为敌步兵80余人，骑兵8人，成两路纵队，队前有一军官牵着一只狼狗，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地。敌军的帽扇在冷风中晃动，像两只猪耳朵。他们对我军的阵地一点也没有察觉，临近村庄不但没有展开队形，反而紧缩间隔，拿出武士道姿态，重踏铁蹄，耀武扬威。

敌人距我阵地百米时，突然，机枪怒吼，手榴弹爆炸，30多名日军当场毙命。被打懵的敌人仓皇散开，有一部分向村北老乡浇水看地的一所独立家屋拥去。王祥发乘敌混乱，指挥第10连冲击，又歼敌一部。

敌人后续部队很快冲了上来，占领了村北一块坟地。

第2营教导员黄新义率领第7连向独立家屋之敌冲击，歼敌10余名，残敌逃向坟地。敌人被全部压缩在坟地后，黄新廷立即命令炮兵进行射击，并掩护第7连继续冲击。黄新义端着机枪，身先士卒，冲向敌群，左手中弹，仍坚持战斗。

敌人利用坟地的每一个坟包，顽强抵抗。黄新廷及时调动外围部队，准备从翼侧对敌人发起进攻。

战斗在激烈进行中，侦察分队向黄团长报告：河间敌人出动150多人，已进至果子洼；随后，又有60余敌跟进。黄新廷命令第1营阻击敌人前进。两股敌人汇合后，分别向黑马张庄、柳林进攻。下午，敌人又派骑兵40余人，增强了进攻柳林的兵力；但均被我第1营击退。

黄新廷重新部署了兵力。他来到第2营、第3营阵地，对蔡久、王祥发

交待：“现在敌人已增到450多人，城内必然空虚。敌人很可能在黄昏前撤出，返回城里。你们一定要拖住敌人，坚持到黄昏，歼灭这股鬼子。”他同时命令第30大队一部由北向南进攻，与第2营、第3营对村北坟地形成夹击之势；命令第1营1个连自柳林向果子洼进攻，其余部队于黄昏后向樊庄运动，断敌退路；第30大队1个营袭击河间县城，并准备消灭漏网之敌。

战斗打响后，附近村庄的乡亲们纷纷来到阵地上，有的送食物，有的救护伤员，有的跑到敌人后方破坏道路。距黑马张庄十几里的刘家疃，一个村子就出动百余人。平原上涌现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军民协手战寇图。

夕阳的余辉还没有完全退去，红红的晚霞仍在天际。“嘀嘀嗒嗒、嘀嘀嗒嗒……”冲锋号声猝起。王祥发、蔡久举起驳壳枪，几乎同时喊出：“冲啊！”部队从四面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扑去。第8连班长王福海一个箭步冲到鬼子的机枪斜侧，抓住正在发射打得滚烫的枪管，猛力夺了过来，迅速扭转枪口射向敌人。不少新入伍的战士在老兵的带领下，与日本鬼子展开肉搏战。

村北坟地的敌人支持不住了，向果子洼逃去。柳林的敌人支持不住了，也向果子洼逃去。顿时，敌群大乱。

王祥发立即派出两个连队拦截敌人。全团各营连，按照团长命令抓住战机，一齐向果子洼进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纷纷向河间溃逃。此时，黄新廷团长已来到河间城下，他看了看表，已是凌晨3点，对身边的一参谋李书茂说：“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白求恩大夫在前线包扎所里，从3月1日下午开始连续工作，直到3日晨处理完伤员后，才上炕休息。下午醒来，他忽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提笔写起了日记：“今天，是我49岁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龄最大的战士……”第716团的同志们虽然来不及为白求恩大夫庆祝生日，但黑马张庄战斗，歼敌2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60余支，以及大量弹药与军用物资，还活捉了两名日军俘虏。这就是对白求恩大夫最好的生日贺礼。

当朝霞映红大平原时，胜利的消息和胜利者一起回到了窝北镇。在充满欢庆胜利的喜悦声中，也听到有人在哭泣。第7连房东老大娘，老泪纵横，放声痛哭。原来，曾经给他挑水端饭的小八路、活泼可亲的司号员自前天夜里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第120师在冀中如鱼得水，纵横驰骋打击日本侵略者。日军华北方面军如芒刺背，决心除掉身边的隐患。3月18日，日军调动近万兵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攻。被打得龟缩畏前的宫崎富雄，认为这是报复屡屡打败他的对手第120师的一个难得机会，遂成为诸路敌军中最积极、最疯狂的一股。

贺龙总指挥采取了“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法，直接指挥第716团，将该团作为一只铁拳，随时给敌人以重击。

黄新廷随着师部，在1个月的时间里，与宫崎富雄兜了一个大圈子，使这个法西斯军官精心组织的4次合击全部扑空。敌人的第5次围攻，也在第120师歼其900多人后，以失败告终。

宫崎富雄还没有回到联队司令部，就接到了一纸命令，免去其联队长职务，调第27师团司令部任参谋，由渡左近接任联队长职务。

宫崎富雄一股悲怆情绪愤然而生，他曾创建联队，为日本天皇侵华的所

谓“圣战”不遗余力，立过“战功”。全联队勋章之多，历来被同级别的人们所羡慕，倒霉的是他碰上了这么一支“皇军”原本没放在眼里、装备极差却难以对付的八路军部队。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及其他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的《治安肃正计划》制定中最大的疏漏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

齐会战斗歼灭日军吉田大队

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殊死搏斗中，第120师也逐渐壮大。先后成立了6个独立支队。第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4支队合编，成立第120师独立第1旅。第716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5支队合编，成立独立第2旅。黄新廷仍然担任着第716团团长的职务。部队扩大；使这位年轻的“老”团长肩负的担子更重了。第716团依然是贺师长的第120师的一支铁军，不仅要担当作战的主角，还要在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为新部队作出表率。

1939年4月18日，黄新廷率团与师部一起转移到了河间县东北地区，第120师在冀中的两个旅全部会合在一起。师部驻大朱村，第716团驻在任村、小店、齐会3个村庄。经过一个寒冬的艰苦战斗，部队准备在这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大好季节，进行一次休整，待机再战。20日，部队正准备召开会合联欢会，传来情报，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吉田大队800余人及满载弹药的80余辆大车，朝我军驻地开进。

贺龙总指挥把联欢会改为战斗动员会，亲自作了动员。会后又召开了旅、团干部会议。贺龙认为：此次敌人兵力虽较多，装备精良，但不明我军虚实，孤军深入，是一次瞎子行动，我军完全能够吃掉它。黄新廷与一些老红军指挥员非常赞成贺老总的决断。一些新编入部队的指挥员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走而不主张打。因为平原游击战通常进行分散游击活动，一次消灭一小股敌人，可积小胜为大胜。这次要在平原上一口吃掉敌人1个大队，使一些新编入部队的指战员心里不免疑虑。

会后，贺龙把黄新廷叫到跟前特别嘱咐：“敌人向东进攻，你们亚6团是首当其冲，一定要严密组织，打好头阵，给其他部队做出好样子。”

“请首长放心。”黄新廷没有过多的语言表达他复杂的心情，骑自行车急匆匆地往回赶。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这次作战虽然是重兵对孤敌，他仍然对敌我力量作了充分的估量。吉田大队兵员充实，侵华老兵多，火力强，弹药充足，战术、技术训练有素，与我军多次交手，经验丰富。敌人虽与我多次对阵，但未受到歼灭性打击。我军兵力虽占优势，但装备差，火力弱。7个团中5个是新编部队，战术、技术水平不高，指挥员对这次作战的认识尚有差距。战场狭小，不可能同时投入众多兵力搞大兵团作战，重任依然落在亚5、亚6两个老部队肩上。贺师长对敌人可能增援的方向都派出部队担任阻援。黄新廷骑在自行车上仔细思忖，决心完成好这次歼灭吉田大队的作战任务，不觉车已骑到小店村口，参谋张霖已在此等候多时。“报告团长，大家都等着您哩！”一声报告，才把团长的思绪打断。

黄新廷将师首长的判断与决心作了简短叙述后说：“我们用1个营的兵力来对付吉田大队的全部兵力，留两个营在关键时刻投入战斗……”

“1个营？”他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诧之声。用只有400人的1个营，抗住日军1个大队，确实出乎大家意料。

经过一番争论、研讨与说服，最后各级指挥员还是同意了黄团长的决定：以第3营固守齐会；以第1营机动，相机支援第3营战斗；以第2营为预备队。白天固守，在防御中歼敌。黄昏后，第1、2营投入战斗，第3营伺机反击，里外夹攻。

黄新廷团长对侦察参谋胡超林和新调来的特务连连长任世鸿交代了侦察吉田大队行动的任务后，又骑自行车，直奔齐会村而来。

齐会是个大村庄，南北一条街，街两旁小巷农舍密集，有一定纵深，利于我布兵作战；村东南有一个葫芦状的大水塘，腰部建一石桥，为进出村庄的必经通道。桥两侧形成两个小湖，水深约2米，利于阻击敌人。这在平原上是个难得的复杂地形，是易守难攻的好战场。

黄团长与第3营营长王祥发，一边观察地形，一边交代战斗任务。黄团长说：“敌人这次兵力较多，我们不在村外打，那样兵力就分散了，就从村沿打起。你们要抓紧时间，把村沿的堞坎、道沟、土坑加以改造，结合树丛、坟包、水塘组成一个大纵深的防御阵地，作到能层层阻拦鬼子的进攻。”

王祥发说：“村内许多房舍里，各连都挖了不少明、暗枪眼，打通能连接在一起。房顶上我们也用木板、梯子搭接在一起。”

黄新廷说：“对，村落战斗，就要这样做。你们要在节节抗击中最大限度地杀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鬼子欲攻攻不下，欲罢又不甘心，把它牢牢地粘在齐会。那时，1、2营在敌人背后再打，把敌人紧紧夹在中间。火候一到，贺老总就要好好收拾他们了。不过这头三脚，还得我们团踢好才行，你们先踢好第一脚，胜利的把握就有了一半。”

“团长，我们保证踢好这头一脚。”王祥发信心十足地说。

“这是一场恶战，千万不可大意。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为组织围歼赢得时间，要留下1个连作预备队，用到战事吃紧的地方或夜间反击。”3营长离开时，团长又嘱咐了几句。

22日午夜，天空中几堆阴云缓慢移动，间或露出几颗星星，发出淡淡冷光。吉田少佐率领着大队人马，从三十里铺开始了他的“秘密”夜行军，每经过一个村庄，都要派出小分队搜索一遍，接连几个村庄没有发现一个八路军的影子。他紧张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日军第3联队新上任的司令官渡左近大佐，一直窥视着八路军的行动。就在黄新廷还没有转移到齐会之前，渡左近就打听到在河间东北地区驻有千名八路军，认为这是他上任后放头把火邀功的好机会，遂派驻沧州的第2大队吉田少佐进行偷袭。他特为吉田配属了管泽山炮中队，还调50辆汽车运送吉田部到河间，并归其作战使用。吉田驻河间时曾多次与我军交手。此次，他作了充分准备，又征用80辆大车，运载比往日战斗要多几倍的弹药。

23日上午9时，日军占领了南北大齐、北石曹一线，仍然没有发现八路军。吉田觉得自己的偷袭行动成功了，于是放大胆子，督领大队直奔齐会而来。

吉田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从三十里铺一起步，任世鸿连长带领的便衣侦察就在与日军平行的另一条小路上跟踪前进了。日军每到一地，关于其活动的情报都准确地传到第716团的指挥所里。

黄新廷将团指挥所前移到距齐会更近的杨家坟。9时，在杨家坟南侧，黄新廷站在一块绿油油似绒毯的麦田边，举着望远镜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随着敌人一步步临近，他突然对身边的参谋发出了命令：“立即通知3

营，准备迎击敌人！”团长移动的望远镜筒里出现了如下场景：日军的炮兵在北大齐一座砖瓦窑附近占领了发射阵地……步兵展开，变成3路战斗队形……队伍后面拖着长长的大车队。“回指挥所。”黄团长敏捷地转身，走在众参谋的前面。

齐会村一片寂静，没有鸡鸣、犬吠和马嘶，没有人声喧嚣，村庄像在酣睡之中。

吉田估计，千把人的八路军主要驻在齐会，便将3个中队弯月形排开，包围前进。行至距村800米处，吉田突然命令停止前进。他明白，这段距离是共军的前哨阵地，为探清虚实，吉田下令开炮。

轰隆一声巨响，打破了村野的沉寂。守卫村沿的战士们手扣着枪的板机，跟踪着自己的射击目标，将揭开保险盖的手榴弹排放在身边，两耳静候着指挥员的口令。

王祥发营长传出了清晰的口令：“这是鬼子的火力侦察，不要开枪，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火力侦察的结果并未证实吉田的判断，他认为村内兵力不多，命令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立即攻击前进。

当敌人的狰狞面孔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在我军面前时，王营长一个“打”字出口，霎时，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愤怒地射向敌人。冲在前面的日军士兵一个个哀嚎着倒了下去。

吉田疯狂地集中所有炮火一齐发射，村沿腾起了阵阵烟尘。随着炮火延伸，日军在9挺重机枪的掩护下，从西、北、南3个方向发起了进攻。

王祥发指挥第9、第10两个连队充分利用村沿工事，顽强抵抗。战士们不慌不忙将敌人放到近距离内，以突发火力给敌以重大杀伤，连续打退敌人3次进攻。

吉田倾其全部兵力、兵器迭次猛攻，连连受挫。于是，他气极败坏，竟丧心病狂地命令施放毒气，以借毒气之效再次进攻。

第3营阵地上发出了一股强烈刺鼻的气味。战士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大蒜嚼烂塞在鼻孔里，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大家忍受着毒气带来的种种不适，利用敌人放毒后还未展开进攻的空隙，整修工事，检查枪支，为重机枪加水，准备打退敌人更大的进攻。

对突然沉寂的八路军阵地，吉田自信是皇军毒气威力所致。他亲自举起指挥刀，歇斯底里地高喊：“前进！”日军3路并进，又一次发起了进攻。

战士们带着对法西斯侵略军的无比仇恨，士气更旺，火力更猛。

后有大队长督战的日军士兵疯狂冲击，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仍向前冲。

两军短兵相接。第9连连长曾祥旺大吼一声：“杀！”战士们纷纷跳出工事，同鬼子展开白刃格斗。刺刀的撞击声、杀声混成一片。眼疾手快的曾祥旺从一个日军军官手中夺过一把战刀，一口气砍死了3名敌人。

我八路军战士与鬼子兵在村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条壕坎，几个坟包，一段短墙……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一进一退进行着生死搏斗。村南一块阵地被日军一个小队夺占，王祥发组织兵力猛扑过去，夺了回来。日军小队长和他的3个兵逃走。日军右翼中队组织搭救，又被击毙8人。

黄团长见村沿战斗已歼灭了大量敌人，第3营也付出了伤亡代价，弹药消耗很大，决定提前转换阵地。王祥发指挥各连，有秩序地交替掩护，撤进村庄。战士们迅速转移，到了室内相通、屋外相连、四处有射孔、里外有掩

体的预设村内阵地，继续与侵略者进行意志与智慧的决斗。

日军把我军主动转换阵地当做败退，便嚎叫着疯狂地拥进村内，却意想不到遭到四面八方的射击。街头巷尾，房上房下，双方进行着一场场短兵厮杀，一场场浴血拼搏。日军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横躺地上的死尸，鬼子付出了极大代价。进展缓慢的巷战，使吉田十分愤怒。他顿足舞刀地大喊：“放火烧！”中国老百姓栖身的一间间房屋顿时成为火场，火苗借着风势，迅速蔓延。齐会村霎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黄新廷团长站在杨家坟一处高地，举着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齐会村，流弹不时从身边擦过，爆炸声、枪声、喊声不绝于耳。他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警卫员周在顺在一旁却非常紧张，不时提醒团长注意流弹，并准备随时扑上去保护首长。团长几乎是充耳不闻，脸上还露出一丝笑意。第3营的战斗使他很满意，比他预想的还要好。忽然，他发现齐会村大火冲天，嘴里不由得骂道：“狗娘养的法西斯！”立即转身，对参谋长王绍南说：“命令1营，跑步增援，从东北方向实施攻击。”

第1营出击后，歼灭了村外一部分敌人，并将其余敌人压向村沿。敌人依托村沿，发挥火力优势顽抗。我第1营虽顽强进攻，但因火力远不如敌人，一时未能攻进村内。

第3营营长王祥发乘第1营牵制了日军一部火力、兵力的机会，指挥部队撤向村东南角。此处隔着一条街，火一时没有烧过去。掩护部队撤出火场的第12连，给了日军不小的杀伤，完成掩护任务后大部撤到了村东南角。剩下1个班4名战士被敌人围在一所房屋中，一时没有撤出来，子弹也打光了，情势危急。4名战士屏住呼吸，在门两侧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等待时机。日军见屋内毫无动静，踹门一拥而入。班长大喝一声：“杀！”4把刺刀个个刺中了鬼子的胸膛。乘敌人慌乱的瞬间，他们冲了出去。

村东南角由几座结构坚固的砖瓦房院落组成。王祥发营长调整了部署，调剂了剩余弹药，组织了交叉火力。战士们被烟熏火烧，脸红黑红黑的，军装也打烂了，但他们更加斗志昂扬，同仇敌忾，轻伤员们也拿起武器，奔向阵地。

黄新廷命令第1营不停顿地向日军猛烈展开进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吉田两面应付，不得不抽出主要兵力对付第1营的猛攻，减缓了对第3营的压力。这样，形成了吉田最不愿出现的局面，两面战斗，形成对峙。

关键时刻，团部与第3营联系的电话线断了，黄新廷显得有些焦躁，他对三参谋张涛厉声说：“再派人联络，派人查线，想尽办法要沟通与村内的联系。”

第716团的联络手段比武器装备还要落后，主要靠有线电话和通信员往返联系，军号为辅，因此在激烈战斗中往往很难保持联络畅通。敌人纵火后，电话中断，几次派人进村联系，均在中途伤亡。

贺龙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派第715团第7连突进村内，支援战斗。第7连利用吉田集中兵力两面作战的时机，沿村东道沟隐蔽前进，乘敌间隙，从东南方向向村内冲去。第9连连长曾祥旺正在屋顶观察敌情，见第7连沿道沟前进，马上派排长张化林带部队前去接应。

张化林指挥战士一个反冲击，吸引了敌人的火力。第7连乘势一个猛冲，冲进了村里。吉田慌忙组织兵力反扑，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封锁了被冲开的

缺口。

第7连攻进村内，第3营如虎添翼，王祥发喜出望外，带着几位连长到高屋顶上观察敌情。他指着东南方向说：“敌人在小石桥边设置了重机枪阵地，此处是我们进出唯一的通道。”然后，又指着西北方向说：“这是敌人的炮兵阵地，与东南方向构成了火力联系。为了打破敌人包围，恢复与团指挥所的联系，必须夺回小石桥，控制周围地区。”

“营长，我要求亲自带队，夺回小石桥！”王祥发的话音刚落，第10连连长杨福明便提出了请战。

“好！接近要隐蔽，攻击要突然，我组织火力掩护你们。”营长立即答应。

王祥发瞅准时机，命令重机枪射击，把日军墙头上的歪把机枪打成了哑巴。杨连长与第6班战士们乘机跃起，迅速接近水塘前一片约40米见方的开阔地。杨连长命令大家把手榴弹盖拧开，并说：“冲过这片开阔地，就能夺回小石桥。同志们，拼吧！受伤不要紧，白求恩大夫就在我们后边。”

杨连长及第6班的出现，使双方激烈交织的炮火更加密集。子弹嗖嗖地从战士们身边擦过，有些战士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活着的、挂了花的仍勇往直前。杨福明率大多数战士冲过了这段险途，接近了石桥，然后将一排排手榴弹甩过去。杨连长在敌人猝不及防的一刹那，与敌扭打在一起，一举夺桥成功。格斗中，杨连长腹部受伤，鲜血染红了灰军装。

突然间，西南方向日军在坟地上的机枪火力向桥面压来。杨福明强忍伤痛对大家说：“咱们要固守桥头，必须摧毁敌人坟地机枪阵地。”他以惊人的毅力，捂着伤口，带领战士向敌阵地爬去。当他接近坟地正要投手榴弹时，又被一发子弹击中腹部，高大的身躯瘫倒在土坎下。愤怒的战士随即冲向敌阵地，王营长也指挥部队从翼侧向敌占坟地猛烈进攻。在我军两面夹击下，日军拖着机枪跑了。

下午5点钟左右，杨家坟第716团指挥所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黄新廷团长迅速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了周士第参谋长熟悉的广东口音：“日军各路援兵，全部受到阻击。贺老总正在调整部署，包围敌人。现在的关键是你要紧紧地咬住敌人，不要让敌人跑掉，坚持到今晚8点。到时，你们团全团发起反击。”

“请首长放心，我们立即派人与3营联系，绝不让吉田跑掉，准时发起反击。”黄新廷放下电话，对一参谋说：“李书茂，立即通知1、2营，晚7点以前作好一切战斗准备。”说完走到地图前。政委金如柏、参谋长王绍南跟着来到地图前。

黄新廷说：“现在离发起攻击还有3个小时，眼下最要紧的是派人进村，向3营传达上级意图，一定要让他们坚持到晚8点。”

“团长，让我进村执行这个任务。”参谋长说完，目光在团长、政委之间打了两个来回，寻求支持。

黄新廷略加思索后说：“好，你去3营，这样还可以加强一线指挥。”金政委略略点点头，表示同意。

王绍南参谋长当即选了两名身强力壮、十分精明的通讯员，一起出发了。

黄团长命令第4连机枪火力掩护。参谋长等3人在第4连掩护下，以快速动作匍匐前进。进到村沿水塘边时，由于动作过猛，踩塌了塘边的虚土，泥土掉进水塘，发出一阵哗哗啦啦的响声，引来日军一阵盲目射击。3人乘

机跃进第3营阵地前。第3营一名机枪手发现了他们，立即搬开机枪呼喊。王参谋长等敏捷地钻进第3营阵地。

日军的机枪还在吼叫，王参谋长已穿过房中通道，来到第3营指挥所。王绍南的湖北大嗓门表扬第3营打得好，王祥发用江西老表腔汇报了战斗简况。二人又商讨了反攻作战计划，并派通讯员回团部向团长报告。

夜幕降临，日军受到内外两面夹击。吉田焦灼难熬，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来回走动。他盼援兵，援兵未到；想进攻，力量不足；想撤退，又不甘心。他突然停止脚步，歇斯底里地喊叫：“大量发射毒弹。”

毒气随风在小店、大朱村上空弥漫开来。在大朱村调动兵力指挥战斗的贺老总指挥和其他人也中了毒。

黄团长不顾毒气呛人，两眼紧盯着手表的时针。晚8点整，他发出了进攻命令。部队像离弦的利箭，向日本侵略军冲去。龚兴业营长带第1营由北向南，蔡久率领第2营从西向东，如一个巨大的铁钳张口咬住日军。王绍南、王祥发指挥第3营反守为攻，第3营的4个连队如4把刺刀同时向外突刺。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铺天盖地。吉田急令日军顽抗。他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一整天战斗，又刚刚施放了毒剂，共军仍能组织如此强大攻势。

黄新廷指挥部队猛烈轮番进攻，内外夹击，锐不可挡，夺回了一个又一个阵地，歼灭了一股又一股顽敌。竟夜激战，齐会村日军伤亡惨重。乡亲们的担架队和送饭送水的人群，一下子拥进了村庄。伤员们很快被送往屯庄真武庙，白求恩大夫在庙里设立了战地手术台。

白求恩得知守卫齐会的伤员到了，立即发话：“凡是胸部和头部受伤的战士首先抬进手术室。”

第10连连长杨福明被抬到了白求恩的手术台上。白求恩剪去他沾满血污的灰军装，露出了碗大的伤口，血还在流。白求恩大夫得知这个英雄连长负伤后仍置生死于度外与法西斯战斗时，激动地说：“我真想象不出，你是怎样忍受这样大的伤痛而坚持战斗的。”

此时，杨福明的伤口虽痛得很厉害，脸上还是露出了甜甜的微笑。

接着，第3营营长王祥发也被抬上了白求恩大夫的手术台。在第716团发起总攻的夜间战斗中，英勇善战的模范营长一条大腿被敌炮弹炸断。白求恩大夫为这位屡立战功的指挥员接好了断腿。

24日拂晓，吉田与逃出齐会的一部残敌，如丧家之犬东窜西撞，向南突围。

黄新廷按照贺龙的指示，及时调整部署。他命令蔡久率领第2营追击逃跑的敌人，通知鏖战了一天的第1营转入预备队，伤亡较大的第3营打扫齐会战场。

中毒缓解后的贺老总指挥，调动部队，为这股残敌布下了围歼阵，任其东逃西窜，都逃不出第120师的包围圈。

吉田逃至马村附近，被执行伏击任务的第715团第4连敲了当头一棒。吉田仓皇调头向东逃往找子营，第715团跟踪追击至找子营。敌人以一部兵力强占找子营，以主力猛攻留路，企图夺路再逃，又遭到埋伏在南留路我第3团的截击。

第716团第2营紧跟敌后追击，使其不得喘息。吉田还未进入马村，黄新廷即派骑兵通讯员通知蔡久：“敌人已逃向马村，你们要咬住不放，绝不让敌人跑掉。”

吉田及其残部被围困于找子营与南留路两村之间的树林道沟一线，顽抗待援。贺龙调第 715 团、第 2 团、第 3 团部队将其包围，要求白天围而不攻，黄昏后全部解决战斗。近黄昏，我军向道沟吉田残部发起最后进攻，将日军压缩于南留路西南的张家坟地中。

25 日凌晨 3 时，日军为突出重围，集中兵力、火力猛攻第 716 团第 2 营阵地，企图打开缺口南逃，未能得逞。天明后，日军又连续攻击南留路，复被第 3 团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反扑，被迫固守待援。10 时许，任丘、吕公堡的日伪军 400 人增援未果。黄昏时，天气骤变，狂风大作，吉田乘机率少数残敌逃跑。逃回大城的吉田，被解除职务，遣送回国。

齐会战斗，我军歼灭日军 700 余人，俘虏日军 7 人及伤员 2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车辆及其他军事装备，取得了平原歼敌的空前胜利。这次战斗，对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向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

蒋介石也致电贺龙，拨予第 120 师 3000 元医疗费。国民党各战区的一些长官也纷纷发来贺电。

第 716 团团部驻地小店热闹非凡，比战斗时还要繁忙。推小车的，提篮子的，赶大车的，从三乡五里赶来，口口声声找亚 6 团。有几个青年人听说亚 6 团南方人多，爱吃鱼，战斗一打响就跑到白洋淀去弄鱼，战斗结束后送来几大筐鱼慰劳亚 6 团，非让他们收下不可。有的乡亲还抬来了棺材，坚持要把已经掩埋的烈士挖出来，重新装殓再葬，并沉痛地说：“不能让打鬼子牺牲的英雄无棺入土，不然我们就太对不起他们了。”金政委、黄新义副政委和副官主任皮松林，为接待这些满怀热情的乡亲们，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此时，黄新廷正集中精力领导部队进行战斗总结。正式总结前，他总要到全团各处走走。到机关，作战、侦察部门必到；到连队，特务连与主攻连队定去。为的是听听大家的议论，征求大家的意见，一方面与指战员分享胜利的喜悦，一方面还能吸取群众的聪明才智。大家都说团长爱“串门”，其实他却在这闲聊中，扎实地掌握了部队的思想脉络。大家也愿意与团长在一起谈天说地。这天，他来到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住处，不少参谋正在议论这次战斗。战前，一些人对在敌人鼻子底下集中这么多部队都有点担心，怕这仗打不好，结果却打了胜仗。大伙儿要求团长谈谈自己看法。

黄新廷说：“贺老总为什么敢在敌人重点防守的地域内集结重兵，打一场歼灭战？这是老总及关政委对敌情、我情吃得透。鬼子虽然占领了主要交通干线，占领了冀中根据地的一些主要城镇，有着优势的武器装备，可它最大的弱点是侵略作战，兵力不足，主力分散于铁路沿线，占领的地方越多，背的包袱越重。齐会周围敌人有不少据点，随时可以增援，但兵力有限，分散于铁路沿线的主力又不能迅速集中。而我们却主力集中，有群众支援，才有可能打赢这场平原歼灭战。”

当大家提到若不是天气作怪，吉田跑不了，那小股敌人也跑不了时，黄新廷说：“那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还是我们协同不够好，包围不严密，通讯联络不畅，才给敌人留下了空隙。几个新编部队能打成这样，就很不错了。教训主要在我们老部队身上。我们应该很好地吸取教训。”

参加陈庄战斗，歼灭水原义重

1939年秋，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调集重兵50万封锁、包围了陕甘宁边区。第120师奉命西调，在冀西区集中待命。

黄新廷率领第716团与第120师师部一起，最后离开冀中区，于9月25日到达行唐县西北的南城寨、北城寨一线，与早期到达的独立第1、2旅会合。部队进行了整编，独立第2旅恢复了第358旅的番号，辖第716团与第4团两个团。

黄新廷到达南、北城寨的当天，从西南方向的慈峪镇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和紧密的枪声。他从师部获悉：在师部与第716团到达的前两天，日军第8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率领正太线上的第31大队全部及周围几个县的警备部队，共1500余人，强拉民夫300余人，大车几十辆，集结在灵寿县城，准备偷袭晋察冀军区冀西区的中心陈庄，并以此为出发点向我北岳区发动“扫荡”。我军组成了由第358旅旅长张宗逊统一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由第120师部队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地方部队予以配合，全力歼灭这支日军。

黄新廷得到消息后，立即向张宗逊旅长和张平化政委请战。他在电话上说：“请首长不要考虑我们长途行军的疲劳，把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能完成！”旅首长在思忖。

战士们听到炮声，心情和他们的团长一样，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递到各级指挥员手里，最后集中在团长面前。老兵们不用组织，自觉地给平原入伍的新战友传授山地作战的本领，讲述利用地形、地物及仰射、俯射的要领……过硬的部队盼战斗，就像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员盼望比赛一样心切。何况这还是归山的猛虎。

黄新廷只争得了一个预备队的任务，但他还是组织全团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并时刻注视着战场形势的变化，随时应召出战。

25日清晨，日军开始以重兵进山“扫荡”，沿着灵寿到陈庄大道前进。进到慈峪镇时，对我军防守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我军在大道两旁设伏，布好了一个口袋，等待着日军就范。可是，这次日军和以往不同，占领了大道两边的村庄后却停止前进。我军边阻击边退，以诱敌深入；但敌人只是以火力还击，就是寸步不移，不往口袋里钻。

黄新廷和团里的领导及机关的参谋们都在议论着敌人这一异乎寻常的表现。敌人是否发现了我们的埋伏？日军是否在调整部署？大家分析着各种可能的敌情变化。“对！”沉思许久的黄团长，忽然抬起头来说，“最近我们缴获日军的文件上说‘对八路军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战术，找准敌人的弱点，以大胆勇敢的精神动作，进行包围、迂回、欺骗、急袭……’这里面敌人一定有欺骗行动。”

果不出所料。日军在占领了慈峪镇以北几个村庄后，忽然又退回到慈峪，接着向灵寿撤退。

后经侦察得知，日军留下少数部队控制慈峪镇，主力千余人正沿着鲁柏山的小路向陈庄疾进。

前线指挥部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贺龙，贺龙说：“敌人这次袭击陈庄，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轻装急袭。这算什么‘新战术’？完全是班门弄斧！”贺龙师长指示：“敌人是孤军深入，北无据点接应，南边接济也十分困难。因此，他们在陈庄必不能久留。等敌人回窜的时候，必须抓紧时机，在运动中把敌人消灭掉。”

前线指挥部立即调整部署：1个营绕道尾追敌人，第716团、第2团、特务团顺大路向陈庄前进。张宗逊命令：第716团在慈河北岸，第2团在慈河南岸设伏，控制敌人东逃大道；特务团一部在陈庄东七祖院与敌人保持接触，另一部与第2团1个营在陈庄南面的长峪，防止万一敌人从来时小路南逃。

27日，也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黄新廷率领第716团到达东西寺家庄指定位置。下午，黄团长带领第716团年轻的营、连长们在大道以北西寺家庄看地形。营、连干部们开始听说让他们这个专啃硬骨头的团担任预备队，还有些牢骚；如今敌人耍花招，第716团又立即担负了主要战斗任务，情绪特高，精神抖擞地来到山坡上，边走边议论。

黄新廷和大家不同，一言不发，时而举起望远镜远眺，时而手摸下巴沉思。常跟他外出看地形的几个参谋，知道这是团长考虑作战方案时的惯有动作，就静静地随在一旁不予打扰。黄团长环视的目光，突然停在左前方一个突出的山嘴上。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问，“路南侧那个小山包，叫什么名字？”

“报告团长，那个突出的山包叫叠谷崖。”作战参谋张霖是个机灵聪明的机关干部，就在团长举目远望时，他已经随着团长的目光在地图上寻找着一个具体位置。

黄团长脸上绽出了笑容，对身边的参谋长王绍南说：“走，咱们到叠谷崖去看看。”

“团长，路南是分给2团的作战地区。”王绍南似有顾虑地说。

“2团分的是路南冯沟里、破门口、高家庄3个小村庄，叠谷崖不在其内。”黄团长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家非常佩服他如此熟记刚刚划分的这个地区的地名。王绍南仍现出一副为难情绪，勉强和大家一起越过慈河，爬上了对面的山坡。

黄新廷看出了参谋长的情绪，对他说：“我们两个团各占大道一边，左右夹击，拦腰斩断敌人纵队，这里确是个好地方；但没有拦头阻击的有力阵地，易被有强大火力的日军突破。因此，必须找一个拦住敌人去路的好位置。”

爬上叠谷崖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感叹：“啊！这里真是个阻击的好地方。”八月中秋，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是北方最好的季节。站在叠谷崖向西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庄；向东可以看到慈河东去的流水，在太阳映射下波光粼粼，蜿蜒的大道及山脚下的3个小村庄尽收眼底。

叠谷崖向西北伸出一个小山梁，像一扇闸门卡住了山下的大道。王绍南为难的表情被一种意外的喜悦所代替，他凑到团长眼前兴奋地说：“团长，这儿真是个理想的阵地，叫你一眼给看中了。”他对刚才的迟疑表示了追悔。

几个营长争着请战，要把这卡敌人咽喉的战斗重任挑在自己肩上。黄团长当场把这个能展示部队作战能力的任务交给了第1营。营长龚兴业高兴得直搓手，对站在远处的第4连连长眨了眨眼，与部下分享争到光荣任务的喜悦。

入夜，皎洁的月光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叠谷崖上发出了铁锹撞击石头的声音。第4连连长曾祥旺手里提着一把大刀，满头大汗，指挥部队构筑工事掩体。像魔幻一样，山包上先是出现一个个鱼鳞坑，然后又一个个地连接起来，形成一道弯弯曲曲的屏障。战士们个个挥汗如雨，曾祥旺还在一个劲儿地催促再快些。爱兵的人都知道，现在多流汗，战斗时就会少流

血。

陈庄没有了往年中秋之夜的欢乐气氛，死一般地沉寂。精疲力竭的日军士兵刚刚躺下，陈庄四周便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日军旅团长水原义重与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刚才还在相互吹嘘“新战术”，现在却在偌大的一个镇子里，东调西阻，南挡北窜，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彻夜未得安宁。

28日清晨，黄新廷走出团指挥所房间。一阵秋风吹来，他精神为之一振，一夜未眠的倦意顿消。警卫员谢补元已全副武装，备好马等候在门口。“先去3营，再到1营。”团长笑着发出了行动指令。小谢知道这一笑是对他工作满意的回报。

黄新廷站在叠谷崖山坡上，身边是第1营营长龚新业、副营长游好扬和第4连连长曾祥旺。这位连长高挑的个头，宽宽的肩膀，两眼炯炯有神，一副精干机敏的样子。他的打扮却与众不同，脖子上挂着两颗手榴弹，腰带上掖着一支驳壳枪，手里提着一把大砍刀。老战士们早已看惯了他这种形象，而新调到第4连的战士们却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自己这位铁汉连长。“曾祥旺，看来你是准备打硬仗了！”团长对这个红军时期给他当过警卫员的连长熟悉得很，知道他一听说有大仗打，就是这么一身装束。

“打仗，咱从来不含糊。”曾祥旺带着几分顽皮回答。

“昨天，他死磨硬缠地要守这个山头。只好把任务交给了他们。”第1营营长用赞许地口吻说。

“走，看看你们的工事和火力配置。”黄团长说着来到前伸的小山梁。他对第4连的工事构筑没有提出异议，嘱咐说：“要特别注意发扬交叉火力，要主动与2团协同，一定不能让人占领附近任何一个高地，始终把鬼子压在沟里。”“是！”连长应着。

“团长，陈庄方向有火光！”警卫员小谢忽然大声叫了起来。

黄新廷向高处走了几步，看见陈庄方向升起一股浓烟火柱。他一看表，5点50分。

游好扬说：“这是鬼子在放火烧房子。”

“敌人要逃跑，向指挥部报告，部队作好战斗准备！”黄团长立即作出判断与处置，转身对警卫员说：“走，回指挥所去！”

8时，陈庄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

侦察参谋朱广居向团长报告：敌人出了陈庄，沿大路撤退，在七祖院与特务团交上火了。

黄新廷脸上露出了笑容，自语道：“好！敌人要进口袋了。”他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通知部队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过了半小时，指挥部来电话说：“敌人主力又后撤了，离开大路，过了慈河，有从来路逃跑的迹象。指挥部已调动2团兵力，加强长峪小路一线防守。第716团要时刻注意敌人动向。”

情况变化，团指挥所里又一阵争论。一些人认为，敌人来去一条路已成他们的规律，不会轻易改变。黄团长让侦察参谋胡必明、朱广居带上吴子龙、苏子龙几个得力的侦察员，亲自去了解敌人动向。当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时，黄团长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已发现我伏击部队。日军先头部队与我特务团在七祖院稍作接触即掉头回撤。这里就有名堂了。”一句话说得大家静了下来。接着，他分析了敌人动向：“按军事常理，撤退路上阻力不大，应排除阻力前进，而日军却一打就撤。我认为这是敌人故技重演，又是慈峪

镇攻击不进而改道急袭那一套花招。欲进而先退，来个兵不厌诈。我看鬼子还是要回来的。”

前线指挥部张宗逊旅长与黄团长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指挥员分析判断多么有道理，当敌军的行动尚未证实这种判断正确之前，大家的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团指挥所里，大家都焦急等待着。参谋们不时地看着钟表，好像时间过得特别慢。

日军涉过慈河没走多远，就调转方向，利用河边的芦苇、树丛作掩护，隐蔽地重又踏上东去的大道。

水原义重半夜未眠，绞尽脑汁，才想出了这一招儿。在这位侵略军将军的精心导演下，千余名日军官兵认真地表演着。

我军各旅、团侦察分队，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冷静地观察着日军的一举一动，并不断报告给各自的指挥部。当胡必明向团长报告日军重新踏上东去大道的消息时，黄团长说：“他这一套没有迷糊住我们，反而麻痹了他们自己。”一句话概括了水原义重“高招”的客观效果。

日军在大道上走了约3千米，来到破门口村一带。水原因他的“新战术”决断而十分得意，深信八路军的主力正埋伏在他们来时的小路上。上千的日军像一群回窝的狼群，在大道上疾步行进。

当日军大部进入叠谷崖第4连设伏地射程之内时，曾祥旺一声“打”字出口，各种武器一齐开火。破门口阵地第2团特务连也开始射击。枪炮声在山谷中激烈地震响。正在向长峪方向前进的第2团部队听到枪声，迅速调转方向，从敌人后面追了上来。

遭到两面夹击的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慌了阵脚。水原一面组织部队就地还击，一面观察战场动向。这个十分狡猾的侵略军指挥官，看出威胁他最大的是伸出在大路南侧的那个突兀的山包，当即集中两个中队的兵力，向叠谷崖发起猛烈进攻。

黄新廷得到叠谷崖打响的报告后，向参谋长作了交代，策马奔向北山第3营阵地。第3营营长张树芝迎上前去请战。他说：“团长，1营已经接上火了，鬼子进攻十分猛烈，我们营是否也出击配合一下？”

“不！你们是设伏，一定要沉住气。1营地形有利。待敌东面受挫，转向突围时，你们再出敌不意狠狠地打，给鬼子以重创。不能急于出击，要向大家交代清楚。”说完飞身上马走了。

叠谷崖前窄后宽。前面由第4连第1排守卫，后面是第2排。第3排的阵地。1排长郭云初是个只有18岁的红小鬼，却有了上百次的战斗经历，作战勇猛，绰号“小老虎”。他面对一群疯狂的侵略军和数百把插在枪口上闪着寒光的刺刀，沉着冷静，一直到敌人距我前沿30米时，才下令射击。一阵猛打，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滚下山去。这时有几个鬼子兵趁机从一侧窜上阵地。郭云初眼疾手快，端起刺刀，大声喊杀，一刀刺倒了第一个爬上阵地的鬼子。十几名战士随着排长冲出阵地，与敌展开肉搏，打退了敌人第一次冲击。

连长曾祥旺高喊：“小老虎，打得好！”

黄新廷赶到叠谷崖时，敌人已开始了第二次进攻。他一上阵地马上命令：“让侧后阵地组织交叉火力，支援郭云初排战斗。”

黄团长对龚兴业、游好扬说：“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更说明叠谷崖是卡住敌人东逃的咽喉。只要你们守住阵地，全歼日寇就有了充分保障，必须

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扇闸门！”

正、副营长异口同声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做到人在阵地在。”

黄团长说：“要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以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敌人攻不上来，必然要转向突围。万一敌人咬住你们不放，我会让3营从敌侧后策应，支援你们战斗。你们尽管放心大胆地打。”交代完后，他迅速回到了团指挥所。

战斗从上午9时一直进行到下午3时，日军先后组织了4次进攻，3次肉搏，我叠谷崖阵地岿然不动。

郭云初在最后一次肉搏中刺倒两个鬼子后，被万恶的侵略军的刺刀刺中胸膛。18岁的青春年华，他本该是个在学堂读书的娃儿，却把一腔热血洒在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的战场上。

曾祥旺红了眼，怀着满腔仇恨，率领战士冲在最前沿，高喊着：“冲啊！为郭排长报仇！”他举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刀砍出了缺口，身上带的8颗手榴弹全都甩在敌群中炸开了花。在打垮敌人第4次进攻的最后时刻，曾祥旺不幸中弹倒下。英雄连长与英雄排长的鲜血流在了一起，染红了被侵略者蹂躏的祖国大地。

日军被我火力压在沟里，成群地挤在一起，火力无法发扬，兵力无法展开，又无藏身之处。水原为了摆脱不利态势，放弃了对叠谷崖的进攻，北涉慈河，企图占领东西寺家庄，从北面突围。

黄新廷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即将涉渡慈河的日军，对身边的第3营营长张树芝说：“等敌人大部将要过河，还没有离开河滩淤泥地时，再开火。时机要掌握好，要打得狠，集中火力先打前面的敌人。”

张树芝指挥全营，在日军半渡之时，突然猛烈开火。日军猝不及防，一批批地倒在水里和岸边，余敌狼狈逃回南岸。黄新廷高兴地说：“张树芝，时机掌握得好啊！”

日军向东向北全碰上了硬钉子。张宗逊旅长适时增强了南面的兵力，把敌人东逃的大道完全封死了。日军全部被压缩在慈河沿的高家庄、冯沟里、破门口3个小村庄里。

黄昏时分，指挥部发出了总攻命令。

黄新廷率领第2营、第3营，渡过慈河向南推进，迅速占领了冯沟里与破门口之间的小高地，将敌人分割两处，切断了两处敌人的联系。“他命令第2营代理营长李书茂冲入破门口村内。一直没有投入战斗的第2营指战员，憋足了劲，一阵猛打猛冲。敌人死伤狼籍，阵脚大乱。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军从冀中水灾区带来的手榴弹因受潮不发火，投入敌阵后打几个转就躺在地下不动了。战士们急得直跺脚。

黄新廷也没有料到出现这种情况，迅速报告指挥部。为了减少伤亡，上级命令第2营迅速撤出村庄，补充弹药，并指定其他部队监视被围困的敌人。

狡猾的水原发现我军主力向南、向东转移，遂命令残余日军离开村庄，施放毒剂，集中火力、兵力向破门口西南高地冲击，突破我第2团第6连阵地后，拼命向陡峭的鲁柏山上爬去。

黄新廷最早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命令第2营、第3营一齐追击。第3营首先赶到山下，第2营随后到达。他们占领有利地形，对着山坡上一堆堆黄色目标连续射击。随着猛烈的枪响，鬼子兵一个个应声倒地，滚下山坡。急红了眼的日寇军官，举着战刀砍那些爬不动的士兵，日军武器装备乱糟糟地

丢散在绿色的山坡上。

日军爬上山顶时，只剩下约 300 人。水原义重为他绝处逢生感到庆幸，正准备稍作休整而后溜之大吉时，黄新廷率领第 3 营也冲上了山顶。接着，第 2 营和兄弟部队两个营也赶了上来，将残余日军包围在鲁柏山西端一高地。

随第 2 营战斗的旅政治处主任颜金生也上来了。他对黄团长说：“我们打进破门口村时，捡到了鬼子 3 条装满东西的麻袋，上面盖着膏药旗，旗上还写着‘武运长久’、‘大和魂灵’几个大字。我们打开一看，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团长没有回答，颜金生接着说：“里面装满了被砍下来的人手，血糊糊一片，而且全是右手。”

“这是他们拉回去用来对指纹的。”黄团长过去曾听说过此事。

“法西斯就是法西斯，一伙毫无人性的东西！”颜金生活音刚落，只见日军 3 架飞机在头上盘旋，并用降落伞投下了几大包东西，有不少落在我军阵地上。

黄新廷说：“现在飞机、大炮都没有用了。”

我军对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昏暗的天空，顿时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最后歼灭侵略者的战斗开始了。

黄新廷指挥第 2 营、第 3 营一齐冲向敌群，第 5 连、第 9 连一马当先。第 9 连第 1 班班长卞占海第一个冲入敌群，连续刺倒了 3 个顽抗的鬼子兵。这股残敌很快被歼灭。十几个冒险从南坡滚下去的敌人，也被我民兵游击队生擒。急袭陈庄的千余名日军无一漏网。

一心研究实施“新战法”，梦想出其不意取胜的水原义重旅团长及其部下田中省三郎的武运并不长久，最终受到了正义的惩罚，可耻地毙命在被他们残酷蹂躏的土地上。

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战场上的曾思玉

汪德荣 李方诗

曾思玉（1911～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曾世裕。1911年2月2日生于江西省信丰县。1927年2月参加本区农民的请愿斗争。1928年3月参加本县农民暴动。1929年春，参加乡和县苏维埃赤卫军。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12军第36师第106团宣传分队长、师政治部宣传队中队长、第108团第2连政治委员。1933年春进红军大学第四期上千队学习，同年夏任红36师第107团代理政治委员，同年秋任第109团政治委员。1934年夏任红1军第2师第5团俱乐部主任，8月任第2师司令部通信主任。1935年冬任军委警卫第3团、第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黄河。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任八路军第343旅第685团政治处民运股长，同年冬任第686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冬任第344旅第689团政治委员。1939年冬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夏任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7月任第115师教3旅政治委员。1942年冬任冀鲁豫军区第8分区（后改2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后转战吕梁山地区，继而参加了强攻清丰、南乐、东平、阳谷、封丘、延津、滑县、汤阴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任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1947年任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1949年任第64军军长，率部参加了邯郸、保南、保北、正大、大清河北、青沧、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进军察南，转战冀东，后参加平津、太原、宁夏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任第64军军长。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先后参加了第5次战役、积极防御作战和反击马良山、高旺山等战役。1954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任沈阳军区参谋长。1959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起历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长江葛洲坝工程第一任指挥长。1973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80年任南京军区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曾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奔赴鲁西抗日战场

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第635团、第686团，转战到洪洞、赵城一带集结休整。当时任第685团政治处民运股长的曾思玉，曾奉师部罗荣桓政委之命带1个连直插到同蒲铁路沿线的大谷、祁县、介休地区，进行小部队活动，执行宣传群众、扩兵、筹款等任务，依靠我军的崇高威望再加上他的智慧和才能，得到了新区各阶层人民的爱戴与支援。两个月后，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带着扩来的300多名新兵（配上了武器）和筹集的3万余元（黄金、白银），回到了第115师师部。初试锋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思玉受到了罗荣桓政委的表扬和赞赏，并任命他为686团政治处主任。这一年他仅25岁。

尔后，由团长杨勇、参谋长彭雄率领第686团，在蒲（县）大（宁）公路沿线捕捉战机，打击疯狂进攻的日军。先后取得了午城镇、井沟伏击战的胜利，接着又是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在南偏城伏击日寇战斗中，击毙日军山口旅团长。当第686团即将随师部向山东挺进的前夕，他又奉命到第344旅第689团当政委，到了晋东南的长子。这是1939年元旦之后的事。

可是，曾思玉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9月初，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个电话把他叫到总部去，对他说：“115师到达山东后，形势发展很好，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壮大，急需大批干部。现在把你调回115师，并由你率领‘抗大’1分校的400多名毕业学员赴山东。”并说：“你马上到壶关县神郊村找‘抗大’1分校周纯全校长，接收这批学生。”

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带上这一批学员，组成了山东营。虽然也任命了营长卢迪和教导员魏金山，但曾思玉实际上就是这一群徒手学生兵的指挥员。山东营对外称为独立游击大队，而他就是大队长。

这样一支没有实战经验的徒手学生兵，要从山西出发经过河南、河北到山东去，沿途既要经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又要通过日伪军严密把守的平汉路、沙河、卫河等几道封锁线，欲顺利通过并非易事。

然而，奇迹却真的发生了。这支400多人的队伍，在曾思玉的带领下，辗转迂回，几经波折，先是通过陵川、草坡一带的孙殿英、朱怀冰新5军的区域，亲眼看到了“国军”的骄横与腐败；后又转到林县万羊坡、秦家一带，找到了赵（基梅）谭（甫仁）支队。原准备由此向东，在安阳、新乡之间跨过平汉铁路，不料事不凑巧，正赶上敌人在铁路沿线“扫荡”。于是转向北面，沿着太行山东麓经涉县，过漳河，爬上峻极关，向东插到沙河，终于在一个初冬的黑夜从沙河、永年之间跨过了敌人深沟加碉堡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当晚，我冀南部队向日军进行袭击以引开敌人的注意，这群学生兵才得以顺利通过。当然，这是曾思玉大队长通过与冀南军区部队联系并了解情况后，才采取的行动。

他们跨过平汉路后，在大平原上行走，很快就进入了鲁西平原。这一次小小的“长征”，400多学生兵，迂回行军1000多千米，在3个月的时间里，历经艰险和困难，一枪未发，一人未减，在友区、敌区、根据地、游击区纵横穿行，终于全部安全到达了第一个落脚点——鲁西地区第115师独立旅驻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次曾思玉不仅带来了400多名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而且让每个班从太行山总部背来了10套苏联外文局出版的精装本《联共（布）党史》（共200多部）。此书在敌后可以说是一份极珍贵的精神食粮。

这次行动，对这一群从课堂上走出来的学生兵来说，无疑是增加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感性知识。这百多个日日夜夜的行军，可以说是“抗大”的又一个进修班。学员们亲自实践了行军、宿营、侦察、警戒，亲自接触了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其实，大队长曾思玉比学生兵大不了几岁，但他那严谨干练、十分标准的红军军事干部的机灵、睿智的精神状态，他那平易近人、淳朴宽厚的风度，处处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学生兵们觉得不论哪一方面都应该跟他学习，因而对他的命令、指示都乐于接受，乐于执行；而结果又往往证明他的命令和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一路行军，他事先要计划，要安排路线。路上他始终走在队伍的前面，随时观察了解沿途的情况。他有一匹马，但没有见他骑过；他有一个年纪很小却很能干的警卫员，但也只不过给他打饭、打水而已。学生兵们都觉得他无时不在自己身边，十分信赖他。

初冬，鲁西平原上晴空万里，濒临东平湖的岱庙镇迎来了又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独立旅旅长杨勇，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在一座普通农舍里迎来了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曾思玉。1年前他们同在第686团，杨勇是团长，他是政治处主任。故友重逢，兴高采烈，说了别后的思念之情，也

谈了鲁西根据地开创的经过。杨勇向他介绍了目前的形势：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有党的工作基础，有大批的老党员、老同志在抗日初期开创的局面，也有几十万善良淳厚、不愿当亡国奴的群众。这里虽然不十分富庶，比起山区却又优越性多一些……因此，我们党和部队在这里坚持长期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今后要全力以赴地在这个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谈话中，杨勇特别向曾思玉介绍说：鲁西这一带是一个古老的战场。范县东北有一个村子叫道口，实际上叫马陵道口，就是战国时代孙臆大战庞涓，用诱兵之计使庞涓孤军深入，最后把他困于大树下，万箭齐发使他愤而自杀的那个马陵道。往东，就是水浒传故事发生地水泊梁山了。东平湖在夏秋季有方圆数百里的湖面，沿岸有许多村子都与梁山英雄们的战斗故事相关。例如张青营就是孙二娘开店卖人肉包子的地方，阳谷县的沙堽堆就是武松打虎的景阳岗，袁口、靳口就是朱贵施号箭的金沙滩，昆山、岱庙就是阮小五、阮小七的家乡，小吴就是军师吴用的三家村……此外，西南的濮阳就是吕布打败曹操的古城。稍往南走，东明、长垣一带又是有名的曹（操）袁（绍）官渡之战的古战场。南面的菏泽地区，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王仙芝的故乡。再往东，徐州周围和我们所处的湖西地区，就是刘邦、项羽、张良、韩信、萧何等名人、名将崛起的地方。清代农民起义军王伦的家乡就在阳谷，他所攻下的临清州旧城也在边区西北部……

曾思玉对杨勇、欧阳文、何德全等几个老战友的介绍听得很入神，可是没有想到杨勇最后说：“老曾啊，我已经发报请示过朱老总、彭老总和罗主任，他们答应把你留在鲁西了。你和我们再作搭档，并肩战斗吧！老伙计，怎么样？”

不但把他留在鲁西，而且把他带来的400多名“抗大”毕业学员也留下一半。其余的学员由山东营营长卢迪带着到师部去分配工作。

曾思玉是一个党性、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正像去年叫他离开第686团时一样，他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何况，他对杨勇这位英勇善战的年轻指挥员一向很钦佩，早就希望同他一起战斗。

从这时起，曾思玉投入了鲁西大地抗日战争无比壮阔的浪潮之中，奉命担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就在这时，萧华这位第343旅的老政委又率领转战于冀鲁边区的挺进纵队来到了鲁西，与鲁西独立旅合编为第343旅兼鲁西军区，下辖运河支队和黄河支队。曾思玉被任命为运河支队的政委，辖第4团、第5团。这是两支颇有特色的武装。第5团是在模范红5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部队，从山西打到冀鲁边，如今又到了鲁西；第4团是以山东泰西人民抗日自卫团为基础，发展成为山东纵队第6支队，于1937年举行武装起义、夜袭界首车站之后，在泰（安）肥（城）山区组建起来的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地方党员和部分红军干部为骨干的一支朝气蓬勃的年青队伍。

这一年，曾思玉27岁。从1930年由赤卫队员参加红军离开家乡——赣南的信丰，至今整整10年了。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的战火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现在又转战到华北，战争环境十分严酷。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神圣的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战场。鲁西军区成立后，有了一个稍稍稳定的时期。就在这时，一位生长在鲁西平原上的回族女儿、共产党员洪林闯入了他的生活。这位1936年即接触进步组

织，1938年加入了共产党的女同志，抗日初期就带领着冠县城里的一群小姐妹走出家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到聊城参加过军政干校学习。这时她已是鲁西区妇女救国会的负责人了。他们相爱，并在战地结成了战斗的终身伴侣。从此，曾思玉这个出生于赣南群山中桃江岸边的江西老姨，成了鲁西人民的女婿，和鲁西人民的血肉关系更加深了。

从这时起，曾思玉开始了在鲁西平原（冀鲁豫平原）上6年半的抗日生涯。说来也真巧，这6年多之中，杨勇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杨得志又调去保卫延安；苏振华到大行山办党校，领导整风；只有他，一天也没离开平原，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在这6年多时间中，他流血流汗，风餐露宿，出生入死，饱经战火。他身先士卒，和战友们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大小上百次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歼灭了敌人，保卫了人民，献上了他全部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忠心。虽然，这一段岁月在他全部军旅生涯中，在他毕生的征战历程上，只不过十分之一的的时间，但这却是一段十分重要的岁月。这位1932年春就毕业于红军大学上于队的军事干部，在这里，在繁难艰巨的抗击日寇的战斗实践中，完成了从初中级指挥员过渡到高级将领的全部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事实正是如此。在冀鲁豫平原这个舞台上，人们看到曾思玉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连台好戏。他与他领导的部队一起，在古战场上谱写出新的战斗篇章。

跃马古战场

在冀鲁豫边区，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是，在咱们八路军里有一个老7团。同时也几乎都知道7团有一门小钢炮，专打鬼子汉奸的炮楼、据点。有时候不用打，那些汉奸队听说老7团来了，就投降或逃之夭夭；有时候炮对准了炮楼还没有开火，敌人就投降了。有些伪军的父母妻子，常常到据点去劝说那些当汉奸的子弟们，告诉他们7团可是某月某日带着炮来了。当然，第7团这种威慑力量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靠一刀一枪、一仗一仗的胜利赢得的。而且很多人也知道，第7团是杨勇手上的一张王牌，是一只铁拳头。同时，不少人也知道，杨勇到延安去参加“七大”以后，这支钢铁劲旅的指挥者就是曾思玉。提起第7团，就会想到那门俗称“小钢炮”的九二式步兵炮，想到多少次战斗的胜利；想到第7团，提起这门炮，就必定会想到曾思玉。三者联系在一起，成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豫边区的一面胜利之旗。第7团来自井冈山的老红军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5团，其前身是红4军第28团，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多次说到过的那支部队。朱德、谭震林、罗瑞卿都曾亲自带领过这个团。1933年整编后的第2师第5团，曾在中央苏区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红五团”光荣称号。当时周恩来亲自宣读授奖命令，并说“模范红五团”是全军的模范。抗日战争爆发后，第5团是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在平型关大捷中，这支部队显示了它的英雄气概，号称“猛子连长”的第5连连长曾宪生壮烈牺牲。该连指导员杨俊生身负重伤，坚持指挥战斗，率领全连向来势汹汹的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英勇冲杀，用手榴弹炸毁了敌20多辆汽车，并与敌白刃格斗数小时，把

躲进车下和藏在窑洞中顽抗的敌兵全部消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该连荣获旅授予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荣誉称号。尔后，这支部队在曾国华同志带领下，从晋北转战到冀西，又从冀西挺进到冀南，协同兄弟部队消灭了南宫一带的反动武装组织六离会。以后，该部又东进到津浦铁路以东、渤海岸边的冀鲁边区，在天津以南、济南以北的大片国土上，与当时司令多如牛毛的灰色武装以及日、伪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壮大了队伍，开创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的嚣张气焰，揭穿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等人的真面目。由于环境的变化，该团主力部队在萧华、曾国华、符竹庭等同志带领下，从冀鲁边转战到鲁西。不久，这支部队整编为教3旅第7团，团长刘正，政委杨俊生。这支英雄部队1937年9月以前，由第685团的第2营第5、6、7、8连组成。从此，第7团在冀鲁边，在鲁西平原上，在冀鲁豫大地上，在杨勇、苏振华、王秉璋、王辉球等同志指挥下，战斗了6年，而最经常、最直接指挥带领这支部队的是教3旅政委、以后的第2军分区司令员、以前曾经担任过第685团政治处民运股长的曾思玉。

话题说到炮，就要说说炮的来历。

那是1940年冬天，冀鲁豫边区、鲁西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在急剧变化着，整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队已经打通了津浦、平汉几条铁路。处在华北中心的冀鲁豫平原，已经形成一个坚强的抗日根据地。日寇和伪军无时不在梦想把我军的活动范围压缩到最小最小，使我军难以生存。在冀中，“五一”大“扫荡”、冀鲁豫边区“四一二”大“扫荡”之后，鲁西根据地的周围驻有日军3个师团，4个旅团；深入我区的日军兵力有5000多人，伪军两万余人；加上长期盘踞在我区内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数万人，我军的活动范围已经十分狭小。日军和伪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在我区范围内建立了大小据点240余个，控制公路25条，使以濮（县）范（县）观（城）为中心的我根据地处在十分严密的分割包围之中。

所谓“据点”，就是以少量日伪军驻守的砖木结构的碉堡式炮楼。这种炮楼并不是铜墙铁壁，不过是外壕、鹿砦围护下的单砖墙两层或三层楼的一种防御体系。敌人凭借这种十里一碉、五里一堡的连锁式防御体系，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白天敌人可以从枪孔和楼顶监视我军的行动，一旦我军进攻时，又可以利用它炮楼固守待援。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条件不易将其打开，如强攻则会遭受较大的伤亡。因此，当时的敌我斗争焦点就是敌人设据点，我们拔据点。拔据点也叫做“拔钉子”。这就是平原根据地1940~1944年除了敌人大规模集结兵力的“扫荡”和我们反“扫荡”之外的主要斗争形式。或者说，所谓反封锁、反“蚕食”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和敌人所设碉堡据点的战斗过程。

然而，要打据点（就是打炮楼），以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条件，只能是偷袭加强攻，乘敌不备一举冲过外壕，树起云梯，爬上碉堡，向枪孔塞炸药，投手榴弹，或用炸药炸毁其墙壁，打开缺口，冲入碉堡……运用这种手段攻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那是靠了我军战士的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伪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或者利用内线关系炸开城门得来的。若论进攻力量，我军则存在不小的困难。敌人有恃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欺侮我们没有炮。因此，斗争任务要求我军要有炮。在第7团，这已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了。

在曾思玉这位指挥员头脑里，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深信我军战士是

忠勇兼备，是无所畏惧的；但是越是觉得战士可爱，就越觉得必须尽量减少战斗中的伤亡。这个矛盾困扰着他，在许多次战斗中他也确实就地取材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曾经使用过八仙桌上加盖湿棉被放在小车上作为土坦克借以掩护冲锋、接近碉堡等办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如果有一门炮，情况就会大不同了。这种想法在曾思玉头脑中久久盘旋着。他不是唯武器论者，但他相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

说起来真是有趣，1937年秋天，曾思玉在井沟伏击战斗中，就曾经有过一次带1个排去夺取日军九二式步兵炮的勇敢行为。当时日寇气焰嚣张，在窑洞中顽抗，其猛烈的火力使这次夺炮未能奏效。事后，第115师政委罗荣桓还半开玩笑地批评说：“老曾，你这个政治处主任想用1个排去抢1门炮，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能行吗？党培养你这样一个干部不容易呀！”曾思玉接受了这次批评，但他并没有把夺取敌人的炮来武装我们自己这种想法去掉，他只是想如何以更巧妙的办法去夺取。

还有一次，是1940年初秋季节，曾思玉率运河支队第5团（即后来的第7团）开辟巨（野）南地区的时候，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攻入了封建会道门把持的营里集。不料这些人勾结日寇，立即通风报信。日寇下午就从菏泽出动了100多人，携带一门九二式步兵炮来奔袭我军。由于当时有1个营因误食桐油而全营中毒，无法投入战斗，只好用火药杀伤敌人后，撤出该地。这次又失去了一次夺取步兵炮的战机，使曾思玉十分遗憾。

1941年元旦前夕，鲁西军区政委苏振华和曾思玉（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又一起来到第7团，向他们祝贺新年，同时检查这一段时期以来部队冬季整训的成果。他们看到经过一年的实战锻炼和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普遍提高，装备有所改善，士气也很旺盛。第7团上下团结一致，求战心切，想在新的一年里开始就打一个漂亮仗，特别盼望能在战斗中缴获日寇的九二式步兵炮。

根据我军的情报和实际侦察，已经知道驻守郓城的是日军第32师团的1个大队约400余人，另有伪军约500余人。这支敌人就配有九二式步兵炮1门。

所谓“九二式步兵炮”，是一种轻型的步兵炮，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前夕，于神武2092年（即1932年）研制出来的。口径为70毫米，高低角射度为10~70度，初速榴弹装药为197米/秒，运动方式为1马挽曳或3马驮载，最大射程为300米，全重300千克。这种炮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中当然是无足轻重，但在1940年那个时代，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对我们根据地的八路军来说，却是一种非常灵巧轻便对付鬼子、伪军据点的有力工具，第7团全体指战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爱国情怀和机智勇敢的气概，如果能有这么1门炮，那真是如虎添翼，将会取得战场上的更大胜利。

在全团军人大会上，苏振华代表军区党委、首长向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祝贺新年，总结一年来我军的斗争经验，并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及鲁西军区的形势。曾思玉在讲话中却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和敌伪斗争的主要焦点是打据点和安据点的斗争，我们需要些什么条件？”其实，答案早已存在于每个指战员脑子里了，那就是要以胜利的战斗夺取敌人的九二式步兵炮。曾思玉是明知故问，有意激将。

果然，元旦大会上，团长刘正、政委杨俊生就向苏振华和曾思玉送上了

一份用红纸写的决心书，表示一定要以新的战斗胜利来迎接 1941 年，打好第一仗，缴获鬼子的九二式步兵炮。

在第 7 团，想大炮、缴大炮已经是上下一致的共同愿望。这次曾思玉因势利导，借风点火，智激第 7 团，为 1941 年第一个歼灭战——潘溪渡伏击战奏响了光彩华丽的序曲。

然而，要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 1941 年已大大不同于 1937 年和 1938 年了。

杨勇、苏振华、曾思玉、王秉璋、李觉等为此绞尽了脑汁：采用什么战术？攻坚非我所长亦不可取，当然只有围城打援一法，诱迫城内的日军出援，于途中设伏，一鼓而擒，夺取钢炮。

为了这次胜利，杨勇亲率第 7 团营以上干部到郓城至侯集一带勘察地形，选定了敌人必经之路，即一面是大坑、一面是村落的潘溪渡，作为伏击地带，并细致周到地部署了围点、打援和警戒任务。这是一次志在必得的战斗。曾思玉在作战预案研究中想出了许多主意，一一都被采纳。

巧计夺炮

潘溪渡战斗是 1941 年我军在鲁西平原上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有如下一段记载：

“八路军 115 师教 3 旅（兼鲁西军区）为打击对鲁西抗日根据地威胁较大的郓城之敌，并掩护该旅 9 团南下开辟巨（野）南地区，决心寻机歼郓城驻守之敌一部。1941 年 1 月 7 日晚，教 3 旅 7 团及 2 军分区地方武装，隐蔽进入郓城和侯集之间的潘溪渡附近地区，用一部兵力围困侯集据点，以诱歼郓城来援之敌。8 日上午 11 时，郓城日军 1 个中队，伪军 1 个大队，出城来援。当其进入伏击圈时，我军对其连续发起数次冲锋。战斗到傍晚，将其全歼，击毙敌软原少佐等军官 9 人，士兵 150 余人；毙伤伪军 130 余人；烧毁汽车 4 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 1 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 6 挺，步马枪 190 余支，弹药物资一部。我伤亡 138 人。潘溪渡战斗是继 1939 年 8 月著名的梁山伏击战之后，我军在鲁西平原上创造的又一次平原歼灭战的模范战例。”

作为全军的战史记录，这一段不平常的文字是已经够多的了，特别是称之为“平原歼灭战的模范战例”，更是高度地评价了这次战斗。

事实上，这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敌寇已基本完成了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封锁的情况下，我军进行的唯一

的一次平原伏击战战例。据所查到的资料来看，在此之后整个华北已经很少听到伏击战的例子，大多是袭击或强攻据点的战斗形式了。

潘溪渡战斗是以杨勇为首的鲁西军区和教 3 旅的军事指挥员们集体的指挥艺术的杰作，是一次十分完美的胜利之战。

在这一个光辉的战斗成果中，有着每个指挥员的一份奉献。曾思玉作为旅政治部主任当然是其中的一员。这次战斗前，他向第 7 团进行了深入的动员。特别是他自从来到鲁西地区之后，两年来马不停蹄地从泰西到运东，从运东到运西，从中心区到边缘区，带领第 7 团、第 8 团、第 9 团的部队进行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随时进行调查研究的，以军人的特有敏感察看了鲁西大地的地理、民情和日伪军、顽固势力、会道门等方面的情况，对一些突出的地形、敌情已经是了然于心了。因此，这次战斗从设想到实施，他都是非

常积极的参与者，提供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潘溪渡战斗的成功是在很多方面的成功。曾思玉的军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潘溪渡伏击战的胜利，再次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是平原伏击战成功的范例。它的成功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克敌制胜的科学，也充分说明只要认真调查研究，掌握客观规律、分析敌情、地形、民情等，就能做到主客观一致，从而胜利实现我们的计划。”

他所说的“主客观一致”，实际上是指这次战斗不但有计划有准备，而且还预先定下了夺取九二式步兵炮的目标。战斗的进行完全符合我军的设想，而且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这次战斗取得胜利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正确地分析了敌情。1941年的日本鬼子远远不是1937年、1938年那个时候的鬼子了，那种抱着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长驱直入、旁若无人的狂妄姿态早已无影无踪，而是被我军打得变成了惊弓之鸟。因此，现在再要打伏击，绝不像平型关、汾离公路战斗时那么容易了。但还是有可乘之隙。因为每个较大的城镇驻军，对所担负的警备区域内的据点有必须支援的义务，当一处被攻击时，仍然必须出动救应。这就给我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创造了条件。只要战术巧妙，完全可以实施《孙子兵法》所说的“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

——正确地选择了战场，创造了战场。时值严冬季节，冀鲁豫平原上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既没有茂密的森林，又没有葱郁的青纱帐，更没有起伏的山丘。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打伏击，大量的部队隐蔽在哪里？杨勇、曾思玉他们想出了办法，就在敌人必经之路的沿途村落里把部队隐蔽起来。但在村落里设伏有许多没把握的因素，要能够封锁住居民点，使人民不因战斗而惊慌，或因停止生产、生活活动而走漏消息。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举动，但又是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坚强信心的表现。事实上，当部队悄悄进入设伏的村庄——碱场店、咽喉铺、秦家集、杨家庙等地后，得到了村民的大力配合。村民们克服了暂时不能自由出入的困难，保持了村子里的和平景象：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田野中还有三三两两的劳动者（当然都是部队化装的哨兵），有拣粪的、打水的、拾柴的……而部队却隐藏在村中的民房里、院墙后或房顶上的柴堆后面，从外面是看不出破绽的。

——认真地实施佯攻。旅部特务营以迅猛的动作、强劲的火力大举攻击侯集据点之敌，假戏真做。手榴弹猛烈的轰鸣，高高的云梯冲向围砦，使侯集据点里的1个小队日军和1个中队伪军大有难以招架之势。敌人不断用电话向驻郟城的日军司令龟田呼救，声称来者不是土八路，难以支持，要求迅速派兵增援。

——准确地掌握情报。当时侯集与郟城之敌在电话上反复讨价还价，一方要求立即增援，一方则以种种借口迟迟不想出城。直到午夜过后，郟城方面才决定于次日天亮后出动日军1个中队和县警备大队，携九二式步兵炮1门，乘汽车4辆前来增援。敌人万没想到这些电话上的往来，却一字不漏地被我军全部听了个一清二楚。原来在杨勇身边有一位觉悟了的日本士兵水野靖夫。这个矮墩墩、满脸胡须的日本青年，自从1939年在梁山战斗中被我军俘虏之后，经过教育大大提高了反战觉悟，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决心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同盟的鲁西支部，担任了支部书记。几年来，他在瓦解日军的宣传工作上做出了

许多成绩。这次潘溪渡战斗前，他又积极要求上前线，并和敌工干事杨靖弄来一部电话机，就在指挥部秦家集材的公路边上，将电话线搭在敌人电话线上，展开了窃听活动。龟田和侯集的日军小队长的对话，被他全部听到，立即翻译出来报告了杨勇司令员。于是，伏击部队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在掌握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指挥员要求部队发现敌人后不要立即出击，要沉着冷静，严密隐蔽，待敌先头过后，大队进入伏击圈时再一齐开火。整个部队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把握。

——果断的指挥，勇猛顽强的战斗。当敌人先头部队侦察人员骑着自行车进入村庄时，在我伪装的村民和干部应付下，居然丝毫没有发现破绽。甚至当他们频频敲门时，还被我第1营谢教导员伪装成妇女的声音连声说害怕所哄骗而作罢。这时，敌人已放心大胆地向侯集前进。但是情况还是曲折多变的。当敌人本队快要进村之际，一名骑在马上日本兵似乎发现房顶上有人。他惊慌万分，拨转马头企图逃走。后边的敌人见状也急忙往回撤。眼看将要进入伏击圈之敌要溜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正团长当机立断，不再等敌人进入伏击圈，立即发出信号。一阵响亮的冲锋号声响起，我伏击各部队立即全面开火，冲向敌人，一路在村外与敌人展开搏斗，另一路将敌人汽车焚毁。我军把日本兵压在大堤之下，并展开了夺炮行动。尽管敌军在指挥官软原少佐指挥下顽强挣扎的情况下，我军也付出一定的牺牲，但终于砍死了软原，夺取了九二式步兵炮。同志们兴奋万分，顾不得仔细检查。谁知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突然射出，把我军一个战士的腿炸伤了。但是炮还是夺到手了。

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那城出援之敌从其指挥官软原少佐到全部日伪军，一个不留地被全歼。当时郟城日军司令龟田曾派出一个中队企图把出援之敌接回城去，岂不知以杨勇司令员为首的指挥部早已考虑到这一着，预先把骑兵连部署在路上。当城内之敌刚刚到达贾家楼附近时，我骑兵连政委赵萍立即指挥全连手持雪亮的战力，向着敌人猛烈冲杀过去。一霎时杀声震天，尘土飞扬，狼烟滚滚。鬼子步兵哪里招架得住这样凶猛的冲击，丢下2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而去。

潘溪渡战斗的胜利，使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畑俊万分懊恼。他立即调集第32师团、第31师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及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和各地伪军3000多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从临清、济宁、菏泽、大名出动，于1月15日（即潘溪渡战斗后第7天）分路向我朝城、观城、范县一带鲁西军区中心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报复性“扫荡”，扬言要找杨勇讨回大炮。敌人采取突然神速的动作，以使我军无法侦察，即使侦察到了情况也无法及时转移，企图陷我军于被动，将我教3旅领导机关和主力一网打尽。这次突然的袭击使我军未能事先转移，在苏村、马集与敌遭遇。为了掩护主力和机关，教3旅特务营在营长钟铭新、教导员邱良佐两位老红军干部率领下，奉命阻击，与敌苦战终日，全营120余位同志壮烈牺牲，保证了主力第7团携着新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安全转移。

此后不久，曾思玉便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他率领着主力老7团，带着这门九二式步兵炮，在边区南征北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利兵坚甲，不为无米之炊

在苏村、马集这一场惨烈的遭遇战之后，教3旅上上下下对于九二式步兵炮的感情更深了。既然日本鬼子为了这门炮的失落居然发动了一场规模很大的紧急报复性“扫荡”，我军为了保存这门炮又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付出了那么沉重的代价，不言而喻，这门普普通通的步兵炮就成了我军手中一件打击日寇、汉奸的有效工具，成了鲁西军区的一件宝贝了。在此后几年的抗战中，这门炮确实实在在历次作战中都发挥了巨大威力，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所有关心这门炮的人当中，曾思玉是最突出、最热心的一个，而且他以后每次指挥作战，总是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使用这门炮，尽可能发挥它的作用。

但是，在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军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九二式步兵炮虽然不算十分笨重，可是要终日携带着它在敌人“格子网”里行动，依然是十分不便的。一门炮要3匹马分开驮，一时之间还拼装不起来。用马牵引，则很难跨越那些既深又宽又陡的封锁沟。因此，当年曾思玉曾经为此绞尽了脑汁，想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平时把炮藏起来，作战前再取出来。

这样，分区侦察科长邱克难的肩上就增加了一项任务，他是少数几个知道炮的准确位置的人之一。无论在严寒的冬夜，还是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里，常常是他带着炮兵连很少的几个人，其中包括连长何吉祥，选择远离村庄、荒无人烟、柳树丛生、土质疏松的黄河故道，于夜静更深之时，将预先拆卸成几部分并用油布包扎起来装在木箱里的炮，抬到预先挖好的沙坑处，将炮分别埋入坑内，再将表面整平，做上特殊的不为人注意的标志，天亮之前返回驻地。这种行动，部队的无关人员不知道，只有曾思玉掌握。有时他也亲自到现场去。一旦有了战斗任务，又由那几个人去把炮取出来，擦拭并装配起来，准备使用。

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藏，而是这门炮怎样才能发挥它的效用。事情很简单：有炮无弹，一切无从谈起。

那时候，炮弹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可是如果没有炮弹，炮又有什么用呢？怎么用它去对付日寇、汉奸在我根据地周围设下的据点呢？

曾思玉三番五次在领导同志中间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积极主张由我们自己的小炸弹厂动手研究试制炮弹。他一次次地苦口婆心地向那些抱怀疑态度、没有信心的同志做工作，千方百计地去打通他们的思想。

有的人说：“愿望是好的，但不现实。根据地后方工厂能造手榴弹、枪榴弹就很不错了，现在又能造八二迫击炮弹了，更是难得。还是集中力量多造些迫击炮弹吧。”

有的则说：“仿造九二式炮弹是空想，根本不可能。连九二式步兵炮炮弹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还想造炮弹？”

一次一次的研究，总是难于取得一致。曾思玉是个火爆性格，他很激动地说：“我们根据地周围日伪军据点碉堡林立，无论如何要设法仿造九二式炮弹来敲掉这些乌龟壳，保卫和扩大平原抗日根据地！”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真是心急如焚。但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直到1942年，九二式步兵炮还在地下躺着。

这一年，教3旅和第2军分区合编，曾思玉被任命为分区司令员。他和主力第7团团团长龙世兴面对着敌伪日益加紧对我分割封锁、蚕食压缩的现实，再一次下决心研制九二式步兵炮炮弹。恰在这时，郟城县汉奸县长兼伪军大队长刘本功竟然给曾思玉送来一份挑衅性的“挑战书”，把曾思玉骂了

一通。这个反面教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来，造炮弹的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在曾思玉主持下召开了专门研究仿造炮弹问题的会议。第7团团团长龙世兴、分区参谋长潘焱、司令部作战股长李觉、后勤处长程重远、后勤政委匡根山等，经过一阵热烈而又细心的研究讨论，下定了决心，也树立了信心，要自己动手仿制九二式炮弹。曾思玉热情高涨，脱掉帽子拿在手上，鼓舞大家：“别人能干的事，难道我们不能干吗？我不信这个邪，一定要下决心造出来！”于是成立了一个以程重远、匡根山、李觉（工科大学生）加上后方工厂厂长赵慕三（大学毕业生）等组成的造炮弹的领导小组，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研制活动。

难关是很多的，但是众志成城，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就能不断地取得进展。曾思玉也每每和大家在一起，鼓舞情绪，坚定信心。大家在既无资料图纸，又无任何现成原料、工具的情况下，废寝忘食地努力攻关。有的负责设计，有的试制加工，有的收集原材料，有的改进设备。炮兵连长何吉祥更是兴奋不已，连夜把炮送到工厂请大家分析结构。经过逐步的摸索，解决了炮弹制模、翻砂、配制炸药问题，又通过商人从敌占区采购来部分紫铜材、黄色炸药等必需物资。一道一道的难关终于被突破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终于造成了3发九二式炮弹。

大家喜不自胜。可是试射的时候却又遇到了炮弹打出去不能爆炸的难题。又经过一番苦心研究，找出症结，进行了第二次试射。只听得“轰轰轰”三声巨响，发发命中目标，而且爆炸效果很好。在场的人包括曾思玉在内都雀跃起来，大声欢呼：“打得好，爆炸了！爆炸了！”不少的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几个月来的辛苦劳累都一扫而光了。曾思玉和大家一一握手，向大家表示祝贺。这时他想到的比眼前的欢乐更多更远一些。他觉得，九二式炮弹仿造成功，是在今后的作战中更能够减少伤亡、避免大的牺牲、以小的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有力保证。他十分爱惜部队，爱惜部队的每一个战士。他在日记里把每次战斗中牺牲的干部、战士的名字都记下来，几十年后还常常想念这些牺牲的同志。

此后又继续添置了工具设备，并组织商人到敌占区采购雷汞等重要材料。工厂全体同志奋力拼搏，从每月造几发炮弹，到后来增至每月造10发、20发、30发。每发炮弹都凝聚着众多技术人员、干部、工人、爱国人士的心血和汗水，闪耀着他们崇高的理想和智慧的光芒。

这时，九二式步兵炮才有了大显身手、发挥威力的基础和条件。我军军威大振。

造炮弹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曾思玉是一个深深懂得为将之道的指挥员。正像《孙子兵法》所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曾思玉作为一个指挥员，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只管军事工作的人。他总是把部队看作一个整体，时刻关心部队的的生活。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牢记红军的传统，时刻思考着把部队建设成为兵精粮足、技术过硬、士气高昂的队伍。因此，一方面，他依靠抗日政权，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一方面在部队内部建立了统一的财务制度和统一的供给标准，保证了最低的生活水平；而且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还千方百计设法解决医药和器材。从1939年起，鲁西军区（独立旅）就着手建立小型兵工厂。

1943年全区部队又展开了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垦荒种菜，参加灭蝗，渡过灾荒。这一切都体现着一个高级指挥员在建设部队、建设根据地上的战略眼光。把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并切实办好，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说到这里，还要提起一件事。那是1946年3月，曾思玉担任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的时候，当时第1纵队驻守在热河省承德至叶柏寿之间的头沟、三沟、六沟一线，与国民党军对峙。由于热河省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陷于日伪魔爪下14年之久的地区，人民极端穷困，饥寒交迫，所以部队生活也处于很困难的情况之中，每天吃高粱米饭，衣被十分缺乏。部队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去年七月七，反攻离故乡。
邯鄲战役后，来到北台庄（热河地区）。
小米沙子饭，还有青菜帮，
上身没有袖，下身无裤裆……”

那时，曾思玉分管后勤，每天忧心忡忡，想方设法解决部队的困难。3月间，他带着供给部长贾春林，乘一辆破旧的十轮卡车从承德出发，经过丰宁、隆化、大阁、红汤寺、四海等地，到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首府、解放还不过半年的张家口去，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第1纵队的生活困难情况。这条路是一条很少通车的旧路，年久失修，崎岖难行。当时汪德荣也一路随他去张家口，坐在他后面的另一辆车上。有一天大家忽然看见，他所乘的那辆车有一半轮子驶出了道路，悬在空中旋转着。由于十轮卡车车身重，前轮大一些，所以尚未失去平衡；但却是一发千钧，危险万分。而他这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却一心只想着为部队解决困难，丝毫不顾个人安危。幸而卡车很快就上了正路，转危为安。车上的人都为此捏了一把汗，庆幸他是一位“福将”，并由衷地钦佩他那种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

在张家口那几天，他终日忙忙碌碌，东奔西走，费尽唇舌找大军区后勤的各有关部门，把聂荣臻司令员对部队的关怀变为实际，解决了把从晋冀鲁豫地区带来的票子兑换成晋察冀的票子以及部队的鞋子等问题。他还利用时机找了些张家口的商人，请他们代购一些军需品。

那几天，他忙得连张家口市容也没有看一眼。

曾思玉这种关心战士疾苦的纯真之情，凝聚了部队坚强的战斗力，成为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正由于他这种不顾个人、一心只为群众的鲜明性格和高尚品德，使聂荣臻动了爱才爱将之心，把曾思玉从第1纵队调出来，留在了晋察冀军区。曾思玉因而没有再返冀鲁豫。

冲决罗网的“大鱼”

从1930年入伍当红军以来，十几年的征战岁月中，曾思玉记不清打过多少险仗、恶仗。但是，1942年9月27日，在鲁西旧范县附近的甘草垴堆，在日寇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他在远离领导机关，仅带着两个步兵连、两个班长训练队加1个排的兵力（不足300余人）的情况下，保护着数

以千计的被日寇包围的地方干部以及数千流离逃难的老弱百姓和妇女儿童，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胜利组织指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铁壁合围”的反“扫荡”战。这是鲁西革命历史上十分壮丽辉煌的一页，充满了神话般的传奇色彩。这次战斗，在广大军民中长久地传颂着，可能也是他一生中经历中最惊险最难忘的一幕。

1942年以来，日寇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日益残酷。敌人把消灭我根据地的首脑机关，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我军主力，作为主要目标。在战术上，敌人除了采用过去的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复搏击等方法之外，重点采取了“铁壁合围”战术，将其作为对付我军的主要手段。这种战术，布置很周密，通过侦察判断精确地定下合击目标，然后调集部队从各方面同时出动，布成并列纵队（即所谓“梳子队形”）逐渐推进，逐渐紧缩包围圈，最后在一个中心点上合击。同时还于半途设伏或袭击，不断把我抗日军民向中心点驱赶。再派几架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制造恐怖气氛。每一支部队到达指定的集结点后即开始分兵，1个大队为1支队，每支队分4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2路或3路纵队，分进合击。一处发现目标，其他各处即向此处奔来。各路士兵分别手持红、黄、兰、白、黑种种颜色不同的旗帜，造成漫山遍野都是其部队的假象。

9月18日以来，教3旅部队在鄆北大石庄一带驻了一周左右，在那里举行了全旅的训练比武检阅大会。抽调了第7、8、9各团的第1连和训练队参加比赛，考核青纱帐期间部队练兵的军事、政治、文化、体育的成果。会后，身为第2军分区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曾思玉，即和第8团参谋长王晓率领参加完比赛回部队的第7团、第8团的第1连及两个班长训练队离开了旅部，前往郓城以北的李楼，准备在那里召集党、政、军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布置秋季征粮的任务。

一路上，曾思玉思潮奔腾，脑海里不停地思考着根据地的形势：当前青纱帐已经消失，秋收正在紧张进行。按照以往的规律，每年秋季敌人都要进行“扫荡”。而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华北日酋刽子手冈村宁次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叫嚷把华北变成其“完成大东亚圣战”的基地，更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这年“五一”，敌寇对我冀中平原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大“扫荡”。下一步，很可能会以我鲁西根据地为主要“扫荡”目标。

这是曾思玉在率领小部队单独行动的情况下，对敌人“扫荡”的一种顶感，一种估计。而事实上，日本侵略者确实已经开始了对冀鲁豫的“扫荡”。日寇自9月下旬即调集重兵，准备进行“铁壁合围”，妄图消灭我鲁西地区的领导机关和部队。日寇对此次“扫荡”极为重视，在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的主持下，召集其主要指挥人员进行了图上作业和现场指挥方面的研究，参战部队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作战训练。

9月26日，敌人从驻克州的第32师团、驻泰安的第59师团、驻新乡和开封的第35师团和驻商邱的骑兵第4旅团中，抽调步兵1.1万余人，骑兵500多人，坦克10余辆，飞机10架，并于当夜以250多辆汽车将步兵秘密运至聊城、莘县、郓城、濮阳、菏泽等地集结。9月27日拂晓，日寇和各地伪军共万余人分8路出动，对我中心区展开了“铁壁合围”。

从聊城、莘县出动日军2200多人，分为3路：一路600多人，经寿张、莲花他到清水河；一路1000多人，经朝城以东直扑范县以北的河沿；一路

500 多人，经阳谷城，到郎集、舍利寺。

从朝城出动日军 500 多人及伪军 1000 多人，向南进到谷疃集集结。

从濮阳出动日伪军 1000 余人，向东过柳下屯后，经濮县南北，到达牛桥和白衣阁。

骑兵第 4 旅团 500 多人，由商邱进至菏泽后，在伪军 300 多人配合下，分经临濮集和鄆城，到旧城汇合，然后经过黄河故道进至范县杨二庄一带。

集结于郟城之敌，分两路向北出动：1000 余人经肖皮口、罗楼过黄河故道，直插旧范县以东；另一路 500 余人经侯集、大渚谭，插到徐井、林楼。

这样，敌人对我中心区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按计划到达各集结点即行展开。旧范县以东及清水河之敌埋伏不动，其他各路以中队（连）、小队（排）疏开，采用宽大正面的梳篦队形压缩前进。为弥补其纵队之间的空隙，在步兵后置以骑兵和汽车，构成严密的封锁包围。敌人手持各色旗帜，到处摇旗鸣枪，互相呼应配合，齐头并进，虚张声势，企图造成对我军的精神威胁，使我军难辨虚实而不敢突围，以求逐步将我武装部队、地方机关一起压缩在以旧范县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最后一举歼灭。

当曾思玉率小部队于 26 日夜宿营于郟城以北李楼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敌人重围之中。拂晓时分，哨兵报告发现了由郟城出动之敌。由于远离部队领导机关，没有情报来源，一时间弄不清情况，只有决定暂向黄河故道以北转移。谁知当到达甘草垱堆之际，发现四面皆有敌人，已经被围在核心了。这时，他们又与第 9 团押运棉衣的 1 个排及寿张县大队一部会合。可是，大批的地方机关、医院、报社、学校的人员和数千群众也被敌人压缩过来。一片慌乱惊恐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呼儿唤女夹着妇女、儿童、婴儿哭泣之声不断传来，敌人的掷弹筒、枪榴弹开始在人群中爆炸，附近村庄冒出浓烟烈火滚滚冲向天空。两三架画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也时时在人们头顶上低飞掠过，一阵爆炸声、枪炮声过后，就有一些群众被炸得鲜血直流，血染红了黄沙。部队几经转移，十分疲惫，加上炎热的秋阳，晒得沙滩灼热炙人，指战员个个口干舌燥。历史上曾有过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而今天曾思玉所处的景况较之那时更加困难，更加危急。在这平坦的沙滩上，人们被日寇逼得无处可藏，无路可走，看到曾思玉所带的这支部队，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个救生圈，便一齐围拢过来。军队走一步，老乡们跟一步，军队走到哪里，老乡们便跟到哪里，寸步不离。这种相依为命的军民鱼水情，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场上，实在太使人感动了。然而，仅仅感动是不行的，必须解救他们。

从 26 日深夜哨兵第一次报告发现敌人时起，曾思玉就一直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尽管眼前的情况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他却十分冷静。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是这支独立行动部队的指挥者和领导人。在独立行动的情况下，他是军事政治的负责人，也是党政民各方面地方干部所寄托着希望的领导人。他必须刚毅沉着，机断行事。他没有消极不为的可能，也没有犹豫不决的余地。他不能指望什么人来指示他，却必须连续指示这支部队如何行动。他迅速地作着一连串的抉择，一面凭借着战士临时给他挖的一个简单的掩体，手持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一面在脑海中迅速作着如何突破敌人合围的打算。

如果说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最可贵的品质在于智勇兼备，那么曾思玉是当之无愧的。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他都以勇敢著称，立下过许多功劳。

同时，他也是一个十分机敏、富有智谋的人。他懂得，打仗不只是一定要勇敢，更要用脑子，要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目标。正像孙子兵法所说“兵者诡道”，要“出奇制胜”。他深深懂得，在战场上智慧是最重要的品质，必须以机智的战术制伏敌人。

那一年曾思玉刚满30岁，作为我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正面临着一场智慧与力量的搏斗。在这场暴风雨般的搏斗中，他必须取得胜利，必须胜利地突破日本鬼子的“铁壁合围”。

突然，他发现日本鬼子这个“铁壁合围”阵势也不是铁板一块。从它的第一线到纵深，四面均有红、黄、蓝、白、黑不同颜色的旗子，西南方向黄旗处是敌人的炮兵阵地，步兵正在向合围点运动，只有南面甘草烟堆村东北角，距我部队千余米的地段上，有日本的“膏药旗”和几面红色的小旗子，插在柳林里停止不动了，在其纵深再也看不到其他的旗子。对，这就是敌人的弱点。他不禁想起了童年时代的往事。在村子前面的池塘里用大网捕鱼的时候，有些大鱼却凭着冲力，撞破鱼网逃去。他暗自笑道：好你日本鬼子，张开这么大的网，真想吃“大鱼”吗？难道不怕鱼撞破你的网，不怕鱼刺扎你的嘴吗？在这一刹那间，曾思玉眼睛里不由得一亮：哼！你鬼子既然是一线式的展开，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大做文章。你判断我们不敢在平坦开阔的黄河故道沙滩上突围，那就大错特错了，老子就要从这里打出去！

他随即下定决心从正南方向打，命令第8团参谋长王晓带领第8团第1连和1个班长训练队，沿着正南道沟，利用柳树棵、大麻子棵作掩护接近敌人，然后集中兵力火力，猛打猛冲，一定要突破这个缺口；又命令第7团第1连和另1个班长训练队及第9团1个排，组织轻机枪和特等射手，用准确的火力压制甘草烟堆村东北角柳树棵下的敌人，掩护部队突围。

王晓是从决死队军官教导团毕业的军事干部，山西青年，1.8米的个头。他平时沉默寡言，但是思维缜密，作风干脆利落。接受命令后，他立即带着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把敌人撕成碎片的战士们向正南冲去。一阵手榴弹爆炸声和震撼着大地的冲杀声响彻天地，声声扣人心弦。不一会儿，这杀声却沉寂下来。原来突破没有成功，受到敌人火力的压制，第8团第1连连长王青山也壮烈牺牲。敌人纵深的炮兵，开始向我军突围的地方猛烈轰击，企图阻止我军突围。炮弹不断地在人群中爆炸，阵地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掀起滚滚的黄沙，遮天蔽日。不少妇女、小孩被炸死炸伤，哭声和呼救声频频传来。曾思玉万分激愤，立即召集所有的干部到自己面前。他沉默了一下，然后下达了第二次突围命令：

“同志们，第一次突围没有成功，现在情况非常危急，每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到了，全体同志要拿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来，要死里求生。我们是硬骨头，钢铁战士，一定要打破敌人的合围圈，冲出重围去！俗话说，一人拼命，十人难挡。我们要以一当十，要以少胜多，要有坚强的胜利信心和决心。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要迅速作好冲锋准备。炊事员要丢掉油桶，举起扁担、锅铲同鬼子拼命。一定要歼灭当面敌人，打开一个缺

口，带领人民群众突出重围。各部队利用道沟，就地展开。各连的机枪要集中，射手在最前面，挂皮带端枪射击。步枪上刺刀，手榴弹一律打开盖子。听到冲锋号声，所有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对准鬼子那几面‘膏药旗’，在几百米宽的地段内，向柳树棵下的鬼子一齐开火，像大刀一样砍下去！冲

锋时高喊杀声，要像猛虎下山一样猛打猛冲过去！只许向前，不许后退！一直向黄河故道南岸的杨集、李集方向突围前进！听清楚了吗？回去准备好，马上向我报告！”

大家齐声响亮回答：“听清楚了！我们都是英雄汉，坚决完成任务！”

曾思玉这一番迅速改变部署、简洁有力的动员，把战士们心中的愤怒火化作了巨大的力量。4个连队加上寿张基干大队在宽大正面上一线展开，同时发起突击。在18挺机枪一齐扫射和几个连队一齐勇猛冲击下，甘草垌堆一线的日军1个中队被冲垮。我军一口气冲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曾思玉和部队冲出后刚刚停下，用望远镜再作观察时，忽然发现敌人骑兵向着我突围方向奔来，企图截击我军。曾思玉稍一停下来，警卫员王振鸿就急促地催促着：“政委，政委，上马快跑吧。”曾思玉虽然知道他是出于关心首长的心情，但还是喝住了他：“你怕死？你往哪里跑？你就不管后面的人民群众了吗？要死也跟群众死在一起！”曾思玉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新的念头，马上说：“快叫骑兵班长过来！”话音刚落，骑兵班长小朱已经跑过来站在他面前，问道：“政委，有事吗？”曾思玉用手指着东北方向说：“小朱，你看见那些打着黑旗子的骑兵了吗？他们企图截击我们，你们骑兵班去迎头痛击敌人！”他指着左侧一个小村落说：“你们到那个沙滩上，扬鞭打马，拼命地奔跑，尽量扬起尘土，造成疑兵，先敌占领那个村庄。然后用少量人拉马隐蔽在村南面，其余人疏散在村北道沟里，对准向南面来的鬼子骑兵，迎头打排子枪，猛烈射击，阻击迟滞敌人的行动，掩护部队和群众突围。”又告诉他们：“成千上万的军民生命就靠你们骑兵班的拿手好戏了！”

不久，骑兵班就在沙滩上扬起一条“黄龙”。接着又传来在道沟里响起的枪声。一阵突然射击使前来截击的鬼子骑兵乱了阵脚。敌人受到阻击不得不下马应付，这就为我突围部队赢得了时间，减少了阻力。部队直奔黄河南岸的大水里而去，突出了日本鬼子费尽心机设下的重重合围。

突围的胜利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大大超过了愚蠢的日本强盗。尽管敌人设计下十分严密的所谓“铁壁合围”，可是他们万没想到，在我军身陷重围之后，由于曾思玉临机应变，虽然部队处于劣势，仍然可以以宽大正面的突然迅速的冲击，以四五百名战士的拼命精神，以全部突围部队和数千人民群众的齐声呐喊和扬起的漫天尘土，造成了一个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声势，反而使那些单兵纵队的日本兵变得十分渺小，吓得心惊胆战，不知所措。有些小鬼子竟向工事、草堆里乱钻。突围中我军伤亡20余人，而鬼子的中队长黄潘中尉以下百余名敌人却被我军击毙，我军还缴获了他的“王八盒子”枪和皮包。

在这次大“扫荡”中，我军也有些后方机关和学校单位，由于战斗力不强又未能及早转移，而被动地陷入了敌人合击中心，以致受到损失。有些人只能各自为战。例如著名的小演员靳士衍和日本觉醒同盟的日本朋友黑田，都在面对敌人捕捉之际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另一些人不幸被俘，后来越狱脱逃回到根据地。这也说明，在敌人“铁壁合围”大“扫荡”的特殊条件下，负责指挥的人能不能清醒地判断情况，采取大胆果断的突围行动，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冀鲁豫日报》和教3旅的《挺进报》都以特大标题在头版刊登了《曾政委率领部队和群众胜利突围》的好消息，教3旅旅长王秉璋和曾思玉见面后，互相拥抱着用手猛拍着对方，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既兴奋又喜悦并带有一

些感伤和心酸的心情。他们久久地激动着……

事实证明，所谓“铁壁合围”是完全可以打破的。

王秉璋事后在《挺进报》上发表了关于反“扫荡”的总结性文章，从军事理论的高度论述了这次突围胜利的重大意义。

奇兵奇袭奇胜

冀鲁豫边区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斗争非常复杂多变，对于像曾思玉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说，既是一个极富于挑战性的地方，又是一个非常适合锻炼指挥才能、提高军事艺术水平的地方。

仅从军事斗争的对象来说，冀鲁豫边区存在着敌、伪、顽、会、匪5种不同的军事集团。他们虽然在与我军为敌这一面上有着某些共同点，但就其军事水准、作战能力、战术技术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来说，则各有各的特点。因此，必须采取各不相同的方法对付他们，战胜他们，消灭或瓦解他们。曾思玉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磨练出来的一位共产党、八路军的指挥人才。

比如说反顽斗争，恐怕华北各个解放区中有这么多顽军的就算冀鲁豫边区了。从1938年到1945年，从泰肥山区到鲁西平原，从鲁西北到鲁西南、直南和豫北，我军几乎从未间断过和国民党顽固派武装的斗争。而这些顽军又有各自不同的派系和历史，有中央军、西北军，也有纯粹是土生土长的民团武装。至于他们的作战方法、武器装备，则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到了1942年之后，他们之中有些人执行所谓“曲线救国”的方针公开投敌，成了汪精卫的伪“和平救国军”。于是又在顽军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日本军事系统所带来的东西。

我军和石友三、高树勋的斗争延续了很长时期，经过大小无数次战斗，挫败了他们在鲁西腹地长期盘踞的阴谋，使其战斗力每况愈下。在他们内部也发生了火并。先是高树勋枪毙了石友三；后来日本人又对高树勋逼降，迫使他仓皇撤出了华北，缩回到商丘以南。这一段斗争过程中，曾思玉始终在第一线指挥着部队。从1940年打吴桥、龙王庄，到1941年打东北庄、古云集、颜村铺、榎风楼、瓦岗等战斗，他一仗也不曾落过，从而使他摸透了这些原西北军的战术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善于对付他们。其他像对李仙洲、孙秉贤、冯子固、耿飏子、时锡九等顽军的战斗，曾思玉也都是屡战屡胜。

1942年的“九二七”大“扫荡”之后，趁日寇集中兵力“扫荡”我中心区，我主力分别实行跳到外线作战的机会，各地伪军纷纷向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其中最大的一股便是汪精卫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他们利用日寇“扫荡”之机，令其暂编第5军工清瀚部为先头，进占我濮县广大地区，安设据点、碉堡百余处，控制两濮；又令其暂编第4军赵云祥部控制东明、长垣一线；其总部则移到濮阳东南的八公桥。这实际上已经直接威胁着我范县、观城中心区，并且割断了我中心区与第4、5分区之间的联系，成了边区的心腹大患。

11月，军区召集了各分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对付孙良诚的问题。杨得志司令员说：“孙良诚随日军前来，控制了东明、长垣直到濮阳、濮县，总部设在八公桥，扬言还要北上，伺机侵占范县、观城，对我中心区造成了直接威胁。这次作战会议，就是要讨论决定打孙良

诚的问题。”经过大家热烈发言，杨得志最后说：“孙良诚两万大军，深沟高垒不易于正面强攻，但要一个一个地去拔据点，又太耗费时日。根据我们打入孙良诚内部的情报人员及其他统战关系提供的情报，证明他是前实后虚，八公桥内并没有多少兵力，而只不过是其统率机关——八大处等单位。如果采取掏心战术，以我主力直捣八公桥是完全可以将其统率部摧毁，而取得震撼其全部，逼其退兵的战果的。”到会者一致同意杨得志的意见，随即纷纷请战，要求担任主攻。但是，区分任务的结果，这个掏心的任务仍然是交给了曾思玉和他的第2军分区部队，其他则分别担任外围钳制或打援任务。杨得志从多年的作战指挥中对曾思玉深为了解，知道他胆识过人，勇猛过人，他的指挥是可以信赖的。

曾思玉与孙良诚的作战也不是第一次了。1941年在巨（野）南地区，我第7团、第9团曾经在杨得志、唐亮、崔田民统一指挥下进行过大规模的讨孙战役，大大挫败了这支顽固势力，因而对其战术特点及军事上惯用的一些手段并不陌生。由于他们反共投降，政治上十分反动，所以士气不高。孙良诚采取力求保存实力、不轻易小股出动的战术，如要出动则采取大兵团整体的行动，以求不受歼灭。但在防御上，他却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成熟的方法，就是修筑围砦，配上明碉、暗堡，互为依托；以集团配制形成梅花阵势，交叉火力，互为犄角，互相策应；再配上既深而宽的外壕和密密层层の木栅、鹿砦，力图杀伤我进攻部队于城下，而其城内的防御和巷战能力却不是很强。曾思玉在受领攻打八公桥、摧毁伪第2方面军总部的任务后，又与政委段君毅、参谋长潘焱及侦察股长邱克难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召开了团、营干部作战会议，分析了当面的敌情：

八公桥是濒临黄河故道的一个大集镇。孙良诚总部在此盘踞已久，构筑了东西两个围砦，墙高6米左右，有两道外壕环绕，沟宽5米，深约4米，并设有木栅栏和鹿砦。围墙四门和四角都有坚固的碉堡。街内十字路口又有一个核心碉堡。

八公桥驻有伪第2方面军的总部八大处及兵工厂等后方机关，由1个特务团和骑兵营担任警卫。附近的徐镇、王郭村、梁庄、保安集等据点有其第38师两个团，以东为王清瀚的暂5军，以南为赵云祥的暂4军控制。

根据以上情况，曾思玉下达了命令：以第7团、第8团和基于团担任主攻，偷袭八公桥，歼灭孙良诚总部的特务团、骑兵营，活捉孙良诚；另由郟北、鄆北、濮县、昆吾等县大队分头包围敌外围据点，阻其出援，相机攻克。

曾思玉经过深思熟虑，把此战的重点放在偷袭的“偷”字上，一切安排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而进行。只有在偷袭不成的情况下，才转为强攻。

他首先要求参谋长潘焱和侦察股长邱克难负责及时地不间断地掌握八公桥敌人的动态，并派出精干的侦察员，在我情报人员带领下，设法绘制了八公桥的地形图，查明了敌人的详细位置。

当然，这里必须补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冀鲁豫军区对敌斗争委员会在黄敬同志担任书记以后，加强了情报工作，在沙区设立了第二办事处，专门对孙良诚内部进行工作，而且工作得颇有成效。因此，我方对孙良诚内部情况已是了如指掌。邱克难与我情报人员密切协同合作，进一步了解敌人内部情况。

11月16日，曾思玉率领主攻部队进至八公桥东北、黄河以西的范屯、常楼、鱼管、宋楼地区隐蔽集结，同时封锁消息，开誓师大会，进行深入的

战前动员。部队在“攻克八公桥、活捉孙良诚”的战斗口号鼓舞下，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

当晚部队出发时，狂风陡起，黄沙遮天。入夜更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至少有十级上下的大风挟着黄河故道上的细沙，漫天盖地而来。曾思玉见此情景，心中大喜，暗忖道：“真乃天助我也！敌人万万也估计不到我们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去偷袭八公桥，岂非是神兵天降！”

这次行军完全按照偷袭的要求，部队不走大路，不过村庄，完全由邱克难拿着指南针掌握开进方向，分别由侦察员和当地情报人员担任向导在前边带路，一律在广阔的黄河滩和“堡子”地上通过。在狂风卷着尘沙、无法睁眼的情况下，各部严密组织，加强联络信号。各级指挥员均在提前指挥位置上。曾思玉紧紧跟随最先头的部队前进。这是一次十分特殊的夜间行军。由于不经过任何村庄，所以也惊动不了村庄里的狗，一路寂静。部队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秘密而迅速地接近了敌人。曾思玉冒着狂风带领各团干部亲自进行现地勘察，选择了突破口。22时，第7团第3连突击队从八公桥东北角偷偷地扒开了敌人第一道外壕的木栅栏。曾思玉就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静悄悄地越过第一、二道外壕，迅速迫近了围砦。他不由心中一阵喜悦，暗暗为战士们加油。心想，这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兵临城下，敌人的灭亡已成定局，胜利就在顷刻之间了。

部队迅速架好梯子，登上围墙，把打更的敌兵抓住后便冒充打更的人继续打更，并令俘虏带路直奔孙良诚的八大处驻地。醉生梦死的敌军官兵们正在汽灯光下打麻将，忽然看到端着刺刀的我军战士出现在面前，吓得目瞪口呆，面无人色，只好束手就擒。

孙良诚经营多年的八大处和他的兵工厂，一瞬间灰飞烟灭，瓦解冰消。此时我部队已从四面八方攻入围砦，枪声四起。敌兵一个个从梦中惊醒，不少人来不及抵抗就成了俘虏。曾思玉立即向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报告：“偷袭成功。正在巷战中。”

只有十字街心大碉堡的敌人还在拼死固守。第8团团长齐丁根急中生智，命令第5连排长蔚金生组织战斗小组，另利用大八仙桌捆上用水泡湿的几层棉被，放在平车上，掩护战斗小组接近碉堡；用烟叶、辣椒、破旧棉絮缠在竹竿上，倒上煤油，用火点燃，在轻重机枪和步枪特等射手的火力掩护下，捅入碉堡的射击孔内。狭小的碉堡内顿时浓烟四起，呛人肺腑，催人泪下，敌人顿时丧失了战斗力，无法坚持，只有缴械投降。俘虏们一个个红着眼睛、打着喷嚏走出碉堡，还诧异的询问我军：“你们用的什么武器？”战士们风趣地回答说：“这是我们的飞雷烟幕催泪弹！”

可是，在围砦里却没有找到那个矮小的孙良诚。一问才知道他已在前天下午坐着汽车到开封去了。只捉到他的参谋长甄纪印，孙良诚却侥幸漏了网。

当战士们把这个参谋长带到曾思玉面前时，他只是惶恐地点头哈腰。曾思玉说：“你是汉奸孙良诚的参谋长吗？”他连忙说：“是，是，小人该死，目光短浅，请求贵军宽恕，再也不当汉奸了……”曾又问：“孙良诚什么时候走的？”他答：“16日下午乘汽车到开封去了。”曾说：“那你成了替死鬼。”他连忙点头：“是的，是的。”曾说：“你知道我们要来消灭你们的行动吗？”甄纪印答道：“万万没有想到，贵军会乘这样狂风之昏夜里来打八公桥。真是神兵，真是神兵。”

我军攻克八公桥，震撼了整个伪第2方面军。紧接着我军又拿下了敌外

围的徐镇、王郭村、梁庄、保安集等据点，全歼守敌。在这连续胜利的声威震撼下，周围敌人 17 个据点相继被我军攻克。友邻部队在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又接连在方圆 200 余里的广大地区内拔掉大小据点百余个，歼敌 3000 余人。伪王清瀚所部和河北保安第 12 纵队在濮县坐立不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终于 11 月 26 日放弃了濮县一带的据点，向濮阳抱头鼠窜而去。从此，我中心区与第 3、4、5 军分区连成一片，完全实现了军区作战会议所规定的战役目标。

运用偷袭战法，绕过敌人坚固设防的外围据点，直奔其中心据点，消灭其首脑机关，是曾思玉领导的又一次以极小的代价换取巨大胜利的成功战例。像这么巧妙的偷袭，在近代战争中是很罕见的。他事后对人说：“这是依靠人民战争思想取得的伟大成功。”然而，他运用人民战争思想精心设计所付出的智慧，不也是十分重要的吗？

在战斗中，不以当面之敌为对手，而是首先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这是八公桥战役的一大特点。事实上，这是一种迫使对方放弃战斗意志，向我方屈服的最好选择。我军置敌赵云祥和王清瀚部于不顾，直接偷击伪第 2 方面军总部，终于一举摧毁了敌人的指挥系统，使其部队成为无头苍蝇而全局动摇，仓皇撤退到黄河以南。于是，我大片根据地重获解放。

昆张地区飘红旗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这一定义看，八路军的每个指挥员都是政治工作者，而不只是管打仗的。具体到曾思玉，他既是军分区司令员，又当过团政治部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还当过支队政委、旅政委，是一位军政经验双全的高级干部。

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的 1942 年后，敌我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从长驱直入的大举进攻转入回师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妄图通过实行所谓“总体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快灭亡中国的步伐。为此，日军日益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和频繁“扫荡”，实施“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以求把我抗日根据地变为其“治安区”。鲁西地区地处津浦铁路之旁、大运河两岸，是日寇疯狂进攻的首要目标。从泰西至运东、昆张地区，很快就被日寇“蚕食”分割，变成了沟墙纵横、碉堡如林的“格子网”。当时部队中流行着两首小诗，描写这种情景：

（一）

驻军碉堡下，
夜观敌营灯。
行军必过路，（即敌人控制的公路封锁线）
天天有枪声。（即天天有战斗）

（二）

泰运那似濮范观，
行军作战不稀罕。
据点炮楼遥相望，

夜过公路一二三。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促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要更加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敌人既然是“总体战”，我军也必然是总体抗战了。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发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关系的决定》，简称为“一元化”决定。主要之点就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游击区的党政军必要时可以合并。这对于当时的鲁西军区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曾思玉为代表的第2军分区部队党委和领导同志，已经逐步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开始派出以正规武装的小分队组成的武工队。这种武工队人少精干，行动灵活，很便于在敌人据点之间开展活动。初期任务主要是采取巧妙手段去捕捉和镇压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为地方除害。这些人往往都是地头蛇，并有些是我军我党的叛变投敌分子。郟北的武工队先后除掉了侯集据点的汉奸薛成、肖皮口的汉奸队长“大洋马”，还有一个“红纱灯”，最后又以突然手段当场打死了叛变投敌后当了小据点伪军大队长的原教3旅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涂代德。镇压这些坏蛋，使大多数伪政权和伪军人员受到震撼，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怕被我武工队抓住。此外，武工队的活动也大大鼓舞了敌人占领下的原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使他们坚定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斗争经验使曾思玉和其他党委成员受到了深刻的启发，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在敌人疯狂“蚕食”、分割的情况下，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派遣精干的小分队和武工队，在“格子网”里坚持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也是和敌人争夺人心的斗争。曾思玉说：“我们必须在广大的敌占区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树立起一面不倒的抗日救国的鲜明的红旗。”

于是，第2军分区首先派遣了以吴忠为支队长、昆山实验县委书记邵子言为政委的昆张支队。这支小部队1942年冬曾插入敌占区，但由于敌伪据点互相策应，我军每到一处，周围据点立即一齐奔袭而来，部队一夕数迁，天天作战，弄得十分疲劳。至1943年春，第2分区党委认真总结了该支队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敌人的特点，研究了对策。曾思玉及时提出：改变正规部队的一套方法，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树立敢于深入敌后斗争的胜利信心，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农村和“格子网”里，进行合法的与“非法”的斗争，树立长期打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创造将来一举把昆张地区完全解放的“一锅端”的条件。

对这支游击支队，他又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这是一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党、政、军、民结合的游击支队，组织要严密，人员要精干，纪律要严明。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工作员，要能够在敌人“格子网”里站得住、走得开，分合自如，行踪无定，敌人找不到，老百姓天天见，与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等各种形式的斗争。

支队长吴忠是第2军分区最年轻的红军干部，“抗大”毕业生，曾任第8团作战参谋，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又熟悉鲁西地区的情况。当年他刚23岁。政委邵子言是大学生，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优秀的地方干部。他们把这支游击队从穿衣、走路、宿营、吃饭等各方面都实行

了彻底的转变，完全抛弃了正规部队那一套，创造了适应斗争的新方法，从而大大改变了斗争形势。

事实证明，曾思玉一系列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从 1943 年春开始，昆张支队先后 3 次插入敌占区，不但站住了脚，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对敌斗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深入敌人心腹地，神出鬼没，活动于据点之间，广泛发动群众，机动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大小数十仗，每仗必有所获。昆张地区有敌伪数十个据点，数千名日伪军，却对这支 200 人的小部队毫无办法。敌人一提起昆张支队和吴忠的名字，无不胆战心惊，许多据点的伪军被打得服服贴贴。支队有时事先预告某些据点的伪军，说我军将于某月某日通过他们那里。到时他们即紧闭大门，老老实实地看着我军通过，或者对空乱放几枪，装装样子。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也不敢轻易出动。

昆张支队实行正确的政策，打击铲除最坏的敌人，争取那些可以争取的人员，采取一次打痛、随捉随放、及时进行教育、订立条件加以利用等方式，争取了一些大股伪军为我所用。

这些经验立即受到冀鲁豫军区和地方党委的重视，很快在全边区推广开来。当年全区共组织派出 100 多支小分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到 1944 年 6 月，昆张地区大小 20 多个据点一夜之间被我军一扫而光，伪军起义投诚者千余人，达到了“一锅端”的预期效果。

事后，曾思玉回顾这一段斗争过程时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这么说：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定的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曾思玉认为，昆张支队的斗争，虽然仅仅是在一个狭小地区的局部情况，但却是最充分地实践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

事实正是如此。在敌人疯狂“蚕食”分割的形势下，执行小分队活动真正起到了振奋人心、争夺人心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而不只是军事斗争一个方面，曾思玉和第 2 军分区的同志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明确地认识，所以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得以胜利渡过一个个难关。正如广大群众所说，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这是一场政治上的大胜仗。

有的人总以为小分队没打什么仗，歼灭敌人不多。曾思玉却不这样看，他总是十分注意从政治上看问题，总是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因此，第 2 军分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现象。

顽军齐子修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之后，他的部下第 9 团团团长张心泽（绰号张大脚）却毅然决然地宣布脱离齐子修，率领全团 300 多人于 1943 年 4 月反正，投奔曾司令员，并奉命改编为冀鲁豫军区抗日第 3 支队。

此后，张大脚继续带他的部队并被委任为司令，这是他没想到的，但却是曾思玉贯彻党的政策的独到之处。军区还从武器装备上、人员上给他进行补充，派去的政委李中勋又处处尊重他，使他心中的一切顾虑完全打消，日后在抗日战场上立下不少功劳。有些伪军头目只要看见他来劝降，就立即投降，因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对待日本战俘，在第 2 军分区也有些很有趣的事。水野靖夫被俘前曾想自杀也不当俘虏，被俘之后也是顽固不肯说话，也不吃东西。可是经过分区敌工科长戴德的耐心帮助，他觉悟很快，还当了训练我军九二步兵炮的教员

和刺杀教员。在后来的多次战斗中，那门九二步兵炮常常是曾思玉指挥，由他瞄准发射，可说是发发命中，为战斗的胜利立了功。水野靖夫和杨勇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杨勇生前，水野靖夫几乎年年从日本来北京看望他。提起这个罕见的从敌人到朋友的故事，冀鲁豫战场上的老兵们无不感慨万千。

从教3旅到第2军分区，始终坚持着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十分重视部队的宣传工作、内部教育和文化生活。

曾思玉除了指挥打仗，还特别注重宣传队（剧社）的建设。教3旅从旅到团都有一个小小的宣传队。这是一支战勤工作队、群众工作队，也是一支小小的干部培训队。每到一地，宣传队都书写墙壁标语和画壁画。特别是壁画，可说是教3旅的一大特色。此外，还搞街头化妆宣传、小型演出以及召开群众会，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宣传干事张富枕的一幅壁画，曾使“扫荡”边区的日本兵引起思乡厌战情绪，只顾看画而迟迟不愿前行。气得日本军官又打又骂地去赶开那些站在壁画前不走的士兵。张富枕还搞过邮政宣传，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邮戳去唤醒敌占区人民和伪政府、伪军人员的民族意识。

部队唱歌是从红军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光荣传统，每一次大的胜利或一个历史时期总要写一首歌。例如：1937年汾离公路三战三捷之后，部队就唱过“大战午城镇”的歌；在冀鲁边区曾唱过《冀鲁边进行曲》；1941年结束时，曾唱过《胜利的1941年》的歌；1942年还唱过“黄河两岸锻炼精兵，西北吹来文化风”的文化学习歌和《纪念五五学习节》的歌。为了学文化，在教3旅还推广过第8团第3连创造的“三八三自来水笔”。这是战士们在学文化中用子弹壳制造的可以装墨水的土造笔，对解决学习困难、提高学习兴趣曾起到很大的作用。

教3旅（后为第2军分区）的机关报《挺进报》是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一张油印报，在部队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战士干部都抢着看。

这一切，无不凝聚着曾身为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和司令员的曾思玉的心血。当然事情是大家做的，而他的倡导支持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当代兵家的风采

曾思玉在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战争中打了许多胜仗，可以用“屡立战功”来称赞他。他率领的部队主力之一就是第7团（即现在的第16集团军第46师第136团）。这支有着红军传统、来自井冈山的部队，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更加发展壮大，更加坚强无敌。在几百次战斗中，都是勇猛顽强、机智灵活地消灭敌人，完成任务。不管环境多么艰苦，不管战斗多么频繁，都保持着常备不懈的饱满的战斗热情和高昂的战斗士气。该团八年中涌现无数的战斗英雄，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真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部队。第7团第7连指导员石玉昌写过一首诗，题为《我们歌唱你，七团》。诗中这样写道：

从不停歇战斗的翅膀，
从不放下战斗的旗帜，
我们歌唱你，
人民所敬仰的7团。

从沙区到清丰，
你们一夜拔了3个据点。
清丰人民，
永远想念着7团。

今年的四五月，
你连放了一炮、两炮、三炮、四炮，
打开了卫城、昆张、清丰的局面，
人民的麦子才安稳收好……

永远该记得，
青纱帐时节，
刘本功为什么不再疯狂？
为什么向我们低头的？
是他决心向善吗？
不是，
因为你打掉了他几千爪牙，
攻克了肖垓、付庄、白虎集，
铲除了层层木栅、层层碉堡。

在苏北、湖西，
7团如响亮的战鼓。
枪声响处，铁兵到处，
反动派的铁壁应声而倒。
耿聋子的新徐州，
时锡九的插花楼，
还有那些、那些……

数不清的围砦、深壕。
那一个个残害人民的坏蛋，
哪个没遇到7团的刺刀？！
新四军是我们的弟兄，
反动派想拔他们的汗毛。
你们南下，冒着风霜，忍着饥渴。
为了什么？弟兄的感情吗？
不是，那是正义的辛劳！
在皖北，你们的雄姿，
给人民增添了胜利的微笑！

南进北上，
往返数月，
衣服烂了，鞋子破了，
你们毫不在意，
一口气又将寿张县的敌人干掉！

高举胜利的旗帜，
从不停飞战斗的翅膀，
我们歌唱您 7 团，
你们是党的一支坚强力量！

……

第 7 团所以能够取得一次次胜利，当然是由于它具有坚强的诸多因素所形成的战斗力。然而，要充分地发挥战斗力，还要有一个明智而果断的指挥者，那就是曾思玉。

曾思玉不是盲目地、莽撞地带领第 7 团打仗，也不是轻易地下决心打仗，而是处处遵循、运用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因而，他指挥下的第 7 团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创造了灿烂的战果。

让我们看一看第 7 团所经历的一些主要战斗的情况：

潘溪渡伏击战之所以取得完满的胜利，达到了歼敌夺炮的预期目的，就在于战前的周密准备，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并不是像诸葛亮那样用八卦、周易算出来的，而是经过细致的侦察以及实战观察准确地掌握了郟城、侯集之敌的行动、作战规律及其战术特点。同时，对设伏地区的民情、地形，指挥员也是了然于心，因此才能够下定实行围城打援的正确决心。这是建立在科学预测基础上的战斗行动，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结果。

“九二七”甘草垴堆突围的胜利，是更为鲜明的一次生动实例。曾思玉远离领导机关，手边也没有什么参谋人员，只率领着一支不足 300 人的部队，却能够在日寇有计划、有预谋的所谓“铁壁合围”的重重包围之中，沉着冷静地观测情况，分析敌情，采取了最恰当的集中火力、集中兵力、宽大正面的突围战术，取得了成功，保护了许多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这是什么原因？其关键就在于他在危急中始终沉着机警，不停息地分析当面的情况，而不为日寇气势汹汹等表面现象所迷惑。在实际观察中，在第一次突围不成的教训中，他看出了敌人的破绽，找准了敌人的薄弱之点，在宽大正面上以 18 挺轻机枪同时开火，形成了以宽对窄、以集团对单兵、以强击弱、以突然对不备的态势，终于打破合围。这不正是最生动最典型的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吗？

八公桥偷袭成功的战例，是曾思玉善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例证。他采用的是掏心和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当然，军区作战会议上确定了偷袭敌人中心点、打掉其统率部的作战原则，而且举全区部队一齐行动，侧翼也有了一定的保证。但是，在具体作战行动上，曾思玉不因气候变得恶劣而犹疑，而是看到气候越恶劣越有利的一面。部队在开进中，不走村镇，不惊鸡犬，从漫漫的黄河滩与广阔的农田中经过，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敌之前沿。这是十分精彩的一着，出的是军事经典上最为重视的“奇兵”，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

运用小分队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插入敌后之敌后，当然并不是曾思玉一人所发明；但是，具体到在昆张地区的吴忠、邵子言支队如何行动，却有着他的一份心血。他把人民群众仇恨敌人、心向抗日这个条件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因而预测到小分队可能在敌人据点如林的情况下站住脚根。同时，他把我党我军的各种政策的威力也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因而在攻心方面取得

成功。正由于他正确地分析了敌我之间的优劣变化，所以小分队在对敌政策上取得了成功，大大地扩大了我军的有利条件。这种从不利变为有利的转变，应该归功于他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

在其他几次战役战斗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在郟城以北讨伐汉奸刘本功的战役中，我军是以大规模地同时进击若干据点的办法，迫使敌人无法处处增援，最后集中于刘口的一个据点内，这时我军再集中炮火猛烈轰击，造成瓮中捉鳖的局面。同时利用了气候上的有利条件——炎热酷暑，小小据点集中千余伪军，饮水都无法解决——迫使敌人全部投降，并造成了十分强烈的震撼，使千里金堤封锁线崩溃于一旦；而我军付出的代价很小。

又如 1944 年的清丰战役，强攻南乐、朝城以南战役，奔袭寿张县城，强攻阳谷城、郭小寨等，曾思玉在指挥艺术上突出表现。至于 1945 年日本投降前后大反攻中的几次战例，虽已是大兵团行动，但每次胜利都有其特点。仅举一两个例子：

对郭小寨伪军孙步月的歼灭性打击，是我军在 1944 年局部反攻接连取得胜利的强大声威条件下，对广大群众万分痛恨的孙步月实行的吊民伐罪式的大张旗鼓的讨伐。尽管敌深沟高垒，战力顽强，但从政治上我军占了绝对优势。我军士气十分高昂，群众全力支援，敌人则处于政治上的劣势，士气低落，已走投无路。曾思玉以极有把握的胜利信心，鼓舞整个部队，在每个关键时刻总是亲临现场，身先士卒。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中，九二式步兵炮发生了膛炸，二炮手牺牲，班长负重伤，站在炮位旁的曾司令员也被炸伤了右腿。

南乐战役也是大兵团作战，由第 7 团担任主攻。这次战役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最后围攻日军据点时第一次爆破未能奏效。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再次攻击的时候，传来了“大名日军出动，军区指挥所和打援部队准备拂晓转移”的消息。这时已是深夜，如果拂晓前打不下敌人据点，问题就严重了。在这紧急关头，曾思玉、段君毅召集分区领导共同研究，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他果断地主张，坚决把日军据点打掉，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失去这个垂手可得的良机。这个决心是来源于他对情况的准确判断。他仔细计算了大名出援之敌到达南乐的时间（途中要渡过卫河，再加上打援部队施以阻截），并估计了我军最后解决日军据点所需要的时间，因而产生了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解决战斗的决心和信心。这就是曾思玉所具有的一种机智、敏锐果断的作战特点。

在其他方面，曾思玉也是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的。

比如对九二式步兵炮，他非常重视其作用。从夺炮到造炮弹他都是最积极、最热心的人。但这决不能认为他是唯武器论者，只能证明他既重视人的因素，也重视武器的作用。有些时候，恰恰证明他是在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的基础上，来发挥武器的作用的。

还有一个小故事，也说明了曾思玉的机智。那是在 1942 年的羊山战斗中，第 7 团配合第 9 团在夜间一举袭击成功，进了羊山镇。但到快天亮的时候，伪镇长李连壁带着一小股伪军盘踞在“羊脖子”上的大庙内固守待援，居高临下，用火力的压制着我进攻部队。我军几次冲击均未奏效。这时天快亮了，人们都很焦急。曾思玉和第 9 团团团长何光宇等人一起到阵前观察，他随即向站在身边的训练股长王正南说了些什么。只见王正南这个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神枪手顺手从战士手中拿过一支马步枪，找了一个有利地形，

对着大庙的射击孔“叭，叭，叭”连打了几枪。敌人的机枪立刻成了哑巴。我进攻部队一下子冲上去，很快就把大庙攻下来了。李连壁这个汉奸慌忙狼狈逃走。羊山战斗胜利结束。

作为一个指挥员，曾思玉是我军许许多多的将军之一，也是善于因时因地运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来解决作战问题的佼佼者之

1973年，曾思玉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时候，曾陪同叶剑英元帅视察了外长山要塞的军事设施。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其中谈到三国时的赤壁之战，也谈到了现代技术装备的重要性。当晚叶帅乘兴为他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横槊临江喜赋诗，
曹瞒当日耀雄姿。
看今导弹挟潜艇，
征服五洋任所之。

闪光的一级独立勋章

1955年，曾思玉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这一枚闪着金色光芒、镌刻着延安宝塔的独立勋章，无疑铭记着曾思玉在抗日战争中的汗马功劳，铭记着他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流血流汗的八年奋斗的心血。

从1940年春天到1945年冬这6年半的岁月里，他无一日不是处在艰苦转战、炮火硝烟之中。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苦心探索，多少个日日夜夜的风霜雪雨，他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壮志豪情以及满腔的热爱都献给了神圣的祖国，献给了人民大众。仅在冀鲁豫地区，他参加大小数十次战斗，取得了非凡的胜利，和当地军民一起粉碎了日寇征服华北的迷梦，打垮了汉奸走狗们卖国求荣的妄想，使得冀鲁豫这块平原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曾思玉率第7团攻克了清丰县城，活捉了伪道尹薛兴甫以及大名、南乐等十几个县的日本顾问。此后从局部反攻到大反攻，先后打下南乐、寿张、东平、阳谷。大反攻开始后又连克封丘、延津、滑县、汤阴等城市，捷报频传，人心大振。冀鲁豫区的部队越战越强，他与杨得志、苏振华一起组建了我军第一支野战部队——第1纵队。

试想，如果没有抗日武装的斗争，没有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冀鲁豫的广大人民群众还不知要遭受怎样的灾难呢！仅以日寇1941年3月对我沙区进行的“毁灭性扫荡”来看，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把114个村庄夷为废墟，杀害无辜群众4000余人，砍掉枣树5万余株，烧毁房屋1.2万余间。有一个村里共7口水井，其中有6口井填满了中国人民的尸体……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有了抗日的主力部队和广大人民武装坚持斗争，才使得边区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从广义上说，正是曾思玉等抗日将领及广大指战员以无比的顽强战斗，打破了日寇的“扫荡”和封锁，才保卫了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不受蹂躏。正因为如此，人们从闪闪发光的勋章上看到了八路军广大指战员不朽的功勋，也看到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上这光辉的一页。

这就是曾思玉和他的战友们所书写的古战场上的新篇章。

